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Peng Shu,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The portrait i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彭述之 口述

法文本編撰者：

程映湘、高達樂 (Clande Cadart)

中文本譯者：

周任辛、葉向陽



彭述之回憶錄

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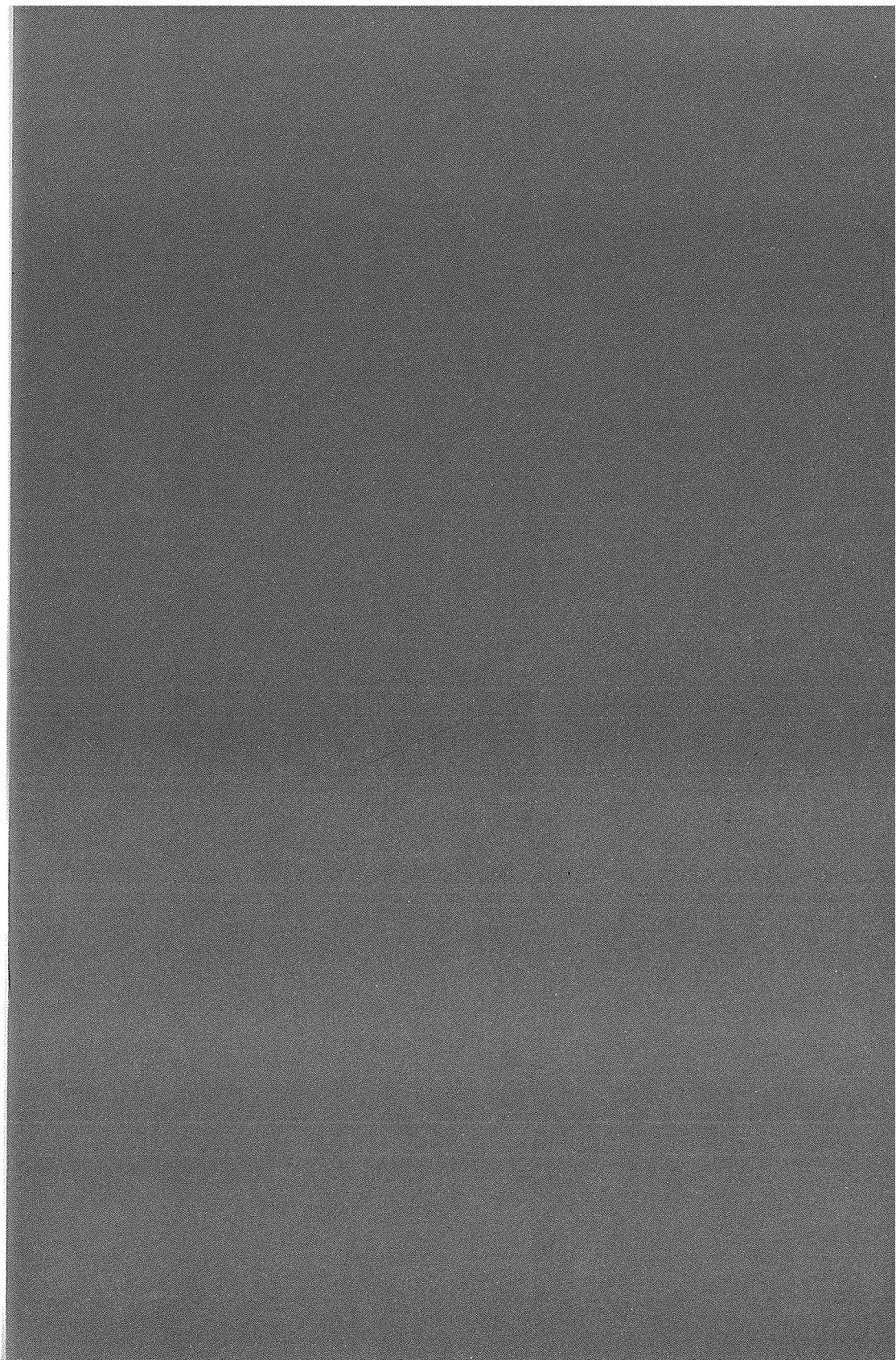
共產主義在中國起飛 (1920 -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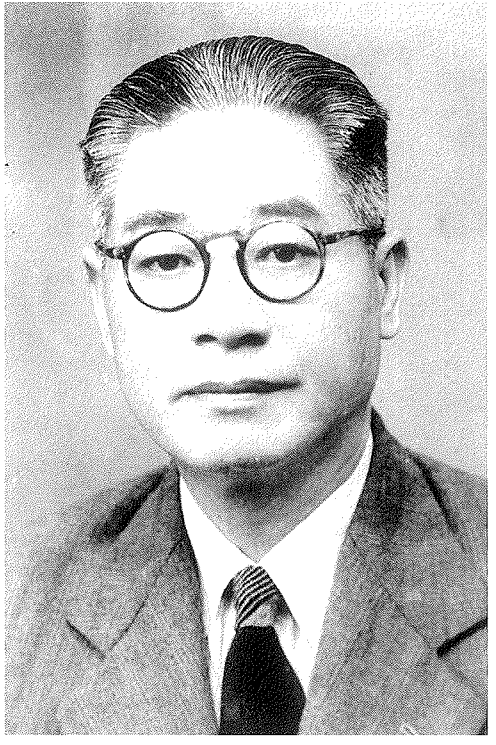
第二次革命 (1925 - 1927)

中國托派運動 (1929 - 1983)

上卷

天地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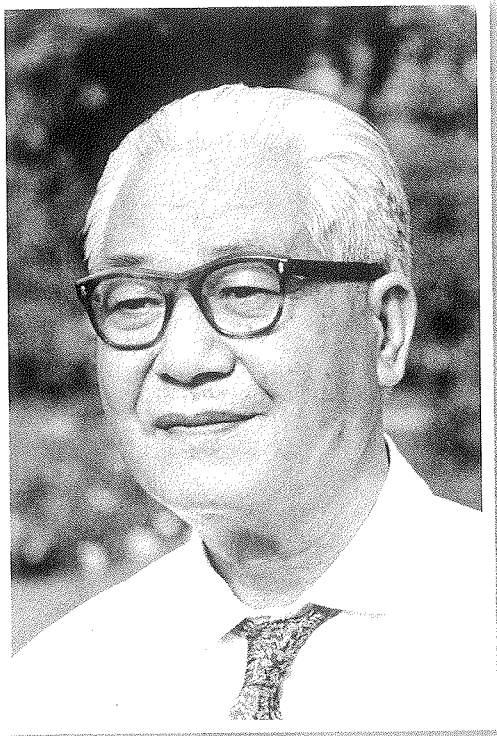




彭述之 1937 年攝於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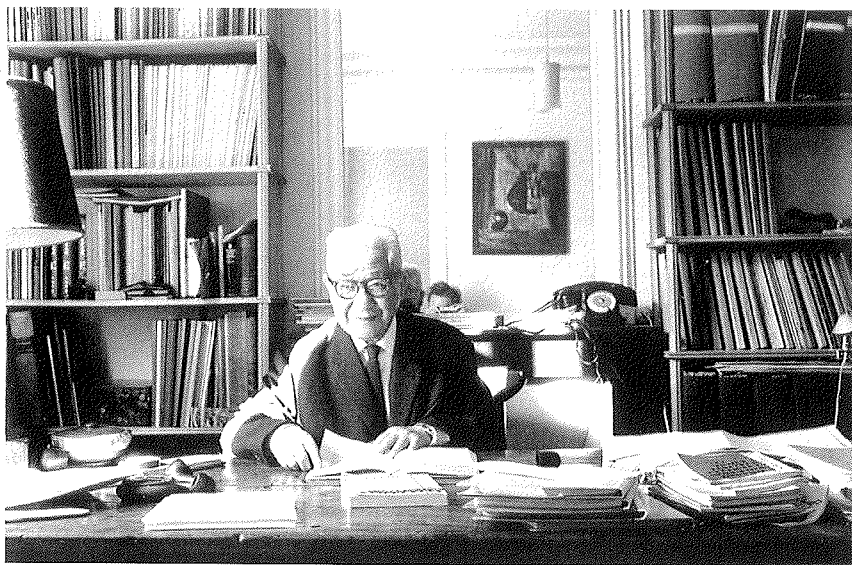
彭述之與夫人陳碧蘭 1955 年在法國凡爾賽



1965 年彭述之攝於巴黎



1971 年陳碧蘭攝於巴黎



1971年彭述之在巴黎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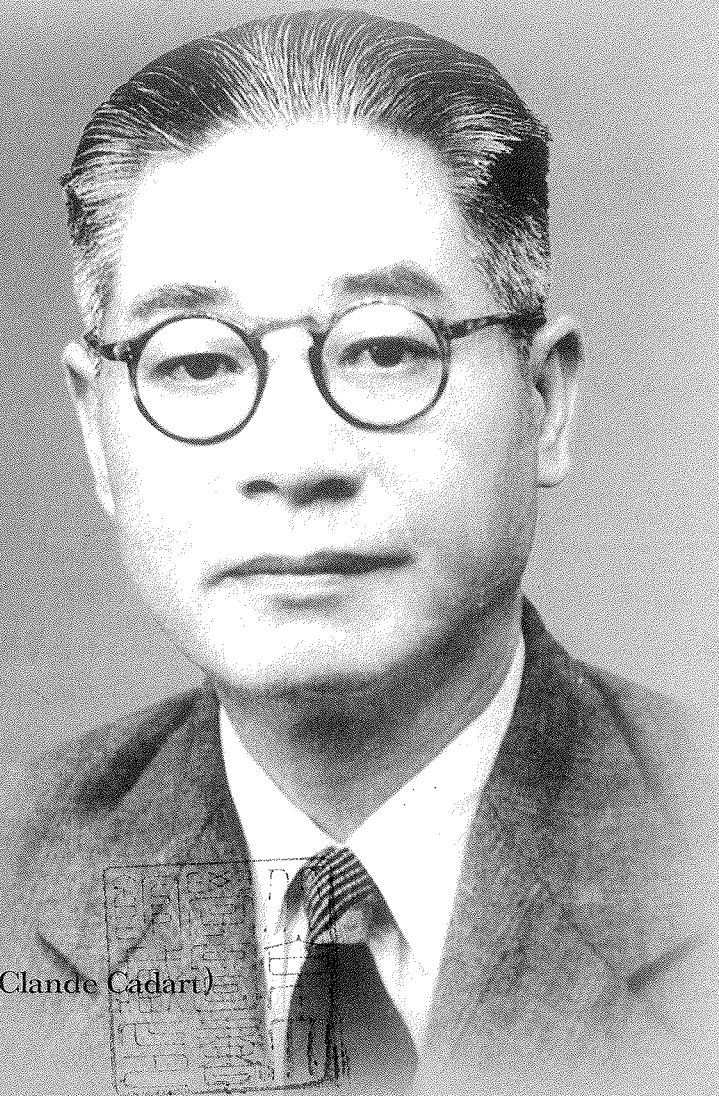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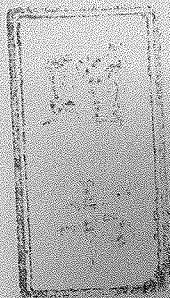


1978年彭述之與夫人陳碧蘭在洛杉磯



1978年彭述之與夫人在洛杉磯

K827.7
949(上)



彭述之 口述

法文本編撰者：

程映湘、高達樂 (Clande Cadart)

中文本譯者：

周任辛、葉向陽

彭述之回憶錄

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

上卷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彭述之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

口述 彭述之

編撰（法）程映湘、高達樂（Clande Cadart）

譯者（中）周任辛、葉向陽

責任編輯 顏純鈞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

智群商業中心 15 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 / 1 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 / 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6

ISBN：978-988-8257-10-2

目錄 (上卷)

告讀者 (代序) 彭述之.....	4
第一章 隆回區鄉村的「樂園」	7
第二章 光芒終於照耀我的心靈	29
第三章 黃興和宋教仁的勝利	57
第四章 從城市到農村，愛國運動風起雲湧.....	83
第五章 走共產主義之路：向湖南第一位共產黨人賀民範學習.....	117
第六章 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及其四位助手	141
第七章 上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走向勞動界， 反對改良主義，批判無政府主義	181
第八章 踏上蘇維埃國家，為西伯利亞中國勞工服務	207
第九章 任駐莫斯科中共小組書記，入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243
第一〇章 1923-1924 年在莫斯科，大批年輕中共黨員到達東方大學	297
第一一章 列寧逝世，鬼蜮登台，我回中國	323
第一二章 我黨路線的調整：國民黨捆住中共黨員手腳， 我向中央陳情	357
第一三章 一個風狂雨驟的秋季，我們從防禦轉入進攻	409
第一四章 敲響警鐘的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445
校後小記 蕭舟	469

告讀者

(代序)

本書是我兩卷回憶錄中的上卷，寫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始時期；下卷寫的是中國第二次革命時期（1925-1927）¹及中國左派反對派在中國進行的三重鬥爭：反對以王明和毛澤東為代表的斯大林主義；反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反對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帝國主義。

我的回憶錄，是由三個人在很長時間裏共同作出巨大努力後的成果，這便是我本人，程映湘和克勞德·高達樂（中文名字高達樂）。程映湘和克勞德·高達樂都是研究當代遠東史嚴肅的歷史學專家。他們兩人之所以對本書具有合作身份，最主要的因為前者是我的女兒，後者是我的女婿，所以我選擇他們作為我的合作者²。

我的回憶錄資料來源由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是我本人寫的材料：有關我青年時代後期的情況；有關我所知道的1920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有關陳獨秀意外「失蹤」之後於1926年1月間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非常會議；有關1926年「三·二零」事變後，我在廣州所執行的使命；第二部份，是為數眾多的，有系統的談話記錄，這是1969-1982年間程映湘、高達樂斷斷續續

注意：書中所有註解，由程映湘和克勞德·高達樂二人負責整理。

1 自20世紀初以來，在中國曾經舉行過三次革命：第一次為1911年辛亥革命；第二次為1925-1927年革命；第三次為1949年革命。

2 程映湘和克勞德·高達樂都是法國政治學基金會和科學研究院國家中心的研究員。

地，也可以說多少帶點定期性地與我進行談話的記錄，其中大部份有錄音磁帶；第三部份是由程映湘和高達樂在收集與我有關的政治事件的第一手資料（期刊、小冊子、檔案等）中經過嚴格精選並細心研究之後得來的成果，他們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曾經前往法國、美國和日本等國高級圖書中心查閱資料，然後由程映湘、高達樂用法文重新編寫過，因此，我的回憶錄是一部三個人合作的著作。

現在這一卷（即上卷）手稿，由我的女兒全面地從法文轉譯成中文讀給我聽過，因此我有可能對資料進行仔細檢查，並嚴格地提出評論，要求她重新校正調整，直到我感到滿意為止，我可以說，像經過這樣的變動而終於完成的著作，像大家在下面看到的所發表的著作，（其一切敘述是完全忠實於我曾生活過的政治事件程序、我的事蹟、我的行為風格以及我的思想演化的；我還可以說，這部著作事實上是同我本人親自所寫的完全一致，如果我有這種可能的話。）

正如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兒和女婿所一致希望和確信的一樣，我的回憶錄必將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始階段，中國第二次革命及其帶來失敗後果的歷史，做出特別有益的貢獻，也為我們時代同類的中國史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貢獻，其理由有二：第一，在所有我曾作為積極行動者或歷史見證人的一系列事件中，我的敘述方式既是嚴密確切的，又是全面翔實的，人們不難從我的深入透徹、前後一貫的邏輯中揭示多層面的歷史事實。第二，幾十年以來，那些蘇共史家、中共史家，秉承斯大林、毛澤東及其代理人 and 繼承者們的旨意，大肆宣揚的各種各類謊言，都可從本回憶錄中，以極其中肯、明確、合情合理的批駁揭露中被撕得粉碎。我作為一名終身戰鬥的革命戰士，在我的回憶錄中專心致志地重

現最富有最大意義的歷史情節，我到底是為了甚麼呢？最終說來，我是為了恢復歷史真面目而努力，除此以外，別無他求。為的是使中國國內和國外的新生一代永遠擺脫幾十年來所有國家的斯大林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國主義者，強加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謊言和偽善的沉重的枷鎖；願我們這些中國人敢於面對剝去一切偽裝的，既是雄偉壯烈，又是陰森可怕的我們革命的過去；願全世界的中國人都要深入思考，我們的不幸、我們的悲劇發生的原因；願我們從我們的莊嚴崇高而又悲慘苦難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使我們能繼續沿着解放全人類的光明的前景而奮勇前進！

彭述之

1982年2月

第一章

隆回區鄉村的「樂園」

在湖南的西南部，五嶺高原的中心，有一座小山村，叫銅鑼村。我於 1895 年 11 月 26 日就出生在那兒。也就在那兒我度過了整個童年以及青少年時代的一部份。

銅鑼村所屬的隆回區，在我童年的時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區：這是一個「司 (si)」，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土司 (tusi)」，即土著人的區，一塊獨立的土地，其實質與 50 年代中國的「少數民族的小區域」類似。我們區最初的居民其實是瑤族人：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曾看到這些瑤族人的後裔，這些朝氣蓬勃的男子漢們生活在銅鑼村旁的黃泥山的窯洞裏。他們不時地用從荊棘裏採摘來的草藥與我們換糧食。他們曾被迫把這個地方一點一點地讓給來自中國北方的漢人，而這些漢人於西元 4 至 14 世紀，由於蒙古人以及源於阿勒泰的蠻夷人的侵略，一批又一批地逃亡。他們擁向江南，即相當於今日的江蘇、安徽兩省，然後是江西省。他們「和平」地在湖南殖民，直至又開始滲透到貴州。

在我小時候，許多湖南人就不再稱呼江西人為「老表」了嗎？我家所屬的隆回區的彭氏族譜（一代又一代的宗祠管理人驕傲地細心保留着），難道沒有寫明本族的祖先，即第一位敢於在 17 世紀（明末或清初）¹ 定居在隆回的土著人聚居區的彭姓人，是一位從江西某縣來的家底殷實的漢人嗎？

隆回區，在我小時候，屬邵陽縣，邵陽縣屬寶慶府。隆回區遠在邵陽縣西部，四周為懸崖，高山環繞，似乎懸掛在天與地之間，與世隔絕。儘管它靠近新化縣中央那些秀麗的農村，隆回區被一座高山阻隔，難以逾越。這座山叫望雲山並非名不副實——凝視白雲的山。

隆回區土地肥沃，山間純淨的水源匯聚成的數不清的小溪灌溉着土地。乾旱非常罕見，大部份山上被森林覆蓋，免去了水災氾濫。而且由於其地理位置的偏僻，她也遠離了兵荒馬亂。茂密的竹林與種類繁多的

1 1644 年明王朝被由外族統治的清王朝滅亡並為後者取而代之。清王朝由滿族人統治。

樹叢，使得隆回區永遠是一片綠色，給人一種巨大的自然公園的感覺。居民明白這個大的特權，聲稱（不管有沒有道理）他們一無所有，只有這個「世外桃源」。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曾在其名篇《桃花源》中給予濃墨重彩的精確描繪。

如果說這個「世外桃源」在短暫夢遊者眼中美麗絕倫，那麼它並未給那些必須一輩子呆在此地的人帶來福祉。儘管森林、木炭資源豐富，夏天還是熱得像蒸籠，冬天還是冷得直打哆嗦。山上時有七到十米長的巨蛇，除非你刺激了牠，一般不會向你進攻，但是情緒還是極易受驚；稻田、村莊裏也常有一兩米長的小蛇，同樣不能去碰牠們。而且，有時，人們還必須組織長時間、危險的搜捕老虎行動，因為老虎闖進農家的庭院內驅趕家畜或小孩。最令人不滿意的是在這裏看不見一點點世界文明激起的漣漪；去它所屬的縣以及府所在地寶慶—邵陽必須要步行二百里地；從寶慶去省會長沙還要走大約八百里。隆回土司（tusi）的極端偏僻決定了其非常落後，不管是物質上的還是風俗、文化上的。

七十多個村莊散落在高山峽谷之間，一個品質低劣的土路網及民間小道把它們連在一起，這就是隆回區。每個村莊都平均聚集了百來戶人家，這些村莊又分成四個區域，其重要性不盡相同。隆回鎮所在那個區最富裕，而第三個，即銅鑼村所在的區最小。

銅鑼村坐落在望雲山的峽谷間，大山俯臨整個村莊，或者說壓迫着它。這個村莊確實屬於隆回區最窮最落後的一個村莊。本村百來戶人家，只有三家把他們的土地租給那些一窮二白的農民耕種。三戶人家即我家，另一個彭姓家及一個蔡姓家。三家之間由於共同的祖先或婚姻關係緊密地連在一起，而且三家全部集中在村莊的一個區域。即便是這三家地主也遠沒有佔有本地全部的出租土地：他們不過是極小的地主。不管怎樣，除了他們以及那些少數可以靠種自己土地勉強餬口的幾家之外，銅鑼村就只剩下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永遠掙扎在飢寒交迫的底線上，尤其悲

督後，他繼一系列清朝大官僚後成為滿清末年最被人看中的總督管轄區的總督。此轄區由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組成。他像魏源一樣不為重回魏家村並在那兒度過餘生而操心。他於辛亥革命前在寶慶—邵陽以東約三十里的一個迷人的湖邊過着引退生活。1916年我偶然地來到此地並遇見了他。他把自己當官時積聚起來的巨大財富的很大一部份用來為其兄弟或侄子購買隆回區的大片田產，同時憑藉自己的影響力不斷地為其無數的叔伯兄弟及其他親戚安排差事或助一臂之力。

多虧了魏光濤，19世紀末魏氏家族就成為我們區最大的地主，也正因為如此，在我們這個地方他們成為能呼風喚雨的人。那些沒有田地或田地不足的同村人只得討好他們，屈服於他們的欲望，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而且隆回區的大清國官員當然無一不是他們的心腹。

隆回區大大小小村莊的大部份實際上是同族世襲的領地：居民均為同姓，而且人們用這些姓來命名村莊。例如魏家村、蔡家灣、匡家鋪。從人口分佈上來講，一個家族成為一個以上大小村莊的主人是很少見的。但是這並不是沒有。明顯的例子是第三區彭氏家族。第三區十幾個村莊中的四個是彭姓：其中三個是全部，第四個即銅鑼村是大部份。

家族組織——其最年長、最富裕、而且原則上最有教養的代表成為法律上及事實上的族長——主要作用是使家規延續及幫助其成員提高社會地位。為了發揮這兩大作用，一個家族會在自己家鄉村中建造與維護一個祖先的宗祠，並在自己所屬的地區所在地的城市再建一個科舉考試考生接待站（伺士祠），每年接待那些家族成員中最有天賦的人，讓他們去考取秀才⁶。

6 19世紀末中國晚清時期，一個人若要成為「士」以便有機會獲得官職，就必須考取以下三級考試（其難度遞進）：第一級：在考生的府所在地舉行，每年一次；考取人們通常所說的「秀才」的將被授予正式的「生員」頭銜。第二級：在考生的省所在地舉行，每三年一次，通過的考生被授予「舉人」頭銜。第三級：在大清的都城舉行，也是每三年一次，通過的考生被授予「進士」頭銜。最終，一位「士」成為「進士」後，即成為翰林院的成員。

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寶慶市最驕人的建築是寶慶地區五個區最有勢力的家族建造的一千餘幢考生招待所。其中有一幢，而且還不是最小的，是隆回區第三區的彭氏家族的。此家族的宗祠建在隆回區第三區純粹由彭姓居住的村莊的最富裕地區周圍，即離銅鑼村大約十里的地方，那兒的一塊土地佈滿了我們祖先的墳墓，點綴着幾片林地。宗祠由三個建築物組成，由又高又精美的貴重木材柱子支撐着三座建築物中最大那座的大廳的屋頂。大廳是個巨大的聖殿，裏面供奉的人像與牌位熠熠生輝，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死者均變成了半神。大廳極為寬敞，一到祭奠祖先的日子，裏面可以擺上近百張桌子，坐一千人同時用餐，然而，只是那些年紀、財產、行為學識與此場面相稱的族人才被允許參加宴會。但儘管如此人還是很多。即便四個年富力強又受良好教育的人來努力管理其財富使之正常運轉也不嫌多。這四位宗祠掌管者的產生比家族首領的推選要民主得多：他們由組成本族的大家庭階段性地進行選舉產生。

大石鋪的轎子舞

銅鑼村既有知識又有財富的三個家庭（即我家，另一個彭姓家與一個蔡姓家）中最有名的無疑是第二家，其原因非常簡單，即本家庭為能養育了一位神童彭育英（Peng Yuying）而甚感驕傲。

彭育英出生於 1888 或 1889 年。他六、七歲時我也來到人世。但他不是我的堂兄，而是我的叔叔。他不足五歲即能熟讀四書五經，不足七歲就能即興吟出形式簡單的小詩，甚至還會做幾個對子，這些對子正是創作律詞的基本要素。他的家庭教師，一位來自蔡家灣的蔡邦慶（Cai Bangqing），在他八歲時，就輕鬆地教會了他寫八股文。事實上，他後來的進步驚人，九歲時，其家人就不無理由地認為他能夠考取在寶慶舉行的由本府人參加的一年一度的秀才選拔考試。

雖然他算得上是位學者，但畢竟年紀太小，不便獨自赴考，他就在

規定時間由父親及家庭教師陪同前往。在他們的護送下他住到了我們家族的考生接待站。考試那天，他用自己的文字充份顯示了自己的才能。不久之後，他很高興地得知考官判定他完全符合取得秀才的資格。

這件事發生在 1897 年末或 1898 年初？我已不能確定。然而我能確定的是，彭育英不是邵陽縣當時唯一的獲得秀才資格的神童，還有一位獲得秀才資格的神童叫蔡更生。

與彭育英在 1897 或 1898 年學業成功後即無下文不同的是，蔡更生隨後馬不停蹄地，在蔡松坡或蔡鏗的名下，成為非常有名的人物，成為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堅定的革命愛國人士，而且直至 1916 年他逝世時都一直是位非凡的人物。難道不正是大部份由於他的努力中國才成功地動搖了賣國賊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根基，然後在 1915-1916 年間把他趕下台並扔進墳墓的嗎？實際上從一開始，即自 1890 年代初始，蔡更生其人其事在任何方面均比彭育英來得激動人心。

邵陽縣雖然不屬於隆回「土司」的一部份，但離銅鑼村只有 75 里路。在邵陽縣的某一個地方，19 世紀末有一處很大的住宅，裏面住着一位非常開明的地主，以及其親屬、孩子們。銅鑼村旁蔡家灣村的蔡氏家族的一個蔡姓家庭是他們的僕人。然而，就在這麼個顯然非常貧苦送其中一個子女上學都無法想像的家庭，在 1886 年或 1887 年的一個大清早誕生了一位不久後命名為更生的小男孩。

可想而知，蔡氏一家並不住在主人宅第的正房，而是住在偏廂房裏面。他們住處的旁邊就是主人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上課的教室。在教室裏面，老師每天訓練學生朗誦那些已給他們解釋清楚的課文並讓他們唸得滾瓜爛熟。自然，教室內講書背書、教室外均聽得一清二楚。而小更生從早到晚都在周圍走着、跑着玩耍，讓他聽見更是理所當然。小更生被朗朗的唸書聲所陶醉，他也跟着唸，感到好玩。不久，他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跟主人的孩子們一樣也成了讀書人。

幸運的是，家庭教師不久偶然地發現在牆外他還有一位叫小更生的學生可能比牆內的學生更有前途，這個在外面亂竄的淘氣學生卻有智慧的亮點。他就把這個消息告知了主人，即那個地主，主人即允許小更生入教室學習。到了五、六歲，這個僕人的孩子就跟主人的孩子一同坐在課堂裏。這孩子並沒有欺騙他們，相反，他很快就超過了成績最好的同學，雖然與他們相比年紀要小得多。而且在這位家庭教師與地主的雙重鼓勵下他去參加了寶慶府的秀才考試，即與彭育英同一年。

在中國，小男孩去考秀才還是較常見的現象。但是一個區去兩個小男孩而且一次性通過就不太常見了。這種成功不僅讓獲得此榮譽的當事人，及其家庭、家族感到光榮，而且也是他們的府、省份的光榮。但需明白的是，往往是兩個裏面那個更年幼的最受讚許。彭育英比蔡更生小兩歲，他就成為真正的小神童，而蔡更生就只能屈居第二的位置。

不過，蔡更生知道要通過行動來改變這種差別。他遂請求蔡邦慶，即彭育英的家庭教師，也收他為弟子。請求得到允諾後，他不能馬上回到家鄉的那個村莊。當時的禮節要求至少得陪伴着被其收下的先生生活幾天，並追隨着他。當蔡邦慶與彭育英回到銅鑼村，他就伴隨在他們的左右。他只是在隆回土司及邵陽縣的居民與鄉紳到銅鑼村慶祝彭育英榮獲秀才的第二天才被允許回到家鄉。

這種慶祝勝利的活動持續了多久？一天，兩天，八天？我不知道。但是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因為這是我最初記憶中的一個）這個慶祝活動的物質層面的內容：數十人的隊伍或數十個坐着轎子的顯貴們來向神童祝賀，而且就在我家居住的房子旁邊；大石鋪上不時地交通堵塞，豪華轎子來來往往。這是一個在銅鑼村人的記憶中從來沒有過的大場面。

但是，大多數人去拜訪小彭育英的動機，是出於尊敬還是出於好奇？更多是出於好奇。他們是想看看或親身體察這個「奇觀」，更為了考考他，給他出一些難題，或要他做對子：根據自己出的第一句現場對出第

二句，或者用某某題材做某一種小詩。但這一切也常常是同時出於利益考慮。事實上，完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小孩九歲時就能很輕鬆地就獲得秀才，那麼隨後獲得舉人、進士也不會費多大的勁，又有甚麼理由不讓他進入翰林院，以至一路爬上社會的頂層呢？而且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會成為最高一級的官員，為其家庭、家族、親友逐年積聚錢財或鞏固這些財富。那麼，為甚麼不抓住這個機會，讓自己的女兒與他聯姻，或至少是試圖把自己未結婚的那個女兒嫁給他？其實許多人就是設法這麼幹的。其中就有寶慶的主考官與知府，還有魏家村魏氏家族中的一家之主……

不管他們的腦子裏有沒有想着求婚，銅鑼村的顯貴們乘着轎子來沒有一個空着手的。他們都帶來一件小禮物給他們急於證實其天賦的這個孩子：最常見的是一本書、一本珍貴的或精美的書。這樣，彭育英就日漸一日地營造起了一個精良的藏書室，以至多年後我還能記得我去找他，請求借我幾本我急需的書。

我的小叔叔一回到銅鑼村，就不僅需要迎接來訪，還要出門拜訪別人。這樣其家族及同村的最德高望重的長輩就可以按情理不必走動登門見他就可以怡然地在家裏向他道賀。他就是以這種古老的「拜見長輩」的禮儀來看我父親，陪同的有蔡邦慶、蔡更生，同時在大石鋪上還伴有轎子舞。至於蔡邦慶和蔡更生，我真是一點也記不起來了。而我的這位小叔叔，我父親非常禮節性地把一條長長的紅色襟帶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以示祝賀。我忘不了那極度蒼白的臉色、不自然的表情、拘束的態度，以及非常削瘦的側影。

但是，很快地所有歡慶的小油燈就熄滅了。蔡更生也離開了我們。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彭育英這個名字重又消失在記憶裏。我的小叔比我大六、七歲，因此我不大可能在童年時常去他那兒。我想必是在十七、八歲時，與他建立了聯繫，而且還是時斷時續的，但是我不得不

說他不再出色。他九歲時由於學業優異而獲得的巨大成功使他得以與一個富裕地主的女兒成親，因此，他就可以不參加勞作，過着小鄉紳的那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乏味生活。

不幸的彭育英遠沒有從其早熟中得益，反而為其所毀，而且他自己也無能為力。在 1897 年（或 1898 年）是否曾有人向他提議去寶慶、長沙或武漢的「新學堂」求學，即進入類似於歐美發達國家開辦的中學或大學學習呢？當然有，但是在他的家人眼中唯有萬古不變的中國科舉考試是好的，因此就不加猶豫地回絕了這個建議。彭育英於是靜靜地留在銅鑼村，整日泡在晦澀難解的四書五經及其注疏裏，準備應考舉人……但是他再也沒有機會了。義和團運動後不久，他獲悉皇上頒佈聖旨要求永遠廢除科舉考試。他此時要轉變學業方向為時已晚。

無疑，蔡更生在離開家庭、蔡邦慶及我們這些銅鑼村的居民後，有着更多的機會。他很快地與其恩人即地主的一個女兒訂了婚，隨後被送到長沙入梁啟超創辦的時務學堂，當時一所著名的中學。我相信正是在這時他取名蔡松坡。在袁世凱的幫助下，慈禧太后非常成功地中止了百日維新。她理所當然地於 1898 年初秋下令關閉了新學堂，梁啟超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而逃亡日本⁷。蔡松坡也很快去了東京與梁啟超會合。在那兒他很快成為招收中國學生的日本最好的士官培訓學校的優秀學生。在此條件下他的光輝生涯開始起步⁸。

7 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是 1890 年代三位中國最先進的改革家。在 1898 年春季，通過康有為，他們成功地說服了年輕的光緒皇帝擺脫其姑母慈禧太后強加在他身上的嚴密控制並遵其意見執政。即發佈諭旨着手一系列現代意義的革新：徹底改革考試制度，重鑄中央行政，重建軍隊等。1898 年 6 月 11-12 日至 9 月 20-21 日期間他們進行的維新變法僅持續了一百天。在維新派認為最為可靠的人，即滿清新軍統帥袁世凱決定叛變他們後，慈禧太后下令鎮壓了這場維新變法。慈禧一旦恢復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急忙下令殺害譚嗣同及其他五個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由於及時逃亡才幸免於難。她又隨即囚禁了光緒皇帝，使他吸食鴉片。她曾於 1861 至 1875 年以他兒子同治的名義垂簾聽政；她要繼續以她侄子光緒帝的名義執政，直至 1908 年去世。

8 本書中彭述之知道的有關蔡松坡的事蹟，不管是上文談過的，還是下文即將提到的，主要源於與蔡松坡家庭關係極為密切的他的一個叔叔的講述。

歸根結蒂，蔡松坡有幸遇見一些思想特別活躍開放的人作為推薦人、引路人以及朋友，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成功的原因。而彭育英的不幸是他除了一些思想極端狹隘的人之外找不到其他的同路人，這基本上道出了他人生失敗、命運多舛、天賦被埋沒的原因。無疑地，我的小叔首先是隆回「土司」愚昧落後的犧牲品。不僅是他的，同時也是我的家庭環境反映了這一點。

三代同堂

小時候，我的家是最經典意義上的一個大家庭，一個真正的大家庭。這個家在同一屋簷下聚集了三代人：我的祖父母是唯一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家庭的代表，下面分別有我的父母、兩位叔叔、嬸嬸，兩位姑姑，最後是我們這些孩子們。三代人中第一代人對其他兩代人的權威，不管是按權力還是按事實來講，都是至高無上的。

我父親兩個妹妹中年紀較輕的一位，她比我僅大十二歲，我叫小姑媽，還沒有出嫁，因此她很自然地就與我們呆在一起，我父親兩個妹妹中年紀較大的那位，我叫大姑媽，已經出嫁了。她一年倒有一半時間住在父母家，帶着兩三個孩子（她總共應該有七個孩子）。她的丈夫姓羅，出身本是富農家庭，但隨着子女不斷增多，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家庭條件每況愈下，不久她們只能勉強餬口。

我的祖父從未過過窘迫的生活。他是一位頗有些名氣地主的三個兒子中的一個，也從事於米行生意，而且生意興隆。同時，也像他的兩位兄弟一樣，在其父去世後，他繼承了一大片土地，還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在我童年時期，這幢漂亮的房子，在我看來，簡直就代表着住所的全部意義。

銅鑼村有四個區，它們由起伏的地形自然劃分。大石鋪是望雲山上一處小小的隆起的地方。大石鋪當然是通向外地的通道。我祖父的房子

位於這條街東面的一片住宅區裏。這條街是本村的商業動脈，也是全村的交通幹線。

我祖父房子的屋頂，就像銅鑼村大多數的屋頂一樣，蓋上紅瓦，整座房子由三幢建築物組成，它們圍繞一個「大場」呈馬蹄鐵型。「大場」在8月份是用來打穀、曬穀的。其東面由「大石」俯瞰着，中間有一個大菜園和一個茂盛的果園；其北、南面均有竹林與珍稀樹林，夏季，在其樹陰底下孩子們能玩耍，大人們能乘涼。在這片竹林、樹林的周邊是平原、稻田。西面從我祖父房子俯瞰，可見庭院外面的池塘，房子高懸於池塘之上。而池塘本身也駕臨於大石街的一些店鋪之上。大石鋪的另一邊流淌着一條河流。池塘上面整日裏有胖乎乎的小鴨子晃着水，而水底下還游動着肉質鮮美的鮑魚，還有冬穴魚、鱸魚、歐鰻魚等等。房子的前廳還有一池清水，裏面養着鱒魚。在大庭院內，房子的南角有一株高大的李樹，其枝葉蓋住了池塘的一部份，在房子的北角，還有一口人們可以汲水的清澈見底的井。當我們離開庭院來到有緩坡的街上，這條街一直通向房子的正門，門口有永遠敞開着的木質柵欄，我們會發現在左手，在鱸魚、鱒魚暢游池塘的北面，有一片芋頭種植區，緊接着是一個小菜園，在其中的一個角落我們這些孩子可以種花。

只要越過木柵欄，再繞過小菜園，我們就可以回到了大石鋪。若向南走，就可看到約十五家門面簡陋的店鋪和手工藝店。其中五家差不多就背靠着我們的池塘。第一家，本是我父親的一個兄弟開的一家草藥店，現已成為雜貨店，樓上開了家小型客棧。第二家是有擋雨披簷但四周透風的小茶亭，第三家是小鴉片煙館，第四家屬於我的祖父，用作家庭的倉庫，同時也是進入大石鋪的第二個入口處。第五家是個寬敞的商店，其後面可見一處極為賞心悅目住所的外牆，曾經是祖父一個兄弟的財產，後來由其兒子繼承。我的祖父後來又從其侄子的寡婦那兒把這座房產買了回來。其侄子早夭後，妻子帶着她的四個孩子移居湘西，他們均為漆

匠、木匠。在銅鑼村這條大街南面有十數家攤店裏面，有一個涼亭，裏面生產豆腐，另外還有一家小客棧及各種小百貨店、酒店，裏面出售鹽、酒、煙、燈油、蠟燭、香、有時還有一點豬肉。

這兩家設備極為簡陋、接待能力至多八至十位過往銅鑼村的旅客的客棧，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然而，茶亭尤其如此。這是個供人停留的地方，在其長椅上誰都可以稍息片刻，並免費喝杯茶或熱水。茶亭供着一座令人敬畏的行路人的保護神關公像。其下面安了一個用燒土做成的火爐，火爐上面總是放着一個巨大的燒開水壺。負責茶亭的人由大家用穀物付給報酬。他整天在這兒呆着。每個季節都有大量的遊客在此停留，裏面有挑夫、苦力、流浪者，說書人或信使。冬天，當霧氣冰涼刺骨，涼亭便成為窮人、流浪者過夜理想的避難所，可以圍着火爐取暖。就是在這個地方，人們有許多機會看見那些從未見過的人，聽到外面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居住的小村莊、我們的「土司」、甚至是我們的府及省以外的事情。而且就在此地還有反映官方意見的佈告欄，上面有皇帝或其代表——當地的官員，向我們公佈重要新聞或者某個與我們有關的旨意。

我祖父房子的中心建築是一排二層樓房。共有六間，帶一個大客廳和一個大廚房。這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就在那兒生活着，他們就在那兒共同起居用餐。房子北廂也是一幢二層的建築。雖然這兒可能並非不能居住，但無人在此住，我們用它作庫房。房子的南廂是一座三層的樓房，很引人注目。底層是一個大穀倉，兩邊都是一個正方形的房間；二樓是個宴會廳，能同時宴請一百多位賓客，一邊是一個大臥室，另一邊是一個書房，來這兒讀書寫字可以免受干擾。

我祖父彭新解 (Peng Xingjie) 是一位非常樸實、心地非常善良的人。雖然他曾學了多年的四書五經，他的筆頭並不快。認識到自己並無從文的天賦也無追求功名的理想，他一成年就心甘情願地重新當起了農民。他自己僅僅耕種其父親留給他的一部份土地，其餘的他留作放地租。農

忙時節他會僱八到十個短工。不管是好年頭還是壞年頭，他均能不但養活全家還有些剩餘供出售。由於辛勤勞動、勤儉節約，他終於使祖上的土地產出纍纍碩果，並且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介於普通農民與小地主之間。

我祖父娶了一位離我們村三十里外的大地主的女兒為妻。她性情剛烈，而且文化程度也比我祖父高。我祖母陳氏就臨駕於我祖父之上。她不久即成為我們大家庭一位中心人物。所有最重要的決定最後都要通過她來做出。她不僅是女主人，還是一家之主。

我父親彭涵友 (Peng Hanyou) 在村子裏的私塾（一種傳統的私立學校）度過四年後，像他的父親一樣重新回到了土地上。他的哥哥彭涵才 (Peng Hancai) 也學了幾年經書，然後到一家中藥房當學徒。但是，他後來與另一個藥劑師在大石鋪上合開的藥房根本沒有生意，他不得不停辦，重又回歸土地。而我父親的弟弟彭涵澤 (Peng Hanzc)，一直讀書至二十歲，能寫得體的文章，穀倉上面那個書房架子上主要是他的書籍。除了像彭涵友和彭涵才那樣生活外，他別無選擇：經驗告訴他，他的文學才能毫無用處，只能重新成為農民。

把我的大家庭看作是一個真正的農民大家庭，這一點也不過份。我的大家庭具有農民的一切美德：吃苦耐勞，民風純樸等等。但同時也異常保守。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生產方式，這個家庭均嚴格恪守舊習俗。

僅僅消費其徵收地租及出售剩餘穀物後收入的一部份，僅僅用去其勞動收入的一部份，這個家庭無疑地本可以衣食無憂。但是，這個家庭遵守全世界鄉下人過度節儉的美好傳統，一直過着苦行僧式的生活。

我們都穿着粗棉布衣服，上面縫着補丁，一直穿到露出織線。我們的三餐無一例外是毛糙米加只用幾滴油煮的蔬菜。只是到了舊曆新年以及其他中國公認的節慶日，我們才可以吃肉，才能品嚐我們自家養的豬、鴨子、鯉魚的味道。當然，對我祖母來說，節慶日一頓飯只能上一個葷菜，即一盆裏面主要的成份是肉或魚。但是這兒也有個例外，同時不打

破規矩。一種大豆發酵後的凝固物，即豆腐，是唯一的一種既有營養又美味可口的食品，而且在節慶日之外的日子吃似乎也不違規。但即使是這麼微不足道的享受我們一月也只有幾次，因為我們必須去購買，規矩是我們只能吃我們自己生產的東西。一句話，我們只是有甚麼吃甚麼，走在街上不赤身裸體就滿足了。舒適、娛樂遠離我們，衛生保健也是可望而不可即。衛生惡劣，營養不良及其後果，造成了疾病氾濫，大部份是傳染病，特別是皮膚病。

我的祖父母很寵愛我，這並不僅僅因為我是他們的第一個孫子。我常生活在他們周圍，直至我十二歲還跟他們睡在同一張床上。而我的父母就顯得比較疏遠。我父親因為整日在田裏勞作，對自己的孩子們少有關心。農村的習俗不是認為男人不必為孩子們操心嗎？而我的母親，一位田姓女子，她總是超負荷地幹活與生兒育女，怎能有時間與精力看管我呢？我出生十二個月後，她就生了我的妹妹。在隨後的幾年裏，她先後生了三個弟弟以及我的二妹三妹。我們大家庭的幾乎全部烹調、家務等重擔都落在了我的母親以及我父親的長兄彭涵才的妻子肩上，而這些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是滿足我們這個大家庭需要的保證。每當夜幕降臨，她還要紡紗。因此，我祖母與小姑媽只能給予我很好的照顧。

最常照看我的是小姑媽，但有時我祖母出門時也帶上我，或者是為了到鄰居家串門，或者是逛商店買東西，或者去廟宇裏朝拜她信奉的佛祖。小姑媽性情和藹可親，給予我的愛並不比祖母少。但是，她不怎麼知道如何與小孩相處，這也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因此，我並沒有感到我的童年充滿溫馨與幸福。

就說玩具吧，我一件也沒有。有的只是碎石塊。我鄰居的小孩子們，特別是那些後來成為木匠的堂兄弟，經常陪我去小溪裏採鵝卵石。我們就用這些石頭一起做算術遊戲，有時也學着大人的樣子算賬，這些都令我們激動不已，這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娛樂。

在所有傳統的大家庭裏，男人們幾乎總是忙於家庭之外的事務，而婦女們只能落個整天困守在家裏的地位。婦女們被禁閉在一個最狹隘的天地裏，在那兒要完成最徒勞無益最乏味的任務，她們的目光局限、狹窄，對自己的事情持悲觀態度。她們之間矛盾眾多，大姑媽（我父親最大的姐姐）與其三個妯娌中的一個，或同時與她們三個，或者三個妯娌之間，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我母親與彭涵才的妻子之間。但是，每次矛盾爆發，我祖母總予以解決，而且總說她女兒有理而媳婦無理。大姑媽非但沒有克制自己，總是樂於濫用這些特權。這對於我母親和彭涵才妻子，幾乎永遠是一個發洩不滿與抨擊的話題。即使互相之間沒有甚麼爭吵，思想上還是有摩擦，互相譴責。婦女之間的爭吵，我當時尚不能完全明白其真實含義，但那些刺耳的爭吵聲確實無庸置疑，它們給我及我的環境造成了惡果，對我的快樂成長一點也沒有好處。在我意識裏老是放映着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一幕幕，而那些爭吵總是給它披上一層悲傷的濃重陰影。

死記硬背

只有幾個稀有的時日，如過節，特別是舊曆新年，才像焰火的亮光一樣把我們單調沉悶的孩童生活點亮。

舊曆新年！在這個時刻，父母都要給我們「壓歲錢」，給我們這些孩子們。這些「壓歲錢」其實就是銅錢，即中間有一個方形孔的銅片，但只是因為在新年的前夜分發給我們，據說會給我們帶來好運。我們用紅繩子像珍珠一樣把它們串起來，做成頸圈，每當我們需要買東西時再把它們一枚一枚地從頭頸上解下來。

舊曆新年當然也是盛宴的時候。但對我們這些孩子們來說，它首先是一段最自由自在的生活時間：我們連續地放爆竹，手裏拿着裝飾着龍的燈籠，我們不斷地走動，玩着最為豐富多彩的遊戲，甚至或尤其是那

些平日裏大人不允許的遊戲……最使我們高興的是我們可以去看戲。雖然通常只是一種「花鼓」伴奏的非常簡單的唱歌跳舞，我們也深深為之吸引。

「壓歲錢」、鞭炮、燈籠、「花鼓」，等等：雖然這些令人快活，但在我的眼中，這些快樂與父親帶我去田家旺帶來的快樂相比就不算甚麼了。田家旺與銅鑼村相距5里地，我們來到這兒給外婆拜年。外公已去世多年。外婆出身於一個慷慨大方地主家庭，她不易動怒、和藹可親，過的生活比我們來得大氣，而且總體而言眼光比我們要宏大。她大方、好客，管理着一大片房產，尤其懂得如何優雅地待人接物。她非常地愛父親和我。為了使我們快樂，她事無巨細考慮周全。每年新年，我們總要住上十天八天的。我不但可以在這兒飽飽地吃上在銅鑼村吃不到的美味佳餚，而且可以無拘無束地與姓田的表兄弟們——我母親兄弟的孩子們——盡情玩耍。

另外，每過兩三年我們村與鄰村都要組織大戲節，目的非常明確，即從我們常出入的地方驅趕邪氣。人們說這些邪氣總是引起水痘、傳染病、蝗蟲等。大戲演出總是在農閒季節即冬季進行，一次演出要持續半月到一月。演出曲目總是那些既古老又有教育意義的保留劇目，劇情主要是關於「忠」「孝」「節」「義」。即使大戲本身品質平庸，它還是受到那些缺乏任何娛樂的村民們的熱烈歡迎。它給所有人，尤其是婦女兒童，提供了一個顯露自我的機會。實際上在平常婦女是無權在公眾前露面的。她們享有的唯一行動自由是偶爾去鄰居家串串門。但是當大戲演出時，她們可以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首飾，盡可能地盛裝地往來於人群之中。鑒於此，沒有任何人有權對她們指手劃腳。而對於孩子們，他們看到這麼多戲中人的奇妙世界更是欣喜若狂，這些戲中人在台上穿着五彩斑駁的服飾，化了妝，不斷地說唱，語言非常難懂，不知所云，而且時不時他們還相互一對一地打鬥。我們都很愛看「大戲」。如果正

當我們的眼睛耳朵癡迷於其中時，父母或友人給我們糖果吃，那我們就更喜愛了。

雖然節假日或「大戲」季節這些美好時光並不常有，並且時間短暫，但是對我與周圍的人來說，它們畢竟是存在的。在銅鑼村，難道所有人都有如此快活的日子嗎？不是的。對於這個村大多數的人來說，生活遠沒有我們所能有的那樣幸福。那些缺乏田地的農民家庭只能過着悲慘的生活，而他們是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日常飲食一般是稀粥外加一點鹹菜。飢餓呈現在他們每一位孩子極其蒼白的臉上。但是，毫無疑問，備受生活煎熬的還是那些季節性的短工。他們一無所有，大部份娶妻連想都不敢想，只好一輩子打光棍。在收穫、農忙季節，他們都受僱於富農或地主家中，可以賺一碗飯吃。但一旦冬天來臨，他們就失業。他們只得去山裏砍樹燒炭，然後以低廉的價格在村子裏賣點錢。他們勉強維生，直至春天來臨。許多疾病不斷地折磨他們，其中最常見的是痢疾、瘧疾、肺病。他們所有人的命運是未老先衰，死亡一刻不停地隨時降臨，以免除被迫榨乾的可憐身軀為維生而操的心。

我的家族中就有人處在這種境地。他是我的一位遠房叔叔。他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因此從小就做短工。他倒是成了家。但是不幸的是，不管他多麼賣力，還是不能使這個家過上正常生活。我還不到十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及其小女兒都被黃疸病奪去了生命，而這不過是營養不良的結果。我的遠房叔叔陷入了單身的困境，艱難地過着日子。然而他的心已死。他慢慢地衰弱下去。他在苦難中總共度過了七年多，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那時我已有十七、八歲，而他卻緩緩死去。為了像一個人那樣自然地生活着，他曾經鬥爭着，但是卻失敗了，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覺中，這件事導致了我後來思想和行為的激進。

我小時候，學年在舊曆新年一結束就開始了。那是1903年初，我父

親首次送我進了銅鑼村唯一的一所學校——私塾。那時我剛過七歲。私塾是一種完全由同市或同鎮的某個社區的大家族出資興辦的學校，目的在於給他們的後代提供教育。這些大家族要湊錢租一個場所，包括一個教室，一間住房，還要聘請一位教師。然而一所私塾的價值要看那位執教本校的教書先生的價值，而那位先生的價值又要看能給他付多少薪金。因此，提供給孩子們教育的水準各地相差甚大。總體來說，那些富裕村的學校老師品質就比較高，而貧困村的老師一般很少有出色的。但是銅鑼村就是個貧困村。

我們私塾的老師——陳先生，水準最次。他的教學方法是，早上一開始要我們跟着逐字逐句地唸經書中的一段，然後要我們背書，最後要我們描紅寫字；下午要我們複習早上的全部課文內容，直至我們全部明白，能一字不差地背誦。老師從不解釋課文的意思，這只是因為他本人對課文也不甚理解。他的學生除了記憶力不錯外，別無所長。那些連好記性都不具備的學生就難免遭到戒尺的抽打。我的記憶力只是勉強能逃避這種懲罰。上學對我來說是無止境的苦差事。而我竟在這樣一位教師的戒尺下度過了五年。

我們遵從傳統，從三字經開始。雖然我並不理解其內容，但是我卻發現要記住並朗誦出來並不難，就像和尚唸經那樣。可是，當我們學到一些更難的課文，像「四書五經」⁹一類時，我便陷於困境，我真的一點也不懂。尤其是《詩經》（《五經》之一，編寫於西元前一千年的詩歌選集，其詞彙和句法結構均頗費解，早在唐朝就有大學問家韓愈對其意

9 《四書》：《論語》，唯一可能是真實的孔子著作；《中庸》，闡述儒家學說精粹；《大學》，一篇短小的文章，讓王子們獲得「上等人的品德」，同時也用於「教化」普通人；《孟子》，孔子的一位再傳弟子孟子著，為孔子的學說辯護、闡發。《五經》：《書經》，關於發生於西元前 11 至西元前 12 世紀的事件，是一部文獻混雜，真偽參半的選集；《詩經》，古代鄉野情歌與宗教聖歌的結集；《易經》，由 64 卦組成的聖書；《春秋》，關於西元前 7 世紀末至西元前 5 世紀初的中國歷史的著作；《禮記》，撰寫於西元前 4 至西元前 1 世紀的有關中國禮儀的結集。

義的晦澀提出批評)令我頭痛。要求一個十歲的學生學這些東西，就像堅持要求今天的意大利小學生在一字不解的情況下硬背西塞羅、維吉爾的作品一樣不合情理。

經過整整五年的這種訓練，顯然，我能夠毫不費用力地背誦四書五經的大部份，同時能基本上正確地寫許多字。但是我還是不太明白我嘴裏講出來的或用手寫出來的詞句到底意味着甚麼。無疑，若我的學業像我大多數的同學那樣必須就此停止，那麼我就會成為我上面提到的那種半文盲。不管是在城裏還是農村，文化，更確切地說古典文化，只屬於富人或地位顯赫的那部份人：即官員、地主、富商。只有這種人才能讓其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只要認為有必要，他們就可以一直地學下去。而普通大眾，尤其是農民，只要能在進入社會為生活而奮鬥之前能有幾年的私塾教育機會，就已覺得幸運了。

我小時候不大相信神，而且像今日這樣也不信教。但是我卻相信鬼，就像農村大多數人那樣。例如，我完全相信鬼能讓一個人死，就像人們說的銅鑼村有一個人就讓鬼給逼死，結果大清早死在路當中：那人被鬼魂附身，整夜擊打自己。我提防着鬼，躲避它們。雖然魔鬼的危害、反覆無常、惡作劇在我的憂慮中僅佔了小部份，但是它們引起的恐慌顯然不能給生活的改善帶來任何益處。

第二章

光芒終於照耀我的心靈

1908年，即我十二歲的那一年，我的生活第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事實上，就在這一年當中，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兩個新人——一個是學校的同學，另一個是學校的老師，他們闖入並改變了我的生活。

1907年底，陳先生，即那位我說過的教學方法整腳的啟蒙老師，不再擔任銅鑼村私塾的老師。因此，在他捲舖蓋走的時候，必須找到一位繼承人。事有湊巧，這位同意僅代課一年的老師，是我父親的遠房叔伯兄弟，家離我們村二十里地，是一位極其有智慧的小知識分子。而幾乎就在這位新老師在銅鑼村的私塾要安頓下來的同時，一個既有教養又虎虎有生氣的小夥子也入了學，他叫劉祖發 (Liu Zhufa)，比我大六、七歲。他對我態度很親切。我們之間的這種聯繫一下子就拉近了我與他之間的年齡差距。

劉祖發不是銅鑼村人。他的家鄉是離我們有八里多路的一個村子。無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讓他一個人在校內佔一間房，既作臥室又作書房。劉祖發出身於一個小地主家庭，其社會經濟地位與我家差不多，而社會文化地位卻要高一些。他小時候就死了父親。隨後他就成為一家之主。幸運的是，這個家庭只有母親與弟弟。因此家裏把他算進去才三口，再也沒其他人了。這也就說明了他為甚麼能悠閒地生活，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把大部份時間用來讀書。他們家有強大的文化傳統，他的一位舅舅留給他的那些數量驚人的孤本書就是這種傳統的象徵。這些書成了他三層小樓最好的裝飾。劉祖發也有很高的天賦，他不用出門就能學會那些他學過的最基本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有必要與其他人進行心靈的交往。1908年他來銅鑼村，除了要尋找一位至少稱職的老師，還要尋找甚麼呢？而這樣的稱職老師他發現我比他更需要。

當然，這個老師對我以及對劉祖發來說，都是最適宜的。我們是這些學生中最積極的。他一下課，很少有~~不來~~與我們再單獨相處一會兒：

他就給我們講《論語》中的幾個難解的段落，或唐宋詩詞中的意義晦澀的若干篇什¹⁰，或者給我們提一些寶貴的建議，以便提高我們的做詩或寫散文能力。他還讓我們讀一些當代作家的作品，其主題比孔子的教旨更有現實價值。隨着時間一週一週的過去，劉祖發與我越來越密切了。他真的成了我的「大哥」。他把我置於他的庇護之下，並讓我到他房內與他一道學習，因為那兒環境更好一些。他教我他知道的一切。我相信說到底是由於他的，而不是我們共同的老師的教導，我在1908年中期才能簡單地做詩，並能較得體地寫一兩百字的議論文。

主要是由於這種重新啟蒙，我又能重讀那些以前已熟背然而不理解的書。終於，我的思想開竅了。即使是那些最隱晦的文章、最艱深的課文也停止與我作對了。我讀了寫，寫了讀，我的進步越來越快。讀那些經典著作對我並非苦差使了。相反，它們變了樣，變得既有份量又內容豐富的快樂的源泉。但是事實上那時我的興趣已轉向唐宋詩人的作品了。

唉！正當我展翅飛翔時，我又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我們大家庭事實上的家長，我的祖母在1908年底，即我十三歲時不幸病倒。為了照料她，我不得不在1909年初中止學業。在大約六個月時間裏，大白天我要跑遍隆回區（至少是第三區）去問醫問藥。我們可以指望得上的那些較容易接近的醫生，事實上離銅鑼區也要好幾里。至於藥物，還要到另外地方去，大多離我們村很遠，但也必須去找。在這種情況下，要我繼續上學是不可能了。本應該成為我上學第七個年頭的那一年變成了我休學的一整年，每天都是這樣，我也無能為力。不用說我心裏也確實非常難受。

但非常奇怪的是，就在這時我發現了我的父親。就在我少年時期的這個時候，父親才開始在我心目中存在。他猜到了我被迫輟學的痛苦了

10 唐（西元7、8、9世紀）、宋（西元10、11、12世紀）時期中國的詩歌達到鼎盛，杜甫、李白、白居易是唐朝最偉大的詩人，而蘇東坡、歐陽修、陸遊是宋朝最偉大的詩人。

嗎？我不知道。他每天總是一忙完農活，就找機會給我複習學過的東西。為了有好的效果，還自己鑽研《春秋》，或者提一些章節或唐宋詩詞，直至他自己完全弄懂為止。我發現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能判斷、分析並鑒賞中國最偉大詩人、散文家的名著。

以前我的確曾注意到，我父親一有閒置時間就讀書，而且他在冬天讀得最多，因為這是一個農閒季節。而我從未留意過他讀甚麼書。我確實有種感覺，即彭涵友（Peng Hanyou）不是一個像其他農民一樣的普通農民。我不會沒有注意到銅鑼村有很多人來拜訪我父親，向他諮詢一些問題或者問他是否願意給他們寫一份地契合同或訃告。我還清楚地知道他是隆回區第三區彭家祠堂的四個管理者之一。我還知道，有了這個頭銜他每年就有三、四次機會去參加紀念先祖的盛宴。還有一個苦力，一隻手提着一個鼓凸的小酒桶，在後面一路小跑着，一直送到我們家門口。從那以後我便知道父親能不太費勁地讀懂四書五經，而且能寫得體的文章。然而作為像我這樣的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障礙無法逾越。我的父親是通過甚麼途徑懂得這麼多的？這是一個謎……

在父親讓我參觀了他的個人藏書以後，這個謎總算在我的腦中消失了。與四書五經、唐宋詩詞作品集及其他一些用文言撰寫的著作並排放着的，還有小說，用白話編寫的敘事作品，如《列國志》、《三國志演義》、《西遊記》、《今古奇觀》¹¹，所有這一切都向我表明我父親是先從這些白話文作品入手，提高到文言作品。對這些作品他讀了又讀，終於達到像 19 世紀末中國文人那樣能寫得體的文章。彭涵友靠着頑強的自修，謙虛不驕傲的品格，終於成為農民中的真正小知識分子。

11 這些白話作品都出現於明代（14-17 世紀）。《列國志》是一種經典著作的通俗讀本，內容有關諸侯爭霸時代（西元前 7 至 6 世紀）各國之間的鬥爭。《三國志演義》是《三國志》的通俗讀本，講述的是漢朝（西元 3 世紀）覆滅後動盪的年代。《西遊記》是一個神奇諷喻故事，講述西元 7 世紀玄奘和尚在孫悟空——聰慧的猴子、豬八戒——愚蠢而邪惡的豬陪同下赴西天（印度）取經的經歷。《今古傳奇》是明朝末年一個中國最佳傳奇故事的結集。

在父親的榜樣及建議的激勵下，我常常接連數個小時地鑽到小說裏去，就像他那樣。在這些小說中我找到了進一步解讀經典著作的勇氣。我突然感到非但沒有為意外輟學而受到損失，反而因此培養了閱讀的品味，這個品味實際上直至今天尚未丟失。

1909年，即我十三歲那年，同時也是我獲知七十年之前中國陷入了悲慘境地的那一年。事實上，直至1909年夏天，我對事物、對社會、宇宙的看法尚局限於銅鑼村的範圍之內。我一點也不清楚從1840年開始我屬於其中數百萬分之一的民族就已掉進奇恥大辱的深淵，而且就在我幼小生命的十三年中，這個民族在其中不斷抗爭的嚴峻形勢每天都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1898年百日維新，1903年沙俄侵佔滿洲里以北地區、隨後發生的1904-1905年日俄戰爭，革命黨人為了推翻清王朝而不斷進行的革命行動，等等。關於這些災難，我一個也未聽人講過。我確實一點也不明白：在難以理解的一系列失敗之後，各種從國外侵入的「夷人」使這個國家蒙受苦難。中國在它本土的許多重要地方失去了行使其主權的能力，被迫承認侵略者的治外法權，並且因為要支付天文數字的戰爭賠款而被吸乾了血。同樣，我也不清楚中國形式上繼續歸其統治的滿清僅剩下一個骷髏架了，而且他們一直穩坐其上的寶座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俄國乘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中國元氣大傷之機，於1901年至1902年着手使滿洲置於其統治之下。這個行動不能不激起日本的憤怒，因為它也企圖插手滿洲的事務。朝鮮也是俄、日對抗的一個籌碼，因此東京與聖彼德堡之間的一場衝突就不可避免了。衝突在1904年爆發。滿洲就是這場衝突的爆發地，中國土地慘遭蹂躪。眾所周知，這場衝突是以1905年俄國的軍事慘敗告終。從此，滿洲就像朝鮮那樣受到日本的控制。

為了試圖推翻清王朝，擁護共和的革命黨人從1895年開始使用暴力的方式。然而，其所有的暴動先後均以失敗告終。本書第二章將有這方

面大量的詳細描寫。

小時候，沒有甚麼暴風驟雨、天塌地裂會打亂我居住的那個與世隔絕的村莊的絕對的寂靜與安寧。當然，一些顯然非常奇特的謠言也會傳到我們中間，如關於義和團及其所犯罪行的謠傳，或者當 1900 年 8 月 14 日八國聯軍¹² 侵入北京時皇室被迫逃離京城；我忘不了 1908 年底我父母家隔壁的茶亭的擋雨披簷下貼了一個告示，宣佈「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及其侄兒光緒帝同時駕崩¹³。這些傳到我們中間的消息總是那樣的條理不清，支離破碎或者奇異不可信，以至我們也不太會被搞得心神不寧。京城離我們太遠，那兒發生的事情我們不會真正了解，或壓根傳不到我們這兒來。

此後一件偶然的事情讓我從公民與政治的不覺悟中解脫出來，而當時我就像銅鑼村任何一個村民那樣沉浸在那份恬靜之中。這件事發生在 1909 年夏末或秋初即收穫剛剛結束的時節，我家迎來一位年青的遠房舅舅。這個年青人是住在離我們大約 25 里的一個大地主的兒子。他的父親要他負責收繳我們區一部份佃農的所欠的租金。就是在這樣的小範圍巡行中他路過銅鑼村。當時他在長沙的一所「新式學堂」裏讀書。他曾借此機會去看過湖北省首府武漢。雖然他學習並不努力，但對甚麼都好奇。他堅持不停地獲取新鮮事物的資訊。在他來我家拜訪期間，常與我在一起，並在一個小鄉下人前面不無表現出一種優越感，問我是否能讀懂用「白話」寫的東西，又問我是否想讀一些「新書」，即是否想要了解「新

12 既反洋人又反基督教的義和團運動於 1899 年興起於山東。1900 年初在中國北部地方蔓延開去。開始時慈禧暗中給予支持。但從 1900 年 6 月開始，她公開與其站在一邊。外國勢力決定以武力干預。他們的聯軍於 1900 年 8 月中旬進入北京城「恢復了秩序」。慈禧不得不外逃，結果被其丟棄的紫禁城落入了俄、歐、日、美僱傭軍之手。西方列強一取得新的勝利就毫不費力地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雖然正式簽字時間是 1901 年 9 月 7 日，但其條款在 1900 年 12 月已經確定下來。

13 慈禧死於 1908 年 11 月 15 日。她死前特別關照要其侄兒光緒帝同赴黃泉。因此就在她本人斷氣之前讓人將他毒死。

文學」的價值。我趕忙做了肯定的答覆。然後他從一個口袋裏拿出一個小冊子，簡略地先介紹了小冊子的作者，說他是我們的同鄉，來自湖南的新化（Xinhua）縣，名叫陳天華；說完他悄悄地把書塞進我的手裏。我的這位年輕的遠房舅舅告訴我，陳天華赴日本留學後不久，就轉為中國革命的堅強戰士。1905年，像他這樣的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成為了迫害的對象，並由於他們表現出來的熾烈的愛國熱情而被認為有罪；這一切都使他非常憤怒。為了組織抗議活動，在他看來，必須要喚起最大多數人的回應，他於是就投海自盡了。

我的舅舅一離開，我就埋頭閱讀陳天華的小冊子，題為「警世鐘」。我不是在讀，而是大口地吞咽，它給我帶來的是一種啟示。一陣無名的感情旋風在我的頭頂上翻騰着。通過這次相遇，這次因為陳天華而與我的幅員遼闊但災難深重的祖國的相遇，我的世界觀驟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警世鐘》的作者幫我們回顧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所遭受的所有災難，並且強調說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展現在眼前的危險正是「亡國滅種」，他以極其尖刻的口氣抨擊那些對我們垂涎欲滴的洋人，他們是英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或日本人，而且猛烈地譴責他們要瓜分中國的圖謀，或者至少是把中國變成一塊塊各國的勢力範圍的企圖。他還不滿足於僅責怪我們的侵略者，他同時抨擊我們的幾代皇帝。他解釋說，清朝已陷入腐敗的深淵，並且變得麻木不仁；他們屈服於外國勢力，實際上成了他們的附庸。但這就是我們徹底絕望的理由嗎？陳天華發問。痛苦的呼聲，陳天華的呼聲一旦出口，即刻變成了向所有中國人發出的響亮的呼籲：「為了拯救祖國，讓我們聚攏來揭竿而起！我們團結起來，進行反抗，為了使我們的祖國免遭印度、波蘭那樣的悲慘命運。」

我剪了「馬尾辮」

在我讀了陳天華的小冊子，我的思想被點亮後不久，祖母去世了。我必須在 1909 年 9 月份趕回奔喪。

這個大家庭在失去這位有權威又有活力的女人之後，同時失去了原則與凝聚力，而我祖父彭新解原只不過是名義上的一家之主。畢竟，一段時間來，這個家庭不是變得人口越來越多，已經有些難以為繼了嗎？分家的時間終於來臨了。

我祖母入土後，我們大家庭的田地與傢具被分成四份：一份分給祖父，三份分給三個兒子，而三個兒子的三份財產由抽籤決定。財產分配結束後，我父親成了大石鋪上那幢商店兼住宅建築的主人，而此處本是分給我叔公的，後來由祖父買下。那幢住宅建在穀倉後面竹林的下方，在池塘的西南角，至少有 6 間房子，而且這 6 間還完全獨立。此處非常適合於我父親彭涵友的小家庭，因為父親的小家是分家時三個小家中人口最多的。我祖父把房屋的正房給了我的兩個叔叔，自己住在北廂房。在底層的穀倉被分為三部份之後，南廂房繼續由大家公用。

我祖父在他的新居安頓下來後還活了許多年。在他結束了為我祖母戴孝的那段時間後，祖父本是可以續弦的。我父親有了家後即一刻不停地專注於擴大其土地與住宅，這個任務也許傾注了他畢生的精力。

按照習俗，最年長的孫子可以象徵性地繼承一部份財產。因此我分到了一小塊土地，這就給我父親的田產上增加了一份。那時我剛過十四歲。然而，毫無疑義，擺在我面前的問題當然是要知道人們將要把我塑造成甚麼樣的人。

我父親對我的前程肯定有非常明確的看法，他要我不再上學。他對我說，一生中能有七年時間學文化我就應該知足了。他告訴我現在該輪到我開始新的生活的時候了。我大膽地向他提出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事

實上我在心靈的深處已下定決心不管怎樣也要繼續上學。在這方面我表現得如此堅決、執拗，結果父親讓步了。

我的外婆在自己的家鄉為其孫子們開辦了一個「家塾」，我經常去這個學校，外婆絲毫未感到不方便。1910年的大部份時間，我是在田家旺外婆的家裏，而不是自己的家裏度過的。這種安排既不缺乏精心，又不失體面。而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滿意的了。我到了田家旺，就能逃避在銅鑼村逃不開的各種家務及田間勞作的沉重負擔，這些負擔幾乎全部中國普通農民的子女都要承受的。這是我第一次能在一整年時間裏安心地專注於學習上。

我外祖母在其屋簷下開辦的私塾是家庭學校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只為八至十個孫子（包括我在內）的讀書而存在，同時是因為本校的先生是她的一個侄兒（因此也是我的一個舅父）。不過，這個親戚有數個頭銜，可非同尋常。他以前曾做過江西省一個縣衙門的文書。他見多識廣，不管對國內國際大事的看法都相對的全面。同時，他文章做得也好。

事實上，外婆的學校就是一個房間：是一個巨大的房間，佔據了外婆決定安置他們的那座建築物的幾乎整整一層；一個裝滿供學生使用的厚重的方桌。但是在房間後頭還有張床，是老師的床，靠窗；這個大房間放學後實際上成了老師的臥室。

我的田氏表親們都比我小。雖然上課並不真正使他們厭倦，但對他們一般也沒有任何吸引力，而我卻着了迷。他們恨不得讓課早結束可以出去玩。他們一出去，大房間就一片寂靜，而我卻留下來。這樣我便單獨地與老師在一起。開始時我不說話，後來壯着膽提一兩個問題，而他半舒展着身子躺在床上，很悠閒地吸着剛剛配好的鴉片丸。他回答着我的問題，目光消失在煙筒冒出的帶着奇異香味的煙圈中。《孟子》、《論語》、《大學》、《春秋》以及用文言撰寫的其他十幾部經典著作，他憑着記憶，給我講那些主題有着強烈色彩的文章，不停地給予渲染。我

聽着，深深地被吸引。如果有必要，就整個晚上坐在他旁邊。

他並沒有少化精力來批改我交給他的作業。當然他教得最好的那部份也是他所偏愛的。而他所偏愛的是古文作品，唐詩，做完美的對子。如果沒有他，那年我決不會有那樣的進步，不管是在閱讀方面還是寫作方面。

1910年底，我剛滿十五歲的那年，父親正如我早預料到那樣，把我召回銅鑼村，並告訴我，他需要我幫忙勞動，但是他同意再讓我上一年學。我們村的私塾於是重新收下了我。執教於這個私塾的新老師正是極其出色的蔡先生。他是銅鑼村蔡氏家族中最有教養、思想最開放的一位，他既有學識又品行端正，還是班裏一位我最要好的同學與玩耍夥伴的父親。此後直至1911年底，他讓我做我想做的幾乎一切事情，同時不時地給予我寶貴的建議。

就在那一年，在我完善自己的寫作技巧的同時，我開始系統地學習祖國的歷史，認真地閱讀《廖方通鑒》（*Histoire generale due a la plume de Liaofan, Liaofan Tongjian*），這是一部篇幅宏大，訓喻性強，編得很好的史書¹⁴。然而，這一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辛亥年，在我的生活也在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中，迎來了1911年革命¹⁵的幸福炮聲。

銅鑼村，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樣，是過去中國偏僻鄉村的典型，即

14 廖方（Liaofan），清末一位歷史學家的名字，姓袁。其「通鑒」不僅僅是一部手冊，其篇幅宏大，不少於二十五至三十卷。

15 中國的傳統曆法不僅僅與歐洲傳統的曆法即格里曆不同，因為中國的傳統曆法是根據月亮—太陽的週期運算的，而不是純粹的太陽曆；而且，不同之處還在於它的紀年起始並不是基督誕生，而是傳說中的黃帝登基年，還有其週期不像西曆那樣以世紀即百年，而是以六十年為單位計算。另外，這個以六十為週期的年份每年均有一個由兩字組成的名稱，其中一個字來自以十個為系列的「天干」字，另一個字來自以十二個為系列的「地支」字；它們一個接着一個，如此表示，周而復始，永恆不變：甲子為第一年，乙丑為第二年，丙寅為第三年……乙未是第三十二年，……辛亥是第四十八年……黃帝登基的第一年根據格里曆是西元前2697年，這兒只需進行一次簡單的計算就可以發現，從西元1864年（或者說是黃帝紀年4562年）開始的六十年週期是從頭算起的第七十七個，而辛亥年即西元1911年（或者說是黃帝紀年4609年），這是第一次中國革命的光輝年代。

對於發生於所屬地區之外的事件一無所知。儘管如此，發生於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標誌着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武昌起義，以及發生於 1912 年 2 月 12 日標誌一個舊時代的結束的宣統皇帝遜位的最新消息來的卻並不慢¹⁶。但是，這些消息畢竟支離破碎，前後不連貫，模糊不清，讓銅鑼村的人吃驚不小。我們第一次聽說的所謂「革命黨」究竟是甚麼，關於它的情況我們當然也一無所知。同樣一無所知的是我們對那些敢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人。我們也根本無法想像共和是怎麼回事。然而，我們所能知道的是王朝滅亡的了，而且永遠不會復活，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以下讀者們會看到促成此次革命爆發的各種條件因素乃至其深層原因，以及其真實性質的一種理論闡述。

我一聽說滿清被推翻，就剪去了盤在頭頂上的「馬尾辮子」（辮子本來很短，看着滑稽）。這是我對此事件的第一個反應：可以說是一種幾乎條件反射式的反應。「馬尾辮子」實際上成了外族奴役羞辱漢族孩子們的一個典型象徵，而這個外族本身也成了更為強大的外國勢力的奴才。

我的老師蔡先生以及我的一位年齡卻比我小的同窗，也馬上模仿我剪去了辮子。通過我們，銅鑼村顯示了現代的風格。

做了這件大逆不道的事之後，我不滿足於市面上含混不清的傳聞，仍然想知道更多關於剛剛發生的這次大規模起義的資訊。儘管我東奔西跑，我能找到的較為可靠的唯一資訊來源是大石鋪茶亭擋雨屋簷下的反

16 這次起義 1911 年 10 月 10 日突然在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爆發，日後中國人均稱之為「雙十起義」。這是自 1895 年以來革命黨人發動的所有暴動中取得的首次勝利，震驚海內外。它引起了一系列反對清朝統治的運動，使得清王朝的反對者在數週之內即掌握了中國中部與南部的權力。清政府在恐慌之中把朝廷交給了袁世凱，自慈禧死後，清廷一直對他冷淡，而今要他承擔拯救朝廷的使命。袁世凱表面上接受，但暗地裏卻為了個人目的與起義軍談判：他很快讓滿清政府的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遜位，以換取自己升上民國總統的寶座。

宣統帝 1911 年僅六歲。後來他以溥儀的名字不光彩地成為 1931 年至 1945 年之間建立於中國東北的日本人傀儡政權滿洲國的皇帝。

映官方意見的佈告欄。

事實上，這個佈告欄馬上就貼滿了公告，革命黨人給我們公佈了即將掌管我們的新任官員，有省一級的，也有縣與區一級的。雖然這些公告內容相對豐富，但大部份內容僅有極少數人感興趣。我還是很認真地閱讀，而且我反覆地讀着，直至牢記於心。通過這個管道，我特別知道了一位叫孫文（孫逸仙）的是革命黨的領袖之一，一位叫黎元洪的，於1911年10月11日在武昌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還有，三週後在長沙，一位叫譚延闓的被「突擊」任命為湖南都督¹⁷。然而，正像人們感覺到的那樣，我獲悉1911年10月22日把長沙從清王朝的魔爪下解放出來的真正英雄是焦達峰和陳作新。但是他們在解放長沙不到八天時即被譚延闓下令殘酷殺害。雖然誰都知道誰是這個滔天大罪的始作俑者，但誰都不能讓真相大白，道理很簡單，共和黨自認為尚無力消滅譚延闓也只能把他調職留用¹⁸。所有這一切都是到了一年之後的1912年底，我才首次在長沙聽說此事。

換句話說，雖然我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及要繼續努力下去，在1911年底我還遠未能獲悉這場剛剛開始的革命的清晰的面貌。然而我並不懷疑的是這事件的真實情況是，對我來說一切均已改變。

17 在雙十起義爆發時，沒有一位革命黨領袖在武昌。就舉孫文為例，當時他正在西方旅行；過了數週才回到中國。武昌的起義者在起義勝利後不久沒有其他辦法，只得「逼迫」黎元洪，一個平庸但還「拿」得出去的人物，湖北新軍的副統帥，就任「民國臨時軍政府」的總統，同時兼任湖北督軍。孫文一到達中國，即在南京召開革命軍光復的各省代表會議，他同時擔任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1911年12月29日至1912年1月1日）。譚延闓作為省內大多數顯貴的典型代表，在武昌起義的前夜，還是一位頗受擁戴的君主立憲派人物。顯然，他於1911年10月中旬歸順共和旗下純粹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

18 早在1906年焦達峰在東京即全心全意獻身於共和事業。當時僅二十歲。五年之後，他成為湖南革命軍的主要人物，在那兒他與新軍以及一些秘密團體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陳作新，新軍長沙駐軍的一名軍官，當時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在一萬多人的支持下，焦達峰與陳作新輕鬆地奪取了長沙並於1911年10月22日分別要求封他們為湖南省都督與副都督。然而幾天後，他不得不派遣其部隊大部份兵力去救援受到效忠於清王朝的軍隊嚴重危險的武漢一位共和派人物。譚延闓實質是那些效忠於清王朝軍隊的盟友，借機說他們煽動鬧事，他底下的劊子手就於1911年10月31日將他們殺害。這樣譚延闓就能順利地繼任他們的職位。

瑞姑

滿清現已被推翻，我感覺不再能夠長期忍受傳統教育以及銅鑼村生活的瑣碎平淡與無所作為。在劉祖發的鼓勵下，我於是着手去尋找一所「新式學堂」，這些學堂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在中國越來越多，以至在我們縣較發達的鄉鎮也能看到其掠影。就在此時，我的家人向我宣佈一件令我既驚訝又難堪的事，即與我大姑媽的長女羅瑞姑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我還不到兩歲，而年齡大於我的瑞姑還不到五歲的時候，我的祖母就正式地讓我們兩個訂婚。瑞姑與我是嫡系的表親。但是在我祖母的思想裏這無論如何成不了我們未來婚姻的障礙。相反地，在這位女強人的眼中讓她的第一個孫子與第一個外孫女聯姻是既合法又有好處的。

瑞姑曾經是我孩提時的玩伴。在我三、四歲時，她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她再也未回到銅鑼村。大姑媽每年要帶着她的一大堆孩子來娘家輪流過六個月，但她從不在此列。而其一直缺席的真正原因（我對此一點都不在意）應該是徹底地迴避我，直至我祖母去世前夕。然而，當我到了十至十二歲時，我家裏就有人不斷地用我的「親愛的表姐」來逗弄我，無疑是為了顯示她與我之間存在着某種關係。但事實是，關於這些影射我一點兒也不明白其含義。

我的關於這方面的啟蒙之燈直到 1909 年才被點亮。這時醫生肯定地表示我祖母的病已不可能治癒。有人就談到在我們家要舉辦一次婚禮來「引入喜氣」來「驅除晦氣」，以達到「改變命運」的目的。而我不得不認定人們正在考慮的婚禮即是指我與瑞姑之間的聯姻，這個我祖母已費了不少心機，希望能盡快地操辦，而且要趕在她去世之前慶賀，否則就可能要泡湯。

然而，婚禮並未舉辦。那時人們肯定是認為我當時做丈夫未免有點年輕。在某種條件、某種情況下，習俗可以允許男子在十二至十三歲時

娶妻。在一般的情況下，要等到十六至十八歲時才能結婚。另外，至於我，關於婚姻意味着甚麼在我的腦海裏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雖然我已下定決心如果非娶妻不可也不能同意瑞姑作我的妻子。

我祖母去世時，全家人都戴孝：要戴三年孝，在此期間我們中的任何人一般均不能結婚（或再婚）；這次戴孝也促使我直至 1912 年秋季保持單身。尤其在那段時間裏我發現了女性的魅力。

我的第一個所愛的人是 1911 年在銅鑼村做我老師的蔡先生的女兒，他的兒子是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她的年齡與我差不多。而且像我與她的兄弟一樣，她也在學文化。實際上，她的父親和有文化的母親從不過問其功課。

她常參與我們的遊戲，裏面有她的兄弟，我與鄰近的其他男孩女孩。但在我差不多十二歲時我看她的眼光完全不再是當時看一位普通女同伴的眼光了。另外，她的母親那時經常拿她的話題來逗弄我，就像我的家人用瑞姑的話題來逗弄我一樣。我不得不承認，如果說我對家裏人提到我與表姐的關係完全無動於衷的話，蔡夫人暗示我與其女兒的關係就給我帶來無限欣悅。

在田家旺呆了近一年後，我重回銅鑼村。當然我又重見了這位年輕姑娘。那時我十五歲。她十三、四歲。我們相見的時間比過去要多，因為她常來旁聽她父親給我上的課。然而，她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沒有變成一種真正的激情。事實上，在我的心中，這位蔡小姐以前一直是並且當時還有另一位同樣姓蔡的小姐的競爭對手，而這位蔡小姐就住在蔡家旺附近。

正如銅鑼村的蔡小姐那樣，蔡家旺的蔡小姐比我小一歲。而且，她的兩個兄弟也是我的同班同學與遊戲夥伴。但我並不是通過他們才認識她的。事實上是通過我的父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通過她的父親認識的。她父親當時是碾米廠主，其水磨坊就建在蔡家旺與銅鑼村之間的一

處激流湍急地方，離大石鋪步行不超過十分鐘。我十一、二歲那年的一個清晨，我父親要我幫他挑穀子去這位蔡先生的磨坊碾米。就在那個早晨我發現有這麼一位磨坊主的女兒，形象已經是光彩照人。自那以後，我常在沒有父親的陪同下回到那裏。在蔡先生為我碾米的那當兒，我在他房裏與蔡太太閒談，她非常熱情好客。而她的女兒，一直埋頭繡着甚麼，靜靜地聽着我們講話。

蔡家旺的蔡小姐沒有文化。但是，她的手很靈巧而且很有品味。她沉默寡言，很少與我講話。但我通過一些幾乎不被察覺的信號，如偶然的一個微笑一個眼神，推測我們彼此之間已喜歡上了。我很快深深地被她所吸引，非常嚴肅地設想在 1911 年的年中向她求婚。我實際上還很有把握地認為她的父母不會反對這門婚事，因為母親向來很喜歡我，而她父親也知道我真誠、勤勞。我還希望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最終能夠解除與羅瑞姑的婚約。

唉！這個幻想很快就破滅了。1911 年初秋，武昌起義爆發前夕，我的家人向我宣佈三年為祖母戴孝結束後我必須與我的表姐結婚，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我當時所能申明的只不過是一句表示異議的話，而就連這一點我也未想到。我低頭了，心死了。我屈服了。把我這樣一個孩子的否決與我家人剛剛向我申明的決定相比較，在我看來這事實比起我祖母在我出生時就自作主張做出的決定更加荒唐可笑，再說這是一個不允許有二話的決定，否則就會違反對大姑媽許下的承諾。反叛家庭，做彭氏家族的叛逆，這在當時簡直是我想都沒想過的。當時是 1911 年，還不到 1919 年，也不是 1915 年¹⁹。

19 指發生於 1919 年 5 月 4 日的五四運動。正像其名稱所表明的，這個運動從 1919 年春季開始才達到鼎盛。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愛國反帝運動，而且是（可能更是）一場質疑所有傳統價值觀的運動，它與創刊於 1915 年底的《新青年》雜誌共同發生與成長。它砸爛一切舊的傳統偶像，對傳統家庭也採取無所謂態度，而這些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所沒有觸及的。

但更糟糕的事發生了。這場不僅讓清朝覆滅，而且要把御座本身砸爛的革命已在武昌、漢口、長沙、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爆發的消息使得我的家人坐立不安，結果使得他們倉促決定把我與瑞姑的結婚日期大約提前一年。銅鑼村沒有一個人認為應該改變這樁匆忙的婚事；也沒有一個人想到「事態的嚴重性」並不能賦予這樁婚事本身的合理性。大姑媽也毫不掩飾地希望在這場已開始的風暴擴大之前讓瑞姑成家。而至於我的父親，他更是急於要我與表姐結婚，他算計着，一旦喜事辦妥，我考慮到要賺錢養兒育女，就不會無止境地讀書下去。

那是在 1911 年 11 月或 12 月，當時我剛滿十六歲時，我的婚事遵照極其嚴格的中國老式習俗舉辦了。瑞姑從她父親的家裏被用轎子抬到了我父親的家裏。這我自從孩提時代後第一次見到她。她的態度溫柔。她並不顯得愚蠢，但她長得醜！她在我內心激發起來的基本印象是反感。

婚禮結束後，我自認為已結了婚。但與誰結的婚？我認為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把自己從已陷入的尷尬境遇中解脫出來，唯一的選擇是逃離夾在我父母與姐妹臥室之間專為我與瑞姑準備的那間洞房。我於是就日夜呆在位於大石鋪的貯藏室內，裏面有我的書與毛筆，曾用作我的書房。除去上學、散步或像平常那樣去跟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吃飯，（現在是多了一位我很少與她講話的妻子），我從不外出。而對於瑞姑來說，她整天在悲傷中過着日子。我的父母也為我如此對待她而感到過意不去。我的母親尤其不安，村子裏面也在談論這件事。人們覺得我很怪。但事實就是如此，我也無能為力。

自從這場革命爆發以來，在中國所帶來的諸多變化中我能覺察到的那一丁點兒，讓我相信必須要盡快拋棄那些使我娶瑞姑為妻的四書五經及傳統教育的枷鎖。由此帶來的我的不幸婚姻以及到處可見的悲慘境遇已經大大加強了我做出抉擇的勇氣——必須離開，必須向銅鑼村及我的老家告別，我的生命的搖籃現在對我來說只是一所監獄。

救命銅錢

新春佳節剛剛結束。1912年，我不慌不忙但十分愉快地離開了銅鑼村，帶着一個挑着我行李的挑夫。我要去哪兒呢？去孫家村。此地距銅鑼村大約有十里地。我決定遵照劉祖發的建議，在此地繼續我的初等教育。

孫家村的私塾實際上與其他地方的私塾不一樣。執教的是一位陳先生，他有着較為先進的思想：梁啟超那樣的思想。當然，學生們在這兒像在其他任何私塾裏那樣認真學習經典的文學哲學著作。但是，我們在這兒還學習一些與當代物質精神生活更緊密聯繫的學科的基礎知識。而且學生們還能聽一門很有趣的通史課，這似乎是陳先生教得最好的一門課。總之，這所私塾在我們整個區聲名遠揚，生源充足。後來它的許多老校友成為了我的朋友。

當我剛離開銅鑼村的時候，在路途中我看到了我的一位遠房叔父開的中藥舖，這裏同時是他的住處。我決定在這兒停頓一下，一是出於禮貌，二是想休息一會兒。碰巧同時在此停留的還有彭少奎，一位我們彭姓家族的人，年齡有我父親那麼大。他跟我父親一樣是我們彭氏祠堂四個管理者之一，而且對我的父親無限地崇敬。他尊敬我的父親，認為他能根據不同祭拜祖先的儀式來編禱詞，而且還懂得在祠堂的紀念儀式舉行時就四書五經的有關話題娓娓道來。

彭少奎是一個思想開明的地主，他就住在我們祖先祠堂附近的村子裏。這是我們家族控制的隆回區第三區四個村子中最富庶的一個。令人慚愧的是，我得承認我已忘了這個村子的名字，也許就叫彭家村或彭家旺。他很早就意識到「新學」比起傳統學堂具有巨大優越性，因此毫不猶豫地把他的幾個較大的孩子送到武漢和北京，以便他們能跟上20世紀的時代的步伐。總之，在滿清覆滅之時這在中國是相當開明的做法。

由於對我的父親懷着一種敬意，他很善意地對待我，一見到我就友好地跟我打招呼。而當我告訴他我離開銅鑼村是為了去孫家村求學，他告訴我他無疑有更好的事要向我推薦。事實上他剛剛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開辦了一所小型的公共免費學校，或稱「義學（yixue）」，但是，它同時具有「新學（xinxue）」即新式學堂的優越性。他邀請我成為本校的寄宿生，並明確表示我不需支付任何費用，包括學費與食宿費。我馬上就接受了。

我剎那間就坐在其櫬子上的這所小型的「義學」肯定是一所初等學校，但它是培養學生參加中等教育機構入學考試為己任的。雖然它只有六位年輕的學生，老師卻有兩個。六位學生中的五位，即這位開辦此校的慷慨的鄉紳的兩個兒子，一個侄子，一個侄孫，還有我本人，都是來自我們區第三區的彭氏家族。而第六位學生，姓龍，是其中一位老師的弟弟。

兩位教師中的一位是個文人，白話文與文言文同樣熟練，寫作既流暢又有文采。他讀過不少書，也去過很多地方。我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他的同事，一位理科老師，比起他來顯然要年輕。這位老師叫龍謝田（Long Xietian）。在他從最好的「新學堂」裏接受了自然科學的正規教育後，他申請進入了北京大學政法系學習。正是在這所學校他被武昌起義的炮聲所震驚。在起義的爆發後的日子裏北京的形勢也變得非常撲朔迷離，他就判定最好還是於 1911 年底回到家鄉湖南。他設想一旦形勢允許他就復學。在此期間，他很樂意地接受了彭少奎聘他一年的這個教職。事實上他還是彭少奎一個兒子的最好的朋友，這個兒子當時在保定軍校讀書²⁰。他教我們算術、地理、化學、物理……教授範圍超出小學教育

20 保定，河北省的一座城市，位於北京的西南面。清朝時河北省稱作直隸，當時保定是其省城。北京是清王朝的都城。保定軍校是在 1901 至 1903 年間由袁世凱、馮國璋創辦，目的在於培養清朝新式軍隊的幹部。這是一所極其重要的學校。

通常的領域。他對待我們不像是老師對學生，更像是同學之間。

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地過去，他與我之間成為了朋友，親密的朋友。在我們坐在一起長談時，他跟我講了他在保定、北京的經歷；而我也講給他聽我為了逃避傳統教育的奴役所做的各種努力。他毫不諱言地承認自己以前未能把一大部份的精力用在大學時學習經典著作上而遺憾，同時祝賀我在這方面沒有像他那樣的無知。他觀察到我還有演說的天賦，就熱心地建議我在秋季未開學前去長沙。他講話的情緒就像他準備自己重回北京那樣。他肯定地說，在長沙，比起湖南的其他大小城市，我有更多的機會進入一所較好的中學接受現代教育，而缺少了這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中國人能成為大學者。

這位勇敢教育者的榜樣激發了我，他的鼓勵更堅定了我的信念，使我做出從未有過的一定要擺脫家庭束縛的決定。我發誓要不惜一切代價在1912年春季去省會，隨同的將有我的三位同學——彭少奎的兩個兒子，一個侄子，他們將與我懷抱同樣的目的。但不幸的是，我一回到銅鑼村很快就意識到要完全實踐自己的決定比起我的同學要困難得多。

事實上我一把自己的計劃告訴父親，他就一言不發。1912年初當我被允許再一次從他的手掌心裏逃脫而選擇入「新式學堂」時，他就已經不高興。而今當我說要去長沙他更加不能容忍，並對我解釋道，這個選擇在我看來意味着要付「很昂貴的費用」：所有那些作為一個孩子在一個大城市需要的費用，包括學費、生活費，更不用說旅費了。事實上促使他否決的有兩個因素：由於受到古典文化的薰陶，他在教育方面一直非常保守；作為非常節儉的農民，他厭惡「揮霍金錢」。但是兩個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個。為了試圖讓我明白其觀點，我父親為我勾勒了一幅關於其經濟狀況的絕望圖：他唯一的收入是自己穀物的收成所得；而這個收入實在是少得可憐；而且就是用這點收入他要養活他自己、我母親，七個大部份尚處於未成年的孩子，此外還有瑞姑。一句話，在他的

思想中，我要享受一種只有富裕地主的子女才能享受的奢侈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第一次敢於與父親作對，與他爭辯，同時，對於儒家的孝道也有點不予顧及。我試着用讓他相信我的計劃的正確性，我努力地向他證明我的對四書五經的研修百無一用，我要使他懂得「現代教育」才能為我開闢未來之路。但他對我幾乎所有的論點均麻木不仁。雖然有些勉強，他還是向我承認「新知識」可能比舊知識更好。但是他重新宣佈他手頭拮据，實在拿不出我要求的那筆費用。

換句話說，這事陷入了僵局。如果我不能為長沙之行湊足那幾個錢，其他人會怎麼說呢？我去長沙的願望一點兒也沒有減弱。但怎麼辦呢？我的伯父彭涵才叮囑我要保重，但這並不能給我帶來多少安慰。他給予我的同情只不過說明了他在其他任何方面，尤其是資金方面幫助我無能為力。我只能靠「奇蹟」的出現了。為了排遣時時出現的不耐煩，我就做起了我弟妹們的家教。日子就這麼過去了，一點也看不到希望；而且感到越來越走投無路。非常合乎情理地，我的同學們為了及時到達長沙，即不僅要趕在新學年開學之前，而且要趕在新學年開學前的入學考試與選拔的那一小段時間之前到達，他們已經做着啟程的準備了。他們將撇下我前往嗎？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只有一個人也許還可能為我做點事，即我的母親。我把目標轉向了。雖然她過着一種默默無聞的艱苦生活，其仁慈之心未泯。她沒有文化，實際上從未接受過任何教育，她對我的道理理解起來有些困難。然而她隱約地認識到這個道理是正確的。她猜測我的前途的確就靠我是否將在我們省會的城牆內求學了。有一個例子，即我們的一個姓楊的鄰居曾在長沙學木器活，現已在那兒成家立業並過着小康生活，使她信服我是有道理的。因此她冒着險在我父親前面為我辯解。但是她所能遭受的還是拒絕。我的父親仍然堅決不予通融。

萬不得已，我只得宣佈無論如何我要去。我說不管人們怎麼說、怎

麼做，我都要去長沙，我明確說為了達此目的，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乞討上路。

我母親被深深地感動，就給了我她手頭所有的「私產」：她用十幾吊銅錢為我換了幾個銀洋，為了我在旅途中便於攜帶。這筆小數目足以應付我家鄉與湖南省省會之間數千里（六百公里）的旅途開支。而且顯然我母親與我均認為我一到目的地就能在我同鄉楊木匠的幫助下生活。因此只留下整頓行李這一件事了。我母親忙於往她給我縫製的小包袱裏裝東西，務必使任何物品不缺乏。

四十八小時之後，帶上這個小包袱與八、九個銀洋，我離開了銅鑼村。這是一個世上最落後、最封閉的小村莊。我轉過背去擺脫的並不僅僅是這個村莊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的一切。在我離開它的時候，我實際上拋棄的是那些通過家庭強加到我頭上的傳統的羈絆。與家鄉決裂後，我跨越了那一道門檻，而展現在我面前的是大千世界所有未知的東西。我的少年時代就此結束。

1912年8月底。我們穿着草鞋，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就是穿着這種鞋走路與勞作的；旁邊還有一位挑夫挑着我們的包袱，在通往長沙的路上我們已走了近三天。我們是彭家村「義學」的四個彭姓的年輕人，只相信「新知識」。

我們跨越了望雲山的山坡後，下了山，就把隆回「司」拋在了後面，它剛剛被革命黨人改名為隆中鎮。我們又回到了新化縣南部的令人賞心悅目的大片土地上。我們由西走到東，直至東北部的邵陽縣。現在我們已到達寶慶城門前，而我從未來過這個地方。

我們進了城，這是一個有近10萬人口的大市鎮，其宏大規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顯然我們既沒心情也沒時間到處轉轉。我們在隆中鎮第三區彭氏家族考生接待客棧美美地睡了一兩個夜晚後，就馬不停蹄地又上路了。我們跨過了湘江，走上了通往湘潭的路。

連續六天，我們從清晨到黃昏不停地走。到了晚上，我們就在遍佈湖南以東廣大農村的小旅店裏歇腳並過夜。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被運河與小河分隔成方塊一望無際的稻田景象。上面沒有任何樹木。我們這些隆中鎮「桃花源」裏出來的山區孩子們還是爬得氣喘吁吁。我們越往前走，越感到勞累：穿在草鞋裏的腳就像被灌了鉛，而且鞋帶把腳踝都磨出了血。當我們望見湘潭的輪廓時還是興奮不已。我們清楚，旅途的第三即最後階段的路程將比較容易：我們懶洋洋地坐在小火輪的邊上，湘江幾個小時就可以把我們從湘潭送到長沙。

革命節慶的小油燈

長沙！60萬居民，數百條小街與幾條大「動脈」相連，數千家商店、倉庫與工廠，整個城市充滿着喧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大城市，也是我第一次置身其中飄搖着。我感到有點頭暈目眩。當意識到這座大城市是最積極參與1911年辛亥革命諸省的一個省會時，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了。一年來這個省城有充足的理由在這個新生的民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據我的所見所聞，它仍然是一個重大政治、文化運動的中心。

然而，我們四人一上岸，就必須解決住宿問題。至於我，就根據預先想好的去找我在大石鋪的一位鄰居——楊木匠，當初他在一個凌晨去了遠方尋找發財機會。他熱情地迎接我；他邀請我住在他家，不管多久都可以；他待我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我在他的家裏安下身後，就與同伴匯合，一起去找一所合適的學校。其實這裏有許多學校。但選起來相當棘手。哪一所是最好的呢？這是我們捫心自問的問題。總之，從湖南省各個縣來了許多年輕人，他們在新學年前夕抱着同樣的志向，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在他們之中我發現有若干從隆中鎮來的少年，裏面有一個姓魏的博得了我的好感。他一見我就向我誇獎一所新近成立的鐵路工人培訓學校的諸多優點。學校的創立者

均是湖南省的名人，他們懷着極大的熱情要實現孫中山提出的在中國建造大型鐵路網的宏偉計劃。而對於小魏與我來說，這與我們的志向即參加國家的重建相當吻合，於是就促使我們去報考這個學校。結果我們被錄取了。但是，與我們一同來長沙的其中一位年齡最大的彭氏同學勸我們放棄這所學校，其理由大致是這樣的：一旦你成為鐵路工人後你將幹甚麼呢？你的整个人生都將要獻給在枯燥無味的地方完成單調的工作。所有繼續上大學或出國深造的機會將離你而去。

在學到更多東西、看到更大世界的意願的激勵下，我們終於認為最好是去接受常規的學校教育，即我們要選一所高水準的中學。這樣，我們很自然地一致要去上「諸省邵陽中學」，原因有二：一是它是唯一的一所專門接收從我們家鄉縣來的年輕人，其二這裏的教育水準之高遠近聞名。另外還有一點對我也很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話，即學校住宿生每月費用只要一千銅錢（大約合三個銀洋），而課程是免費的。

於是，我們去參加了入學選拔考試。我們大家都被錄取了。我一得知這個資訊，就跑去通知了楊木匠。楊木匠聽到這個消息時就跟我一樣高興。然後，他為我準備了第一個月的寄宿費一千銅錢，我於是搬出了他的家在學校寢室住下。在那兒，我第一件事是給父親寫信，當然是讓他知道我近來的一切事情，同時也是更重要的是向他建議作以下安排：楊木匠在長沙每月付給我一千銅錢寄宿費，而我父親每月給他在銅鑼村的家屬寄一千銅錢。父親為我成為最有名的長沙邵陽這所子弟中學的學生而感到無比自豪，他一句嘮叨話也沒有。他很痛快地答應我建議的方式辦。他沒有二話就承擔起了對楊家的責任。

邵陽縣這所子弟中學校位於長沙的西北部，離城牆的北門不遠的地方。它佔據了邵陽會館的大部份房屋，這個會館的前身正是邵陽士館，即邵陽縣考生接待站。我們通過一扇外觀漂亮的大門進入，裏面有田徑場、體操場以及做遊戲的地方，而且設備非常完備。學校的主體建築嶄新，

也許是科舉考試廢止後才建的，建築物總體呈現西式風格。教室由大門窗來採光，學習室配備了個人專用的斜面課桌，行政專門集中一處，教師有專門住處，食堂也相當寬敞並為學生提供良好服務；所有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嶄新的。

邵陽士館老房子的唯一殘留是幾幢小樓房——現在用作我們的寢室（裏面擺着五、六張床的臥室），稍遠處還有一幢長方型建築物；裏面住着大學生、省政府機關的職員以及一些在長沙作長期停留的來自邵陽縣的其他成年人。

中學的學制是四年。我們學校有四個班級，每個班有四十至五十位學生，共有十幾位老師。功課有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化學）、數學（代數、幾何）、歷史與地理（中國、世界）、一門外語（英語）、體育、音樂、美術、書法以及國文（全國通用語）。當然，國文課是最多的。我們課程表裏的內容與歐美所有中學的功課內容基本是一樣的。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感覺有着光明的前途。

邵陽士館變成邵陽會館，並在裏面建立了我們的學校。這種轉變方式在長沙很有代表性。在 20 世紀初，幾乎所有的湖南省各個縣的科舉考試考生接待站都變成這樣。而我們學校在所有的方面都堪稱典範。我相信我可以說在辛亥革命後我們學校在校長何英武、歷史老師劉武、國文主講老師李洞庭等人的推動下，成為了同類學校的領頭羊。

何英武有着浪漫、大方的氣質，他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不久即突然中斷對中國典籍的學習，赴日本接受現代教育。1905 年同盟會在東京一成立，他就參加了²¹。他隨同焦大奮在長沙參加了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當譚延闓在同盟會領導人的支持下當上了湖南總督時，何英武被推舉為大議會議員，負責監督政府的施政情況。同盟會與共和派四個小黨合併

21 同盟會，中國第一個大型的鼓吹共和的黨派，於 1905 年 8 月 20 日在東京成立，是國民黨的前身。

後（1912年8月25日）成立國民黨，何英武被選為湖南委員會委員²²。換句話說，何英武是一位政治人物，同時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因此，長沙的邵陽縣子弟中學的氣氛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就我個人來說，這個學校成為了我從事政治活動的搖籃也就不足為怪了。在1912-1913學年的頭兩個季度，所有這一切均啟蒙了我的「新知」。

在長沙流通的主要中國報紙在學校裏面露天的大塊牆面上均有張貼。每天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學校行政部門。幾乎每一位學生，一旦得知上面換了新內容，就都跑去閱讀。也許這是我到達本校第一天最令我驚奇的。以前我從未讀過報紙，我甚至從未看見過。這些報紙介紹讓我知道如此多的新鮮事件，我再也離不開它們了。我完全沉浸在裏面貪婪汲取。其中一份我特別關注的是《長沙日報》，原因只是其中大部份文章的作者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課還沒開始，所有的學生就都被邀請去參加校內定期組織的以與國家利益相關的時事為主題的辯論會。學生在辯論過程中可以自由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由主持人評判及總結。

1912年10月初他們宣佈了一個我最感興趣的辯論主題，是有關以下問題的：「哪個城市最適合成為剛剛誕生的民國政府所在地？」袁世凱費盡心機想讓北京繼續留作中國的首都，大部份國民黨黨員不承認這是最終的解決方案；而我閱讀的報紙也經常反映他們在此問題上的不滿。正如所預料的，辯論在親南京（在長江沿岸，是國民黨的前哨陣地）派與親北京（中華帝國的保壘城市）兩派之間展開。在雙方均充份展開論

22 1912年8月25日與同盟會合併的四個規模較小的共和黨派分別是統一共和黨、人民黨、民族進步聯盟以及促進共和聯盟。由這次合併後誕生的國民黨只存活了不到兩年時間。它只是到了1913年3月底至9月中旬才面臨了嚴峻的考驗。1914年6月23日，孫中山在東京賦予中華革命黨領導權。但這個黨也只存在了五年多時間，而且一事無成。改組後的國民黨，即中國國民黨於1919年10月10日成立。正是這個黨日後成名；也正是這個黨被賦予第二次革命重任後，於1927年又反過來粉碎了第二次革命，正是這個黨日後成為蔣介石獨裁的工具。

點後，我要求發言。我於是為第三個方案辯護，而這個方案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我竭力推薦武漢。我憑着非常有限的一點關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及政治地理知識，滿腔熱情地解釋道，北京位置太北，而且刻下了數百年封建帝王統治的烙印，而南京又太老氣橫秋，再加上完全缺乏作為一國之都城的宏大。武漢不僅是辛亥革命的搖籃，而且還具有佔據中國之中心位置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它作為我們的都城是再自然、再合適不過了。我的簡短的發言一結束，何英武就被深深吸引，並鼓了掌，把最佳辯手獎毫不遲疑地給了我。從那以後，他就再沒有停止過對我的關心。

在關於選擇國民政府首都的辯論後若干天，何英武把我以及我的兩位同學同時叫到了辦公室。實際上他是想與我聊一聊。一見面，他就向我們宣佈說他已注意到我們對政治問題抱着濃厚的興趣，因此一心想要告訴我們孫文、黃興與宋教仁等民國領導人中最有威望的三位剛剛成立了一個新黨：國民黨。他對我們解釋說，國民黨是同盟會的繼承者，將一如繼往地忠誠於革命傳統，而且是國家復興不可或缺的工具。他接着說，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這些具有遠大前程的年輕人，不能在黨內沒有一席之地，於是就邀請我們加入，並明確提出要做我們的入黨介紹人。關於國民黨的黨章、立場，他沒有向我們透露任何細節。但他問了我們幾個問題。他問我們是否同意孫文、宋教仁、黃興等人的觀點及其設想。雖然我們僅了解關於孫文及其同志所要進行的革命的大致情況，我們還是回答說當然全力支持。於是，何英武極為高興，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國民黨黨員卡。

半個月後，即1912年10月底，我們作為國民黨黨員參加湖南省教育協會——一個非常出名的半官方組織——的主席、副主席選舉大會。會議的前夕，何英武勸我們推舉從自己的內心、意識裏認為最合適的人選來填補這兩個很高的職位。投票時，我們很自然地就選了他。無疑我

們並不是唯一選他的人，因為投票結束後有人告訴我們說他獲得了兩個權力位置中的第二個，即湖南省教育協會副主席。

就是在這個小場合，我們首次使用了國民黨黨員卡。而且事實是，這個第一次也將是最後的一次。此後，我們就從未得到我們黨的領導人發佈的新命令，也從未被召集去參加我們黨地方支部的哪怕是最小型的會議。雖然這次經驗不足稱道，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政治活動，對我來說並非毫無意義。我當時真的認為國民黨是一心一意要重建中國，對公眾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均投入極大的熱情，並急於要親自投身其中。當時我還不足十七歲，就感覺自己已隨同席捲我們國家的新生之風一起飛揚。

1912年10月10日。第一個雙十節紀念日，即武昌起義勝利紀念日。這成了長沙的節日，傾城出動慶祝了三天。全城歡騰來見證這個歷史中最美好的時刻，也是歷史性的時刻。雖然人們均來到街上，看演出、擺宴席，但這個重大事件在學校、軍營、辦公樓，當然也包括各種各樣的公司大樓裏舉行的紀念活動也多得數不勝數。例如，在我們學校就舉行了一個大會，在會上何英武作了一個激動人心的長篇演講。我們的校長給我們講了些甚麼呢？他說到同盟會的誕生及他本人本世紀初在日本的生活情況，在1905至1911年之間所有的反清起義，他本人積極參與的發生於1911年10月底的長沙起義。所有這一切，此前在我僅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今突然變得非常生動而振奮人心。

這些把全部的篇幅用來追憶各種反清鬥爭事件的報刊，終於把我們運動本身的歷史告知了我，因此，使我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民國活動分子。而且，我還以極大的自覺與熱情，與我們學校大約兩百位學生一起，投身到一次又一次地橫貫市區的有組織的遊行之中。但是，我們參加的最輝煌的一次紀念雙十節的遊行，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同類遊行的極致，難道不是1912年10月10日傍晚開始的迷人的火炬遊行？成千上萬的年

輕人每人手持一個火炬組成一個遊行隊伍。這個隊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蜿蜒婆娑，最終向省政府大樓廣場進發。在那兒陣陣的笑聲、歡呼聲爆發出來，整個廣場都沸騰了。我們都沉浸在歡樂之中。

雙十節過後不久，就像所有的諸省邵陽中學的同學們一樣，我還加入到在市內舉行的許多遊行行列當中，以表達對像從陳天華（《警世鐘》作者，1905年歿於日本）到焦大奮（長沙起義英雄，1911年10月31日遭暗殺）的此次革命中湖南籍烈士的悼念，讓他們永垂青史。雖然這些遊行激動人心，但是對我觸動更大的是數週之後陳天華的遺骨從日本運回故里這件事。陳天華的墓地就坐落在長沙市西南湘江對岸的神聖的嶽麓山畔，與許多湖南的優秀兒女墓地相伴。就是在一種令人永世難忘的默哀中，我們排着漫長而莊嚴的隊伍，一直把這位英雄送到其最終的安息之地。我們的這位傑出英雄，他為了拯救祖國而鬥爭，同時也是為了我們這些已經「覺醒」的長沙青年。

第三章

黃興和宋教仁的勝利

人們集會並紀念那些已逝的英雄，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無疑具有以下優點：點燃了您的想像力並使您能得到教育，超越自我。運動的領導者去向那些永遠活在我們所參與的運動中的英雄們致敬；這些領導者是當今最優秀人物的代表，而且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未來的方向；這場運動對他們的震動一點兒也不比他人少，而且還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我發現，如果我能像所有同學那樣能參加那些在長沙由官方組織但受大眾歡迎的遊行，我就心滿意足了。黃興於 1912 年 11 月初，而宋教仁於 1912 年 12 月中旬先後回來，他們兩人均是湖南籍的民國主要領導人，遊行就是為他們而舉行的。

黃興此前在北京呆了一個月，在那兒他與孫文一起以國民黨的名義與袁世凱和解（1912 年 4 月初到 10 月初）。隨後，他在華中地區轉了一大圈：他這次回到湖南應該是其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²³。在黃興回來的前夜，何英武把我們召集起來，要求我們準備為其凱旋慶功並給我們講述了其生平。

我們學校的校長告訴我們說，黃興就是長沙人。他很有文學天賦，很小的時候就在科舉考試中拿了秀才。他在武昌最好的現代教育機構——兩湖中學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學業後，從湖北省都督張志東那兒領到一筆獎學金赴日本留學。一到日本，他就與孫文，然後與陳天華聯繫，後者給予他極大的影響。黃興於 1903 年回到湖南，決定在那兒盡快組織反清起義。他在箱子裏面放了數千本陳天華的《警世鐘》小冊子。他迅速又秘密地把小冊子發放到整個華中地區，而且還與宋教仁、譚人鳳一

23 宣統皇帝一退位，孫中山就按他已正式允諾的那樣，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了袁世凱。自 1911 年冬至 1912 年春，中國有兩個政府：南京革命政府與北京反革命政府。從 1912 年 3 月開始，又恢復為一個——即北京政府。然而，一般認為北京政府經民國思想的改造而獲得新生，逐漸放棄了反革命傾向。但不幸的是，在 1912 年 6 月、7 月、8 月間，袁世凱與同盟會成員的磨擦激化。而孫中山千方百計要保持從封建王朝的黑暗統治中解脫出來的中國的統一。他認為只能前往北京與袁世凱進行開誠佈公的商談。孫中山於 1912 年 8 月 24 日到達北京，在那兒他被袁世凱說服，於是急忙要求黃興立即前來與他會合。9 月 25 日，一個共八點的國家和解與統一的宣言由袁世凱、孫中山與黃興簽署並在北京發表。雖然宣言內容空洞無物，孫中山、黃興還是非常滿意。

起創建著名的華興會，一個致力於中國復興的團體。在確認哥老會——華中地區最有影響的傳統秘密社會團體——將協同配合後，他積極地、極其具體地策劃起義，旨在推翻清朝統治。1904年11月，就在他準備向他的同謀者發出開始行動的信號時，有人告訴他行動計劃的秘密剛剛洩露出去。他匆忙從長沙出逃，以逃脫清朝巡捕的魔爪。如同這次流產起義的其他幾個倖存者那樣，他逃到了日本尋求避難。數月後就在日本，他與興中會的創建者孫文以及光復會的創建者張太炎商討合併，這次合併產生了第一個國民黨，或稱同盟會²⁴。他是這個組織的第二號人物，孫文是最高領導。然而，此後不久他就重返中國，在隨後的幾年中為了拯救中國他不惜代價地組織起義暴動。在他要達到此目的所進行的所有革命行動中最富有戲劇性、令人難以忘懷的是1911年春在廣東的那次失敗——以八十位革命黨人被屠殺告終。在中國這個事件被稱作「1911年3月29日起義」，雖然其實際發生日是1911年4月27日²⁵。

我們湖南人給予他的接待非常隆重。在我們的眼中，他的重要性總是與孫中山一樣，如果不是更為重要的話。他坐在轎子裏穿過了整座城市，兩邊擠滿了人群。人們終於能見到血肉之軀的他，欣喜若狂，不停地歡呼。在我的眼中他有一個光輝的形象：這是一個舉止莊重的勇士；這是一位真正的偉人。

1912年11月黃興在長沙短暫停留期間，做了多次演講。聽眾主要是社會名流與政治人物，但我通過當地的報刊報道了解了其內容。他們

24 孫中山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發起創建了興中會。張太炎，別名張炳麟，原籍浙江，年輕時即成為一位激進的反滿清的愛國者。他在日本短暫逗留後，於1904年在上海創建「光復會」。

25 1911年，格日曆的4月27日相當於中國傳統陰曆的3月29日。在清朝最終覆滅後，整個中國一直在格日曆3月29日舉行本次起義的紀念活動。另一個怪事是：「3月29日」的這次失敗的起義發生在廣州市中心；但是，七十二名同盟會的烈士被葬在幾公里以外的黃花崗。不久以後，此地即成為人們拜謁中國革命先驅者的聖地。但是，許多中國人就很不恰當地把「3月29日起義」稱作「黃花崗起義」或「72烈士起義」。

演講主題主要是：「現在清朝已被推翻，民國已建立，因此必須認識到革命的主要目標已經達到。今後全國人民應該把所有精力投入經濟的重建、現代化與工業化之中。」如果要歸類，黃興當然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是十足的樂觀主義者。然而，我贊同他的夢想。就像其他人那樣，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實際上，在湖南他的主張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此時，人們已經在長沙及本省其他幾個城市看到半機械化的小企業遍地開花；這似乎宣告了在不遠的將來要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購買兩三台機器，開辦一個日常消費品的小工廠，寄希望於數年後把它辦成一個真正的工廠，這無疑已成為湖南開明的年輕名流的一種時髦。這種情況我本人就碰見好幾次。例如：我晚間或週日常去跟大人聊會兒天的那座邵陽地區會館大樓的一位住戶，一位來自日後在我的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的隆中地區第二區的羅元慶，一位已經成年而且很有教養的人；他在長沙的主要事業是在弄到一台織布機與一台縫紉機後剛剛開辦了一個襪廠。

雖然宋教仁比黃興年輕，而且這顆明星剛剛升至中華民國的天頂，但是，湖南省會的人民對他的歡迎熱情一點兒也不遜色於黃興。他乘着快艇順着湘江進入城市，並在小西門登岸。在那兒他坐上了轎子，就像幾週前的黃興那樣，經過了我們的一些最美麗的街道，後面跟隨着數千名軍人與學生。我也在尾隨的隊伍當中。他的外貌與其朋友黃興形成強烈的反差，這使我驚奇。在我看來黃興屬「豪俠」的形象，這種胸懷寬大的英雄形象我們全省有各種故事予以讚美。他以大度、開放、熱烈的神情去驅邪撫正；而宋教仁神情嚴肅、沉默寡言。雖然他比黃興小十歲（他三十多，而黃興四十多歲），但人們會說他比黃興要大。他是一個沉思默想、憂心忡忡、承受超負荷工作壓力的人，也許新生的國民黨領導核心都不能不如此工作。

宋教仁是順德縣人，在 1902-1903 年在他不到二十歲時，就在湖北

一所現代教育機構接受新思想的洗禮。他不久以後就結識了黃興，並幫助他創建華興會，隨後他便成為黃興的親密朋友。1904年11月，他與黃興共同組織的起義失敗後，像黃興那樣被迫逃亡日本。1905年6月他在東京創辦了刊物《20世紀之支那》。三個月後這份刊物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報，並於1905年11月份改名為《民報》²⁶。在他以極大的責任心與才幹擔任《民報》的編輯、社論作者的同時，他還專心系統地研究西方政治制度；而其朋友黃興也以從未有過的注意力，投入到完善他在日本軍校裏學到的指揮藝術之中。1905年末，當宋教仁一得知彼得堡的工人起義反對沙皇統治，就分析其來龍去脈；他懷着極高的熱情要求中國的革命者要盡快學習俄國革命者的榜樣。

由於宋教仁不滿同盟會主要領導人之間非常無謂的勾心鬥角，而且自己也無意捲入，他於1906年計劃去滿洲里與非常著名的秘密組織「紅鬍子」²⁷頭頭合作組建反滿的地下組織。他此次擬定計劃的指導思想與當年發動華興會領導人時的指導思想非常接近：1903、1904年他們曾在湖南與哥老會的領導人建立聯繫。但是，他想現在推翻滿清的最好辦法是直搗其滿洲老巢以成功地打敗他們。但不幸的是戰鬥失敗，他又一次旅居日本，並在那兒重新研究。1910年他前往上海，並成為《民立報》的主編。這是一份由于右任創辦的期刊，不久即成為中國最有影響的革命宣傳的陣地²⁸。

1910年底與1911年初，他起草了一個未來中華民國憲法的總藍圖，以及關於未來中國行政與司法運作機制基本原則的宣言。顯然，這兩個

26 在同盟會創立（1905年8月20日）後，《20世紀之支那》自然地成為其機關刊物。但日本當局沒收了第3期。後來刊物復活並改名為《民報》。《民報》辦了近五年。它總共出版了26期，最後一期是1910年2月。

27 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紅鬍子」的大量的情況介紹，參見原著第248-255頁。

28 《民立報》由于右任在上海編輯，它是由孫中山編輯的《民報》停刊後不久創辦的。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它很快就成為同盟會的半官方機關刊物，一直延續到1912年初。于右任，激烈反滿的自由主義文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時他年方二十七。1907至1913年間他投身於革命新聞事業之中，成績卓著。他於1923至1924年間在許多共產黨知識分子的協助下創辦了上海大學。彭述之就在那兒與他結識。

文稿均是其長年研究與反省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成果。實際上，那時他跟黃興以及同盟會其他大部份同志一樣，相信將於 1911 年春在廣州舉行的起義會一舉成功，因此就考慮下一步的方案。這次起義的失敗，使得同盟會遭受了難以彌補的一大批高素質革命活躍分子的損失，其影響當然是深遠的。然而，他並未失去理智與勇氣。他並沒有屈服於搞暗殺爆炸的誘惑，也沒有完全放棄革命的努力。他重新回到上海，在極度艱難的情況下重新擔任《民立報》的主編。

在同盟會內部，他們經常自問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出發地應該選在哪兒。有些人認為應該選在北方，那兒是清朝統治制度的堡壘。有些人說應該選在南方，即在貴州、雲南、廣西和廣東諸省交界地帶，據他們說從此地出發較容易逐漸佔領清王朝的其他地盤。還有些人認為應該選在中原地區，這樣影響就可以輻射到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個討論又一次激烈地進行着，原因很明顯，此時正是 1911 年春廣州起義失敗後不久。而宋教仁，以前曾主張革命地點選在北方，現在非常坦然地選擇了中原地區。事實上，在湖北與湖南的「新軍」聯合一致的情況下，而且這些「新軍」均是按現代方法組建與訓練，清朝政府把它看作是其王朝及政府長治久安的工具，革命軍還能以與他們關係極為密切的「哥老會」那種組織形式來不斷地擴大地盤，這個情況觸動了宋教仁。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加速打入新軍並與譚人鳳（Tan Renfeng）、居正（Ju Zheng）最親密的同伴協同一致，宋教仁於 1911 年 7 月主動在長江中游各地區設立國民革命活動協同組織，即華中局²⁹。無疑地，他有充份理由被看作是 1911

29 譚人鳳，黃興最早的一批同伴中的一位，華興會的創立者之一，而且是 1904 年在湖南的這個革命組織裏最活躍的成員之一。

居正，湖北籍的一位小知識分子。1906 年在東京由宋教仁介紹加入同盟會，時年三十歲。1907 至 1910 年在新加坡、仰光均積極參加反清活動。

在華中局（1910 年夏至 1911 年春）成立之前，譚人鳳、居正已經是宋教仁最親密的合作者。1911 年 7 月 31 日，華中局終於正式在上海的《民立報》社址成立時，譚人鳳與居正在宋教仁的領導下，堅決地從事於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的準備工作。

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勝利的主要謀劃者之一，同時也被認為是少有的幾位對此次革命勝利後要建立的國民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模式具有清醒認識的同盟會領導人之一。從此，即從1911年中期開始，雖然他精神鬱悶，而且嘴不留情，他還是很坦然地承認自己有取代孫中山的雄心。

清朝一被推翻，孫中山與宋教仁之間的意見分歧就公開化了。一方面表現在對付袁世凱的策略，另一方面是中國適宜於建立甚麼樣的政府類型。孫中山希望考驗一下袁世凱的堅定性，他是最後才歸順到民國旗幟下的北洋軍閥神秘莫測的頭目。而宋教仁，就像黃興那樣，要求我們對於他要顯示某種靈活性；而且內心焦慮，千方百計要避免一場他認為革命黨人根本沒有準備好的內戰。孫中山宣佈贊成建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宋教仁卻提倡英國、法國式的議會制。支配着宋教仁觀點的是擔憂像中國那樣遵從權威的國家，一經選舉就不會下台。他是怕延續了數千年的君主制的復辟。起先，大部份的同盟會成員都反對宋教仁，他們私下裏指責他企圖壟斷政府首腦一職；但從孫中山決定把臨時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開始，反對宋教仁的各種意見就瞬間緩和下來。按照孫中山的意見於1911年末在南京由其同僚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憲法》，由1912年3月召開的由革命軍光復的各省代表團大會根據宋教仁的意圖修訂，最後經同盟會代表團同意通過³⁰。宋教仁居高臨下意識到同盟會只不過是一個幹部團體，一個基本上以流亡日本的革命者組成的政黨，他最後主張必須趕快由一個真正具有全國範圍的政黨、一個為盡可能多民眾謀利益的政黨、一個能夠在每一個省均獲得最多選票的政黨來取代同盟會。目的是要肩負起它應負的領導國家事務的職責。關於這一點孫中

30 由革命軍光復的各省代表團大會於1911年12月在南京召開。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至1912年3月底一直行使中華民國臨時議會的職責（直至袁世凱在北京行使職責），而且此次大會在其議事日程中還包括研究《中華民國臨時憲法》這一項，這是根據「總統制」的思路起草並由孫中山提交給大會的。大會在1912年2月初至3月初討論憲法內容，結果是1912年3月11日由當時還是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頒佈了一個採用「議會制」的憲法。

山馬上同意。國民黨建立之初，宋教仁成為了事實上的黨魁，而孫中山更願意充當其精神領袖。

自從1912年8月底起，宋教仁就分秒必爭地展開一個大規模的攻勢，其目的是大肆宣傳國民黨，同時使本黨成為1913年1月份立法選舉無可爭辯的獲勝者。他表現出極大的自信與積極性，一連數週一個個城市地訪問過去。他1912年12月來到長沙也就是為了履行其自認為的准神聖的使命。在黃興不斷地給我們講工業化的好處的同時，他也在大大小小各種演講中反覆地宣揚民主化。這些演講均在我們的報刊裏刊登或摘登。

袁世凱在表面上顯然全面而真誠地遵守孫中山、黃興同他在北京費了重大努力才達成的國家和解八點宣言；這在全國，自1912年10月以來，激發了極其振奮人心的樂觀反響。這件事還引發了整整六個月的社會變遷與宏大期盼，而且自始至終我都有某種激情飛揚的感覺。這種感覺遍佈我的大部份同學和老師，長沙各種學校的大部份學生以及長沙的許許多多市民。誠然，這個時期的湖南人民的心態變化異常迅速：不但是年輕人的心態，所有的一切均激起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熱情並力邀他們參與政治活動，正如同我已揭示的那樣；而且還有成年人的心態，至少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如同向我展露他們事業前進的腳步。過去的好吃懶做的習慣讓位於20世紀的奮發圖強的精神，他們看見了在他們身邊發生的反滿清鬥爭英雄偶像的越來越輝煌的成功。

長沙的一個最好的居住區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寺廟：這是清朝為了給剿滅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曾國藩慶功，在一處宜人的池塘花園景區中央建造成的。現在省政府一聲令下，自1912年冬起，這個廟宇變成革命烈士紀念館。自那以後，每當我看見成年人僅僅為了瞻仰那些為革命獻身的英雄的肖像與紀念物而排起長隊，我就激動不已。這是個嶄新的現象。另一方面，這也充份說明了真正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

如果說宋教仁這次來訪成功地給予了我們指點，那就是他指出了當前競選的重要性。我們均以耐心而且平穩的心態來等待 1913 年 1 月選舉的結果。選舉結果一公佈，我們均欣喜若狂，因為顯然我們支持的黨派所獲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全部反對派的總和，這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國民黨不管在上院還是下院均獲得了相對的優勢了嗎？宋教仁不是因此就可以確保期待的目標，即讓純粹的國民黨掌管內閣去處理有關民國命運的大事了嗎？我們的期望與現實吻合了。1913 年 3 月，宋教仁告別了他在上海和長江流域一帶的朋友並準備前往北京組建新政府。事實上，我們一點也不懷疑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為了開辦新式學堂而訴諸法律

1913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北站有一群人站在月台上，前面就停了一輛火車。幾分鐘後即將前往北京。宋教仁登上了火車。就在他登上火車的當兒，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用左輪手槍向他開了一梭子。他倒下了。人們立即把他送到醫院。兩天以後，他由於傷勢過重去世。

這起難以令人置信的謀殺使所有長沙人震驚。是誰開的槍？這正是問題所在：這是一個我與我的同學們均感覺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所閱讀的報刊也對此保持最大限度的沉默，對這件極為尷尬的事不願多說。事實上，我們的領袖們馬上就猜測出事件的原委，但是我們直至 1913 年 4 月初才開始覺察，知道此案的罪魁禍首就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本人。我們的報刊不敢報道，因為他們此時還不能確認。

然而，1913 年 4 月中旬開始，真相大白於天下，或者更確切地說，真相像一顆炸彈被引爆。謀殺案調查由黃興和宋教仁的朋友，1912 年 6 月被選為江蘇省總督的程德全（Cheng Dequan）主持。他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是袁世凱授意總理兼內務部部長趙秉鈞（Zhao Bingjun）派人暗殺了宋教仁。這樣的背叛行徑在我們及許許多多同胞心中激起的憤怒當

然是極為強烈：反應的強烈程度開始時使我們驚呆了。為了讓憤怒達到頂點，我們還必須揭露袁世凱與由五大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的最大銀行組成的財團簽訂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協定；根據條款財團貸給兩千五百萬兩銀子，當然作為交換，他重新把過高的利益出賣給了外國資本主義。其實我們知道他這樣做是為購買武器以及給軍人付軍餉，否則他就不可能在今後的內戰中獲勝，而這場內戰他認為根本無法避免。1913年5月開始，他就無理地指控黃興陰謀策反他，並指控黃興正在精心準備謀害他，因此要求對他繩之以法。1913年6月，他還斗膽「解散」國民黨，發佈禁止令並進而罷免此黨三個代表的職位，即李烈鈞、柏文蔚（Bo Wenwei）、胡漢民，分別是江西、安徽、廣東的都督。我們的怒火馬上爆發了出來。但是必須認識到這是隱藏着的怒火，是無力的抗爭。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領導給我們發出了一些指令，才使我們不能行動起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我們的報刊上登載的新聞讓我們痛心和羞恥。這些新聞讓我們心緒低落、深感憎惡，直至我們幾乎拒絕閱讀。我們甚至不再談論時事，我們逃避現實。我們的校長何英武越來越頻繁地不在學校裏出現，顯然是去參加湖南省議會或者國民黨湖南省省部的棘手而無休止的會議。我們觀察到他的神態越來越肅穆，話越來越少，而且容顏越來越消瘦。這一切令我們傷心。我們的期末考試比預計的來得早，在6月底之前我們就都回家過假期了。此時長沙的氣氛已經相當沉重，於是我們便被放任自由了。

那時在長沙，在我1912-1913學年即已熟悉的邵陽會館為成年人準備的房子裏，住着一位三十歲上下的匡（Kuang）先生與一位四十歲上下的陳先生。他們兩人均是我純粹的「老鄉」，因為他們像我那樣來自隆中鎮的第三區。此外，陳先生對於我不僅僅是「老鄉」，他還是我已故祖母的一位外甥。陳、匡兩人均受過系統的古典文學訓練，現在一心

想順應時代成為法學家。他們就是懷着這種心情來長沙的那所優秀的政法學院學習的。我告訴他們我剛剛離開的那所學校原來是我們家鄉那個區的小型「義學」，後來彭少奎用了六個月時間把它變為一所「新學」，即新式學堂。聽完他們歡呼了起來。當然，聽說 1912 年秋季由於學校的教師及大部份學生離開，學校停辦，他們同我一樣地傷心。然而，我們三人最後一致決定學校必須盡早恢復，從 1913 年夏季開始，我們必須為達此目標做好必需的準備。

我一回到銅鑼村，就如約去拜訪匡先生。其家鄉的小鎮——匡家鋪——離我家僅五、六里路。隨後匡先生通知了陳先生。因此，我們三人很快地聚首制訂我們的行動計劃。事實上，我們面臨的困難並不少，因為我們清楚掌管本區經濟大權的那些腐敗名紳不可能不出來反對。

我們區的「義學」，就像在中華帝國上遍地開花的大多數「義學」那樣，具有悠久而根深蒂固的傳統。這種學校，如同名稱中「義」所暗示的那樣，是一種公益、免費、供選讀的學校，是一種不論貧窮貴賤，面向我們區所有家庭孩子們的學校，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末。人們把學校建在我們區公共用地的中央，負責辦學的鄉紳們很早就制定了田租制，規定不管豐收或歉收，每年要收繳幾百擔（每擔 50 公斤）的稻穀。幾十年來，正是通過上述半成品的田租來維持教師的薪金、校舍的維修以及招收幾十名學生。不幸的是，在 1880 至 1890 年的十年間，隨着中國傳統社會及其統治階級的日益衰敗，「義學」這種教育機構也幾乎全部被廢止了。我們區的情況尤其如此。在我出生前夕的一個清晨，我們地方被委以捍衛公共利益重任的鄉紳們，肯定是受到了當時腐敗社會風氣的毒害，一下子就把「義學」關閉了，把公共的資金裝入了自家的腰包裏。自那以後，事實是他們通過這種手段靠犧牲我們的利益肥了自己。唯一例外的是在 1912 年的上半年，彭少奎說服他們支持他恢復學校，這給我帶來巨大的利益。

匡、陳兩位與我均認為，在我們展開與我們區這些腐敗鄉紳鬥爭之前，最好是先徵求他們的同類但不同謀——即我們區的開明鄉紳的意見。幸運的是，他們人數相對眾多，而且大多數對現代觀念與新學持非常同情態度。說到就做到。我們區的十幾位開明鄉紳接受邀請前來與我們討論計劃，地點在匡家鋪鎮的一個商店內。他們毫無保留地同意我們的計劃，並許諾全力支持，並慷慨地給我們建議，以免走彎路。而我們區的腐敗鄉紳，其中有不少是我本人所屬的彭氏家族的有權有勢的成員，既頑固又膽小。他們中有一位姓蕭，以經商為職業，而且在做買賣之餘，還是個吸鴉片煙的大煙鬼。他正式負責讓我們區所有需交納田租的農民每年交足數目，並由他撥入「義學」的金庫，我們不能否認他確實完成得很出色。但是，他還負責——雖然根本沒有以上那麼正式——編選告示來糊弄我們鎮以及隆中鎮的官僚們，一旦「義學」的金庫被填滿，他本人及其狐朋狗友就把資金挪用一空。這位蕭姓背後還有一個無賴，更是膽大妄為，而且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其大名：彭華山（Peng Huashan）。他是一位中產地主，財富又相當可觀，但總是通過一些非法手段來不斷聚斂更多財富，尤其是盜竊公款。他主要是進行一些欺詐與小偷小摸，來讓他的煙館開得更加紅火，而且還養着一個花鼓隊，他想把它作為一個誘餌來吸引老主顧的到來。在他們的旁邊，總還有另一個姓彭的傢伙，但他似乎並不被看作是他們同夥裏最被看中的那個。他是我們這個狡猾團體的第三個偷盜者，是十足的寄生蟲，他本人無田地，又不勞動，但他卻過着奢侈的生活，而且還大量吸食鴉片。為了自我享受，同時為了讓那些可能譴責其行為的人閉嘴或操縱他們，其同黨彭華山及其「錢櫃子」姓蕭的那位就不停地大擺宴席。

在匡家鋪（Kuangjiapu）舉行的開明紳士會議期間，我們很快就達成共識：打敗這樣的三個貪婪冷酷的傢伙只有一個辦法，即在縣一級，或者說是去邵陽狀告他們。我們中最有文化、最有才華同時最有威望的

陳先生當場就拿起筆起草一份訴狀，要求那三位已被指名道姓的傢伙，必須為侵吞我們區的義學基金負責，而且永遠不能繼續濫用職權；他們必須追回由於怠忽職守而流失的至少部份款項，而且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由道德高尚的人來取代他們；只有這樣，才能在我們區按照時代的要求重振公眾免費教育。這份訴狀一寫完，我們三人就親筆署上了名，次序是：匡先生、我本人、陳先生。為了把這份訴狀呈給我們縣衙門的有關官員，匡先生即刻去了邵陽，同時，這個醜聞也公開了。

當然，彭華山為了自衛，和同黨聯合開始反擊了。用甚麼方法呢？他們攻擊三個告狀者中最易受攻擊的那個目標，即我本人。事實上，我是這三位「始作俑者」中唯一與他們來自同一家族的，而且在這個家族中誰也不會忽視他們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我是個年輕人：我不是三十歲也不是四十歲，我還不到十八歲。實際上，要打垮我對他們應該只是小菜一碟。彭華山及其同黨馬上召見了我父親。我原以為讓他知道這件事於事無補。但當父親從他們口中得知我做出了狀告他們這樣大不敬的事後，大吃了一驚。他們催促他要把我帶回到正路上來。

被召見後父親回到家裏，茫然不知所措。他看我的神態很特別，我一下子就猜到有人剛剛給他講了我的壞話，於是決定先發制人。我問父親他是否碰上了非常不如意的事。他說是的，並仔細地向我描述了我的那些陰險欺詐的對手剛剛跟他談話的場景。他告訴我他們主要講了以下內容：「你生出來的這個逆子把與我們有關的那些事情擅自抖漏出去真是不能容忍。你的兒子神志正常嗎？他去長沙吸了那兒的空氣後沒有變成瘋子吧？他母親的乳汁在他的唇上還來不及乾，他還透出那股氣味，就敢跟我們對着幹，我們這些最受人崇敬的他的長輩，他家族的頭領！這種事無疑是非常嚴重的。而你唯一可做的事是：要求這個毛頭小夥去邵陽把他膽大包天告我們的訴狀上的署名給擦去。因此，我們有言在先，如果你的逆子拒絕聽從我們，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把他趕出我們的家族，

其後果是取消他繼續姓彭³¹的權力。」父親把以上情況通知我後，神情沮喪，轉向我並說：「我們身陷困境。你現在要怎麼辦呢？」

為了使父親放心，同時為了在他眼前自我辯護，我就開始把所有事情向他詳細地和盤托出。我提請父親注意，這兩個彭姓的人不管是在他們的地方還是在我們的地方上，剛剛肆無忌憚幹的是一種威脅的勾當，更不必說訛詐了。他們不管是在我們的家族還是我們的區都一直以貪贓枉法而遠近聞名。我讓他認識到陳、匡與我三人現在投入的這場反對他們及其同謀的戰鬥並非無足輕重。我向他說明我們區「義學」財產的收入相當於他的收入的幾倍，並且問他讓這些人繼續偷盜下去是否合適。我的父親本是個正直的人，在這一點上他無法認為我理虧，他站到了我這一邊，認為我決定維護的是個正義的事業。但是，他懷疑我們有機會戰勝他事實上十分熟悉的這些貪得無厭的人。他心裏仍然十分不安。

「但是你，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將你逐出我們的家族，到頭來連自己的姓都保不住，你該怎麼辦呢？」他大聲說道。

「那好啊！如果那些人千方百計地不再讓我姓彭，如果那些人想盡方法不讓我姓『鼓聲』，那我就姓『鼓』吧。」我不假思索地開玩笑答道³²。

但我父親一點也不欣賞我的這個笨拙的文字遊戲。我就趕緊試圖說服他不要對我的事太憂心忡忡，並告訴他陳、匡與我三人領頭的訴訟案件不僅是正義的，而且證據確鑿，同時告訴他已經有許多有威望的社會

31 在舊中國，被家族除名或剝奪姓氏權，其嚴重程度與舊時的法國由民間宣判鞭杖而死同樣可怕。

32 無法翻譯的玩笑，因為它與漢字書寫的特殊性密切相關。「彭」這個中國所有彭姓家族的姓氏，原來的意思是「鼓聲」。從外形來看，它由兩部份組成：如果獨立地來看，其中一部份可以理解為「羽毛」；另一部份自身沒有意義，因此無法獨立成字，但是當它與「羽毛」那部份分離時，就只能與一個「樹枝」部份相結合，與之構成一個發音為“gu”的字，意思為「鼓」。使彭述之覺得好玩的是若有人剝奪他的姓氏，即脫光其羽毛，沒有人能阻止他給自己再取一個用樹枝掩蓋的姓氏。用一個表面相異但實質相同的法語譯法，這個玩笑可譯為：「那好！即使他們脫去了我身上的羽毛，我總還有樹枝遮身。」

名流支持我們，隨着時間的過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我們的行列。總之，在或長或短的將來，我們肯定會獲得勝利。為了安慰父親，我對他大聲地嚷道：「而且這位給邵陽衙門起草訴狀的陳先生，你很清楚這個人在整個隆中地區是崇高威望，你也知道得清楚，你比我更熟悉他，因為他是你的表兄，你自己母親的侄子！」我這樣說明是否已使父親安心了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說的是，在這次談話後，他放任我去做事了。

1914年初，邵陽縣負責司法的部門全部滿足了在陳、匡與我起草並呈送的訴狀中提出的要求。彭華山及其同黨，還有姓蕭的那個傢伙及其同夥，結果不得不很不情願地放棄隆中地區免費公共學堂的財政權。權力終於轉到了我們這一邊思想確實進步的那些名流手中。而且再也不可能把我從家族中趕出來，並剝奪我的姓氏。但是，遲至1916年，陳、匡與我才成功地利用了我們的勝利，即從我的朋友中找到一位罕見的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小學教師，他成了我們把隆中地區第三區的免費公學辦成真正的新學的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但事實是，這個免費公學在經歷蛻變與復興後，將在許多年中為我們家鄉許多孩子提供珍貴的服務。我將說服父親盡快把我的幾個弟弟送到學校學文化，並且同時說服他稍遲把我的幾個妹妹也一同送去，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李洞庭的犧牲

1913年9月初，當我重新來到長沙求學時，人們稱作的「第二次革命」，其實不過是由一支名義上由國民黨領導人帶領的後衛部隊反袁世凱的一次戰鬥，而且已經遭到失敗。

在袁世凱於1913年6月發起挑戰的逼迫下，面臨失敗與反叛的兩種選擇時，江西、安徽及廣東政府於1913年7月舉起了起義的大旗。黃興在南京隨即宣佈支持這些省份的起義，福建、湖南省都督馬上回應。總

共有五、六個省份參加了戰鬥。由於其他省份未能參與進來，以及反袁部隊在規模上無力與袁世凱對抗，因此在抵抗了不到兩個月後，起義在軍事上遭到慘敗。自此以後，整個華南地區均落入了以袁世凱為首的軍閥集團，即北洋軍閥（即北洋地區）的統治之下。一個已經被勒緊脖子的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往後將有自由的空間來征服所有那些敢於挑戰其權威的人。在發出大量的針對孫中山、黃興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的逮捕令後，他還組織鎮壓所有的這個「非法黨派」的活動分子與同情者。當然，對於那些起來反對他的省份，湖南也包括在內，即使不是打頭的話，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會給予最嚴厲的懲罰。在譚延闓及其朋友們逃離後不久，他着手把我們這些長沙人重新置於其統治之下而委任的那個人是原同盟會和國民黨的成員，最後時刻叛變。這時，在中國即使是地位卑微的變節者也到處官運亨通。他叫湯薌銘（Tang Xiangming）。即使是他尚未公開工作，他在我們這座城市的存在就是危險，像屍布那樣已籠罩着她。

然而，在我們的學校，情況沒甚麼改變。只是何英武不再是我們的校長了。為了生存他當然必須離開長沙。我們不禁為此感到惋惜。但是我們的教師團體一致推舉劉武（Liu Wu）充當其繼承人。他是我們尊敬的歷史老師。雖然方式上更加謹慎，少些鬥爭性與火藥味，難道他不是跟何英武一樣寬容、愛國嗎？在他的領導下我們享受何英武當校長時同樣的自由。我們繼續密切關注時局，而且不受指責地給予傳播，不管是口頭還是筆頭，在課堂上還是課後。

袁世凱一旦鞏固了對國民黨的勝利，他就變本加厲地做出卑鄙的舉動：他操縱着佈滿其黨羽的議會，而且人員極端不整。他獲得表決授權他可以無限期地擔任民國總統；他查禁了所有反對他的報刊；他讓議會「休會」；他委任了一個所謂的顧問委員會，由美國法學家古德諾（Goodnow）帶領按袁的意見制訂憲法。這部憲法極其專制，實際上是

為他實行君主制做準備的。他擬於 1914 年 5 月 1 日頒佈。他在臭名昭著的道路走得越遠，我們越是詛咒他。李洞庭（Li Dongtian），我的五位語文老師中最讓我尊敬的一位，與我們的看法一致。他在給我們上課時，直截了當地給我們講了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顯然，他毫不懼怕這樣做會引火焚身，而當時已是白色恐怖籠罩着我們。不管是在我們同學之間的討論會，還是我們的校長繼續讓我們組織能引起廣泛興趣的辯論會，或者乾脆在我們的作業裏，我們均能把我們的憤怒自由地表達出來。我們沉浸在這樣的幻覺之中：學校是聖堂，是任何勢力均無力觸及的反叛的孤島。我們在四、五個月當中就這樣生活在夢幻之中。我們沒有料到事實上這股勢力只是發發慈悲，給我們點喘息機會。

為了報答他自 1913 年中秋以來極力為自己賣命，袁世凱在 1914 年初正式提拔湯薌銘為湖南省都督。一旦坐在了這個令人敬畏的交椅上，他就不再滿足於過去的那種高壓統治；他盡力擴大鎮壓範圍，最明顯的就是把魔爪伸向了各個學校。然後為了達此目的，他建立了一個所謂的「督學」團體，其唯一的使命是確保對湖南省那些政治上有嫌疑的教學機構進行清洗。

1914 年 2 月的一個晴朗的日子，當時我們正在體育場打球，我和同學們看見兩位有點鬼鬼祟祟的人，是兩位成年男子，身穿豪華的絲綢長衫官服，跨過我們學校的大門徑向校長室走去。我們感到驚訝，不過也就是僅此而已。我們認為校長在他所接待的如此眾多的來賓中出現幾個怪異的人，也是不足為奇。我們於是就心情平靜地繼續打我們的球。

同一天的晚些時候，我們得知其來訪激起了我們一點好奇心的陌生人自稱是湖南省政府教育局的特派員，我們還獲悉他們似乎是「教育督察員」，而且憑着這個頭銜，他們就有權對我們所有的老師進行訊問，而且可以到處探聽情況，而不必說進行搜查，而且更放肆的是，他們闖入校長辦公室，搶走了我們的一包作文。每週的這個上午，我們班的同

學都把他們語文作業存放到這個辦公室裏。我們的「教育督察」經不起這堆練習簿的誘惑，就開始翻閱，顯然極其漫不經心。他們一翻畢，就迫不及待地說裏面充滿着針對民國總統個人的不友好言論。這個發現開了他們的胃口，於是他們就責令校長把他的所有班上所有同學的一週語文作業當場全交給他，藉口是「評估學校的教學水準」。他們就是這樣拿走了我們的作文，就像得到了一個獎盃，然後大搖大擺地離開了我們的學校。

一旦知道此事件的細節，我們還是感到有點兒不放心，但我們也不怎麼把它太當一回事兒。我們更願意自我安慰地說這不可能有嚴重的後果。但幾天以後，我們成了打擊的對象，這使我們很驚訝。

你們來看一看後來發生了甚麼吧：我們的學校被湯薌銘的部隊給包圍了！從我們的圍攻者隊伍中分離出一個小分隊的武裝官兵。他們闖進了我們學校，又侵佔了校長的辦公室。我們這些學生被集中在教室裏。半小時過去了，可能最多過去了一個小時。我們親眼看見有兩人像犯人那樣地被捆綁着，在我們這些穿着制服的來訪者的簇擁下從窗戶底下通過，他們竟是劉武和李洞庭（Li Dongtian）！他們就是這樣被人簇擁着穿過了整個體育場，走出了學校，然後消失了。這怎麼可能？他們的被捕揪着我們的心，而且更有甚者，這使我們心急如焚。我們無法想像，這個我們剛剛銘刻在記憶深處的既平凡又吸引人的形象將走向盡頭，以後再也不會出現了。

我們校長的辦公室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我們很快地得知，湯薌銘的爪牙們一闖入校長室，我們的老師們，如李洞庭，同時向那個地方奔去。湯薌銘的爪牙們在宣佈逮捕我們的校長後，就強令他供出所有語文教師的名字，他們被認定為我們大多數同學這種反叛性格的教唆犯。李洞庭就立刻走向前去，宣佈他是唯一的對我們所寫東西負責的人，並且說我們的作文裏充滿的那些對政府不敬的評論不過是他本人看法在學

生作業中的反映。就這樣他暗暗在自己的逮捕證上簽字，而在他眼中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四個同事可以不受同一指控罪行的牽連。

我們最喜歡的老師李洞庭做出的犧牲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震動很大。他與劉武的被捕入獄，使我們突然感到成了孤兒。最後，我們揣摩在哪個方面我們相信自己無懈可擊是錯誤的。恐懼於是籠罩着我們。

就像他那一代其他的知識分子那樣，李洞庭是於本世紀初在日本加入國民革命的事業中來的。他就在那裏成為蔡松坡的一位朋友，而且還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與他有過非常密切的工作關係。他詩、文均好，曾撰寫並出版了精心題為「洞庭波」³³的一個詩集。他能幾個小時不斷地給我們講司馬遷在其《史記》³⁴裏精心描寫的那些英雄們的壯舉。他的性格非常內向，不善言辭，甚至有些膽怯，但是當民國被扼殺、民族在沉淪這些景象把他推入無名的憤怒與悲哀的境地時，他在給我們講述時激情便會噴薄而出。而且無可否認的是自1913年9月份開學以來，他就以各種方式不斷地鼓勵我們要利用那些往往是赤裸裸的事實，毫不掩飾地通過口頭或筆頭揭露那些我們不幸的祖國落入賣國賊後所發生的邪惡之事。從1914年初開始，李洞庭對我們來說不僅僅是個榜樣；誠然，他是我們「苦難的心靈」的象徵。

湯薊銘及其爪牙們對我們進行突然襲擊半個月之後，我們從報紙上得知，根據在長沙監督「維持秩序」的軍事法庭的判決，李洞庭已被執

33 《洞庭波》中的「洞庭」正是《洞庭波》作者的名字，即與「李洞庭」的「洞庭」是同一個字。「Bo」即「波」，「Dongtian bo」即「劈開烏雲的波濤」，或「（李）洞庭的波濤」。「洞庭」除了「劈開烏雲（字面意思：開闢一條通往上天的路）」的意思外，還有「在山裏鑿出的供神仙居住的大山洞」意思。

34 司馬遷，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生活在漢武帝——漢代（西元前140-87年）最英明的皇帝——統治的時代。他的《史記》包括史、論、傳，從傳說中的黃帝（西元前三千年中葉）一直寫到漢武帝，即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料大量來自口頭以及筆頭記載，其資料的豐富性無與倫比。《史記》原來共有約一百三十卷，用優美的散文體寫成（唐朝的韓愈及其朋友發起古文運動時就從中得到了靈感）。遊俠騎士、伸張正義的義士在其筆下以正面形象得到了充份的表現。

行槍決。我們同時還收到仍在坐牢的校長的一封信，上面給我們描述了我們英勇的老師的最後時刻，當李洞庭、劉武被帶上法庭的時候，李洞庭馬上承認了所有對他的指控：對民國總統進行人身攻擊，教唆青少年鬧事，陰謀顛覆國家等等。這個體現了其非凡勇氣的行為一旦結束，他就緘口不言，保持沉默。當法官宣判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他連眉毛都沒有動一動。在給他留下的最後八天時間裏，他拒絕吃衛兵給他送來的食物。他就是以這樣的慘狀被押上了刑場，就像被裝在廢棄的麻布袋子裏的一件東西，一個木閘就足以使他咽氣。

劉武雖然也像李洞庭那樣被歸入叛國罪一類，但他沒有被判處極刑。然而，被判處監禁十五年，他能有多少機會活着出來呢？他幾乎沒有機會了；這一點他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的信其實是告別書：在信中他要求我們不要陷入絕望，要面向未來，要以堅實的步伐邁向未來；這封信不僅令我們深受感動，而且文筆優美。事實上，他是用駢體文來寫這封信的。駢體文是一種非常莊嚴又極其古老的詩體散文，我們那個時代已少有文人可以真正地運用自如了³⁵。他被自己高貴的情感所激發，不由自主地找到了那種在唐朝達到至善至美境界的這種表達模式的大師氣息。以前我們從來不知道校長竟有如此的天賦和勇氣。我們馬上明白我們將失去一位了不起的人材。我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眼淚禁不住往外流³⁶。

當然，我們的學校不是唯一遭受湯薌銘淫威打擊的。到底有多少所學校，遭受了怎樣的迫害？我實在無法說明白；原因很簡單，報上一個

35 「駢體文」或「駢文」，深受詩歌影響的有節律的散文，在漢朝末年（西元前2世紀）至唐朝初年（公元7世紀）佔據重要地位。而這正是韓愈及其競爭者在發動古文運動（西元8世紀）所攻擊的目標。

36 非常幸運地，劉武並沒有死在獄中。他於1916年，即袁世凱倒台後，重獲自由。他後來選擇了法官這一職業。這是彭述之一次偶然在報上讀到的一條消息，即有關他於1925年初在湖南西部一個地區當選。

字也沒報道。我的一個夥伴，姓孫，原籍是離銅鑼村不遠的隆中地區的一個村莊，一天非常悲痛地告訴我，他所在的那所下級軍官培訓學校，湯薌銘及其走狗就抓了不少學生，並處決了其中兩位。我承認，對我來說那是唯一由直接證人告之，對鬧事學生進行鎮壓的事件。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對於那些自從 1911 年底以來一直為民國貢獻全部力量的所有的人，1914 年春天的長沙，其氣氛已完全令人窒息。

劉武和李洞庭被捕大約一週後，省政府的教育局給我們派來了一位新校長，屬袁世凱那一派的。顯然是想要討好我們，他向我們保證我們之中不會再有任何人為剛剛過去的事件負責，並向我們露出了微笑。他其實是擔心下個學年開學初我們會大量地離開這所學校。他的這個擔心是有道理的。我們之中誰不夢想着來年 9 月去一個政治、文化方面不像長沙那麼沉悶的城市繼續中學學業呢？

我們計算着剩下的日子，直到年底考試的日子。就在這十足索然寡味的學校生活的最後幾個星期裏，我與幾個同學卻極度地興奮，我們非常認真地預謀刺殺湯薌銘和其他幾個袁世凱的同黨。但是我們既搞不到炸藥、手槍，也找不到足以教會我們使用的教練，我們很快放棄了這個恐怖團體組織的空想的暗殺計劃。然而我們又無法安慰自我。那個夏天顯得從未有過的令人窒息。

1912 年年底，當我第一次步入長沙城牆成為何英武的學生時，那是我人生的重要時刻，也是令人興奮的時刻，我跟着各種幻想的波浪隨波逐流，1914 年年中，當我準備離開長沙，再也不想回來時，我所沉浸其中的是哀悼、悲傷、絕望。我已經歷了怎樣的期望？它是最美的嗎？是最糟糕的嗎？春節的鐘聲終於敲響了，我因此狂喜，但是最最黑暗的暴風雨突然降臨，把節日的氣息無可挽回地擊得粉碎。宋教仁的被暗殺就是民國的這樣一場暴風雨。

但是，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的，發生了以後，人們又為甚麼反應如

此遲緩以至漠不關心？孫文、黃興、宋教仁等人為甚麼就如此盲目，以至相信必須在袁世凱這一類的老狐狸前面一再退讓？他們對他及其過去的背叛行為一無所知？他們怎能對他內心深處醞釀的一點也不客氣的圖謀毫不懷疑？他們在得知了袁世凱的軍事實力後，怎不考慮到他要遣散他們幾個營的兵力是極其輕而易舉的事呢？他們為了換取他對忠於民主這個概念的簡單許諾而放棄了對他所有的控制權，這是可以理解的嗎？這些就是糾纏着我的一些問題，我不斷地問自己，而一直找不到任何線索可以給予滿意的答覆。我的政治素養太淺薄，以至無法弄清楚武昌起義的價值以及三年後我生活其中的如此錯綜複雜而全新的形勢。只有在我經過十年長期努力的思考後我才終於看清楚。誠然，只是到了大約1924年我才終於把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確地定性為一場發生於一個東方國家的未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指出了其失敗的深層的，即結構方面的原因。

回到寶慶

1914年7月初回銅鑼村的途中，我在寶慶停留的時間比往常要多。其實，我是希望在這座城市完成我中學學業的最後兩年。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的行政改革，把寶慶變成邵陽地區的首府，因此寶慶不再叫寶慶這個地名。原則上在任何場合，它僅僅被稱作邵陽。而在我們眼裏，他還是寶慶，不僅僅是因為它保留了原來的地域、風格，並且無論如何，它照樣發揮由邵陽、新化、武岡（Wugang）、新寧（Xining）、城步（Chengbu）五個縣組成的大行政區首府的職能。再說，它不可能不再是芷河流域的主要港口城市；由於其水文地理位置，它不可能不再是整個湖南西南地區的自然首府。而且，如果它是一個特長永遠顯著的地域的話，那麼首當其衝就是其文化生活。作為過去高品質作家、文人的搖籃，寶慶自十多年前就開始比較果斷地走上「新學」之路。

因此它擁有足夠多的智力方面的資源，以至能吸引許多熱衷於教育及具有其他良好素質的年輕人。

無疑，寶慶保留了具有長期歷史發展的痕跡，因此會呈現通常很髒的一系列小河流的複雜水網，根據職業區域帶分割而成的空間劃分（木器工區域、鐵匠區域、鞋革工區域等），大量的氏館以及會館的威嚴莊重。無疑，在這兒你不會發現任何的半機械化工廠車間，而一年半之前我記得在長沙到處都是。但是這裏令人鼓舞的現代的因素已經出現了。寶慶最大的街道已經被改建成一條大道，路邊聳立着幾座西式的多層建築，裏面均通了電，並且出售許多洋貨，尤其是日本貨。其中的一幢建築物是上海一家著名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分支機構，供應非常充足。不用說，那些最經常光顧此處的愛書人是各種學校的師生們，這座城市總是有許多學校，我們就從本城區內其中的兩所中學談起。

這兩所中學的最新的一所是私立的。其創辦者即是本校校長。他是位完全在日本接受「新學」教育的專家，而且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具有領導能力，又頗有威望，能從寶慶的社會名流那裏捐到開辦學校不可缺少的資金。他姓李，其女兒李芬（Li Fen）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於 1927 年在河北等地與我有密切的工作聯繫。他在各城各縣均享有崇高的聲譽，而且名副其實。在他的學生中已有五、六位來自隆中地區的男生多少屬於我的朋友圈子。但是，要獲得去這個學校學習的權利，必須要付學費，而且學費不菲，因此我要設法進入這所學校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就轉向了寶慶的另一所中學。這所學校歷史更悠久，更受人敬仰，在我眼中，它有一個無可比擬的優點，即學校的大門對窮孩子照樣開放：學費一分錢也不用付；膳宿費也幾乎全免。它是寶慶地區過去的公立學校（寶慶府學），在科舉考試被廢除後它改名為「寶慶五縣中學」，即在本世紀初它又以新的面目出現。值得注意的是，1911 年辛亥革命後取消「府」這個行政區制的決定也絲毫沒有使學校分崩離析，它產生的

唯一效果是要求作為東家的五個縣的負責人聯合起來，直接管理學校的財政與經營。

我去的目的是詢問是否有可能取錄我。校長接待了我。他長時間地看着我的成績單與我在長沙的老師對我的好評，當場對我進行了極為簡短的口試，沉思了一會兒，便決定同意收我為第二年9月份的寶慶五縣中學的三年級學生。

在銅鑼村我父親的屋簷下，或者在隆中地區的其他幾個村莊即我的一個老朋友劉祖發（Liu Zhufa）或者兩年來在長沙結識的幾個新朋友的家裏，我度過了這個異常寧靜的暑假的幾個星期。隨後，在1914年8月底，我不緊不慢回到了我們縣的縣城。一個重要的事件離我很遠很遠的地方發生了。在我回來前一個月，發生了一件將永遠改變世界以及中國面貌的事：一場殘酷的戰爭爆發了，在隨後的四年時間裏，戰火燃遍了整個歐洲，那是在我安頓於新學校後不久第一次聽說的。但是，我得承認當時一點也沒有估計到其重要性，而且更猜不到這次大戰正在給我們的國家帶來最為嚴重的反應³⁷。

雖然寶慶五縣中學沒有我在長沙時的朋友或同學，儘管由於我在這世事紛亂的兩年呼吸了湖南省城的空氣，剛開始的時候因此在這所學校裏享有聲譽，但是我再也沒有時間結交朋友。事實上，我絲毫也沒有背井離鄉的感覺。寶慶五縣中學實際上很像長沙的邵陽縣子弟中學：相同的面積，相同的規模、學生數也大致相同；各個部份的總體組織形式也是類似；相同的科目設置，同樣的行為規範，對住宿生來說當然只許在週日外出。而且教語文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人們只學文言文；唯讀經典

37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8月4日在歐洲爆發。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當然，不久人們就識破日本只是意在奪取1897年德國已經接手的山東。它於1914年8月27日派遣一支遠征軍去山東，並在兩個月內粉碎了駐紮在那裏的幾個德國陸軍小分隊及艦隊的抵抗。但是，當彭述之1914年9月初回到寶慶時，他一點兒也沒聽到這個消息。在袁世凱的統治下，這些消息傳到中國中部份的小城市的普通百姓和學生那裏需要很多時日。

作品；而他們提供的唯一需要點勇氣的東西，是所謂的時文，即選讀梁啟超撰寫的名著《飲冰室》裏的若干篇文章³⁸。

就像在長沙那樣，我並沒有全力以赴地學習。結果是：我在音樂方面很差，繪畫與書法也很弱。英語也不太好，但語文、歷史很好，數學、後來是幾何成績優秀，其他科目一般。相反地，就像在長沙時那樣我化了很多時間與我的許多同學討論學業以外的話題，而這些話題更能吸引我：詩歌、政治、哲學等等。就這樣我在幾週內就找到了一些摯友，其中最活躍的可能是兩位來自新化縣的男生，一個姓鄭（Zeng），另一位姓周（Zhou）。姓鄭的那一位的父親是著名詩人，他曾在一段時間內擔任過我們學校的前身，即清府公立學校的校長。姓鄭的這位同學個頭很高，其精力同他的寬厚一樣無與倫比。他遇大事不懼怕，而且眼睛充滿熱情。第二位的周姓同學是個藝術家。他寫詩，而且笛子吹得很好。在同縣的老鄉組織裏，人們對他的尊重並不亞於對大個子鄭姓同學的尊重。

我與新化縣的同學就相處較好，是由於我出生於隆中地區，而且跟他們講同一種方言嗎？這是可能的；但我並不這麼想。事實上，我與武岡縣的同學相處同樣好。而且我與城步縣、新寧縣來的同學的關係同樣相當好。只有那些來自邵陽縣的同學在我內心僅僅激發起了通常非常有限的好感。他們大多數是寶慶本地的孩子，而且在他們當中已經湧現出了一位叫夏修奮（Xia Xiufeng）的，近幾年來他作為轉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獲得了某種知名度³⁹。

38 當然，彭述之於 1910 年代中葉在中學裏常讀的經典作品已不是原來的四書五經了。但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所有那些寫得好、能夠為青年人所接受的作品均是用古典語言即文言撰寫的，這一點絲毫未變。梁啟超只用文言寫作。但是他運用的文言已大大地現代化了，有明顯的白話痕跡，但仍舊極為精彩。《飲冰室》是他的一個文章精選集，裏面均是 1898 年底至 1911 年底在國外，特別是在日本流亡時寫的。

39 夏修奮在寶慶的中學學業一完成，即赴北京接受高等教育，並且參加了 1919 年 5 至 6 月間的反帝愛國運動。他於 1921 或 1922 年赴德國，直至 1925 年才回國，並重又定居北京。就北京，1926 年初彭述之與他重遇。

原寶慶府的五縣學校，我們學校如此稱謂不僅因為它招收五個縣中各縣的男孩；而且還因為每年秋季都要變換校長，因此每個縣五年一次通過輪流換崗來行使教育權力以確保其良好運轉。1914-1915 年度，輪到實施此權力的是武岡縣。在為我們尋找校長的過程中，這個縣選中了一位叫應文高（Yin Wengao）的人，不幸的是這並不是最佳選擇。應文高曾接受過舊式教育，有舉人頭銜，而且在本世紀初，他也跟其他文人一樣，赴日本進修過。然而，這個培訓顯然在他沒留下多少痕跡。在維新的道路上朝着康有為、梁啟超方向邁進過兩、三步後，他馬上就又陷入傳統、保守的泥沼裏。

1915 年初發生了一件並不重要的事情，但足以說明他的平庸無能。與我同級的一位同學偷了他同桌的一點東西，應文高便小題大做。他向我們宣佈要請警察來學校把小偷抓走。這個魯莽的舉動沒有一個人贊同。這件事激怒了我，使我怒不可遏。在早操的時候，全校所有的學生均集中到操場上，我發了言。我說學校畢竟是學校，在任何情況下，請警察闖入學校並干預校內事務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不管原因如何，為了這一點小事把警察叫來是荒謬的，我建議我們就在現場選舉一個學生代表團，去校長室要求他重新考慮決定。我的建議獲得一致通過。以我為首的代表團受到校長的接待，他非常專心地聽了我們的意見並馬上作了讓步。但是，他這樣做是很勉強的。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惱恨，而且他對我懷恨在心。但是，在如此冒犯他的過程中，我在同學中終於獲得了許多同情與好感，而且同樣地，在不知不覺中給了第二次取勝他的方法，從 1915 年春季起的這場鬥爭在政治方面比起我領導的對抗他的那場鬥爭要更加嚴肅。

第四章

從城市到農村，
愛國運動風起雲湧

歐洲的大國都在自己的大陸被一場激烈的衝突搞得雞犬不寧，這場衝突一爆發，就讓它們深深地捲了進去，根本無法再插手遠東事務。日本借機在 1914 年的最後四個月中強佔了德國在 19 世紀末就已全部搶佔的山東。這個罪惡的勾當一完成，它就恬不知恥地於 1915 年 1 月 18 日向我國政府拋出了《二十一條》。這個條約唯一的內容是授權它在我們全國範圍內建立其保護地。而且，認為原本應該非常順從的北京政府有點拖延滿足其要求，日本人就毫不猶豫地於 1915 年 3 月向我們派出了部隊，把兵力增加了三萬人，藉以窺視我們的東三省。日本軍隊在我們的國土上進行各種調動，我們在寶慶當然直到很遲才得到零星的消息。1915 年初以來，我們至少學了不少如何在動亂與不安中生活的方法。但是，關於東京向我們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其存在我們就連想都不可能想得到。直至 1915 年 4 月份，即直至一份在我國出版的美國報刊偶然讓我們發現了事情的原委。於是，我們都義憤填膺，更有甚者，1915 年 5 月日本向我們下了最後通牒，而袁世凱幾乎馬上屈服；這更是讓我們憤怒到了頂點。從那時開始，全國人民已怒濤湧動。但只是到了 1915 年 5 月 25 日，袁世凱卑鄙地以中國的名義簽署了這個完全由東京政府強加於他的屈辱的協議，才在許多省份、城市興起抵制日本商品、銀行，總的來說，是抵制來自日本的一切東西。由青年學生發起的這個運動在幾天之內就燃遍長江流域的整個地區，從上海到南京，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長沙。1915 年 6 月這個狂熱月份的自始至終，我們獲得的成功將是最喜人，其轟動效應也是最大的。

從 1915 年 5 月份開始，在寶慶首先發難的無疑是我們的學校。我們一被告知袁世凱所犯的滔天罪行，就激動於這種同仇敵愾的反抗精神，隨之行動起來。我們的第一個舉動當然是集中在操場上，把我們自己的日常用品中所能發現的所有日本貨，如筆記本、鉛筆、衣服等等堆在一起，並放一把大火將它們燒毀。我們兩百多人懷着滿腔的怒火看着這些

日本權力的象徵在火中消失。那麼下一步呢？顯然，我們必須一天天連續不斷地懷着滿腔的怒火，同時在校內外投入行動之中。在我們放一把火把全部「日本製造」的物品一燒而盡後召開的全體大會上，為了達此目的，我無比激動地第一個走上講台，建議成立寶慶五縣中學學生聯合會。我的建議獲得一致通過。當場，大會推舉我的一位朋友鄧天河（Deng Tinghe）為聯合會主席，同時推舉我和我的另一位朋友馬仁才（Ma Rencai）為兩個副主席。就這樣成立了以前從未有過的第一個寶慶縣青年組織。

聯合會一成立，我們很快就確定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在城裏組織小組來擴展我們的隊伍，以便能讓市民們警覺起來並發動他們，讓他們知道關於最近袁世凱與東京那些吸血鬼們之間的骯髒交易這些精確有用的情況，並且說服他們拒購從日本進口的產品。然而，當我們試圖把想法變為行動時，卻遭到我們校長的禁止。他為我們沒有徵求他的意見而擅自建立聯合會而憤怒，便指責我們從事「顛覆活動」。他決定採取的第一個針對我們的制裁措施是把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彭述之開除出校。幾乎全校的同學，從新化縣的到武岡縣的，都宣佈站在我這一邊。他們向我表示的方法是委託其代表去校長室抗議其決議的武斷性。應文高一言不發。但是，兩天後的一個早上，我們看到校方佈告欄上貼了張關於把我堅決、立刻從學校開除出去的佈告。為校方固執己見以及蔑視我們的誠意所激怒，同時為了證明我們的決心已定，我的同學們考慮開展罷課鬥爭。但是，當他們正在討論實施的辦法時，我在聯合會常務機構的同學們的陪同下，去找尋那些給我們留下最大好感的老師們，向他們說明我們的觀點，並請求他們的幫助。

那些友善的老師們很快相信有必要為我提供幫助，就直截了當地去找了校長。他很尷尬，就召集了全體教師開協商大會。協商大會一開始就要求傾聽我的意見。我在會議面前盡量為我的行為辯護，並堅持這樣

一個事實，即我絲毫沒有觸犯我們學校的內部規章制度，而且堅持認為不管怎樣我只是在盡一個愛國者的義務。我的情況當然發生出以下的原則問題：「中學生有權每天盡量去跟蹤國家事務的發展情況嗎？如果他們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那麼他們有權把它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嗎？換言之，中學生有權從事政治活動嗎？」經過辯論、反思後，我校教師協商大會否決了校長做出的開除我的決定，投票的結果是贊同我的佔壓倒多數，而且毫不含糊。因此，校長除了辭職外別無選擇。很快地其職位就由我們的物理兼化學老師臨時接任，這位老師有許多優點，其中一條是不怎麼獨斷專行。

獲得這個勝利後，我們把目光轉向了本地另一所中學，即李先生的私立學校學生們，目的是向他們建議與我們聯合成立寶慶中學教育學生會，這樣自然就會讓我們擴大我們的愛國行動。他們中的許多學生很快就接受了我們的建議。開始是那些來自隆中地區而且在其中享有聲望的學生，他們現在都成了我好朋友圈子裏的人。但是，因為李先生這個徹頭徹尾的保守分子斷然拒絕允許學生參與學業以外的事情，這個計劃終於泡湯了。即使這樣，難道我們就要放棄在寶慶的街頭示威遊行嗎？當然不是的。我們將獨自行動，就是這樣。而且我們正在組織我們的流動演說小組。這時我們的老師介入了。然而，他們發現要說服我們放棄發動一場非常冒險的運動並非易事。他們最終還是達到了目的，因為他們向我們道出其嚴重後果：如果我們的行動擴大到校外，即使我們自己身處學校，也會不可避免地成為殘酷鎮壓的對象。於是，我們只能滿足於在同學中間組織關於時事的辯論會。但是，在這些辯論會中，我們並不局限於譴責日本的領土野心，我們同樣譴責那些滿足他們貪欲的中國人，那些統治我們的北洋政府的投降派；而且我們要以確定的方式對袁世凱的體制提出訴訟，直至對民國總統本人繩之以法。

擔負維護寶慶秩序的那個人，即寶慶縣縣長，雖然不會不知道我們

學校內發生的事。但是，他寧願對我們性格中造反的一面視而不見。這是為甚麼呢？因為作為一個縣的縣長，要對一所由五個縣共同擁有的學校司法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所在的地方離湯薈銘及其黨羽相距甚遠，就不必唯命是從；因為他既沒有足夠的權威也沒有足夠多的辦法對地方民意不理睬或不妥協就能保住自己的職位；而且因為他本人，也像我們省所有帶保守傾向的其他縣長或區長那樣，無法忍受中國淪為跟朝鮮同樣的命運，同時讓社會名流也淪為「亡國奴」。

誠然，1915年5月期間，長沙的氣候也起了變化。而且此後它以如此的速度繼續演變着，直至1915年6月中旬人們談起湖南省會就會說它重又成為湖南省愛國者的先鋒城市。雖然湯薈銘保留着打擊那些在他的管轄範圍內發動抵制日貨運動的年輕人，他其實是在克制自己以便利用這場運動。其權力的基礎徒然保持輝煌的外表，他表現出的其實是小心翼翼，唯恐破壞了他極力要維持的團結。如果不是「中等教育學生會」的話——與我們在寶慶未能成立的組織相當，那麼在長沙還有哪一個組織，是比它更具活力的愛國運動的領頭羊呢？這個組織內部殷實，而且受到大眾的擁戴，能夠支配相對大量的資金。這是一個有效、有生氣的團體，它不僅僅滿足於召集會議，讓所有湖南人都知道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日本一刻也沒有停止過針對中國的侵略活動，以及近十年來在朝鮮建立的意在奴役朝鮮人民的真正的奴隸制政權⁴⁰；它還上萬張地印發宣傳傳單、小冊子；而且它還不斷組織盡量多的愛國演講巡迴宣傳隊，

40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成功地使朝鮮擺脫了中國的勢力範圍處境，但又未能因此讓朝鮮完全進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其實，它發現自己必須與俄國分享這個事實上的保護國。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慘敗，日本便趕緊獨吞了整個朝鮮。但是它因此也遭到了朝鮮人的頑強抵抗，尤其是從1907年開始。為了結束這種「不正常狀態」，日本在接下的三年間又重新開始進行血腥鎮壓，在經過一批批的大屠殺後（這些屠殺與1931年至1945日本人在中國、東南亞地區的大規模暴行同樣不可饒恕），1910年8月23日，日本堂而皇之地吞併了朝鮮。這個「壯舉」一成功，日本自然地繼續在朝鮮進行恐怖統治。

其使命是在整個夏天走遍湖南省各縣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

1915年7月初，我們的暑假開始前夕，長沙中等教育學生會的兩個特派員來到了寶慶。他們倆都是邵陽縣人。他們馬上與我取得聯繫。他們給我帶來了傳單與宣傳小冊子。而且，在他們的建議下，我們在幾天時間內組織了一定數量的愛國演說巡迴小組，每個小組由兩三人組成。同學中有一位姓陳，與我組成了一個組，負責邵陽縣西部農村的宣傳工作，我們將盡力而為。

六個人口相對集中的地點標出了我們即將踏上的行程，姓陳的同學與我不斷地向西面走去。每個地點我們都要大致停留三天。但是，因為我們同樣必須花費很多時間一步步地走過兩個地方之間的道路，整個行程最終持續了大約一個月。我們開始於1915年7月中旬，同年8月中旬前夕才走完全程。

在每一個停留的地方，事情幾乎都以如下方式進行着：當地政府代表接待我們，我們向他們說明我們來訪的目的，以及請求他們說明我們組織適合於他們地方百姓的消息通報會議；我們準備會議並發佈會議消息；最後我們召開會議；然後，吃了一頓飯或告別招待會後，我們就又上路了。

我們的第四站桃花坪(Taohuaping)無疑是邵陽縣西部最重要的鄉鎮。它屬於大型農村集市類型。其中心是幾十家商店，其周邊是數百家農莊。以本鎮為中心的這塊邊遠地區的最高長官是一位年輕的顯貴，其憂國憂民的心不比我們輕鬆多少。他給了我們很好的招待。這個地區的鄉立學校的兩位教師居然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學。因此，我們的愛國宣傳會議自然就將在他們的學校舉行，學校雖然位於農村，但與鎮上相距不遠。

幾百人當了我們的聽眾。他們幾乎都是農民。要讓他們懂得我們必須讓他們弄懂的那些東西，在我看來總是很困難。事實上，問題不僅在於找到給他們講的話語，還在於推倒那堵他們對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全然不知的牆，以便最終能觸動他們。日本在哪兒？朝鮮又在哪兒？他

們全然不知。山東、福建、滿洲位於何方？他們照樣茫然。因此，我們就必須向他講明日本人為了在 1914 年達到攫取山東的目的，他們開初是把十七年前佔領山東的德國人給趕跑。但是，我是枉費工夫，他們聽不懂我的話。對於他們來說，那個故事簡直是比拉丁文還難懂。相反，我們要他們考慮如果他們遭受日本人「鐵蹄」的踐踏，那麼他們的日常生活將會變成甚麼樣。我們開始以盡量簡明、具體的方式給他們講當日本人不滿足於讓朝鮮人擺脫中國非常寬厚的帝國主義，而是把他們淪為奴隸後朝鮮所遭受的苦難與迫害。當我們講到這些。他們就能理解得更好。是的，他們因此聚精會神地聽着，而且他們不久就因為聽了我們的講述而交頭接耳，感到不安甚至憤怒。最後，他們義憤填膺，似乎日本天皇敢於用征服朝鮮人的方式來征服他們本人。

在另外一個地方，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在我們看來相當高傲的學校校長。那個人是位清朝的文人，在那個時代曾考中舉人，因此大為自豪，而且其學問一直名聲遠揚。他不能不給予我們以款待，因為這涉及到一個非常古老的、幾乎無法違背的習俗。但是，他以一種非常明顯的居高臨下的態度接待了我們。在他的眼中，我們其實無非是些「洋學生」，是一些對經典著作一無所知，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是文盲的毛頭男生。在我們的宣傳會議召開前二十四小時，在我們與他交流的過程中，他覺得在我們面前大量販賣其學識非常滑稽。而我卻快速地一一給予解答，因此就把自己置於與他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以最自然的腔調給他背誦他所珍視的經典著作中的精彩名句。正如我所期待的，他聽得張口結舌。他對我們的態度便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現在他尊重我們了，而且竟變得畢恭畢敬。然而，最令我們高興的是，所有那些來他們學校參加我們的小型會議的村裏人，對我們的反日宣傳演講並不比我們已去過的其他地方理解得差。

六都寨 (Liuduzhai) 是一個大鎮，其重要性幾乎與桃花坪同等。這

兒也居住着千餘戶人家。它位於一條小河的邊上，小河上小帆船不斷地來來往往。它與隆中地區雞犬相聞，其繁榮的大部份該歸功於這個地區。它與隆中鎮及我的家鄉銅鑼村僅隔三十里左右。幾十年來我的家人或長或短地定期去那兒，為了以最便宜的價格購買家裏無法生產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原棉、紡紗棉等等。六都寨是我們愛國宣傳行程的第六站，即最後一站。無疑也是最好的、色彩最為鮮明的一站。

這裏有一條規矩，即要善待那些來自寶慶，尤其是來自長沙的人。以六都寨為中心鎮的那片山區的負責人簡直把我們當作官員來接待。我們一對他們說要組織會議，他們就通過到處大量張貼告示及大聲吆喝來廣而告之。我們考慮在一個面積較小的房間裏開會。他們就在一個可以容納數千人的操場中央為我們搭了一個富麗堂皇的主席台。因此，我們的會議就有了大會的氣派，而且是一個聽眾來自各行各業的大會。前來聆聽我與姓陳同學演講的並不完全是種田的農民，還有商人、手工藝人、店員、學徒，還有穿長衫的社會顯貴們。

儘管如此，這種聽眾還是非常奇特，這些已經半城市化了的聽眾對我們的講話並未做出適當的反應，而且，其反應方式與直至目前為止我們所遇到的基本是農村聽眾的反應方式並不完全不相同。聽眾還是反應遲鈍，不能聽懂我們的話，雖然我們盡量以他們的習慣而且措辭極其簡單，敘述二十年來「新日本」以中國為代價進行擴張的種種努力。他們還是紋絲不動，直至用最平易的方式講日本佔領者的平日暴行時，我們才算講到了他們的心坎上。但事實上是，我們一打動他們的心，聽眾就至少以兩種極強烈的方式激動起來。百姓發出一陣陣的怒吼聲，而顯貴們卻直搖頭，以顯示日本人的行為與當前百姓的表現同樣使他們感到氣憤。而那些年輕人，他們大多數是學徒，並不限於憤慨。他們中那位最大膽的漲紅着臉，自動地站了起來，接着我們的話說，全中國的愛國者必須團結起來與「來自日本的魔鬼」作鬥爭，而且他們自身必須準備好

去打擊這些「魔鬼們」。

當我離開了六都寨重又回到銅鑼村的時候，我顯然只能用很短的幾天時間來消除我一年來東走西跑的疲乏。但這對我並不算甚麼！難道我沒有因此利用這樣的非凡特權，以我非常有限的辦法允許的範圍內，致力於喚醒那些一直在農村家庭中成長起來、此前在政治上完全與世隔絕的許多人真正的民族意識嗎？

讓我們擺脫暴君的運動

1915年的反日愛國運動，醞釀於3、4月份，出現於5月份，在6月份達到高潮，到了7月底，在全國範圍內已失去了其基本的動力。這次運動沒能在其高漲期形成永久的框架結構。它在9月份已僅是個記憶，這時我們重新回到邵陽／寶慶準備開學上課，就像其他各個學校的學生那樣。其實，城裏的環境已大有變化。上一年我們縣的那位寬厚的縣長已於夏天被免職。而取代他的那位湯蕪銘的走狗，在匆忙中看中一位思想非常狹隘的老學究，在他的授意下突然被任命為各校的學監，要求無論如何必須重新回到古代文化的緊箍裏。

這個幽靈迫使我們在我們所隸屬的某個機構內全部參加祭孔儀式，而這種儀式根據規定在寶慶的孔廟內舉行。他自己穿着此類儀式要求的長衫，以非常浮華的形式參與紀念活動。這無疑是自滿清覆滅以來強加在我們身上讓我們感到羞恥那一類事情中的第一件。為了提高我們的緊張度，幾天後他發佈了一個批示，其主旨是在所有的學校，像舊時那樣，語文教學範圍必須重新限制在正統儒家經典著作之內。當我們感受到，在我們這個小小的天地裏復古逆流重又回潮，我們當然灰心喪氣。但是，我們必須屈服的，除了那位顯然落後於時代的狂妄自大的獨裁者透露出來的某種要讓整個國家重新陷入災難的跡象外，還能是甚麼呢？

1915年5、6月間的愛國運動，在其矛頭針對日本人的同時，也毫

不掩飾地直指袁世凱，但是他慶幸地在 1915 年 7 月份終於成功地繞過了一處最危險的岬角，而且沒有多大損傷。總之，他相信已成功地重又真正地把權力奪回到自己的手中。自然他還不斷地受到他的那位叫古德諾的美國顧問的激勵。在 1915 年 8 月初，袁世凱相信能夠着手為自己的利益而進行復辟帝制進程。此後，他不斷地使用種種陰謀詭計，耍政治手腕，只是為了達到實現其荒唐「宏圖」的目的。

他考慮必須要顧全面子、做表面文章，於是在 1915 年秋季他着手炮製一個全國協商的天大鬧劇，其最精彩部份是對以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你贊成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對於這個全民公決，顯然參加的並不是人民，而是由一夥個人組成的「人民代表大會」，分縣級、省級，而且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幾乎全都贊同建立新的帝制。確實如此！如果有一個人這樣的投票中可以顯示自己是最狂熱的君主制擁護者，那個人就是湯薌銘。1915 年 11 月他投入了多大的熱情！這位奴顏媚骨的湖南省總督說甚麼也要在本省的每個縣城，當然還有在長沙，展現自己模範的「人民代表大會」。而我有權利來觀察寶慶的這齣鬧劇是如何上演的。寶慶是我在其中扮演一個小角色的地方，如果冒昧地說一句，我還充當了它的證人。在上述我的「地方」，我在長沙的楊木匠家中結識的一位前清的秀才，大地主的兒子，於 1915 年 11 月清晨帶着我直接去了邵陽縣政府所在地。他對我解釋說他按約定要去履行他的「人民代表」的職責。作為一個有些玩世不恭的小政治人物，難道他不希望繼續保持與像我這種愛國學生的良好關係，以便獲得百姓的歡心嗎？我跟着他走進了一個大廳，裏面坐滿了形形色色的人，所有人都急忙舉手擁護建立帝制。看到這個場景我心裏作嘔。

袁世凱無疑是被其全民公決假戲的「巨大勝利」搞得糊裏糊塗，而且他無論如何也聽不見其行為在中國民眾當中激起普遍憤怒的聲音，於是在 1915 年 12 月 12 日，他便「同意」登基，按他的話說，是「回應國

民的意志」。然後他宣佈，根據本國人民的意願，1916年將是他登基第一年，即「洪憲」元年。自此，也宣告了他的末日。事實上，中國是無論如何不願意復辟帝制的，因此整個國家均被激怒了。1915年12月22日至26日，三個民國的偉大戰士在昆明揭起了反對袁世凱的大旗，他們稱之為「三次革命」⁴¹，其尖刀部隊就有不少於三個軍的一支護國軍部隊。其中的一位唐繼堯（Tang Jiyao）是雲南省總督。第二位是李烈鈞（Li Liejun），「二次革命」失敗後不久，未能逃脫袁世凱的魔手，只能流亡在外。而第三位，三位中最純潔最有才幹的那位，他是起義的實際組織者，而且直至勝利一直是這次革命的靈魂人物。他就是蔡鍔（Cai E），或者沿用許多人繼續稱呼他的名字：蔡松坡（Cai Songpo），即我已在上文講到的那位與我的小叔彭育英一起初涉人生舞台的小神童。

蔡松坡於20世紀初葉在日本留學四年，學習陸軍軍官專業。不久，他在那兒就顯露了其戰爭天才，他同屆的中國年輕學員中在這方面唯一與他可以匹敵的是直接從北京皇宮裏來一個滿族人，叫鐵良（Tie Liang）⁴²。但是，由於在道德上的嚴格自律、正直，當然還有勇敢，他在同學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樣，他很自然地把許多來自中國的學員吸引到自己的周圍。他們把他奉為楷模，發誓要永遠與滿清政府野心家們的可恥傳統劃清界線，他們是中華帝國腐朽、墮落的分子。這些都是在1920年初我在莫斯科結交的朋友，他們中的一員王允雲（Wang Yunyun）曾多次跟我談起的。

蔡松坡在同盟會創立前夕回到中國，他於1910年末在廣西培訓清朝

41 請勿把1913年夏天民國的「第二次革命」與1925-1927年的真正第二次革命相混淆；當然也不要把1915-1916年民國的「第三次革命」與1949年的真正的第三次革命相混淆。

42 鐵良，回國後他在清廷的軍事機構裏扮演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當然，他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後不久給革命黨人出了難題。但是，他最後在南京被他們擊敗。他後來流亡日本，在那兒一直考慮復清的辦法。

「新軍」軍官時起了關鍵作用，隨後從 1911 年春季開始在雲南，他另外還接受了 37 旅的指揮權。這是一支裝配精良、訓練有素而且由昆明地區的反滿秘密組織暗地控制的大部隊。而且從那時起他與一個同輩的雲南軍官建立了聯繫並發展成戰友情。這個人在他日後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蔡松坡還很快地把他的妹妹娶為二太太，他就是唐繼堯。1911 年 10 月 30 日，即武昌起義勝利整整二十天後，蔡松坡在唐繼堯及一大批數月或數年來秘密從事共和革命事業軍官的支持下，帶領 37 旅攻取了昆明城，並在那兒宣佈廢黜滿清，被選為雲南軍政府的都督。在 1913 年夏天「二次革命」爆發時，他還佔據着這個位置。雖然袁世凱的反共和的舉動讓他蔑視，但他自認為沒有必要參與其中。

袁世凱最終不可能信任一位像蔡松坡那樣有天賦、才華橫溢的年輕指揮官。因此，他在平息了「二次革命」後，就趕忙給他派來唐繼堯在昆明作他的接班人，同時讓他上北京，意在一方面通過讓他擔任純屬名譽性的官職把他打入「冷宮」，另一方面把他嚴密地監視起來。蔡松坡判定沒有二路可走，為了保全性命，只得與袁世凱玩起歸順的喜劇，同時為了挽救國家，也只得假裝放蕩不羈。當他獲悉這位心狠手辣的「保護者」已決定復辟帝制時，就着手策劃反對他，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在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顯然只有這樣才能讓全國人民趕走袁世凱。他因此在暗裏緊密地聯繫其尊敬的老師梁啟超⁴³以及戰友唐繼堯和他幾位摯友。在一位交際花的幫助下，1915 年 11 月中下旬的一個清晨，當一切安排準備就緒，他付之行動並成功地逃離了北京。

在去了一趟東京尋找幾位同志後，他與他們同時踏上了回國的旅程。1915 年 11 月 19 日他到達昆明，在不到八天時間，他與唐繼堯、李烈鈞同時發起全國性的反袁起義。

43 在 1913 年夏季的「二次革命」前後，梁啟超同意充當袁世凱的裝點門面人物。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對他抱有的不過是幻想，結果在 1915 年初他與袁世凱決裂。

自 1915 年 12 月底至 1916 年 3 月中旬，蔡松坡發動的反袁起義在南方如火如荼地開展着。然而，袁世凱在這個差不多十二週的過程中，自信最終能不費太大力氣平息它。直到 1916 年 3 月 25 日，他的一位親信，名叫魯塞亭的廣西頭號人物起來反叛他，他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他於 1916 年 3 月 22 日宣佈放棄皇位，以求形勢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他做出如此決定已經太遲了。當時中國人願意看到他既去掉皇位，又丟掉權力。1916 年 3 月中旬至 5 月底之間，袁世凱仍然可以依靠的力量與蔡松坡仍為其統領的最堅定、最受擁戴的部隊之間的鬥爭繼續進行，而且愈演愈烈。其中鬥爭進行得最激烈的一個省份無疑是湖南省，在那兒，因為這場革命幾乎到處受到廣大民眾的有力支持，從 1916 年 4 月中開始，由程潛指揮的護國軍不費吹灰之力重新開回北部，趕跑了民國總統的最後一名僱傭軍。

共和派起義軍與忠於袁世凱的追隨者之間在中國西部、中部以及在湖南省境內展開全面戰鬥，我首先無非是個離得很遠的旁觀者，因為我仍然處在寶慶五縣中學兩百個寄宿生這麼一個消息閉塞卻熱情洋溢的小世界裏。但有一個小事件令我覺醒：湯薌銘及其同黨，從他委託維持我們城市秩序的那些人開始，自 1916 年 1 月，判定總體形勢非常嚴峻，要求必須對那些發放顛覆性傳單的地方尤其提高警惕。1915 年僅僅過去半個月，一個瘦高的男子手裏提着兩個裏面裝滿供出售的印刷品與書的籃子，來到了我們學校。在他的收藏中我發現有幾份我從未聽人說過但乍看起來似乎非常有趣的雜誌：《甲寅雜誌》⁴⁴。我隨即就全部買了下來。

44 從 1864 年開始新週期的天干地支（60 年為週期）紀年法中的甲寅年指 1914 年，正如辛亥年指 1911 年。在其創辦者章士釗（筆名張秋同）的思想裏，1914 年對於全部的共和派人士來說應該是復興年。正與 1913 年即癸丑年形成對照，這一年是解散年。實際上，章士釗把《甲寅雜誌》看作是所有黨派、團體、組織以及無派別人士決心推翻袁世凱的統一戰線的機關報。《甲寅雜誌》於 1914 年春在東京創刊，後在袁世凱的要求下於 1915 年夏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本雜誌在日本編輯與印刷，很難到達中國，即使在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難以見到。因此，彭述之在本雜誌停刊後數月才在寶慶看到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雜誌已是過期，登載的事件已不再是新聞，但我還是從頭到尾熱情高漲地一本本讀個遍。《甲寅雜誌》是1914年5月由愛國知識分子章士釗（Zhang Shizhao）、張秋同（Zhang Qiutong）在日本創辦的，它其實是一份反袁統一戰線實際的機關報，刊物一直發行到1915年盛夏，即日本人勒令其停刊為止；裏面不僅有創辦者撰寫的文章，還有作家或像李大釗、陳獨秀這些宣傳家的文章。這些文章所表達的思想比起我自己曾經想過但未能表達的要深邃得多，而且，文章也促使我們繼續思考。我剛品嚐完這些「瓊漿玉液」，便又去要求購買。人們告訴我這個賣書小販一般在城市的哪個區域哪個地點賣雜誌與小冊子。我盡快地飛奔而去，心裏怦怦直跳，希望能買到《甲寅雜誌》的其他各期。唉，已經沒有了！再也沒有了。同時，與我的那位賣主相鄰的我不太熟的一位商人悄悄地快速告訴我他剛剛被逮捕了。

由程潛率領的護國軍分隊試圖從南面及西南面威脅寶慶解放湖南，袁世凱豢養的幾個連僱傭軍在1916年4月的最後幾天被緊急派往本市防衛。他們把我們從房裏趕走以便充當其營房。我們這些不知所措的學生與老師們只得逃難到一個距我們大約三十里的地方。此地以風景優美著稱：東湖之畔，雄偉的夏山（mont Xia）腳下，那兒仍然聳立着東湖書院幾乎保持原始風貌的房間的牆壁與屋頂。當然，這個地點吸引着我們。這裏就是隆中鎮魏氏家族著名代表人物魏光濤選中並建造一處自己安度晚年的住所，便不足為奇了。

這一年，我有一位來自隆中鎮的姓魏的同學。他小時候有一位姓陶（Tiao）的老師，現在被任命為魏光濤孫子的家庭教師。一天，這個小夥子對我說他得去向這位老師那兒交作業，並問我是否希望同去。我被好奇心所驅使，趕快回答他說可以。在我看來，這位老師顯得很虛弱。他不滿足於讓我們羨慕他君臨其上的這個坐落在樓上的大教室，並把我介紹給了這座屋子的主人。儘管魏光濤至少有八十歲，長鬚花白，但他

的身體極為出色。我驚奇於長年的軍旅及宦海生涯絲毫未在他臉上留下更深的印記。但是，他尤其打動我的是他的樸實。他在接待我們並在其客廳給我們上茶時所表現出的謙遜，以及在詢問關於我們學校以及關於我們自己的各種問題時溢於言表的興趣。

除了與魏光濤的臨時見面外，在我居留東湖邊上的近一個月時間裏幾乎甚麼也沒有發生。對於我、同學們以及老師們來說，住在這個風景迷人但與世隔絕的地方，興趣非常有限。1916年5月底，袁世凱的僱傭軍一撤離，我們都非常高興地全部返回寶慶。我們剛剛重新復校，就像所有其他愛國者一樣，夾道向剛剛解放本城的士兵們致敬。作為非常年輕統帥的程潛，神氣十足地坐在馬上，向我們的歡呼致以軍禮。他只需要幾天時間就能打到長沙去，趕跑湯薌銘，把湖南的領導權重新交回到譚延闓的手中⁴⁵。

袁世凱幾乎被他自己陣營裏的所有將軍拋棄，軍事上又被護國軍將領打敗，政治上又被其復辟帝制的計劃失敗搞得身敗名裂，結果在1916年6月6日他因惱怒而死。但是，他的不光彩的死並沒有妨礙共和擊敗帝制、人民擊敗暴君的鑼鼓聲繼續敲響。鑼鼓聲反而響徹整個夏季，即直至共和與國家完全恢復為止。但不幸的是，鑼鼓聲為袁世凱敲響喪鐘後，最後也為蔡松坡敲響了喪鐘。

從他很小的時候開始，身體虛弱多病便是這位「第三次革命」頭號英雄的異乎尋常的天賦與早熟這枚紀念章的另一面。在他表示要發動忠於共和理想的大規模起義時，蔡松坡即已重病在身。僅僅憑其精神的力量他才堅持到六個月後的反袁鬥爭取得勝利。一旦共和體制重新恢復，

45 程潛，同盟會湖南籍會員，1916年僅三十四歲。正像蔡松坡及許多同時代的其他共和派的積極追隨者那樣，他是日本專門招收非日本學生的最好軍校的學生。他在雙十（1911年秋季）革命與「二次革命」（1913年夏季）中在戰場上多次證明了自己的勇氣與能力。在光復湖南後，他似乎必然會成為省都督。但長沙大多數社會名流不情願他來執政，而要譚延闓。

他被任命為四川省總督。但是，此後他的健康進一步惡化，已無法行使職責，他緊急前往日本尋求治療。但已無力回天！1916年年底，他回國，只為在上海咽入最後一口氣。他的老師加朋友，成名已久的梁啟超在這座城市為他建了永久紀念他的一座富麗堂皇的廟宇，這是1920年底我去那兒靜心沉思時，他在我的雙眼注視下親自告訴我的。

正像我於1914年7月後的兩年間，在長沙盡看到黑暗面那樣；在1916年7月後的兩年間，我在寶慶盡看到光明面。袁世凱這個我在中國最厭惡的人已經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對我以及所有的愛國者來說，自1913年春季以來的長期的噩夢已煙消雲散了。最後，我取得了「高中」畢業文憑，圓滿完成了十二年的學習（8年小學，4年中學），並且，它代表着我已獲得了進入大學的鑰匙。從此以後，我的內心是如何充滿着無限的希望的呢？來年我要去武漢，或者最好是去北京繼續我的學業，讓我吸收全部知識的養分；這些知識改變了世界，因為它們改變了人類，而且正是因為它們改變了人類才改變了世界。

山中隱士

但是，我剛回到銅鑼村就感到洩氣。不管是去北京還是去武漢，高等教育比起中學要花費多得多的錢。而且我的父親直接向我道明他無力供我上大學。於是我再一次滯留在我的村莊，就像一隻老鼠掉進了井裏。誰將會給我投下繩索，沒有了它的拯救我將不知如何逃跑？這便是問題的所在。我還自我叩問多日，突然有一天我的一個表兄弟，即瑞姑的一位兄弟，問我是否可以跟他一起去湘西開辦一個小型的採礦公司。其實這個小夥子不知通過甚麼管道已積蓄了一些錢。他急於要把這筆錢投資在一處錒礦礦藏的開採上；近年來一部份湖南人（大部份是新化縣人）因此而成為暴發戶。然而關於錒礦以及去其最可能蘊藏的地方尋礦需要採用的方法我幾乎是一無所知。但是，既然我的表兄弟顯然對此也跟我

一樣生疏，我就無所顧忌地一把抓住這個未曾料到的機會。這難道不是他主動把我從銅鑼村的令人窒息的環境中拯救出來的一個機會嗎？

因此，1916年7月底的一個清晨，小羅與我背上了包袱，朝新化、溆浦兩縣沅江中游的交界出發。離銅鑼村只有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山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山頂就像掛在了我們的頭上，比蒼穹還要高，而且至少要化費一整天時間經過艱苦攀登才能跨越。跨越了這個艱難困苦之後，我們又上路了；近一週後我們才把隆中地區拋在後頭，來到了河邊上的一個小鎮。在那兒已有兩位稀有礦產勘探者剛剛創立了一個微型礦業公司，他們顯然都比我們有經驗。一位擔任企業主，另一位擔任其秘書。我們去拜訪了他們，並直截了當地給他們說了我們旅行的目的。他們沒有把我們看作其競爭對手而予以回絕或讓我們碰壁。他們急忙幫助我們，他們的狀況並不完全像我們這樣，他們已進入開礦階段：他們在家裏接待了我們，並給我們提供膳宿，但無論如何不讓我們付錢。但是，我與表兄弟的資訊太不靈通，加上我們太無能，結果在這個小鎮的大約半個月的時間裏，在其四周的勘探中，我們一次也沒找到是錒礦的蛛絲馬跡。如果在河邊上我有所發現的話，那是某個最沒有料到的一類東西。我的主人的書房藏書雖然非常有限，但其中有一本我從未讀過的書，《西廂記》，這是元朝的一個著名的劇本，是中國最感人的愛情詩篇之一。我便一頭扎了進去，它使我心蕩神馳。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讀，最後幾乎可以背誦。

在這次大約一個月的逃避之後，住在父親的屋簷下，瑞姑的身旁，在我比以前更加難以忍受。我只有一个想法，在我的前面只有這樣一種前景，我因絕望而縮成一團……唉，好吧！既然我沒有其他任何辦法與命運決裂，那我就去當隱士吧，這是以前中國持不同見解的文人的美好傳統。

盤踞在離銅鑼村不遠的望雲山某一處的山坳裏有我早就知道的一座

被廢棄的廟。雖然其高度大約有一千五百米，但我只需要三十分鐘即可達到。在廟宇中間的沒有遮蓋的平地上，在一叢極其茂密的竹林的不遠處，四邊有三邊被既直又高的古松林包圍着。它有兩個庭院。第一進的那座最大的建築物是由一間相通的房間組成的，其中最令人賞心悅目的房間是前面的那些，它們面臨的是無限的、令人眩暈的群山，似乎是非人間的景象。這座規模與外觀均不起眼的寺廟位於第二個庭院的中央。但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再也聽不到一句唸經的聲音了。幾十年甚至是幾個世紀中相繼而來的僧人們現在都再見不到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因為此地道路崎嶇，生活艱難離開了。非常偶然地，在房子裏還住着一位窮人，其任務是看管寺廟，其口糧由銅鑼村供給，只有一份非常有限的未碾過的稻穀。他是一個可憐的瘸子，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只得不斷地編草鞋賣。我去找到了這個人並要求他讓我住在第一個庭院的那座最大建築的一個房間裏，並且非常願意以每天做一頓極其簡單的飯菜來做報答。既驚訝又滿足，他同意了。我回到了家，整理行囊。我把剛剛做出的決定告訴了母親，就上山了。現在我就住在高山上；就在那兒呆下去，我的整個身心不屬於其他任何人，只屬於我自己了。

我試圖要理解生活，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世界的命運連在一起。我查閱歷史書，我不斷地寫，既無次序也無克制。我寫的尤其是詩，這些解除我焦慮重負並使我從非常荒唐的想法裏解脫出來的詩歌。無限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和平的角落。這種寂靜人們說是由於埋葬在寺廟牆角的所有的那些僧人而加重了。雖然這些僧人的墳墓被長得很高的草淹沒，但它們都被上面建有小牆的土堆標示出來。除了這位看護人與我外，常來這個地方的有數幾個人是我的弟弟道之，我的最小的妹妹，他每週兩次給我送來母親燒的菜肴（她總是擔心我的健康），還會有幾個村中小孩，他們在村中會合後來到我們叢林的邊上。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過去。我也就不再計算何年何月了。

所有人都相信我瘋了：不僅有我的親屬，還有村裏人。因為這些人都很迷信，他們就想像那些鬼，那些埋在寺廟牆腳的遊魂們，使我中了魔法了。但這算得了甚麼呢！我對死人活人都已置之度外了。

時間到了 1916 年 10 月份的最後幾天。森林的色彩越來越暗淡了。雲被急風所吹颳，在天空迅速地飄過。山間小道被一層摻雜着落葉的枯草所覆蓋。冬天露出了其真面目。在院子裏我的窗底下，一台轎子停在那兒。一位四十餘歲的男士走了出來。他來見我並直呼我的名字。他叫陳潭言，羅雲慶的朋友。羅氏是隆中地區二區人，一名開明紳士，我與他於 1912 年底在長沙認識，當時他相信能投資半機械化地生產長統襪和鞋子。這次來訪令我驚訝，因為我相信這個世界沒有人，即便是我的朋友們，會對我的命運感興趣。

陳潭言馬上告訴我說羅雲慶已被任命為隆中地區的「團長」（即首腦），因此，他能做出決定把這個區的「義學」轉變為現代的小學。然而，即使他能成功地找到一位姓張的人擔任本校校長，並說服陳潭言擔任語文教師，他還缺少數學、物理、化學與自然科學的老師，而這個老師顯然是必需的。他認為我可以，而且我應該成為這個老師，是我，年輕的彭述之。

這個建議讓我困惑。像羅雲慶、陳潭言這些長我二十年的令人尊敬、出類拔萃的現代主義者向我提出的建議，讓我非常高興。然而，這個建議顯然不是把我送上赴武漢、北京之路，而是把這條路給截斷。我真是悲喜交集。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考慮後，我給陳潭言一個肯定的答覆，而讓我決定下來的是我想他剛剛給我提供的機會可以讓我遠離自己村莊，而這是未曾預料到的。但是，隆中鎮的第二區與第三區相鄰。但我難道不認為它不是第三區已是大幸嗎？無疑，換了一個區對我就是換了一個世界，我也將有所改變。

陳潭言的使命完成後，就撇下我走了。半個月後，嚴寒又迫使我回

到父親的房子裏。與我的家人過完 1917 年的新年後，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離銅鑼村二十里開外的隆中鎮二區高小就任教師職位。

隆中鎮的開明紳士們

隆中鎮的第二區聚集了二十餘個村莊，人口大約有一萬五千。作為鎮府所在地的那個小鎮的周圍建有許多寺廟，均以富麗堂皇而聞名。但在這些寺廟中最漂亮的一座無可爭辯地是大家稱作「五十四」的那座，其原因我不得而知。其內部裝潢精美，因為擺滿了十幾座用燒土製作、油漆保持完好的佛像，從外面來看，又受到大家的仰慕；因為它坐落於一座山頂的岩石上，四周有一條可愛的小溪環繞，而且幾乎全部被一片高大的松樹林覆蓋着。唉！就在這座山上的腳下，在這塊從前是「五十四」附屬寺廟的大塊平地上，矗立着兩幢堅固而舒適的西式建築物的外牆。我羨慕其巨大的窗戶均配有玻璃；牆壁是隆中鎮的四所「義學」中最現代化的。一句話，我仰慕於 1917、1918、1919 年在其範圍之內度過最光明的日子並首次把我列入教師這個職業訓練的圍牆。

我們有一百餘位學生，分散在八個班級，兩級初等教育共六年（第一級四年，第二級兩年）的六個年級，以及其水準已相當於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的「高級課程」的兩個年級。他們大多數年齡在八至十八歲之間，其中有少部份，即那些我們將之稱為我們的一系列初習學生，有接近或超過二十歲。羅雲慶不是我們的校長，卻在學校的事務管理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他要求他的一位老朋友擔任校長一職。他姓張，來自邵陽縣東部，其思想及行為的絕對現代化絲毫不妨礙他以很大的熱情去閱讀與填寫優美的古體詩詞。這位張校長，像羅雲慶那樣，用一部份時間給我們的學生上課，陳潭言一直教他們語文，而我是最年輕的，就孜孜不倦地給他們講授數學、自然科學，有時還有文學史的基礎知識。我們全部就是四位教師。值得注意的是，統領我們教師的協約照樣適用於師生之

間的關係、即使我愉快、理解與融洽的協約。從物質上來說，我受到百般照顧。我的每年的薪金一百銀洋並不可觀。但是，如果考慮到我享有的以下巨大優待，我就不能說他們是極其慷慨大方：免費三餐，飯菜均極其豐富多樣；住宿、漿洗、照明免費；暑假、新年來回銅鑼村的轎子免費。

隆中鎮第二區的高小當然並不是偶然創辦的。其創立是一場長期的極其艱苦的鬥爭的結果，鬥爭的雙方一方是隆中鎮的羅雲慶為代表的具有進步傾向的一批紳士，另一方是著名的魏氏家族的那些反動、腐敗的顯貴們。他們不滿足於設法成為他們自己所在的第一區的差不多唯一的主人，他們還要在第二區施展其決定性的影響，除了獲得市場的主宰地位後，還要獲得在整個鎮的行政權，因為他們掌管着行政區域的政府所在地，就不惜任何代價反對妨礙其小小的，對其「既得權力」進行重新審議，尤其是剝奪其財政來源的一次對公共教育體系進行的改革。

羅雲慶及其友人們早在清朝覆滅前就已發起此役。他們相信學校的問題是拯救中國的關鍵問題。此後被他們發動得如此成功、結果他們毫不懼怕直上武漢在兩湖副都督面前告狀，矛頭直指魏氏家族的頭目們的傀儡，此人在當時稱作龍輝的隆中衙門內擔任教育負責人一職。民國一宣佈成立，他們就急忙對魏氏家族的頭目們列舉許多罪證。但是，魏氏家族的頭目們借「二次革命」被鎮壓後反革命的惡勢力復辟之機來重振旗鼓。只是到了袁世凱死後的夏末，在隆中鎮的四個區裏，現代主義者才最終讓他們在教育戰線上的愚昧的對手俯首稱臣。魏氏家族的頭目們不得不讓位於羅雲慶，讓他當上第二區的「團長」，這件事本身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我與我的同鄉匡、陳共同發動的反對彭氏家族的無賴，意在達到根據 20 世紀的要求來復興第三區的「義學」的成敗，不禁使人想起羅雲慶及其友人為了重辦第二區的「義學」並使它重新煥發生機而發動的針對

魏氏家族的無賴們的戰役。當然本次戰役在激烈程度，尤其在持續時間上都比上次短，原因很簡單，即彭氏家族的這些無賴比起魏氏家族的，力量要弱得多。若要打個比方，他們是小弟弟。但他們的愛國是一樣的。這也是羅雲慶及其友人要把我招聘去的原因之一。雖然這些人都處於盛年，說他們不再年輕。因此，他們不能不考慮找幾位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不管是目前或是等勝利到來後，都必須由他們來工作以鞏固勝利果實。事實上他們代表甚麼呢？他們代表着一個上升的階級：第三等級，在一個已誕生了數個世紀的行將就木的官僚體制中，四面出擊，拚命地攫取權力。

我的學生很喜歡我，我也很好地給予回報。我認為給他們上課是不夠的，還必須在下課時傾聽他們的意見，並對他們的所有問題給予答覆，對此我並不在意時間。總之，我並不局限於在上課時間給他們上課，我在帶着他們散步時同樣給他們上課。我還有責任教會他們用自己的雙眼隨時隨地觀察現實奇觀。在他們的眼中，我既是位老師，更是個哥哥。我在他們面前表現出極大的寬容。但我從不放任他們。他們對我的尊敬就像他們對我的感情那樣都是內心自然的流露。而就我本身而言，我發現我所關注的，乃是我真正有了教育的職業。

我的生活狀況在各個方面都特別的好，教書並不妨礙我每日有不少屬於自己的時間。從此我便有充裕的時間來繼續我於1916年秋天當隱士時開始的研究，即把發現中國古代歷史及其哲學的非凡豐富性的意義作為主要的目標；尤其是從此以後我就有時間與我的三位同事進行長時間可貴的交談，由此讓我接受真正的古典詩歌散文的薰陶。

雖然跟張、陳潭言與我不同，羅雲慶從不住校，但他把心留在了這裏，經常來，很少不出席我們的文學討論與比試並充當主席。我感覺到與張一起即興寫短詩的無限快樂，他也很欣賞我，並請我給他即將請人編輯的詩集寫序。而對於陳潭言來說，他有幸出生在一個家學淵源、學

富五車的大地主家庭，因此他屬於真正的學者一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的指教我才在寫作技巧方面重新獲得快速進步。總之，1917年的上半年尚未過完，他不僅僅是我的同事，還是朋友。

羅雲慶、張、陳潭言和我四人組成的文學愛好者小核心自然吸引了一批隆中鎮第二區的紳士們，他們曾在各自的時代，即科舉取士時代，獲得過秀才或舉人頭銜。這些人如同我們一樣，大部份相信新學堂比舊學堂要優越，但是聽說我們在閱讀與寫作技巧上同他們有相同的品味，他們就來看望我們，同時邀請我們去他們家。我們就這樣度過了許多既有學究氣又消遣娛樂的夜晚，無所不談而且還即興做詩。很快地，二區高小突然就不僅是教育改良的策源地，還成為了文化生活小規模復興的中心。雖然我們這個微型的文人圈子非常活躍，但是由於深處農村所以非常閉塞。除了湖南西南地區的消息大致知道外，我們對長沙和中國其他地方的消息就知道得非常有限，而對於國外的情況則一無所知。誠然，1917年對於我們來說是平安的一年、寂靜的一年。

1918年初詩人張離開了我們，去生活在另外的天地裏，因此陳潭言便成為我校的校長。因為我是他的朋友，而且他相信我的判斷，他便邀我會談，行使他的新職位。這樣，我事實上成為我們學校的共同管理人，但是，他並不因此減免我從早到晚的日常教學工作。接着，羅雲慶同樣無意間對我們說，他認識的一個湖南人最近在安徽被任命為安慶縣縣長，已召喚他去他那邊做他的首席顧問。但是，他是帶着輕鬆的心情與我們道別的。目前二區高小充滿自信的領頭的「革新者」一位是陳潭言，一位是彭述之。此外，它已永久地處於一個政黨的保護之下，而這個政黨肯定在不斷吸收大量的既誠實又開明的顯達之士。因此，其未來就絲毫不必擔心；更不會疑心魏氏家族的頭目們會使它的行政處於癱瘓。

總之，張和羅雲慶的離去並不影響我們學校的活動，也未曾給學校帶來聲望的這個文學圈子的光芒暗淡下來。我想那是在我們聽見或者本

人自己傳言說這個文學圈子已把一批被遺忘的文人全部送入了墳墓後，一位老家在隆中鎮二區的何先生，一位過去的舉人，剛剛成為湖南西南大區域有權勢的官吏，有了一個「神奇的想法」：在二十幾個屬於他權力範圍的縣內組織一次盡量公開的美文比賽⁴⁶，一千餘位接受過文言文嚴格訓練的人參加了於1918年中期舉行的這個競賽，其中還有幾位過去的舉人。競賽的考核項目有六個：從「五經」裏抽出一個題目作一篇論文；寫一篇要大量引用司馬遷《史記》的關於中國歷史的論文；寫一首詩；填一首詞；寫一首歌；再寫一首賦⁴⁷。當然，我的朋友陳潭言參加了競賽。因為他催促我也像他一樣參加，為了不使他為難，我不敢對他說何發起的競賽程式非常陳腐，而且感覺參與進去沒甚麼希望。我告訴他如果他真的認為我能寫品質上乘的散文，他也不能肯定我能寫體面的詩歌，尤其是賦了。但他回答我說我低估了自己，並說散文是他的弱項，他願意幫助我寫賦，但願我能幫他寫有關中國歷史的論文，我最後就同意依他說的辦。因此，我們就開始撰寫，而且兩人均沒有費太大的勁就在規定的期限內寫完了六篇。幾個星期過去了，一天早上，當我們得知我是獲獎者之一，並且還得了二等獎，真是喜出望外！

我非常自豪，但是我的學生們、陳潭言以及我們的文學團體的成員顯然比我更感到驕傲。為了慶祝我的成功，整個學校均喜氣洋洋，連續放鞭炮。一片歡騰的景象！為了喜上加喜我決定用全部的獎金（三十餘捆銅錢，合二十餘銀元）來大擺宴席。我不僅邀請了遠近熟悉的成年人，還把我的學生們也邀了來。無庸置疑，在這個如此閉塞的隆中鎮，關於

46 湖南在1918年被分為三、四個大區，每個大區管轄十五至二十個縣。大區的長官相當於副省長，頭銜為「鎮守」，而這位組織湖南西南大區美文比賽的何先生正是這個大區的「鎮守」的首席顧問。

47 詩：最古老文體，是用來唱的，雖然詩人並不知曉其曲調；唐宋時其優美程度達到頂峰。詞：很講究韻律，抒情，興起於唐代，直至宋代才輝煌；它也是用於唱的，詞人知道所根據的曲調。歌：即歌曲，最自由，最普及。賦，即哀歌，不是用歌唱而是用於朗誦的；最有學究氣，被人研究得最多，也最古老，因為它在漢朝時就已達到盡善盡美。

勤勉生活中的我這一有利又未曾料到的插曲，馬上就給我帶來了名聲。

暑假與新年定期地把我帶回到銅鑼村。我很少在那兒長久停留。每次都是我想甚麼時候走就甚麼時候走，理由或者是為了外出蹣跚，或者是為了去拜訪我的一個舅舅，一個姨媽。我的外婆田氏，或者最好是去看一個朋友。當然，如果是去會朋友，我很少有兩天之內就回去的。就這樣，我又見到了老朋友劉祖發，現在他是田家旺一所學校的老師，一年中大部份時間在這兒過。他見到我非常高興，整個夜晚，一邊讓我喝着好酒，一邊給我看他最近寫的詩。在我的朋友中跟我有着相似憂慮的，卻是那位頑強的歐陽秋撲。這位比我大三、四歲的小夥子既有智慧又寬容大度。他是隆中地區一區的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他家的那引以為自豪的房子就坐落在隆中鎮的中心，隆中地區行政大樓旁邊。清朝覆滅不久，即 1912 年初，歐陽秋撲當時十九、二十來歲，就赴長沙準備入中學讀書。但他並不是一個人前往。他與他的妻子一同前往，他已安排她進入一所青年女子學校，以便她能學會讀與寫。而這個大膽的舉動已足以讓他也出名。我認識他是在 1912 年年底，這個時候我剛剛來到湖南省的省會。我們幾乎馬上就能充份理解對方；後來我們就常來往。當歐陽秋撲回到隆中而不是去武漢或北京讀大學時，我還在寶慶。他一回來就馬上在一座他自己的房子裏開辦了一所非常罕有的學校，一所不收費的私立學校，他同時是這所學校的唯一投資者與唯一教師。1912 年他學校裏有大約百位學生，大部份是他自己佃農的孩子。他還為他們提供毛筆、墨、鉛筆、筆記本和書，但不收一分錢。我每次去他家他總是留我住兩三天：兩三天當中我們感到從未有過的自由，談我們共同的夢想，譴責嚴密包圍着我們的黑暗，非常幼稚地要重建世界，最後不禁為我們有點烏托邦的想法而爆發出陣陣笑聲。

「五四」的號角吹響

任何漩渦都不能給隆中鎮二區的我也算其中一位的開明小紳士團體這塘平靜的水面帶來波浪。我也似乎處在麻木不仁的狀態中。而且直至1918年年底情況還沒有改變。然而，就在此時，這種中了魔法的狀況突然中斷。一片奇特的叫嚷聲自遠處而來，打破了我的「欣悅範圍」嬌嫩的寂靜。甚麼樣的叫嚷聲？這些叫嚷聲充滿着羅雲慶定時給我們從安徽寄來的小包裹報紙，這些報紙，雖然與事件發生已相隔一兩個月，但讓我重新建立了已三十個月未與外界建立的聯繫。這些報紙是長江下游地區最流行的日報。它們是《時報》或《申報》。每次這些報紙寄到時，我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些報紙透露給我的內容多次讓我陷入驚奇的深淵。例如，正是這些報紙讓我驚訝地獲知某件我完全未知的事情；知道了自從1918年4月以來，直隸軍閥吳佩孚已插手我們省即湖南的事務，我已從我們當地的報刊裏看出了一切激烈的政治、軍事衝突正在湖南的掌權者之間進行着；但是並不知道其意義。這些上海的報紙不但具有讓我們把省或地方一級的新聞放在全國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的優點；而且還具有讓我自從1914年夏天離開長沙後首次近距離重新跟蹤世界大事。俄國革命的輪廓因此也漸漸地突出濃霧，變得清晰起來。

為了從共和派那裏奪取政權，然後再維護這些權力，作為這些軍人總頭目的袁世凱從1913年至1915年給自己陣營即北洋政府內的將領們督軍頭銜，後又把他們任命為幾乎每個中國省份的首腦。但經驗很快地讓他知道自己相信他們的忠心是錯了。他們的大部份只是爭取在各自省份地盤內建立半獨立或完全獨立的王國。而且他們的大部份最後均支持1915年12月由蔡松坡、唐繼堯、李烈鈞發動的反帝制大起義。

那麼，段祺瑞，這位在袁世凱死後裝扮成中國新主子的人又代表甚麼呢？他只是眾多軍閥中的一派，即安福派。其實在1917年夏至1918

年春，在孫中山周圍聚集了一批西南及南部小軍閥，他們並不懼怕與段祺瑞作戰；段祺瑞僅在中國的東北，大致由張作霖為首的奉天軍閥勢力範圍內行使名義上的政權；而執掌長江口、中原省份甚至河北的直隸軍閥頭目馮國璋、曹錕、吳佩孚不斷地與他鬧矛盾。藉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與以孫中山為精神領袖的南方革命軍的衝突之機，吳佩孚於 1918 年春攫取了湖南省。他的一名親信在這裏一直統治到 1920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在中國各個勢力範圍內的每個軍閥集團都是一個非常確定的外國勢力的被保護人：例如：安福、奉天軍閥後台是日本人；而直隸軍閥倚靠着英、美。

然而，我能看到的報刊對 1917 年 10 月的彼得格勒起義的描寫過於簡單、非常混亂，而且還帶有偏見。因此，我無法欣賞到其重要性。對歷史上共產主義革命的英雄們，報刊只把他們簡單稱作「過激派」。關於俄國的內戰以及外國勢力的干涉這些新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即 1919 年初開始，中國大報的讀者均能接觸到。然而，雖然這些消息非常珍貴、相對豐富，它們對於我看清布爾什維克與蘇聯卻沒有任何作用。在這方面，我獲得的唯一確定觀念是，正像 1911 年辛亥革命讓中國擺脫了皇帝的獨裁統治，1917 年十月革命也使俄國從沙皇的專制主義裏解放出來。

由在大部份的大城市裏，站在思想、文化和語言的前沿，並已獲得無法抗拒力量的新式知識分子發動的反傳統運動，我所賴以獲取資訊的那些高品質的報紙顯然在提防自己過多渲染這個運動。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前夜，關於這次運動我只有模糊的印象。相反，我身邊的這些報紙密切地跟蹤 1919 年 1 月 18 日在法國召開的「和會」，因此，我對於大戰後凡爾賽條約談判的背景情況有比較充份的了解。當我們從報中獲知我們的歐美盟友不願他們自己標榜的高尚原則而執意出賣我們，即他們確定日本將成為德國於 1897 至 1914 年間在山東攫取的具有殖民地性質的

特權與其他好處的合法繼承國時，我內心的憤怒並不比我大多數的國人少。這個抗議的愛國風暴從 1919 年 5 月 4 日開始在北平興起，不久就席捲所有的中國城市，直至 1919 年 6 月底。但是，隆中地區的極其平靜的河岸並未受到衝擊。然而，這個波濤是如此的洶湧澎湃，其怒吼的若干回音終於傳到了我的耳中。即使像《上海日報》這樣謹慎、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報紙，當 1919 年 6 月 11 日最具威望的五四運動⁴⁸的發動者陳獨秀在給市民發放傳單時被捕，也禁不住要站到反對政府的那一邊。

此次愛國運動大爆發的原動力是學生、教師等新式知識分子。他們從 1917 年初開始，就已高高舉起「新文化」「新思想」「科學」「民主」的大旗，反對所有中國傳統價值，以這些知識分子為中心的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兩極，一直是上文已多次提到的陳獨秀主編的刊物《新青年》，以及經新校長蔡元培於 1917 年初徹底重組的北京大學。此兩極一直是相當獨立的，不過，後來兩極終於聯結在一起了，因為最早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的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而陳獨秀為了離開上海赴北平就職，又不得不把《新青年》編輯部隨他本人搬遷至北平。

如果說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後不久，蔡元培、陳獨秀並未成為段祺瑞特別注意的對象；那會讓人覺得奇怪的：蔡元培，因為同情當天被警察逮捕的三十二位學生，受到段祺瑞打手們的嚴厲監視，只得辭去北大校

48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平，三千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合，然後喊着反對日本、反對西方列強、反對段祺瑞政府中最臭名昭著的親日賣國分子的口號向使館區進發。使館區為了不讓人穿越而戒備森嚴，他們就排成縱隊繼續在市中心大街高喊着憤怒的口號，獲得市民的歡呼。他們中的一部份人闖入郵政與運輸部長曹汝霖的住宅，他曾在 1915 年 5 月 25 日的山東喪權辱國的條約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們並未抓住其本人，而是抓住了其同謀者張宗祥，北洋政府的駐日本大使，痛打了他一頓，並在離開前一把火燒了住宅。當天夜晚，就在遊行剛剛結束的時候，警察逮捕了三十二位參與其事的年輕人。但是，這次運動遠未結束，在隨後不久經過組織重又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雖然段祺瑞採取了越來越嚴厲的措施進行鎮壓，但是它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各種形式繼續進行着。同時，本次運動還席捲了北平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城市。1919 年 6 月 12 日，上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把此次運動推向了最高潮。

長職務，秘密地於 1919 年 5 月 9 日離開北平，陳獨秀，因進行「顛覆」國家的宣傳而「有罪」，一個月後在北平被維護社會「秩序」的安福軍閥投入監獄。

1919 年 5、6 月間爆發的大規模愛國運動的產生的第一個影響是迫使段祺瑞於 1919 年 6 月 10 日解除了以曹汝霖為首的賣國投日的大臣的職務，第二個影響是通過數千封發自中國各個角落的電報以及在巴黎的中國學生、工人強有力的示威活動來說服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不顧北京政府的指令而拒絕於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而且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本次大規模的愛國運動，美國於 1922 年並未花費多大力氣即迫使日本撤離山東。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運動，如果沒有 1917 至 1918 年反孔反蒙昧主義的文化思想運動的推波助瀾，顯然不會成為後來的那個狀況。相反地，第二場運動從 1920 年初至 1930 年底，如果它沒有第一次運動強有力地推動，也就不會像現在那麼成功。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這兩次運動在歷史場景面前的同樣社會團體一步步地推動下，實際上它們互相之間聯繫非常密切，以至於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們其實是合二為一了。從此，兩次運動很自然地被冠以同樣的稱呼，即用兩個中更為轟動的那一個即「五四運動」。

1919 年 7 月中旬，當我被這些時事弄得半開竅時，我準備赴銅鑼村度暑假。然而，我已強烈感到在我內心升起了一股無法抗拒的欲望，即盡快離開這個鍍金的籠子，展翅飛翔，到那些有着更強烈人類之海波動的地方去。政治折磨着我，但政治重又吸引着我，因此我做出了決定。我保證在隆中地區二區高小一直教到 1919 年底，因為我已擔保過。然而，這個諾言一旦實踐，我將馬上離開；我將經長沙、武漢前往北平。三年來我把工資的主要部份存了起來，難道我會沒有最終實現此次旅行的資金嗎？

我回到銅鑼村僅僅幾天後，即 1919 年 7 月底，當我像平時那樣正在我父親屋子裏的那個書房兼作我的臥室、工作間裏看書的時候，有人告知有一位來訪者。誰會來看我呢？兩個姓彭的年輕人，他們來自隆中鎮三區一個全部是彭姓的村莊，比我小兩三歲，剛剛從他們求學的長沙回來。其中一位是我的堂弟，還是設在湖南省省會的邵陽縣子弟中學的學生，六、七年之前我也在那所學校裏上過學。另一位叫彭仲者，他此時已是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有幸生活在愛國運動的日日夜夜裏。長沙不會不對北平的五四運動強大的號角聲做出反應。而且他內心不無驕傲與激情地向我陳述了有關情況，把我的整個身心均帶到了這個「新思想」裏面。對此他們當然已完全明瞭，而我卻幾乎茫然不知，北大就是「新思想」的大腦中樞，蔡元培⁴⁹對此進行改革等等這些資訊，對我乃是真正的啟示錄。他在向我講這些時激動得全身顫動，但是，作為剛從「戰場」上歸來的英雄，他畢竟不滿足於把他的激情傳輸給我。他還在我們眼前令我有點驚訝地打開了一個相當大的包：整包都是關於廣義上的五四運動的書刊。而且他還慷慨地把它們都贈送給了我。多麼意外的禮物，在這個顯然離任何的「新思想」的策源地都沒有比它更遠、更陌生的銅鑼村！

我的兩位年輕的來訪者一離開，我就一頭扎進他們送給我的這些書刊。讀完後，我發覺居然還有這麼一種令人耳目一新、激動不已的文字，

49 蔡元培，浙江人。1919年已五十餘歲。他二十一歲中舉人，二十二歲中進士，二十四歲時翰林院的大門已向他敞開。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他決定投身於教育事業，相信唯有改革教育才能「救中國」。在1904年，他與章太炎等人發起成立光復會，1905年自然成為同盟會會員。他於1906-1911年在德國初步接觸歐洲文學與思想，後成為現代化與「西化」的極力鼓吹者。1912年初，孫中山任命他為教育部長。但在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他即赴歐洲，一戰初期，他在法國。作為一向的完全自由主義者，他在朋友李石曾、吳稚暉的影響下，逐步轉向了無政府主義。他跟以上兩人一樣幾乎成為親法派人士。他為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奠定了基礎：1918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後不久，數百名中國青年赴法留學。在他所厭惡的袁世凱死後六個月，確切地說是1916年12月26日，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在陳獨秀的協助下，他快速地把北大變成自由思想的聖殿，並使其行政制度民主化。

承載着一股思想新的洪流，其力量與寬廣在我看來就像那生活之長河。胡適和王星拱均是中國知識界復興最有名的旗手，同時也是北大的教授。我剛剛有權擁有的許多書中，第一部份是關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二部份是關於自然科學概況的。這些書在我內心激起特殊的崇敬之情。我以一位初出茅廬者的天真如飢似渴地閱讀着。但是，最讓我激動，從靈魂深處扣動我心弦的是一些《新青年》近期雜誌，以及幾乎全部的《每週評論》。事實上，這兩個雜誌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以及其他成功地把五四運動在廣度、深度上推向極致的陣地。

每期的《每週評論》的文章的信息量非常豐富，分析確切，涉及世界與中國的時事，有甚麼比這些更振奮人心的嗎？而且，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個個政治態度都非常鮮明，有誰比他們更具典範意義的嗎？雖然《每週評論》並非某個黨派的機關報或具有黨派的傾向性，但是它常常是處於我們發動的反對分裂或吞噬我們國家的兩類禍患雙重愛國戰鬥的前哨：一是帝國主義國家，二是軍閥。如果說《每週評論》⁵⁰一些作者的文章我願意再三品味，那便是陳獨秀、李大釗撰寫的。他們的文章雖短，但尖銳、有力，從骨子裏面喚醒我對中國全身心的赤誠；它們讓我的熱血沸騰。誠然，很難設想我將不會成為他的文章的最狂熱的追隨者。

我被贈予的《新青年》其中的一期是1919年5月號，這一期出版的時候，在北京恰好「五四運動」的驚雷剛剛響過。這一期幾乎全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它很吸引我，只是因為上面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說」這些術語對我完全陌生。其主要篇目是三篇由三位北京的成名已

50 《每週評論》，政治鬥爭期刊，1918年12月22日由陳獨秀、李大釗、王光祈（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周作人、以及其他幾位「新思想」運動的推動者發起創刊，名義上是《新青年》（有必要更強調文化性、理論性）的副刊。本刊總共出版了37期，最後一期為1919年8月31日。1919年9月初被段祺瑞政府查禁。1919年夏天，本刊在北京以及中國的其他地方，在報道事件的真實情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要超過《新青年》（曾中斷一段時間）。請勿將《每週評論》與《星期評論》相混淆，後者是1919年8月8日在上海由從屬於孫中山的進步知識分子創辦。

久的作者執筆：一位是谷少雄（真名谷夢裕）⁵¹一位凌霜（真名黃凌霜）⁵²還有一位當然是李大釗。我以近乎教徒般的專注來閱讀這三篇文章，因為我迫切要知道「新思想」的最新發現是如何模樣的。可惜的是，三篇文章都帶有太強烈的個人色彩，結果對我想要的答案於事無補。一篇介紹經典馬克思主義觀點，另一篇關於無政府主義、第三篇研究改良的社會主義。結果它們給我留下的總體印象是一團糟。憑甚麼要我支持這個學派而非那個學派呢？從我直覺來看，最明瞭、證據最充份的文章正是李大釗寫的。但是，歸根結蒂，該文所要表達的，據作者本人承認，總是試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決定論與某一種唯心主義的烏托邦相聯繫。這讓我不知所措，馬克思主義當然是一種非常博大精深的東西，更有甚者，我當時對此學說還只是初次涉獵。但是，即使文章僅僅透過折射鏡有點失真地向我們傳達這種學說的存在以及制度的輪廓也無不具非凡的重要性。

我很輕鬆讀下去的其他各期《新青年》幾乎沒有涉及馬克思主義。而在我看來，這些內容如果不是更加有趣的話，至少是同樣有趣。所有舊社會的禁忌與習俗，所有數百年來由孔夫子帶來的不容置疑的準則，如「在任何情況下遵從長輩與上司」「婦女（只有婦女）必須保守貞操」「對權力要表示絕對尊重」，所有這些都被攻擊、嘲弄並義無反顧地予以摧毀。這份「五四」時候的主要刊物就像一盞探照燈，用它的刺眼的光束，逐個地搜索那些最隱蔽的角落，中國人意識中最骯髒的那些東西，最終也照亮了我自己。而我，借着它解脫了一直束縛着我的鐐銬，允許或迫使我從原有基礎上提高一步，決心一直要研究下去，直至搞得明明白白。但是，李大釗、胡適、陳獨秀、王星拱等人讓我感受到的所有的

51 谷夢裕、德國通，並精研其哲學。北大教授。最後選擇了國民黨。彭述之於1926年初在北平與他結識。

52 黃凌霜，北平最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彭述之於1926年1日在莫斯科與他結識。

發現中，最令人滿意的也許首先是其著作的文體，而非其內容：那些有「新文化」旗手頭銜的所有人必須放棄文言文、轉而用白話文⁵³寫作。我用了我暑假大部份時間在自己的斗室裏探索這個發現。對我來說，文言已經結束。從此我只用白話寫作。

1919年9月份開學的時候到了。我重又出現在學生們的面前，強烈地感覺到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僅幾個月了，但是照樣想要讓他們分享這些五四運動的戰將們及其刊物剛剛帶給我的省悟與希望，迫不及待地要引導他們認識到在1919年夏天的騷動中誕生的恰好是新的中國、真正的新中國。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請他們要像我那樣地練習白話文，讓他們拿起毛筆來只寫通俗語。這個舉動馬上得到了他們全部的贊同，激發起他們的熱情，而且很快地讓他們成為了「新文化」的追隨者。唯一遭到的阻力來自我的一個同事。總之，我鼓勵我的思想最開放的那些學生——他們是我最後執教的幾個班級中最優秀的代表——盡快離開我們這個壓制思想的隆中地區，至少去對思想的充份發展更加有利的天空下生活幾年。後來，我有機會聽人講起或自己了解到，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聽從了我的話。例如，1926年和1927年，在廣州、武漢等地我不止一次地驚喜發現他們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有的黃埔軍校畢業後成為了國民革命軍的軍官。

1920年2月，我最後一次與我的家人過舊曆新年。節一過完，我就離開了銅鑼村和隆中鎮。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的朋友陳潭言決定辭去校長職務去尋找廣大的世界，還有我的兩位學生也選擇了與我踏上同一條路。我們總共四人向長沙進發。我們步行去新化，並在本城裏的幾

53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借助於一些引起陣陣騷動的文章來掀起白話文運動：一場可與文藝復興時期出現在法國的用「通俗」法語取代拉丁語成為文學、知識以及思想主要載體相比。胡適，在那場革命關頭並非是最出色的作家。但在1918年春季，《新青年》雜誌新增加了周樹人及其弟弟周作人的文章。而且，這位周樹人相繼用魯迅筆名緊接着發表了短篇小說，獲得的成就顯示現代白話文是一個與國外最成熟的「通俗」語同樣穩固而細膩的表達工具。

個朋友家裏休息了幾天後，搭上一艘小帆船向水的下游駛去。到了益陽後，我們又坐上了另一艘船，取道最終注入變化莫測的洞庭湖的河流與運河交錯的水網，經過了近三週（我們是1920年3月初出發的）的旅行，最終到達目的地長沙。此後對於我，一場尋找光明的真正的馬拉松便開始了：在十八個月中我從一個城市到了另一個城市，從一種轉變到了另一種轉變，直至去了國際共產主義的首都莫斯科。

第五章

走共產主義之路：
向湖南第一位共產黨人
賀民範學習

我本無意要在長沙長期留下來。差不多六年了，未曾見到過長沙，但在我看來，城市的面貌沒有很大變化。我打算在長沙最多逗留二十來天。但就二十來天吧，便足夠我實現政治上的重要轉變了，獲得了五四運動的思想財富，並通過自己的想像力，重溫那激動人心的歷史插曲。

長沙、武漢、桐城（Tongcheng）

我剛到長沙時，非常幸運地便重新見到了 1912-1914 年間頗有才能的同學：管武訓（Kuan Waxun）和孫良弓（Sun Lianggong）。管武訓是邵陽縣以東，方圓廣闊、人煙稠密的一個區裏的孩子，而孫良弓與我一樣，原籍是隆中鎮。

管武訓和孫良弓兩人，年齡比我稍大；1912 年秋邵陽縣有一所供本地學生求學的中學校，他們兩人都是高年級學生，恰好和我同班，我就在那裏認識了他們。最初，他們對我只不過是帶有一種優越感的同情和喜愛，這在當時說來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慣例，所謂「年長學生」對「幼小學生」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兩人當中的孫良弓，因為是小同鄉，很自然地我便感覺到更容易接近，但 1913 年春天，他不再住在長沙，而是遷往武漢，轉學到湖北省由湖南人創辦的一所中學裏去。1913 年 6 月底 7 月初，正是學年結束的時候，他必須離開武漢，返回長沙，然後再回到自己的家鄉度暑假。世上巧合的事總是有的。當時我回隆中鎮之行，彷彿是為他而保留的。這次家鄉之行，竟持續了數十天，在此過程中，我和孫良弓之間，可以促膝談心，開始時談起來還是比較小心謹慎的，後來則越談越興奮，越談越富激情。看來，我的思想與他的思想之間既沒有天壤之別，也沒有落後於他，他才開始對我重視起來了。管武訓以他為榜樣，對我的態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擺老資格了。

1913-1914 這一學年，仍然是多事之秋，學習生活等等都很緊張，雜

亂，我沒有很多時間同管、孫兩人保持密切關係，隨後不久，我與他們便失去了聯繫，當時我返回寶慶，在比較適宜的氣氛下繼續我的中學學習。而管武訓去長沙，孫良弓去武漢各自完成他們的中學學業，然後到北京去了，他們進了北京的高等師範學校，並逐漸地在周圍環境影響之下，都轉變成為新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典型代表。1919年5月和6月，在那熱火朝天的日子裏，他們兩人毫無例外地積極參加了進去。管武訓比之孫良弓來，更純樸，更自覺，更富戰鬥性，他選擇了無政府主義的道路，甚至在1919年5月初，他果敢積極地在北京行動起來，頃刻間便成了各大城市人民群眾、愛國反帝鬥爭中聲名卓著的英雄人物。

1920年3月，我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教育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回到了長沙，而那時，孫良弓和管武訓離開北京已有好幾個月了。然而，在他們頭腦中所保留的1919年5、6月間在北京所見所為的記憶，仍然是栩栩如生，精確無誤。當他們跟我敘述這段事實時，如此生動，如此確切，給我留下的印象彷彿我是「親臨其境」。管武訓和孫良弓對我談的，不僅限於「五四」時期他們所享受到的生活特權，而且還特別談到了「五四」運動正在繼續下去；特別激動人心的是，他們還告訴我，由於「五四」運動應運而生的各種出版物，這些出版物的名稱是：《星期評論》，這是1919年6月由國民黨最先進分子在上海出版的雜誌；《覺悟》是《民國日報》的增刊，同樣由孫中山的黨控制，是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晨報副刊》，像《晨報》本身一樣，是在北京出版的週刊，由梁啟超及其朋友所主持；《浙江新潮》，是由杭州的先進知識分子出版的；都是深受歡迎的雜誌等等……，此外，在經過五個月停刊之後，於1919年11月初在上海重新出版的《新青年》。當時我最迫切的心情莫過於能看到這些報刊雜誌，後來，我終於在圖書館借到了一大部份。幾天之內，我充滿着激情，讀啊讀啊，簡直是狼吞虎嚥般讀完了所有借到的報刊。當我心滿意足地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跟我那兩位同學一樣，是地地

道道的無政府主義者。

巴枯甯、克魯泡特金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先驅者寫的作品，當然，我只能讀過很少一部份譯作。但這又無妨，因為讀過的書刊已經足以堅定我的信念了。但 1920 年初，以抽象思維的形式曾經影響到我，以及「五四」一代的年青人的這種無政府主義學說，是否就是無法抗拒誘惑的唯一思潮呢？那當然不是的，也還有以托爾斯泰思想為代表的運動，還有以克魯泡特金思想為代表的「新村運動」，不過其形式是更加生動活潑，具有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

這一運動，所針對的恰好是要同時解決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是由農村社會內部有一種傾向，即要加強消滅各種形式的私有財產而引起的，看來，這不僅有可能，而且是相當迫切地要推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這一原則約在 1910 年左右在日本誕生，但不到十年時間，在日本國土上已引起了各種探索的試驗。深受這種探索的激勵而感到欣喜若狂的不僅有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而且魯迅本人後來也受到影響。很大一部份由於他們兩人的關係，從 1919 年夏開始，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流行起來。在這期間，正好爆發了「五四」運動，因而無政府主義一直風行到 1920 年盛夏。然而，在甚麼時候達到最高峰呢？大約在 1920 年初，也就是我在長沙時，通過《新青年》雜誌報道，使我發現了它，從那以後，令人驚異的是，我卻不再同它有任何聯繫了。但我不能不承認，正是得力於無政府主義，才使我對事物的看法，有了重大的而且是深感滿意的轉變。到了 1920 年 3 月，我最感興趣的事，只能是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幸與不幸的政治問題；但從 1920 年 3 月開始，我對這些國家的社會問題，不僅深感興趣，而且發展到狂熱程度。

變化是何等奇妙！很快我便對管武訓和孫良弓兩人感到特別的親切，他們真的成了我的名副其實的同志了。但與此同時，我又不能不感到，要下決心以他們兩人為榜樣，並追隨其後，用「新思想」來增添精

神食糧的源泉，要下定決心盡快地離開長沙前往北京，因此，也就不得不使我與他們兩人分手了。

我向管武訓、孫良弓告別了，向那位心情沒有我這樣迫切要離開長沙的陳潭言（Chen Tanyan）告別了，還向所有我在湖南省城長沙的朋友和熟悉的人告別了。我搭乘的火車向武漢方向駛去，而1920年初，幸好是毫無阻礙地到達了目的地。儘管在武漢，我不止只有一位同學，我卻不希望在這個城市耽擱下來，然而，自從我踏上武漢市之後，便了解到，要買到一張去北京的車票，實在是白費力氣的，原來，在我到達武漢之前，京漢鐵路因河南、河北發生了軍事叛亂和軍隊調動，列車不再為市民開動了。

無法設想的是，叛亂遠沒有結束，而是不斷地加劇，而且惡化，也無法推測，這時，1920年7月大規模內戰——即直、奉系軍閥反對安福系軍閥的鬥爭將要發生了。我決定不再折返長沙，而是留在武漢，我還堅信，京漢路恢復「客運」交通，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再說，我可以利用這次不幸遭遇，在武漢作一次較長期的參觀訪問，與此同時，還可以在我那旅館的小小陋室裏，繼續飽覽五四時期的刊物。但日子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已耐不住了，想要在武漢作一次較全面性的參觀，到底這個現代化大都市的真實面貌是怎樣的？有甚麼名副其實的大工業以及工人的勞動條件；我終於在這次參觀中，得出理論上的和哲學上的結論，這結論決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

不應忽視的是，武漢並非一個城市，而是三個城市：武昌、漢口、漢陽的三結合。扣動我心弦的，不僅是三結合城市的規模龐大，而且特別富有生命力，可以說這生命力使我具體地感覺到，武漢正在擴大，這種擴大是建立在工業的基礎上的。武漢的三個城市中，最能吸引視線的，無疑是漢陽，我不斷地在漢陽兵工廠及其巨人般的鋼鐵設備周圍，轉來轉去。說真的，以前我從未看到過這樣規模的城市，這不禁使我對自己

所剛剛掌握的理念提出反問，也就是懷疑要在我的國家裏建設「新村」這樣社會模式有甚麼價值了。即使是在鄉村裏建設人人平等的公社，如同周作人所捍衛的那種模式也已經過時了。然而，在大城市裏，在由工業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把巨臂伸向四面八方的大都市裏，要實現那種「新村」模式，豈非夢想嗎？

在事實的照亮和啟示下，我不能有別的選擇，只能轉向科學的社會主義，轉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轉向 1920 年春、中國人通常稱之為「集產主義」的主義，這就是我開始要走的路了，儘管這時我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都還是完全陌生的。

正由於我體會到的一切，也由於我能通過與再次見到的同學們的頻繁來往和多次談話之後，而這些同學中的大多數，早已在湖北高等師範學校裏完成了學業，他們懷着迫切希望，能在不日之內便可以搭上離武漢去北京的第一列火車，因此，我也只能充其量在被迫逗留武漢期內，再忍受十天到十五天。然而當第三個星期開始時，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這時，我已經了解到，再沒有理由可以期待在幾個月之內，軍方將會在京漢路上取消對客運交通的禁令。我已沒有甚麼重要的新書可讀；春天又早已到來，我必將被陷在這個城市裏，陷在旅館的小客房裏去忍受將到的「火爐」般的高溫了。到了 1920 年 4 月底，一件令人高興的事發生了；我接到一封來自妹夫的信，他是我三個姐妹中排名第二的妹妹的丈夫，而我最喜愛的妹妹也就是二妹。妹夫敦促我到他家裏作短暫的逗留，他的家在貴州東部，最靠近湖南的一個縣份，正式名稱是銅仁縣，但我們通常稱為桐城，這個縣城的小商品作坊，主要生產塗料、清漆（通稱凡立水）、天然漆（通稱蠟克）等。每年有好長幾個月都是生產這類小商品的。歷來，我沒有中斷過與家人的通信聯繫，因此，當我到達武漢後不久，便把我的小小苦惱告訴了他們。我妹夫阿孫在覆信中建議我改變一下環境，使我改變想法以便等到京漢路重新通車。我欣然接受了他

的邀請。

1920年5月中旬，當我到達桐城時，這是一個人口約有十萬的小縣城，縣城四周還圍有城牆。桐城真的是種桐樹之城，桐樹的果實可用製作清漆，桐城便因此而得名。此外，還有天然漆樹，這種漆樹分泌出來的膠質樹脂是十分珍貴的。在該地區的中部，居住有少量苗族人，他們殷勤好客。這地區特別富於優良品種的桐樹和天然漆樹，每年從4月初開始，苗族人在森林深處採集桐樹果實和漆樹的樹脂，然後出賣給成百上千的「漢族小商人」，這些漢族商人雖窮卻刻苦耐勞，他們列成長長的隊伍，肩上背着沉重的負載，把產品一直運送到桐城，最後，出售給少量富有的批發商。這些批發商，不僅要確保商品的銷售，而且還要配製大量的塗料、清漆和天然漆料，才能滿足不斷增加而從不減少的需求。他們至遲要從5月初開始工廠生產，經營商店，一直持續到10月底才結束。換言之，他們每年只能在這幾個月中在經營這項業務的。但在這五個月中，批發商們以及與他們在一起的幾十個不知勞累的夥計們，該有多少工作等待着他們去幹啊！實際上，那些採購者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湧來，採購者催着要把已經預訂好的貨物發運回去，而且，他們不訂好新貨單是決不會回去的。這些採購者有的來自長沙，有的來自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地；簡言之，來自長江流域的所有各城市；也還有來自國內其他城市，甚至有來自日本的。像這樣一個大量產銷清漆和天然漆的中心地在20世紀初期，除了湖北北部一個叫做老河口（Laohekou）以外，在國內市場上，桐城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競爭對手了。

然而，根據這些情況來看，誰是桐城本地人嗎？不。原來卻是原籍湖南、是我們隆中鎮的老鄉，他們是季節性工商業者，秋天來到時，便匆匆忙忙地來，在桐城度過一段時候，直到次年春天到來，氣候暖和了，才回到自己的家裏。我們隆中鎮老鄉中的細木工和油漆工，長期來在我國中部各省最著名的工匠中是屈指可數的。他們產品的品質很高，其中

的訣竅之一便是好幾百年以來，他們樂意使用的唯一清漆是從貴州桐城來的，這或者是他們親自去購買，或者委託其他商人前往桐城得到的。

我妹夫阿孫，當然也是原籍隆中鎮，是在桐城經營塗料、清漆和天然漆的工商業者。他過的是悠閒自在的富家生活，但從不因此妨礙了他那熱忱、隨和、慷慨大方的作風。我在妹夫家中，度過二十多天，這該是我一生幸福日子裏最幸福的二十多天了。值得一提的是，歡迎我到桐城來的不僅有我的妹夫和二妹，還有來自隆中鎮的所有老鄉，這批隆中鎮老鄉由於生產販賣塗料、清漆、天然漆的需要像我妹夫、二妹一樣，每年都要來到桐城。他們總共約有一百多人，當然包括夥計和僱工在內。就我個人來說，在那個小集體中遇到了不少熟人，他們當中有好幾位，在我童年時便在一起玩耍的。而我妹夫的表弟以及妹夫的妹夫，卻是我留在桐城時關係最密切的兩人。儘管論身份，他們是批發商人，但比較有知識，最愛好的是文學，而且思想開明。當我向他們講述某些事件的時候，總是力求所能去滿足他們的興趣，但當他們對我所提的問題做出回答時，在我看來，同樣使我感到很有意義。

人們可以想像得到，處在他們的包圍之中，我幾乎沒有感到煩惱的時候，也因此，更少時間使我能專心致志去做大量社會調查的工作，而這項工作我在桐城以及在桐城郊外的鄉村裏已經同時開始了的。早在幼年時期，我在本省湖南的城市或鄉村裏已經觀察到了的那種貧窮落後的悲慘光景，更足以給人留下十分沉重難受的印象。然而，在貴州這裏，在那些有權勢的人眼裏，彷彿這一切都不算甚麼，不妨留心看一看桐城大街小巷所發生的事，或者同那些運送天然漆料、油桐樹果實的小商人進行幾次談話，或者去參觀那認為合適的小學校，學校裏比較優秀的學生，在閱讀或書寫十分容易的課本時，感到十分費力，儘管大多數小學生的年齡都已到了二十五至三十歲了。所有這一切足夠使我了解到這裏的情況。

顯然，在我的思想裏，決不能聽任這類人世間不平的事永遠地持續下去。但是怎樣才能終止這類事呢？如果我們要從底層着手，應採取甚麼手段呢？從哪方面開始呢？對於這一切，我是毫無認識的，不免陷於絕望之中。但由於要對這一繁重而艱巨的問題，得出一個確切而又實際解決辦法的強烈願望所引導、所推動，我又重新開始閱讀在武漢購得的有關「集體主義」思想的著作和小冊子：一本從美國翻譯過來的《歷史唯物論記要》；一本從日文翻譯過的《社會主義史》，譯者署名李季。

後來，我還寫了不少材料。我寫的是日記體的筆記，這是在武漢時已開始了的，在筆記中我寫我的考察和感想。所謂考察，就是我對社會進行小型調查的成果；所謂感想，就是根據社會考察和書本學習不斷得出的理論研究的成果。我並不以保持寫日記為滿足，還通過筆談方式，與我的朋友定期交換學習的內容要點。在桐城時，我不斷地寫信，也不斷地收到朋友們的來信。那時，中國還沒有對私人信件實行密探式的檢查，我和我的通訊者可以自由地談出自己頭腦中所想的一切。

有一天，我得到一個消息，提到了羅雲慶（Lao Yungqing）。羅雲慶是隆中鎮第二區的著名進步人士，他也是我思想上最大的影響者。1918年他曾在安徽省某一個縣裏擔任官職，後來回到湖南，重新定居在長沙，此時他已是長沙聞名的船山學社的行政管理者，社長賀民範（He Minfan）也是他親密朋友之一⁵⁴。那時，羅雲慶正是我通訊最多的一個，他成了我的「特殊的對話者」。正巧是這位謙虛簡樸的新型人物，不久後，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54 船山學社，這個校名不是無足輕重的。船山，實際上這是湖南傑出人物王夫之晚年的外號。王夫之是一位大聖人、大思想家（有唯物主義的傾向），一位反滿的偉大愛國者。王夫之生於1619年，歿於1692年，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人。1644年慘劇發生後十年，反抗滿族篡權者的最後一次運動也宣告結束了。王夫之的友人，凡參加這次運動的一一犧牲了。他便選擇隱居山林當一名隱士，直到逝世。石船山是一地名，也就是王夫之隱居之地，船山是石船山的簡化詞，就成了王夫之的外號——王船山。

賀民範（He Minfan）—— 湖南第一位共產黨人

我寫的信，給羅雲慶留下極深的印象，印象如此之深，到了 1920 年 7 月底左右，他再也無法克制自己，終於向賀民範談到了我，向他介紹了我的歷史，特別是最近兩年來，我在知識方面、思想方面如何沿着進步的道路發展得如此迅速。賀民範聽了之後，深感興趣，便提出要看我的信，並仔細地讀了，當他把信歸還時，對羅雲慶說：「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他跟我們有共同的思想，跟我這裏的一些青年人共同的思想，我正打算跟他們一起建立社會主義小組，他應該立即到長沙來。我們有些年輕同志，不久後便離開長沙到蘇維埃俄國去。我要派他與他們一起去。」羅雲慶立刻把賀民範的意圖寫信轉告我。他明確他對我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們準備負責把我送回長沙，並幫助我經過上海前往莫斯科。我在覆信中表示了我的虔誠願望。不久，他給我發來一封電報，電文說：「準備動身，詳見信。」果然，隔幾天後，我收到了他寄來的信，信中明確地通知我有關未來幾個星期中我們的行程和活動計劃，與此同時，他還要求我不容遲疑地返回長沙。

那時，我不得不向桐城告別了，不得不向所有親切款待過我的人們告別了。當我向他們說出了最近就要離開的消息時，我妹夫阿孫，妹夫的妹夫，妹夫的表弟以及所有與我父母或朋友有關的其他熟人，都表示十分憂傷，在他們當中有幾個人，也包括我妹夫的表弟在內，試圖要我改變決定。然而，很快我便知道了他們的意圖，不管他們怎麼說，我是不改初衷的，他們只好讓步了；在無可奈何情況下，他們只得考慮為完成我的計劃而想盡各種辦法。我妹夫的表弟，竟然背着我去轉了一圈，要求我們朋友中最富有的人，為我提供旅費，說我將要進行一次直到上海、北京之行……，他用巧妙的辦法，避開了說出我的莫斯科之行。就這樣，他募集到一筆很可觀的金額，約計三百五十至四百圓（當時稱為

銀洋），悄悄地，簡直是神不知鬼不曉，直到我動身的那一天，甚至直到我動身的那一刻，才把錢交給我。天啊，我能說甚麼呢！

我妹夫以及我的二妹雖在桐城，但同在故鄉隆中鎮一樣，生活過得愉快、歡樂、幸福，這是何等美好的日子！但誰能想到，在桐城度過了三至四年後，我妹夫阿孫竟然去世了，留給我二妹的都是年紀很小的五個孩子。這種不幸竟然降臨到我最喜愛的人的身上，這無論如何當我即將搭上列車馳向長沙、上海、馳向莫斯科時，顯然是無法預計到的。1920年8月的最後幾天，我不得不向桐城告別了。我的心仍然是攢得緊緊的。實際上，對我來說，桐城就像我的家鄉隆中鎮的銅鑼村一樣，也就是我的童年期、我的青少年期生活過的地方。而如今，這塊小小的天地已經留在我的身後了，永遠地留在身後了。我心裏完全明白，我要像小燕子一般破殼而出，展翅試飛了。

1920年9月10日，我回到了長沙。我暫時住在由我妹夫阿孫介紹的一個人家裏，不消說，這人當然也是塗料和漆料商人。剛一住下，我便急於去找羅雲慶了。近兩年來，我未見到羅雲慶，他十分激動地歡迎我，並立即把我介紹給賀民範。

賀民範儘管留有一臉鬍鬚，滿頭銀髮，但仍然生氣勃勃。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但喜歡自稱「老少年」。他非常熱情大方，催促我搬到他家裏去住，總比住在漆料商家裏要好得多，他說：這樣做，正是為了我們早已嚮往的能夠經常保持接觸。他那堅決的口吻，使我讓步了，用不着他再三請求，我也毋須再三推託。我在他身邊度過了二、三個星期，是在同志式的氣氛下，在少有的相互信任下度過的，在此期間，我們不斷地相互交談。

我仔細地聽他敘述自己的歷史，思想發展過程。也聽他談到年輕時之所以成為舊中國文人典型代表的種種原因，使我深受感動，但他最後終於成了熱烈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信徒。自從他通過官方考試，好不容

易考取了「貢生」，他很快估計到中國古典道德標準的局限性，像他同一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便積極投入對新知識的追求。大約在 1900 年前後，他前往日本學習技術和科學的入門知識，而這種科學、技術在歐洲大陸早已發展到很高程度了。當時他在日本吉田大學求學，當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之後，便一直在推動「新式學校」的發展。辛亥革命（1911 年）前夕，在一段時期內，他擔任邵陽縣中學校長，該校建在長沙，1912 年，我曾是該校的學生。由於他在教育部門做出了重大貢獻，曾在湖南省享有一定的聲望。他的成就絲毫沒有妨礙，而是起着推動「爭取新文化運動勝利」的作用，這個「新文化運動」在狹義上說，是為五四運動作好準備，豐富其內容，延續其時間，因為在這新文化運動的每一階段，生活氣息十分強烈，出現偏差可以調整，最後，還可以體驗到不同程度的變化而進行探索。

1919 年在長沙時，他有四個男學生，比其他任何別的學生都更接近他，這就是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理所當然地，他只能向這四個學生提出緊急建議，並給他們提供物質上援助，要他們不失時機地離開長沙，前往北京，要他們放棄中學學習，因為 1920 年初，他已知道，在五四運動著名人士主持下，在無政府主義者王光祈的首倡下，要在北京發動一次異乎尋常的試驗性探索，這探索將會證明可以有效地克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矛盾，並因此還可以結束長期以來人剝削人的罪惡制度，這試驗性探索還可充份發揚十分嚴格的平均主義公社的理想，這就是「工讀互助團」的試驗⁵⁵。平凡乏味的現實生活，是烏托邦理想最殘酷的敵人，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在原則上，要為創造另一種生活模式服務，但是試驗並沒有成功。1920 年 2 月或 3 月，工讀互助團因其營

55 工讀互助團，不應同勤工儉學混淆起來。前者存在的時間極短（1919 年秋至 1920 年春）而且只出現於北京和上海兩地。後者存在了好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有來自不同省份的幾百個中國青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他們在法國逗留時間長短不一。

養不良，後勁不足，已處在死亡的邊緣上，恰在此時，賀民範的四個天真純樸的學生卻來壯大它的隊伍。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已是無容置疑了，然而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不甘心失敗。他們乾脆急急忙忙地前去參加設在上海的由較為勇敢的創始人舉辦的另一個工讀互助團。但是上海工讀互助團，儘管有陳獨秀以及其他先進分子的關懷，並沒有比北京的組織更顯得有生命力。當這種工讀互助方式，也就是為「爭取勝利的新文化運動」，在其發展最後階段所依託的，充滿着希望的方式，遭到失敗之後，賀民範所培養的這四個學生並沒有回到長沙，他們仍然留在上海，毫無疑問，他們在上海當然要按照新文化運動中的最著名領袖陳獨秀的那種方式去求取進步。1920年4、5月間，他們以陳獨秀為榜樣，追隨其後，踏着他的足跡轉向共產主義，1920年7月，當陳獨秀決定要創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時（應當說這與未來的中國共產黨是有區別的，但可以肯定它是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人才的園地），他們四個人都成為發起成立青年團組織的核心分子。

賀民範自從促使他的四個學生離開長沙之後，經常不斷地與他們保持通訊聯繫，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因此現在不可能允許他貼近他們了；而他本人仍然希望通過他們，了解「五四」運動後所出現的錯綜複雜的思想，使他能真正做到對事物保持高度敏感性。換言之，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就成了為他傳遞資訊的管道，而且也正是通過他們，他終於與陳獨秀建立起通訊聯繫，那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剛剛形成。至於賀民範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經接受了「集體主義」的思想。從那時起，他就不斷地與陳獨秀商討，在長沙建立的應是湖南社會主義小組，或使用更確切的名稱——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接着便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湖南支部。在陳獨秀的堅持要求下，從1920年7月底開始，他便着手在湖南全省物色較有文化修養的青年，而他們的政治傾向，也能適應於短期內前往蘇維埃俄國，並在那裏參加理論培訓以及加強革命

實踐；培訓時間大約兩年或三年。

1920年9月，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究竟是個甚麼樣的組織呢？由於我本人留在長沙的時間實在太短暫了，無法了解它，但賀民範對我作了解釋。他說，與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不同，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是個先驅小組，而湖南的共產主義小組還不是正式建立的小組。事實上，小組的存在還沒有得到完全確認，小組的活動是由五個成員展開的，他們富有生命活力，享有崇高威望，他們五人身為教師或教育家，不能不對青年學生施加影響。無庸置疑，這五人中的第一位，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都是第一位的沒有爭議的領袖，就是賀民範；第二位是李琿（Li Hun 音譯），他是賀民範擔任校長的船山學社的教師；第三位是何叔衡，時年四十五歲，長期以來，他擔任的主要職位是文學史首席講師兼管湖南省政府的教育事務；第四位是二十六歲的毛澤東，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便在一師附小擔任教師，開始走上人生道路；第五位是易禮容，在易禮容的幫助下，毛澤東開始試辦一家書店，旨在出售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籍和小冊子，這家書店取名為「文化書社」。

當賀民範跟我交談了幾個漫長的夜晚之後，他問我，如果成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一名成員，我是否會有甚麼不便之處呢？我回答說：「不成問題，哪有甚麼不便之處，將近六個月來我早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經過短暫的思考之後，我又補充說：「從現在起，我完全聽從你的吩咐，這是不消說的。如果你希望的話，我也作好了準備，延長我在長沙的逗留時間，以便對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發展做出貢獻。」但當賀民範細心探問我的優先選擇究竟是那一項活動時，我毫不遲疑地告訴他，當然，我強烈的願望是能立即離開長沙，前往上海，然後轉赴莫斯科。賀民範向我表示：「你不必耽擱在長沙，最好還是不要錯過你們年輕人第一次旅蘇的機會。」

1920年9月的最後幾天，我乘船到武漢，又從武漢改乘輪船直駛上

海。當輪船起錨，汽笛長鳴，我深信不疑，此一去再也不可能回到長沙了，也頗懷疑，還能有機會再見到賀民範嗎！

賀民範跟我兩人，本來是生活在一起的，實際上自從分離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仍然保持着通訊聯繫。賀民範給我寄來的最後幾封信，我是在上海收到的，那時我剛從俄國回來，正緊張熱烈地投身到我黨路線的調整的工作中，也就是說已經到了1924年年底了。一方面由於自慚；另一方面由於小心謹慎，他在這幾封信中，盡可能地避而不談他自己，他的憂慮，他內心的悶悶不樂，但當我在讀這些信件時，仍然能了解到，或者猜想得到賀民範自從離開長沙不久，再度回到我的故鄉縣城寶慶時，他在形式上已不再屬於我們的黨了，但是實際上，他仍然全心地、由衷地作為一位正直的共產黨人而行動的。我還可以順便提到，1923年或1924年間，他與毛澤東之間，已經達到無法挽回的對立關係了。從1925年春到1926年底，我還不時地從各處遇到的同志們的口中，聽到他的有關消息。因此，我特別了解，他跟我那富有才華的好友歐陽秋浦（Ouyang Qiupu 音譯）同心協力，曾在寶慶地區的活動中，在宣傳、鼓動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儘管如此，但我仍然未能從這些不同的消息來源中全面掌握其真實意義。對我來說，從下列事實來看，彷彿有一些不光彩的事發生過，否則像我們這位光彩照人的「老少年」，怎麼會如此銷聲匿跡，暗淡無光地結束了他的一生呢？

1927年，數不清的悲劇性事件接踵而來。我也被這場政治漩渦捲了進去。當然，我沒有更多時間來思考賀民範的事。1928年、1929年、1930年……這些恐怖的年份，一年復一年地來到。1932年10月，我終於被蔣介石的特務警察逮捕了。1933年春，蔣介石的走狗們對我作了裁決，並承他們的那番「照顧」，判處我監禁十年，我被剝奪了生存的自由權。判決後沒有多久，我又被轉送到南京監獄，這裏的監規十分嚴酷，我那年輕的弟弟彭道之，便在這所謂南京「模範」監獄裏，被奪走了青

春生命。南京監獄，根據上頭的決定，從來不許我出來「放風」，這對於當時一般囚徒來說，本來是該允許的。誰能料得到，1933年夏末或秋初，一天天氣晴朗，人們告訴我有人來探望，原來來人就是賀民範，天哪，我怎麼能指望見到他呢！

啊！十三年中，「老少年」的變化可多大！再也不能在他身上，找到青少年時期的痕跡，他已是十分蒼老了。我猜想他必定是個七十多歲的人，或許七十一歲，也或許七十二歲，看來他確是這個年齡，顯得虛弱不堪。實際上，他本人也已嘗夠了南京監獄的無情滋味，好多年中，他就是被囚禁在監獄裏面的。在1932年底才被釋放出來，這離開陳獨秀、彭道之和我入監時前後不久。

儘管此刻我所重逢的人，與1920年9月間我所認識的那位充滿熱情活力的人，彷彿今非昔比而感到困惑不安時，然而他那決定前來探望我的想法，以及他一開始便陶醉在重逢的歡樂之中的神態，使我深受感動。突然間，我彷彿心血來潮，急於想要詳細了解他那神秘的、曲折的命運歷程，我敦促他談一談他自己，談一談為甚麼他認定書信中是不能談的、或談了也無用的所有一切事。接着，他便告訴我，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做出決議以後的那段時間裏，儘管他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然而長沙共產黨員人數仍然寥寥無幾，他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小組，大約在1921年7月底，改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派來的委員會書記名叫毛澤東。接着，他大體上對我談了以下的事：

「那是1921年的夏天，我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們建議，要把我擔任校長的船山學社進行一次改革，即把學校制度改革得更加靈活、更加實用，例如新生入學規則、徵聘教師方式以及課程的設計等等，簡言之，就是要把船山學社改革成為自修大學式的學校。這項建議立即一致通過了，在這個文檔上簽過字的，毛澤東並不是最後一個。自修大學一經開辦起來，看來是完全符合我們原先所期望的目標，這所學校不僅能使那

些有才能而又不可忽視的年輕人大量地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並且還允許我們將那些同情者迅速地轉變為共產主義戰士，與此同時，還可以加速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的進程。更顯著的是，從 1921 年秋到 1922 年秋，自修大學能使我們的政治影響範圍擴大了，行動得到了解放。

「自修大學的極大多數教師都是中共黨員，這件事自然是由我掌握的。毛澤東也是其中一個，他還在課餘時間擔任校內行政工作。遺憾的是太草率了！我必須明確指出，同這樣一個人談合作，遠非幸事。毛澤東此人具有異常執拗的性格，難以商量，難以對付。至少我們敢於這樣說，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頗有點怪裏怪氣，難以理解的。

「單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有一天天氣炎熱，毛澤東認為，要使他自已自由自在，輕鬆涼快，最好的辦法是把衣服全部脫光，只在腰部圍上一條毛巾，這就近於赤身裸體了，他就這樣去給學生上課，走訪同事，並且在我們這所理所當然地應被認為是人間嚴肅的學校，從這一端到那一端來回地走動，看來他絲毫沒有體會到他所引起的卻是一件極其令人氣憤的醜事。他的幾位同事力圖向他證明，這種做法太傷大雅了，但無法說服他；他們便跑來圍住我，向我抱怨，向我告狀，這迫使我把他召來訓斥一番，並要求人必須設法穿上一條短褲。但他粗暴地回答我說：『這有甚麼關係呢！』我試圖與他說理，並向他指明：『如果說你穿的奇裝怪服，在你自己眼中不算一回事，但在我們自修大學裏經常來往的許多人眼中卻是一件荒唐大事，你別忘了這會給人以極不舒服的感覺。』說理的結果，仍然只能使毛澤東大發一頓脾氣，他狂暴地反駁我說：『這樣一點雞毛蒜皮的事，能有這樣的後果嗎？我認為即使我剝光衣服，一絲不掛，也談不上是甚麼可恥的醜事，何況，我還圍上一條毛巾，難道你們不以此而感到高興嗎？』這樣，我們只好把事情擱起來。

「通過這次較量以及其他情況下的較量，我已完全明白了，毛澤東這個人絕不會考慮到他的同事甚至其他的同志的，我毫不懷疑，要引導

他去尊重別人的意見，那是非常困難的。好幾個星期又過去了，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對於由毛澤東個人的缺點、錯誤所造成的大小矛盾衝擊中，（畢竟都只屬於引人發笑的笑料），我索性視而不見，不去擴大這些矛盾了。但是由於氣憤，感到失望，並且深信湖南省委書記與我之間，在性格上、情緒上，是絕對不能相容的，我終於做出決定，離開自修大學，離開黨，甚至離開了長沙。這時已是 1922 年底。當我最後把自修大學交給毛澤東同志那種荒誕的思想去支配時，這所大學不久之後也就煙消雲散⁵⁶。

「誠然，我不再是一名共產黨員了，但我始終保持着我那完整的信念，我仍然是一名共產主義者，當我接受任命，負責你故鄉邵陽縣的教育事務時，便離開長沙前往寶慶，我感受到最迫切的事，莫過於能再一次地得到提高，而且要在比過去從未有過的更大範圍內，得用給我的官方職務，盡可能多地把年輕人團聚在革命的旗幟下。

「在我管轄和指導下的，有寶慶的兩所中學及分佈在邵陽縣整個縣境內的大約一百所小學。當然，如果沒有一批教育督導員的協助，是不可能使整個學區的工作獲得可喜的進展的。為此，我便作好安排，使人員配備齊全，特別是，我要使用的人只包括我的同志和優秀的共產主義者。為了完成達到這個目的，我還作了必要的人事任命……現在留給我的主要工作，是給遍佈在全縣四面八方的教育督導員，不斷地寄發郵件，郵件中裝滿了大量的刊物，如《嚮導》、《中國青年》以及各種各樣所謂『顛覆性』的出版物⁵⁷。每一個督導員要把這些期刊和小冊子分配到

56 這座後來改革成為自修大學的原船山學社校址，直到 1949 年，至少還有部份保留着。不言而喻毛澤東本人同意當地政府在此建成一所陳列館，以示對他的個人崇拜。70 年代末，人們還可以看到，那裏豎立着令人驚愕而又齒冷的「偉大舵手」的塑像。

57 《嚮導週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刊物，1922 年 9 月創刊於上海，先是蔡和森任主編，直到 1924 年底。繼而任主編的是彭述之，直到 1927 年春初。1927 年 7 月停刊。《中國青年》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5 年 1 月由團中央改用此名，1923 年 10 月創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由譚代英擔任主編。

各校校長或教師手中，作為主要任務貫徹下去，並根據他們的建議，教師們輪流地將這些書刊作為資料或基本教材，在他們各自的班級裏，啟發年輕學生們閱讀和寫作。他們中的任何一人，確是全心全意地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努力。另一方面，在寶慶，我創辦了一所圖書館，讀者群眾可在圖書館內找到上海或國內各大城市出版的進步書刊，這也同樣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使我感到意外驚奇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共產主義的思想的影響，在邵陽縣許多地方未能壯大起來。而發展得最快的，倒是寶慶地區，第一批湖南省革命農民協會一個接着一個地創辦起來了，就連我這個不再是中共黨員的人，也樂於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並且分享到無比的喜悅。革命農民協會創始人不是別人，卻正是你的好友歐陽秋浦，想你必不會忘記吧！但可能使你想不到的是，當歐陽秋浦在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農民協會運動之前，他曾是我任命的教育督導員之一。

「當我在邵陽縣，以剛才對你說過的這種方式，領導全縣教育事務之後，我又被安排邵陽縣的鄰縣，即新甯縣擔任行政事務領導工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運用在邵陽縣已經取得成效的方式，也在新甯縣各地傳播共產主義思想，但就在任職期內我被逮捕了。這時，中國革命因蔣介石及其一夥人的鎮壓而遭到扼殺，這已是 1927 年了。然後，我被押送到南京，並在那裏判決，判處徒刑五年。直到服刑期滿之前，我一直沒有離開過南京。刑滿後，我才有可能特地來此探望你。」

賀民範對我說了這番話之後，先是沉默了好久，然後又深深嘆了一口氣，顯然是因勞累和憂傷而感到疲乏不堪，最後他補充了一句：「現在我已是風燭殘年，留給我的有生之年，已是指日可數，我打算退歸山林，專攻佛學了。」

就這樣，我們永別了，這也就是他給我、給人間留下的印象。後來，賀民範何年何月逝世，他又是怎樣離開人世的？確實，我已一無所知。相反，我所能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最清楚的，也就是從那以後，人們早

已把他忘在腦後，而且連姓名也不提了。1927年大屠殺之後不久，在我的同志中，知道賀民範的人已經不多，而在30年代末期，當中國共產黨落到了毛澤東手中時，知道賀民範的人更少了。毛澤東怎能容忍得了，不在人們的記憶中抹掉對這位英雄的懷念呢？正因為這位英雄曾經對他犯下「滔天」罪行，不信任他，對他懷疑過、指責過。人們如果試圖在中國共產黨主持下所出版的歷史文獻或歷史教程去尋找有關賀民範的生平，那是徒勞的。總之，根據我的認識，如果人們試圖在中共主持下，而不是在其他人主持下，不論在中國或在世界各地所出版的現代史文獻中，找到賀民範的業績，同樣是徒勞的。因此，人們即使有可能讀到有關的幾行字，最終也會把賀民範拋到歷史的荒煙蔓草中，讓人們永遠忘掉他，毛澤東就是用這種辦法，來補償賀民範曾經對他欠下的凌辱。

霍霍諾夫金——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第一任特使

為了力圖恢復賀民範的光輝形象，我才希望能如實地說明湖南共產主義運動初期的歷史真相，這跟幾十年來由那些中國和外國的傳記作者們所神化了的、美化了的、聖徒化了的「毛澤東主席」中所歪曲了的事實，是有多麼的天壤之別啊！現在，我還應突出闡明的是另一位同志的形象，這位同志早已在人們的記憶中被一筆勾消了，這位同志不是湖南人，而是俄國人。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明確地指出、糾正並深刻地說明流傳很廣的歷史現象、也就是說第三國際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以及其他領導人，是怎樣攜手一致、共同努力來締造中國共產黨的歷程。

很久以來，人們一致地認為，1920年初，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一位代表名叫葛列格里·維金斯基，這位維金斯基首先在北京遇到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認為，最大的可能是讓他到上海去，與陳獨秀取得聯繫，並在上海協助陳獨秀創建未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然而，事件發展的經

過是不是這樣的呢？不，不是這樣的，至少可以說，不完全是這樣。我可以肯定地說，肩負着同中國「五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相聯繫的使命，維金斯基決不是第一位，他是其中的第二位，只能是第二位。應該說還有一位比維金斯基更早的先驅分子，在籌備中共建黨工作這塊陣地上做出卓越貢獻的先驅分子，名叫霍霍諾夫金。這個情況不但是由霍霍諾夫金本人對我說的，而且1924年6月的某一天，李大釗在莫斯科時親口對我證實了這個情況。

1924年6月底，我已在蘇俄生活了將近三年半，而在「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也將近三年，這所大學是在共產國際的主持下於莫斯科創建的，有關這所大學的詳細情況，我還會有更多的機會在下文中提到，現在為了敘述的方便，我把「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簡稱為「東方大學」或「東大」。那時，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早已開始了。我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之一也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是李大釗，人們常喜歡稱他為李守常，與大多數非蘇聯黨的代表一樣，李守常被安置在呂克斯旅館（Hotel Lux），到了晚上，我總習慣地到他的房間去看望他，他也十分熱情地跟我作長時間的談話，這就表明我們彼此之間已不再是陌生人了。恰好，有那麼一天，我在東方大學歡迎李守常的到來，因為他要我帶他來東大參觀。當我正陪同他從大院子裏散步到教室、宿舍，然後到小院子裏時，一個偶然機會不期遇上了霍霍諾夫金，對於我來說，霍霍諾夫金已是一位很熟悉的人了。這位身材高大的俄羅斯人，先前在哈爾濱時說的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簡直如中國人一樣。他剛從中國回來時，便擔任東方大學開設的托爾斯泰文學語言基礎課，專給一年級學生上課的。1921-1922年間，他也是我的教師，正因為這樣，我準備把守常介紹給他，誰料守常一見到他，眼神忽然一亮，便高聲喊道：「是你啊，原來是你霍霍諾夫金啊！不錯，正是！」守常急忙熱情萬分地擁抱了他。這時我十分驚訝、而且是越來越感驚訝；

守常鬆開了擁抱之後，轉過身來對着我解釋道：「正是由於這位霍霍諾夫金，我們的一切才能開始……」夜幕已經降臨了。晚上我到守常的房間裏，由於我的迷惑不解，守常跟我面對面地談到了過去，這就引出一段歷史：

那是1920年年初，像慣常一樣，我坐在北京大學辦公室裏辦公，突然有人敲門，「請進來！」我一邊說，一邊發現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而堅實的外國人，他肯定是俄羅斯人。先前，我曾預料到會有這樣一次訪問的。說起來並不奇怪，北京大學裏，我有一位同事，他也是俄羅斯人，是北大的俄語教師，我們都稱呼他為波里維先生，他曾通知我說，他的一位同鄉非常希望與我會面。然而，不能不使我吃驚的是，這位新來客人講的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他用普通話說道：「我是俄羅斯人，相信波里維先生早已對你說過了。我名叫霍霍諾夫金，向李大釗同志致敬……」這位俄羅斯人是一名共產黨員，因此，他對待我也彷彿是一名共產黨員。他的辦事能力真夠精幹了。我立即抗議道：「喔！我不能自稱是你的同志，至少現在還不是。」從各種跡象可以看出，我的北大同事波里維先生，早就確切地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就反駁我說：「你說到那裏去了！長期以來，我們早就了解你，你是一位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你在中國大力推行馬克思主義宣傳。你在〈布林什維主義勝利了〉的那篇文章中，如此充滿熱情。我們怎麼會不把你看成是我們隊伍中的一員呢！？」⁵⁸

58 霍霍諾夫金這裏所說的，即指李大釗所寫的文章，標題為〈布林什維主義勝利了〉。這篇文章發表在1918年11月那期《新青年》上。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領袖寫的第一篇文章，敢於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讚頌俄國十月革命。

畢竟，他說的這番話打動了我，我才放聲笑起來，並請霍霍諾夫金告訴我，他此行的目的是甚麼。他的態度十分坦率，簡直是毫不掩飾地回答我說，他是受設在伊爾庫次克的第三國際遠東局的委託，前來與我接觸，目的是要在中國創建共產黨。類似這樣的事，我從未預計到過，一時感到局促不安。對我來說，這還需要一定時間來仔細考慮他所提出的問題。我向霍霍諾夫金解釋道：「這並非因為你說得太肯定，太明確，而只因為我確非你所需要的人。」

他聽了之後，不禁激動地嚷起來，接着便滔滔不絕地對我說開了：「據我所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已經有了大量出版物，這些刊物，用長篇欄目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有些刊物甚至提出對社會主義要求；而你們是五四運動中第一批領袖，當然不滿足於只是公開地慶賀俄國革命勝利一番，而要毫不含糊地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樣條件下，就必須毫不遲疑地在中國創建共產黨，而你是最有資格的一位，來推動事業的發展，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嗎？李大釗同志，沒有共產黨，社會主義便成了一句空話。」

霍霍諾夫金說的這番話，確實非常在理，使我深受感動。然而，他談到的這件事是十分重大的，而且也唯有我才能做出安排，接着我對他作了以下的回答，我說：「在中國，唯有一個人勝任此事，也唯有這個人能發揮他的主動性來創建共產黨，這就是陳獨秀。陳獨秀當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至少是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我很了解他，但在建立政治組織這個問題上，他未必比我有更多的思想準備。遺憾的是陳獨秀不住在北京，他現在上海。因此必須經過通信來往，才能在我們兩人之間進行討論，並以共產國際名義邀請他。顯然，這就需要一定的時間。」

你是否有可能延長你在北京的時間，一直延長到我們能夠做出決定的時候？你是否同意，待到我們作出決定時，再來向你表示我們的態度。」

霍霍諾夫金要我確信，他早已作好準備，一定會耐心等待。這樣，我就不失時機地寫信給獨秀。開始時，獨秀在給我的覆信中還持謹慎態度，他希望在作出或拒絕作出投身於建黨運動之前，必須給他充份考慮的期限。然而不久以後，他打破沉默了，像我一樣，他很快就認識到不再有任何重大的理由，可以拒絕第三國際向我們提出的建議。一旦當獨秀把決定告訴了我，我便根據以前的承諾，通知了霍霍諾夫金，他欣喜若狂，立即把獨秀與我兩人的同意，作為極大喜訊帶回伊爾庫茨克。不久後，我便見到了第三國際派到北京來的一名新的代表，他就是伍廷康（維金斯基）同志。我感到當前最迫切的事，就是使伍廷康同志離開北京前往上海……。

在那個時期，也就是守常向我回憶起往事的那個時期，第三國際還是十分年輕，甚至連第一個週年紀念日也沒有到來，列寧心焦如燎，急於要敲開亞洲的大門，特別是能夠看到第三國際走向中國；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列寧要求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遠東局，而遠東局則通過一位在滿洲的俄羅斯人，集中全力要把與中國五四運動中最激進的領袖取得聯繫作為高於一切的中心任務，而這位在滿洲的俄羅斯人，不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已經中國化了的，這裏所指的這位俄羅斯人，就是霍霍諾夫金。

第六章

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主義
小組及其四位助手

上海到了，我在武漢搭乘的輪船，終於在黃浦江碼頭靠岸，這裏就是航程的終點。賀民範給我出具證明的那個文件上的地址、即漁陽里六號，我還記憶猶新，中心小組裏的同志們也定會負責照顧我的生活的。但是此刻，在我面前突然展現着的是一個遼闊無垠的陌生城市，我不免感到有點局促不安，只得惘然地隨着一小群同船旅客，準備離船上岸了。

然而，一上岸我便看到了碼頭上有一個年輕人，他彷彿就是像我這一類的年輕人，正在一個勁地盯視着每一位從船上下來的旅客，而旅客們魚貫地從他面前經過。當他一從人群中看見了我，便向我這邊靠近，問道：「你從長沙來嗎？」我點頭表示肯定。他又問：「尊姓？」「我姓彭，彭述之」。這時，他滿臉堆笑，更堅定了我的信心，頃刻間，我內心充滿喜悅。他對我說：「我是黎冰若，我早就收到賀民範寄來的信，他在信中託我要在今天到黃浦江碼頭來接你。根據他對你外貌特徵的描述，我便認出你來了。」

從輪船靠岸的碼頭，到漁陽里所在地的法租界，有一段路程，黎冰若考慮到我若帶着行李步行，實在路程太長了，他為我僱了一輛出租馬車。想不到啊，受到如此款待，實在太幸福了！黎冰若是湖南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自從1920年秋以來，賀民範便着手把這批湖南青年，一個又一個地經由上海送往莫斯科學習。黎冰若是其中的第一個，我是第二個。

漁陽里六號在對外公開宣稱時，只是以講授俄語為主課的外國語學社的所在地。然而左翼人士中的大多數都知道，這裏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新中心之一，距離以著名人士陳獨秀為首的多數小組成員的住所，並不很遠。無疑，採取這個辦法是因為他們已經預感到有這方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就是法租界巡捕房早已集中視線，不露聲色地在周圍監視他們了。

當然，就我本人來說，一開始便認為漁陽里六號實際上不過如此，因而也就沒有甚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從外面看進去，這是一座磚砌的二層小樓房，位於一個正方形院子的深處，院子環有一堵水泥牆，從牆壁中開出一道雙扇門；如果從裏面往外看，可以看到底層和二層都有一個長長的房間，外形像是由兩個中型房間組成的夾層結構；底層的那個長房間，通常是作教室用的，而二層樓的長房間，根據需要，可以用作會議室，或者用作應急室或備用室，特別有意思的是底層與二層樓之間還裝配有一個小小的夾層式房間。（上海人一般稱之為亭子間——譯者）

當黎冰若剛把我領進漁陽里六號時，我面前便出現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高大的北方人，另一個是身材中等的南方人，前者是楊明齋，而後者便是陳望道。他們兩人都住在這裏，是這二樓兩個房間的住戶，每天的大部份時間也就是在這裏度過的：第一，因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一位名叫波克（Pouk）的朝鮮人協助下，力圖把外國語學社辦得更出色，這位朝鮮人便住在上述的「亭子間」裏。第二，因為他們另有一個任務是：保證做好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的經常性工作，這就是接待從各省來的同志，聽取他們的意見，或者指導他們活動，這些從各省來的同志有的是臨時性的，也有的是固定的，總之是處理一個組織的日常事務；在沒有達到一個政黨的規模時，這個組織只不過是帶有討論性質的俱樂部，這兒還有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小夥子作為助手，他原籍浙江，名叫俞秀松，他就住在底層兩個小房間的角落裏。

儘管外國語學社還沒有開課，但已有不少學生來到了上海，例如羅亦農以及他的三個好夥伴，好幾個月前已經住在學校裏，再如黎冰若，則是剛剛到達的。當時，除了漁陽里六號之外，這十多個學生再沒有其他住所了，他們恰像沙丁魚一樣塞滿了漁陽里六號底樓。不言而喻，他們的到來，使原先同志們的任務更加複雜化，同時，由於來往同志的人

數不斷增加，就使得留宿接待問題很難解決，我又跟隨着我的同鄉黎冰若之後也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來，陳望道直率地告訴我，要他長期留我在他的房間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必須自己設法，或單獨一人或幾人合夥在這個居民區內另找別的住所，今後凡新來的人都照此辦理。當時，黎冰若和我立即決定合夥租房。在我到達上海後還不到一個星期，我和黎冰若便在漁陽里附近的一個弄堂裏，找到一間二層樓房子，隨後不久，我們立即接待了一位原籍湖南的姓江的同志，他跟我們一樣，也是由賀民範吸收來的，還有一位原籍江西的傅大慶，這樣我們就有了四個人，按照同志們中間通常流行的習慣，我們便建立了食宿在一起的集體，這不但因為我們四人共住一間房子，而且還需要有人為我們料理三餐飯菜，這個人每天都要給我們端來必不可少的早餐、中餐和晚餐，如同我們的房東一樣，每到月底還給我們開來一張賬單。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經濟上沒有給我們任何幫助。組織本身窮得可憐，它只能通過伍廷康（維金斯基），從共產國際那裏領到一些補貼僅夠用來還清一筆負債，因為黨的出版物要支付印刷費和發行費，單這兩項已把組織的錢挖得空空的了。

當然，共產國際要給楊明齋和朝鮮同志波克支付一點點生活費，與此同時，還要保證我們能享受免費教育，不必向外國語學社交納學費。但就是這樣的局面，也不可能維持得很久。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所能掌握的經費來源，如果同它所面臨的支出，即還須給專職人員提供一筆工薪作對比，早已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了。那時，我們這批年輕的社會主義者，除了絕對靠自己之外，就別無其他選擇；我們只得按照性格上比較情投意合的原則，或者以同鄉為基礎，組成若干個互助組，否則，怎能維持生計、求得生存呢？

陳獨秀從 1917 年春到 1919 年春止，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以及《新青年》雜誌的中心人物，已在全中國獲得了極高的聲譽，那麼，為甚麼

1920年春，他能在上海首先主動地創辦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並因此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逐漸地應運而生，最後又創辦了中國共產黨呢？這是不是因為陳獨秀一開始便願意這樣做的呢？不是的，而是因為客觀環境的推動，這也可以說是無法意料的命運所決定，正如李大釗於1924年在莫斯科向我所揭示的那樣、是根據他把霍霍諾夫金的一段歷史告訴我之後的那樣。

1919年6月11日，當陳獨秀向人散發傳單時，當時的親日派集團——安福系首腦段祺瑞正控制着北京，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抓走了陳獨秀；我已經談到過，段祺瑞的這種行為，激起了輿論的強烈不滿，甚至包括那部份最溫和的、最有克制能力的代表。當陳獨秀被捕之後第二天，一個為釋放陳獨秀的營救運動，便發動起來了，運動進行得相當成功，而領導這次運動最執着、最頑強、最有力的領導人，用不着絲毫懷疑，他就是李守常。這時的守常擔心着段祺瑞手下的特務警察不可能很快釋放獨秀，或者有可能，決定簡單地加以處理，因此守常刻不容緩地把視線轉移到所有可以團結起來的全國著名人士、顯要人物出來干預，以便更有利於釋放陳獨秀。但經過了八十天的等待、奔走之後，結果卻是空有所望的時候，守常已經預感到最終必將在法律上起訴。然而，守常又被一個新的恐懼所困擾：那就是安福系集團不會迅速釋放《新青年》雜誌創辦人，除非能夠成功地排掉以下這種偏見，即認為這是化裝的謀殺犯或者是觸犯法律的刑事犯。直到1919年9月初，當人們知道釋放陳獨秀已是既定事實或者幾乎是既定事實時，才防止了事件的惡化，而沒有慘遭不幸，這就是我此刻所了解到的對事件經過的敘述，正如多年以後，守常對我所敘述的一樣。

「那天，我知道陳獨秀要釋放出獄了，我僱了一輛老式馬車，一大清早便等候在監獄的出口處。當沒有看到獨秀時，我便充份利用時間使自己鎮靜下來。但一當發現他已在路上了，我一把將他推到馬車上，隨

後我自己也跟着跳上車，立刻命車夫開車離開，我們就這樣直接回到他的住處，而且我也不用費多大的勁，便說服了他，盡快離開北京。我向他告辭時，天已經大亮了，並一再勸告他在我尚未回來之前，他千萬不可走動。當我回到他的住處時，已是中飯時節了，那時他已化裝為北方小商人的樣子，我還催促他穿上像我那樣的破舊衣服。我們就這樣穿上了化裝衣服，當重新出現在大路時，夜幕已經降臨大地了。我們再次僱一輛老式馬車，囑咐車夫在市內迂迴式來往兜圈子，直到我們基本上確信，再也沒有那些兇神惡煞般的『保鏢』跟蹤着時，才敢要車夫闖過北京城門。我們以最快速度，匆匆趕到了北京遠郊區的楊家村（Yang Jiacun）並搭上從這裏通過的京津路列車。我們到達天津後，便直接趕往通向上海的航運碼頭。我要獨秀上了首先起錨開船的那條船上，船離開了，我還等候在那裏，一直等到遠離的船，從白河（Le Baihe）上望去，只留一點黑影時，我才動身返回北京。就在那一刻，我方開始緩緩地鬆了一口氣。」（譯者注：這段敘述可能有誤，陳獨秀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9月16日出獄，未即離開北京。李大釗護送陳獨秀經過天津赴上海是1920年2月。）

正值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在那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首都，在那呂克斯旅館的房間裏，守常彷彿是為了使他自己開心，也彷彿是為了要我開心，他回憶了這段與安福系頭目周旋的往事，然後，他不禁開懷大笑，十分滿意，非常自豪。但他沒有意料到的是：那時他說的這番話，已完全使我察覺到他與陳獨秀之間的關係，自從他們相逢以來，也就是說自從1917年初以來，早已是一般人難以相信的那麼熱情友好，那麼親密無間，那麼相互信賴。然而守常是一位少有的謙虛者，他總是肯定無疑地，把自己看成為他那享有崇高威望的朋友陳獨秀身旁的第二提琴手。

陳獨秀已經逐漸地沿着令人可喜的方向，改變了對待俄國布爾什維

克的態度。顯然，自從 1918 年夏到 1919 年春，他同俄國布爾什維克之間關係，一直小心謹慎地跟隨在李大釗之後向前發展的。儘管受到了「五四時期」的暴力行為以及他本人受到監禁的雙重打擊，然而，即使在監獄中，獨秀的思想仍然迅速地有所前進。到了上海以後，由於上海是一個具有國際水準和風格的大都市，上海激動人心的政治氣候使他受到了鞭策，上海知識界最活躍分子的言談、作品以及自由爭論使他受到了激勵，特別是得到知識界要求盡快在上海復刊《新青年》這種關懷的促進，獨秀的思想，在 1919 年最後的四個月中，簡直是飛躍地發展。

他已經不滿足僅僅宣稱：「軍國主義」和「寡頭政治」，由於事實上到處犯下無數罪行，而「此刻必須予以連根剷除」；也不滿足於僅僅把未來世界描繪為「沒有權勢者和富裕階級法律統治的世界」。他明確地宣稱，要創造一個「人民群眾運動來改變的社會」，1919 年 12 月初，他還明確地指出「要堅決地同昨日和今日的政黨和政治集團決裂」。換言之，他已不滿足於僅僅譴責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犯下的罪行，而且無比推崇社會主義社會的功業，「五四運動」後不到九個月，他已看到有必要建立一個嶄新的革命組織⁵⁹。1920 年初，即到達北京的前夕，陳獨秀在思想上已經追上了李守常，這是十分自然、不言自明的道理了。

然而，在未向共產國際表明態度之前，在尚未弄清那些最進步的「五四」領袖是否已認識到創辦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之前，陳獨秀是不能在通訊中向李大釗作出完全贊同的保證的。他首先必須向在上海的六位具有一定社會主義傾向的激進知識分子徵集意見。這六個人自從 1919 年秋天以來，是獨秀經常來往的人。其中有屬於國民黨的邵力子、

59 令人感到異常激動的創舉是，1919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那期《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我們的聲明〉一文。這期《新青年》雜誌，自始至終是由陳獨秀主編的。

沈玄廬、戴季陶，也還有在五四運動中享有聲望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所有這幾位知識分子的主要活動，是為三種「五四」出版物寫文章或譯作，這三種出版物於1919年夏天間仿照北京「五四」出版物的模式而創造起來的，而且還在國民黨的支持之下，這時的國民黨正需要重新煥發它的青春，這些出版物是：《星期評論》、《建設月刊》（Mensual Construire）以及《民國日報》的文化副刊《覺悟》。自從獨秀逃亡到上海之後，上海的這幾位激進分子，毫無疑義，非常高興地歡迎這位享有極高威望的知名者來到他們的社團中來。他們這幾位立即與獨秀結成了緊密的聯繫，而且盡可能地追隨其後。獨秀的魅力使他們心馳神往，抵擋不住，因此，幾乎所有的人都環繞着他而旋轉，在他們大多人中間，感到獨秀的吸引力，不但能與資深的孫逸仙旗鼓相當，而且還超過他。換言之，他們原先預定的發展目標，已經明顯地發生了變化。此後，陳獨秀更進一步地對他們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使他們下決心團聚在他的周圍，以便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實行一項新的計劃，即在政治上使「五四」力量來一個重新組合，這顯然同孫中山所追求的有利於國民黨的那種方式來改組「五四」力量的計劃，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必須看到的是，如果這個計劃不成功，他們必須同時作好準備，像他那樣擺脫國民黨，像他那樣轉變方向，即轉向共產主義和布林什維主義，這樣做是為了發動一場中國文化的以及愛國主義的復興運動，而目前這個運動還是缺乏生氣的，因此，霍霍諾夫金無疑是一無所獲，便匆匆地離開北京返回伊爾庫茨克了。

1920年3月底或4月初，葛列格里·維金斯基，在他的妻子以及一個會說俄國話的中國人名叫楊明齋的陪同下，到達北京，但他只在北京逗留短短一段時間，與李大釗交換了有關遠東革命可能成功與否的一般性問題之後，便請李大釗寫一封介紹信由他交給陳獨秀。實際上，他在上海的使命，就是刻不容緩地完成一項任務，這就是指導中國共產主義

運動的初步工作。據我估計，大約於 1920 年 4 月中旬前後，他在他的妻子和楊明齋的陪同下，動身前往上海⁶⁰。

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陳獨秀及其友人們不再等待觀望了，當獨秀把友人們團聚起來商談時，他們便着手以「俄羅斯革命化」精神、專心致志地在《新青年》、《星期評論》以及《覺悟》等刊物上組編有關獻身於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利益的特輯，他們還決定在 1920 年 5 月初，即五一勞動節到來之際出版。就這三份刊物來說，最惹人注目的、中國空前未有的、富有戰鬥內容的刊物，用不着任何懷疑，這就是《新青年》了，如同陳獨秀所樂意做的那樣，他在刊物中組編了一系列文章，如中國各省有關勞工階級具體情況的調查報告，以及歐洲、俄羅斯和美國勞工階級的過去和現在的有關文章，此外，《星期評論》和《覺悟》兩刊物，也同樣地刊出了不少有關的文章。當然，顯得最突出的畢竟是《新青年》雜誌，它宣告說，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出現了，他們決定做出最大努力，使無產階級團聚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這就表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初步形成了。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大會召開的日期，正是《新青年》、《星期評論》以及《覺悟》等刊物開始散發「五一勞動節」特刊的時候，也就是 1920 年 5 月的最初幾天。我可以肯定地說，參加大會的，至少有八個人，他們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李達、楊明齋、沈玄廬、邵力子和戴季陶。

然而，在成立大會開過以後僅僅幾天，就是在 1920 年 5 月中旬左右，戴季陶帶着滿臉的尷尬相，跑來找陳獨秀（這是五年之後，陳獨秀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告訴我的），並向陳解釋說，他自覺十分遺憾，不得

60 維金斯基年輕時，因政治問題被迫離開俄羅斯，在加拿大避難。十月革命後不久，他趕忙回到自己的祖國。當時，他已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員。黨派他到西伯利亞，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之一，他在伊爾庫茨克安頓下來，同時當他得到霍霍諾夫金有關的報告之後，便從伊爾庫茨克動身前往中國。

不放棄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一個成員！陳獨秀深感詫異，開始時，他還摸不清究竟這話是甚麼意思，於是，在他們兩人之間出現了一陣沉默，而且是相當令人氣悶的沉默。戴季陶向他所作出的解釋，才反映出事情的發展過程。這解釋的突然發生還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戴季陶究竟說了些甚麼呢？他是這樣說的：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大會，舉行了四十八小時後，但還沒有結束時，他滿懷信心地去見孫中山，他把大會上所討論的，所決定的，當然也包括大會所起的作用，全部告訴了孫中山。戴季陶自從 1920 年春開始，長期來便是孫中山的私人秘書，而且從更長的時期以來，他對孫中山的欽佩，幾乎到了個人崇拜的地步。想不到！這一次使他大吃一驚的是，孫中山不是讚揚他，而是向他發了一通脾氣。譴責他背叛了國民黨，而只是為少數受到極端主義誘惑的知識分子的利益服務，這些知識分子所唯一關心的是成立共產黨。他還責備他竟然被他的好友陳獨秀引上了歧途！最後孫中山要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準備在「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面旗幟之間，作出選擇。啊，就戴季陶來說，他的靈魂深處，除了選擇三民主義這面旗幟之外，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由於戴季陶曾在他擔任主編的《星期評論》上，寫過若干篇文章，有關於一般社會主義的，有關於西方社會主義的，也有關於日本社會主義的；另一方面，也由於他曾是考茨基寫的有關馬克思《資本論》作品的譯者，這些譯文曾以專欄形式在《建設雜誌》（Construire）上連載過，因此這位年輕的政治家，曾在六、七個月內着實以聲名卓著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享受過他的榮譽。現時，孫中山向他兩眼一瞪，那就足夠了，毋須花費多長時間，戴季陶就回到了擁護階級合作的陣營中去了。實際上，階級鬥爭的概念，對他來說，本來就不是固有的。何況 1925 年孫中山死後不久，他在反共的道路上，表現得就更堅決，這完全是為了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使國民黨右派更加稱心如意。

1920年春，儘管陳獨秀已經四十多歲了，但實際上，他幾乎還沒有深刻認識到「成立革命組織」的實際內容指的是甚麼。20世紀初期，特別在日本留學時，他與張繼⁶¹以及其他幾個反清的政治反對派人士，保持着密切聯繫。1905年底，當東京成立同盟會時，陳獨秀本人並不認為有必要參加進去，然而他仍然十分忠誠地為革命事業服務，不論從1911年武昌十月起義後不久，或1913年夏倒袁世凱運動失敗之後，他都是如此，他既沒有在1912年加入國民黨，也沒有在1914年底加入中華革命黨。二十年中，作為一個具有卓越才能的政論家，他所選擇的道路，卻是遠離那些為奪取權力而爭鬥的所有政治把戲。那麼他從何處獲得經驗，並認識到適宜或不適宜去着手建立傳統式的或布爾喬亞式的大黨，甚至更有理由去建立如同共產黨那樣的大黨呢？應該說這是獨秀接受了維金斯基所提供的珍貴建議，使他顯示出才能，終於在1920年5月到10月間，即僅僅五個月時間內，創立了他所創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10月，正是人手缺乏，也正是我為他提供微薄勞力支援的時候；那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成為一個複雜的黨組織，該組織在多方面開展連續不斷的活動，然而，組織的編制充其量只不過十四個人員，這就是說，還要把1920年7月間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支部所有團員都算進去。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外國語學社的任務，不限於為中心組織、其他的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國准共產黨員服務，也不限於創辦一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所研究會既要適合於急於想提高自身理論水準的成員，又要適合於準備出發到蘇維埃俄國去進行一個較長時期培訓的成員，它還要創辦一個刊物其性質是能夠使他與上海工人取得聯繫的《勞動界》週刊，要重新出版《新青年》雜誌，以便與中國全體知識

61 張繼，在20世紀初是孫中山最親近的夥伴之一。1905-1910年間，他是東京創辦的《民報》的常駐編輯。1920年初，他成了國民黨內最堅決的反共人物。

分子取得聯繫，還要準備創辦一份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期刊，適合於爭取所有可以爭取到的人，這就是《共產黨》月刊。

《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集體和領導集體，是在1918年1月組織起來的，而在1919年9月加以擴大，但到了1920年初，雜誌的領導層和編輯部已不協調工作了，一批自由主義分子團聚在胡適周圍，很快就同團聚在陳獨秀周圍的社會主義分子發生爭論。儘管如此，但直到1920年4月間，危機並沒有妨害《新青年》雜誌的繼續刊行，相反，雜誌編得更加引人注目，更加富有魅力。只是到了1920年5月間，在扣發基本上是按照陳獨秀主張而編輯的《勞動界》特輯時，才惡化到再次作出決定，停止出版《新青年》雜誌，事實顯然是：由於陳獨秀要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雛形組織一事上，刺激並激怒了胡適，他不能不認為這是一個極端偏向。

當然，陳獨秀決不是這樣一個人，會輕易同意《新青年》雜誌長期在出版發行界銷聲匿跡，他與維金斯基一樣，力促雜誌重新復刊。但仍然需要三個月時間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只有到了1920年9月初，《新青年》雜誌終於復刊了，但雜誌既要布爾什維克化，又務必保持「五四」精神，就這樣一直辦到1920年底，此時出刊的《新青年》，從表面看來，與原有的雜誌是頗為類似的，因為胡適分子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仍然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是要辦成一份面貌全新的《新青年》雜誌，勢必要配備強有力的、唯一的總編輯，才能毫不含糊地堅持同志們的共產主義立場。這位總編輯具有卓越的表現，胸襟開闊，信念堅定，並且能與人們和睦相處，而這些人從不考慮他是否有受到抨擊的可能，這位總編輯具有大膽無畏的精神，能表現出獨特作風，即能容忍一般來說難以容忍而又值得容忍的意見，甚至能容忍一些令人不安的意見。

1919年秋天，當獨秀重返上海時，他便選定法租界作為《新青年》雜誌以及他自己住宅的所在地，這是符合實際的，符合由經驗得來的實

際的，因為法租界是比較安全的地帶，至少可以少帶風險性。但遺憾的是這裏同樣存在着有意外發生的事；上海是位於長江口的國際大都市，這裏防區治安負責部門，要維持資本——帝國主義社會秩序，肯定會時時刻刻提高他們的警惕性。大約在 1920 年 9 月中旬或 9 月下半月，即當我來到漁陽里六號之前不久，法國巡捕房就來糾纏陳獨秀了，他們的藉口是：他所主持的《新青年》雜誌，是有利於共產國際和蘇維埃俄羅斯的宣傳機關刊物，除非改變這種性質，否則就不能重新出刊。法國巡捕房逮住他之後，大約拘留了他四十八小時或更長一點時間，他們揚言道，按照他們不得不遵守的法律條文，這次對他提出的罪名控訴，是非常輕微的，也是十分客氣的。然而他們這樣處理，為的是給他一個恐嚇，要他在今後行動中，必須小心行事，不得亂說亂動，而在這一方面，他們指責陳獨秀過去是完全無視了的。陳獨秀對於第二次被捕，感到相當輕鬆，這不同於第一次被捕，這次只在監獄裏蹲了短暫時間，但是他完全意識到，如果第三次逮捕發生，無疑地，就不可能輕鬆地擺脫了，他也認識到，要隨時提高警惕性，特別下了決心，今後不可常去漁陽里。

當然，他仍然繼續不斷地去看望他所最了解的人，並同這些人一道，齊心協力地開始進行中國共產主義事業，但這樣的接觸，一般是在他的家中，有時在這些認識者的家中。對於另外一些人，嚴格地說來，並不是他必須保持緊密聯繫，而只讓他們完成任務的人，他就不再出現在他們中間，即使這些人是完全同意他的主張的。我在這段時間內，連一次機會也沒有見到陳獨秀，原因有兩個，剛才說的是其中的第一個，何況從 1920 年秋到 1921 年春初，我在上海度過的五個月，簡直是風吹水流般地消逝了；第二個原因則是從 1920 年 12 月中旬開始，陳獨秀本人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他在廣州逗留了八個月，我更沒有機會見到他。

陳獨秀的四位助手

陳獨秀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關鍵人物，但很少露面，這不僅因為他是出版物的主編，並依靠他來調配各項不同活動，而且還因為在建黨道路上，他必須確保與中國其他各共產主義小組保持通訊、聯繫。因此，要把建黨的事順利地開展起來，就必須得到另外四位不但具有卓越才能而且具有獻身精神的人的密切配合。這四位便是李漢俊、李達、陳望道和楊明齋。在我看來，他們四個人都是平易可親的。

那時，李漢俊年齡已有三十餘歲，長期以來都留在他的故鄉——湖北省。從1913年秋到1919年夏，他是東京帝國大學一名留學生。東京帝大嚴格要求所有的學生，至少要精通兩種外國語，除日語外他還學會了英語和德語，並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法語。因此，他能夠很快領會、並掌握那些不斷改變世界面貌的政治事件，例如1914年秋初（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1917年3月初（俄國革命的爆發），特別是能夠及時理解1917年11月初彼得格勒工人起義的實質意義，他還能接觸到世界最著名人士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以及列寧等人的著作，能夠探索辯證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奧秘，能夠理解範圍廣泛、內容豐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也因此他能在理論領域內，走在大多數「五四」領袖們的前頭，其中也包括李大釗在內。

李漢俊曾經得到一些日本人的幫助，這些日本人不僅限於閱讀馬克思著作，而且還將其譯成日文，並從1917年時竭力為布林什維主義辯護，並從1919年初以來，他們一直盼望建立日本共產黨，如果沒有這些日本人的幫助李漢俊的思想是否能沿着共產主義道路發展得這麼快呢？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實表明：李漢俊對於日本學者的思想啟發，很快就能領會接受，1918年春，當日本軍隊干涉西伯利亞西部事件時，他與這批日本學者一樣感到無比憤慨，從那時起，他就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

共和國的熱忱同情者。

李漢俊受到「五四」運動的召喚回到中國，定居在上海，並繼續鑽研馬克思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做到言行一致。隨後，他便立即成為深受讀者讚賞的《星期評論》的編輯之一，特別是積極地從事寫作一系列有關歐洲社會主義史的論著，以及對第二、第三國際功過評價。1920年4月到9月，他在創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的每一階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幾乎不遜於陳獨秀。

儘管工作方式是全憑經驗的、非具體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但總的說來還是比較明確的，就是這樣的工作方式下，1920年10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和楊明齋已能分工負責來完成任務，這樣便使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看起來，彷彿時時刻刻都像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李漢俊有他的特殊任務，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他的特殊任務包括：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主義研究會的活動，為《新青年》、《勞動界》以及《共產黨》編寫多種不同題材的論文，並為上述刊物搞翻譯工作，即把從國外來的英語、德語或日語的作品譯成中文。

李漢俊的住所，離漁陽里僅幾步路，如果有人向他請教、或有事相商、或徵求意見，儘管他自己的工作很忙，負擔很重，但他很少拒人於千里之外。他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學識淵博的人。當人們在聽他的言談時，很快便會發現，他是一位具有多種才能的思想家，他通常接觸到的專業範圍，不僅包括歷史學、哲學，而且還包括各學派的政治學和經濟學。他在思考問題時，像哲人那樣地端莊穩重，簡直就是沉着鎮靜的化身。誰曾看到過他發過脾氣呢？他那彬彬有禮、講究文明的風度，完全可以彌補作為一名學者多少帶點笨手笨腳的缺點。他工作、學習精細入微使他忘了甚麼叫做厭煩，甚麼叫做疲倦，當人們同他交談時，時間從不知不覺中過去了。

李達原籍跟我一樣，也是湖南人，儘管他比李漢俊年齡稍輕（那時

恰好三十歲），但跟李漢俊一樣，幾乎在同一時間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深造，因此享有同樣特殊機會，除日語外，還學到了英語和德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過程中，他幾乎每天都可讀到有關遠東消息的報刊，同時也有較好條件研究馬克思及其信徒們的論著，最後還幸運而又及時地、受到贊同布林什維主義的第一批日本社會主義者的影響。緊隨着「五四」運動的爆發，他於1919年底回到了中國。他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所作的貢獻，實際上是跟李漢俊一樣的出色。從這方面來說，有人估計他與李漢俊彷彿是並肩兄弟，或者僅居第二位，如果再走一步，也許就可越過了。

在思維和判斷方面，無疑他不及李漢俊那樣敏捷、那樣機智，但在宣傳馬、恩思想工作方面，卻比李漢俊做得更多，他要把馬克思主義送到他認為可以接受的人手裏。正是在這樣的願望推動下他發揮出很大幹勁，把他在圖書館裏所讀到的大本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從頭到尾輕快地譯成中文，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我所知，在陳獨秀身邊四個助手當中，唯一結了婚的、或者說正式結了婚的只有李達一人。在我到達上海不久，他已把妻子帶來了，自然是住在復旦大學附近。但他也常在妻子陪同下，頻繁地出入於漁陽里六號。李達沉默寡言，看來態度有點冷淡，是一個十足教授派頭的人。但實際上，他是厚道可親的，為人正直，頗有膽量，決不是機會主義者。

不可「以貌取人」，陳望道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如果有人與他初次見面，投以一瞥，誰也決不會相信他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到底像個甚麼樣的人呢？簡直像一個做中裝的裁縫師傅，他身材又瘦又小，帶一點駝背，一句話，彷彿是一個發育不全的矮小子。就總體來說，特別是他的一舉一動，顯得小心翼翼，謹小慎微。此外他鬱鬱寡歡，不停地抽着煙。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很不惹人注目的外表裏，卻掩蓋不住他那惹人注目的才華。

陳望道，是以前設在杭州的浙江教會大學的舊學生，後來他既是優秀的作家，又是出色的教師，更能熟練地閱讀日語和英語書籍，並能流暢地將其譯成中文，但應該說，陳望道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一位具有堅定的現代化思想的文學家。作為一名中國社會倫理、知識以及文化振興時期的堅定捍衛者，他正像北京大學多數教授和《新青年》雜誌的全體編輯一樣，曾從 1919 年 5 月至 6 月事件發生之前，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絕大多數學生，起到了巨大影響，而在「五四」事件之後，又在《錢江評論》上發表帶有明確社會主義傾向的文章，《錢江評論》是杭州出版的反對傳統最尖刻的雜誌之一；他還全力協助邵力子出版《覺悟》雜誌，繼而協助出版《共和日報》，這份日報的方針同樣是強烈無視舊社會的一切清規戒律。然而，陳望道的成名大作，最令人心馳神往的貢獻卻是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這部名著是在 1920 年 4 月在上海出版的。

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並非第一個譯本。第一個譯本是在 1919 年 11 月間，由北京大學進步學生所創辦的月刊《國民雜誌》社出版的，也曾在中國公眾中流行過。但第一個譯本有兩大缺點，一是不完整，二是過於草率，文體不流暢。有了這個經驗之後，人們要求對馬、恩這本不朽的著作，應該有既是完整的、又是譯筆出色的譯本。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就是抱着這個動機的，人們信賴他能出色地完成任務，使譯文優美，譯筆流暢令人滿意。他便着手翻譯了，並且不惜付出辛勞，終於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嚴格地說來，他譯的《共產黨宣言》幾乎是無可指責的，譯文相當嚴謹，按照我的看法，已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譯文十分忠實於原著。1920 年間，除陳望道外，還有不少中國人有能力，把馬、恩這本 1848 年發表的主要傑作譯成中文，即使沒有他奉獻的這份力量，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但我的想法卻不是這樣。

誠然，就發揚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言，陳望道的聰明才智不及李

漢俊和李達，理論知識也不及他們兩人豐富、不及他們運用自如。然而，當我來到上海的那個時期內，陳望道仍然受到許多人的重視和讚賞。重視他在寫作方面的價值和作用，特別是經他發展了的文學、戲劇、藝術、倫理道德、風尚習俗等等，簡言之，重視和讚賞他在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著作。因此，當陳獨秀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之前，把《新青年》雜誌的主編任務交給陳望道，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楊明齋，身材高大，體質堅實，精力充沛，顯然是地道的山東人。在清朝未被推翻之前不久，他的家因不堪貧困而被迫移民到沙俄帝國的東西伯利亞土地上，那時，他有多大年紀呢？據我猜想，僅十二、三歲，但不會超過十五歲，這是肯定無疑的。他一生中有大部份時間是在俄國境內度過的，先是在東西伯利亞，然後在莫斯科，他在那裏不僅有了上學機會而且還找到了工作，前前後後大約逗留了十年，從1917年開始，他滿懷熱情轉向支持布林什維主義。因此從心理上來說，不論好歹，有種種理由可以說他已是深深地斯拉夫化了。有這樣強烈印象的人並非只我一個，凡這些日子中天天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有同樣的印象。

在楊明齋身上留下了十分明顯的俄羅斯印記，這不但因為他能像俄國人一樣會說俄語，而且還因為他熟悉的俄羅斯、是我們漁陽里六號外國語學社的學生所無法達到的，因此，我們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做「我們的活詞典」。除此之外，還因為他具有斯拉夫式的獨特風格——豪情奔放，感情強烈；他曾專心致志地為我們講解托爾斯泰和普希金文學語言的優美，同時又為我們講解被列寧和托洛茨基所豐富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毫無疑義，他在這兩方面的認識都是比較全面的。最後，還因為他對待周圍同伴的舉止態度、作風習慣，仍然免不了帶有遠東式的、北亞式的或東歐式的特點；他對待我們每一個人，經常是坦率到近乎狂妄，顯得大方而又粗野、善良而又生硬，彷彿要把他心裏的一切都說出來那樣的魯莽，那樣的直率。

楊明齋是半個俄羅斯人的中國人，說得更確切一點，他是俄羅斯人和中國人兼而有之，如果他所掌握的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能像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語言一樣的出色，那麼，他就可輕易地適應一切工作了。但遺憾的是，1920年時，情況恰好不是這樣，當然他中國話說得不錯，讀中國書也頗自然，寫出來的中文也夠得體。但畢竟他缺乏一種獨特的才能，因此人們看不出為甚麼第三國際要求他回到中國、擔任維金斯基的口頭譯員，而維金斯基除了俄語之外，只懂英語；人們也看不出他如何能克服困難，去完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兩項任務，其一承擔來自莫斯科的俄語文章的漢譯工作，這是照耀着《新青年》和《共產黨》雜誌所有讀者思想上的指路明燈，其二是負責在政治上、語言上初步培訓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他們已決定前往蘇維埃俄羅斯首都，參加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和培訓。然而，事實是楊明齋說的中國話，不像中國人說的那麼自然流暢，特別是在公眾場合下更是如此，而他寫的中文也不都是成功的，這就使他感到困難重重，難以承受。自從那天維金斯基剛一卸下他的行李時開始，楊明齋就重新投到了同胞兄弟的海洋之中，顯然，他要逐漸地重新學會早已忘記的事物，與此同時，他還要像我們每個人一樣地在中國學校裏或日常生活中學習那些他沒有學到的東西、因為他年幼時離開中國、移民到俄羅斯去了。但所有這一切顯然都要他付出很大的代價。實際上，這需要兩三年時間才能克服他個性上這點小小的、但又是令人自慚的困難和缺點。

我雖然與李達常有見面，而與陳望道、楊明齋見面的機會更多，但在個人方面，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很膚淺的，李達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除了理論方面之外，我從沒有想到要跟他談其他的事。按理來說，楊明齋應是一個傑出的俄語教師，他的心地也非常善良而直率。但他上起課來卻很糟糕，只因為他根本不遵守課程表來教學。因此他使我感到頗為惱怒，有一天，我終於向陳望道寫信表示不滿。陳望道接信後不久，立

即約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由於楊明齋在國外生活了太長時間，他已忘了我們的風俗習慣，這就可以解釋他的個性為甚麼有點怪僻、糊塗，缺乏條理；但隨着時間的過去，毫無疑義他肯定會起變化，而且會有所改進，因此我應當對楊明齋表現出耐心。事實確是這樣；如果說陳望道這番話已經起了很大作用、能夠說服我繼續容忍楊明齋的怪僻行為，使我一直沒有與他發生過爭吵，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在這五個月時間內，陳望道一直與我保持着私人接觸。

從1920年10月起至1921年2月止，在上海外國語學社比較年長同事中，我曾與之有過較深的正常關係，而且也是我真正體味到有過友情的唯一的人就是李漢俊。我明知他工作很忙，要盡可能地避免過多地去打擾他，但實際上我仍然經常去看望他，目的是請求他給我解釋馬、恩思想或考茨基思想的種種論點，或者與他在一起討論我們未來的黨是否有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在中國完成一次蘇維埃式的革命。在我離開上海前往蘇聯留學之前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兩人對動員農民這個重大問題，曾進行一次較長時間的熱烈交談，從那以後，我對這個問題是經常不斷地反覆思考。

中國共產黨人深知自己的國家，主要是一個農業國，因此，土地問題不能不是因歷史的使命而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實際上，像毛澤東那樣，他們也早已渴望作出決定。約在1926年底緊接在許多工作之後在湖南的十二個鄉村裏，進行了一次小型調查。自從1920年底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就已理解到這個問題，即使在上海的領導人中間，為採取甚麼手段才有可能去喚醒農民，去組織農民而不斷爭論的時候，他們也是同樣理解這個問題的。我完全可以承認，他們切實費盡心機，但始終未能成功地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政策。但事實終歸是他們已經全力以赴了。當然，關於動員農民這樣的問題，對於我這樣一個從較為落後的湖南西部深處山村長大的孩子來說，一直是掛在心裏的一個重大問題。

同樣，我也可以作證，自從 1921 年 1 月以來，李漢俊也是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的。

令人驚異的是，1921 年 4 月，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共產黨》月刊上，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題為〈告農民書〉，當時，我恰好在莫斯科，直到過了好幾個月之後才讀到這篇文章。儘管如此，我仍然被這篇文章吸引住了，這不僅僅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文檔上採取公開立場把農民問題提出來，而且還因為從文章中，我發現其內容實質及其使用措辭，都是在我動身赴蘇前夕李漢俊都早已對我談到過的。當然，我還不能判定〈告農民書〉一定就出於李漢俊的手筆，但我大體上已經肯定了。

1921 年秋初，在一個偶然場合，我總算有機會重新見到了楊明齋。但自從我離開上海之後，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李達和李漢俊了。至於陳望道，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內，幾乎純是插曲式的有時與他重新保持一定的關係。行文到此，我對這三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元老的命運前途說幾句話，應該是不失時宜的。

1920 年底，陳獨秀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之前，把各種不同的工作任務都託給了陳望道，他都非常忠實地一一加以完成，直到 1921 年盛夏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接着，儘管對他來說，並不那麼興高采烈，但仍然以同樣的熱情，同樣的獻身精神，全力以赴地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委員會的建立作出了貢獻。然而到了 1921 年底或 1922 年初，他離開了中國共產黨，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我一直無法知道。此後，大約三十年中，他過的是自由自在的教授生涯。1949 年，他也欣然地歸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他以上海著名的復旦大學校長身份，走完他的一生。

李達是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上海兩名代表之一，另一位代表便是李漢俊。在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全國臨時領導成員之一，他在

這個位置上大約工作了一年光景，因此不得不推遲到 1922 年底才離開上海。然後他便回到故鄉湖南省會長沙，就任湖南大學教授之職，與此同時他還參加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湖南省委工作（李達），如同賀民範一樣，對毛澤東的態度深感厭惡，從 1923 年起他便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他與賀民範不同，並不因此就放棄，卻以他自己的風格、為爭取共產主義勝利而奮鬥。李達作為大學教授，自始至終按照馬克思及其後繼者的思想嚴格要求自己，直到最後一口氣。從 1949 年到 1965 年，他不是為個人私利，而是為了一個信念，即作為一個理論家，一個高等學校學者，他為新「中國的創始者」們提供理論幫助。然而，毛澤東怎能容忍他在理論上總是高他一籌呢？1966 年，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天才」發明家的司令部唆使之下，一隊「紅衛兵」，奉命來制服這個非黨分子、中國公民李達，指控制他是 70 年代的「大黑幫分子」，從 1953 年起便犯了竊居武漢大學校長的職位，並召開一系列持續不斷的「控訴人民敵人」的批鬥會，大會勒令他承認「毛澤東思想是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但他拒絕承認時，大會以慘無人道的殘酷折磨了他，他終於在 1966 年 8 月 24 日銜冤而死。

李漢俊與李達的情況不同，他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並沒有授予全國性的重大任務，因此，在 1921 年底，他可以自行決定踏上了回鄉之路——湖北省。當他剛一在武漢定居下來時，便找到了教書職業，並抓住有利時機、爭取到一批青少年男女接受共產主義（其中包括陳碧蘭，她後來成為我的終身伴侶），他還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運動中去，特別是協同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陳潭秋，以及富有強烈戰鬥精神的武昌無產者工人項英，以最積極態度推動、組織京漢路鐵路員工。

軍閥吳佩孚及其直隸系同謀者發起反攻，槍殺了京漢路員工，這就是 1923 年的二七事變，接着，他們在武漢以及全國其他大小城市，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獨立王國」內的各省城市，策動一次更為廣泛的大屠殺，

這次屠殺既具有反工會幹部，又有反共產黨人的性質⁶²，就在這個時刻，李漢俊估計到，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只有前往北京去投靠他的兄弟李書城，要求避難和保護，李書城是國民黨內頗有威信的資深人士。當時，正由於他和李書城有着這種關係，才能從直隸系集團控制的政府部門的教育部中找到一份小差使，勉強擺脫了這種困境。但也因此，他遭到了北京共產黨人的嚴厲批判，指責他為機會主義者。然而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他幾個月後離開了黨，他離黨的原因，還由於黨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斷然採取一條在國民黨內實現國共合作的路線，這在李漢俊看來，是黨的原則所不能容許的。

62 1921年夏末，主要是由於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所作的努力，工人俱樂部與職工會開始成立，並在1921年秋，先在上海登記，然後便在全中國推廣，這朵真正燦爛的工人運動之花，一直盛開到1923年初，當工人俱樂部和職工會剛剛成立時，便提出了要求縮短工時、增加工資、廢除封建式的帶人身侮辱的「勞動編制」、廢除在大多數企業中仍然盛行的警探制度，並且要求承認工人們正當的生存權利。為了爭取要求得到成功，他們便發動了總罷工運動，有的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有的至少是取得了部份勝利。在這些罷工運動中，表現得最英勇大膽的是香港的海員工人，江西安源的煤礦工人，河北唐山的煤礦工人及京漢路上的鐵路工人。

然而1923年1月30日，直隸系軍閥吳佩孚已經控制了京漢路沿線的所有各省，嚴禁該鐵路線七個工會俱樂部代表團舉行集會，因為他們早已宣佈，要在1923年2月1日於鄭州成立京漢鐵路員工總工會，結果吳佩孚的部隊封鎖了他們原先計劃集會的入口處。在得到所有鐵路員工以及鄭州其他無產者的強有力支持，京漢路七個工人俱樂部的代表們自信足有能力，不顧軍閥的強制命令，他們成功地衝破了軍閥部隊設置的封鎖線，按照預定時間、預定地點，宣佈總工會誕生了。但當全副武裝的軍人開始追捕不久之後，工人們便陷於一片混亂，他們急忙從鄭州轉移到漢口附近的江岸，並於1923年2月1日的晚上發出京漢路沿線所有員工總罷工的號召。1923年2月4日京漢路所有的車站、停車場、車庫都卓有成效地停止工作了。但吳佩孚在駐漢口的英帝國及其他列強代表的唆使和支持下，更加咄咄逼人地進行挑釁，1923年2月5日和6日，士兵與工人之間的大小事端層出不窮，而緊張局勢的烈焰在不斷升高。最後，到了1923年2月7日，吳佩孚及其同夥決定採取斷然措施：武漢司令蕭耀南下令用機槍掃射，約二百人受傷；河北省軍閥頭子曹錕採取同樣鎮壓手段，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用機槍掃射，死鐵路工人五人傷六十人；至於由吳佩孚本人統率的軍閥所控制的江岸、長辛店和鄭州等地，被逮捕的工會幹部、共產黨人的總數就無法估計了。

在這次大屠殺之後不久，京漢路總工會以及發起組織總工會的七個工人俱樂部，不言而喻，全部不再存在了。1923年2月9日，京漢路鐵路工人沒有其他選擇，只得復工。吳佩孚及其同夥，從那時起，便有了更大空間，在其所控制的地區，對無產者實行恐怖統治，特別在湖北省。許多其他地區也很快跟着吳佩孚亦步亦趨，經過這次打擊後，中國各地的工人運動幾乎都陷於癱瘓了。唯有湖南與江西兩省交界的安源地區，由於地處偏僻，這個「小蘇維埃」總算保住了幾個工人俱樂部。

1926年底，李漢俊重又回到上海，生活了一段短暫時期，並在上海大學的新校址——閘北，舉行過幾次有關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術講座。據我猜想，1927年初他從上海動身回到武漢，擔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的職務，儘管他在理論上、精神上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他已不能重新入黨，而他自己也從來沒有這樣考慮過。他曾深信，作為一個無組織、無黨派人士，不可能引起蔣介石及其狂徒們追捕「赤色分子」的注意，這個「追捕」暴行從1927年4月開始已在全中國猖狂地展開，即使他想避開也已經太晚了。1927年12月17日，蔣介石分子一經抓住他，自然未經審判，便把他槍殺在武漢。

漁陽里六號青年之家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核心是由五人組成，即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和楊明齋，當然，還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支部的大約三十名團員，構成核心外的大周邊組織，然而緊圍繞着核心而運轉的成員，我稱之為核心外的小周邊組織，此時最多不過三人，但在我到達之前不久，又增加了四人，他們是邵力子、沈玄廬、施存統和俞秀松，他們的原籍都是浙江省人。

邵力子和沈玄廬（又名沈定一）兩人，像陳獨秀一樣，此時年已四十，兩人都是閱歷豐富，頗為成熟的傑出分子，而且智力發展正處於最佳狀態。約在1900年時，他們兩人都獲得了最似光耀門庭、實則一無所用的舉人稱號之後，其中一個在日本，另一個在中國接受了歐洲的「新知識、新思想」，並且在辛亥革命（1911年）前夕，秘密加入了共和黨。清廷被推翻之後，他們兩人更加顯示出膽識俱全的共和黨人的精神面貌。在袁世凱統治最黑暗的時期，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雜誌，這使他們兩人對陳獨秀深表敬佩；「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能向陳獨秀學習，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首先是邵力子，他創辦了《覺悟》，這是孫中山

信託他擔任編輯的一份小型報刊；其次是沈玄廬與戴季陶合作，經常在《星期評論》上發表深刻批判舊傳統觀念的一系列有關時局發展的文章。

1920年初，邵力子、沈玄廬是擁護第三國際的，但他們兩人的動機，毫無疑義是不能與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以及楊明齋四人相提並論，我們可以不帶任何感情來說，李漢俊等所表現的特點是更令人感動的，而沈玄廬在這方面的情況，給我們留下的印象，至多只比邵力子較深而已，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他們兩人主要是由於同陳獨秀保持個人性質的來往關係，使他們在1920年10月仍然留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裏。儘管他們具有這樣的特點，但仍與戴季陶有別，因為當他們沒有失去孫中山黨的黨員資格的時候，終於選擇了走布林什維主義和蘇維埃的道路，這決不是瞬息之間的一念之差；對於他們來說，在作出了有利於宣傳布林什維主義思想的貢獻之後，並沒有想到要退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而且從六個多月以來，他們一直是以中國共產主義忠實信徒自命，也是這樣行動的。他們兩人不顧戴季陶以及其他幾個孫逸仙主義的清一色強硬派的沉默仍然堅持、而且比之以往更加堅持貫徹《覺悟》和《星期評論》的思想，這是我們認為十分可貴的思想，因此，也正因為在他們的刊物以及在其他刊物的旗幟下，例如《新青年》雜誌、《共產黨》和《勞動界》的旗幟下，使共產主義宣傳能夠普及到全中國，能夠給廣大有文化的群眾指明方向，特別是能夠深入到成千的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中去，這就是我們的目標之一，這個目標也就是要在短期內把他們爭取到站在我們的旗幟之下。

《覺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創辦了頗有獨特風格的對話專欄，這樣的對話簡明而坦率，是在提出話題和加深話題討論的人之間進行的。這個專欄向所有的讀者開放，他們可以暢所欲言，發表他們的意見，或者乾脆向編輯部成員提出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等等。然而，這項專欄，不但是由邵力子創辦起來，由他堅持下去，而且我還認為，幾乎

全憑他個人使刊物越辦越好。無論甚麼人，只要向他的專欄提出要求，他便力圖做到盡可能快速地、確切地、完滿地予以答覆。事實畢竟證明刊物是辦得成功的，而且也正因為連續不斷地取得了成績，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贏得了「百科全書」的美名。儘管在我們看來，《覺悟》雜誌是相當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及甚至遠不及《星期評論》。從1920年初以來，《星期評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日益得到確認，我們必須承認，沈玄廬歷來就是《星期評論》的第一位主持人。沈玄廬很少寫過思想性深刻的文章，但他能充份利用他那生動的、激烈的、富於戰鬥性的文學語言，博得了青年讀者的歡迎。

1920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論中國青年地位仍然不受重視的短文，刊在《覺悟》雜誌上，但不言而喻，這篇論文並未得到編輯部或出版發行部像邵力子所受到過的那份榮譽。漁陽里六號並非陳獨秀常去的地方，至於邵力子和沈玄廬從來就沒有到過。因此，當我第一次在上海逗留的五個月中，幾乎連一次機會也沒有遇見過他們，更沒有談過話。我認識沈玄廬是1923年底在莫斯科的時候。而我與邵力子建立關係，是1926年春在廣州的時候。

施存統和俞秀松兩人，要比邵力子和沈玄廬年輕一半左右；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一或兩個月之後，他們兩人便參加進去了，但這並非由於與陳獨秀保持私人關係，而是由於同陳望道保持私人關係的緣故。

施存統、俞秀松是陳望道所接觸到的一批年輕人中，對新事物最富有敏感性，那時陳望道是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教員，正是在他的影響下，他們兩人與杭州其他一些不滿現實的學生一起，於1919年秋創辦了《浙江新潮》，我以前已經提到過，這份雜誌在反對舊傳統觀念作出了值得稱頌的貢獻。然而，1919年11月8日，在《浙江新潮》的第二期上，施存統竟敢發表一篇反對孔儒哲理的文章，並且還大膽地冠以一個標題「打倒孝道！」或「孝道休矣！」，文章當然是熱烈歌頌「五四」提出

的要求，但這篇文章先是在杭州，後在上海，最後乃至在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有傳統觀念的思想界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其所引起的公憤是如此強烈，以致以施存統和俞秀松為首的這批人，沒有別的道路可選擇，不得不離開了杭州。

1919年12月間，由王光祈在北京發起組織的工讀互助團，儘管隊伍有新擴大，但仍然一無所獲，而且事實證明；「五四」運動曾經寄予的期望，也沒有得到明確的反應，在此之後，施存統和俞秀松便在1920年春重返南方，而且毫無猶豫地被陳望道說服了，他們放棄了無政府主義，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兩人在這四、五個月過程中，不論從理論觀念上，或從思想觀點上，差不多與賀民範最初培養起來的四個小青年，即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所走過的道路一模一樣。

自從陳望道把他們兩人爭取到我們事業方面來後，同時又很自然地、也是無愧地吸收他們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來，負責每天的例行工作。從技術觀點來說，人們不能說他們不屬於我們那些年長者行列，然而從政治上來說，並沒有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年輕團員更加成熟，自從青年團誕生之後不久，他們兩人也就參加進去了。

據我回憶，當我尚未到達上海之前不到一個月，施存統已經離開上海前往日本了，他在日本大約學習了兩到三年，後來他以施復亮之名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在中國頗負盛名。我僅在1924年底才有機會與他建立起關係，那時我本人也從蘇維埃國家逗留三年半之後回到中國。

與此相反，我與俞秀松之間關係卻早得多，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2月，我們在漁陽里六號幾乎天天可以見面，他留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十分忠誠的同志，他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家交給他的任務。從1925年底開始，輪到俞秀松前往莫斯科學習，並在那裏逗留了一個很長時間之前，由於生活歷程的風風雨雨，使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

了。但不久之後，我從某些熟人那裏聽到有關俞秀松的消息。為了心理上及政治上的某些原因，1926年在莫斯科時，他同陳紹禹之間發生了衝突；陳紹禹又名王明，是斯大林主義者帕維爾·米夫所豢養的首席應聲蟲，也是列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黑手黨名單中的第一名。王明一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宰，他便誣告俞秀松是「托派」。1937年12月10日，新疆政府受蘇聯內務部指令，將俞秀松逮捕，1938年夏押去莫斯科，1939年2月21日被槍決。⁶³（譯者注：俞秀松的犧牲日期據1996年6月俄羅斯檢察院給安志潔的「平反證明書」。）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我將其簡稱為青年團），是在1920年7月中旬，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建的。創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為培養未來人材的一個基地，但青年團的活動與黨的關係是保持着比較獨立自主方式的，因此，青年團也有它全國性的實際使命，具體地說來，直到1920年

63 1925年秋初大約有三十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到達莫斯科，並在那裏接受政治和思想培訓，培訓時間兩年，他們不像先前留學莫斯科的同志們那樣，由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負責，而是由新建立的孫中山大學負責培訓的，中山大學牢牢掌握在斯大林主義者米夫的手中，他很快便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無可否認的是這裏提到的米夫對左派反對派是刻骨仇恨的，而對由斯大林篡改過的所謂「列寧主義原理」則是百依百順。米夫本打算要把俞秀松這樣的一批人引入歧途，但失敗了，而這批人是屬於少數。以王明為首的多數急忙向米夫獻殷勤、百般奉承。米夫對他們深感滿意，不久後便把這批人美其名曰「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1927年頭七個月，王明是在中國度過的，他擔任米夫的譯員和辦事員，此時的米夫突然被斯大林任命為中共問題專家。之後，王明又回到蘇聯去，逗留了約兩年多。1930年，實際上是根據莫斯科的明確命令，而李立三執行的冒險主義路線失敗之後不久，王明又回到中國。1931年1月，在令人不齒的特殊條件下，王明攫取了中共的領導權，這個陰謀完全是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黑手黨的合作下，特別是在他的主子米夫支持下實現的。然而，1931年底起，王明又前往蘇聯。這次他逗留的時間共有6年，仍然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1935年1月，事實上，他的位置已被毛澤東所取代，毛成為中共的實際領導人。但王明是否意識到，他對當時中國的每天現實生活早已被切斷了呢？

在王明竊取中共領導權的時期內，另一個陰謀人物康生，成為他的最忠實的盟友。這個康生於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專門接受斯大林主義有關格別烏各種陰謀伎倆的訓練，正是在這個最可靠的朋友陪同下，王明於1937年重又返回中國。然而，在他決定取道回延安之前，王明和康生兩人，曾在新疆首府一烏魯木齊生活過若干星期。那時他們以工作為藉口，要在新疆解決中共與當地小軍閥的合作問題。他們意在肅清或者聽任肅清一些中共黨員，不幸的是這些黨員中例如俞秀松這樣的人正是他們心目中最厭惡的人。康生一經到達延安後，用不了多久，他就覺察到，為了個人利益，就必須拋棄王明，轉而為毛澤東服務。但這已屬於另外一段歷史了。

9月，它的使命是為上海團委，亦即為創始者團委提供九到十名成員。實際上，上海團委儘管支援過共產主義小組聯絡網，但不可能比它擴大得更快，而且只有在各級學校復學之後，在學生們結束了暑期生活之後，才能逐漸地成長擴大起來。

然而，令人感到異常好奇的是：唯一的一個團委，而是北京團委，或北方團委。其他的團委，例如浙江杭州團委，安徽蕪湖團委以及湖南長沙團委，在1920年的7月至9月依次先後作為團委的雛形而成立了，看來這三個團委只是為了增援上海團委的，卻被上海團委於1920年9月至11月間所吸收而融合在一起了。為甚麼會是這樣呢？讓我們來看一下事實的經過。

1920年7月底左右，正值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或者說在巴庫代表大會，亦即「東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大約一個月左右，列寧及其同伴們，已經完全意識到除歐洲之外，世界各地潛藏着無比巨大的革命可能性，他們認定必須刻不容緩地把一批原居於烏拉爾山以東地區的先進青年輸送到俄國來，估計這批青年是能夠前來的，為的使他們獲得大量適應於20世紀水準的、能反映政治理論的知識，因此，他們決定在最短時期內、在莫斯科創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開始時，列寧還僅僅看到，這樣的學校只應該適合於保留在其領地以內的蘇維埃國家，或已經回到蘇聯的前沙皇帝國的東方各民族。但當列寧的同伴們向他提出，最好的辦法還應該把這樣的學校向所有東方國家的青少年開放，其中包括朝鮮、日本和中國，列寧立即採納了他們的意見。

創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決定一經作出，陳獨秀便從維金斯基那裏得到訊息。陳獨秀一經接到通知，便完全信託楊明齋到漁陽里六號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主辦的外國語學社去進行組織工作，與此同時他着手以口頭通知或寫信方式，以極其迫切、興奮心情要求杭州最知名的共產主義者陳望道，獨秀的朋友、時任蕪湖公立中等學校校長的高語

罕，長沙共產主義者的中心人物賀民範，北京共產主義者主要領導人李大釗，據我的設想還有獨秀認識的，有一定威望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以最快速度物色盡可能多的社會主義青年，要他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前來上海，準備動身到莫斯科去。

然而正當陳望道、高語罕以及賀民範毫不費勁地分別說服了幾乎是全體由他們培育起來的青年，使他們懂得一個年輕共產主義者，必須到蘇俄去，在十月革命的英雄學校裏學習二到三年時間，作為第一任務和最高要求時，而李大釗卻無法使他的任何一個學生理解到這一點。事實上，華北的社會主義青年，可以說毫無例外，或者剛剛在國立北京大學畢業，或者正要畢業了，這所高等學校從來就沒有停止上課。談到去國外留學或定居時，他們顯然是要到西方國家去，這個思想是無法改變的，例如到法國或美國去。其結果是：當北京仍然保留着幾乎是整體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委時，而所有已經開始形成自身團委的杭州、蕪湖、長沙三地的青年團員則富有激情地暫時轉移到上海，（因此在 1920 年 9 月中旬到 11 月初之間，上海團委內的實有人數已經增加了三倍）。

1920 年 9 月初創建的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屬下的外國語學社，只在 1920 年 10 月中旬，才向第一屆學生敞開大門。但到 1920 年 11 月初時，如果把全校所有的人數合計起來，並包括遲來者在內，看來已不少於二十九或三十人。其名額分配如下：來自湖南的十六人，來自浙江的七或八人，來自安徽的四人，江西一人，上海本地一人，但北京連一個都沒有，其中原因我在上文已經談到過了；也沒有來自湖北或廣東的，其理由很簡單，那時武漢和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甚至還沒有形成。來自湖南的年輕人，幾乎每一個都經過賀民範認真而又嚴格地挑選出來的，他們出身各不相同，情況也並非是清一色的。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兩小類：一類叫做「老資格者」，其中包括四位一體的「四重奏」，那就是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他們到達上海已有八或九個月了），

也包括兩駕馬車的「二重奏」，他們是李啟漢和陳為人（他二人到達上海已有五或六個月了）；另一類或可叫做「一年級新生」，其中包括所謂「三張同花牌」，他們是黎冰若、彭述之和阿江（他們到達上海僅五或六個星期），還有所謂七人一體的「七重奏」，他們是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蕭勁光、彭禮何、阿彭和阿吳（他們到達上海僅兩或三天）。來自上海本地的這個年輕人，叫做抱樸。他跟以羅亦農為首的「四重奏」一樣，是上海工讀互助團裏的先驅分子，因此也屬於「老資格者」之列。但這位抱樸沒有（而且始終沒有）擺脫與無政府主義的瓜葛。來自江西的年輕人叫做傅大慶，來自安徽的四個年輕人是韋素園、曹靖華、蔣光赤，另一位的姓名直到現在我講述時仍然無法記起來；此外還有來浙江的七或八個年輕人，他們是王一飛、韓百樺、謝文錦、華林、天底等，這幾個年輕人與「老資格者」相反，卻幾乎跟黎冰若、我（彭述之）以及劉少奇一個樣，都是新來的成員，來到上海後還不到兩個月，每個人都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戰士，因此，當然是屬於「一年級新生」這個檔次了。

非常明顯，我們都歸屬於青年團，青年團規定外國語學社的學生，首先都要作好準備，以最大限度延長在蘇維埃國家的逗留時間，也正因此，必須充份利用六天工作日的大部份時間，即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要學習語言和思想理論方面的基本課程，而楊明齋和他的朋友波克則須連續不斷地給我們講課。但是作為青年團員，特別是青年學生，是否理所當然地，除了上課之外，同時還要根據上海市青年團的指示來完成必須的任務呢？例如要完成作為一個忠實活動分子必須完成的起碼工作；要完成起碼的宣傳工作來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呢？啊！說起來慚愧，我們卻沒有完成應盡的職責。當時我們要做的一切，是利用星期天召開所謂教育性質的會議，這是向路過上海的各省年長者和同志們敞開的，在會議期間我們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從來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有時則

在這樣或那樣的地點，在這樣或那樣的期限內，所討論的僅僅是明確規定了的，而且非常具體的這樣或那樣的活動。

在星期天舉行的大會期間，使我們有機會與青年團上海團委的四名團員建立了比平時較為深入的感情關係，他們都不是外國語學社的學生。這四個人中的一個就是陳望道的助手俞秀松，他的情況，上文已經談到了；另三人是馬念一、包惠僧和柯怪君。馬念一在我看來是相當平凡的，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我有充份機會覺察到包惠僧是個朝氣蓬勃的人，而且也頗有周旋的能力，在他離開我們之前，便想到廣州去試一試身手，以便追隨在陳獨秀之後。柯怪君是來自安徽省的小青年，是蕪湖公立學校的前校友，同樣是高語罕送到我們這裏來的。「怪君」無疑是他的名字，他認為取名字離不開怪字，或者說「怪裏怪氣」可以裝扮自己，卻料不到這樣一來留下的卻是令人困惑不解，使人好笑。但他馬上就拋棄了這個名字，而代之以不那麼怪裏怪氣的名字，叫「慶施」。再加上他的姓，就變成了為大家所熟知的柯慶施了。他一生中處處提防，使他在長期內永不離開他所熟悉的長江下游地區。1955到1958年間柯慶施登上了令人欣羨無已的上海市第一號人物寶座（上海市委書記），緊接着便進到毛澤東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1965年4月9日，柯慶施的年齡僅六十多歲，因暴病身亡，距離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約半年光景。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早先提到過的話題上來，為甚麼一旦不把外國語學社計算在內，青年團上海團委不過是形式上的存在；對於我們未滿二十五歲的上海這部份青年團員來說，為甚麼未能爭取完成應盡職責，其中有甚麼理由嗎？理由有四個：第一，他們知道在兩個月內至多在三個月內，就要離開上海前往蘇俄，並在那裏學習兩年或三年，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無道理地認為，實際上我們沒有時間按照上海團委的指示，來執行名副其實的政治活動，不管這些活動內容是多麼有限。第二，我

們當中一部份人自認不論年齡或成熟程度，都已夠條件可以歸屬到另一種團體中去，也就是在最近將來歸屬到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的行列中去，而不是臨時地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個組成部份。第三，在我們當中幾乎有五分之四的人不會說一句上海話，即使能夠懂得運用普通話，我們也感到生活在上海社會裏，也是無法自由自在地開展活動的。第四，我們的工作並不是領導上海學生，而是領導上海工人的，因此我們當中能夠聽懂上海話或者能勉強說幾句上海話的人，自從 1920 年夏天，或從《勞動界》週刊創刊以來，才決定力圖突破這個缺口。

我跟三位共同生活的夥伴黎冰若、阿江、傅大慶相處得非常融洽；在這三位夥伴中，我最喜歡的仍然是黎冰若。但遺憾的是，1921 年初黎冰若未能跟我們一起動身前往蘇維埃俄國；而且後來在我們之間彷彿是命運注定了似的，除了一次之外，幾乎都是擦肩而過，這一次是在 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發動事變之後不久，在廣州相遇，但也僅僅是一個極短時期。

我跟來自浙江和安徽的同志們，同樣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儘管在整整一年內，他們遠未要到莫斯科去作一次令人嚮往的旅行。他們都是新來的，在行動上不能不是怠慢、鬆懈些；但他們之間相處得很協調、和諧。另有一位也是浙江人，名叫天底，自從 1920 年 10 月以來，我便同他結成了如同與黎冰若那樣坦率親密的友誼。天底也是我們這批人當中的一個，仍以漁陽里六號底層房間作為宿舍和食堂的。人極像俞秀松那樣，以其最大的可能，僅次於俞秀松完成了外國語學社的課程。但在我的眼中，天底最值得稱頌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詩人。當他一有空閒時，常常來到我們中間，要我們同他一起寫詩，他寫的是白話詩。然而，他與黎冰若一樣，1921 年初未能與我們一起到蘇維埃俄國去，待到 1924 年底，當我剛從莫斯科回來時，希望能重新找到他的行蹤時，不幸已不知他的去向了。1926 年，他肩負着發動農民運動的使命回到家鄉。但於

1927年遭到了蔣介石及其同謀、幫兇派來的僱傭軍所槍殺，藉口是要在全國各地「重建秩序」。

同樣地，我也安排出時間與李啟漢、陳為人以及抱樸建立了友好關係，李啟漢是這三位「老資格者」中最能表示出熱情來歡迎我的人。但從那時起，為甚麼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這四位「老資格者」拒不與我講話呢？自從我來到上海以來，有甚麼確切理由使得他們如此地排斥我呢？我對他們犯下了甚麼大逆不道的事呢？實際上我從沒有見到過他們，除了我們共同的老師賀民範對我談起有關最令人嚮往的社會之外，我也從來不認識他們。

儘管我從心理上推測，也帶點純樸天真的設想，但我也應當花些時間來解開這個小小的謎底。我同樣到他們那裏去。然而，我同以羅亦農為首的四位一體之間所發生的事，簡單地說來，那就是在我的身後，即當我還在教書時，曾有過一段難忘的往事：為了要積極參加由王光祈在北京創辦的工讀互助組的戰鬥行動，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只得在1920年初中斷了他們剛剛開始的中學生活。他們不願支持我的唯一原因，是他們對於我，以及對於同他們年齡相差不遠而比他們更富有教養的人，都懷有一種令人厭惡的自卑感。在這方面，給他們帶來最氣憤的事是，僅隔幾天之後，我就被推薦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去，不久，我還被指定成為已經開展工作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的第七名成員，而羅亦農他們四人呢，大家並不認為，而且也從來沒有認為值得把他們吸收到研究會中來。

正因為羅亦農及其三位夥伴如此地對我冷眼相看，顯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就是說在1920年11月初之前，我曾受到了只能以他們為代表的、湖南籍社會主義青年之家近半數人的冷遇，而這個青年之家，我原本就是其中一員。實際上，我不僅僅遭到了如同一般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特別因為我成了我的八個「同鄉」中四個人所敵視的目

標，因此，我勢必經常感到局促不安，有時候不免有點孤獨感，但是到了1920年11月初，劉少奇和他的六位夥伴到達上海了，湖南籍社會主義青年之家的成員，一下子從九人增加到十六人。僅在幾天之內，我的處境倏地改觀了：我重新找到了怡情悅性之所，在自己人中間也不再是山窮水盡，而是喜氣洋洋了。

與此同時，這七位遲來的新戰士，是乘船來到上海的。實際上，賀民範早已在信中一一給我介紹了，為了使他們不至失望，一當他們到達上海後，我就負起照顧他們生活的責任。首先，我向他們介紹了外國語學社的校風和日常的生活習慣，並千方百計為他們找到了離漁陽里不遠的一所出租住房，這房子有三、四間小房間，租金低廉而使用方便。我幫助他們安頓下來後，便發現他們當中的為首者劉少奇，是一個傑出的小夥子。我對他深表好感，而他對我也頗情深。我們兩人很快就結為朋友。但當時，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仍然堅持裝出一副不理睬我的樣子，他們對於由賀民範派來的七名新戰士很快成為我的好同伴，深表不滿；不久後，便在我的背後大發議論，向願意聽他們說話的人瞎扯我打甚麼主意，企圖利用我的所謂知識分子優越性，要迫使人承認我是所有湖南人的領袖，而這些湖南人正在上海等待、要動身到蘇維埃國家去接受長期培訓的，但這於我又有何損失呢？

劉少奇當時剛好二十歲出頭，風華正茂，而且又是如此的沉着冷靜，那六個比他年齡更輕的好同伴，便自然而然地認定，並且把他視作他們的領袖了。劉少奇是長沙第一中學的老校友，高中畢業後，又有機會讀了一、二年的補習課。儘管他受教育程度並不很高，但他的認識水準和理解力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他謙虛謹慎，反應靈敏，彬彬有禮而且和藹可親，每當聽人講話時，總是聚精會神、十分專心。因此，不論身處任何環境，他都能輕鬆如意地與別人建立起良好關係。他有他待人接物的好辦法，人們不可能說他是個陰謀家，相反地，會說他是個相當認真嚴

肅的人。他不輕易承諾，但一經承諾了，必定照辦。他與六個同伴中的多數人一樣，原籍是由三或四個縣組成的地區，這裏原來是以長沙為首府，而長沙同時又是湖南省的省會。我不知道他究竟是那個縣人，但根據他的話音，只能猜測。他說的官話，顯然是長沙官話，絕沒有北京官話那麼純正。但不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他比羅亦農說的，比我說的，仍然文雅得多。更加清晰，更加明白易懂，因為羅亦農說的是湘潭方言，我說的是寶慶方言。

總之，隨着時間的消逝，劉少奇與我之間更加相互了解，我經常到他的住所去拜訪。他對我也異常信任，信任到每當他急需解決有關理論或實踐問題，而當這些問題是十分棘手時，他總免不了要來徵求我的意見，甚至採納我的意見。

1917年我正在隆中鎮第二區任教時，羅雲慶介紹我認識了一位與他是同一代的人，而且身份地位也相當，當然是羅雲慶的好友之一，他名叫李振鏞（Li Zhen'e），我很快被他吸引住了，而且對他深感欽佩，他家鄉跟我出生的地方毗鄰，是一位經營清漆、天然漆和塗料商人的兒子，19世紀末期，這位商人在長沙設有商店。不久之後我對他懷有深深的情愫。一兩年中，我們幾乎經常見面。在那英雄輩出的年代裏，他參加了同盟會，也因此參加了辛亥革命。後來在一段很短時期內，他曾擔任過湖南新化縣的縣長。我之所以喜歡與他為友，因為他學識淵博，精神境界開闊，而且思路敏捷，文采斐然。從他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接着，我們曾失去一段時間的聯繫，但當1920年9月在長沙重逢時，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多麼高興。我們兩人再一次恢復了長時間的談話。當然，我對他毫不掩飾，我說我已經接受了在他看來毫無吸引力的「集產主義」思想，因而也不隱瞞我已決定前往上海，並準備好作一次蘇維埃俄羅斯之行。出人意料的是，他遠沒有反對我心中織成的圖景，相反地卻勉勵我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甚至當我離開長沙前赴揚子江口的雄偉都市的前

夕，他還贈送我一首富有他自己風格的白話詩。

儘管在我心中，對李振鏢是懷有好感的，但他畢竟不屬於我深交知己的朋友範圍裏。當我離開長沙之後，我感到沒有必要，像對賀民範以及羅雲慶那樣要繼續保持聯繫。然而，他相當關心，很想知道我在上海是否能從生活困難中擺脫出來，他便向羅雲慶打聽我的消息。為了幫助我能實現理想，在取得羅雲慶的同意之後，便給他所認識的一位在上海頗具影響的人寫信，他在信中談起了我，提供了我的通訊位址，並要這個人以他本人的名義給我送 30 塊銀洋，並在信中把我介紹給他。他認識的在上海的這個人，也是湖南人，雖然同是姓李，但與李振鏢並非親屬關係，這位姓李的曾擔任過官職，1918 至 1919 年間，他是安徽省安慶縣縣長，羅雲慶是他主要的參事之一。現時，他在上海經營工商業，他還有個弟弟，是復旦大學學生。自從他收到李振鏢的信後，曾連續兩次派他的弟弟來看我：第一次為了試一試我是否就是李振鏢所託的人；第二次他便把李振鏢的 30 塊銀洋交給我，並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邀請我到他家裏去看望他。

儘管別人已經告訴我，這位尊貴的李先生，決非生活困難的人，但當我去拜訪他時，親眼看到他擁有這份非常可觀的財產，擁有自己的住宅，不免有些吃驚。他自有的住宅坐落在戈登路，流螢飛彩，富麗堂皇，可說是上海最漂亮的住宅了，單宅內的普通會客廳，就非常寬敞，同時可容納一百多位賓客用筵。那時，我真無法理解，共和政體建立之後，安徽省的一個小小官職，居然能有權裝滿自己的錢包，簡直像清廷皇室時期的前輩們一樣，豪華闊綽，擺出一副貴族氣派；這位李先生還有一個機警靈敏的頭腦，把他積聚起來的大部份資本，投放到工廠中去，這工廠建立在武漢，專門生產棉紗和棉織品，而且企業紅火、生意興旺。

但很明顯的是，這位新貴的文化修養是相當平凡的，他在接待我時表現出來的親切和善態度並不純正。當他讓我坐下時，我發覺他對我頗

有不信任感，經過李振鏗以及他弟弟的介紹，實際上他應該完全了解我，了解我屬於哪類人。儘管他對於我曾在湖南山村深處，曾在由知名人士羅雲慶所創辦的高級小學裏，擔任過三年教職，並得到好評的教師一事，表示滿意。但他對我作出決定，要到蘇俄去繼續學習，就毫不感興趣。接着，我向他表明，這遠不是拋棄我那不同尋常的計劃，相反，正是為了實現我的計劃，這才到蘇俄去學習俄語。聽完了我的話後，他未免有點戰慄起來，儘管想盡辦法克制，但仍然克制不住，等到他完全鎮靜下來，這才親切地對我說：動身前往蘇俄，無疑是不錯的，同時也是很好的設想。但是，年輕的朋友，你既然已經下了決心，要到國外去留學，為甚麼不到美國去呢？我相信，美國要比蘇俄好，無論根據甚麼觀點，美國要比蘇俄好得多。

這一次，我要略使一下外交辭令，盡量克制不向這位尊貴的先生暴露出他所預感到的、我雖沒有參加組織、但必定是共產主義者的真情，因此我沒有向他表明這個身份。然而弄巧反成拙，我告訴他如果旅居美國，情況卻大不相同，美國的費用大得驚人，而旅居蘇俄則可以百分之百的得到免費，這個因素不得不使我加以考慮，因為我身無分文。這位尊貴的李先生，聽了我的回答後，則欣喜若狂。他向我保證說，如果我旅居美國所存在的問題，真是屬於經費問題，這對他來說簡直像小兒遊戲，既能輕易辦到，又是賞心樂事，他說完全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在好長一段時間內，我只能報以微笑，卻說不出一句話來，接着，我含含糊糊地說，他對我提出的這個建議，還需要好好地考慮一番。這位可尊貴的李先生，在這個問題上，他始終堅持，他是很樂意支持我的。當然，從此以後，我便提高警惕性，再也不不想去看望他了。

生活能經得住歷史考驗嗎？當然，也唯有歷史本身，才能說明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2月間，我在上海共產主義運動以外的生活情況。我聽不懂上海話，甚至連一句也不懂。我的所有財富只不過是少量銀洋，

這還是在桐城的友人以及好心的李振鏑所贈的，我要在生活上表現出特別的儉樸節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由於我有願望要徹底地重新思考這個世界，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光照之下，以及希望我在旅居莫斯科時能獲得教益，我就不懈地工作着。那時，我在上海怎麼能有時間憑興趣在上海的馬路上閒蕩呢？上海共產主義運動所接觸到的範圍是特別狹小，而周圍所籠罩着的氣氛也是特別激動和熱烈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應該承認我寧願閉門不出，因此，特別是對於我來說，沒有任何可能去享受個人私生活。

第七章

上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與實踐：走向勞動界，
反對改良主義，批判
無政府主義

如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作一比較，二者是很不相同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學術研究會」是公開的，而且帶點學術性質，總之，在組織上是比較鬆散的。對會員的要求也不那麼嚴格，他們並非都是共產主義者，只要具有進步思想都可以參加研究會。因此，通常前來參加研究會的多數人都是屬於這一類人。與此相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帶有選擇性，對會員的限制很嚴，因此會員人數不多，就是要經過精心挑選的，全體會員都必須是信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就是先它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研究會本身來說只不過是有關理論問題的工作討論會。

我確信，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創立的日期是1920年9月。我本人在1920年10月加入的。實際上，當我在上海定居下來不久，陳望道便要我參加了。他向我解釋說：這就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告訴我，李漢俊、李達、楊明齋、俞秀松、李啟漢以及他本人都早已參加了，他問我是否願意成為研究會的第七名成員，我立即答覆他說，我當然願意的。我是一個新來者，具有年輕人那種充滿熱情的特點，當我第一次參加研究會會議時，竟敢冒昧地向同志們提出一項有關工作方式的建議，同志們不但沒有拒絕，而是認真地加以考慮。

不久後，劉少奇繼我而來到上海，我向研究會的同志們談起了劉少奇，誇獎他為人正直誠實，堅定可靠，總之，我向同志們推薦了他。同志們也就贊成了我的意見。就這樣，從1920年11月中旬開始，我們不再是七個人，而是總數八個人組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中四人代表着「老資格」的一代，他們是李漢俊、李達、陳望道和楊明齋，另外四人代表着「年輕」的一代，那就是俞秀松、李啟漢、彭述之和劉少奇。

研究會每星期研究一次，在每次集會之前，我們務必反覆認真地閱讀一系列論文、小冊子或大本書籍的片段。會議中，首先由我們提出對所讀文件的系統分析，然後由陳望道、李漢俊或李達發表綜合性發言，每次會議都是這樣結束的。

我們的研究課題可分為兩類，或者是輪番進行，或者同時進行：一類是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另一類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第一類課題時，我們可以運用兩種著作以及若干雜誌上的文章，在研究第二類課題時，我們只能運用一種著作，即考茨基的作品，中文標題為「馬克思資本論導言」（或「馬克思資本論介紹」）。考茨基的作品在中國有兩種譯本，其一是戴季陶譯的，以連載方式，發表在《建設期刊》上，對此上文我已談及；其二是袁銓（Yuan Quan）譯的，同樣以連載形式發表在北京《晨報》的副刊上，但袁的譯本後來以單行本的形式再版發行。我們使用得更多的是這後一譯本，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更實用，更容易查閱，第二更加完整。

對於我們「年輕一代」的四個人來說，要領會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掌握其基本原理，倒不需要花很大力氣，然而使我們迷惑不解，有時不免要為之驚異不已的卻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商品」、「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剩餘價值」、「貨幣系統」以及「擴大再生產」等等就是如此。儘管這些概念，對於我們來說是全新的、難以理解的，有時甚至聽起來有點稀奇古怪的，但是要使這些概念不至於永遠停留在「完全陌生」的階段上，我們必須要為這個課題付出更多時間來同我們當中的那些「老資格」，進行極其認真艱苦的討論研究。當然，這是無法避免的一個過程。因此人們至少可以說，課程的學習十分艱苦，正是在這種情況，我唯一的安慰是：我們的「年長者」認為我在四個年輕人中，還是比較容易地從《資本論導言》的迷宮中擺脫出來的一個。

每當我們從事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時，李達是我們的學習主持人。

但一當轉到研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時，李漢俊就取代李達成為我們學習的主持人。李達和李漢俊兩人是博學多才的，他們真正懂得辯證法，同其他人作比較，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1921年春便停止了活動，因為需要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準備工作，這就給研究會的所有成員，特別是給李漢俊和李達兩人增加了大量的額外工作。

1920年8月15日，是《勞動界》週刊創刊的日期，這日期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建團日期要晚一個月，卻比《新青年》月刊復刊日期早十五天。

《勞動界》週刊是為哪一類人服務的呢？首先是為工人，同時也為一切勞動界的人服務，總之是為所有上海的工人和勞動者服務的。

《勞動界》週刊所包含的內容可分兩類文章。文章的性質既有一般性的，也有富於教育性的，而且這些題材在中國來說都是非常新鮮的，例如關於人剝削人的題材，物價起落與工資調整的關係，剩餘價值的形成和使用的方式，作為推動整個社會發展動力的階級鬥爭，以及有必要建立無產階級自身的工會系統等等，所有這些題材和文章，都是由我們當中的「老資格者」，特別是由李漢俊編寫。這些文章的特色應是十分具體的，能切中要害、又生動活潑、耐人尋味，並且是與上海勞動界確曾發生過的事件密切相關的。因此撰寫文章，應當按照人們曾經在那裏生活過的，受過磨練的，或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作過鬥爭或應當着手作鬥爭的方式進行。所有這些都有必須建立在調查基礎上，而調查應具有高度的覺悟性，應為工廠企業中的被剝削者或居民區中陷於極端貧困的勞動者利益而服務。

在我們當中都是哪些人來進行這項工作呢？是青年團中三位「老資格者」，也就是三個湖南人，他們既有時間也有長處，特別是在「上海話」方面，他們經過學習、鍛煉，能夠聽懂上海話，並且還能馬馬虎虎

的說上幾句，這三個年輕人就是李啟漢、陳為人和袁達時，參加調查的還有他們的好夥伴羅亦農、卜士奇和吳芳，儘管這三個人參加的次數較少，但不失為一臂之助。自從青年團建立之後，也就是說，自從1920年7月15日以後，這三個年輕人中的領導者，一直就是那個堅韌不拔、立場堅定的李啟漢。他們深深地感到，既然已成為共產黨人，那就應當在最短期內，與上海無產者取得經常而具體的聯繫。從那以後，他們便在一些工廠周圍轉來轉去，不論夜晚或清晨，利用工廠關門、工人離廠時候，或交接班、停工休息的時候，他們都在等候工人，旨在與工人們建立關係，設法同他們進行一般性的，實用性的或娛樂性的交談，引導工人談談他們的工作，車間工廠的勞動條件；談談他們的工頭和老闆，他們的工薪，工傷事故的風險，以及經常可以發生的疾病和死亡一類事。簡言之，就是同他們交換肺腑之言，如有可能，要結識幾個工人，同他們交朋友。就這樣，他們逐漸深入到人口稠密的工人住宅區的核心中去，在那裏他們受到了接待，在那裏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終於發現了上海工人日常生活的悲慘情景。正是大部份依靠他們深入實際調查回來以後，所整理出來的筆記材料，才使第一期《勞動界》週刊得以編成。如果沒有他們及他們的材料，《勞動界》週刊就不可能與讀者見面。如果沒有他們，週刊也不可能繼續下去，因為事實證明：《勞動界》週刊創刊以來，已經存在三個月了，唯有他們才能進行調查，而調查也證明了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也唯有他們才能使《勞動界》傳播到無產者中間去。

《勞動界》週刊曾否取得了成績呢？當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第一，因為刊物上使用的語言，明白易懂，只要能高聲朗誦出來，即使是沒有文化的人，也能聽得懂文章的內容。第二，還因為這些文章富有普遍值得關心的問題，可使這些不幸的窮苦人經過輾轉相傳之後，重新喚起他們的自尊心，堅定了他們的自信能力，甚至激起他們的滿懷希望；所有這些文章還能向他們表明：社會上巨大財富都是由他們自身，協同

全國其他大城市的弟兄們創造出來的，使他們學會並且懂得在全世界特別是在日本、北美和西歐，還有無數百萬的同志，像他們自身一樣都有自己的敵人，他們繼續不斷地同敵人作鬥爭，迫使敵人後退，揭露他們的無恥罪行，終於換來了1917年俄羅斯無產階級所取得的勝利，這次革命勝利的前景，是向世界全體無產階級敞開着的，就是走向正義和自由的王國。但從本質上來說，《勞動界》週刊之所以受到歡迎，還可以說明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週刊上的文章，與當地工人的利益、與主要的課題直接有關，更不用說同個人的利益休戚相關了。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從以下的事實中得到證明。

大約在1920年8至9月間，幾名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向上海幾百個工人出售或贈送《勞動界》週刊時，工人們便開始閱讀了，但意想不到的，他們深感驚奇。正是這份雜誌中他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讀到了他們自己，從雜誌中他們第一次認識了自己像高保真度的鏡子那樣照出他們原來的、沒有扭曲了的形象，難道不正是這樣嗎？這份雜誌使他們重新看到自身生活上的悲慘情景，雜誌如實地描繪了他們的內心苦衷，正確地表達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憤怒呼聲。《勞動界》週刊為他們喊出了這種無比鮮明的呼聲，這種呼聲也正是被傷害者、被凌辱者、被壓迫者在長期被迫默不作聲時期內所要喊出的呼聲——當然那時他們還不可能喊出這樣的呼聲的。但既然這份週刊是為了他們而創辦的，那麼理所當然地使他們感到，他們也應當為這份週刊做出一些貢獻，以便使週刊變成了由他們自己辦的刊物。在週刊創辦之前，李啟漢及其同伴們深深感到，要進行調查工作是頗有難處的，理由是不能不引起他們在其周圍轉悠的那些工人們的懷疑或不信任。週刊創辦以後，他們逐漸地感覺到，情況已經不一樣了，每當他們把刊物帶給任一工人，或者在工廠門外散發時，他們已經取得了工人們的信心。而現在用不着這樣做了；工人們早就比他們先到。好幾個月來工廠大門一直緊閉着，現在卻經常敞

開，甚至用不着再敲門。而且還經常發生這樣的事，即刊物的內容，工人們事前已經討論過，每當他們出現在工廠附近時，工人們就向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勞動界》週刊得到最初幾批讀者的熱情支援之後，越辦越好；刊物越是辦得好，越能吸引一批新讀者，正因此，這份刊物辦得更加出色了。換句話說，這是一份在不斷前進中的刊物；頗富「吸引力」的刊物。李啟漢及其同伴們由於這件創新之舉而興奮到極點，但同時也因此付出了不斷增加的艱辛勞動而感到過度勞累。他們在完成了楊明齋的課程後，便箭也似地飛出了外國語學社，從那時起，楊明齋便讓他們自由自在，差不多在所有這些日子裏，李啟漢他們不是到印刷廠去編完最新一期的《勞動界》，便是到工人住宅區的現場去。他們一門心思，目不斜視地編、印刊物；也可以說，此時的他們似乎專為着編、印刊物而生存。我着實對他們羨慕不已。

《勞動界》週刊並不是把引導上海一批無產者，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作為唯一目的，這份週刊曾經胸懷大志，決定要把這批無產者組織起來，力圖在上海建立勞動者工會，建立只是屬於勞動者的工會。在這批無產者中間，有一個叫做李中的，可以毫不懷疑地說，他是一位最大膽、最英勇不屈的工會工作者。

李中是一位機械修配工，當兵工廠建造或更新船舶時，他的工作就是維修或裝配機器。他給《勞動界》週刊寄一封信，《勞動界》於1920年9月26日那期上發表了那封信，標題是「一個工人的聲音」，他在信中慷慨激昂地向他的階級兄弟發出呼籲，要求團結起來，行動起來進行鬥爭，他還在信中號召他的階級弟兄，要在全中國範圍內形成一個龐大組織，這組織是具有無可抗拒的力量，他還要求他們能在無產階級聯盟內部，充份發揮作用，不言而喻，未來是屬於這個世界聯盟的。自從《勞動界》發表這封不同尋常的公開信之後不久，李中便在他的兵工廠裏建

立了機械工人工會，儘管工會的規模不大，但其最大功勞在於，中國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第一個屬於工人的正式工會誕生了，儘管如此，李中仍不以此為滿足。由於在《勞動界》週刊工作的朋友們牽線搭橋，李中與電廠工人、鑄造廠工人以及多個紡織工廠機修車間的工人建立了關係，並在不久後創辦了以兵工廠工會為核心的上海機械工人工會，1920年11月21日，他成為了工會的主席，會員人數接近四百人了。

然而，走上由李中為階級弟兄們開闢的工會道路的，並不僅僅是機械工人。當1920年尚未結束時，擁有一千以上會員的印刷業工人的正式工會，加入了上海工會的行列。1921剛剛開始時，紡織業部門的工會也宣告誕生了。最後說來，一個符合於20世紀水準的工人運動，一個富有堅定革命精神的工人運動，已經在順利地進行中了，換句話說，工人運動已經在揚子江畔的大都市裏嶄露頭角了，這時也正是外國語學社的同志們以及我本人離開上海動身前赴蘇俄的前夕。根據我在暗地裏分析估計，1921年1月1日，一個幸運的機會必將出現。

那天，果然不出所料，《勞動界》週刊的編者和調查研究者、邀請所有自1920年8月中以來在無產者中間作出貢獻的同伴們，跟他們以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其他黨員們，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一起，假復旦大學大廳慶祝新年的到來。一部份通稱為雙手結滿老繭的工人同志們也接受了熱情邀請，我們的總人數是一百多人，集合起來參加他們的小型「友好會議」。在這次扣人心弦的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工人的大會上，李啟漢是主持人，並且也是他發表了開幕詞，由陳為人負責提出了工作報告，開幕詞和報告後來都在《勞動界》週刊上發表，所有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

以《勞動界》週刊為代表的這種接近工人階級的方法方式，已經感受到了她在上海所取得的成功，因此，用不了很久時間，我們那些在中國其他大城市工作的同志們，便根據自身條件，也採取這種方式出版了

《勞動者》。而在北京，李大釗、鄧中夏以及若干其他同志，於 1920 年 11 月 7 日創辦了《勞動音》。最終說來，這種活動方式不只是在上海顯示出它的靈活性，而且更明顯的是，革命知識分子的職責已經轉向了無產階級，要去喚醒他們，可以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正是為了要全心全意地履行這個職責，自從 1920 年 5 月初以來，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中的年長的或比較年輕的黨員們，始終以優先的方式，不斷地彼此聯繫，而且繼承俄國布爾什維克傳統，沿着正確的方向，他們所要履行的也就是這個共產黨人的職責。

然而，我在上面談到的那次在復旦大學舉行的、有共產黨人知識分子和同情共產黨的工人參加的、激動人心的小小集會之後僅僅三個星期，《勞動界》週刊便停刊了。1921 年 1 月 16 日那期《勞動界》週刊雖然仍有出售，但已是最後一期了。情況之所以如此急轉直下的原因，首先是由於第一位領導人陳獨秀，自 1920 年底以來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力量便受到了削弱，其次，在 1921 年初，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動身前往莫斯科去留學，實際上，又給予一定程度的打擊，無需懷疑，在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行動領域中，便遭到了更大的打擊了。

1921 年 1 月，李啟漢跟黎冰若和天底一樣，最後決定不到蘇聯去，儘管他們的理由是各不相同的，李啟漢深深感到，他本人早已同上海工人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他要為奪取工人運動的勝利而鬥爭，他這種願望的強烈正如我們投身到蘇維埃國家去的願望一樣。因此，他留在上海了。但是，得不到陳為人和袁達時的幫助，他一個人怎麼能把 1920 年 8 月中以來所有的工作都挑起來呢？也就是說怎麼能每隔一週把新的一期《勞動界》週刊的裝訂發行和傳遞工作都完滿地完成呢？

儘管他的《勞動界》週刊已經在讀者面前消失了，但是李啟漢在 1920 年的頭七個月中，充份顯示出他的才華，能把一批逐漸而又穩妥地增加起來的上海工人，吸引到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的軌道上來。正是

李啟漢這個人物，在 1921 年夏末，出色地協助陳獨秀創辦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鼓舞和協調全中國無產者進行鬥爭的組織，她一直十分完滿地履行她的使命，直到 1923 年「二·七」事變發生為止。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在 1921 年 7 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正式建立的，但當陳獨秀於 1921 年 8 月或 9 月回到上海之後才具體形成。正當張國燾這位書記部的第一號權力人物，取得鄧中夏的協助，實際上，只限於領導北京和華北支部時，而第二號權力人物李啟漢，基本上已經成為領導上海支部的第一號人物了。在那九或十個月期間，李啟漢為勞工運動作出了應作的貢獻之後，卻招來了中英兩國警犬們的仇恨，這批警犬是專為維持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治安」而賣命的，因此，1922 年 6 月 1 日，李啟漢終於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度過了兩年長長歲月之後才被釋放出來，那時距離我在蘇俄留學、尚未重返上海之前不久。

反對改良主義，批判無政府主義

落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人雙肩上的所有任務中，最迫切、最重大的任務，無可爭議的是必須每月要出版一期《共產黨》，同時還要出版一期《新青年》雜誌。繁重的任務，決非落在報刊發行人身上，而是落在報刊編輯或者論文譯者身上，據我估計，這要佔據他們全部時間的四分之三。顯然，他們的眼裏，這項任務所具有的重要性，就等於要他們付出最大的辛勤勞動。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這兩個主要刊物所要傳遞的大多數資訊和資料，從政治角度上來說，還不是十分精練，十分高深的，實際上，還需適合於當時情況的需求：這就是刊物的格調力求簡明淺顯，以提高認識水準的目標，繼之就要充份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這就是刻不容緩地吹響進入中國共產黨歷史時期的號角。

《共產黨》月刊是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恰逢俄羅斯十月革命三週年的時候創刊的，當時她具有二重性：既是機密的又是秘密的。說她機

密，指的是刊物只在共產主義小組的戰士們和同情者中間流傳；說她秘密，指的是刊物並沒有得到上海「社會治安部門」中、外當權者的許可而編輯、印刷和傳播。因此，在《共產黨》上寫文章，人們就不必擔心寫出《新青年》雜誌上不宜寫的文章，因為《新青年》雜誌上刊出這樣的文章，會嚇跑了一部份讀者，或者有可能遭到查禁或扣押，也沒有理由擔心公開而又坦率地轉載宣傳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長篇的文章；人們也不必噤若寒蟬般地不敢宣佈：當前中國人民如有願望繼續前進，求得發展，便沒有別的道路可供選擇，唯有走社會主義革命的路，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路，走由 1917 年彼得格勒起義所打開的光明之路！毋庸置疑，《共產黨》月刊是中國共產黨人想要說出心裏真正所想的獨一無二的雜誌。正是為了人們能夠說出他們真正所想說的話，陳獨秀和李漢俊才堅持，當《新青年》雜誌復刊後僅僅幾個星期，便開始出版《共產黨》月刊了。

當然，在《共產黨》雜誌上，人們可以讀到好多不容忽視的文章，說得更確切一點，可以讀到由我們上海領導人執筆的哲理性文章。通常，由陳獨秀和李漢俊撰寫的文章，總是詳細描述了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重大特色，諸如，思想發展史，文章分析了為甚麼從 1864 年以來曾出現過三個工人國際，首先對第二國際的蛻化變質深表遺憾，其次對第三國際的光榮歷史備加讚揚，最後以嚴厲的批判口吻揚棄了無政府主義等等。誰也不能否認，所有這些文章對於未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高潮中的英雄戰士們來說，是具有培養和教育作用的。然而，《共產黨》讀者的真正優先權還不僅在於他們有權接觸到的文章，能使他們吸取屬於第三國際的、世界各不同組織和政黨活動的新鮮材料，而且還可以從下列所引用的完整或比較完整的文獻中感到歡欣鼓舞；這些文獻包括有托洛茨基起草的第三國際成立宣言（1919 年 3 月）、列寧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1920 年 3 月）、美國共產黨建黨大會上通過的

政治綱領（1920年春）以及在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譴責第二國際犯了「修正主義」錯誤的決議和其他文獻（1920年7月到8月）等等。

然而，我們怎麼能夠得到這種不同尋常的資料呢？

這些文獻和資料又是怎麼這樣迅速地傳到了我們編寫《共產黨》月刊的同志手裏呢？喔！原來這完全是由於維金斯基同志、通過楊明齋陸續地把來自莫斯科和美國的資料，送到編者的手裏，資料的文本是多種多樣的，有小冊子，雜誌和報紙，最通常的是用俄文或英文編寫，但有時也有用德文或法文編寫的。如果上述提到的文獻版本是用俄文編寫的，負責翻譯的顯然就是楊明齋，如果文獻版本是用英文、德文或法文編寫的，那就毫無疑問交給李達和李漢俊負責翻譯了。此外，維金斯基也時不時地為《共產黨》用俄文或英文寫些小文章，然後逐漸擴大成為論集，再交李漢俊、李達和楊明齋譯成中文，當這些文章或論集發表時，當然不用維金斯基或伍廷康署名，據我回憶，他用了一個中文筆名，叫做「必勝」（Bisheng的音譯）。

我已經談到過，《新青年》雜誌在中斷三個月之後，於1920年9月1日由陳獨秀復刊，此時的陳獨秀已有決心要投身於革命戰鬥，便不加掩飾地反對以胡適為代表的那批人的意見，這批人提倡在哲學和文學上「不談政治」，復刊後的《新青年》當然要大大改變這種作風。正如《新青年》主編以毫不含糊的措辭，發表了題為「談政治」的社論一樣，他在社論中強調，要改變方針並為這個方針作了辯解，同時，為了給《新青年》注入新的生命力，雜誌觸及到了大量現實問題，這在過去是守口如瓶的，現在卻以十分堅定的立場，明顯是按照第三國際處理方式，來處理和解決屬於這類性質的大部份問題。但也因此招來了某些人的議論，如同不久後胡適所說的那樣：《新青年》雜誌不過是《蘇維埃俄羅斯》的中文版（《蘇維埃俄羅斯》是在紐約出版的一份雜誌）。因此，《新

青年》雜誌的新方針還面臨着一步之遙，這一步務須小心提防，不可輕率地越過去。對於那些不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的、甚至公開敵視她的朋友們和合作者，《新青年》實際上是相當慷慨地允許他們有權在適當的欄目中充份發表他們的思想。這就證明《新青年》決不是勉強改變事物的性質，而只是最終證實了《新青年》雜誌仍然是一份代表各種「新思想」潮流的自由論壇，尤其是代表各種不同傾向的、分佈在各個領域裏的、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戰士們的聚集之所，這些反傳統的戰士們樂意繼續進行工作，繼續從頭做起，繼續探索前進。

從1920年9月到1921年1月，在整整五個月中，以嶄新面貌出現的《新青年》雜誌，事實上辦得更好了。影響擴大了，讀者增加了。但後來作出決定，要把《新青年》雜誌定在廣州出版，其理由決不是因為雜誌領導成員中存在不和現象，也決不是因為缺乏讀者群眾，儘管接着有兩個月的停刊；其中主要理由是：據我想，大約在1921年2月底或3月初，上海法租界的巡捕親臨印刷廠檢查，因而造成事實上的困難，以及物質上受到約束。1921年4月1日，《新青年》雜誌又在廣州出現了，當然，雜誌的編輯部仍然留在上海。

從1920年底開始，到1921年初止，《新青年》雜誌充滿着生機活力，這是無可置疑的，因為雜誌已經擺開陣勢，要在理論上開展兩面作戰，中國共產黨人，際此黨在孕育期的決定性階段，堅持反對改良主義，堅持批判無政府主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李漢俊、李達以及緊隨其後的其他「新思想」代表人物，已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並在「五四運動」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聚集在十月革命和第三國際的旗幟下，但實際上他們還沒有超越集合在資產階級旗幟下的那些政黨領導人的願望，這些領導人所日思夜想的只不過是使中國盡快地擺脫附屬國的地位，擺脫那種不可名狀的悲慘困境，至於封建軍閥們則狂熱地要

維持現狀。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這批先進人物，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那時他們仍然提出要通過如同孫逸仙所倡議的民族主義集權制道路，或者如同梁啟超所倡議的「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道路。然而，就在同一時期內，從上海小組開始，各共產主義小組全神貫注於以自身形成的認識過程來干預群眾生活之後，他們不再惶惑不解，而是用獨特的視野來審視這個時期中所發生的一切了。

1920年夏開始，情況已經起了很大變化。陳獨秀、李大釗以及團聚在他們周圍的共產主義者和准共產主義者，在各條戰線上都採取了進攻策略，他們必須認真嚴肅地對待一切，必須認識到要從文化、文學、語言和思想的九霄雲外高處走下來，而他們直到1919年底止仍在那個高處徘徊不前，而現在呢，就須進入每日發生的、平凡接觸到的政治鬥爭的歷史舞台上來，他們還必須認識到，昔日曾經是他們很有益處的、當然也帶點特殊性的朋友和盟軍，現在卻變成了束縛自己手腳的敵對者，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們針鋒相對，而不能作絲毫讓步了。

知識和精神文明振興運動，在1915年底便已經發動起來，到了1918年底開始，特別是從1919年「五四」以來，人們力圖從運動中能取得「補償效應」，而現在，陳獨秀、李大釗以及他們的同伴特別令人注目地表現出有決心，要賦予這個運動以完全嶄新的政治架構，使之朝着有利於得到蘇俄支持的中國共產黨的方向轉變，他們為創立這個黨而不辭辛勞！果然不出所料，他們跑得太遠了！第一個公開說出這個意見的就是改良主義首領梁啟超。

梁啟超是一位才華雋異的作家和出版家，同時又是一位與眾不同的精明能幹的政治家，卻一生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當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正值1898年百日維新變法時期，他站在康有為和譚嗣同的一邊，人們都知道百日維新變法時期是轟動一時的中國歷史轉捩點。梁啟超終其一生，唯有通過從上而下，而不是從下而上地說服已經掌握權力的人，積極採

取他們建議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從困境中擺脫出來。

自從 19 世紀末期以來，梁啟超為了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領導進行了一場反對清廷保守派的鬥爭，他像他的導師康有為那樣，在中國獲得一筆深孚眾望的巨額資本。與此同時，他在事業失敗中，拒不接受十分明顯的教訓，這教訓便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他仍然認為不管怎樣定能擴大和保存他那筆深孚眾望的巨額資本；直到 1912 年，他還以我曾讚揚過的那種文風筆調寫下他自己的意見，這就值得注意了。但是接着從 1913 年到 1919 年間，他簡直是完全浪費了精力和時間，他反覆多次犯了錯誤，這就是以他的小黨和他本人，竟然同那兩個一樣可恨而又一樣可鄙的「大總統」袁世凱和段祺瑞⁶⁴ 結成既太無知而又太真實的臨時聯盟，玩這樣的牌豈不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了嗎？

儘管如此，畢竟像梁啟超那樣才智過人者是少有的，用不了多少時間，他完全懂得了由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人，在「五四」前所宣導的知識和精神文明振興運動的重要性。因此，也用不了多少時間，在「五四」之後便集合在振興運動旗下，從中得到鼓舞，並主動地試圖將其仍然存在的小組織——「研究系」再度重整旗鼓。實際上，那時他手中握有王牌，是可以穩操勝券的——這就是說，他掌握着一系列報刊的領導權。他決心要改變這一系列報刊的編輯航向。他希望從「研究系」內部吸引一大批激進年輕人，把報刊的一些欄目基本上向他們開放，諸如北京的《晨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Le Nouveau Journal de L'actualite）。他讓這批年輕人按照他們自己心願，讓他們放手編寫文學副刊。但從基本上說來，他所採取的是運用甜言蜜語、誘惑欺騙的手法來籠絡青年，終於 1919 年 9 月在上海創辦了口頭上以社會主義為方

64 1916 年初，梁啟超在對蔡松坡發動的反袁稱帝的起義運動中，提供了幫助，無疑地，這是對他在 1913 到 1914 年參與袁世凱政治活動立功贖罪的表現。不幸的是，當袁世凱死後，他又認定，唯有段祺瑞才能統一全中國，因此，梁啟超又投到了段祺瑞的旗幟下了。

向的《解放與改造》雙月刊，1920年9月該刊改名為《改造》。

《解放與改造》雙月刊所要爭取的群眾，也就是《新青年》月刊的基本群眾。梁啟超逕直向《新青年》提出挑戰。1920年6月初《新青年》再度停刊了這件事絲毫沒有妨礙梁啟超，他倒希望她的復刊越遲越好。後來，《新青年》復刊了，仍以原來的風采出現，也就是說直到1920年5月為止的那種鮮明風采，這便使梁啟超感到很不舒服了。人們可以看到，《新青年》月刊的重新出場，她的思想意識的利刃，已經完全轉變為真正社會主義組織的利刃，這便把梁啟超的《解放與改造》遠遠拋到後面去了。

在題為「論政治」的那篇社論中，即我已在上文談及、是1920年9月1日那期《新青年》雜誌上作為開篇的社論中，陳獨秀反覆強調說，現在所需要的社會主義，既是科學的，又是革命的；這樣的革命社會主義與一段時期以來充斥中國的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可說是毫無共同之點，如把這篇社論看作是完全嶄新的《新青年》雜誌的宣言書，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自從梁啟超及其老友張東蓀得悉那期《新青年》雜誌之後，終於明白了將他們同陳獨秀及李大釗分隔開來的那條裂痕，實際上變得越來越大了，誰也無法加以填補。當時，他們便毫不遲疑地發動他們所控制的各種報刊，針對《新青年》，並通過《新青年》，針對全中國共產主義者群起而攻之。這就是他們的行動準則。中國共產主義者別無選擇，只能迎着他們發動的挑釁進行反擊。直到1921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一直堅持以高水準理論進行論戰，反對以梁啟超為主要代言人的各式各樣社會民主主義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中國大師及其門徒，而使自己一直處於有利地位，為了達到目的，他們部份地依靠《共產黨》雜誌，而主要卻是依靠《新青年》雜誌。

按照張東蓀和梁啟超的分析，當時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幅員遼闊廣大，廣大農村的各方面仍然陷於黑暗深淵中，

數億人口中的極大部份仍然是愚昧無知的；某些被誇大起來號稱為「工人階級」的人們，實際上只不過是少數面目不清的、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邊緣分子，他們只能算是「游民無產者」或「流氓無產階級」，因此中國現時不可走社會主義的路；如果有人試圖強把中國推上這條路，那是「完全不現實的」，對於中國來說，最迫切的任務是工業化，唯有：「有節制的資本主義」體制，才是走出符合需求的一步；當然，在很遠的未來，當中國工人階級真正成為多數，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了，那時才能考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然而，毋庸置疑的，而且絕對毋庸置疑的是，若使中國立即走上「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這是很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盲目地、輕率地把「俄國式社會主義」強加給中國，人們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而只能是把中國交給了「最惡劣壞分子」的手中，只能使中國在那些「游民無產者」的狂想中遭受磨難，只能把中國「拋到了無政府狀態」的深淵中去。

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當然毋須費多大的勁便能駁斥梁啟超的這些論點，同樣也毋須費勁地指出：1920年底，中國無產階級所代表的是另外一回事，而決不是一幫無產游民。與此相反，他們還進一步指出：從現在開始，中國為甚麼只有依靠社會主義，而不是依靠資本主義、才能充滿信心地確保工業化，進而確保現代化的道理。緊接着，他們便十分出色地闡明了、並不失時宜地提出有關這方面的基本看法，其論點如下：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者，竭力向中國推薦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不僅是我們早已在所有的國家裏親眼目睹過的，而且還不能不是具有嚴重缺陷的模式。這些就是以犧牲被剝削階級為代價、為剝削階級提供巨大財富機會的、為勞動大眾創造了無法避免的日益貧窮化的一貫性模式。一句話，這是令人髮指的極不公平的模式。這些模式還有更嚴重的缺陷：把中國以及所有「東方國家」同帝國主義掠奪模式捆綁在一起，因此，這勢必是，而且命中注定的是阻止發展的模式，而決不是推動發展的模

式。正如陳獨秀、李漢俊等人所說的那樣，要使我們的國家擺脫困境，就必須同時打倒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反過來也一樣，打倒帝國主義是為了打倒資本主義。因此，就必須把所有的被剝削階級動員起來，把權力交給他們，把一切權力交給被剝削階級……陳獨秀他們說的這番話，難道不就是向世人宣佈了真理嗎？

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的領袖們所發動的論戰，不但必須從右面如火如荼地反對改良主義者，而且同時必須從左面開始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切不可弄錯：以為在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與繼續反對改良主義者之間是可以保持平衡的，不，保持平衡只是表面現象而不是真實情況。別以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比之繼續反對改良主義者所需的理論水準要低一些，實際上不是這樣，相反地要激烈得多，這不僅是參加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有其頭面人物，而且還有隨處可見的那些默默無聞的基層鬥士們。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有以下種種理由。第一，因為無政府主義者，跟那些溫和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自稱豪邁的布爾喬亞們，最終說來實與改良主義者不同，他們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卻是屬於同一個範圍之內；第二，因為他們自稱是社會主義者，跟我們有一樣的自信，一樣的激進而且是一樣的毫不妥協；第三，因為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爭論，看來顯然是屬於家庭內部的分歧和爭論；第四，還因為走向共產主義之前，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曾是無政府主義者，在我們中間的某些人，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中間，或者仍然深深地陷入無政府主義思想中，例如抱樸同志，或者仍然十分容易接受無政府主義者有關政治、政權、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的說明。

整個「五四」時期是沉浸在無政府主義氣氛中，而後來也仍繼續沉浸在這種氣氛中，可以說並沒有遺忘了她。自1913年春以來，在中國所體現出來的政治及政界人物，其中有可悲的當權派人物如袁世凱、段祺

瑞、吳佩孚、張作霖以及大大小小的軍閥，另一方面是處於反對派地位的頭面人物，如懷疑派的梁啟超，以及有爭議的孫中山等，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那些有過清醒頭腦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同時也正因為有過清醒頭腦才發動了「五四」運動的他們，難道能不對這種政治局面表示出極大的憎恨和厭惡嗎？不錯，他們確實憎恨過、厭惡過，因而突出地形成了無政府主義的夢想，這就是夢想直接建設一個沒有約束、沒有邊界、沒有國家的社會，能夠即時或者即將降臨到人間。然而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遺憾的並非是他們當中最明智的傑出分子已經拋棄了對這種夢想的追求，更傷心的是這批傑出分子受到經驗的教育，並經過反思之後，又回到了正確的政治行列中來，1920年初，他們終於選擇了走共產主義之路。

自從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與陳獨秀本人之間，因發表公開信件進行意見交換開始，終於在1920年底引發了一場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論戰很快地推廣開去，不僅內容頗富活力，而且形式也相當激烈。積極參戰的不僅有《共產黨》和《新青年》，而且《覺悟》雜誌也忘不了利用公眾名義，推波助瀾、熱烈響應。區聲白和他的朋友們，為了論證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他們大吹大擂地用來抨擊我們的論據，幾乎同所有國家裏無政府主義者攻擊社會主義者所用的論據是一模一樣的，無非要使人們信服，無產階級如果不用政黨來裝備自己，要取得政權，或者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取代資產階級專政，休想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為了批駁無政府主義者這種論點，我們使用的方法方式就是類比法，這種類比法也是所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每隔一段時間，或經常性地採用的方法方式，通過陳獨秀的發言，更確切地說來，通過陳獨秀的筆桿子，當然我們對區聲白及其朋友們也作出過不容忽視的讓步：我們同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是，只當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發展到採取暴力的頂峰，並且已經孕育着一觸即發的階級鬥爭時，為了對這

樣的局勢作出反應，我們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只當無產階級社會的進程已開始形成，而且是不可戰勝時，我們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句話，無產階級專政是具有過渡性的，是短暫的，而且是極其短暫的……然而，這樣說，我們是否符合以《共產黨宣言》為出發點的傳統呢？當然，是完全符合的。不容懷疑的是，我們忠誠於那個傳統的神奇力量，能使我們的壓倒多數的基層戰士、我們的同情者懂得一個道理，即最後分析起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擺脫了他們的影響，實現了我們的團結一致。

〈社會主義，也唯有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實現工業化〉除非我們不希望中國能重新獲得完全獨立，不希望看到中國工人和農民生活得比現在更好，否則就必須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實現工業化。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最終一致地從論戰中得出的結論，這結論就不能不使他們同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劃清界線。革命，也唯有革命才能使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才能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除非我們在極短時期內遭受兩種勢力聯合起來的扼殺，這兩種勢力便是天生不願意接受失敗的國內資產階級和顯然不甘心退出他們勢力範圍的外國資產階級，否則就必須實現革命，就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最終一致地從論戰中得出的結論，這結論就不能不使他們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劃清界線。

當爭論終結時，中國共產主義者才真正懂得了：甚麼是他們希望做的，甚麼是他們不希望做的。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甚麼力量可以阻擋他們明確地朝着建黨的方向繼續工作下去。從 1921 年春開始，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人便着手這樣做了。

陳獨秀創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

當 1920 年年終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成為中國其他各共產主義小

組的先鋒小組，這個小組不僅盡可能培養其他各小組創辦出版物，盡可能地為他們提供思想武器，並通過他們在必要時去抵制來自各省的改良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攻擊；一句話，這個小組不僅盡可能地為其他各小組擔當任務繁重的領頭人，而且盡可能地為其他各小組作出榜樣，盡可能地在行動上、言談上為她們作出表率；這個小組還要盡可能地以其他各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義，並經由維金斯基，與第三國際保持經常接觸的優先權，要盡可能地作為唯一的途徑，同聚集在俄國無產階級周圍的所有五大洲各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保持聯繫；還要盡可能不斷地給各小組提出可貴建議，讓她們能在思想上更加堅定可靠，要盡可能地督促他們刻不容緩地創辦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然後不斷地督促他們自身，從空談理論，徒具善良願望的階段，過渡到具有戰鬥性和組織性的階段。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 1920 年底，除了上海小組外，全中國已有五個共產主義小組。他們是：在華北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由李大釗於 1920 年 10 月間順利建成，共有成員七或八人；在山東的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這是北京小組派生的分支小組，實際上人數不多；在湖南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是在 1920 年秋初建成，建成時的環境條件，我在上文已作了詳盡的描述；在湖北的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是在 1920 年 12 月的最後幾天內，由董必武、陳潭秋兩人着手建成的；此外，還有在廣東的廣州共產主義小組，自從陳獨秀本人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天起，這個小組不再是面目不清、含含糊糊的共產主義小組了。

陳炯明是個小軍閥，他自稱進步派，在一定程度上與孫中山保持聯繫，1918 年夏天，他終於在廣東省東部，福建省西部割裂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以福建漳州為其「王國」的首府，並沸沸揚揚地聲稱要聚集在「五四」運動的旗幟下，1919 年他還標榜同情社會主義。誠然，當陳獨秀從監獄裏出來不久，陳炯明便表示歡迎他到漳州來，創辦一所跟北京大學一樣聲名卓著的大學。但陳獨秀認為接受他的邀請並不是可

取的，因為不言而喻，不論陳炯明自稱是明智人士，或者傾向進步派或社會主義，實際上都是裝裝門面而已。

然而 1920 年 10 月 26 日，當經過為期六週的戰鬥之後，陳炯明率領他的部隊進入廣州。當他剛剛進城時，他又一次求助於陳獨秀，此時他提出的建議恰好是任命陳獨秀為現代化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加速推進廣東省的教育體制。這一次陳獨秀在是否拒絕接受任命問題上卻表現出躊躇不決了。不錯，陳獨秀不信任陳炯明，而且不信任他的時間已有一年多了。但轉念一想，為甚麼不緊緊抓住陳炯明提供的這個機會，以最短期間在廣州創建像在上海、長沙以及在北京那麼人數眾多的共產主義小組呢？又為甚麼不在華南，為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發展，迅速創建像華中和華北那樣鞏固的基地呢？儘管如此，他還是先向他的戰鬥同伴們徵求意見之後才做出決定的，正如過了好多年之後他向我描述的一樣。

當時有兩個人，楊明齋是肯定的，我想也還有李達，他們兩人嚴格按照原則，竭力勸阻陳獨秀，切不可與這個魔鬼式的陳炯明達成任何協議。但與此相反，思想較為靈活、反應極其敏捷的陳望道和李漢俊則認為要適應環境，隨機應變，他們建議陳獨秀刻不容緩地利用他的職位，推動廣州新統治者向前邁進。為了要給這個建議作辯解，為了要提出證據來說明陳獨秀切不可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面前搖擺不定，而要敢作敢為，李漢俊還特此引用了難以駁倒的先例，這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市議會和省議會和選舉，有時甚至參加了由議會授權的行使政權的機關。最後，陳獨秀接受了李漢俊和陳望道的意見。

當陳獨秀在沈玄廬和包惠僧的陪同下，離開上海乘船到達廣州時，廣州究竟有多少個可稱為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呢？據我所知，僅有三個人，這就是譚平山，時年三十多歲了，他曾參與《新潮》雜誌創辦小組，另外兩個人是他的堂兄弟譚植棠以及他的好夥伴陳公博。這三個廣東人，在北京大學完成了高等教育之後不久，便回到了廣州，三人中的譚平山

和譚植棠找到了教書職業。他們三人都曾受到「五四」運動的深刻影響而引人注目，並且也由於李大釗的指點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當然，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能力在廣州的擁護者中間，高高地舉起蘇維埃革命的旗幟，這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經驗，另一方面也因為 1920 年下半年的廣東仍然局面混亂尚在多事之秋。但現在可不同了，他們在偉大人物陳獨秀的率領下，又有了出色的沈玄廬和年輕的包惠僧配合下，那就完全有理由在宣傳領域內以及在吸收新黨員方面，作出更好的貢獻。

果然，1921 年 1 月初，廣州共產主義小組領導班子經過討論，認為勉強去模仿《勞動界》週刊並不可取，因而創辦了《勞動者》雜誌。但在 1921 年 2 月又創辦了另外一個《勞動與婦女》週刊，這應該說是中國出版史上第一個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方針的婦女期刊，陳獨秀是實際上的主編，而大部份文章是由沈玄廬撰寫的。與此同時，這個刊物還承擔了一個任務，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為了確保在上海被禁止了的《新青年》雜誌的復刊任務。幾個星期過去了，在華南的中國青年中，接受我們思想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為了能把大部份時間專心致志地從事於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顯然，陳獨秀必須把省長陳炯明付託給他的教育委員長職責，亦即把屬於行政性質的大量工作擺脫開來，交由某一個人去照顧，巧的是，他終於找到這個人了，這就是陳公博。一段時間過去了，然而陳公博對充當陳獨秀與陳炯明之間中間人的角色仍然是小心翼翼、頗為認真地進行的，因為，當此之際，陳公博並未明確地認識到，他擔任此職是為了陳獨秀去「盯住」陳炯明，抑或是為了陳炯明去監視陳獨秀。又過了一段時間，陳公博在共產黨人與陳炯明之間所擔任的橋樑工作不錯，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因此毫無困難地他就被視為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了。這就是為甚麼在 1921 年春末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同志們，毫不躊躇地委任他作為代表，並在包惠僧的陪同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但僅僅過了不久，即在 1922 年夏初，這時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一派爭論聲中與陳炯明切斷了關係⁶⁵，也正在這個時期內，中國共產黨人才認清陳公博的真面目，一經認清了之後，便把他開除出黨了。此後又在一段很長時期內，陳公博在背叛祖國和人民的職業生涯中，竟然與汪精衛、周佛海以及其他人等串通一起，為日本佔領者的利益服務。1946 年 6 月 3 日，他以叛國通敵罪名判處死刑，並在蘇州執行槍決。

中國共產黨是在何時並由何人創建成的呢？「1921 年 7 月 1 日，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十二名代表，組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最著名的是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這就是一段時期內廣為流傳的中國共產黨官方歷史上作出的論斷。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控制着中國，正因此，從 1949-1976 年，在中國國內外大多數人心中，這個論斷是起了明顯作用的，甚至在毛澤東死後的若干年內，仍然保留着這種影響，儘管從 1979 年以來，在北京已經有人敢於開始懷疑了。那麼這段真實歷史究竟是甚麼樣的？

官方史家的論述，在許多細節上顯然都是錯誤的，歪曲了的。現在，人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 1921 年 7 月底而非 7 月初舉行的，各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代表大會代表人數決非十二人而是十三人，而且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擔任最主要角色的是李達和李漢俊，而不是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和何叔衡。但，這樣的錯誤與我何干呢？況且這樣的錯誤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樁！我大可不必對此小題大做，吹毛求疵。不，決不是這樣的。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在於這種廣泛流傳論點實質問題，在阿諛奉承的所謂「毛主席」稱呼下，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來論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無非是一個謊言；依我之見，應該說明的，而且需要反覆說明的，就是要重新恢復有關建黨問題的真相，重新恢復

65 1922 年 6 月 16 日，陳炯明發動突然襲擊，把孫中山驅逐去廣州。中國共產黨人毫不遲疑地同他切斷聯繫。

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真相，茲簡述如下：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決非幾個人關在封閉的小房子裏，經過八天或十天的討論作出的決定，而是由一批忠心耿耿、視野開闊、反應靈敏的知識分子，在長達十五個月的艱苦努力之後，並在第三國際代表的細心照顧和不斷啟發之下而達成的。這也決非由重要性各不相同的七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十三名代表，在 1921 年 7 月的某一天早晨集中在上海的一個小房子裏組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由這次代表大會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事實決非這樣，而是由中國共產主義中心組的五名「火車頭式」先驅人物以及李大釗，在經過一段極其熱情、異常艱苦的，而且是道路坎坷的時期之後，約在 1920 年 2 月或 3 月當陳獨秀向霍霍諾夫金同志表示「同意」之後，才在接近 1921 年 7 月底由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最後一次會議宣告建立的。

不應忘記的是李達和李漢俊兩人都是那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但更不應忘記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卻不是代表，而當時的次要人物或可疑人物例如包惠僧、陳公博和周佛海卻接受了邀請。當然，我遠沒有這樣的想法，要去否定代表大會的功績，這功績就在於大會最終同意使中國各共產主義小組的混合體，開始轉變為全國性的、具有適當組織的統一整體，轉變為以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制約的真正組織。但是我還應當表明我更沒有這樣的想法去支持、認為中國共產黨已具有很高素質，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布林什維主義先鋒隊，也不支持認為中國人民已有了自己堅定不移的行動綱領，有了明確無疑的鬥爭戰略，一句話，那時還沒有可與這名義相稱的路線。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創建中國共產黨、宣佈黨來到這個世界上並在取得黨的誕生證方面，都很好地完成了她的使命，首先應當一提的是，她完成了統一團結的使命。但是這次大會所發揮的作用還只局限於登記方面，實際上也就是一次獲得人們認可的大會。不錯，她的

特點與其說是工作有效性，倒不如說只是形式上的存在，與其說是積極主動的，倒不如說是消極被動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的發展壯大進程中，確是一次有益的、不可或缺的時刻，但還需要將近兩年時間才能在總體上發展壯大起來，更確切地說來，第一次代表大會是黨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時機，是許多時機中的一個，不能說是最有決定性的一個。

第八章

踏上蘇維埃國家，
為西伯利亞中國勞工服務

1921年1月，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屬下的外國語學社學生，開始分批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學習，我們可以單獨前往，也可以兩人一組、三人一組、至多四人一組分批前往。這次莫斯科之行，就技術角度來看，楊明齋是主要的組織者。開始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前往莫斯科的行程，應該說是十分簡單的，即從上海搭乘俄國的商船，這些商船經常來往於上海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之間。待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我們便可搭乘橫穿西伯利亞的火車，直達莫斯科。但實際上，事情卻複雜得多，由於那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仍然被日軍佔領，通常我們只能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動身前往莫斯科，而哈巴羅夫斯克則是屬於蘇維埃聯盟內獨立的遠東民主共和國⁶⁶。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羅夫斯克

早在1921年2月底，我離開了上海，當時與我同行的是任作民同志，他跟我一樣也是湖南人。由任作民與我組成的兩人小組，是最後一批離開的。我們搭乘的海船，船體和設備都十分陳舊。船上可供全體船員和乘客使用的最起碼東西，也都非常簡陋。然而，這艘海船只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經過日本長崎市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同船的乘客中，絕大多數都是祖籍浙江的商人，他們或他們的父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均設有商店。在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中途這艘海船停靠在日本長崎市，整整有一天時間，我們兩人便利用機會上岸去稍稍領略日本風光。長崎市大街

66 1918年4月初，日軍藉口要保護他們僑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登陸後，日軍不僅佔領了前沙皇的濱海省，而且還佔領該省西部一大片領土，他們這樣做，完全是為當時的海盜塞米諾夫（Semenov）服務的。1920年春天，莫斯科政府創建了遠東共和國，這在一段時期內，在蘇維埃俄羅斯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起到了「緩衝」作用，1920年夏天，日本軍隊不願陷在遼闊荒涼的西伯利亞深處，便從他們已經佔領的濱海省以西地帶全部撤出，他們還在1920年秋季，表明不再支持塞米諾夫之後，也放棄了哈巴羅夫斯克。但是日軍始終佔領着濱海省，彷彿他們已下了決心不再從那裏撤走，因此，蘇、日兩國間爆發戰爭的危險性並未排除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1年的盛夏季節。

兩旁顯得異常乾淨清潔，路上我們看到的日本人，身着穿戴入時得體，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經回到船上之後，我們憑靠在這艘舊船的舷欄，眺望着碼頭上所發生的一切。當時，我們能夠親眼目睹的那些景象，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驚奇而又不勝欽佩。裝滿煤炭的重型貨船正在卸貨。搬運工都是婦女。所有這些婦女穿上白色工裝，她們背上扛着袋子，從船上到吊車，又從吊車到船上，無休無止的來來往往，周圍的背景主要是一片深黑的景物，可閃耀着一些明亮的光點，確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我們又重新出發了，長崎市留在我們的身後。海船從中國海，經過日本海，然後轉彎直向北方駛去。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還需要多少時間呢？我們捉摸着。明天可以到達了，幾個小時可以到達了。我們在船上新認識來的乘客們，向我們探聽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幹甚麼，顯然，在他們的眼中我們決不是商人，任作民和我兩人告訴他們，我們是學生，準備到德國去留學的。不管他們是否相信我們的話，但從他們彬彬有禮的外表上看來，他們似乎是相信了的。當我們搭乘的船，不久後就要進入由日本人嚴密控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時，他們十分懇切地通知我們，凡海船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靠岸時，日軍就要嚴密細緻地搜索全船及所有要求上岸的乘客，不論那個乘客的證件如不完全符合規定，或者乘客在行李中攜帶有所謂「可疑」的物品時，且不說有嚴重的麻煩，至少也要冒相當麻煩的風險。儘管我們的行李中沒有任何「可疑」的物品，但我們口袋裏卻有一份頗為「可疑」的證件——一封介紹信，信上有葛列格里·維金斯基的簽名，字跡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封信是我們向蘇聯當局聯繫時，作為護照使用的，唯有這封信才能使他們信服，才能給我們免費提供膳宿必需品，我們也才會受到兄弟般的歡迎。

怎樣處理這份證件呢？這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問題既然存在，任作民與我兩人就不能不提出來商討。如果放棄維金斯基的介紹信，顯然，

要使我們得到俄國同志的承認，就會增添很大的困難和麻煩。如果保存這封介紹信，我們的日本敵手就會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把柄，然後把我們拉出去槍決……經過一番簡短的討論之後，我們記起了一句合於情理的話：兩害之間，取其輕；不論情況如何，首先我們必須處理好這件緊急的事。我們決定放棄由維金斯基簽名的介紹信，並把信撕得粉碎。正當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經在望時，我們剛好把最後的碎片拋到了大海的深處了。

我們乘坐的海輪剛一進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日本軍警便猛衝過來。那些穿便服的警察，在一眨眼間便登上了甲板，打開我們的手提箱，強行撕開我們的包裹，橫蠻地把裏面的東西一股腦兒翻出來，都扔在地上，他們這樣幹，為的使所有的物品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他們搜遍我們全身，當然更是獨斷獨行地到處亂翻，態度惡劣而狂暴，可他們的動作都是十分熟練而又機靈。然而，日本軍警所搜集到的東西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後，船上的全體乘客，包括任作民與我，都毫無阻礙地登上了碼頭，然後消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中。

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到何處去找安身之地——即食和宿的問題。在俄國人中，我們熟悉的人是很有限的（儘管有楊明齋和波克兩位同志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但此時，我們認為最妥當，最明智的辦法，還是到定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國人所經營的小客棧先安頓下來再說。我們便根據在路途上認識起來，而又認為比較可信的中國同胞的指點，隨意選擇一家小客棧安頓下來了。

我們同小客棧的主人經過一番閒聊之後，便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是中國人，而且還須到伯力（即哈巴羅夫斯克）去，那麼當他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時，最好用甚麼辦法才能擺脫困境，把問題處理好呢？客棧的主人是一位善良誠實的人，但他不識字，是個文盲，說得更確切些，是個半文盲，他回答我們說，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建議

我們去請教那些有文化知識的「先生們」，這幾位先生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唯一華文報紙——《遠東日報》的編輯和發行人。

然而，我們對於《遠東日報》的編輯和發行人，即店主人所說的有文化知識的「先生們」的政治傾向毫不了解，但猜想他們的思想不會是進步的，我們考慮了好長時間，要採取甚麼策略既可以接近他們又不致暴露自己而受到損害。突然間，我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就是要寫一篇有關海上航行的報道，我打算把報道寫完之後，連同我在船上為了自我消遣而已經寫就的白話文短詩，一起寄給報紙的編輯部，並附上一封信，在信中，我們原則上始終堅持要給人們留下完全可靠而不致引起懷疑的形象，因此，自從離開上海以後，我們總是主動地表明我們是途經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德國留學的學生。

說幹就幹。我找來最近一期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唯一華文報紙；但我注意到，這份華文報從頭到尾是用文言文編寫的；我讀了又讀，為的是惟妙惟肖地模仿報紙的語調和風格，隨後我立即拿起筆來，用不了一整天時間，我便把白話詩改寫成古體詩，連同那篇報道和信，一起騰清好，裝在一個信封裏，並請小客棧的夥計馬上送到《遠東日報》的所在地。但使我們大為驚奇的是，第二天我們打開報紙，便發現我的小詩，我們的報道，已全文刊載出來，而且是刊載在十分顯著的版面上。

我們對於《遠東日報》的這樣處理，感到十分滿意，一天後，我們離開小客棧住所，前往報館去，當時我們聲明要拜訪報社的主編陳先生。顯然，我們的行動使這位陳先生深表驚奇，因為我們的一切，是我們早已給他送去過的。看來這位陳先生也想親自看一看，我們究竟是甚麼模樣的人，而在他的內心深處，卻算計着如有可能，不論用甚麼方式，使我們能與報社保持聯繫。這裏，顯然用不着轉彎抹角式地迴避問題了。我們向他表明，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還一再向他談到，我們只不過偶然寫點新聞報道而已，而當時唯一使我們感到不安的問題是下一步的行程

以及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伯力這一段路程中可能要冒的風險。

陳先生非常率直地馬上回答我們說，最簡便的辦法還是搭乘火車去。他還告訴我們，當火車到達伯力之前，像所有乘客一樣，我們肯定要接受紅軍的檢查，火車要越過黑龍江支流上的大橋，換言之，即阿莫爾河或愛神河（Amour）支流上的大橋，然後，從長期由日軍佔領着的前沙皇的濱海省，馳向也是前沙皇所屬的廣大領地上，而目前這些領地已在遠東共和國政府的管轄下連成一起了。但陳先生為了使我們放心，他說，重要的是，由紅軍檢查引起的一切障礙，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他是一位挺熱心的人，自動提出要為我們負責買到去伯力的火車票，並且把當時局勢的嚴峻性以及我們對於符拉迪沃斯托克居民的風俗習慣的缺乏了解都考慮進去了，這就大大減輕了我們的負擔。

當這個純屬「事務性」問題解決之後，我們又向陳先生提出了另一些問題，如城市、地區問題，有關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所遵循的風尚、禮儀問題，特別是中國人生活的城市和地區。他都懷着喜悅的心情，一一給我們作了回答。儘管他是一位優秀新聞工作者，一位小心謹慎的人，他仍然力求做到客觀公正，不偏不頗，但據此可以想像，他特別要避免觸及到俄國共產黨人的問題，當時任作民和我看得十分清楚，他是決不喜歡俄國共產黨人的。

這位陳先生同時告訴我們，大體上有一萬中國人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散居在東西伯利亞其他居民點的大約有 10 萬中國人。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自從沙皇統治時代起，那些中國人中的絕大部份，都被俄羅斯人當作下等人對待的。他們別無選擇，為了生存只得日夜操勞；但他們很少受到干擾，並可從較為寧靜的政治環境中享受到一些好處，不論年頭好壞，還能勉強地把日子過下去。但是今天呢？這位陳先生把雙臂舉向天空，哀嘆地繼續說下去，自從革命以來，我們定居在東西伯利亞的同胞們的生活，不斷地惡化下去了，特別這樣的一批中國人，他們定居

的地方，最近落到或者再次落到紅色俄羅斯人的控制之下，那麼他們的生活，比之其他中國人，譬如說比之定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國人還要糟糕得多，因為定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國人，還可以得到必需的食品，找到必要的工作，而且也不會輕易地失去他們所必需的一切。

當這位陳先生詳細地提醒我們，在伯力以及附近地區可能遇到的一切。過了一天或二天，他居然遵守向我們許下的諾言，再次來看望我們了，並送來火車票。他一手把車票交給我們，一面對我們說，我們完全有理由為交上好運而慶幸、而自豪。他說還不到六個月時間，那時，在整個阿莫爾河下游地區，一邊是日軍再也不敢支持的白俄，另一邊是獨立的遠東共和國的紅色俄羅斯之間的戰火紛飛，十分激烈。因此，那時，對任何人來說，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伯力之間的數百俄里之間，不可能不遇到在火車上的、汽車上的、騎馬的或步行的士兵的巡視和檢查。

正當我們請求這位和藹可親的同胞，把我們應該付的火車票票價告知時，他卻斷然表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並沒有給我們代付票款，這不過是他應該支付給我們的稿酬——因為他發表了我們寄去的稿件。更令人好笑的是，他還補充一句，只要我們到達德國時切不可忘記給他寄新的報道文章來：不論是我們的俄羅斯之行，也不論是歐洲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印象，他都表示歡迎。

更過意不去的是，他親自陪送我們到車站，還交託小客棧夥計領我們上火車，給我們找個較滿意的車廂——火車漸漸地離遠了，他還站有那裏。現在回憶起來，令人最感驚奇的是，我們終於從已經陷進去的困境中成功地擺脫出來，從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二天算起，僅僅是幾天時間，我們已經向哈巴羅夫斯克進發了，這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我們的列車，沿着烏蘇里江的右岸，一公里一公里從容不迫地徐徐前進。隨着列車的繼續北上，但我們並沒有感到寒意的加強或減弱，終於要到達哈巴羅夫斯克了，這兒已是黑龍江支流上的大橋了，正像那位

好心的陳先生所介紹的那樣。列車在跨越過大橋之前，突然停住，有幾位紅軍士兵登上我們的車廂，每一位乘客都必須把證件交出來，讓他們檢查，儘管任作民和我兩人沒有甚麼證件可供檢查，但紅軍士兵絲毫也沒有責備。

列車重新啟動，車至大橋仍以平常的車速行進，但到了哈巴羅夫斯克車站時，彷彿已經精疲力竭，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裏。所有乘客下車了。天哪！不論任何人，想要進入遠東共和國境內，都必須要進行一次身份證的嚴格檢查，這對我們全體旅伴來說，是會順利通過的，但對我們兩人來說，卻是非常麻煩了。

我們曾千方百計要使盤問我們、而又深表懷疑的俄國官員了解我們的身份，但實際上是落空了，因為我們除了能說幾句非常糟糕的俄語一半漢語之外，就不會講其他語言；我們也曾試圖解釋清楚，為甚麼我們沒有了由維金斯基簽名的那份珍貴的檔，而且這檔恰好用來表明、可作為護照使用的，但仍然是徒勞無益。開始盤問時，這些官員還是相當耐心的，但到後來便惱火起來，也不再繼續盤問下去，便把我們兩人關進候車室裏面，他們自己也走開了。他們究竟要把我們在籠子似的候車室關多久呢？一個小時後我們就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但當我們剛要提出問題時，那幾個盤問我們的人又出現了，這一回是由一位中國翻譯陪同來的。

到了此時，我們真的認為有可能跟他們談得通了，但我們所說的一切，他們以為是完全不可信的。人所周知，有時真理未必看起來都是真的。但這裏還有另一面：同我們談話的對方，並不滿足於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而且還向我們的外表斜瞟了一眼，顯然，他們是越來越加懷疑了，他們通過中國翻譯，又繼續盤問起來。該說些甚麼呢？將會發生甚麼事呢？此時任作民和我想去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突然間，我們的思想裏閃過一個亮光。最使我們的盤問者感到不舒服的僅僅是我們

的外表衣着而已。事實上，當我們剛離開上海之前，任作民和我便認為，必須要從頭到腳重新打扮一番，因為我們原先那身衣服實在不成樣子了。我們最後選定要換上一身日本學生穿的制服，理由很簡單，既方便實用，又價格便宜。但是換上了這套「奇裝異服」後，我們從沒有想到，在大部份紅軍士兵眼裏，也就是說在這些正直誠實，但頭腦還有點簡單的年輕小夥子的眼裏，我們就不能不被當作是日本的特務了。

此刻，既然已經明白過來，我們就急忙向他們解釋這身衣服的由來。然而，事情並非所料，遠沒有使我們的盤問者減輕懷疑。相反地，這番解釋卻加強了他們的懷疑——實際上，把我們看作日本人了。那位中國翻譯一再向他們保證，我們確是真正的中國人，並且一再向他們說明為甚麼在他們看來，我們不像中國人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他們慣常接觸到的是中國北方人，而我們則是南方人，但這些保證和說明仍然無效，蘇方的盤問者不願放棄他們的成見。為了要打消他們這種成見我們就不得不講述離開中國的經過。我們說，直接從中國出來，而最近分批到達哈巴羅夫斯克、然後轉往莫斯科的，我們兩人並非是僅有的中國年輕人，先我們而來的至少還有二十多位，他們當中的某幾位很有可能目前還停留在哈巴羅夫斯克市內——我們這番話說得如此確切，如此肯定，不免使他們困惑起來，他們才同意分頭派人去證實情況，用不了多久，他們便發現，我們說的，並非胡言亂語，而是實際情況。

從1921年1月底到3月初或3月中旬這段時間內，上海共產主義中心小組屬下的外國語學社的首屆校友，先後都到達哈巴羅夫斯克，並在那裏重新團聚。其中有羅亦農、卜士奇、劉少奇、蕭勁光、抱樸、韓白樺、王一飛、蔣光赤等人……據我所憶，他們彷彿都在那裏。他們的住宿以及其他費用都由一個招待中心承擔了。只要有可能，他們便去附近城鎮那荒無人煙的街道上來回閒逛，好讓時間消磨過去，有時甚至廢寢忘食。根據他們的神色表情，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比我們等候得更久，便可以

與我們一起搭列車前往莫斯科去了。他們一經發現我們，很快就能辨認出我們是誰時的那股激情，不消一刻鐘，便足以把一直壓在我們身上的那種令人可怕的疑團，驅散得煙消雲散，我們不再被當作日本人，我們又回到中國人的隊伍裏來了，此時我們心中的歡樂，彷彿就像迷途的羔羊又回到羊群中去一樣。

任作民和我兩人剛一回到自己的隊伍裏，便從俄羅斯人手裏接到一張表格，紙上用粗黑線條畫成十四個方形格子，這些俄羅斯人是來照顧每個人生活的。我問一位同志：「這張表格紙有甚麼用處？」他半開玩笑而又半當真地回答我說：「稍等一下，現在是開飯的時候了，過一會兒你就明白的。」進了食堂，一切都明白了，毋須大驚小怪。原來，跟大家一個樣，我必須把這張紙攤開交給食堂服務員，他用剪子在我的那張紙上剪下一個方形格子，這就使我懂得，這方格子是用來調換一張蓋印的票子，便可以吃一頓飯，這樣，在眼前一週內，我完全有權可以在食堂裏用飯了！我本打算要了解一些尚未了解到的事，後來聽人說，原來這是定量供應卡。

為東西伯利亞中國勞工服務

當時，在我們中間，唯一能說一口較為流利俄語的，能夠聽懂我們招待中心主人的話，並且還能夠相互交談的只有卜士奇一人。卜士奇是一位年輕小夥子，早些時候，他曾在廣州生活好多年，那時他的專業性和歷史性任務，是擔任加倫·布盧歇將軍的譯員。因此，在我們中間，也只有他一人能獲得有關哈巴羅夫斯克的令人深感興趣的事，如哈巴羅夫斯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曾經經歷過的一切。據他所說，城裏有好幾個區，居民總人數充其量為五萬人，也有一個免費食堂，像我們所在的食堂一樣，專門為從事公共事務的官員與勞動者而設的，在食堂吃飯的每一個人，也像我們一樣，每星期都會接到一份畫有十四個格子的表格紙。

然而哈巴羅夫斯克居民中的絕大多數人，按照傳統習慣，都在自己家裏開飯。看來，他們並沒有比莫斯科人或彼得格勒人更超前。集體主義對他們沒有很大的吸引力。

1921年3月，在蘇維埃俄羅斯各地以及遠東共和國的許多地方，因糧食缺乏，到處都在鬧饑荒，克隆斯塔德正發生暴亂，托洛茨基必須用武力來恢復當地秩序，另一方面他還要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進行工作，異常明顯的是，這次代表大會需要結束軍事共產主義，並不容遲疑地要開始推行由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或簡稱耐普（NEP）⁶⁷。換句話說，我和我的上海同志們是在情況最惡劣的時候來到這個國家的——這個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燈塔的国家。然而當時，我們有否意識到這一點呢？可以說完全沒有意識到。當時新經濟政策尚未正式付之實施，有關克隆斯塔德叛亂事件，我們只在好幾個星期之後才第一次聽人們談起。哈巴羅夫斯克定量供應方面，所享受的特權究竟達到何等程度，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甚至連最機智、消息最靈通的卜士奇也無法估計到。關心吃好、喝好、生活得好這是我們所關心的事中最末一位的。我們並沒有甚麼困難。公共食堂給我們準備好三餐飯菜，通常可以喝到一碗土豆湯，嘗到一小塊肥肉，或一片魚乾，還可以按自己的願望享受栗黃色的麵包，然而，這在我們看來，似乎還有點異常的現象。當然，我們並不知道幾乎所有彼得格勒、莫斯科或其他城市的居

67 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於1921年3月初，大約持續了一個月左右。當大會剛開始時，受到饑荒襲擊的克隆斯塔德地區的水兵和工人，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煽動下爆發了叛亂，他們高呼「第三次革命萬歲」（第一次革命指的是1917年2月革命，第二次革命指的是1917年10月革命）。托洛茨基作為紅軍總司令，自1921年3月5日起，便向克隆斯塔德公社的叛亂者發出最後通牒。但未能說服他們，托洛茨基遂於1921年3月15日至18日之間，在取得杜恰切米斯基支持的同時，便把克隆斯塔德的叛亂鎮壓下去了。在這種極度困難的時刻，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又稱「耐普」，於1921年3月15日，在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幾乎不費甚麼力氣便一致通過。（譯者注：托洛茨基沒有參加1921年3月的鎮壓水兵叛亂，率領軍隊進行軍事鎮壓的是捷爾任斯基和伏羅希洛夫。）

民要像我們一樣可以按照自己願望去享受麵包，不管這麵包是鬆脆易嚼，或者硬得像木頭那樣，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場夢幻。

不論從哪方面來說，我們生活在哈巴羅夫斯克是深感無聊的。除了散步或閒逛之外，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了。但難道哈巴羅夫斯克一無所有嗎？不，人們可以看到一片片實際上是空蕩蕩的商店，還可以看到十分狹窄的、結成網狀的馬路，走在馬路上的行人，穿一身污垢的衣服，衣服破得不成樣子，連線頭都露在外面了。有兩、三家供應少量麵包的麵包店，還有三、四家比較熱鬧的咖啡館，這就是哈巴羅夫斯克最富魅力的地方了。此外，這小小的西伯利亞遠東停車站，實際上是專門用於商品運輸的，能同共產主義有甚麼聯繫呢？我們注定要在哈巴羅夫斯克度過的這一個星期，彷彿是漫漫長夜，永無盡頭，我們希望能早日到達「革命聖都」——莫斯科的願望，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強烈。突然間，人們向我們宣佈：全體中國學生在四十八小時內搭列車向俄羅斯出發，我們簡直高興得亂蹦亂跳。

然而，在我們動身那天，或動身那天夜晚，我們正在招待中心收拾行李準備出發的最後時刻，兩位俄國同志，即哈巴羅夫斯克市布爾什維克黨委會的兩位代表，前來看望我們了。他們向我們宣佈，有重要的事要對我們說，我們全體中國學生立即集中起來聽講。原來他們要說的是：為了幫助新近成立的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國勞工聯合會，創辦一份中文報紙。出版這份報紙的目的是為住在哈巴羅夫斯克市及其周圍的中國人服務的，因此，要在我們中間提名兩人，這兩人不是到莫斯科去，而是留在哈巴羅夫斯克，並且要我們馬上作出決定。

聽完這番話以後，我們大家彼此尷尬地對望了一眼，不言而喻，誰也沒有思想準備，自願承擔責任去完成這種艱苦工作。但同樣不言而喻的是，我們拒絕滿足俄國同志們提出的要求又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最好的辦法無疑就是抽籤，這是我們所能想得起的一種辦法，來確定俄國

同志所要求的兩名實際上的犧牲者。但是，羅亦農卻有他自己的主意，可以明確地說，他提出的這個主意，使我們今後與他見面時，一直對他產生反感。羅亦農說：「彭述之和任作民兩人，顯然是我們當中最有才能、最適合於擔任新聞工作者或顧問一類的職務。因此，根據我的看法，他們兩人都可以留在哈巴羅夫斯克。」卜士奇絲毫沒有比他的同夥羅亦農更喜歡我，也就毫無保留地贊同羅亦農的意見。所有其他的同志，與其冒着風險被留在哈巴羅夫斯克，不能動身到莫斯科去，倒不如隨聲附和，更適合他們的心意。毫無疑問，唯一的例外就是這位可憐巴巴的任作民了，就這樣，當我還來不及作出反應之前，羅亦農的「建議」便成了「一致通過的決議了」。我和任作民只好帶着沉重的心情，接受了這個任務，這個任務的期限究竟有多長，顯然是無法估計的，難怪人們說，我們注定要被掩埋在哈巴羅夫斯克這個西伯利亞的遠東城市中了。

哈巴羅夫斯克勞工聯合會「中心所在地」的那座建築物，不僅不是簡陋不堪，而且使我大吃一驚的，倒是這座建築物頗具豪華風姿，氣派十足。單從這建築物風貌來看，就表明上級機關下定最後決心，要做出一些具體工作，來改變經常來往於西伯利亞、並且受到殘酷剝削的成千上萬中國人的命運。

任作民和我兩人毫不費力氣地便同聯合會的兩位主要負責人建立了合作關係，這兩位主要負責人中一位是聯合會主席，另一位是秘書。實際上，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中國人。聯合會主席說俄語、聽俄語都有很大困難，而這位秘書雖能讀懂俄文，困難不大，但同樣不能理解俄羅斯人的心態。

我們受到了主人的殷勤接待之後，兩位主人非常坦率地告訴我們，他們是多麼地期待着我們的到來，他們意志堅定，雄心勃勃。他們的設想是：我們即將幫助出版的這份中文報紙，不僅應當成為為哈巴羅夫斯克及其周圍一帶的中國人利益服務，而還應當為東西伯利亞所有其他城

市的中國人服務，其中還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在內，他們希望這份報紙將成為東西伯利亞所有中國勞工的機關報。

這兩位負責人還告訴我們，哈巴羅夫斯克市從來就不是工業城市，儘管如此，但在革命前，該市曾急需非技術性的勞工，我國同胞，可以說毫無例外地以苦力身份受僱於一些資方老闆，其中有加工製造業，庫房堆疊，搬運業，中等規模或小規模運輸業，或者受僱於建築業，後來也有被著名的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管理局招募去的。中國苦力的工薪及其生活水準都是極其低下的，比之工資及生活水準本來就不高的俄羅斯工人還要低得多。東西伯利亞其他城市和各鄉鎮的中國工人，跟哈巴羅夫斯克市的中國工人一個樣，同樣是低水準的工資和生活標準。他們大多來自中國的山東省或者滿洲，通稱為東北三省的一省。四年革命時期，外國干涉（例如日本），內戰以及繼之而來的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所有這些因素，顯然都不可能有助於改善這種賤民般的不幸命運。特別是他們受到停工和失業的打擊，較之他們俄國同志更加嚴峻，更加冷酷無情。不可避免的是，中國勞工中一些被安排去看守鐵路的那些人，也一再受到失業的影響。間接受到影響的是：長期以來，成千上萬的中國商人是依靠這些顧客來謀生的，但這幾年當中，這些顧客再也不向他們購買任何東西了。

自從 1921 年 1 月以來，哈巴羅夫斯克中國勞工聯合會負責人，仍然按照過去的慣例辦事時，而遠東共和國已完全落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掌握中了。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儘管這一進步，還來不及在就業戰線上明顯地感覺到。但就哈巴羅夫斯克以及東西伯利亞大多數中國同胞來說，便是有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工會了（且不說得到鼓勵去組織工會）。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這是甚麼意思呢？難道除了今後能與政府當局商談提高工薪、發放失業津貼費、改善中國工人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之外，不能有別的意思嗎？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還有甚麼別的含義嗎？難道

除了不滿於忍受做一個依然故我的中國人，而作為中國人，政府應當希望他們從深深陷入的文化落後深淵中擺脫出來之外，還有甚麼別的含義嗎？

定居在哈巴羅夫斯克和東西伯利亞的中國同胞，特別是在工人當中，能讀能寫漢字的，人數不多。即使說在他們當中，包括中國工人在內，能說能寫俄語的人數比較多些，實際上除了少數幾個例外，說起俄語來都有很大困難。因為他們不是在學校裏學俄語的，對他們來說，上學校學習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每當有必要迫使他們非說不可時，他們說出來的俄語也不過是亂七八糟，瞎說一通而已。但他們說中國話時，至少能做到正確而又自然，而不管他們的祖籍來自中國的那一省。這是不是說中國勞工對於定居的國家——蘇俄冷漠無情、毫不關心呢？絕對不是，事情恰好相反。顯然，中國勞工懷有強烈的願望，想更多地了解發生在歐俄的新鮮事物以及各種不同的變化發展，可以說在最近四年中，所有這些已成為中國勞工視線的中心了。因此，我們必須合乎情理地向哈巴羅夫斯克勞工聯合會的負責人表明態度，並肯定地說明，這份報紙的辦報方針，只能是：首先要報道蘇聯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其次，要介紹蘇聯社會所常用的政治詞彙；第三，報紙應以「本來意義」的中文編輯出版，這就是說，文字毋須嘩眾取寵，語言要真實樸素。

當我們上述的建議得到採納之後，任作民和我兩人便着手工作了。我們使用的紙、墨、蠟紙、鐵筆以及油印機，都是舊式過時的。我們所掌握的用來編輯報紙的資訊資料也並非完美、理想。由於考慮到這些缺點，同時也估計到我們自身能力的有限，看來要把報紙辦好，我們不能把生產節奏設想得過高，如果達到半月能出一期，印數能達到一千份左右，算是很不錯了。

實際上，設計和編輯這份華文報紙只有我一人，任作民應該說是一位十分正直、忠厚、責任心很強的小夥子，但他膽怯，顧慮重重，並且

沒有自信，他不肯協助我撰寫論文或編發新聞。他寧願專心致志地以他的一手好字，在蠟紙上謄刻我寫的文章。勞工聯合會秘書是懂得俄文的，他把俄文報刊上各種有關蘇維埃社會的新聞資料收集起來，然後扼要地口譯給我們。而我們自己則必須從閱讀中文報紙中去了解發生在中國和日本的重大事件。這些中文報紙是從黑河（Heihe）那邊，多少帶點走私性質的小商販手中，定期地送給我們。黑河是中俄邊界線上的一個城市，位於哈巴羅夫斯克上游地區阿莫河河谷，由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支線連結起來。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在一系列文章中，主要是以新聞報道方式告訴讀者關於蘇俄國家的形勢發展，還可以更詳細地報道遠東共和國以及中國和日本的實際情況。在另外一系列文章中，特別是在一組專門有關教育的文章中，我們得以解釋各種政治詞彙的意義，例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蘇維埃」、「工會」、「紅軍」等等，為了使讀者容易理解，我們所使用的詞彙都是非常簡單淺近的，表達方式也是通俗易懂的。

一句話，我們這份報紙同人們所要求我們的，是完全相符的。儘管如此，難道不可能出現不受歡迎的情況嗎？難道能使讀者滿意嗎？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嗎？人們肯定地向我們表示，他們是滿意的，報紙是可讀的而且是深受歡迎的，我們但願這都是真情實話。也許這是由於在東西伯利亞地區所有華文報紙中我們這份報紙可說是首創的一家，自始至終用白話文編寫，而不是用文言文編寫，這就是獲得成功的原因。

歲月易逝，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說得更確切一點，三個月過去了——這就是1921年4月、5月和6月都過去了。我們的生活，彷彿一池靜水，毫無變化，或者幾無變化。我們在哈巴羅夫斯克的生活，儘管很少掀起激動人心的波瀾，倒也是相當的輕鬆愉快。我們的生活節奏，慢得令人可愛；勞工聯合會辦事處中，半月編輯一期華文小報的同事們，也跟我們一樣地生活着。我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至於我們的

伙食，在勞工聯合會辦事處同事們的眼中，由於不能同我們共用，就認為是不體面的事。其實，我們的伙食，基本上是切成小片的棕黃色麵包，在鍋子裏煮得熱氣騰騰，比較豐盛的各色蔬菜，還有甜沙司炒綠油油的大蔥，這是地道中國北方人的傳統，就任作民和我兩個南方人來說，在品質上一點不感興趣，但在數量上卻頗合我們年輕人的胃口。一天工作結束時，我們也少不了到城市的大街上去散散步，可大街上看到的那些極端醜惡的行為不斷使我們心驚肉跳，同時我們的內心也感到十分苦惱。街上的商店，從外表來看，連最主要的必需品通常也不能供應。路上行人，很少有穿新衣服的，甚至連穿像樣衣服的人也極少見。人們如想購買比較滿意的衣物，只能買黑市貨，但也只是劣質粗布做的長褲和上裝，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儘管哈巴羅夫斯克人經常抱怨他們自己的命運，但按照勞工聯合會辦事處同事們的說法，他們是不對的。實際上，哈巴羅夫斯克人在物質享受上，遠比蘇聯俄羅斯人幸運得多。還應該說，他們比之東西伯利亞地區其他城市的大多數居民來，也還是幸運得多。這是由於那裏帶有走私性質的小商販，串通俄羅斯的腐敗官員，可以容許他們不斷地來往於黑河與哈巴羅夫斯克之間，這樣，他們幾乎可以喝到他們所需的茶，可以抽到所需的旱煙和煙捲，甚至還可用接近於最高的價格，購買棉織品；使他們可以擺脫那種一絲不掛地在街上東溜西達的尷尬局面。

如果作這樣的設想：認為任作民和我兩人在哈巴羅夫斯克，不是咬緊牙關，不是勉強抑制住內心強烈願望而生活下去的，這就太不真實了。生活得好，吃得好，這決非我們所關心的事，我們所日思夜想的，是堅持要求到莫斯科去。在遠東共和國的北面，中國人居住的地區，當一名報館記者，過着文靜的、按部就班的、不越雷池一步的、彷彿幽禁般的生活，並且在遠離那真正可以探求人類歷史的偉大中心的外面，我們怎麼能想像得到，有人在惦記着我們，思念着我們，關心着我們呢？在西

伯利亞的後方，我們忠誠地為中國同胞服務了將近三個月之後，此時，我們的思緒是：再也沒有任何理由，把我們二人撇在一邊，即算是拋開不管，我們也不能無限期地忍受下去了。大約在 1921 年 6 月底的一個清晨，我們獲悉一件無法預料的事發生了，這簡直是一個「奇蹟」，起初我們還不敢相信我們從今以後就可以跳出這個偏僻的山城了。儘管考慮到我們勞工聯合會中的朋友和同事會因此而難受，我們不願把感情過份暴露出來，但我們確是喜出望外。

「奇蹟的出現」究竟指的是甚麼？原來是：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國勞工聯合會的負責人，接到由遠東共和國軍隊總政委員派人送來的一份急件，這份急件的基本內容是：「茲悉，最近有兩位從中國來的年輕中國同志，恰好在哈巴羅夫斯克市並協助你們工會編輯一份報紙，我們已向布爾什維克黨哈巴羅夫斯克委員會提出要求，請你們同意把這兩位中國同志的工作調動一下，以便能夠分配到我們這裏來。倘蒙允許，深表感謝。」

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國勞工聯合會負責人，察覺到我們並沒有因為這個調動命令而灰心喪氣，他們對我們深表滿意。然而，他們不能不知道，自從今年年初以來，日本對遠東共和國正在醞釀着一項越來越惡毒的陰謀計劃。我們向聯合會負責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就我們而言，不論在原則上或必要性上，我們必須表現出高度紀律性，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選擇。命令就是命令。只要黨和共產國際認為是合適的，使我們可以更好地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無論要我們到哪裏去，我們都準備去。

水滸式的人物「紅鬍子」—— 遠東紅軍中的同事

遠東共和國紅軍參謀部派來調走我們的使者，不是俄羅斯人，而是中國人，是定居在西伯利亞的中國人。他來到了中國勞工聯合會所在地，事實上，除了這裏之外，我們在哈巴羅夫斯克再也沒有其他住址了。不

錯，我們生活的一切都在這裏：寫作和收集資料在這裏，吃在這裏，睡在這裏，但此刻，所有這一切都要結束了。我們動身的時刻已經到了。

那位西伯利亞的中國人，是以遠東紅軍名義派來調走我們的，不容等多久便把我們帶到哈巴羅夫斯克火車站，他雖是個例外卻也證實了這條規律，俄語並沒有比漢語更神秘。他這次接受的是一項高級任務，既充當我們的嚮導，又充當我們的翻譯，當我們逗留在哈巴羅夫斯克約摸三個月時間內，畢竟我們連一分一秒鐘也沒有走出華人世界，實際上，我們對於俄語是完全無知的，幾乎是同我們離開上海時一樣的無知。

我們上了火車，火車開動了，在機動車隆隆聲中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在此期間，我們的翻譯兼嚮導邀請我們到他的車廂去。列車開得極慢，簡直像烏龜爬行一樣，這就使我產生了猜想：要我們去的那個地方，定會像蘇俄其他城鎮一樣，取名為諾夫哥羅德（Novgorod）⁶⁸，肯定離哈巴羅夫斯克不遠。果然不錯，這地方正是這樣的城鎮，此時正為遠東紅軍參謀部及其政治委員設立各個不同的行政辦事處。停靠在火車站附近的曠野上，有一輛客車，但已沒有了火車頭了，這輛列車客車暫充宿舍、食堂及廚房等等，看來是供一批不同民族軍官們使用的。我們的翻譯兼嚮導，直接把我們帶到第一個車廂，並把我們安頓下來，這車廂空着，而且很容易找得着，他要求我們耐心些，在那裏安心地等待一天或兩天，在這一兩天內切不可隨便走開，直到他再次來看我們，然後，他向我們打了招呼，告辭走了。四十八小時後，他果真又來了，向我們宣佈說，遠東紅軍政委希望見見我們，然後帶我們到政委家裏去拜訪他。

遠東紅軍政委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俄羅斯人，他接任職務的時間還不是很長的。當他熱情地接待我們之後，便把夫人介紹給我們，他的這位夫人是非常殷勤好客的，夫婦倆簡直把我們看作自己真正的同志一樣平

68 諾夫哥羅德，意即新建的城鎮。

等款待。事實上他們把食堂裏可吃的最好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主人首先對我們說了類似恭賀的話，然後逐漸地轉入正題，政委說：有可能，遠東紅軍不日內就必須發動對日軍作戰。遠東紅軍司令員已接到莫斯科來的指示，認為在當前條件下，不可避免地要配備一定數量的步兵部隊，步兵分兩類，一類全部由朝鮮人組成，另一類全部由中國人組成；若干由朝鮮人組成的連隊，總數大約為三百到四百人，早已建成了，從政治上來說也已配備好幹部；至於將由中國人組成的連隊，恰好相反，還僅僅處於徵募的階段，迄今為止，還只募集到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左右，雖然大家認為要達到幾千人決非不現實的事。不管怎樣一定要徵募到足夠人數，以便能組成一支師級兵團，或者建立兩個師吧；然而正在徵募的大多數中國新兵，並不十分了解為着甚麼正義的動機，必須在由俄羅斯人為主組成的紅軍旗幟下作戰，換句話說，他們的政治自覺性不高；這恰好是彭述之和任作民我們兩人要完成的任務，這任務就是要提高中國士兵的政治覺悟。

在告辭之前，遠東紅軍政委告訴我們，他的夫人早已準備好，要為我們補上必要的課，以便使我們能夠自然流暢地說俄語，閱讀俄文書刊。政委還說：那位「翻譯同志」，也就是我們離開哈巴羅夫斯克時一直充當我們嚮導的同志，還會繼續照顧我們，特別是他定會全力以赴地為我們市中心很快找到一個住所，這比起現在所住的那輛列車車廂，就會方便得多，合適得多了。同時，每當我們需要向政委提出甚麼要求，就可以對這位「翻譯同志」講明，以便幫助我們去克服困難，至於困難，那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定會在工作中碰到的。

我們的嚮導儘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在市中心為我們找到一個合適的住房，但並未成功。我們在諾夫哥羅德度過的五、六個星期，實際上是在我們初到時暫充臨時宿舍的，亦即停靠車站附近的那輛軍用列車車廂裏度過的。那臨時宿舍當然是很不舒服的，而且處於十分偏僻的地

方，但這既沒有擾亂我們的心情，更沒有阻礙我們的工作。譬如說，一天裏我們必須無休止地走來走去，彷彿是在來回兜圈子。每當一天工作下來已經十分勞累了，我們仍要到遠東紅軍政委的家裏去，不是為了去看望政委，而是為了聽他的夫人給我們上俄語課（她一直是一位和藹可親、樂於幫助而且十分耐心的人）。這樣一來，我們在體力上，實在感到太疲乏了，只學了三個星期，我們不得不懷着極其遺憾的心情，放棄了俄語課的學習。

與遠東紅軍政委會見後不久，嚮導將我們介紹給兩個中國人，他們也是被安頓在與我們同一列車車廂裏，其中一位姓張，另一位姓劉。這兩位身體堅實的人是遠東紅軍中第一支建成的中國部隊的「頭頭」，毫無疑問，我們是要跟他們一起工作的。張君擔任士兵軍事指導員，而我們則擔任政治指導員。劉君是負責招募新兵的主要官員。

張君，原是職業軍人，前沙皇軍隊中的下級軍官（那時，他費了很大力氣才盼到了尉級軍銜），現在他已被剝奪了再度服軍役的機會，不再夢想軍銜晉級的事了。他有一個俄羅斯的妻子，常在諾夫哥羅得城內出現。但不幸的是這個俄羅斯女人是極端魯莽的，是一個無理性的人，要想跟她交往簡直難以想像，然而，這裏所談的事，對於我們來說，幾乎毫無興趣。也毫無利害關係。

與張君相反，另有一位劉君，他是具有不同個性的人，立即引起了任作民和我對他的注意。有時，劉君也頗顯得冷酷無情，甚至極端殘暴。但他的這種冷酷無情的態度，不是針對別的，而完全是為了針對卑鄙無恥行為的反抗，完全是為了一種願望，即在人世間保持最低限度的正義，這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水滸式」英雄人物所堅持的生活原則，這位劉君，從少年時代起，便是名聞遐邇、頗具魅力的「紅鬍子」（Barkes rongc）秘密會社社員，這些秘密會社是非法組織，經常出沒於東北三省境內。此時劉君仍然是黑龍江省北部「紅鬍子」的首領，特別是屬於黑

河境內中俄邊界地區「紅鬍子」的首領。上文我已經提到過，黑河就是阿莫爾河河谷上中國一方的「瓶頸式」城市。這位劉君既是熱忱大膽，富有反抗性，又是慷慨大度，他說話坦率，表情豐富，人們完全有理由說他是「水滸傳」中的人物。

這位劉君從一開始，便對我們顯示出「慈母般」的關懷，幾天來，他習慣利用種種藉口經常跑到我們的小房間裏來。他總是十分關心地了解我們是否缺少甚麼東西，並且盡心盡力地做到使我們盡可能地不缺少東西。看來，他跟我們聊天是非常高興的。我本人就很願意同他聊聊「紅鬍子」的事。「紅鬍子」這個秘密會社在中國所有這些秘密組織中，不論過去或現在，它既非最享盛名，但也決非無人所知；它既非人人都有均等機會加入的，但也決不是關門主義的，難道正是這樣的一個秘密會社嗎？當然，我避免向劉君提出我所想問的一切問題，但我只向他提出幾個最通常的幫派問題，使他絲毫覺察不到我是有意在盤問他的。然而，他卻主動地向我提供有關「紅鬍子」會社的一系列情況，這些情況可以說是既確切又珍貴的。其實，「紅鬍子」這個秘密組織，對他以及對他的家庭來說，都是珍貴財富，他牢記在心，是與之血肉相連的。

劉君十分肯定告訴我說，這個秘密會社長期以來，在中國東北三省從未有過競爭對手，然後他向我說明，在上述三省中，沒有那一個鎮、那一個鄉不是在以「立誓兄弟會」的地下小組組織形式而出現的，一個人一旦作為「兄弟」被接受入社，這個人不論走到那裏，就會受到歡迎，得到幫助，謀得生計；但同樣，作為同等的義務來承擔，這個人不論何時、何地都必須表現出最高的紀律性，如果違反了紀律就會受到無情的懲罰。接着他又向我說明，張作霖是一個投靠日本的軍閥，當時日本正統治着前滿洲三省。張作霖長時期來又是「紅鬍子」組織中的首領之一。正由於他有着「紅鬍子」組織中高級「兄弟」的身份，使他在整個中國東北地區享有很大的勢力影響，才能使張作霖成為當時那樣的一個人物。張

作霖成為那樣的人物之後，卻在光天化日之下充當富人們的保護者，成為日本人的附庸，這個鐵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十足的叛徒嗎？從此以後，在他和他的先前兄弟之間，再也不能容許有相互妥協的可能了，「要麼是他消滅我們所有兄弟，要麼是我們消滅他，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劉君激動地對我們喊出這句話時，話裏包含着滿腔怒火，視線裏充滿面着復仇的烈焰。

「誓死打倒日本，誓死打倒日本第一號代理人——張作霖！」不錯，這就是當時「紅鬍子」的綱領。後來，我更進一步了解到，為甚麼前滿洲國這位剛正不阿的江湖俠士、水滸式人物，為了遠東紅軍的利益，竟能招募到多達二百中國人，這二百多中國人都是經過黑河新近才到達諾夫哥羅德的。當然，他們都是來自黑龍江省北部的「紅鬍子」，是完全為遵命而投奔遠東紅軍的。「紅鬍子」秘密會社，通過劉君的聯繫，便輕而易舉的與蘇維埃俄國結盟，而當時的蘇俄也斷定「紅鬍子」是唯一力量足以牽制日本，並能切斷張作霖賴以建立穩固基地的日軍支隊。在此同時，劉君還保證，要在幾個月之內把遠東紅軍中中國作戰團的實際兵員數額，從原來的二百人增加到一萬人，甚至兩萬人，他說為達此目的，只要運用他在東北三省極北部「紅鬍子」組織內那不容置疑的、最高首領的權力便行了，任作民和我是相信他的，並深信這決非虛張聲勢的欺人之談。

在我們到達諾夫哥羅德市三、四天之後，張君和劉君把士兵介紹給我們以便相互認識。在此初次會面之際，我們只限於說明：新招募來的誠實勇敢的士兵，仍然是屬於十分特殊的兵種，我們已經接到任務，要提高大家的政治自覺性，但此時我們自己尚未制訂出計劃，未能大量提供課程和課程講稿，恰好相反，我們卻希望能與他們更好地合作以便盡可能地提出更靈活、更生動的講課形式，在此前提下，我們向他們建議今後聚會的方式：每天，我們將去看望他們，同他們一起舉行討論會，

會議時間在一至兩個小時以內，在每次討論會前，他們可向我們提出他們所希望提出的所有問題，特別是準備與日本作戰的目的性和動機問題，而我們則竭盡一切，盡可能明確清楚地、全面地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建議，不僅沒有受到反對，而是一致通過了，我們的士兵一致同意，在第二次集會上，準備提出第一份有關問題的單子，這樣從一開始，很明顯地在他們與我們之間便有了「解決問題的適當辦法了」。

士兵們都是來自中國的中國人，都是「紅鬍子」秘密會社的社員，他們的外表模樣極像東西伯利亞地區的中國人，我們在將近三個月時間內，已與這一地區的中國人有過接觸，打過交道。他們之間的文化水準基本相同，精神面貌幾乎是完全相似的。由於這兩批中國人每天都同蘇維埃社會有所接觸，受這個社會的包圍，他們的生活沉浸在這個社會裏，因此，實際上他們的態度是相似的，作出的反應也是相同的，甚至還有着相同的驚異感。當然，他們不是自覺地或明確地，而是出於無意地融合在蘇維埃社會中。他們或者本能地或者出於自願地保持着一種早已形成的思想感情，這就是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同情，他們還受到來自俄羅斯的宣傳影響，支援和贊同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體制卻在早些時候曾使邊界地區即黑河邊界區的情況更加「惡化」，而他們正是這邊界地區的居民。他們對於代表或反映無產階級革命的多種多樣新生事物的理解程度，應該說跟他們同為沙皇帝國的臣民，今已成為遠東共和國公民的理解程度，基本上是同樣膚淺的。他們提出來的或者向我們提出來的有關新生事物的問題，也同遠東共和國公民所提的問題一個樣，例如「甚麼是蘇維埃？」、「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為誰服務的？」、「為甚麼要建立紅軍？」、「為甚麼要有這樣一支軍隊？」等等、等等，為了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首先是真實確切的，但也必須使他們能夠聽得懂，因此，我們使用的語言，跟我們以前在哈巴羅夫斯克市，編輯中國勞工聯合會中文

報紙在答覆前沙皇帝國臣民，今遠東共和國公民撰寫論文時所使用的語言是基本相同的，是具有同樣的教育性質的。

我們很快就認識到：為了要使他們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解釋的一切，我們就必須反覆多次地重複同一命題。單就頭腦及理解力而言，他們這些人實際上是並不靈活的，反應也是不快的。有一個小組，可以說是「紅鬍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僅由幾個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組成，他們基本上都來自農村，有的是無地農民，有的是被大地主，特別是黑龍江省北部那些窮兇極惡的大地主從他們的土地上驅逐出來的農民，以後他們被迫逐漸地轉變成為流浪漢，變成了無業游民，以後又從城市貧民中漸次擴大他們的隊伍。同樣，用不着驚奇的是，他們能利用時間來領會、掌握所學到的一切知識。一旦他們領會了、掌握了，便再也不會忘記。無論如何，如果把他們當作愚蠢的人來看待，那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有一次，他們好奇地提到有關俄羅斯聯邦問題，並且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他們來自中國，因此這是完全自然地、毫不做作地就有關中國情況向我們連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其中首先的一個問題是：「既然俄羅斯人有理由，而且有充份理由轉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麼我們中國人為甚麼不急起直追，同樣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呢？」然而，對「紅鬍子」士兵來說，中國，首先是、而且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在這大片土地上過去曾建立起滿洲國，對於他們的這個「中國」他們是懷有強烈感情的，但是在那裏，他們每個人都曾受到過張作霖全心全意支持的富人們以及張作霖本人的剝削和榨取。他們對這個大叛徒，昔日的指揮官和專制獨裁者的仇恨，是無比強烈的。只要有人在他們面前提起張作霖這個名字，他們就咬牙切齒、怒不可遏，根本談不上對他的關注了。

不幸的是，跟水準較高的紅鬍子不同，也跟他們昨日的「兄弟」、今日領導者劉君不同，一般紅鬍子戰士未能正確地認識到，為甚麼張作霖要把自己取得的成就，歸功於他的日本盟友，為了要把這個具有決定

性意義的重大問題解釋清楚，每當我們談到張作霖時便使用了「軍閥」這個詞，而當我們談到日本時，便使用了「帝國主義強國」這個詞。事實是：我們必須以最大的耐心一一加以評論，以便他們能夠領會問題的實質。我們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使他們有所深刻領會了。當時，我們懷着滿意的心情，將他們自願暴露出來的思想記錄下來，他們說：（1）如果長期以來「不存在」日本帝國主義，那也就沒有軍閥張作霖，也就不可能在他們的家園進行革命，當然也就不可能在他們的祖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2）如果從現在開始，在蘇維埃國家某一省的土地上，發動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那麼明天，他們就可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為反對軍閥張作霖而戰，同樣可為取得戰鬥的勝利作好充份準備。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與新戰士們討論達到一個轉折關頭時，我們便感到比較輕而易舉地說服他們了。我們說：正如中國東北三省境內反對張作霖的鬥爭，與遠東共和國境內蘇聯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休戚相關一樣，中國其他各省英勇的中國人，在其各自地區內反對各式各樣軍閥的鬥爭，也必然同他們反對軍閥張作霖的鬥爭是同樣休戚相關的。當然，當他們懂得了有那麼多的外國列強爭先恐後地擁向中國，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制服中國、肢解中國、在中國掠奪大量財富時，且不說會突然失去控制，但至少可以說是大吃一驚的。他們不禁大聲嚷道：「難道我們沒有可能去反擊這一連串的妖魔鬼怪嗎？特別是難道我們不能成功地頂住他們，並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家園嗎？」然而，他們這種狂熱精神，是不能持久的。因為他們並不了解俄國革命的艱苦性。我們還必須使他們回憶起，俄國革命力量之所以取得勝利，是要堅持鬥爭的，自從 1917 年以來，首先他們不得不同國內敵人挑起來的內戰作鬥爭，使他們領會到只有把壓倒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動員起來、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這個民族才會成為不可戰勝的民族了。

美好的遠景使他們大受鼓舞，他們要求根據我們的意見，應當採取

怎樣正確的措施，才能使中國從一切外國鬼子控制下解放出來，才能從一切張作霖們的壓迫下擺脫出來，他們問道：像俄羅斯曾經出現過的那樣，由革命裝備起來的同一類型政府，能不能在我們祖國建立起來？這個政府首先要關心的問題是不是要收回所有被外國人及軍閥所掠奪去的領土呢？

我們的回答：「當然是的。」在中國如同俄羅斯一樣，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是：把所有一切大企業、大地產，從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手中奪過來，把企業經營權交給工人，而把土地分配給農民。

我們指出的這個前景，顯然堅定了士兵學生們的信心。然而他們多少還帶着點懷疑，再提出下列的基本問題，儘管提出的方式各不相同，這個基本問題是：「你們給我們指明的俄羅斯革命，是作為範例來遵循的，這個革命早已實現了，俄羅斯的大資本家已經消失不見了，大地主也早已消滅了。但是，俄羅斯人民仍然繼續生活在苦難中。遭受着無疑是從未有過的最大不幸——失業。為甚麼會是這樣呢？」為了要消除學生們已經提出的疑團和異議，同樣也為了爭取我們的聽眾能認清共產主義事業的目標，我們不能不運用迄今為止仍然最合理最正確的論據來說服他們，我們指出：俄羅斯革命還僅僅是個開端，還來不及充份顯示出革命的優越性，時間太短，只顯現出一個未成型的狀態，即使這樣，但她已成為無法預料的企圖將之扼殺致死的對象和目標了。由於俄羅斯的國外敵人，如同中國的國外敵人一樣，其國內敵人，包括柯爾察克、塞米諾夫，以及其他白俄分子，也同中國國內敵人張作霖以及其他職業吸血鬼一樣，他們都是一樣的兇惡殘暴，因此，俄羅斯必須要對付這些強大的對手；必須進行自衛，要自衛，並不是沒有困難的，也並非輕而易舉的事，但畢竟她已取得了優勢；現在，俄羅斯已經得救了，但仍然遍體鱗傷，她還只是剛剛開始包紮傷口，醫治創傷；不言而喻，她還不可能立刻恢復健康；可以肯定地說，她的健康情況還不是十分良好的，但

她已有了一對警惕的眼睛，這對眼睛不僅能識破暴露在外的醜惡事物，而且還能識破敵人用五顏六色偽裝起來的種種詭計。

自從我們來到諾夫哥羅德以來的五至六個星期內，我們與劉君及張君的士兵一共舉行過多少次會議呢？至多三十次，至少二十次。不錯，我可以這樣說，所有這些會議給我們留下的印象，跟劉君和張君的士兵們留下的印象是一樣地深刻的。由於開會和講課，已使他們的士兵成長為遠東共和國軍隊的戰士了，不管東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市民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有決心一直戰鬥下去，直到全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直到社會主義取得最後勝利為止。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開會、講課、討論已經揭示了一個基本觀點：如果我們農民想要獲得大片土地，農民就必須得到解放，必須保持尊嚴性，這樣，要在全國接受共產主義，那就未必有多大困難，正像 1917 年在整個俄羅斯曾經接受過共產主義一樣。因為，對於那些被剝奪了一切的工人、農民來說，革命除了使他們身上失去鎖鏈之外，便一無所失了。不言而喻，革命必會到處出現，只要人們懷有幹革命的願望、培養起幹革命的理念，那就足夠了。

幽美壯麗的貝加爾湖 搭列車赴莫斯科

1921 年 8 月初或 8 月中旬，我們從遠東紅軍總參謀部處，偶然得到一個消息，消息說：東京已決定要調整對遠東共和國的軍事戰略，在近期內結束自 1918 年 4 月初以來，一直堅持在東西伯利亞的遠征軍軍事行動，要通過協商方法解決同莫斯科的分歧，這樣，為建立遠東紅軍中朝鮮人和中國人部隊而進行的所有活動——募集新兵、軍事訓練、政治教育等等，今後已經失去了意義，換句話說，應當立即停止進行。儘管我們不了解，東京這次作出的決定，部份原因是在美國外交壓力的強大影響下作出的，然而我們卻不可忘記，日本作出決定的首要動機是：四個月來遠東紅軍不斷地在加強自身的力量，他們在這遼闊的疆土上，是以

維持社會安定，保衛國家領土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的。⁶⁹

再會吧，紅鬍子！再會吧，劉君——你這「水滸式」的草莽英雄！你將回到中國東北部，為反對雙重叛徒身份的張作霖而繼續戰鬥下去，今後用不着困惑不安，而有了更明確的目標，在諾夫哥羅德安營紮寨。我們則往西去，直到莫斯科。

當人們告訴我們，1921年日俄戰爭終究不會爆發的消息之後僅僅幾天，那位一直擔任我們翻譯和保護人的西伯利亞中國人，便向我們宣佈說：「收拾你們的衣物和行裝吧，你們要到伊爾庫茨克去！」從中國人和朝鮮人中招募來的新兵，雖然急於要復員，要遣散回去，但遠東紅軍仍然要求他們中一部份士兵不可離開隊伍，因為還需要留住一些朝鮮人，他們已經學會了講俄語，甚至能比較方便地閱讀俄文書刊，本是有意要把他們培養成為翻譯幹部的。至於中國人，恰好相反，他們要留住的只是一個有用的人——一個有非凡本領的神槍手，這個小夥子能夠雙手各握一支手槍，同時可以把左右兩手的子彈，一絲不差地擊中兩個不同靶子的靶心。我們就是在這些可愛的朝鮮人以及那位令人可敬又可畏的中國人陪同下，在諾夫哥羅德登上一輛列車，動身前往伊爾庫茨克。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近一個星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是由於在路上被耽誤了的，列車缺乏熟練的技工，缺乏一切設備，而且橋樑隧道、車站多處受到破壞，這是蘇聯鐵路線從未有過的。

在我們的心中，伊爾庫茨克首先應當是伍廷康（維金斯基）同志以及楊明齋同志曾經去過的城市。自從莫斯科作出決定，要派遣他們到上海，並幫助陳獨秀創建第一個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即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以來，已有一年半時間了；在我們心中，伊爾庫茨克首先還應當是這樣一個城市，即久負盛名的共產國際執行局遠東分局的所在地。因此，

69 1922年10月底，日軍撤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再過十多天，即1922年11月10日，遠東共和國這一緩衝國的身份便自動消失了。

我們剛一離開伊爾庫茨克車站，便立即被護送到該局的所在地，接着便住進了招待所，在我們看來，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儘管如此，我們能在現場很快又看到了楊明齋同志，怎麼不令人感到這是多麼驚奇的事。

楊明齋同志留在上海，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後不久，才由一位俄羅斯人陪同，於1921年盛夏季節，又前往伊爾庫茨克了，這位俄羅斯人就是V·達林同志，他在中國作了短期逗留。達林同志是共產國際執行局遠東分局的成員之一。他在這個組織內擔任的主要職務，是推動和促進中國、朝鮮、日本等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的進展。同時，他還是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人之一，顯然，這就大大有利於他去完成這項任務。正由於這樣，他作為青年共產主義國際遠東分局的負責人，接待任作民和我的任務，便自然落在他的身上。此外，就法律形式的所屬範圍來說，我們不是任何別的身份，而正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兩名團員。達林已是三十來歲了，但在我們看來，他仍然充滿着青春活力。他不僅品德高尚，而且工作認真。這位俄羅斯人非常殷勤好客，他出於本能，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在他和我們之間可以說是毫無拘束的，確實給我們留下了純樸而爽直的印象。此外，中國對於他，卻是個神秘的國家，豈僅如此，中國使他念念不忘，也使他困惑而入迷。他總是不斷地與我談起中國，有時促使我跟他談中國，在這個時候，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他能夠動員起來作為我們之間的翻譯人員，不是別人，只能是楊明齋了。我們之間的這種交換意見的方式，可以證明達林同志又是個熱情洋溢的人。為甚麼中國這個國家會使他如此入迷呢？因為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很費腦筋而又很難理解的國家，因為他並沒有正確地認識到，要抓住問題的哪一個方面，才能理清他將之比喻為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堆亂麻。

作為一個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達林同志能夠察覺得出，不論誰企圖要「解開中國的神秘之謎」，首先要完成的第一步任務就是要徹底研

究中國的社會，要致力於揭示出中國固有的特點，還要進一步考慮人們是否有權可以說，在性質上中國社會不同於其他社會呢？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然而，當他根據他自己的意見，對我解釋道：好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呈現出來的是一群獨立的、諸侯割據式的、所佔領土大小不一、統治形式各不相同的封建集團的結合體。聽了他的這番解釋後，顯然我是不能認同他的論點的。

為了力圖使他懂得他的錯誤，他的偏聽偏信，我也對他談出了我的意見，其基本要點如下。我說：在今天中國，你所發現的，確實存在着的軍閥割據的分散局面，恰好跟你所信以為真的是相反的，這種分散局面是完全反常的，例外的，實質上應歸因於辛亥革命（1911年10月革命）的創始人，自1913年春天以來遭受失敗的結果而引起的。自從那時以來，也僅僅是從那時以來，中國同時存在着兩個體系的軍事獨裁統治集團，彼此一樣均不穩定，在中國北方，有一個統治集團是由袁世凱派系的分裂而形成的；在中國南方又有另一個統治集團，基本上是與孫中山的黨結合的。儘管這種類似現象，在過去歷史上曾反覆多次出現過，儘管我也承認，這是一種迴圈反覆的性質，而且也難以看作是簡單事件的重演，但是這種現象是很少能夠持久的，在任何情況下，毫無疑義，都應當將其考慮為一個例外，但例外也就更加證實了規律，也就是說凡規律總是有例外的。自從秦始皇以其英雄膽略統一了全中國，並在秦法律控制下所推行的政權，就稱為帝國中央集權主義政權⁷⁰。自那以後，這種中央集權主義政權在中國曾經長時期地存在着，而且中央集權主義的加強和鞏固的傾向越加突出起來。歷來，中國政府以皇帝名義派出去的長官，輪番地統治着中國本部各省、或國防前沿各省，這些長官都只是為中央政府服務的奴才。如果要使這種情況不再繼續下去，那就必須推翻中央

70 秦始皇，中央帝國的創始者，即著名的「中國凱撒」，是統一中國的第一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這皇朝稱為秦朝（西元前 221-207）。

政府。如果要推翻中央政府，唯有真正空前嚴重危機的存在，唯有王朝危機、亦即消滅王朝整個體系的危機存在，才能引發無政府主義的、災難性的政治局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基本問題。但不幸的是，不僅唯有中國人未能認識到，如果這種災難性局面長期存在下去，則中國本身將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⁷¹

如果說，我同達林同志作了一次談話以及有關性質相同的其他談話之後，便能成功地改變了他的見解，那是不符合事實的。然而，我終於能使他的態度有所動搖，這是因為達林同志最後向我表示，他同意我在回答時與他的看法不同的那個問題上，他認為確實值得深入研究的。此外，另一個更值得擔心，更值得注意的問題，那便是中國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關係問題，不論是同他們的整體關係，也不論是個別關係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遠未能像他那樣說得合情合理，十分中肯。不錯，他向我提出來的最清楚、最確切也最珍貴的觀點是：在沒有解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之前，要想規定中國的革命的戰略任務，那是不夠嚴肅的。這一思想一直困擾着我。

楊明齋和我兩人，感到最值得關注的唯一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事。楊明齋的期待心情特別迫切。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期待着，是唯恐會上的辯論，會後的結果，由於不太令人滿意，而且沒有特色而不能不感受到失望。他特別強調這一點。他不斷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而且深感惋惜的是，不論從政治觀點或組織觀點上看，

71 V·達林，作為青年共產國際的代表，密切注視着並領導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這次大會於1922年5月於廣州召開。接着，他在廣州拜會了孫中山，企圖說服孫中山在中國有建立國共兩黨聯合戰線的必要性，但孫中山並沒有被說服。1922年8月，達林再次在上海與孫中山進行一次新的會談，這是一次劃時代意義的會談，因為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孫中山在莫斯科使者面前，提到了國共兩黨合作方式問題，合作的原則是中共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到國民黨中去。

1923年，達林以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身份，在支持托洛茨基反對三駕馬車（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的聲明上，是聯合署名者之一。

代表大會都沒有顯示出富有成果，也不能在有關組織的決議中，清楚地規定黨的方針和路線。在大會上通過的黨章中，也未能反映出布爾什維克精神……隨後，我感到我應當在這個問題上，使楊明齋同志的精神振作起來，無論如何我力圖向他作出解釋，我說：儘管我對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工作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但根據我的揣想，大會工作之所以受到障礙，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結果，不僅是由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仍然處於幼稚階段所形成的，而同時還由於以下各種條件偶然湊合起來的不幸事實起了決定作用：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參加會議；代表中剛剛入黨黨員的比例過大，特別是全體代表有關制訂黨章、作出決議以及提案方面缺乏經驗；此外，還由於意料不到的到處有警察的干擾威脅造成的惡劣環境等等。我向楊明齋保證說，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切都會改變的。我還要使他確信，只消幾年時間就足以使我們黨成為真正的共產黨，成為不愧為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那樣先進的黨。

任憑我怎麼做，怎麼說，但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為了說服他，我甚至弄到精疲力竭，但可悲的是，我並沒有使我的同志提高了鬥志，振作起精神。我滿懷的樂觀主義豪情，卻絲毫沒有博得他的同感，楊明齋照常搖着他的頭。誠然，楊明齋是一位情真意切的人，有一顆善良忠誠的心，他有一個缺點：這就是思想僵化。我認為，正是思想僵化這一缺點，妨害了他不能在極其複雜條件下去正確理解俄羅斯革命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同時也證明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幼年階段的幼稚性，缺乏最低限度的寬宏大量。雖然，從理論方面來說，楊明齋的馬克思主義修養是十分堅實的，但最近幾個月來，他卻產生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認為在俄國已經取得的經驗光照之下，中國能夠而且應當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一個理想的革命黨。但現實促使他拋棄了幻想，他不再接受了，不再信以為真了，也不再提起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了。

楊明齋對於我們其他中國共產黨人，表示出極大反感，這可以說是

無法改變的，他在開始時力圖要在蘇維埃國家謀求一個小小職位，但沒有成功。他只得重新回到中國，設法依靠筆桿子來謀生，例如作一名翻譯者、評論家或作者。但回到中國後，他很快便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是沒有重大的前途的，正如1924年6月間李大釗在莫斯科時告訴我的一樣。此後，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

當我們逗留在伊爾庫茨克期間，給我們帶來最大的歡樂，並不是能同達林同志交換思想，也不是同楊明齋同志能開誠佈公地談到了我黨的前途。這最大的歡樂是從達林同志口中很快聽到一個消息：任作民和我兩人終於可以再次乘列車轉往莫斯科，而且立即就可跟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同志們團聚了。簡言之，不管怎樣我們再也不必擔心會接受同樣令人失望的任務分派，如同前述在哈巴羅夫斯克接受為期三個月，以及然後又在諾夫哥羅德接受為期一個半月的任務那樣。但是只因開往莫斯科的列車既少又不定期，我們不得不在西伯利亞又逗留了八到十天。說實話，我還應當在此順便地補充幾句話：儘管任作民和我曾下過決心要證明我們具有高度的革命紀律性，然而在最後幾個月，特別是在哈巴羅夫斯克市為中國勞工聯合會工作期內，有時真想回到中國去。假定有這樣的情況，國際認為有必要，繼續考驗我們能在東西伯利亞更久地「埋藏」下去，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將會違背國際命令，以這樣或那樣方式返回家鄉。

但今天不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不久之後我們便可以前往一年來一直嚮往的地方——莫斯科。自從我們踏上遠東共和國的領土以來，我們才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美好的、同時也是紅色的生活景象。伊爾庫茨克，在我們看來同樣是風光秀麗的城市，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大約有好幾天可以自由活動、輕鬆愉快的休假期。我們便無愧地利用這幾天休假期進行了一次旅遊。我們凝視着的西伯利亞森林，一直向我們這裏延伸過來，說實話，直到此時以前，我們從未看見過，而現在我們終於發現了

我們不厭其煩地一再讚賞森林的遼闊宏偉。啊！變化多大！重新點燃起來的希望，不是源於人們的頭腦中，而是源於人們的生活中。

在西伯利亞，如同在俄羅斯一樣，一年中令人最注目的可愛時刻是夏末季節。我們在動身赴莫斯科的前一天，遊覽了貝加爾湖，沿湖的群山上，積雪早已消融了。我們在貝加爾湖的水面上，可看到微微顫動的莊嚴圖景的倒映，湖水清澈見底，在落日映照下，一陣微風拂過，變成一幅巨大的、彷彿佈滿星星的、光彩動人的織錦。世上還有甚麼景色比這更美嗎？

列車緩緩地往前駛去，把我們帶向莫斯科，帶向西方，當我們凝視着這大片森林時，貝加爾湖幽美壯麗的風光所啟示的，那種半脫離現實生活的情思，不止一次地在我們心靈上再現。那森林，特別是俄羅斯大地深處的森林，要遠遠勝過西伯利亞的森林，即使在列車上，只要我們全神貫注地沉浸在這森林的海洋裏，彷彿我們的心就飛起來了，飛向天空，飛向雲層，一直飛到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七重天」。但遺憾的是，每當列車停頓下來時，彷彿我們從天上重返人間，我們不禁產生一種強烈的可悲感受：彷彿一下子被摔在人間苦海的深處。

列車越益駛近莫斯科時，我們看到的各車站、碼頭及其附近的景象，越發令人感到苦惱。每當列車停下，而且不論停靠在哪裏，都有成千上萬的城鄉居民，他們衣衫襤褸，身上撲過來陣陣惡臭，爭先恐後地要攀上我們這輛已經擁擠不堪的列車，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呢？他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他們希望要得到的是甚麼？顯然，由於饑荒，他們缺乏日常生活必需品，這饑荒已經把他們折磨得夠不幸了，人們可從那無法形容的臉部表情，恐慌不安的眼神中，察覺出他們的飢餓愁容。他們手中或緊握着少有的幾片麵包，塗上劣質奶油，或幾個清水煮蛋，或更不易得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小商品。就這樣，他們希望用手中的物品，去換取幾盒火柴，幾克粗劣的煙葉，幾平方米破舊的衣料，甚至劣質紗布。

事實上，誰也不會對銀行鈔票產生任何信心。鈔票貶值得很快，從當時來說，唯有以物易物的辦法還能起到一點作用。但可惜的是，這種以物易物辦法太原始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連任作民和我，根據自己的經驗、教訓，也就馬上能看出其原始性來。

我們的旅程日復一日地持續下去，由於體力不支，我們必須不時地購到一點食品來填飽肚子。但事實上，我們甚麼也沒有買到，說得更確切些，我們碰到了極端困難。為甚麼會是這樣呢？因為我們只有現錢，這還是公家的錢，（在伊爾庫茨克時，共產國際執行局遠東分局把錢交給了我們），我們希望用錢向店主買些食品，但在店舖裏，我們私下瞅一眼，看到一部份清水煮蛋，還有一些麵包，但大部份食品是無價的，連一點價格都沒有。

自從新經濟政策（耐普）出台以來，還不到六個月，在人民的消費水準上看不出有任何明顯的提高。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以及內戰，一共是七年，在這七年內形成的頭等重要必需品的匱乏，已經達到了頂點了，這些重要必需品首先包括燃料和服裝，特別是人們所急需的食品。此刻，我們也同樣是腹內空空。此刻，可以說，至少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已同俄羅斯人民同命運共患難了。但是我們仍然充滿着希望，只因為我們有着似火般的激情頭腦，有一顆歡暢、快樂的心。從西伯利亞內地，我們從東到西橫穿過整個亞洲北部，列車也已精疲力竭了，發出了最後掙扎的嘶吼，此時，莫斯科這個十月革命的光輝城市，剛從地平線上顯出她的輪廓時，我們兩人費了好大力氣才能抑制住我們內心的激動。

第九章

任駐莫斯科中共小組
書記，入讀東方勞動者
共產主義大學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或東方大學，創辦於 1921 年 3 月。1921 年 4 月，東方大學開學了。我們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外國語學社第一屆學員，是從哈巴羅夫斯克去的；不久之後都成了東大寄宿生。1921 年 9 月初，列車終於把我們帶到了莫斯科，我們剛一離開火車，就刻不容緩地趕往東大與同學們相會。

東方大學的高大建築物，矗立在特維爾斯卡婭和普希金林蔭大道的拐角處，面對俄羅斯這位不朽詩人的銅像，東大校舍恰好位於市中心，再也沒有比這個地點更適中了。特維爾斯卡婭大街，實際上就是莫斯科的「愛麗舍宮」大街，不然的話，又會是甚麼呢？當人們從東方大學外出時，很少能抵擋住這種誘惑力，要到這條神奇的林蔭大道上去遊覽一番。那時，人們就會發現，在莫斯科瓦大街的周圍，聖·巴西勒教堂雖然不高卻很壯觀的剪影格外的顯眼。可惜，如果從裏往外看，倒不如從外往裏看，東方大學的景色更為秀麗，東大校園寬敞，並不缺乏公共場所，但顯然是一片肅殺景象籠罩着一切。譬如圖書館吧，圖書匱缺，設備簡陋，這是我感到最傷心的事。

這不僅在東方大學本身是這樣，此外，在特維爾斯卡婭大街的另一邊，說得確切些，即在林蔭大道第五十一號，住着三百至四百左右不同民族，不同國籍的學生。從 1921-1922 學年第一學期以來，這裏早已成為東大校舍的一部份。學生們居住的樓房共有四層，所有這四層樓房，都像東大本身一樣，房間寬敞而設備簡陋。分配給我們中國學生住的是一座獨特的而且十分寬大的房子。嚴格地說來，房間裏除了床鋪，幾條橈子以及幾張桌子之外，幾乎沒有甚麼別的設備了。我們的床鋪用二、三塊木板草草地湊合起來就算是床板，另加一張草墊，和一條毛毯；而桌子則是以粗糙的木塊，用幾枚釘子敲敲打打便算做成了。房間裏是有取暖設備的，一隻大型烘爐經常燒着木柴來保持溫度，散熱器也起到了令人滿意的作用，所有的窗戶都是內外兩層的；我們就這樣安全地、方

便地保住自己度過俄羅斯的嚴冬。但是我們還應該說，這裏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缺點，那就是在我們的寢室裏，幾乎連最基本的衛生規則也沒有得到遵守，不管怎麼說，這恰好表現了我們的不重視、不關心，彷彿我們已被學習的熱情吞沒了。

我們的個人服裝，早已穿得破舊不堪，也太單薄了，簡直抵禦不住即將到來的嚴寒。東方大學行政領導催促我們趕快換上學校制服，這些制服是我們到達莫斯科後不久就發下來了。應該說這制服並不是新做的，但我們穿起來並不感到緊身，說實話，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只感受到制服太大太寬。事實是，這些制服是按照高大的俄羅斯人的體型裁剪的，是給這些高個子穿的，現在穿在我們這些「遠東小個子」身上，打個比方吧，彷彿是把大熊皮披在幼仔身上一樣。可以肯定，要把上衣和褲子改短改小是完全可能的，但我們如何安排帽子尤其是鞋子呢？我們每人都穿起長統軍靴來，就好像是神話裏吃人妖怪穿起長統靴來的那個「小蒲賽」一樣，一鼓勁便可越過七里路。為了不使自己的雙腳長期在軍靴裏漂蕩，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能用各種各樣織帶，甚至用大量報紙把腳趾包裹起來。袁達時是我們當中最矮小的一個，他穿插上俄羅斯式的奇裝異服，東搖西晃，做出來那種令人可笑的樣子，每當我們同他邂逅時，忍不住就要笑出聲來。

與此相反，如果說有甚麼事，我們從來不會當作玩笑來看待的，那就是極度缺乏營養。一杯熱開水，再加一塊方糖，基本上就成了我們的早餐了。每個月我們可以配給到四百五十克方糖。而市場上卻有大量令我們深感興趣的舊書，我們大多數人就無法抵擋住書的引誘力，就只好用糖去換書，因此一大清早起床時，經常留給我們的，實際上只能喝一杯熱開水。按規定，每三天，我們可以配給到一磅半左右的所謂「麵包」，但實際上，這種「麵包」主要是由品質可疑的麵粉以及切成小片的已腐爛掉的甘藍菜組成的大雜燴，而我們還不能不體會到，這樣的營養物是

同類食品中獨一無二的。每天，我們可以配給到這種有幾分像麵包的「麵包」。但過了二十四小時後，「麵包」就收縮變硬成為乾巴巴的了，人們再也咬不動它，甚至切也切不開，但不久後它自身又會變為一堆粉團，只要用手指去碰它一下，就粉碎了，這樣也許更好一些，把它裝在碗裏，用湯匙盛着吃。食鹽也同樣是定量分配的，我們從來就沒有足夠的食鹽。每天，我們都要到東大食堂去用餐，中餐和晚餐，我們帶去已剩下不多的用報紙包着的麵包，還帶去碗和木制餐具。食堂裏每餐飯，主要有少量水煮土豆（而且也不是經常有的），說到蔬菜，僅有一碗淡淡的甘藍菜湯，至於主菜方面，是一小塊乾魚（那更不是經常有的）和一小塊肉類。這一小塊乾魚，散發出來的那種惡腥味，在第一個星期當服務員給我們端上來時，我和大家一樣，連碰都不敢去碰。但是，經不住飢餓的折磨，隨後，我就鼓起勇氣冒險去嘗一嘗。可現在呢？像所有人一樣，我倒感到十分美味了，再也用不着細細咀嚼，簡直是囫圇吞棗般地吞下去了。

當時，我們的營養很差，但我們還必須堅持下去，經得住考驗，大體上說來，要堅持到 1921 年 11 月至 12 月之間，至於我本人，不容置疑是我們當中堅持得較好的一個，這有兩個原因：第一，直到 1921 年秋，我生活在東西伯利亞，享有優越權利，可以吃得飽；第二，從先天性來說，我生來就是一個比較健康堅實的人。但我們是不可能一個接一個，包括我在內，長期地陷於這種可怕的困境，特別從 1921 年底開始，我們的最後體力儲備已經消耗殆盡，普遍的營養缺乏又進一步惡化了，東大發覺到在這種情況下，給我們提供適當的醫療照顧已是不可能了，在過度疲勞之下，要想學習得更多，觀察得更多，也是不可能了。身體消瘦，臉色蒼白令人感到擔憂，而我們的身體卻在不斷地虛弱下去。下課後，要回到寢室去，我們必須攀上兩層樓，這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已是一件難以忍耐的費勁事了。每當我們走路或工作時，只一剎那間，突然

我們的眼前一陣發黑，這實在太可怕了，隨着時間一天天的過去，這可怕的情況越來越頻繁，我們的視力也越來越不行了。甚至，還比較經常性地發生這樣的事，即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忽地失去知覺，昏倒過去了，而且昏倒的時間相當長。我們都病倒了；這是因缺乏營養而引起的，並因此，我們還得了不同程度的嚴重疾病，這就是結核病。就我自己來說，在東大的這幾年中，也受到了結核病的影響。

蕭勁光，在我們東大中國學生中，無疑身材是最高大的一個。因此，這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他一直存在着吃不飽的問題，據我揣想，他的胃口要比我們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大兩倍以上。我在莫斯科初次碰到他時，他是身強力壯，可是到了 1922 年初時，由於飢餓折磨，他已經瘦得不成樣子了。蕭勁光每次用餐，一口氣狼吞虎嚥般地把麵包吃光，這數量恰好等於我們每個人三天麵包的定量配給。我敢說，在這幾個小時裏，他確實體會到幸運之至，但好景不常，幾個小時飛快過去了，他又感到要挪動他那巨大的身軀卻是非常痛苦的，他寧願躺在床上動也不動，每當有同志經過他的床前時，他必伸出手來懇求這位同志說：「同志，請給點麵包吧，請給點！」彷彿就是一個地道的叫化子。我們經常可以給他的，僅僅是一點麵包屑，這點麵包屑放在他的手心裏能成甚麼東西呢？實在是太可憐了。

誰能想到，1922 年初在俄羅斯，不論從哪方面來看，特別是從食品配給的觀點來看，我們作為著名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作為外國人，卻成了享有特權的歐洲人了。

過去，我曾經說過，由於幾個主要原因，蘇維埃國家從 1920 年底開始，從總體來說，是處於物資混亂、經濟癱瘓、生理上極度痛苦的艱難時期，這種情況到了 1922 年同期，不是改善而是更惡化了。關於這方面情況，我在此只提供以下幾點說明：

一、1921 年，鋼和小麥的產量，分別僅及世界大戰前最後一年，即

1913年產量的6%和48%。

二、1921年下半年，史無前例的旱災襲擊伏爾加河流域以盛產糧食著稱的整個地區。這整個地區的居民，不僅突然間表明他們不能向其他地區以及大城市居民提供成千噸穀物，這些地區或大城市居民的糧食，過去歷來是由他們提供的；而且本地區居民還不得不背井離鄉，到一些比較幸運的地區去乞討度日，但這些人當中，有年老的，年幼的，有大量婦女，還有病殘的，不可能隨大夥去行路乞討，而只能被迫放棄而留在家裏。這些留在家裏的人，不言而喻，一個接一個地被死神奪走了，那麼究竟有多少窮苦的人是這樣死去的呢？一百萬？兩百萬？受災人數的總計是否在一千萬以上或者更多呢？我無法知道。實際上誰也無法知道。

三、經濟政策，是一門嶄新的政治經濟學，是由列寧親自制定，並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3月通過的，但按照最普通的城鄉居民的理解水準，想要產生可以感覺到的效果，則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同時要想使新經濟政策充份發揮作用，勢必要受到廣大幹部有意識的反對與破壞，因為他們是在「戰時共產主義」這種形式下接受共產主義的，不可能接受新經濟政策這樣的構思。由於不了解蘇維埃國家出現食品短缺的根本原因，在農民中首先表現出來的是憤然不滿，更糟的是、發生了農民的叛亂。為了要重新取得農民的信賴，就必須解決農產品的徵購制，例如用現金繳納糧食稅制來替換以資鼓勵，才能提高農產品的產量。人們還不得不承認，為了要發展對外交流，就必須在貨幣領域中回到金本位制上來。由於人們未能領會，或者不願領會當時列寧提出的口號「要向商人學習，向資本主義世界托拉斯巨頭學習」，並且還僅僅為了要鼓勵他們初步學會最基本的經濟生活法則的概念，蘇維埃政府還突然想到要去說服俄國黨的基層活動分子，而這些人卻是頭腦最簡單、最淺薄、而且是最頑固不化的。啊！1921年最後六個月，我又

多少次聽到人們發牢騷或低聲抱怨說：「這樣下去，將會發生甚麼事呢？難道現在我們又要採取資本主義辦法嗎？難道我們又要幹我們最兇惡的敵人要幹的事嗎？模仿他們嗎？穿他們的老鞋走資本主義老路嗎？」

列寧，列寧的黨及其政府，決不向人民隱瞞局勢的嚴重性，相反，卻向全國人民廣泛地提供了真相。例如，在莫斯科，黨和政府利用最廣大的公眾場所，組織一次大型的圖像和照片展覽會，毫不掩飾地展示了蘇維埃國家普遍流行的饑荒，以及人民遭到的不幸和痛苦。儘管黨和政府並沒有下令禁止，但前來參觀展覽的外國人僅佔少數。然而，我們東方大學的中國年輕學生，卻享有特殊的一天，可以集體地長時間地前往參觀展覽會。展望會所展示的一切，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但又是十分淒慘的情景，例如剛剛死去的小孩，那彷彿還是活着的四肢，全是皮包骨頭，而此時，他們的父母正在鍋子裏燒甚麼可吃的東西，實際上要給他們餵的全是樹皮，還有用高嶺土捏成的所謂「麵包塊」。無人掩埋的屍體，無人援助的垂危病人，所有這些夢魘般的情景，所有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慘象，卻都是真情實事。當我們注視着這些圖像和照片時，我們的眼裏不禁淚如泉湧。

類似嚴重的恐怖災情，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震驚；列寧、列寧的黨及其政府為了不使自尊心受到損害，不願以屈辱的感激來換取來接受外國人的救濟；但是只要從純人道主義名義提供救濟的，蘇聯黨和政府也會提出申請；他們曾向國際發動一次規模較大的糧食救濟募捐運動，為了取得成功，他們也毫不躊躇地向全球以慈善事業為使命的不同機構，提出申請，與此同時也曾向在物質上能作出有誠意的反應的所有國家提出申請。美國人 H·C·胡佛，他回應正在為饑荒所苦的蘇聯政府的呼籲，不久後便到達莫斯科，並在組織援蘇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正如他在西方發揮過重要作用一樣。當時中國，也因為北京著名人士胡鄂功（Hu Egong）將軍僅花幾個星期時間，便募捐到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

四萬大洋，不久後就利用這四萬大洋，購買到整整一列車的麵粉。中國支援伏爾加河流域災民的救濟代表團，由知名人士王雲功（或王登雲）、彭澤湘（Peng Zexiang）、彭兆賢（Peng Zhaoxian）及楊建忠（Yang Jianzhong）組成。他們接受護送救濟糧使命，約於 1921 年底最後幾天，或 1922 年最初幾天，完全成功地到達莫斯科。

另一方面，為了從死神手中奪回上萬骨瘦如柴的病孩，這些病孩由於無人照顧，在大城市及其周圍漂泊流蕩，蘇維埃政府特地派遣一些小組出去，要求各工商企業以及公立或半公立的組織去「收養」他們，這就是說要求這些企業或組織負責病孩的食宿和醫遼照顧，當然，政府不可能給他們提供那怕是最小量的額外配給，也不可能提供最小量的補充撥款。1922 年初的一天，東方大學同樣地也接受了約五十名這樣的孤兒。儘管我們一無所有，但為了幫助孤兒們能繼續生活下去，我們想盡一切可能辦法，來完成自己的責任。瞧！這些孤兒們的縷縷愁緒，小而瘦削的臉龐上，兩隻大大的眼睛鼓出來，像火柴梗般的搖曳不定的兩腿，支撐着飢腸轆轆的空腹。這空腹啊，簡直像是充了氣的氣球，為了救活他們，誰還不願意作出犧牲呢！?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裏，因大多數的學生是屬於蘇維埃國家東部少數民族的代表，包括高加索族、哈薩克族、土庫曼族等等。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以及蘇維埃國家西部少數民族代表有他們自己的大學，通常也就是俄羅斯各大學，在我們中國學生卻不是包括在他們當中的。1921-1922 年間，與我們中國學生相處在一起的有幾個蒙古人，隨後不久又增多了幾個（但由於種種原因，蒙古學生人數從來沒有很多）；我也曾反覆考慮過，不把蒙古學生看成蘇維埃國家東部少數民族的代表，而寧可把他們看作外國人，究竟有甚麼好處呢？為甚麼不顧這一事實呢？即：從莫斯科的觀點看來，蒙古政府從理論上來說，早已建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了。但實際上，由於他們的固有成見，從蒙古人身上看不到革命

正待進行的一個國家的僑民身份，就是說看不到早已蘇維埃化了的或正在蘇維埃化的共和國公民的身份。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中，可以而且應該視為外國人的，總數大約五十人，但五十個人在全體東大學生三百至四百名中，當然不算是很多的；然而，他們決非無關緊要。在這大約五十個外國學生中，中國學生約佔三十人左右，其餘的主要是波斯人（五至六人），以及十多個朝鮮人，其中有幾個是前遠東紅軍戰士，而正是這幾個朝鮮人曾於1921年8月間陪送我們完成了從諾夫哥羅德到伊爾庫茨克之行。

從我逗留莫斯科開始之日起，直到結束，也就是從1921年秋季開始直到1924年夏季為止，東方大學在校學生人數已顯著地增多了；但與此相反，他們的少數民族成份幾乎還保持一樣，來自蘇維埃東部和東南部，以及來自蒙古的青年學生平均每年佔總數的六分之一。而外國人中的過半數，是來自中國的青年學生。外國學生中除中國人、波斯人和朝鮮人之外，東方大學，於1922年至1924年間還接受了若干名日本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亞人、印度人，甚至有一名來自中國新疆省的、可以說已經漢族化了的維吾爾族人；實際上，在此期間，只有蒙古人小組與朝鮮人小組中偶或有少數的青年女學生報名註冊。

東方大學建校初期的校長布洛伊多（Broido）是一位老革命家。直到十月革命爆發之前，他是孟什維克領導人之一，隨後加入布爾什維克，當創辦東方大學時，他預先便接受任命、主持東方大學。此前，他擔任過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人民委員，也因此加入了斯大林派。布洛伊多博學多才，精通教育學和心理學，不論理解能力和辦事能力都比較突出，從1920年初開始不容置疑地他是俄羅斯大學傑出領導人之一。所有的人都尊重他，聲望卓著。他的夫人是一位賢內助，只要有可能，她便全力支持他，因此也同樣受到人們的愛戴，儘管他們位居顯要，但絲毫沒有妨礙他們為我們所有東大學生做了很多有利的事。例如，對我們中國學生

來說，當他一經注意到我們確有勞動過度的傾向，便十分關懷，有時特地來看望我們，只為的是要我們克制自己，對已經虛弱的身體要好好保重……布洛伊多擔任東方大學校長之職達好多年。

東大教授中，有不少人是富有教養的比較高級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是俄國共產黨員，其中有幾位是經過長期考驗的布爾什維克。此外，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倒是實實在在的年輕者。這批年輕教授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一週中，我們每天至少要用六個小時，跟他們學習各種學科。他們開設的學科共有五種不同題材：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西方國家革命與工人運動發展史、19世紀的俄國的社會運動、俄羅斯共產主義運動史以及十月革命與社會民主黨的創建。我們的課堂也決不會長期不開新聞時事課的，這是很自然的事。每當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時，我們的教授先提出基本報告，然後在我們東大學生中展開討論。最後，東方大學千方百計要反覆傳授有關地下秘密工作技術的一些基本知識，例如密碼通訊技術等；校方要在外國人學生中精心挑選若干人來學習這種技術，我很榮幸也被列入名單中。

誰也不會對東大的培養和教育有過錯覺，或產生非現實的想法，東大給我們提供的教育形式並不是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或者非常精練的。一般說來，東大的培養和教育形式是不夠成熟的，其缺點常常是過於簡單化，是一種粗糙方式，是中等水準的幹部學校方式，其唯一目的是：要求我們初步學會無產階級政黨所具有的蘇維埃式革命的工作能力。但同時，這又是一種扎扎實實的教育方式，頗有系統的教育形式，如果按語言的措辭意義上來說，是明顯具有列寧主義的特點的。而且這種培養和教育形式會產生直接的效果，1921年底，我終於發覺，接着便不厭其煩地一再談到了這個問題，這就是說，對於我們中國青年學生來說，我們原先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只是十分有限的概念，對世界革命史，嚴

格說來，是一無所知，因此，我們認識到在東方大學所接受的這種培養和教育形式，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更確切地說，是不可替代的一種形式。

東大的全部課程是用俄語教授的，因此，開始時，除一兩個人外，如果沒有通過翻譯的講解，我們幾乎無法跟得上。這句話的意思是：按精密的數學法來估計，如果不通過翻譯，我們要想領會課程內容，或者需要付出的時間要比正常所需的時間多兩倍以上，或者就只能領會到課程內容的一半，然而，我們卻從俄語課上獲益不少，這主要是由於傑出的翻譯者，上文已經提到過的霍霍諾夫金不惜犧牲一切作出了很大貢獻所致，使我們在經過努力之後得到了很大的效果，至少使我們能夠讀懂刊登在《真理報》上的俄文文章，也能聽懂從大學講台高處傳來的俄語演說，這樣，到 1922 年春天，我們絕大多數人，便能一個接一個地「直接地」領會教授們的講述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們當中一些人如果沒有通過翻譯者的講解，不管是多麼機智、靈活，也難以超越語言這道障礙。當時有哪些翻譯人員呢？有一兩個俄國人，他們像霍霍諾夫金一樣，曾在哈爾濱學過中文。此外還有兩個年輕中國人，他們是在 1921 年初被派送到莫斯科的，但他們被派遣的途徑、方式，是跟我們不同的。儘管他們兩人早已成為共產黨員，但不是屬於東方大學組織範圍之內的。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是我在上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過的李宗武，他是人所周知的梁啟超的外甥，另一個是李宗武的同伴瞿秋白。

至於說到我本人在俄語學習方面，以前確實未很好地掌握或使用過俄語的日常用語，因此也沒有同屬於革命知識階層的其他俄國人建立起真正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的關係。但後來，僅僅幾個月中，我在俄語閱讀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這種進步的取得，連我自己也頗覺驚奇，更值得驚奇的是，那時我所依靠的只是一本在哈爾濱編輯出版的中俄辭典，這本辭典既古老，品質又很差，不久後，我換了一本較好的日俄辭

典，但我讀日俄辭典當然只限於憑漢字（Kanji）⁷²來理解了。1922年底之前，我已能做到大量閱讀幾乎所有用俄文寫的或譯成俄文的著作，並不感到困難很大，而這些著作是我長期以來久已渴望着要讀的，其中有的是我們的教授提出來的參考書，有些是我一直深感興趣的題材。在我重返中國之前，我也讀過少量俄羅斯的古典文學作品；但當我逗留莫斯科直到最後回國之前的這段時期內，如果說我在集中注意學習共產主義教程及其主要原著存有問題，這並不是由於我沒有能力，而僅僅是由於缺乏時間。

當然，在我逗留莫斯科這麼長的時期內，幾乎每一天都閱讀《真理報》。同時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一位忠實讀者，《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是由里亞查諾夫創辦的一本高級理論雜誌，列寧曾在一段時間內同這位里亞查諾夫合作過。除了雜誌和報紙上的論文之外，我還讀了一些使我深感興趣、而且留有極深印象的書籍，其中最重要的有：由里亞查諾夫執筆的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系統評論（這本小冊子，使我明白了非同尋常的歷史條件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幾乎可以寫一本書，因此，長期以來，牢牢地記在我的心中，這本小冊子是我讀到的第一本原著，甚至可以說，是我在1922年初，能夠根據俄文從頭讀到尾的第一本原著）；由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編的《共產主義ABC》，（這本書使我真正懂得了俄共綱領的意義）；布哈林寫的《歷史唯物主義》（儘管列寧曾給予嚴肅的批評，但這本書曾在莫斯科風行一時，我本人一直給予很高的評價）；由杜布林編著的《自然辯證法》（據我的看法，這是對德國的唯物主義作了最完美最成功的介紹）；此外，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哲學著作（例如《反杜林論》，是我最感興趣的哲學著作之一，儘管有些內容是比較艱深難懂的。）以及普列哈諾

72 “Kanji”日俄辭典上，有三種文字，其中兩種是標音字，即片假名和平假名，還有一種標意字，即“Kanji”，顧名思義，這就是漢字。

夫和梅林的著作等。

東方大學行政領導、為了要激發我們對古典文化的熱情和興趣，為了要我們熟悉當代大生產的實際情況，總是經常性地把我們組織起來分成小組，並在強有力的導師帶領下去參觀博物館或莫斯科區最現代化的鋼鐵冶金聯合企業。此外，到了 1922 年初，東方大學還徵調我們於每個星期天義務去參加開山、挖河、填土等艱苦的土方工程，這是同所有的莫斯科公民一樣，其中也包括高級領導人（在蘇聯，所有義務勞動的那些星期日，現在都被人們稱為「紅色星期日」）；我們還須堅持每週兩次（有時甚至在同一天內）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但當時，我們已經餓得面黃肌瘦，根本使不動鐵鏟、鐵鎬一類的工具，同樣，要想背起長槍或者操練長槍，那就難上加難了，因為這些槍的重量重得難以令人置信，由東方大學給我們分配來的指導員或軍事教官們看到這種情況，便立即決定完全免除了我們這兩項沉重的負擔。每當星期日到來時，我們的情況就變得特殊了，我們不必專心學習俄語，也不必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而可享受一種純粹消遣或娛樂活動了，我們從東方大學行政領導那裏定期領到兩至三張免費入場券，可以到布林舒瓦劇院或其他劇院去看戲，當然按照情理，我們不能予以拒絕，而是輪流地去了。在三年時間內，就這樣我也有兩次機會終於擺脫工作、放下書本去盡情地享受：第一次，我看到了卓越的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所表演的《國際歌》舞曲；第二次看到的是莫里斯·梅特林克所表演的《蘭鳥》。當然，電影對我們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應該說我們從來沒有去看過電影，理由很簡單，看電影必須自己掏錢去買票，而且票價非常昂貴。

1921 年到 1922 年間，我們可配給到煙絲和火柴，但配給定量，幾乎同糖和麵包一樣，是經過精打細算、非常有限的。吸煙一直是最愛好的享受：我經常吸煙，而且吸起來很凶，但我感受到吸煙是一件最輕鬆愉快的事。那是 1917 年，正當我在家鄉隆中鎮第二區分享到上學的幸

運時，卻染上了最壞的習氣，用旱煙袋吸旱煙或吸香煙，而我卻認為這是賞心樂事，直到晚年最後幾年之前，我從未停止過吸煙。我到達莫斯科時，我的吸煙勁頭已經發展到了頂點。但是，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內，我反而滿足不了所希求的吸煙欲，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得用一天內的瞬間吸點煙罷了，然而，按照我自己的心願，倒不如利用晚上的瞬間，因為在晚上毫無疑義，我可以與住在隔壁房間內的畫家韓白樺和詩人、作家蔣光赤為伴。所謂大家聚在一起吸煙，說穿了，我們吸的是名義上的煙。實際上這裏所說的煙，是一點點令人看了害怕的俄羅斯煙草，已經存放多年，連顏色都變黑了（這樣的煙，我們每月可領到一小盒），我們把報紙撕成帶狀當作煙紙，然後把煙草夾進去，捲得緊緊的，我們便用這種方法盡可能地使煙捲兒慢慢地吸完。但儘管如此，幹那玩意兒，倒使我們感受到春風得意之極了。我們三人一起抽那玩意兒，不禁沉浸在狂喜之中；有時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有時坐在韓白樺的床上抽起煙來，當我們「擺起龍門陣」來時，則異彩紛呈；當我們對不順眼的事挖苦起來時，則樂不可支；有時即席賦詩，高聲朗誦，直到三人沉沉欲睡，以至到了「心滿意足」睡着為止。

任駐莫斯科中共小組書記

1921年9月，當我與任作民相伴而行，終於到達莫斯科並進入東大時，我就很自然地重新見到了那批同志，是他們五個月前把我留在哈巴羅夫斯克的，他們也就是我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外國語學社第一屆同班同學，其中缺了李啟漢、黎冰若和天底三人（據我的記憶，他們是最後放棄去蘇聯的），一共是二十四至二十五個年輕人。但是我又發現他們當中還增加了四個新來者，都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這四人集合到上海時，要比我離開上海稍後些，而他們到達莫斯科時，要比我稍早些；四人中一位是四川人，名叫廖化平（Liao Huaping），三位是湖南人，其

中兩位都姓彭。若把我和任作民計算在內，東大中國人小組的總人數為三十多個年輕人，他們的原籍來自中國以下各省：來自湖南省十九人，浙江省六或七人，安徽省四人，一個上海人，一個江西人，還有一個四川人。中國人小組的組成人數沒有變動過，一直到了1922年夏初，才有了新的變化。

1921-1922年間，在莫斯科市確有幾個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屬於東大的。但比起東大的中國共產黨人來，他們人數很少，而且他們之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緊密關係，因此，人們在「駐莫斯科中共小組」與「東大中國人小組」這兩個概念之間，劃一等號是不會帶來錯覺的。以下談一談，在甚麼情況下，我終於無意中成了東大中國人小組及駐莫斯科中共小組的書記。

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四位「老資格者」羅亦農、卜士奇、袁達時和吳芳在東大學生中經常表露出某種優越感，實際上，東大一年級學生是把這四位看做同班同學的，因為1920年底，在楊明齋主持下，他們一起都在上海外國語學社上過課。1921年春，這四位「老資格者」到達莫斯科後，便開始在東大中國人小組中發號施令。這方面表現得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卜士奇，關鍵原因是在語言上。卜士奇在中國學生中與說俄語的行政領導之間作為聯絡員，他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此外，於1920年7月至1921年1月，他們在上海創辦《勞動界》週刊及取得成就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並博得了工人運動戰士的聲望，從而在1921年7月底或8月初，當中國共產黨建黨代表大會開後不久便成為中共黨員，同時也由於在東大所有中國人小組成員中，唯有他們才享有這樣的地位，他們相信可以利用這個地位，能把同志們組織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莫斯科小組中去，並完全受他們的控制。

他們還希圖利用在東大中國學生中具有「老資格」的這種繼承權，樹立起有權威的領袖形象，並由他們壟斷安排所有的「事務」，然而由

於種種原因，他們從來沒有受到尊重，也從來沒有引起人們的同情，實際上，他們很少得到支持，儘管他們當中的卜士奇，在俄語方面是很強的，然而就文化水準而言，在全體東大中國學生中，仍然是極其平凡的，無論如何，他們肯定要比大部份來自安徽、浙江、江西以及來自湖南的同志們的水準差得多。比如，如果與那個特別顯得深思熟慮的小夥子劉少奇，同具有文學天賦而且注定會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蔣光赤、韓白樺、韋素園以及曹靖華等人擺在一起，不難發覺，這些「領袖分子」的所作所為了。至於我本人，在剛剛到達莫斯科時，所以就能一下子看穿他們的陰謀勾當，在於人們已經告訴我他們侵吞麵包配給定額的事實，這是他們損害全體東大學生利益而幹下的可恥行為。

在深受飢餓折磨的蕭勁光、曹靖華或韋素園，有時因不堪苦惱而抱怨營養太差，要求稍微多給點麵包——僅僅要求多給一點點——以免身體完全垮掉，就在這時候，羅亦農和卜士奇習以為常地、用一種自以為博學多才、一本正經的語調回答說：「怎麼啦！你們到蘇聯來，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或是為了接受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呢？你們不是懷有自願的情志來到蘇聯嗎？同志們，要認識到，為了我們的共同事業，我們應當心甘情願地作一點自我犧牲！」為了使他們的說教收到無懈可擊的效果，他們發表意見時總是引經據典從理論上來說服不滿者，但一般說來，他們是無法說服的。在羅亦農、他的同夥以及東大中國小組中其他「七嘴八舌者」之間，很快也就議論紛紛，爭執不已。雖然這種爭論最後並沒有得出結果，但事實卻令人深思。人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稀奇古怪的事：羅亦農及其同夥們總是單獨地或在時機合適的時候才開始吃他們的麵包，人們還可以發現麵包放在他們的床上，藏在角落裏。實際上，除卜士奇一人而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這種念頭出現的，因為卜士奇利用他在中國學生和學校領導之間充當聯絡員的獨特身份，因此成了東大總務處為中國學生領取麵包的唯一人選了。他們便偷偷地的把手伸到有

營養的配給品中，便於他本人、羅亦農、袁達時和吳芳之間去瓜分了。

卜士奇是早已了解他在甚麼情況下（即食品短缺——譯者）到達莫斯科的，因此，當他剛一到達時，就迫不及待要幹下這種醜行，他所採用的手法並不新鮮，而是人所共知的，但他所得的數量卻是十分可觀。卜士奇之所以不知羞恥地一再求助於這種手法，是因為他深知羅亦農、袁達時以及吳芳是他的積極同謀者，心中十分踏實。為了自身的利益，他竟然把那些虛構出來的假名單一再拉長，並用這張名單向東大總務處要票子，要麵包的定額配給。如果說不是某一天東大中國人小組派一個助手給卜士奇，以便根據學校領導的命令完成每天工作任務，那麼卜士奇很可能還要把這種手法玩弄更長時間。這個助手不是別人，而是王一飛，他能像卜士奇那樣用俄語出色地把一天的事務料理清楚，有了這位助手的支持，但同時也有了對他的暗中監視，僅僅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內，卜士奇就無法阻擋這位助手發現了其中的奧秘，發現卜士奇的卑鄙，也發現了羅亦農、袁達時以及吳芳的分享贓物的可恥行為。他們的醜聞也就這樣曝光了。

東大的學生小組，並非是唯一的沒有任何其他政治活動的小組，只是因為那時在這個小組裏佔優勢的是一片混亂和無秩序狀態，我就在那時，1921年9月才實現進東大的願望，說得更準確些，是經過哈巴羅夫斯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進入東大的。

剛到東大的那一天，我就被劉少奇及其同伴們團團圍住了，他們當中有任弼時、蕭勁光、彭禮河等，當然也還有蔣光赤、謝文錦和王一飛，他們詳細地把最近發生在我們這個小天地裏的事告訴了我，最後，他們還要我對這件事直接提出我的意見……也就是毫不含糊地直截了當地譴責卜士奇、羅亦農、袁達時和吳芳，並且一致地極力反對這四個人。坦率地說，這實在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一時措手不及，我考慮的是：最迫切的事要使他們鎮靜下來。因此，我特地提醒他們，以往在上海時，

我們總是經常地召開大會，並在會議過程中用不了多大困難，便能處理、解決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問題。我解釋說，按照我的意見，現在是時候了，應該恢復過去這種良好的作風，我還進一步地表明：顯而易見，我們是共產主義戰鬥小組，不論在甚麼情況下，要克服我們所面臨危機的較好辦法，就是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帶來的後果，並根據組織原則使每個與會者都能最高限度地坦率陳言。劉少奇等人仔細地聽取了我的意見，並且對我的建議報以熱烈的掌聲。然而使我感到吃驚的是，「羅亦農那個小組」也居然毫不躊躇地一致贊同我的意見。

在上海時，羅亦農曾經斷定，我在原籍湖南的那批人中搞陰謀詭計，目的在於要使自己成為他們的「頭頭」，現在他再不介意了，而是完全出於自發地跑來找我，並告訴我說，他們最大錯誤在於聽憑卜士奇的拉攏而滑向危險的道路上去，他以堅定不移的態度要求我，在他和三個同伴、以及其他東大同學之間充當全面調解人。就我來說，我的有利條件在於：沒有站在任何一方參加爭論，而這個爭論，當我不在莫斯科的五個月中，已使我們的小組受到損害，遭到分裂，正因此，我就公開表明，要完成調解人的任務。羅亦農想方設法要使我理解他對我說的那番話。這就是為甚麼我要他相信我已經理解了。應該說，這還是第一次，突然間我們就成了朋友。後來在東大，再也沒有甚麼嚴重的事使我們必須相互對抗。

畢竟，我並不願意去詆毀或攻擊羅亦農；或者要詆毀或攻擊他三個夥伴中的任何一個。不，我知道，羅亦農比之「願為他赴湯蹈火的」卜士奇來，並不那麼狡猾，他完全不是壞傢伙。至於袁達時，我很了解他是一個天性極其正直的人，那麼吳芳呢，他除了追隨羅亦農等三人之外，能有其他的選擇嗎？果然這四個年輕人再也不犯這些錯誤了；他們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犯下這些錯誤，只是由於飢餓折磨使他們暈頭轉向後才犯下來的；他們的行為之所以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會被帶向歪路上去，只因

為他們當中誰也沒有認識到，這樣做是否逃避得了法律上的應負責任，他們對於普遍原則也是十分糊塗的，根據這個普遍原則，頭等重要的必需品極端缺乏，必然會帶來連鎖性的社會禍害，其中包括貪污、行賄的禍害。總之，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忽視，最近兩年來，在俄羅斯經常發生一些不幸的事，同是一家人，僅僅為了一片麵包，卻引起了無情的爭吵，殘酷地相互毆鬥。

由我提出的東大中國學生全體大會，終於在 1921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召開了。參加大會的共約三十人，其中有五名中共黨員（包括我在內），其餘的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毫無疑問，大會允許任何人以比較婉轉的方式，向羅亦農及其同伴們提出批評，責成這四個人大膽地站出來，在大家面前承認他們的全部錯誤，並引導大家作出決定：為使今後不再發生導致混亂的類似不愉快事件，最好的辦法是要嚴格遵守以下的原則：「凡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為了小組集體利益，需要進行接觸或商談時，務必向小組全體成員公開彙報他完成任務的情況、以及在完成任務過程中他的經驗和體會。」說實話，這次大會還批准我們小組重新開始工作，這在政治上說來，是非常重要的，這裏僅僅指的是今後要建立以總數為五個不同支部為基礎的小組，由中國黨員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組成，並決定大約在三個星期內召開一次全會。最後大會選舉我為小組書記。

當時，我確實未曾料到居然在這三年內，我必須要擔任這個任務，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1922 年年初，東大中國學生小組重建後，三個多月已經過去了，小組的表現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好得多。我們從中國千里迢迢一程又一程地來到蘇維埃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又是一個相當嚴峻的現實，再說我們還不能經常用俄語對話，也不能按俄羅斯人方式思考問題，當然，這個小組不可能成為政治戰鬥組，而且只能是一個政治上的自我教育，自我培

訓組，然而，這個小組充滿着生命活力，懷有一個共同願望，要把自己的祖國——中國引上革命的道路。我們共有五個支部，每個支部有五至七個成員組成，他們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每天他們都要討論思想性和哲學性等問題，通常這些問題相當深奧，為的是開展有關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歐洲階級鬥爭史的教育，這些課題在東大是不可缺少的。通過這種方式加快開拓大家的思想境界；（2）每當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了重大事件時，他們就展開討論，並漸次養成習慣，週期性地對國際形勢進行分析，如果缺少這種分析，不論哪個國家的共產黨員都不可能及時正確地指導他們的行動；（3）也就是最後一個方面，他們按照我的要求或者我的建議輪流撰寫小型的調查彙編，主要是 20 世紀初，沿長江流域各省（湖南、安徽、浙江等）的農村生活、農民的物質條件，以及佃農、僱農與大小地主、土豪劣紳之間關係的社會體制。對於這三方面活動的每一方面，特別是第二次全會和第三次全會上我們着力提出的、並已取得成就的進展要加以綜合和分析，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最後，也應該讓我們來看一看，在我們基層幹部中出現的爭吵和論戰的事，應該肯定，有時候在我們之間也還有衝突發生，但為了今後相互尊重，我們就得善加處理，例如，處理有關抱樸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抱樸在我們的隊伍中，是唯一百分之百堅持無政府主義的人。

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的領導人，在思想領域裏發動對中國無政府主義鼓吹者的鬥爭，迄今已有一年了，不容置疑，我們大部份人都已成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這場鬥爭並沒有使我們深信有必要徹底地與克魯泡特金、巴枯寧，他們的競爭者以及他們的信徒決裂。不久之後，我們隊伍中有一個上海人抱樸，卻作出了相反的證明。實際上，我們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這名團員，在莫斯科時同他在上海時一樣地熱衷、一樣地公開為無政府主義理論辯護，但他感到這樣還不夠，還必須同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保持極其密切的聯繫，他毫無顧忌地同他們頻繁地

往來，更不必說自吹自擂，大言不慚了。

我並非不了解，抱樸是十分真誠的，但真誠到近於固執。他不像我們中間大多數人那樣容易轉變。俄羅斯只因為已成為蘇維埃的俄羅斯才那麼強烈地吸引人，但他不理解這個蘇維埃俄羅斯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國家的援助是不可能將其壽命延長到幾個月的。他的不理解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這完全是他個人的事嘛！他的這種態度，在我們中間許多人（其中也包括羅亦農）看來都一致認為是極其令人反感的，帶有挑釁性的。他的這種態度刺激了大家，因此，他們終於以不公開的但又是嚴肅的方式，提出一項「懲罰」方案，要他為這種「思想不純」付出代價，要把他囚禁起來，至少也要隔離審查四十天。我認為這是荒誕之舉；這是歇斯底里的發作；自從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我便去找他們談一談我個人的想法，我提醒他們，不論在甚麼情況下，我無法容忍他們對待抱樸的態度。首先，我向他們解釋道：「在我們中間，無論誰還帶有過去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烙印，這完全是正常的事。但我們是講民主的。我們只能採取說服的方法。如果他不顧我們種種努力，仍然沒有改變他的觀點，如果他回到中國。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那我們又能對他做些甚麼呢？在中國，經常還存在着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另一方面，很明顯的是，蘇維埃國家，每年仍繼續吸引着大批的無政府主義者。難道我們真的愚蠢到要抱怨嗎？畢竟，蘇維埃俄羅斯是容許無政府主義者來往的，只要他們放下他們的理論武器，不再強加於人。這樣做恰好證明我們既不是宗派主義者，也不是器量狹窄的人；這恰好證明，我們對待意見不同但又是態度誠懇的人的理解和容忍，特別是抱樸，他跟我們大家一樣，是革命者。」上述這一切應當成為我們可貴的準則。

事實就是這樣，在我留任東大中國學生小組書記時間內，這條可貴的準則一直是受到嚴格遵守的。

我承認，如果按照純邏輯性推理的觀點，毋須和那些主張把這可憐

的抱樸「囚禁」起來的人說明理由，便提出以下問題，也是完全合理的。這問題是：「為甚麼能把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抱樸接納到東大中國學生小組中來，而這個小組主要是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從理論上來說，東大是不分思想傾向、向所有東方國家的革命青年開放的，在必要時按照學校規定，把抱樸接納到中國學生小組中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進一步從政治角度上來看，那又怎麼能把抱樸接納進來呢？」我們的答覆是：「要理解，從政治角度上把抱樸接納進來，只因為他是作為一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身份進來的；在招收新成員的標準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要比中國共產黨員寬鬆得多。」

為了使這個答案更加全面，我認為必須要強調一點，即首先是為了實際應用方面的理由。1921年秋天，我們曾決定，要在我們小組內部把本來黨、團員身份雜亂無章的狀況，善於區別開來，使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中留有完全清晰的印象。此外，我作為政治小組的書記，還更掌握一些情況，譬如我有權可以作為青年團員入黨的介紹人。但我使用這個權利只限於很少的場合，而且是在考慮成熟之後才使用的。1922年，我只在四到五位同志身上使用過，最明顯的是劉少奇（在他離開莫斯科回國之前），與此同時，我還在劉少奇的朋友任弼時的身上使用過。

現在，我不妨用簡單的幾筆，對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第一屆同學中，跟我最為熟悉最接近的人作一次人物描寫。

人物描寫要逼真，不可隱諱，也不可拔高，只能秉筆直書。先從羅亦農開始。羅亦農是個身材高大的小夥子，背略駝，有一張很大的嘴巴，兩眼深深地凹陷在眼眶裏，但仍不失為是一個風度瀟灑的人。畢竟我也是湖南人，但有時我很難聽懂他說的話，他說起話來，有一股濃厚的湘潭鄉音，怪裏怪氣，聽起來有點不舒服。卜士奇，是羅亦農的老搭檔，一個名副其實的瘦個子。但他機靈而多狡詐，反應靈敏，行動敏捷！誰不希望能有像他那樣天賦的口才呢！袁達時，圓圓的臉形，笑口常開，

但他走動時，絲毫不會給我們留下特殊的印象，因為他的身軀在我們當中算是最瘦小的一個。如果他沒有上當，吃了卜士奇、吳芳和羅亦農竊取來的麵包，他在我們的眼裏，一直是坦誠、正直的化身。但自從這件令人痛苦的事得到解決之後，他又成為可信任的人了；此後，他再也不幹這種事了。這裏最好的證據是：我們終於給他取了個外號：我們黨內的「鐵漢子」。

對劉少奇，恰如我在 1920 年底對他所作的評價一樣，我看在此再加讚揚就沒有必要了。任弼時，剛滿十八歲，有一張和藹可親的臉，身材瘦長，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討人歡喜的小弟弟，每當他走過來時，我們總是在他的背上貼上一張紙條，以示友好。他專心致志容易接受新事物，不論幹起甚麼事來，就能顯示出他的才幹能力、顯示出他的認真負責。任作民，據我估計，是任弼時的堂兄弟，看來，他沒有任弼時那樣的出眾，那樣的引人注目，但同樣是坦率誠懇，同樣地嚴格對待自己，也同樣有一種小心翼翼的傾向。當我們兩人在東西伯利亞一起工作時，我早已注意到他的這些特點了。蕭勁光，身材高大，雙肩寬闊，特別同袁達時作一對比，給我們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執行軍事訓練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感到很難背得動那支槍，實在是太重了，但在蕭勁光使起來，簡直像舞弄一根小木棒，當他未被飢餓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前，蕭勁光可在你的面前舉起一隻裝滿石子的大箱子，其從容自在，悠然自得彷彿舉起一條輕柔的鴨絨被一樣。他臉額豐滿，氣質大方，待人誠懇，十分幸運地出身於名門大家，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書香之家。他是一個純樸的人，又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具有了所有的條件，使他後來成為優秀的，出類拔萃的軍事領袖。⁷³

73 蕭勁光，曾參加過歷次中國革命戰爭及抗日戰爭。1950 年初，在蘇聯協助下，他獻身於建設一支小型的中國海軍作戰艦隊。從那時以來，他一直指揮着這支艦隊，後來成為中國海軍司令員。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幾乎毫不遲疑地站在毛澤東及「四人幫」的旗幟下。「文革」結束後若干年，他總算平安無事地死去。

高語罕身旁的三隻小馬，都來自安徽蕪湖，他們是韋素園、曹靖華和蔣光赤，那時他們都同樣年輕，在這三個年輕人的眼中，文學價值意義並不亞於革命，確實，不久以後，他們在文學藝術方面都很有成就。在這三個人中我與前二人的關係不如與蔣光赤那樣的親密。然而，我都非常喜歡他們。曹靖華是一個身材結實，個性熱烈的小夥子。韋素園的臉上長有小黑痣，他作出的反應，有時令人難以捉摸，這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怪人。蔣光赤，中等身材，兩隻眼睛小得出奇，但兩眼一亮，炯炯有神；他說話時，信口開河，不假思索，幸好，他很機靈、敏感，可以彌補這兩個小缺點。毫無疑問，他比曹靖華和韋素園更加博學多才，因為他能用更深奧的文字，即文言文寫作。

原籍來自浙江的同志們，都具有優秀的品質，引起我的好感；在他們這些人中年齡都比較大，其中一個名叫華林（Hua Ling）的，確是最年長的了。在浙江人當中最出色、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王一飛和韓白樺。王一飛的身材並沒有比袁達時高多少，顯然不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但從這樣一個平凡人的身上能有甚麼誘人的魅力呢？首先是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只要他微微一笑，你的頹喪情緒便跟着煙消雲散，光這一特點就很夠了。他的頭腦十分機靈，只消幾個月時間，他的俄語能力便追上了卜士奇。陰謀詭計、撒謊作假是與他性情格格不入的，而他的殷勤懇切是與他的忠貞正直並行不悖的。韓白樺原是杭州美術學校的老校友，他首先學的是繪畫，這種繪畫的傾向性，不是現實主義的，也早已離開了象徵主義，只是在表現主義上變換手法。然而，韓白樺善於運用他的筆觸，既能寫詩，又能寫對聯，寫出來的詩或對聯不僅有通俗易懂的語言，而且也有高深精巧可供欣賞的語言，他擅長於各種各樣的韻文，但與蔣光赤的風格不同。初看一眼，韓白樺並無甚麼特殊出色的地方。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沉默寡言，舉止寧靜，絲毫不露聲色，因此很多人無法發現他是一位很不平凡的思想家。但是在他周圍的少數幾個人則有不

同的感覺了。每當談話的中心開始轉到繪畫或者詩歌上，他的話匣子一打開，誰也無法鎖住他，彷彿一下子變成了一位健談的人物。他愛好吸煙，整日地吸着，甚至比我吸得更厲害。說真的，我同韓白樺之間有着很深的友誼。

德寶普 (De Bao Pu)，被人戲稱為我們隊伍中的癩腿鴨子，諷刺他動搖不定，我倒認為他是個英勇正直的人，只不過頭腦遲鈍得多。為了把他從無政府主義的迷宮裏搶救出來，我曾費了大量的口舌。但徒勞無益，他仍然堅持錯誤。他的一生可以說是自得其樂的一生。廖化平 (Liao Huaping) 原是中學教師，後來選擇了追隨青年團的道路，他便離開中國奔赴莫斯科。廖化平富有理想，胸懷開闊，最後來的三個湖南人也是賀民範送來的，他們三人一起在我們的小組裏另外組成了一個小小組，在同志之間的緊密團結上稍差一些，這是因為他們都是遲來東大的人。

拜訪中國社會主義的「始祖」

1922年初，除了不屬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四位中國共產黨人外，我在莫斯科幾乎沒有認識的人，這四人中，二人是新聞工作者李宗武和瞿秋白；另外二人是前中國救災代表團成員彭澤湘和王雲功。

李宗武個性純樸，溫和可親；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因為他父親就是梁啟超妻子的兄弟，換言之，他是這位頗有影響的改革派和知名人士的內侄，我在上文已經不止一次地談到過他。

李宗武是具有先進思想的許多年輕中國人中的一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四運動爆發時期，他決定報名參加設在北京的俄文專科學校學習。我相信，1920年7月，他已經畢業了，按照正式規定，他得到了畢業文憑。他姑夫梁啟超所主持的一系列報紙中，最有聲望的左派報紙之一——北京晨報的編輯，希望有一位常駐莫斯科的通訊記者，李宗武滿懷希望地要去承擔這項任務，但他有自知之明，如果他隻身前往，深

知決無能力承接，理由有二，其一是缺乏新聞工作的經驗，其二他的寫作方式一般是不夠令人滿意的，他便想出一個主意，要同能力比他強得多的朋友和同學瞿秋白合作，以便能夠實現兩人並肩到俄羅斯首都去工作的願望。與此同時，李宗武腦中又出現了一個類似的想法，如果得不到梁啟超的認可，晨報編輯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李宗武去找他的姑夫並把問題提了出來。事出意料，他姑夫不但一般地認為是可以的，而且深表賞識；顯然，瞿秋白曾經給梁啟超留下極其良好的印象，他不僅俄語能力很強，而且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也是頗有修養的。>

李宗武和瞿秋白到達莫斯科的日期，我不能確切肯定是那一天，只聽說是在 1921 年的頭四個月左右，不過必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屬下的外國語學社第一屆學生從哈巴羅夫斯克來之前到達的，他們兩人被安置在由蘇聯當局提供的辦公室裏，並開始為《晨報》編輯各種品質不等的文字，主要是有關他們看到的、讀到的以及聽到的。

儘管他們對俄羅斯革命懷有深刻同情，但那時兩人都還不是共產黨人。他們參加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於莫斯科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時候，也就是說 1921 年 6 月底或 7 月初。中國共產主義中心小組曾派出一個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工作，其中一名代表叫做張太雷；這位張太雷年紀很輕，他不僅是我們隊伍中一位很有能力的戰士，他善於為我國國內領導人及來自國外的領導人擔任譯員，也是我們隊伍中最有堅定信念的戰士（他曾於 1920 年 7 月積極參加締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且還是一位很有說服力的戰士（他的交際能力可以說發展到高峰了），他還是瞿秋白的同班同學，跟瞿秋白一樣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多巧啊！他們兩人曾於同一時間，在常州同一所中學裏學習！自從張太雷到達莫斯科後，不到十天功夫就足以說服瞿秋白和李宗武，使他們感受到有必要參加中國共產黨，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會還正在召開。

李宗武和瞿秋白成為中共黨員後，並沒有明顯地感受到必須要放棄《晨報》駐莫斯科記者的職業，儘管這份報紙確實沒有向革命方面發展的趨向。反之，他們又不能不同意，要跟東大的同志們保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緊密、更頻繁的關係，但他們僅僅接受間隔性的多少帶點定期性的譯員任務，直到擔任俄國教授在課堂上的翻譯工作，其中原因我早已談到過了。但當李宗武樂意接受這樣的安排而受到讚許的時候，瞿秋白卻對此表示反感，這完全是由瞿秋白的個人意願和作風決定的，他不希望把住所搬到東大去，實際上，居住在東大的都是莫斯科當局認定的中國共產黨人，因而生活上比較艱苦些，瞿秋白兩人則仍希望在那舒適的辦公室裏，繼續過着與眾隔離的生活。

1921年9月當我到達莫斯科時，李宗武及瞿秋白兩人，我是完全不相識的，那時，我確實從未與他們談過話。第一個把我介紹給他們的是羅亦農，這是在羅亦農與我之間建立起友好關係之後不久。過了幾天，也是羅亦農帶我到他們的居所去拜訪。

從一開始，瞿秋白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好的。他的年齡至多不過二十多歲，但人們認為他未老先衰，他那麼脆弱，那麼思前顧後，那麼不堅定，又那麼地不討人喜歡；他的姿勢、步態、模仿的動作以及他的衣着，都會令人回憶起「舊中國」的文人、雅士，但五四運動早已同這種文人雅士決裂了。瞿秋白有一張近乎橄欖色的蒼白的臉孔，看起來平平淡淡，卻佈滿了暗褐色的小斑點。小小的鼻子，牙齒黑得怕人，因為他是一個吸煙成癮的人，即使跟你談話，嘴唇裏還叼着一支香煙。然而，他使我感受到最難容忍的是，顯然他缺乏誠意，缺乏坦率的態度。聽他談話，很難領會他的實質內容，這只是因為他覺得、只要用那些外表華麗的辭藻裝飾起來，便能使他的交談者感到滿意。自從1921年底以來，瞿秋白顯然是在力圖通過他的矯揉造作、通過他的談吐和姿態等獨有特點，能博得大家對他的高度評價，認為他是中國的精英、是他同時代最

傑出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鄭超麟同志，我僅在 1923 年才跟他認識，但此後不久，我便同他在很長時間內保持密切關係，當鄭超麟看出瞿秋白的特點時，有一次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對我說，他發現瞿秋白純粹是一個「紹興師爺」。鄭超麟運用漢語中的這個詞來描繪瞿秋白的形象，可以說是天衣無縫了，因為，除了這個詞——「紹興師爺」之外，我看再也沒有其他的詞比這更能傳神了。⁷⁴

不但在我看來，瞿秋白不是一個能引起好感的人，就連東大的所有的中國學生也幾乎沒有甚麼好感。他不但不願意搬到東大和我們共同生活，而且還自以為參加我們自己組織起來的任何小組政治生活，對他都是毫無益處。他甚至不屑在我們的全體大會上進行相互幫助，相互提高。不錯，有時也會屈就一下，來東大擔任翻譯，特別是當我們接待蘇聯或外國的重要人物來訪時，例如馬林和路易⁷⁵的來訪時，他不消說就要下來了。瞿秋白自稱掌握着高度文化奧秘，自稱是一切高雅的具體化身，他的這種驕矜自傲，自命不凡，使我們深感不安，我們當中誰也沒有幻想過有可能與他保持友好、甚至「兄弟般」的關係。

瞿秋白發回《晨報》的有關蘇維埃國家文章，極大部份是屬於報道式的，後來把這些文章彙編起來，又以文集形式在中國重新出版，題為「赤都心史」。無疑，他的文章是很不容易讀懂的，因為他所寫的文章風格矯揉造作、錯綜複雜，這標誌着他着重考慮的是炫耀他的古文學根

74 紹興：浙江省紹興地區的首府，以盛產黃酒出名。「紹興師爺」的含義是：從前在官府衙門擔任幕僚工作的紹興人，工於心計，善於刀筆。

75 馬林，他的真名是斯尼夫里特（Sneevliet），著名的荷蘭革命家，在第一次大戰前夕及戰爭爆發初期，他在印尼爪哇，創建了反殖民主義運動。是早期的共產黨員。1921-1922 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與孫中山談判中蘇聯盟以及國民黨與中共之間的聯盟。有關馬林及其在中國完成的任務問題，參閱本書有關章節。馬林不久後便脫離了斯大林的共產國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慘遭納粹分子殺害。

路易，印度早期共產主義者。1920 年 7 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他在大會上為他的東方國家革命理論辯護而出名，列寧批評他的理論帶有左的傾向。1927 年春天，他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被派到武漢，並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彭述之於 1924 年夏在莫斯科結識了他，那時正是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

底是不容置疑的堅實的。不過在我們東大全體中國學生看來，這些文稿似乎也頗能引起興趣，但到了1922年暮春季節，情況就不同了，因為在這段漫長時間裏，由於我們還不能很好地掌握俄語，我們無法去欣賞這些文稿的真正價值。但這段時間一經過去，我們終於看清楚了，而且也不能不發現，他所謂寫得最惹人注目的、最卓越的文稿，原來完全沒有甚麼獨創性，他只是簡簡單單地化點力氣，以便坐享其成；先是他把主要由塔斯社電訊組成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出版物拿來，然後再把《真理報》上的論文摘要和《國際通訊》上的片段資料拿來，或者改寫或者乾脆將其譯成中文，就這樣，無需經過多大思考、鑽研便一段一段地拼湊起來了，因此，他的所有文稿缺乏前後聯貫性也缺乏邏輯性（到了1922年底，我的俄國同志塞爾蓋當着我的面，抑制不住地提醒他注意這是把俄國的文稿中國化了，然而陳獨秀本人也是這樣說的）。瞿秋白本來機會很好，能在「赤都」總共逗留約二年時間，可以利用起來求得進步，但實際上由於有了這個嚴重的缺點，他始終不能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真正的、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

李宗武，當然不像瞿秋白那樣可憎，如果讚揚他十全十美，那也不很相稱，然而，我很快就對他產生了好感。他外表俊秀，富有魅力，特別是在婦女的眼中，他簡直是個溫馨迷人的小夥子。他心情愉快，喜氣洋洋，態度和藹可親，能充份利用熟悉俄語的特點以及有着新聞記者身份，使他成為東大中國學生中強有力的小青年。他謙虛謹慎，儘管自信俄語說得自然流利，但有時候他也感受到朗讀俄文並不那麼容易，當他發現我在朗讀方面比他強時，就走過來徵求我的意見，而並不以為這是不光彩的。在他身上還可找到平等待人，作風民主，邏輯性強等優點。他感受到不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可恥的事，1923年初，當瞿秋白一旦離開莫斯科回國去時，李宗武便迫不及待地前來東大與我們共同生活了。

為支援伏爾加河流域災民的中國救災代表團，一旦把全部麵粉運送到莫斯科並交給了蘇維埃政府之後，顯然，代表團本身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1922年初，當代表團完成了任務便解散了。代表團的四位代表該怎麼辦呢？回到中國去嗎？不，四位代表一致表示寧願留在莫斯科，但其中兩位即彭兆賢和楊建忠對於他們在莫斯科聽到的和看到的贊同革命的言行，仍然表現出不甚理解甚至無動於衷，他們兩人只願進入蘇俄的一般大學，從事學術性研究；而另兩位彭澤湘和王雲功則很快便成為熱情奔放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留在莫斯科，只是為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蘇聯學習。兩人都向我提出，希望能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過認真的審查和考慮之後，我同意可作他們候補黨員的介紹人。但應該指出，所謂候補期只不過是要經過為期數月的考驗，然後便可以參加我黨成為享有全權的正式黨員了。兩人中的彭澤湘是比較年輕的，根據他自己的要求，於1922年間進入東大學習。王雲功年齡太大了，不能進東大。但他有一定的收入，那時碰巧，我們的俄國朋友可以為他提供免費住所（俄國朋友把王雲功安頓在托爾斯泰女兒以前住過的房子裏，後來則搬到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此外，他能夠獨立地為自己提供生活費用。這樣，他就沒有分享我們的食宿待遇，也沒有權利像我們一樣能參加東大學習。然而，他跟彭澤湘一樣，全心全意地自願參加我們所主持的政治小組活動。

當然，在莫斯科時，我們還有好幾個中國同胞，他們不是共產黨員，而是商人或學生。但我並未發現，在我們當中有誰（除二至三人外）認為，與他們保持關係簡直是沒有價值的。當然我們不是他們的人，他們也不是我們的人。儘管如此，但當人們告訴我們，他們中間有一個名叫江亢虎的人，我們便立即洗耳恭聽了。江亢虎從1911年起，即在武昌起義勝利後僅僅一個月，便主動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社會黨，這個黨在稍有政治氣氛的中國城市中是比較出名的黨。

當然，我們並不是沒有注意到，江亢虎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空洞的民主要求與「創立累進所得稅」制的一種平淡無奇的混合物。同樣，我們也不是沒有注意到，儘管他經常提到，他的黨有一批聲譽卓著的黨員，但中國社會黨的職能（即授權領導人，並通過他那十分值得懷疑的政治集團，要在中國「議會」內部所起的影響）看來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微不足道了。雖然如此，但有一段時間內江亢虎卻成為我們的旗手，這時，他的急進主義調子放低了，而贊同我們的主張的嗓門卻提得高高的。對於他的這一切，我們是深表懷疑的，事實上，我們就連最起碼的尊重和同情也是不給的。

然而，他在莫斯科究竟幹了些甚麼呢？出現了甚麼奇蹟呢，事實十分簡單：這個奇蹟是第三國際曾於 1920 年給他寄出一份邀請書，在那個時期裏，列寧和托洛茨基所經常關注的是，要爭取東方各民族團結在他們事業周圍，因而派出密使，例如像霍霍諾夫金那樣的人到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去。大約在一、二年之後，江亢虎便以「中國社會主義始祖」身份，在他的妻子陪同下到達莫斯科，實現了短暫的逗留，並在莫斯科受到一大批蘇維埃著名領導人的接見，其中當然有季諾維也夫，也有列寧，但顯然用不了多久時間，他們都對他徹底地失望了。從那以後，蘇聯領導人便讓他放任自流，從政治角度上說來，務必對他保持良好待遇，而從物質角度上說來，特別要提一提的是，務必使他那懷孕妻子不缺乏任何東西。1922 年春，一個晴朗的日子，天氣十分炎熱，我們正在閒談時，正好談到了江亢虎，我和廖化平突然間想到一個主意，要去拜訪江亢虎，目的在看一看，究竟他的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不，這決不是被熱情所驅動，而是在這種情況下所引起的好奇心。說做便做，我們去了，受到江亢虎的親切歡迎和接待。但當要討論我們感興趣的事，他卻轉到了我們所從未接觸到的話題上。我估計，這是他未曾料到的，他在我們看來，是何等的令人反感。接着，他談到了閻錫山以及其他軍

閥，這些軍閥，我們認為是極端可憎的，而在他卻認為是親切的朋友。他炫耀自己對他們的私生活瞭若指掌。但當我們要求他談一談有關「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想法時，他竟厚顏無恥地以極其枯燥乏味的話來搪塞我們的問題，並以種種藉口，把事情搞亂，例如說他長期在美國逗留，以致多年來中國發生一切幾乎一無所知。總之，在我們與他談話的整個過程中，徹頭徹尾地暴露了他的思想是如此庸俗，毫無價值，如此令人沮喪，我們索性對他沒有任何期望了，我們便起身告辭。天哪！不再聽他嚕囂，是多麼地令人寬慰啊！從他家裏出來之後，我們發誓再也不去找他了。

在莫斯科，江亢虎大約度過了一年，他更感到高興的是他的兒子出生了。之後，俄國人彬彬有禮地請他回國去，並為他提供了一切費用，他帶了妻子和兒子回國了。回國後，他在上海創辦了一所高等院校，這所大學在 20 年代中成為反共的大本營之一。他不斷地在各派軍閥之間鬼混，在軍閥面前，他卑躬屈膝，奉承討好，後來又同最惡劣的國家主義派勾勾搭搭，所謂國家主義派，其實就是長江流域地區內右派集團中的極端民族主義派。

✓ 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

1922 年 1 月，召開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中斷了我的單一的學習生活。但這決非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我作為由九人組成的，強有力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自始至終參加大約持續十二天的大會工作。由第三國際發起召開的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旨在反對華盛頓會議。該會議於 1921 年 11 月開幕，1922 年 1 月閉幕，會議的組織者祝願大部份決議都有獲得成果。自從凡爾賽和約簽字生效以來，日本帝國，遠不是變得安分守己，而是越來越大膽、越來越強硬地顯示出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果，擴大它在中國已經獲得勢力範圍，這使得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深感不

安。華盛頓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就是同意美國及西方列強迫使日本接受一系列有關海軍、關稅等條文，並宣稱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重新瓜分中國以及其他力量弱小的遠東國家。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正是最適的時機來揭露華盛頓會議的內幕，與此同時，大會邀請了以抵制華府會議為中心任務的東方各民族參加大會。

實際上，只有兩個遠東國家——中國和朝鮮——派遣自己的代表團出席大會。朝鮮代表團是由駐上海的「流亡政府」的使節組成。中國代表團共有九名代表，由中國共產黨任命的共五人，即張國燾、高君宇、鄧培、胡公冕和我本人另四名由中國國民黨指定，即張秋白（Zhang Qiubai）、王法求（Wang faqiu）、黃碧渾（Huang Bihun）及黃凌霜（Huang Lingshuang）。

張國燾，中等身材，背略駝，顴骨高高突出，前額平坦而開闊，目光炯炯，他平易近人，與人相處能討人喜歡，而且還是一個頗能關心體貼別人的人。可惜的是張國燾的作風，頗有點像旅遊推銷員那樣的庸俗，他不僅缺乏風度，而且才智也不高。他最感興趣的是蠅頭小事。大家在他身上早就識破了有搞陰謀詭計的傾向。此外，他是江西人，原籍萍鄉，說一口難聽的江西土話。高君宇，原籍山西，他給人強烈的印象，彷彿是朝鮮人。他身材高大、臉龐瘦削、兩隻小小的三角眼。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已是北京大學享有聲望的人了，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始人之一。他能寫、還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他的缺點是太過自滿。儘管我同他的關係十分良好，但每次看到他時，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有說不出的不舒服。鄧培是中國代表團中唯一的工人代表。他是一位很受歡迎的人，年紀很大，據我估計已是四十開外了。他曾在北方不同行業幹過工作，當過鐵路工人，現在是唐山地區的煤礦工人。他在這個地區不止一次地顯示出，他是一位無產階級戰鬥中生氣勃勃的領導人，他的思想早已有了覺醒的階級意識。胡公冕是杭州市浙江第一師範的體育教

師，他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熱情宣傳者，深受浙江一師學生的愛戴。1924年春，在黃埔軍校創辦時，他擔任該校的軍事教官。

至於我本人，與他們四人，張國燾、高君宇、鄧培、胡公冕不同，毋須經過長途跋涉來參加代表大會，因為，我作為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是由我們東大同志們選派我作為代表的。莫斯科的另外兩位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和李宗武同樣出席了代表大會，但他們不是以黨的代表身份出席，而是以譯員身份參加大會工作的，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中國代表，把用俄文發表的黨內演說譯成中文，如翻譯薩法洛夫的演說。如果為非中國人的代表翻譯中國代表的發言，則經常是由高君宇任譯員，他使用的是英語。

國民黨派出的代表，似乎並非經過正式選舉，而是任意指定的，只要由孫中山個人批准就行了。張秋白，安徽人，他自恃不凡，彷彿是他們自己成立的分組小組長。他個性好動，躍躍欲試，喜歡發議論，但他說出來的卻令人興味索然。王法求，山東人，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物。黃凌霜，廣州人，年紀三十出頭了，他的表現與眾不同，是屬於另外一種情況的人。他本不屬於國民黨。自「五四運動」後長期以來，他是北京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還是發起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人員之一，後來很快就同其他幾個無政府主義者一起退出去了，因為他們不同意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然而，黃凌霜從來沒有以論戰方式來反對我們。他是北京大學名聲顯赫的教授。他參加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與其說是以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首腦身份，倒不如說是以知名人士的個人身份參加的。黃碧渾，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看來不是一個踏實可靠的人。她是黃凌霜的近親，黃凌霜在多方面為她作證。在日本留學回來後，她參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廣東省議員，這次直接從廣州來的。在政治上，她投靠陳炯明，仇恨孫中山。回到中

國後不久，便試圖暗殺孫中山，暗殺不遂，立即被槍決了。

中國代表團由上述這些成員組成，如果認定他們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那未免是一種諷刺。國民黨，任你說她是甚麼政治集團，但決非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至於中國共產黨那時正處於幼年期。儘管中國代表團的組成猶如上述，其代表性又是如此的局限，然而同參加代表大會的其他代表團相比較，還是強得多的。

在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的是季諾維也夫，他在開幕詞中着重談到以下幾個問題：東方國家的反帝鬥爭、東方各民族為爭取自身的權利而鬥爭以及華盛頓會議的真實意義等等。但就我個人來說，更吸引人的並不是那篇演說，而是演說者本人。季諾維也夫已經四十多歲了，充滿着生命活力，有一張豐滿的圓臉，滿頭濃密的鬚髮，格外引人注目；他說起話來，氣勢雄渾，滔滔不絕，彷彿每句話一旦從他口中裏噴射出來，就會激起你的滿腔熱情。啊！多麼了不起的鼓動家。

接着，大會聽取各個代表團所作的報告。朝鮮代表團的發言時間最長，他們說明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其情況是何等的悲慘。中國代表團的發言時間較短。但中國代表當中，唯有共產黨員張國燾和鄧培的發言，不是完全空洞的，也唯有他們的發言才能遠遠地超出難以避免的空泛概念，而能明確地指出東京對待中國的行為，是具有令人髮指的侵略性質的，張國燾和鄧培的有利條件正是因為他們兩人都能以初具規模的工人運動的名義出來講話的。特別是鄧培，他根據中國工人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令人深感興趣的說明，儘管發言過於簡單，缺乏條理。

然而，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報告，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大會最精彩部份，是由薩法洛夫作的報告，薩法洛夫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的主席。「東方部」包括兩個局，我在此前已經提到過的，即「近東局」和「遠東局」。薩法洛夫是完全按照整個東方部的實際需要出發去推動「近東局」的工作的，他年紀雖輕，卻已出版了好多部著作，其

中一本著作是專論近東民族問題的，曾經產生相當大的反響，他可說是蘇聯學術界一顆正在上升的新星。人們還特意給他取了一個外號，稱為共產國際內的「小布哈林」或「布哈林第二」。薩法洛夫是一個博學多才而又和善可親的小夥子，他具有布哈林那樣的特徵。另一方面，他與季諾維也夫保持着緊密聯繫。因此，他們兩人都沒有逃脫那悲劇的命運，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斯大林派組織的清算左派反對派罪惡運動，使他和季諾維也夫一起都捲進這場腥風血浪中。

薩法洛夫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報告中。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並接合着分析中國與帝國主義世界之間關係的發展。他在報告中，還及時地強調指出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勢力，正按照日本人的意圖，並利用時機積極鼓吹要把中國兼併到上升的太陽帝國的版圖中去。薩法洛夫反覆指出：現階段中國的革命者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目標的選擇，只能進行反帝、反軍閥的雙重鬥爭，直到他們的國家獲得完全解放為止。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提到，中國革命者要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可能是，從現在起就要把動員和解放全體農民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而奮鬥。由於他對中國的遠景看法如此，才首次提出一個口號，要把中國建設為「農民主義共和國」。顯然他低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大戰以後，已在中國實現的工業發展的重要性，他輕視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太微弱。但他仍然估計到，在未來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無產階級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特別要同農民結成聯盟；在任何情況下，中國無產階級應當保持自主性，要提高警惕，務使自己的行動路線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與資產階級行動路線混淆一起，總之，要遵循1920年7月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制訂的、有關東方國家全體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建議。然而，薩法洛夫仍然未能十分嚴格地、精確地確定城市工人，在未來中國革命中所佔的地位。從那時以來，每當他宣告說，在中國以及其他東方國家，革命組織的典型模式

是工農蘇維埃時，他還只限制在流行一時的宣傳手段上，應當認識到他的報告一般只具有十分簡單的特點，有時候甚至觀點混亂。然而，對於我們東方人來說，他在報告中所傳達的概念，對 1922 年夏初，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有了更大的啟示。具有同樣意義的是：中國共產黨於 1922 年 9 月創辦的週刊《向導報》上所發表的、來自國外的最早原本之一，恰好就是薩法洛夫在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

由薩法洛夫的報告所引發的討論，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討論只限在俄國代表之間展開。遠東各國的代表只能跟着俄國代表之後亦步亦趨，這是因為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水準太不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情況也同樣如此，至於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同胞們，那就更談不上了。此外，要依靠誰才能從討論中得出結論，依靠誰才能結束這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呢？只有依靠薩法洛夫。

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自身、並沒有更大的權力，相反，大會只能授權第三國際，並通過蘇聯報刊以及歐洲各國共產黨機關報，發動一次規模較大的反帝宣傳活動。在中國，無疑地沒有引起重大的反響，因為共產黨人尚未掌握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報刊，至於國民黨，顯然不願給予重視。但是，對於我們中國革命者來說，如同遠東各國革命者一樣，大會就是鼓舞力量的源泉。

當遠東勞動者代表大會尚未結束時，列寧表達了一種願望，要接見參加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他的這種表示使我深受感動，這說明列寧本人特別關注我們中國的事。我們選派了四名代表，即張國燾、鄧培、張秋白和高君宇去看望他。高君宇只是為其他三個人擔任譯員工作的。但此時的列寧，以異乎尋常的坦率態度，表明他內心深處的思想境界，他對四個代表中的鄧培，情有獨鍾，正如後來鄧培自己以及張國燾和高君宇告訴我們一樣。鄧培是列寧本人過去從未遇到的第一個中國工人。他

詳詳細細地向鄧培提出一系列有關中國無產階級的問題，如中國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特點，他們所遭受到的被剝削方式的特點等等。

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一經結束，所有與會的外國人在他們各自回國之前，受到共產國際的邀請到彼得格勒去瞻仰俄羅斯的革命搖籃。王雲功、彭澤湘、彭兆賢和楊建忠四人，他們都是在上文中提到過的、此刻早已解散了的救援伏爾加河流域災民中國救災代表團的成員，此時，也參加到由九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中一起去瞻仰聖地。我們到達彼得格勒之後，全體一致寄宿在斯莫爾尼學院，這座雄偉的學院是為俄羅斯的貴族後裔而設的。1917年，行使革命政權的主要機關、以及各主要革命黨的聯合中心便設在這裏。學院內的建築物已無法保持原狀，因為近五年來，這座雄偉建築物的內部，早已堆滿積垢，破敗不堪了。共產國際仍然設在這裏，定期地舉行各種會議，也在這裏歡迎和招待客人。

在我們到達的當天，彼得格勒市布爾什維克黨的負責人，為了歡迎我們，在當地大劇院舉行晚會，參加晚會的大約有一百人。柯倫泰代表市布爾什維克黨向我們致歡迎詞。這位崇高可敬的俄羅斯婦女的講話，彷彿也是一場值得欣賞的情景。因為她是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演說家之一。每一個參加晚會的人，都屏住呼吸靜聽她的發言。她那縱逸豪放的深沉話音，在大劇院的屋頂下強勁地回蕩着。儘管歡迎詞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但我們幾乎都被她制服了。

我們這次來彼得格勒瞻仰革命搖籃，所遵循的旅遊路線是最傳統的，我們參觀了冬宮、皇村以及博物館。冬宮的豪華裝飾，稀有的絨繡掛毯，多種多樣的珍品寶藏，令我們讚賞不已。古雅的皇村，已失去他原有的光彩了，只能使我們回憶起那奇特而又古老的風俗習慣。在參觀各博物館時，使我們留下了銘嵌心坎的印象，顯然是那些中國藝術品。博物館收藏了大量光彩奪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其價值是無法估計的——所有這些古代藝術品，都是在1900年，當鎮壓義和團運動時期，沙皇軍隊第

一次長驅直入中國，從北京皇宮掠奪去的果實。帝國主義分子從中國掠奪去的其他大量藝術品，當我稍後去西歐時，曾有機會在巴黎的博物館內看到過，面對這些博物館展品，我的心情總是十分沉重的。

然而，就在這同一城市——彼得格勒，也有使我興高采烈的時候，可以說我也曾被這征服過。那尼夫斯基大街、尼瓦河上的大橋、皮埃爾——保羅古堡，城裏所有的道路以及所有的工廠，都給我留下 1917 年革命時期，那數不盡的高潮起伏，曲折變化的印記，給我留下改變歷史進程的日日夜夜。但與此同時，使我大為驚異的是，彼得格勒與莫斯科作一對比，不論物質上、精神上都是不相同的。如果克里姆林宮的周圍缺少了那些建築並不井然有序、又不成比例的廣闊的中世紀集鎮，莫斯科又成為甚麼樣子呢？如果沒有了那處於城市中心的兩條交通大動脈——特維爾卡婭大街與普希金林蔭大道——莫斯科只不過是一座佈滿了羊腸小徑的迷宮式城市，只不過是完全不顧最基本的城市建設規劃的一大堆低矮土房的結合，只不過是體現東正教會和帝國官僚的沉重呆滯而又令人氣餒的象徵。彼得格勒卻完全相反，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彼得格勒是完全按照經過反覆考慮的設計圖樣而建設起來的大城市，這座大城市富有想像力。她那寬廣的道路、一排排五層或六層的樓房，一眼望去，顯然是屬於西方式的首都城市，如同巴黎和柏林一樣。自從 20 世紀初以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心臟，正是在這裏、在她的門廊和城牆的深處，在那用巨石砌成的大廈裏躍動着。

一天晚上，我們不得不向彼得格勒揮手告別了，正當我們離開斯莫爾尼學院，集體步行到車站時，一陣凜烈的寒風像鞭子般地抽打在我們的身上。而這個季節，我們還只穿着輕裝便服，實在是凍得直打哆嗦、苦不堪言，寒暑表已直線地下降到攝氏零下三十度。但當我們得知，我們搭乘的列車還沒有到站時，這陣刺骨的寒意，簡直使我們渾身麻木了。

更令人苦惱的是，既無月色又無星光，我們只得在這漫漫黑夜裏躲

縮在車站的一個月台上，等待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抵禦這狂烈的寒風。我們曾試圖利用樹枝生火，但也無濟於事。寒風越吹越烈，我們隊伍中有幾個人，特別是朝鮮同志，竟然經不起寒風的猛烈襲擊，不由自主地哭出聲來。待到天明，最終可以准許我們登上列車車廂時，我們早已是半死不活了。這場令人遺憾的意外事故，這場令人不安的痛苦經歷，使我們大部份中國同胞、特別是由國民黨挑選出來的代表們，對蘇維埃國家留下了不利的印象。

參加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的外國代表們，受到俄羅斯主人們的細心照顧和熱烈接待。所有的外國代表都被安排在特維爾斯卡婭大街的呂克斯（Lux）旅館裏，這旅館寬敞而又舒適，原本是專供招待顯要的外國旅遊者而設的。在代表大會持續舉行的長時間內，他們每天都有條件享受到豐盛的飲食，如雞、鴨、紅燒肉、白麵包（這種白麵包是專為他們烤製的）以及葡萄酒等。為了在生活上照顧得更加體貼，使他們感到更加滿意，俄國主人特別派遣文雅的、和藹可親的女共青團員來為他們服務。在飲食方面，不言而喻，我跟大家一樣享有這種特權的，但在別人看來，彷彿我吃得格外津津有味。凡有機會能參加某種盛宴時，這對我說來，簡直是一種奇蹟。但是，我的中國同胞們，對於這種額外的照顧，都絲毫沒有感受到光榮。同樣，他們對於俄國東道主為了更好地接待他們所作的巨大努力，也絲毫沒有體會。在俄國當時的那種困境下，對他們的照顧不論是甚麼都不缺也罷，不論是至少能夠吃得飽也罷，都當作司空見慣的事，對於他們，絲毫沒有感到東道主的這種殷勤接待有甚麼特殊的意義。反之，當看到在他們周圍發生的種種慘象時，便產生了強烈的印象，甚至不斷地慨嘆，不斷地表示憤恨。原先，他們對於在歷史上第一次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抱有很大的幻想，而此時，他們已經極度失望了，甚至體會到這是受人愚弄，上當受騙了。

張秋白作出的反應，也同樣如此，因為他猛烈地諷刺年輕的俄羅斯

革命所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他也不再提出類似革命目標的問題了，為了這個革命目標，蘇維埃國家一直為之奮鬥，甚至在1922年初在極度困難中仍然為之奮鬥的精神，而現在再也不能打動張秋白的心了。從最壞的意義上來說，張秋白畢竟是個職業政治家。他來到莫斯科只是為了宣傳蘇維埃革命的。與此相反，最使我感到傷心的是，黃凌霜也跟我談到了有關類似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問題，而顯然受其影響的黃碧渾，則不斷地發出共鳴。他們經常一起來看望我，向我提出各種各樣有關俄羅斯問題以及在那裏所發生的事實真相。從他們接受我講述事實真相時的態度來看，顯然表明他們對於當前的現實，跟他們所懷有的烏托邦理想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時，又是何等地受到了創傷。我力圖使他們懂得，所有的悲劇是怎樣發生的，力圖使他們理解革命不可能在一舉手之間就會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但儘管我作了詳細的辯解，他們仍無動於衷，而且再也不聽我的解釋了。這也用不着大驚小怪，幾個星期以後，我便得知黃凌霜他們已回到中國去了，而且也早已齊聲高唱誹謗蘇聯的合奏曲了。……然而，唯有張秋白一人仍保持緘默，並沒有扮演那種惡意中傷、卑鄙下賤的「大師」角色。

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共產黨員，對我所作的有關蘇維埃國家遭受到不幸的性質和原因的分析，比之黃凌霜和黃碧渾來，自然是容易接受得多了，他們自身很快又被置於困難和混亂之中，這是他們最早接觸到的蘇俄每日生活中的嚴酷現實，使他們接受考驗，他們不僅限於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逗留期內，使他們有可能了解到別人所不能了解的事，而且也由於他們能用自己的眼睛目睹在這個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儘管時間很短，但他們畢竟是獲益不淺，與此同時，他們還能在理論範圍內，獲得了某些進步。以張國燾和高君宇為例，他們把有限的珍貴業餘時間，用來專心致志地攻讀布格達諾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我早已讀到過這本很值得讀的著作，而共產國際提供他們的是用

英語列印的文本。當然，他們在攻讀這類著作時，會遇上大部份實用的詞。高君宇的英語知識本來是很突出的，但當他發現這對他沒有甚麼幫助時而深感丟臉。我是了解這一點的，因為他經常在張國燾的陪同下，前來要求我，能給他提出布格達諾夫教程中這一或那一問題的解釋，而他和張國燾之間也一致努力鑽研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的。然而高君宇和張國燾並不認輸，他們堅持下去，堅持就是前進，就是勝利。當我注意到他們是怎樣費勁來掌握這些在我看來是如此熟悉的知識時，那麼我就想到，我們這些中國年輕人，受派到東方大學接受長期的實習培訓，我們還有更多的機會，為甚麼我們不堅持下去呢？

陳獨秀在莫斯科

1922年夏初，學年將近結束了。東大的學習計劃，基本上是以兩年為最低期限。但當東大學生中有人感到，因營養不良而加劇了體力衰竭，也可以不必強制學習兩年。當時，東大大多數中國學生，決定回國去。實際上，他們再也不能堅持下去了。他們認為，最好辦法，畢竟還是盡快地投入實際行動中去。這樣的中國學生共有多少人呢？大約二十四至二十五人。在中國學生中唯有六人聲明說，他們準備在蘇俄再一次迎接新的「饑荒年」的考驗。他們是羅亦農、任弼時、蔣光赤、王一飛、抱樸和彭述之。

1922年7月，中國同志中選擇立即回國去的那些人，與我們決定留在蘇聯的人告別了。他們動身後不久，我們便被派往一個小村莊去度假，同時還有東大的外國學生和蘇聯學生，也還有一些東大的俄國幹部一起被派到這個離莫斯科只有一兩個小時火車車程的小村莊——馬拉霍夫卡去度假。有一座別墅交給我們使用（這別墅是木結構房子，坐落在森林的邊緣地帶。直到革命爆發之前，俄國首都的貴族及資本家每當夏季來臨時，經常來此避暑）。就在這度假地，我們的日常生活得到改善：麵

包很合我們的胃口，而且份量也不缺少；我們的早餐也有了牛奶或羊奶供應；更使我們高興的是，有時我們可以領到現金，自己準備飯菜——白米飯外加調味的牛肉。

新經濟政策實施以來，開始收到了效果。農業的恢復帶動了工業的振興。自從 1922 年春末起，整個國家經濟戰線上的積極性，已經達到了全面的高漲。這一年蘇俄的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各種商品的總和，終於達到了 1913 年已經達到的半數以上。這種令人鼓舞的變化，也反映在我們回到東方大學以後在生活上的變化。我們可以分配到越來越多的蛋黃麵包，新鮮牛奶以及美味的菜肴，如同在馬拉霍夫卡度假村時的生活一樣。

1922 年暑假，持續長達兩個月，在這過程中，我們中國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內，專心致志地把大量時間用來提高俄語水準。我還是第一次試圖把俄文版的著作譯成中文，即布格達諾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這同一著作，我曾在東方勞動者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看到過張國燾和高君宇兩人要根據英文版譯成、而付出的勞動是十分艱巨的。這種經歷，對我來說，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十分豐富的。因此，當我後來重新回憶起這件事時，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激情滿懷。

1922 年暑假結束之後，一個奇特的消息從中國傳到我們中間來：8 月間，在杭州召開一次特別中央全會，根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明確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作出一項決議，表示贊同馬林所建議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今後中國共產黨員必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的是為了同國民黨員協調行動，在國民黨的框架內，更好地發動國民革命、取得勝利。我沒有聽到過這個消息，我也不相信有這個消息，我認為很可能是消息傳錯了……但不，消息卻是真的！當我證實了消息時，我沒有對誰隱瞞過我的真實思想：消息使我深深地陷入了矛盾和苦惱之中。我當時便對住在別墅裏的俄國同志們說了。這些俄國同志看來對於馬克思主義已有了一定的認識，因為他們恰好正在一起深入鑽研資

本論。不錯，他們對消息的反應，是值得提一提的。實際上，他們承認，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按照共產國際的命令在杭州作出的決議有甚麼邏輯性。他們首先回顧了他們本國革命後，當着我的面表示，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不僅永遠不能同意跟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政黨合作，而且還要有必要切斷已經結成的合作關係，例如曾在一個時期內切斷同以孟什維克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先鋒隊的關係一樣。但，我向他們學到的，要超過他們自身的理解。他們急忙對我聲明說，如果這樣的方針確是共產國際制訂的話，那麼共產國際也是有一定理由這樣做的，當時我回答他們說，對於我來說，這些理由是根本不成為理由的，其中有一位俄國同志，他對我說：「有可能人們希望中國共產黨人，要仿效英國共產黨人的榜樣，以個人身份應邀參加工黨。這一點你是知道的。」但他的論點並沒有說服了我。我反駁他說：「中國國民黨根本不能同英國工黨相提並論。國民黨只不過一夥官僚、政客、買辦、資本家、軍閥等組成的大雜燴。」此時，我的這位俄國同志便沉默不語了，彷彿他自己也有點迷惑不解。

這是我第一次同荒唐的政治方案的反常現象進行了鬥爭，要確切地說，這種荒唐方案、多年來使中國共產黨陷於無法自拔的境地，最終導致 1927 年的革命失敗。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當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國共產黨正式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毫不遲疑地、全面地將此政治方案付之實施。從那時以後，我們完全被禁止重新討論那些理由或根據的問題了。紀律要遵守，難道不是這樣嗎？特別當涉及黨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國際問題時，那就更不許討論了。

1922 年 9 月中旬，中國學生一起都回到了東方大學，我們的政治、理論培訓階段的第二學年開始了，這時，我們並無緊急的事要做，課程才剛剛恢復，學校便邀請剛從中國回來的馬林到校講話，談一談自 1921 年夏末以來與孫中山的多次會談，特別是最近一個月在上海的會談。馬

林儀表英俊，談吐富有表情，滔滔不絕，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然而，馬林並不了解，我們以前不知道而現在想要知道的是甚麼，我們不喜歡聽的是甚麼，顯而易見，他應該談的是最重要的，而且又是最機密的他與國民黨第一號人物之間的商談內容，但他給我們灌輸的滿是那些平淡無奇的、在中國的長途旅行，而且為了使我們堅定信心，同時更為了不必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他就不斷地向我們保證，要用樂觀主義態度來觀察中國革命的遠景。

1922年11月初，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為參加第四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抵達莫斯科，代表團僅有三個成員，是由陳獨秀親自率領的，另兩名代表團團員是王荷波和劉仁靜。在此以前，我從未見到過陳獨秀。而陳獨秀的命運是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現在可好了，我可以有不止一次的機會去看望他，向他表示崇敬之意，在此長長的兩個月時間內，陳獨秀就在蘇維埃國家首都的城牆之間來往走動。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淨，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着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然自得的精神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傑出的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一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然而，在我看來，如果是屬於高層次的講話，他的表現就差一些了，譬如在進行長時間的政治討論中，他的發言就有點兒離開主題。而在公眾場合發表演說時，常使他的友人失望。

王荷波是鐵路工人，年紀與陳獨秀相差無幾。寬廣的肩膀，一臉嚴肅的表情，恰好是他生活上艱苦坎坷的特徵，但他隨時準備為革命而獻

身，是北方工人運動的重要革命幹部。回到中國以後，他參加了鐵路員工罷工運動，經歷了1923年二七事變。1923年6月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劉仁靜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躍分子，那時還不到二十五歲。他身材矮小，臉上佈滿黑痣。與其說他像一個知識分子，倒不如說他更像煤炭商人。但是只要他對你一笑，就足夠引起你對他的好感。五四運動時期，他還是北大學生，但已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第一批成員之一。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也許正是這個理由，才選拔他陪同陳獨秀和王荷波前往莫斯科。1923年夏末，他當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

然而，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陳獨秀和王荷波不但需要劉仁靜擔任翻譯工作，而且還需要瞿秋白充當翻譯。當然，瞿秋白非常高興而又幸運地抓住時機，在有威望、有影響的第一號中國共產黨人的身邊，充份地自我表現。他施展他的全身魅力，而且把各方面的工作都應付得很好，不久後，陳獨秀斷定他既是能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傑出行家，也是深通俄語的人，因此，於1923年1月初，便把瞿秋白一起帶回中國了。

當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團大會的工作正在進行時，隨後當他動身返回上海之前在莫斯科度過的八或十天內，我經常可以見到陳獨秀。但由於他閒置時間不多，只可能同我們討論實際問題，或者談談他在俄國逗留時間的計劃，或者談談從西歐回來的同志與回國工作的同志之間團結的重要性，他希望我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還會談到。在少有的幾次談話過程中，他仍能斷斷續續地談到了一些我們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毫無疑義，他也對我們談到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事，不過談的方式是有所保留的，也是含糊其詞的，但我終能獲得令人深感興趣的印象。可以說，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興奮的了。這有甚麼

理由嗎？我認為理由就在這裏：列寧沒有出席大會，令人特別感到驚異的是，只限於宣讀他的開幕詞，但代表大會在托洛茨基的鼓勵下，如同人們所期望的那樣，討論了新經濟政策，尤其是討論了早已出現過的、歐洲國家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問題，例如法國共產黨的危機，勢必作為頭等重要的現實性問題被重新提出來。而一般說來，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於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有關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問題，陳獨秀認為不應該提出。但使陳獨秀苦惱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共產國際這次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堅決地、要把同國民黨建立合作陣線，強加給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陣線是否有充份根據，事實上陳獨秀還持懷疑態度。在此問題上，他並沒有十分明確的概念，但他對我卻談得很多，為的希望我能作出何去何從的判斷。那時我還沒有事出意外的特別感覺，後來，人們告訴我，陳獨秀在一開始時，認為同國民黨建立合作陣線是不能接受的，但 1922 年 8 月在杭州時，他同意了只應當按照馬林的命令去做，隨後他只能更消極被動地保持這種態度，但當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口吻的反駁。⁷⁶

陳獨秀越是對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不願多作評論，而當跟我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則越是滔滔不絕。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

76 拉狄克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反駁，其實質內容如下：「你們太天真了。現在正是你們要走出孔夫子象牙之塔的時候了，你們所必須做的一切，就是把工人階級集結到由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反帝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不論社會主義也不論蘇維埃，在短期內都不能成為你們的目標。」見康拉德·布拉德的《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一書，哈佛大學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4 頁。

觀主義者。毫無疑義，必是他心懷這個動機，所以事實上就沒有任何別的憂慮，他最大的憂慮就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之前，他曾經告訴我有關派到莫斯科參加培訓的一些同志的消息，這些同志在 1922 年夏天已經回到中國去了。他還對我談到這幾位同志的素質給他留下了的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別談到了劉少奇、彭黎河、袁達時等同志，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⁷⁷，他向我表明，我黨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這種類型的革命戰士，因此，最好的辦法能使我們繼續派遣最富有熱情的年輕同志，到蘇維埃國家的首都參加加速馬克思主義隊伍建設的培訓班。他還及時地向我示意，一批來自中國的新同志，將陸續不斷地來到我們中間。

但他考慮了一會之後問道：是否有可能把我們在西歐的同志，在他們申請回國之前，先送到莫斯科學習，因為他們已不能再在那裏忍受下去了。陳獨秀的這個意見，在我看來，是具有重大意義的。1922 年夏天，我們在東方大學培訓的第一屆同學，由於自願返回中國，他們留下的二十多個空位，隨時可以使用，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我幾乎可以肯定，若能與東方大學行政管理部門的負責人磋商進行安排，把那些空位重新分配給我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經驗證明我的期望並沒有落空。不久後，便得到蘇聯方面的「同意」，陳獨秀立即寫信給他的長子陳延年，他那時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書記，力促他跟他的同伴一起，在短期間內作好準備，離開法國前來莫斯科。

當時，我們在西歐的同志共有五十人：法國三十人，比利時十人，

77 1922 年夏初，劉少奇一經回到中國，便受黨中央派遣，到安源去組織煤礦工人，成立「工人俱樂部」。但他不是單槍匹馬去安源的，他還帶了三個小兄弟一起去，這三人即彭黎河，另一個姓彭的，還有一個姓吳的。這個打成一片，緊密合作的小組，很快便在安源創造出奇蹟來。袁達時受黨的委託，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工會書記處工作，同樣地，他也取得了完全令人滿意的成績。

他們中大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德國十人，大多數是中國共產黨員。

我們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同志，開始時，幾乎都加入了勤工儉學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勤工儉學使兩位中國無政府主義前輩李石曾和吳稚暉，有機會從事一種活動，目的是使更多的中國年輕知識分子前往法國學習，他們卻要以勞動所得來支付一切費用⁷⁸。申請旅法參加勤工儉學的候選人登記局，已於1918年在北京、上海兩地開始辦公。登記局設法在開往歐洲船隻上預訂極少量的乘客座位，1918年底，第一批招收進來的年輕人到達法國。到1920年底為止，招收進來的旅歐學生總數約計一千五百人。

勤工儉學運動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只因為這運動適應了打開外面世界的需要，曾經推動五四運動的文藝復興的非凡現象，幾乎使我們所有學生的心靈深處都感受到了。實際上，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把他們的視線轉向西方，特別是轉向法國；在這批年青知識分子中，例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外國語學社第一屆學生，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轉向了蘇維埃俄國，這樣的人是極少數。「旅居法國」曾經如此風靡一時，我們同胞中的一些人就被這股旋風捲進去了，但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能在李石曾的登記局裏註冊，便不惜犧牲一切：家庭財富、職業、學習。最突出的例子是蔡和森，他母親以及他的妹妹蔡暢，他們賣掉了在湖南家鄉的所有房產土地，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能登上駛往馬賽的輪船。另一個例子是徐特立，他已年過四十，並擔任長沙中學校長，但為了同樣的目的，可以放棄中學校長的職位。還有一個例子是詩人王獨清，為了達到前往巴黎的目的，毅然中斷了嚮往已久的在日本

78 李石曾和吳稚暉兩人，於20世紀初，曾在法國逗留很長時間，他們在隱修士一類人的影響下，很快成為無政府主義者。1907年，他們在其他中國同志合作下，於巴黎創辦了一份小型期刊，取名為《新世紀》，對具有現代思想傾向的年輕中國同胞起到一定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他們從法國回來，就在那時，勤工儉學運動的概念在他們的思想裏形成了。

東京的學習。⁷⁹

然而，到達目的地之後，所有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發現，現實的法國，同李石曾、吳稚暉以及其他人所廣為宣傳的形象遠不相稱，使他們深感不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懂法語，也就不可能在法國實現名副其實的學習。同時，由於他們缺乏專業技術資歷，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從事一般手工操作。這樣，他們的生活處在極端困難之中。在失望之餘，多數人只要有有可能便設法回國了。

在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間，最有經驗而又能堅持下去的，差不多都是湖南人或四川人，他們從 1920 年底開始，在雙重影響下，飛快地轉向共產主義：第一，他們是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比如通過《新青年》雜誌以及留在中國同伴所寄來的文學作品；第二，受到法國共產黨思潮的影響，比如在圖爾（Tours）代表大會之後，他們讀到了《人道報》。1921 年初，有一批中國青年，向數月前在上海創建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出請求，以較鬆散的形式在巴黎建立同樣的組織，其中有幾個十分積極的活動分子，像蔡和森、李維漢、李立三等人，由於那次令人可憎的里昂事件的後果，終於在 1921 年秋天被逐出了巴黎，但他們當中沒有參加里昂事件的陳延年、王若飛、趙世炎、周恩來、尹寬、任卓宣、李富春等人，於 1922 年決定創建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當然，上述這個支部設在巴黎。陳延年當選為書記，並以此身

79 蔡和森，可參閱本書第 376-379 頁（法文版）。蔡暢，1923 年在法國與李富春結婚。李富春曾積極參加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經歷過長征，後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財政方面最高領導人之一。蔡暢自 1949 年起，便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首創者之一。徐特立，1924 年回國，那時還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直到 1927 年，第二次大革命失敗後才入了黨，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毛政權中裝點門面的知名人士。1968 年年底，徐特立去世，終年九十二歲。王獨清，原籍陝西，出身於達官貴人的家庭，當他離鄉赴日本求學時，便同家庭斷絕了關係，他的特點是充滿激情，才華風發，而且富有浪漫主義色彩。1925-1926 年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給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在 20 年代後期，他參加「創造社」文學小組活動並以革命藝術手法編輯文學月刊。1930 年代初期，他轉向左派反對派（托洛茨基派）。

份，他付出了大部份時間，用來確保編輯和出版油印刊物《少年報》，這就是他們的臨時機關報。剛才提到的這份《少年報》，基本上是在中國學生中流傳的，這些學生已經到達法國，而且恰好都在里昂、克勒索（Creusot）、蒙塔日（Montar）、盧昂及哈佛爾（Havre）等地工作……有的在巴黎行政區內工作。與此同時，為了跟居住在上述各城市的同志保持聯繫，留學法國的中國社會主義者青年中，目光犀利，富有高度敏感性的趙世炎、王若飛、周恩來等人，從此一城市到另一城市頻繁地來往。1919 或 1920 年間，以勤工儉學名義來到法國的某些同胞，最終離開法國前往比利時，一些天主教教會學校已經同意，以享受助學金待遇的學生身份，歡迎他們到那裏去學習。在這些學生當中，理所當然的也有意志堅強的人，他們很快便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以聶榮臻為例，他是未來的元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核武器力量的主要主持人；又如劉伯堅，共產國際曾委派他到頗有爭議的「基督將軍」馮玉祥那裏去，以顧問身份為馮玉祥服務了好多年。

在他們當中最富有鬥爭性的，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他們力圖通過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同在里昂的中國未來大學負責人進行洽談，但他們得到的只是敷衍搪塞的答覆。當時他們估計到，再也沒有任何別的道路可供選擇，只有大夥兒一起擁向里昂，試圖不經過任何手續便在準備好的場所裏定居下來。其中有些人原住在巴黎、科隆或科爾貝瓦，另一些人原住在蒙塔日，再有一些人住在克勒索，總人數足有一百多，1921 年 9 月 21 日他們都在里昂集會，因此犯下了所謂「罪行」。

法國警察應里昂大學的請求，從 1921 年 9 月 22 日起，把他們從「非法」居住的地方驅逐出去，並把他們拘押在該城的一個古老的營房裏，三個星期內不得離開。1921 年 10 月 13 日，他們被帶到了馬賽；並於 10 月 14 日法國政府粗暴地把他們押上一隻條件十分惡劣的船隻。

他們回國的航程持續了十四天，而且是在物質條件糟糕透頂的條件

下結束這次航程的。1921年11月底，終於抵達上海，這時他們雖都是抱病之軀，但仍耐不住心頭的怒火，一經登岸，便向報界投書，慷慨陳詞，這就是鐵證。

大體上說來，我們在德國的同志的年齡都比在法國的更大一些。他們分別依靠自己的辦法來到德國的，學費也要自己負擔。他們用不着靠勞動來維持生計。從物質生活上來說，如果馬克貶值的速度越快，使他們享受到更大的兌換好處，他們在生活上的安排也就更舒服，1922年底到1923年初，他們在柏林的費用每月僅需8元到10元，生活就得很得體了。然而，我們德國同志形成的小組，陣營就不那麼整齊了，人們可以看得清，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張崧年是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劉清揚是天津南開大學的前校友，五四運動的頭面人物，也是張崧年的妻子；高語罕是蕪湖中學的前校長，陳獨秀的老朋友；朱德是從以前的小軍閥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他同妻子賀志華（He Zhihua）一起來柏林；夏秀峰（Xia Xiufeng）是我以前在寶慶五區中學的同學；熊雄，以前是職業軍官，後來團聚在我們的周圍；熊銳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德語專家；李季是哲學家……不久後，又來了周恩來，他先在法國兩年多之後才來柏林定居。

1922年底，陳延年順從他父親在幾個星期前發出的召喚，來到莫斯科，陪同他一起來的同志，從比利時來的兩人，從法國來的六人，他們是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汪澤楷、蕭子璋、李何林，當然還有他的弟弟陳喬年。他們這一行人，是今後兩、三年中從西歐來到莫斯科的第一批中國青年共產黨人。他們到達莫斯科後，大家假呂克斯（Lux）旅館組織了一次小小晚會，來慶祝這件喜事，陳獨秀以及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也都來到旅館。這次小小晚會，把在莫斯科的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團聚在一起，大約有二十多人。晚會的氣氛既是歡樂又是激動。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

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着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着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陳獨秀帶給我們的。幾天以後，即 1923 年 1 月初，陳獨秀又啟程重返中國了。

第一〇章

1923-1924 年在莫斯科，
大批年輕中共黨員
到達東方大學

1923年1月，我到達俄羅斯已有二十一個月了，俄國國名已改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那時，列寧正身患重病，無法處理公務，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三頭執政者，或稱三駕馬車，正利用時機，從俄共黨內發動對托洛茨基的進攻。採用這種手段發動起來的進攻，是一場頭等重大的政治危機，這危機持續到1925年1月，才稍有緩和，但緩和時期僅十六個月，到了1926年初夏，反托洛茨基的進攻又重新發動起來，這一次一直持續到1928年1月，以托洛茨基的全面失敗而告終。當這場頭等重大的政治危機，月復一月地存在時，我們生活在莫斯科的中國年輕共產黨員，對此連一點概念都沒有。這場危機在1923年底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1924年7月間，便更猛烈展開，就在這個時期內，我們又必須回到中國來。這場危機不僅在蘇聯，而且還在全世界範圍內，通過共產國際，引起了災難性的反響。

然而，事實是：我們曾受到這場危機的影響，卻不理解危機的嚴重性，我們曾經沐浴其間，卻沒有抓住實質意義，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莫斯科時，並不是以主體身份而是以客體身份出現的。不錯，這也是事實：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察覺到俄共已沿着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化的斜坡滑下去，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已標誌着俄國革命改變了航向、蛻化墮落，乃至成了倒行逆施的起點了，更可悲的是世界革命的進程暫時受到了中斷。

誠然，如果我在1924年就能預先看清，直到1928年初才真正看清的那場政治危機，那就太好了。

一批又一批從法國、比利時、德國等西方國家來的同志們到達東大了，數量較少的從上海、北京、廣州等地來的同志們，也連續不斷地來到東大。東大的中國人，在數量上逐漸地增多起來。其中大多數人在東大逗留相當時期，有一年的，有兩年的或更長一些，按此趨勢，我們在東大的實際人數還要不斷地擴大。1923年春，我們小組人數三十多人，

再過一年，人數已經超過六十人。

顯而易見，這相當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到達莫斯科後，給我們帶來新的任務，我本人當時擔任這一班人的書記。我還必須同西歐來的同志的各小組負責人保持聯繫，以便及時準備歡迎新來者。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西歐支部，是在 1923 年初正式成立的，它領導着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分支，但是應該說這個西歐支部，只是寫在文檔上的，而實際上並無多大作用，我們共產黨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對他們進行具體領導。因此，從 1923 年到 1924 年中，我不是同他們的書記，而是同巴黎和柏林的共產黨小組成員保持着通訊聯繫。我同這些成員中最早保持聯繫的是尹寬，後來是李富春，最後是在巴黎的任卓宣，和在柏林的熊銳及李季。

1923-1924 年間，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員小組，其工作方式大體上與 1921-1922 年間相同。通常由五至七人為一個支部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經常召開全體會議。一般是每八天或十五天（即每週或每隔一週）舉行一次，因為在他們中間的一些共產黨員，當時是專心致志地參加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討論會，從法國來的同志們，堅持要求我本人進行說明，我根據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以及普列哈諾夫和弗蘭茨·梅林的哲學著作，為他們準備講稿。

我們在東大的所有同志，特別是從法國來的，都是非常熱情地、始終如一地利用他們的時間，根據他們有利的物質條件來學習他們所最關切的理論，以便將來回到中國時，能更好地履行革命戰士的任務。我可以強調地指出，正是莫斯科東方大學，從 1921 年春到 1925 年夏，特別是從 1923 年春到 1925 年夏之間，培養出一大批我黨所需要的英勇戰士，他們成了中國第二次革命的主力軍。

從 1922 年 12 月到 1924 年春，在莫斯科接受或長或短培訓的是那些

同志呢？現在當我提筆寫這幾行字時，當然不可能全部都記得起來，但是我仍能想起以下的姓名來：陳延年、陳喬年、陳世炎、王若飛、鄭超麟、汪澤楷、尹寬、李何林（Li Helin）、蕭子璋（蕭三）、余立亞（Xie Liya）、李啟達（Li Qida）、馬玉夫、張伯簡、袁慶雲，他們都從法國來；從德國來的有張崧年、劉清揚夫婦及熊雄；從中國來的有陳其修（Chen Qixiu）、黃平及葉挺。在他們當中，有幾個人特別熟悉，不妨在這裏談一談。

陳其修

陳延年和陳喬年，是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他們年齡分別是二十五歲和二十一歲。1919-1922年這一段時期內，他們兄弟倆與父親之間關係並不十分融洽，其原因有出於家庭的、也有出於政治的。由於狂熱地崇拜黃凌霜，兄弟倆都自稱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他們這種信仰最先在中國開始，後來在法國一直堅持到1921年底。只在1922年他們才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延年不拘小節，外貌並不討人歡喜，穿的衣服不成樣子，鞋子破破爛爛，彷彿是撿來的，很像一個流浪漢。他不像父親那樣才華橫溢，但他的長處是腳踏實地，是一位嚴肅的、深思熟慮、立場堅定的人。他的生活習慣十分簡樸，雖說不上是清教徒式的，但他既不嗜酒，也不吸煙，的確沒有任何惡習。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們中是難能可貴的一位，在掌握法語知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能把一般的法文版文獻譯成中文。正如在這十八個月中，我有機會親自在莫斯科所觀察到的一樣。在此段時期內，我與他很接近。喬年是一個很可愛的大孩子，兩頰紅潤，眼睛裏閃耀着智慧之光。他在性格上毫無疑義地比延年更加活潑、開朗，更富有青春活力，更少受外界的影響，但要倔強得多。在工作上，與同志們相處的關係上，他很像哥哥延年：堅定不移，光明磊落，毫無怨言地接受最嚴峻的考驗。

四川口音，智力過人的趙世炎，中文造詣很深，他說法語的能力，也勝過陳延年。身材高瘦，長長的臉形，表情嚴肅；儘管性格偏於凝重，

但思維十分敏捷。他演說時，具有異常的魅力，能把聽眾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確是一位傑出的鼓動家。他唯一的缺點是：在碰到一些問題時，本來應當以完全獨立精神加以比較就能作出最後判斷，但是他常常缺乏足夠深刻的思考功夫。

王若飛，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很雅致，有一張潔白發亮的臉龐，每當開懷暢笑時，露出一副虎牙似的牙齒，他的舉止表情格外討人歡喜。通常他說話自然，不矯揉造作。毫無疑問，他所到之處，都能顯示出他的青春活力。王若飛出身於貴州省頗有名氣的家庭，他青少年時代的大部份時間，是在四川省度過的。小時候，他常與一群「熙熙攘攘、無憂無慮」的孩子們混在一起；後來成當地鄉紳王伯君（Wang Bojun）的結拜兄弟；甚至還加入過哥老會。他的這種氣質和性格，同幾年後賀龍那種氣質和性格相似，無怪乎他自稱是一個「講義氣的正直者」，就是說他有一顆忠忱的心，是一個無畏無懼的人，看來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除此之外，他才思敏捷，富有高度機靈性，不會使人感到他的態度是粗野的。儘管如此，他仍然有他的小缺點，但據我看來，這是個致命的弱點：他酷愛飲酒，鍾情女人。當他逗留在法國時，在同志們中間，他是以口袋裏整天藏着滿瓶燒酒，而且總是各種傳奇式冒險行為的中心人物而聞名的。當他第一次去德國時，連一句德語都不會說，沒等到多久，他居然像我們中國話所說的出去「打野雞」了。我在同志們中間知道他性格上的這種令人遺憾的缺點，便在他到達莫斯科之後不久，單獨找他談天，提醒他不要在蘇維埃土地上，再做出這種亂搞男女關係的不光彩事。彷彿突然間，他對我懷有某種疑懼，在莫斯科停留的那些年裏，他一直保持着這種疑懼，甚至後來我們都回到中國了，他還是這樣。可是王若飛，不論過去或以後，他始終沒有停止過以最堅定的犧牲精神為革命的勝利而戰鬥。應該說，他不是出色的作家但具有卓越的組織才能，他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不僅有條不紊，而且高度有效，凡他作報告，傳

達會議精神時，既精確無誤，又忠實可靠，在這方面幾乎無人與之匹敵。

鄭超麟，身材堅實，朝氣蓬勃。高高的前額，面帶笑容，態度溫和，但無疑有點書生氣。他說話時口吃，從政治上來看，他並無獨到之處。從他的身上，我發現他是一位學語言的天才。在這一特殊領域內，鄭超麟能以最快的速度學會辨認和閱讀外國文，並且能用最確切的中文翻譯過來。不論甚麼外國文。只要有關於政論性方面，特別是當人們不要求他發音清晰或在口頭上解釋清楚，便能充份發揮他的才智。例如，他在莫斯科時，不需幾個月時間，便把俄文學會了，正如他在法國時那樣，他不消幾個月時間學會了法文。除了熟悉這兩種文字之外，他很快又學會英、德、意和世界語等四種文字。

尹寬，身材又瘦又長，看上去好像細長的青豆一條，他的兩腿發育不全，而通常臉色略帶病容。他那足智多謀的特點，表示出他是一個頗具洞察力的睿智者，事實上他確是一位善於思考的人。他在理論方面的理解力，顯然要比大多數同志高明得多。但他與人相處時，態度生硬，說話太刺耳，頭腦不冷靜，很快會失去理智，無論對人或對事，他的判斷易走極端。人們因此認為，他的這種態度對組織決不會產生積極作用。

葉挺，像黃平和陳其修一樣，代表着來自中國的同情者。在莫斯科時，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葉挺是職業軍人，前保定軍校學生，國民黨員，又是該黨多數領導人的親信。他擔任過聲名顯赫的、實際上就是孫文「私人的警衛團」中一個連隊指揮官，1924年初，他來到我們中間，或許有人說，難道他不是駐中山大學特使胡漢民所推薦的嗎？正因此，我在開始時，不免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他。但隨後不久，我就毫不遲疑地證實，這個年輕人雖然愛說閒話，卻是正在成長中的非常忠誠的同情者。與此同時，在他對我講述了他的全部過去歷史之後，並向我提出請求，要參加我們的黨。我同意了他的請求。長期以來，我從未因負有這一責任而感到後悔。葉挺的入黨，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一件神秘的事。

按照現行的第三國際內部規定，東大的中共小組必須要合併在東大的俄共組織中去。然而，1923-1924 年的情況，已遠不是 1921-1922 年的情況了。我們同俄共的關係，是完全獨立自主的。除了中國共產黨的命令之外，我們不接受任何其他命令。這樣做的主要理由有兩個：（1）我們建立起來的小組成員流動性很大，而且是極不穩定的；（2）在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論是理解俄文或用俄語說話，都是同樣有困難的。

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兩人，即羅亦農和我本人，從一開始就理所當然的是俄國共產黨黨員，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實際上，我們能否就是這樣的黨員呢？問題就在這裏。我們能說俄語，而且除中國名字外，還取了俄文名字，我的俄文名字叫彼得洛夫（Petrov），但我們幾乎很少召開由我們自己創建起來的東大俄共支部會議，主要理由是兩個：第一，我們沒有時間，第二，我們感受到並沒有必要性，也沒有特別的迫切性。

作為東大中國黨組織的負責人，我也經常受到邀請，去參加東大俄共黨組會議。我是很樂意去的，特別當會議要傳達有關世界和蘇聯國內的重大事件的時候。那時會場上的政治氣氛仍然是老布林什維精神起着主導作用，儘管列寧因敵人襲擊而身受重傷，無法處理公務。參加會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進行討論。任何人只要有願望，都可以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不受任何約束。只是從 1924 年春天起，即列寧死後不久，這種情況就不再繼續存在下去，理由很顯然，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已經萌芽了。

在每一學年的學習期內，我們中國人與蘇聯同志及東方大學的外國同志之間，只能保持十分淺薄的關係（如土耳其人、保加利亞人），或者只保持表面上的關係（如蒙古人）。特別顯著的是日本人，他們一直生活在自己人中間，不和外人接觸。但我仍能設法與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保持關係，這是一位工人同志，當他回國之後，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宣導

者之一。我唯一能與之建立真正友誼的外國同志是一位波斯人，他與本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此外，還有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1923年暑假，同往年的暑假一樣，但同1922年暑假不同，這年一共持續了兩個半月。這樣，我們就有了更多機會，不僅可以同外國同志們生活在一起，而且還可以同到鄉間去休養的東大教師團中的俄國同志們生活在一起了。

這個暑假我們是在一個典型的、古老的鄉村裏度過的。這村莊位於離莫斯科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火車車程，村莊裏共有數十棟小木屋，一幢豪華的宅第以及一所漂亮的學校。往日，這些矮小屋子裏全擠滿了農奴以及他們的孩子。所有的小木屋都是用樅木頭一根一根地堆起來，彷彿這是他們有意這樣做的。這座豪華的宅第，無疑就是以前整個村莊歸他所有的莊園領主的家。宅第全部是磚石結構，坐落在村莊的中心，緊靠着它的是一口池塘，一座小磨坊。鄉村學校的前前後後是由公園環繞着。這座豪華宅第內有十多間非常寬敞的房間，直到1917年，房間的裝飾都是按照莫斯科資產階級家庭的樣式佈置的。隨着國家所有制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之後，事實上，這座豪華住宅卻沒有多大變化：到處可見的古色古香的傢具、裝飾着四牆的油畫以及那琴聲可以振動客廳的三角鋼琴，都還是原封不動地留在那裏。一間大得異乎尋常的糧倉就在鄰近。我們大多數中國同志就是住在這間糧倉裏。其中有羅亦農和任弼時。其他同志則與波斯人小組以及原籍高加索地區的蘇聯人小組分住在大房子裏。

我自己則與東方大學的幹部名叫謝爾蓋的為伴，住進小學的一間又大又靜的房子裏，這是在收穫季節所有小學生離開之後留下的場所。謝爾蓋是曾在哈爾濱上過學的學生，他懂得中文，而且運用起來同他的母語一樣熟練。那時，他正接受一項任務，即為共產國際把陳獨秀的名著《獨秀文存》的一部份譯成俄文，我則幫助他更好地完成這項艱巨的任

務。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是偉大領袖，每當他的著作中出現一些生動逼真的表達手法時，或出現精彩的片段時，謝爾蓋未免有點疑惑不解，我就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理解，把問題解釋清楚。但一個月過去了，小學校要重新開學，我和謝爾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搬離學校。當時我們在一個農民家裏寄宿搭伙，並同一位才能卓越的第三者合作，這是一位俄羅斯人，他能說六、七種語言，無疑，他也是東方大學的教員。

如同我以前已經談到過的，在東大的中國小組裏，沒有一位女同志，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有方便之處的，就是說在我們同志之間的關係可以大大地簡單化了。然而在東大的其他小組裏，同我們中國小組不一樣，他們都有一定數量的年輕小姑娘。然而，在整個學年期限內，我們有那麼多的工作，而我們連做夢也不會去考慮與女同志們建成立關係。反之，如果假期來了，特別是漫長的暑假來了，我們能與高加索或者其他蘇聯女同志接觸的機會也就增多了。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問題。實際上，在蘇聯人的眼裏，我們這些中國人並不是不受歡迎的。1923年，我和同志們一起度暑假的那個村莊裏，我很快認識了一位高加索的女同志，她長得漂亮可愛，對我也很親切體貼，她經常希望與我一起出去作長距離的散步，在散步過程中，每當我在說俄語時出現較大的錯誤時，她就會不厭其煩地給我指出並加以糾正。後來，她察覺到她對我是有吸引力的，於是有一天，正當我們並排走着時，她力圖向我暗示，她要跟我一起到中國去。當時我確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只能帶着極度痛苦的心情向她解釋清楚，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的工作性質不同，一旦回到中國，我只能專心致志地獻身於工作。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到此結束。我歷來是一個嚴肅的人，從未擁抱過她，至多也只不過在無目的的漫遊中拉着她的手罷了。

在我們留蘇學生中，有一個叫李宗武的，他有兩個特點，一是風度翩翩，二是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因此他在蘇聯婦女的眼裏，是頗有魅

力的。李宗武甚至於揚言說，他早就與蘇聯婦女睡在一起了。但我知道得很清楚，他的這種說法只不過是他的自吹自擂，因為在蘇聯，沒有一個，或幾乎沒有一個婦女，只要是她們沒有得到結成伴侶的可靠保證，是不會同意跟男人睡在一起的。

正當我剛剛下決心忘卻那位可愛的高加索姑娘的時候，羅亦農便跑來找我了，他告訴我說，就在我們這同一村莊裏，他也深深地墜入了莫斯科馬克思研究院的一個女學生的情海裏，從她那方面來說，她希望兩人能結為夫妻，這時羅亦農確實陷於進退兩難，他要徵求我的意見。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說：「你要把一個俄羅斯婦女帶回中國去，她能幹甚麼呢？你豈不太輕率了嗎？假定我們是這樣的人，而且真的把她帶回去，那麼我們的身上便背上了一個外國妻子的包袱，豈不是太荒唐了嗎？你設想過沒有，那時你就要為你的外國妻子提供豪華奢侈的生活，你就要像貴族老爺般擺起闊來，你何時才能回到我們的隊伍中來呢？」羅亦農立刻同意了我的勸告。

1923年9月，我在東大逗留時間進入第三年。這時我已不再是一個學生，而是一個教師的身份了。我要做好的教學工作，只是針對東大的中國學生的。這是一門全新的課程，即六年級課程——《人類社會形式發展史》。為了能把課上好，我在好幾個星期中，把主要時間都用在資料的查閱工作上。毫無疑問，我要查閱用俄文寫的、我可能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而特別還要查閱大量中國古典著作，如《易經》、《尚書》以及其他更古老的傳奇的文獻、資料，這些我都可以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實際上，我所關心的是：要重新確立在人類社會總的發展過程中探索中國的發展過程，以此來說明從原始公社時代起，直到由十月革命而引起轉變了的時代止，中國社會到底在那些方面是與西方社會相似的，又有那些方面是不同的。我頗自信地說，在大膽投入這樣一種學術探索事業中，我是中國知識分子行列中最早的一員。

不幸的是，當我動身回到中國時，為了安全起見，我不可能隨身帶走這些研究成果的筆記，這些筆記是我在教學的基礎上寫成的，不僅我自己深感興趣，而且我相信，我的大多數學生也同樣是深感興趣的。但我把這些筆記留在莫斯科了，正像我個人日記也留在那裏一樣。自從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那時起，我在蘇聯境內一直沒有停止過寫日記。回國後兩年，最使我大吃一驚的莫過於，我發覺我在東大任教的課程，以筆記的形式，一字不差地已被我的一個學生所佔有了，這就是從法國回來的張伯簡，這位張伯簡，把筆記編成書的形式，送到上海左翼出版社、大東書店去出版，署了他自己的姓名，書的名稱便是《社會形式發展史》。

由於我是一個教師身份，我在物質上就有了各種優先權，我可以有自己的單人房間，也可以在專給全體教師使用的食堂裏就餐，我還可以每月領取工資一百五十個盧布。對於頭兩個物質優先權，我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在蔑視特權的觀點指導下，我決定始終如一地與同志們生活在一起；與同志們一道睡在集體宿舍裏，吃在集體食堂裏。但對於每月領取工資這一點，我是樂意接受的，我的工資只是俄羅斯人的平均工資，他們最高工資每月三百盧布，最低的只有五十盧布。但就我的情況來說，這一百五十盧布倒不失為是一筆小小的財富，我可以派三種用處：第一購買一隻新錶，來替換那隻損壞到不能再用的舊錶，添置一些盡可能樸素的衣服，此外再購買一些我所希望的帕布洛斯牌的煙絲和列寧牌的長嘴捲煙；第二用來幫助身體虛弱或確實有病的同志；第三購買各種各樣的書籍。

蘇聯的舊書是非常便宜的，不到一年時間內就積聚了相當一大批雜七雜八的各種舊書，其中有歷史著作，也有哲學著作，有馬、恩全集，也有列寧著作，還有俄羅斯文學著作。1924年初，正當我即將離開莫斯科之前，恰巧遇到了維金斯基，他自動地向我建議說，要我利用外交郵

件途徑，把所有的書籍運往上海去，我急忙把書裝在箱子裏，並委託他辦理。這位維金斯基先生安排得如此及時，如此恰當，在我到達上海之前，所有的書都已運到上海了，並且放在上海蘇聯領事館，但那時，我們都是被嚴密監視着的，而且在第二次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一直處於這種地下狀態中，當然，問題不在於我可能到蘇聯領事館中去，把書取回來，問題也不在於我可以到那裏去尋找，再不然的話，我可以秘密地一小包一小包帶回來。問題在於我沒有時間，不能經常地去幹這件事。因此最後，我只能領回一小部份書。其餘的書的命運怎麼樣了？我永遠也無法知道了。

「德國十月」革命失敗 蔣介石抵達莫斯科

1923年秋，我親眼看到了兩件大事，一個接着一個地發生了，給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從表面上來看，這兩起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彷彿是很不相同的，但是這兩件大事，各自地、好像非常深刻而又鮮明地標誌着，俄羅斯革命的命運正在尋求着第二個前途，而中國革命的命運也同樣在尋求着她自己的前途。第一件大事，就是：「德國十月」革命出人意料地失敗了，這次革命失敗正有利於在蘇聯國內，以完全決定性的形式，策動一次肅清列寧遺產的進程，以迎合斯大林的利益；第二件大事則是蔣介石抵達莫斯科後，他的半官方使命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功，結果在中國國內，莫斯科立即授權國民黨把共產黨的手腳捆綁起來了。

1923年初，法國藉口柏林拒不支付戰爭債款，派兵佔領魯爾區，這是德國經濟的實際中心。在這種極端粗暴的干預之下，開始時，德國是以消極抵抗的反應載入史冊的。佔領區的人民群眾，在柏林政府的公開鼓勵下，起來抵制法國佔領當局，並號召總怠工。魯爾區的生產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而國民經濟也立即元氣大傷。在法德之間舉行的有關戰爭

債務問題的談判，到了1923年5月全部歸於失敗。駭人聽聞的通貨膨脹，很快地便誘發了同樣駭人聽聞的馬克貶值，使中產階級陷入了絕望的破產深淵，使勞工階級走進了極其悲慘的失業死胡同裏去。當權的資產階級政黨，因受到這種災難深重的打擊而失去控制，力圖要藏身到觀望主義的政策背後去。反對派組織，包括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在內，想乘機再度站起來，但又無能制訂出新的政策。幾個星期過去之後，接着在全國範圍內的不滿情緒日益擴大，從1923年夏開始，這種不滿情緒已是如此明顯，以致一個高漲的革命形勢也就磅礴而出了。

當時德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形勢是，一方面這個黨在大戰結束之後，德國是個戰敗國，使它遭到種種痛苦和挫折，另一方面，由於俄羅斯蘇維埃的突然勝利，在德國工人隊伍中激起了莫大的希望，因此藉以結束德國資本主義制度特殊機遇終於出現了。但是這個黨是否力圖去抓住這個特殊機遇呢？而共產國際如果確有真心實意的話，又將以甚麼方式推動它去抓住這個機遇呢？

可以說，直到1921年春天，德國共產黨所表現的極左主義和盲動主義傾向，始終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在1921年3月舉行的那次以工人起義的失敗嘗試所證明了的一樣。後來，在1921年夏初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及1922年秋末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對德共發出警告之後，這才糾正了這種幼稚的錯誤路線，並願意接受與社會民主黨人結成統一戰線的戰略原則。到了1923年年中時，德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一個群眾性黨，在選舉中能贏得數百萬張選票了，特別是，站在它身後支援它的，還有大批工人群眾，他們因處境惡化而被激怒了，正準備為結束資產階級社會秩序在戰鬥。其實，此時的德國共產黨是完全可以同意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

在此千載難逢的歷史時刻，難道德國共產黨不應迅速有效地把工人群眾動員起來，並在工人委員會內部迅速成立德國蘇維埃嗎？然而，

德國共產黨幹的卻不是這回事。他們不是很積極地採取措施，盡快地行動起來，而是糾纏在永不休止的爭論之中，支吾搪塞，互相誹謗。這樣的做法確是令人感到十分可笑的。難道此時的德共不是更應當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佈的、毫不含糊的指示嗎？顯然，這指示完全能促使他們結束徒勞無益的空泛議論，把精神振作起來的。畢竟，總書記海因里希·布蘭德勒是同莫斯科不斷地保持聯繫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那麼，共產國際最高領袖中，究竟是誰在 1923 年夏這個關鍵時刻、負責作出有關德國問題的決定呢？這就是問題癥結之所在。實際上，此時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不能在第三國際內部發揮他們兩人的真正作用。此時的列寧，不僅因為人們禁止他從事活動，而且還因為身患重病，不得不保持沉默。而托洛茨基也不能再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此時的主席是季諾維也夫，這位季諾維也夫是由斯大林導演的三頭執政者之一，而斯大林在最近幾個月來，不無成功地已把托洛茨基孤立起來，終於迫使托洛茨基不願意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一句話，直到 1923 年秋末，托洛茨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知道在德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在當時的條件下，唯一能起作用的人是季諾維也夫。但是，試問，像季諾維也夫這樣的人，能否一貫作出正確的決定、並且是由他一人作出的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老人突然間交給這位實質上是一個小人物的傳奇式領袖一份異乎尋常的重任：去發動或者不去發動關係到歐洲前途、人類未來的關鍵性革命——德國革命。問題是明擺着的，這責任實在太重大了，他是不敢去承擔的，如果能得到一位比他更強有力的人的支持，他也許能作出應該作出的決定，下命令給布蘭德勒同志要他準備發動真正的「德國十月」革命，但是，季諾維也夫終於把責任推卸了。就這樣，他日復一日地把問題拖下去，甚至不惜把本來可以抓到手

的最後機會，也一個又一個地放過去了……更糟糕的是，由於他罪惡地、冷漠無情地對待革命，居然在這種無恥的觀望等待中，還感到心安理得，非常舒服；這種無恥態度、斯大林自從 1923 年 7 月底以來就已經表露無遺了，他的目的在於阻擋任何俄國十月革命戰爭式的姐妹革命的揭竿而起，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讓這樣的革命起飛，必將妨礙他實現自己的野心，這野心就是把托洛茨基排除在歷史舞台之外。

但是，德國現實形勢的發展，越來越迅速，從 1923 年 8 月中旬開始，時機已經發展到非面對現實不可了。但是，在這段時期，內部發生一場浪費大量最寶貴時間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從 1923 年 8 月底開始，直到 10 月初為止的整整六個星期中，這場爭論把在莫斯科的兩派德國領導人全神吸住了。一派是以布蘭德勒等人為首的持謹慎態度的德國共產黨人，另一派是以馬斯洛夫和羅斯·費雪爾為首，他們得到共產國際內「監護人」的支持並堅持左傾路線的德國共產黨人。現在卻在斯大林的恩賜下由季諾維也夫出來調停，要在「立即發動革命」的擁護者以及「把革命無限期的拖下去」的擁護者之間達成一項折中式的解決辦法。顯而易見，這種解決辦法決非可靠，也可以說根本不是解決辦法，說得更正確一點，這是一個遮眼法，一個騙人的解決辦法。事實上，當他們剛要把這個辦法付之實施時，就招來了事業的慘敗，他們曾自以為這事業在「較近的期限內」定能出色地完成，因此，他們也就「證實了」拖延戰術的必然結果。

在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市，德國共產黨人於 1923 年 10 月 12 日，同他們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弟兄們」採取一致行動，合法創建地區性政府、號稱「保護無產階級」政權。顯而易見，其目的是利用已經奪得的薩克森州，作為橋樑去贏得全德國無產階級支持革命事業、使他能實現這一重大任務。但是，由於他們在活動中，錯誤地估計了左派社會民主黨兄弟的決定性作用，因而力圖避免明確地制訂出整個行動計劃的日程

表，他們認為只有出其不意地倉促行動，才可能制服階級敵人。這樣，資產階級便利用了德累斯頓掌權的左派聯合政府內部、以及德共內部的一片混亂，於 1923 年 10 月 20 日突然派遣帝國軍隊，重新在薩克森恢復了帝國的統治權。除了漢堡的無產階級在 1923 年 10 月 23 至 24 日共四十八小時內還能保持陣地外，德國其他各地的無產階級全都沒有起來反抗軍事政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德國共產黨最終放棄了號召他們舉行起義，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戰鬥就屈膝投降了。彷彿是一夜之間這熊熊的革命烈火便突然消失了，本來像這樣熊熊的革命烈火所能作出的貢獻，至少應像 1917 年在俄羅斯歷史舞台上所出現的那樣，要改變全人類的面貌。但是革命慘敗了，此後在歐洲上空遊蕩的已不再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而代之以法西斯主義的幽靈了。

1923 年，大約從 9 月中旬直到 10 月最後幾天這段時期裏，在整個莫斯科，人們所議論的只有德國革命即將勝利的話題。在整個蘇維埃國家內，從南到北所激發起來的，而且滲透到工人階級、共產黨、青年團以及廣大群眾的心裏去的，確信革命勝利的熱情是無比巨大的。事實上，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人們懷着滿腔希望，想要看到十月革命的火焰，最終能蔓延到歐洲舊大陸；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人們正期待着在歐洲的心臟地區爆出拯救人類的革命運動。

在我們的周圍，到處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集會，有的在室內舉行，有的在露天召開，特別是在戲院、學校以及馬戲場裏，這樣的集會就更多了。演說者，彷彿受到了「天使報喜」的啟示，發表了令人極度興奮的關於德國大革命必將勝利的預言。他們深信，革命正在向前推進中，再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它的前進。他們誇張說，今天最先進的國家莫過於德國，她有強大工業，有三千萬早已組織起來的工人大眾，德國共產黨是堅強果敢的黨、充滿活力的黨。德國第一號共產黨人布蘭德勒在莫斯科竟然被捧上到了天上去，誰也沒有懷疑過他將來是、而現在早已是

德國的列寧了。甚至共產國際派駐德國的特使拉狄克和皮達柯夫，成了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歐洲的特別使節了。大批的蘇維埃青年以及居住在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人，在這股預先掀起的熱浪衝擊下，急不可耐地要動身前往柏林、漢堡或德累斯頓，他們都希望能在追求和推進世界革命的洪流中，作出自己的貢獻。當時，我本人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於是，東方大學便應運而生地開設了加速德語學習的基礎課。學習取得了成就，我本人也是勤奮學習德語的。

遺憾的是，不消幾天時間，即在 1923 年 11 月初，革命的狂熱降到零度，我們不得不在事實面前低頭：德國革命失敗了。然而，我們始終不理解為甚麼革命落得如此慘敗。一則我們不知道列寧的病情急劇地惡化了，二則當時我們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內部，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衝突更加尖銳了，三則絲毫沒有猜想到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內已經起着獨攬大權的作用。原來在德國革命問題上，我們是受到自吹自擂、厚顏無恥的樂觀主義的迷惑而步入歧途的。

但當時，讓我們迷失方向的各大報紙上，誰也沒有向我們提供有關德國無產階級全面崩潰的理由說明。儘管如此，我們從種種跡象中，能清楚地察覺到的是，俄國的工人階級因世界革命遭到新的挫折，而深受創傷，他們今天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感受到孤立，更加士氣消沉。在蘇聯，一種政治真空的局面形成了：這種政治真空，被斯大林利用來提出他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天才戰略」，並強加於人，與此同時，他還在俄共黨內，向左派反對派發動了第一次正面進攻。

1923 年 9 月初，蔣介石負有半官方使命，在共產黨員沈玄廬和張太雷的陪同下抵達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大約逗留三個月，以孫中山私人代表的身份，商談蘇聯給國民黨提供援助的方式問題。對於蔣介石這個一直默默無聞的人來說，這次使命是他在政治生涯中青雲直上的

起點。而對於國民黨來說，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轉折的開端，由於這一關鍵性的轉折，使國民黨實際上走向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合作的道路。

馬林曾向孫中山提出，在反帝的基礎上，要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結成親密聯盟的必要性，但 1921 年，當馬林在中國同他進行第一次商談的時候，孫中山的態度是相當遲疑不決的。實際上，在此時期內，孫中山自以為仍能使黨局限於這樣一種局面，即在南方軍閥微妙而又均衡的聯盟支持下，策劃一次反對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但在 1922 年，當他再度會見馬林時，想不到又一次地被他昨日的盟友、南方軍閥陳炯明趕出了廣州；這才使他轉向俄國，為的是能得到巨大的物質援助。如果沒有俄國的物質援助，他就休想重新奪回廣東省的政權，更不用說全中國的政權了。然而此時孫中山並沒有表明有任何誠意同俄國共產黨，更不必說同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治上的合作，因為使他不安的是害怕看到蘇維埃主義和布林什維主義這種「疫病」會在中國大地上蔓延開來。

後來由於他感到來自莫斯科的援助，只有益處，而無任何別的麻煩時，這才使他最後下了決心，向他的「紅色」談判對手提出兩點要求：第一，國共合作只能絕對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上，即共產黨員是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第二，蘇共必須承諾，不向中國輸出蘇維埃——布林什維主義革命。1922 年夏天，馬林代表共產國際滿足了上述兩個要求中的第一個。則在 1923 年 1 月間，越飛——孫文會談結束後，越飛代表蘇聯政府滿足了第二個要求，這正是在孫中山重新成為廣州政權的統治者之前。隨後，在漫長的一箇月中，有關實施國民黨與蘇聯以及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方針路線，進行了多次商談。1923 年 8 月，馬林再次去廣州會見孫中山；當時代表馬林的蘇聯駐北京大使加拉罕交給孫中山一份文件，文件申明：蘇維埃政府現已決定提供早已同意的物質援助，旨

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⁸⁰。孫中山立即決定派遣他的親信蔣介石前往莫斯科。

從下列這個事實，即同意派遣沈玄廬和張太雷作為蔣介石的同行夥伴，便可證明孫中山毫無疑問地是一位精明能幹的領導人。事實上，張太雷不僅是一位非常傑出的翻譯員，而且他還是莫斯科的親近者，取得蘇聯政府參加談判者的信任。至於沈玄廬，實質上他是同樣能使俄羅斯人放心的人，長期以來，他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中的知名人士，1920年5月初，他已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之一。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張太雷和沈玄廬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一般的角色，而蔣介石始終是，特別在起決定性的時刻，他是唯一的談判者。

儘管蔣介石只是負有半官方式使命抵達莫斯科，但他畢竟是偉大友邦的代表，他受到了相應隆重、殷勤的接待，俄共中央委員會秘書格羅斯塔克專門受斯大林之託來照顧他，可以說在各方面是聽他安排的。他多次會見了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他得到允許能同蘇聯更高級領導人會談，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

80 袁世凱垮台之後不久，孫中山便回到中國來。他毫不遲疑地利用兩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即華南和西南的小軍閥，反對中國其他地方的大軍閥，以達到他控制廣東省的目的，並在廣東省成立政府，對抗北京政府，準備發動北伐戰爭，北伐的最終目的旨在使他成為全中國的唯一統治者。懷有這樣的願望，他第一次策劃的嘗試並不是順利的。1917年7月間，他所依靠的華南和西南小軍閥反而將他逐出了廣東，直到1918年5月底。1920年10月間他認為有可能再次進行1917-1918年並沒有取得成功的嘗試。他急忙同剛回到廣州的陳炯明聯合起來。1920年11月間，他又重新奪回廣東省會廣州；並力圖團結1913年當選的那些殘留國會議員，1921年5月間，他在廣州創建成了合法的表面上看來無懈可擊的國民政府，隨後，陳炯明則幫助他「解放」了廣西。此任務完成之後，他立即宣佈廣西最重要的城市桂林為北伐大本營。此時，孫中山自以為力量相當強大了。這就是他不接受馬林以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名義第一次提出的合作建議，並斷定這是沒有甚麼益處的理由所在。1922年6月中旬，陳炯明突然間無恥地背叛了。這是又一次使他處於別無選擇的境地，不得不避難在上海的住宅。1922年8月間，當他到達上海時，完全陷入了心煩意亂的苦惱中。正在此時，馬林和李大釗便立即準備在上海再度拜訪孫中山，唯有此刻，他才細心傾聽他們兩人早已向他提出的建議。然而，當決定打出跟蘇聯結盟這張牌時，孫中山已經暗地裏積極進行給陳炯明一次出其不意的報復行動，為了達到目的，他又向華南和西南小軍閥們試探情況，實際上此時的小軍閥們對陳炯明更加痛恨。就這樣，孫中山終於在1923年2月中旬，第三次（是最後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定都廣州。

蔣介石是受孫中山之託，此行目的究竟何在呢？在1917-1922這幾年內，孫中山正處於極端困難和不幸時期，他深知只要國民黨沒有優良武器的裝備，就不可能使廣東成為真正可靠的革命根據地，因此，蔣介石的莫斯科之行，是為了從蘇聯得到武器和經費的供應；幫助他創辦一所軍校，培養一批忠誠、精幹的軍官；為他派遣一些軍事教官和專家，協助他改組軍隊和整頓指揮機關。蘇維埃政府同意他的這三項要求，並且十分慷慨地滿足了國民黨領導人的願望。

然而，這三項要求中的第二項，即創辦軍校所引起的困難，是第一、第三項要求所不可能引起的。實際上，蘇維埃政府堅持的是培訓國民黨軍官的校址要設在伊爾庫茨克。當時羅亦農和我是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上，是了解蔣介石及其處境的、當蔣介石與我們兩人交談過程中，他力圖勸我們在他此行活動中，要發揮積極作用，但不久之後，不論是中方或蘇方都體會到，這裏所涉及到的方案，是不現實的。不言而喻，誰都沒有認真地考慮過要把大批中國青年，秘密地、定期地通過張作霖所控制的滿洲運送出去，這是不可能的。當時，蔣介石聲明說，關於這個問題，只能在他回國後徵求孫中山的意見才可以決定，因此也就成為懸案了。後來，這問題終於解決了，決定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國民黨部隊的軍事學校，即黃埔軍校。

蔣介石、張太雷和沈玄廬，已由蘇聯政府安頓在前德國駐俄大使館的所在地，同時王雲功也是住在那裏的，張太雷是一個身材堅實而且富有熱情的人，他並不像人們所說的是一個美男子，但確是討人歡喜的，儘管他出生在常州，但能說一口流利而又標準的普通話。他曾在天津南開大學讀過書。此外，他又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由於他富有才智和幽默感，他總是忍不住要開些玩笑，而這些玩笑的矛頭所指，常常使一些人局促不安。但實際上，張太雷是一位難得的、忠誠可靠的朋友。

沈玄廬身材高大，自我感覺良好，洋洋自得。不論在公開場合，或在私人談話中，他說話聲音宏亮，步履、神態，即使談不上英雄氣概，至少可以說具有軍人風度。有趣的是，他的臉部下巴總是往前傾的。他儀表非凡，也許是他的天性吧，總是表現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情。他一直在學習托洛茨基的樣子，衣着打扮像托洛茨基，穿的長統皮靴也很像托洛茨基的，不論甚麼地方，他的動作像託洛茨基那樣有勁、激動、果斷。雖然這種外表令人可笑，但他卻有一顆正直的心。總之，我對他很有好感。有一次在我們兩人之間彼此談心時，他沒有向我隱瞞他的想法，他確實不能理解，為甚麼中國共產黨要強迫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或重新參加國民黨。

如同我以前指出過的，越飛那時已經病得很厲害了，可還是住在前德國駐俄使館內。我時常去那裏探望他們，有時是我隻身前往，有時與羅亦農結伴而行。實際上，蔣介石經常希望來看我，但就我本人的願望來說，最高興的事是去跟張太雷、沈玄廬和王雲功相互交談。他們三人同住一間房子，而蔣介石單獨住一間房子。

不久後，我就發現：一同住在前德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所在地的蔣介石與我們三位共產黨員同志之間，絲毫沒有取得相互諒解，當我前去看望他們時，我的三位同志從不忘對蔣介石的抱怨，而且指責蔣的行為品德，玄廬和雲功在這種場合，說話時更是怒氣沖天，咄咄逼人。譬如玄廬，他充滿輕蔑的神情對我說：「呸！孫中山怎麼會有這種想法，竟把完成我們的使命的工作交給這個膿包來處理！」雲功當然不會忘記，1900年初他是日本東京聲名顯赫的陸軍軍官學校的一名學生，享有盛名的蔡松坡是他的同學，而那時的蔣介石，在稍晚的時候才來到日本學習軍事技術，只不過被錄取在最低級的軍事學校。他不斷地在我面前聲稱，他那「親愛的同志」蔣介石，根本不懂甚麼軍事。

我本人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在性質上稍有點特殊。在我與他交談

的過程中，在他那方面總是很少說話，即令說起來也是十分簡短的，事實上，他卻不停地、接二連三地向我提出一連串有關蘇聯、蘇聯經濟、蘇聯黨和國家的組織以及蘇維埃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切。這在我看來，沒有一樣不是重要的。他的使命是帶有極端機密的性質的，他不能隨心所欲地把機密的事在莫斯科流傳。至於他在同蘇聯負責人談話時，如果要探聽今天蘇聯的情況，不言而喻，這對他是有損無益的。顯然他是受孫中山之委託，為了不時之需，就要盡可能多地收集到有關這個國家的最大限度的情報資料。因此，有必要利用我為他打開這一扇視窗。儘管他已有三十多歲了，但看上去還相當年輕，也不乏風度。在我看來，蔣介石還頗能沉着鎮定、深思熟慮，這種氣質顯然並非職業軍人的特色。他還裝出一副十分謙虛的外表，他那如此貪婪地想要學習當時最大膽的創造之舉，顯然表明他已感受到文化不足的苦楚。俄國革命，俄國奪得革命的勝利，似乎都使他激情滿懷，狂喜不已。與此同時，我倒十分自然地任其設下這一喜劇性的圈套。說到底，這個在政權尚未到手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也許多少會有點革命願望吧！?

一日，天氣晴朗。我深為詫異地看見蔣介石突然來到東方大學。當他向我致意並說他有強烈的願望要來東方大學參觀時，我未免有點尷尬。當時，我不得不陪同他參觀。當我們走過一個教室又一個教室時，他就向我問起學習課程的內容。我向他解釋說，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必修的課程之一，他突然高聲嚷起來：「啊！我多麼想跟着學一學這門課程，當一名旁聽生行嗎？」當時我別無其他辦法，只好提醒他，儘管我們的課程都是公共課，但要出席聽課，無疑是有諸多不便的。當然，他贊同我的意見。然而，他彷彿是大失所望。另有一次，他有意要討好羅亦農和我兩人，向我們兩人建議說，他樂意做我們參加國民黨的介紹人。那時，我們既不能乾脆地對他說「不」，當然也不能說「是」，我們只能限於如下的答覆：「待到我們回到中國後，那時再說不遲。」

1923年10月底或11月初，蔣介石一定要為我及我的幾位同志，舉行一次小型的友好晚會，他如此信任我，讓我挑選到會的客人，無非是要把更大的決定力量能繼續保持在他的莫斯科使命的周圍。我請來出席晚會的人中除羅亦農和王雲功外，還有陳延年和趙世炎，他們兩人以前並未見到過蔣介石。連同張太雷、沈玄廬、蔣介石本人、我以及新近剛從法國到達莫斯科的孫中山的副官邵元沖（Shao Yuanchong）總數一共九人。

席間，出於禮貌，我要求我們的主人，簡要地向我們介紹國民黨、國民黨的演變以及直到現在為止的同盟會時期的歷史。當然，他不能、也沒有借此炫耀光榮史，但不能迴避不談。由於事出意外，使他措手不及，這表明他所能賞賜給我們的，除了語無倫次、雜亂無章的醜態之外，便沒有其他東西了。後來，我們還驚奇地發現，他對自己黨的歷史認識，簡直比我們還差得遠哩！待到這最尷尬的時刻過去了，晚會的氣氛才寬鬆下來。而我們也就隨心所欲一點了。沈玄廬此時心花怒放，為大家表演了舞劍節目，他劍步輕快靈活，舞姿優美文雅，博得大家一致的讚賞聲。沈玄廬精通這種藝技是在為參加清朝官場考試作準備的那個時期，是為了考得清朝舉人的官銜，更正確地說來是武舉人的官銜，用現代語言來說，是一種「軍事學位」。這次晚會是唯一的一次晚會，在晚會進行中，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員之間，自始至終充滿着毫無保留的友好、誠摯的氣氛，這是我們從來未曾看到過的。當我們離開時，我向主人蔣介石說了幾句道謝的話。而蔣介石也向我們致簡短的答詞，但出人意外的是他在結束語中，竟高呼在我們聽來是如此熟悉的口號：「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蘇維埃萬歲！」。我認為，這是晚會最精彩的部份。

然而，在這次值得紀念的晚會上，受到如此款待的共產黨員的命運又將如何呢？陳延年和趙世炎，於1927年夏天在上海，因受到蔣介石創

子手們的照顧，先後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張太雷，於 1927 年 12 月當廣州公社事件發生時，由於國民黨幹下的罪行，成了屠殺共產黨人的犧牲品。羅亦農，於 1928 年春天，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在上海被槍殺了。沈玄廬，於 1924 年底已完全離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屬於他個人的感情問題而引起的（他不能原諒瞿秋白奪走了他的兒媳婦）。後來他確實參加了國民黨的右翼，而蔣介石卻不放棄對他的報復：1925 年底或 1926 年初，當著名的西山會議派召開會議不久，便將他殺害了。我本人，從 30 年代初起在蔣介石的監獄裏度過了漫長的五年。至於王雲功，我不知道他在 1927 年春天參加上海暴動後的命運如何，但我猜想，國民黨賞賜給他的命運，也必是凶多吉少的。

當蔣介石還留在莫斯科時，一個名叫鮑羅廷的人到達廣州了，他奉命給蔣介石說了不少捧場的話。鮑羅廷是斯大林的心腹，他將扮演甚麼角色呢？在孫中山眼裏，他是蘇聯和共產國際授予全權的軍需裝備代表，是武器和金錢的主要分配者，這些武器和金錢是蘇聯政府同意贈給重新成為廣東主人的民族主義者，他還是所有蘇維埃專家和中國共產黨人組成的合唱團的總指揮，他要求他們承擔起一項重大責任：振興國民黨的事業，改造國民黨的政治——軍事機構。無怪孫中山興高采烈地歡迎他，立刻把他帶到了廣州，習慣地尊稱他為鮑顧問，而且還把他捧為「天才的戰略家」，所有這一切都不足為奇了。事實上，鮑羅廷幹勁十足地為國民黨辦了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促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以嶄新面貌在中國大地上呈現：第一件大事，於 1924 年底召開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第二件大事，於 1924 年 5 月間創辦黃埔軍校。

蔣介石從莫斯科回國之後，便參與了這兩件大事，這是出於孫中山和鮑羅廷的共同關心，此時孫中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信任蔣，而鮑羅廷很快地對他作出了高度的評價。特別是不久之後蔣介石成了受益最大的得利者，因為已經決定在最短時間內，便可任命他為黃埔軍校的校長。

一旦他成了國民黨軍官培訓學校的首腦，實際上便抓住了可以用作跳板的最大權力機構，通過這一跳板，以便實現他那夢寐以求的一直跳到權力之巔的野心。

第一章

列寧逝世，鬼蜮登台，
我回中國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彼此意見分歧達到如此程度，他們歷來是很難相互容忍的。畢竟多年來，托洛茨基有時明確地，有時含蓄地但卻都是旗幟鮮明地同時揭露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和警察手段的傾向。斯大林則先是利用了列寧 1922 年 4 月任命他為布爾什維克黨總書記，然後利用同一個列寧，由於成為第一次發病的犧牲品，他只得按照醫生的特意要求，從 1922 年 5 月起的四個月期限內，因病情惡化不得處理公務。斯大林正是利用這個時機，全速地加強控制各蘇維埃國家範圍內的權力機構，包括國家機器在內，到了 1922 年夏天，斯大林甚至走得更遠了，走上了從未有過的鎮壓格魯吉亞人的罪惡道路，他為了自身的利益，竟把憲法上毫不含糊規定的授予人民自己的權利的原則，也當做兒戲來耍弄了。當時，托洛茨基在政治局裏激動萬分地挺身而出反對斯大林，譴責他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並指出他在政權機關內除了引起紊亂之外，決不會做出任何別的好事來。1922 年 10 月，當列寧恢復辦公時，他最終發現由斯大林造成的禍害程度十分嚴重。他對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爭論作出的判斷，不是有利於斯大林，而是同以往作出的一樣，百分之百或者幾乎百分之百地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他還請求托洛茨基與他在政治局裏結成集團、去反對斯大林及其結盟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換言之，即反對三駕馬車。

但不幸的是，他此時從何着手把這計劃付之行動呢？他的病情又一次發作了，而這次病情如此嚴重，他自知生命的延續已經指日可數了，必須抓緊時間去處理繼承問題。1922 年 12 月底，他已擬好了大家習慣地稱為《遺囑》的主要內容。在這份叫做《遺囑》的文獻中，他向隨身人員所講授的最迫切要求之一，並非別的，正是要把斯大林從黨的總書記職位上調開去。最後，到了 1923 年 3 月間，正當他被第三次發病壓垮之前，也就是在絕對地被剝奪發言權之前，他已給托洛茨基發出指示，口氣十分堅定而迫切，要托洛茨基在 1923 年 4 月召開的黨的十二次代表

大會上，毫不妥協地維護他們兩人共同達成的一致立場。

此時，三頭執政者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最最害怕的，就是獨怕由托洛茨基接過列寧的繼承權。如果讓他們作出選擇，毫無疑問，三駕馬車就要從 1923 年初開始陰謀發動一場規模巨大的誹謗運動，去反對托洛茨基，以便在黨內孤立他。但他們所能做的，莫過於捏造一套假話，說他們的觀點，已同列寧的觀點，在兩個主要問題上重新走到一起了。又說他們已認識到列寧對此問題是非常重視的，一個是民族政策問題，另一個是經濟管理問題。這樣一來，列寧與他們之間便達成了以下的協定：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期間，我們將宣佈以緩和方式來調整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所執行的路線，並在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建成有計劃的集中制，這都已經完全一致了。此外，對列寧的《遺囑》的全文以及列寧所寫的其他最後文件的內容保持緘默，也完全取得了一致。實際上，在所有這些文件中，列寧強烈地譴責了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呢，為了挽救黨的團結，並出於純樸真誠的書生氣，竟然責無旁貸地與他們達成協議，相信了這場騙局。

當斯大林繞過暗礁，即繞過了很有可能，甚至必定會摧毀他的事業前途的暗礁之後，迫不及待要辦的事，就是重新揮動他那惡毒的撒手鐮，把一切黨與國家幹部中，所有同情於他的對手托洛茨基的可疑分子，有系統地清洗出去，並且同樣有系統地用他自己的親信、那些馴服的奴才來取代他們。當他這樣做時，顯然可以看到，在黨內已經是一片怨聲載道。另一方面，由於他已經暴露出無能實行由托洛茨基和列寧所提出的任何一種措施來整頓經濟秩序，因而就在 1923 年夏天間，人們已經看到了經濟秩序的加速惡化，並在全國範圍內嚴重地激化了社會的緊張關係。

當三駕馬車意識到黨內外不滿情緒的不斷累積，很可能在極短期內會被托洛茨基所利用的危險，他們便決定先發制人，毫不遲疑地以不計後果的手法，把工人階級以及農民的憤怒情緒轉移到托洛茨基身上，把

他變成替罪羊。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也同樣意識到，三駕馬車已經把他作為攻擊的重要目標，也被迫作出反應。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布爾什維克黨中央，他在信中向三駕馬車發動反擊，並且特別鄭重地指出，三駕馬車主宰着的蘇維埃政權官僚主義化的進程，已達到令人可怕的程度，而這又決定了經濟生活的瓦解程度，他要求黨應回到尊重工人民主的最基本標準的道路上來。八天以後，那些無可非議的、擲地有聲的老布爾什維克（其中包括穆拉洛夫、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斯米爾諾夫、皮達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在一封致中央委員會的聲明中，響應了托洛茨基的號召，並重新確認任何人都有在黨內組織派別的權利，要求盡快召開一次黨的臨時會議，克服當前危機。毫無疑問，三駕馬車終於成功地在中央委員會內獲得多數，投票反對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聲明，並譴責分裂活動。但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大多數工人支部中以及紅軍內部卻掀起了一片抗議聲，他們迫使中央，今後必須讓爭論擴大到全黨去，也就是讓爭論更公開地開展起來。

然而，我們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員，是否能理解這些事件，即是否能理解像我今後回憶起來的事件發生時的真實情況呢？不，那時我們甚麼也沒有理解。就我個人來說，需要經過好多年之後，才能重新認識。只有到了這樣的時刻，即1923年11月7日《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這是季諾維也夫為紀念十月革命六週年時撰寫的，我們才知道德國革命已經慘敗了，而布爾什維克黨則成為有嚴重分歧的爭論中心，分歧的嚴重性達到如此激烈程度，在黨內引起大規模的公開辯論已是無法避免了。

自從9月重新開學以來，我們確實已經注意到，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在莫斯科出現：越來越頻繁地任意調動企業或地區的支部書記，而這種頻繁調動只不過是憑黨中央組織局的一紙簡單決議。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我們東大的蘇聯同志，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黨幹部，時不時地表現出一種完全非同尋常的激動情緒。然而，我們對於這種反常現象並

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是因為受到在東大盛行的向來都是民主氣氛比較濃厚的影響，也是受到我們建立的小組具有民族——文化特殊性的限制。

1923年11月7日《真理報》上發表季諾維也夫的論文後，所引起的三駕馬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大辯論，此時在莫斯科幾乎是帶有爆炸性質的。實際上，反對派在莫斯科是受到壓倒多數的基層同志的熱烈歡迎。那時，三駕馬車驚慌萬狀，但為了自衛，他們不惜玩弄可恥的手法：他們在各級黨與政府機關中，把支持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聲明的領導人說成是「犯罪分子」，大批予以免職或降職，但又虛情假意地裝扮成是考慮到反對派分子的願望，實際上這是為了剷除異己，以便他們能冷酷無情地指定他們的人作為新方針的保護者。在迫使托洛茨基陷入絕境的道路上，三駕馬車已經走得很遠了，終於批准在1923年12月5日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全文，四十八小時以後，《真理報》公佈了決議，其目的只不過是要把夢想重建全黨團結一致的大辯論之門關上。

然而，托洛茨基決不容許自己，聽憑這樣一種行為圈套的擺佈，為了作出反駁，他從1923年12月8日起，給《真理報》送交一封致全黨的〈公開信〉，他在信中公開譴責黨的「老近衛軍」企圖抓住政權不放，扼制年輕戰士和幹部充份發揮他們的才能、他們的創造力，分裂和破壞工人階級，簡言之，這是仿照社會民主黨內領導集團的榜樣，聽憑布爾什維克黨沿着保守主義斜坡滑下去。儘管托洛茨基在寫作格調上，還是頗為小心克制的，但這封〈公開信〉卻成為具有神奇力量的一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磅炸彈。總之，〈公開信〉是一本小冊子，題為「新方針」，於1924年1月底出版，在長時期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當小冊子剛剛出現時，三駕馬車不能不做點事，以便擺脫這具有最大毀滅性的後果，顯而易見，他們要做的只能是聲嘶力竭地去反對托洛茨基，以便人們不再去聽信他，即使有些人將被托洛茨基重新激勵起革命熱情，但他們也會指出他所寫的一切，並不能以更激烈方式來保護他們的事業。因此，

三駕馬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公開大辯論，又重新更加起勁地恢復了。我認為，從 1923 年 12 月中旬到 1924 年 1 月初，大辯論達到最激烈的高峰。此外，我自己也有機會加以觀察，開始是以東方大學的俄共黨員的身份參加，後來是以莫斯科市一個組織的黨員身份參加（東方大學的黨組織就是隸屬於這個市組織的）。

1923 年 11 月 7 日以來，東方大學的中國同志以及我本人，對於這場公開大辯論，除了讀《真理報》外，幾乎是不理解的，這也就是說我們還離得很遠，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現在我認為，不論就我個人來說，或者東大中國同志們來說，對於大辯論是接近得多了。我甚至感受到已經參與其事，這是因為我和羅亦農都有機會，可以列席三次辯論大會，大會在蘇維埃國家的首都舉行。約有數百至數千幹部和積極分子參加。但遺憾的是，我仍未能比以前看得更清楚。

1923 年 12 月中旬，我出席第一次莫斯科幹部和積極分子大會。會場安排在馬戲團競技場內，會議是由政治局中的「多數」，亦即三駕馬車發起召開的。主要演說者是加米涅夫。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當他登上講台時，態度沉着、講話從容不迫，他講話的聲調，從不會因情緒激動而走樣，他是一位頗能深思熟慮的人。在我看來，他顯然是新方針、新路線的維護者，至少像中央委員會在 1923 年 12 月 5 日決議那樣來說明其特點。但他在其明白易懂的演詞中，並沒有專門用來批判四十六人聲明的內容。對他來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除開中央委員外，黨的幹部和戰士從來就沒有讀過全文，關於聲明書的作者揭露「黨中央」專橫地把黨機關的各級書記加以調動、撤換、降職、免職一事，他反而譴責說這是他們沉湎於蠱惑人心的煽動行為。果然，他以泰然自若的態度要使人確信、黨的各級書記從未停止過按規定進行選舉的。他這個斷言，看來不可能說服大多數聲明書的作者。甚至我本人對這一斷言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道不是僅僅幾天之後，我們便得知正是採用這種類似行

政命令的手法，撤換了我們東大俄共黨組織的書記嗎？但也正在這個時候，我沒有接到俄國同志通知卻在幾個星期後，莫斯科的若干行政區內，有關基層黨的常委職位的分配和再分配工作，除了那種協商式的滑稽喜劇外，甚麼也不再進行了，難道不是這樣嗎？然而，此時加米涅夫倒向托洛茨基發動挑釁了。他強烈地指責托洛茨基，說他力圖玩弄與布爾什維克傳統格格不入的觀念遊戲，挑動年輕黨員反對老近衛軍，故意提出黨內兩代人之間相互衝突的不成問題的問題。最後他明確地指出，這裏涉及到的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

但當加米涅夫結束演說時，便有幾位同志針對他的論點，指出他的矛盾，但批評的語調並不十分激烈。同樣地，加米涅夫也以有節制的、適度的方式反駁他們，不像往常那樣唇槍舌劍。此時，我像許多同志一樣，當會議宣佈散會，就感到我們親眼看到的只是兩個主要人物中一個人的獨白，而不是兩個主要人物的對話。其實質性問題任何時候都沒有接觸到。

第二次莫斯科幹部和積極分子大會召開時，我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可以說同第一次大會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就是說，大會容許政治局的「少數派」，換言之，即三駕馬車的反對者到會，為他們的觀點進行辯護。拉狄克是主要角色，與加米涅夫相反，他是一個情緒激動的人。他曾力圖控制他那憤慨激昂的情緒，但仍徒然無效。由於強烈感情的推動，他往往說話時就像連珠炮似的一陣陣噴射出來。他高度熱情地為托洛茨基的事業辯護，反對他的誹謗者。拉狄克指出，有人把托洛茨基描繪為挑動我們的年輕戰士去反對「老近衛軍」，這簡直是惡意中傷！他的唯一意圖，正在於提醒「老近衛軍」有必要對年輕一代先鋒隊，要體現出更多一些的關懷，為的是防止黨在短期內僵化。拉狄克繼續說道，有人特意斷言，托洛茨基歷來就是蔑視農民的，這簡直是彌天大謊！難道革命歷史本身，不是不容置疑地作出了證明嗎？自從1917年以來，列寧與

托洛茨基之間關於無產階級——農民聯盟問題不是完全達成一致意見了嗎？正像許多其他同志一樣，在歷史上曾經作為革命中心長期爭論的對象，豈不也是達成一致意見了嗎？篡改歷史事實是可恥的。隨後，為了專門論證，影響黨內實現民主的嚴重威脅時，拉狄克列舉了許多異常具體的實例，來表明這就是不可容許的官僚主義操縱作風在作怪。為了爭取支持他在這方面所說都是可信的，他援引了最近發表在《真理報》上、某個人頗有教益的文章，而這某個人決不可能被懷疑他屬於反對派：這個人便是布哈林。然而，當他發表演說時，越是富有激情，但當他要準備向三駕馬車的支持者作出答辯時，他提出的人的形象越會是客觀公正，因為他深知三駕馬車決不會忘記要對這個人大加鞭笞一番。

這第二次大會，如同第一次大會一樣，是在秩序井然中結束的，但第三次大會的情況便不是這樣了。第三次莫斯科大會是在1923年12月底，或1924年1月初舉行。通體說來，這第三次大會是有相當的限制性，因為參加大會的人只有五百到六百人，全部是莫斯科的幹部同志，相互對峙的兩個派別中，任何一派的第一流領袖都沒有參加。使我十分驚奇的是，大會一開始，氣氛就是異乎尋常的緊張。

三駕馬車的追隨者以及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聲明的支持者，往往在同一主題上都是互相對抗的。至於實質問題，不錯，他們都沒有新的內容。他們僅僅滿足於縱情地辯論，更確切地說，他們只滿足於把曾經發生過的事，加以複雜化，然後轉了一個圈子，滿足於把所有問題，不分輕重地一股腦兒提出來討論，從各方面重複他們的論點。然而，在我看來，三駕馬車的追隨者，在會上更加氣焰囂張，咄咄逼人。他們對托洛茨基的進攻、挑釁表明已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了。他們不滿足於把托洛茨基關於蘇聯經濟形勢的分析扣上一頂「惡作劇」的帽子，而且揚言，如果托洛茨基佔了上風，全體農民便會在他建立起來的政權下，遭到超剝削的苦難。三駕馬車的追隨者還把托洛茨基說成是貪婪地奪取政權的

魔鬼，他日思夜夢要打倒布爾什維克的「老近衛軍」，其目的是要使蘇維埃國家屈服於他的專制政權的枷鎖下。可以肯定，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聲明書的支持者，不用費多大力氣就可列舉大量頗為可靠的引文來證明，即可使斯大林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以及加米涅夫分子從來也不敢放肆到說出如此無恥的謊言來。但是，他們的對手根本不聽他們，而是提高嗓門，沸沸揚揚，就這樣，把會場的秩序惡化到頂點。

從那時起，會場的氣氛激化了。頃刻間，人們相互辱罵，相互毆鬥，桌椅板檯從四面八方飛來飛去。羅亦農和我參加的這次大會，已不再是甚麼辯論會，而是一場大規模的群鬥。在驚慌之餘，我們力圖使自己縮成一團，正當此時，主席台上的主席宣佈說，會議休會，要求大家最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去，但放肆的嘈雜聲和喧嘩聲混成一片，使我們幾乎聽不清他的聲音。

我們認真負責地參加了三次「討論會」後（關於討論的內容，我以後還會談到），羅亦農和我都深表慶幸，因為我們在三駕馬車反對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聲明簽名者的爭論中，已經學到了有關爭論實質、爭論背景等不少東西，而這些東西在我們簡單地閱讀《真理報》時是無法學到的。但當時我們也同樣處於困惑不解的情況下。當然，我們贊同托洛茨基關於當前蘇聯經濟危機所分析的基本要點，並且贊同他所採取的辦法來達到擺脫危機。我們尤其認為他以及四十六人聲明中所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應當起來反對黨內不執行共產主義式的工人民主，對此，他明白地表示，斯大林及其「一夥」，在得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正日益走向犯罪道路上去了。然而，我們對於諸如「老近衛軍」一詞的理解，還是很不透徹的，這是因為我們歷來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資深領導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都懷有高度欽佩和無限崇敬的，我們絲毫未加懷疑，以他們為代表的這個小集團，不論在政治上、道德上，竟然會蜕化到如此不可救藥的地步。因此，當托洛茨基敢於貶低他們、粗暴

地批評他們時，這反而引起我們的反感，當時我們在感情上認為托洛茨基是在惡意中傷，至少，他以此為藉口在兩種人之間即十月革命的英雄建設者與那些可鄙的以考茨基一夥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分子之間、劃出一條性質相似的平行線。由於成了三駕馬車及其追隨者所操縱的、極端虛假狡詐的輿論宣傳的犧牲品，我們終於被說服了。對呀！托洛茨基是錯誤的，他力圖在黨內撒播分裂種子，誘使「青年一代」去擺脫「老近衛軍一代」的桎梏。一句話，那時我們還沒有認識到應該怎麼辦。大家都處在感情的矛盾中。而我們中國同志更加如此。應當承認，我們對於斯大林這個人的所有一切，實際上是很不了解的。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狄克，還有其他蘇聯領導人，我敢說，我們是非常熟悉的。但斯大林此人呢？他究竟是誰呢？確切地說來，他為革命究竟做了甚麼呢？是個誰，一切都還是個謎……

為了要把問題看得更清楚，理所當然我必須要對布爾什維克黨內發生過的事，進行一次深入調查研究。但我不能也無權這樣做，我只能局限在向那些最沒有偏見的東大中國同志了解、在「大辯論」中兩派之間論點交鋒的詳細情況、這兩派人就是莫斯科的三駕馬車的支持者和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聲明書的支持者。在一次重要的討論中，我們小心謹慎地把問題提出來。然而，像這樣的歷史事實，怎麼不使我們感到憂心忡忡呢？此時，我們再也不能以高度樂觀主義態度看待前途。直到現在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蘇維埃天空是晴空萬里，一片蔚藍，可今天卻蒙上了層層陰影，朵朵烏雲，使我們看不清布爾什維克黨的遠大前程了。

1924年1月頭幾天，《真理報》上塞滿了來自全國各地自稱代表黨基層組織的決議、信件及動議，這些基層組織包括有支部、地方分部以及其他組織，他們毫不含糊地幾乎全體一致譴責托洛茨基等是對政治局「多數」的中傷、誹謗。1924年1月16日，黨的全國臨時代表大會終於在莫斯科召開。大會以壓倒多數名義，宣佈反對托洛茨基以及四十六

人簽名者，揚言他們犯了「反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與此同時，大會宣佈，從 1923 年 11 月初開始的公開大辯論到此結束。

這次，對三駕馬車來說，既是出乎意料之外，同時又大獲全勝，足以令人驚訝不已。但應該如何去解釋呢？有以下三個理由：（1）自 1923 年 10 月底以來，隨着一次外出打獵，托洛茨基得了瘧疾，在兩個月中，一直發高燒，接着幾個星期過去了，病情越來越嚴重，在大辯論的關鍵時刻，實際上他不可能再公開露面了。三駕馬車自然利用這意外有利條件創造出來的空隙期間、使他們大受裨益。（2）在瘋狂地飛轉起來，試圖把那些同情托洛茨基的可疑的負責幹部清洗出去，到了 1923 年秋初，車輪更加速運轉了，斯大林終於在 1923 年 12 月底，成功地把完全忠於他的官僚安插到黨機關的全部領導崗位上了。（3）只要反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簽名者的大辯論繼續進行下去，三駕馬車感到他們在黨內的地位是虛弱不堪的，誰也不知道這場大辯論的結果，他們是否會奪取勝利，這就是他們感受到處境不佳，怏怏不樂。但只要列寧還在世，他們還得容忍下去。反之，如果他們知道了，正如 1923 年底已經知道的那樣，而且是只有他們才知道列寧的死亡已經迫在眉睫了，那麼他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實上，難道他們不需要在列寧未死之前千方百計地結束來自對手的攻擊嗎？難道他們不需要在這位偉大的革命創始人去世之前，不惜任何代價重新奪得黨內的實際地位嗎？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在舉行葬禮的那天，取得了列寧的繼承權，難道說這不需要嗎？需要，是完全需要的……這就是他們為甚麼像野獸般地瘋狂、加強加速大清洗的理由之所在。

當我們還沒有從陷入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失敗的震恐氣氛中恢復過來時，人們便告訴我們，列寧已於 1924 年 1 月 21 日逝世了。這一不幸消息給我們，給所有的蘇聯人以及莫斯科的外國留學生，不管是否共產黨員，都帶來了無比震驚、巨大打擊。如果說，自從 1923 年初以來，人

們已經知道列寧患了病，但是誰也不會意料到，他所患的病竟然如此迅速地奪走了他的生命。在東大可以說幾乎沒有人不為這位偉人的逝世而哀悼、而痛哭，彷彿是悼念自己最親切的親友一樣。難道這是矯揉造作、賣弄感情嗎？不，決不，這才是全民族哀情的由衷流露。我們東大的中國同志，心情沉重、置身於宏偉而又肅穆的行列，在群山垂首，溪水低吟的默默然中，伴隨着列寧直送到他最後的安息地。這一天就是 1924 年 1 月 27 日。

托洛茨基沒有參加列寧的葬禮。他的病情使他的身體更加虛弱，1924 年 1 月 18 日，即在布爾什維克黨創始人逝世前三天，他已經前往高加索，準備在那裏休養幾個星期，那時的斯大林就更加如願以償地，以實現列寧的心願為幌子，發動募集新黨員，在短短的四個月中，有 20 萬「新黨員」招募進來了，其中大部份是工人，據說是按照可塑性程度加以選擇的。同志們談起來，都說是「以列寧名義徵募新黨員」。我自己看到了大批的，不知來自何處的不認識者，像自由出入磨房那樣的加入到東方大學的布爾什維克黨組織，不禁大為驚訝。這股空前的、大批機會主義分子和野心家的洪流，湧進黨內之後，顯而易見，斯大林便可以為所欲為地把黨內久經考驗的革命者淹沒掉了。1924 年 5 月 22 日，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夕，克魯普斯卡婭向在莫斯科召開的、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宣讀了《列寧遺囑》。但當時，斯大林得到季諾維也夫的熱情配合，終於獲得勝利。這一非同尋常的勝利，竟能使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提出保證，讓斯大林留在黨的總書記位置上，並因此得到他們的同意，不顧克魯普斯卡婭的抗議，最終把《列寧遺囑》埋藏起來，不予公開。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一共持續八天，在這八天內，代表們簡直像木偶般地接受三駕馬車的幕後操縱，他們熱情衝動，爭先恐後地對托洛茨基橫加誣衊和誹謗。但是所有這一切，我遲遲地只在好幾年以後才知道……

我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就近仔細看一看，在這場激烈而又可怖的戰鬥中的兩位主要人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呢？是的，機會終於來了。1924年春天，我們東大學生終於榮幸地可以看到這兩位主要人物了。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斯大林。

1924年2月底或3月初，在一次集會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願意向大家講話，他是在可容納五百至六百人的大廳裏發表演說的，我們出席這次大會，因為我們已經結束了有關民族問題的討論會。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一個平庸不顯眼的演說家。他好像一位不稱職的教授輕輕地在讀他的教本，他聲調沉濁而又支離破碎。從他口裏發出的語言，就好像是從穿孔機裏發出來的聲音。但時不時地，他又會噴出一種蛙叫聲，使我們聯想起這就是老了的癩蛤蟆的叫聲。他的演說實在太乏味，令人厭倦，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想睡了。突然間，我聽到背後的一位蘇聯人悄悄地說話了：「多麼傑出的人物啊！他從來沒有犯過任何錯誤。他幾乎很像列寧。啊！他不是托洛茨基！」此時，我未免大吃一驚！可我一點也記不起，是否在為慶祝十月革命週年紀念的大會上看到過他，最傑出、最有聲望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總是趁此機會登上主席台，並向群眾發表演說的。

大家一再證實，在我們東方大學大多數俄國同志中間，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強烈的同情。其中一位同志，是我的個人朋友，（理論研究小組的積極發起人，他發現帕維爾·米夫，在一段時間內也曾屬於這個小組，米夫就是斯大林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未來大亨。）他對我肯定地指出，實際上，黨內甚麼問題都不能解決了。對此他給我講了一件事，他說莫斯科斯維爾特洛夫大學大約一千五百學生中，壓倒多數的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支持托洛茨基了。我認為他說的是正確的。我從另一個消息來源也同樣證實：最近斯大林親自到這個大學，向學生們講解《保衛列寧主義》，希望能爭取他們站到自己方面來。

1924年3月21日，東方大學舉行盛大典禮，慶祝學校誕生三週年。托洛茨基是我們邀請到會的貴客。大會主持人在雷鳴般掌聲、歡呼聲中，以俄國人方式的熱情擁抱歡迎他。我們大多數負責人親切而又尊重地向他致敬。他在這裏對我們講了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他在如此眾多，但又有限制的聽眾面前說話。但他並不是在演說，而是採用交談的方式。他說話時相當隨便，無拘無束，用不着特別講究說話的措辭或構思。可以設想，他對我們講的，首先是最近在東方爆發起來的革命，然後談到我們必須解決的特殊問題，以便使革命更好地進行下去。他要我們把值得堅持的東大原有特點堅持下去，並強調未來幾年中我們必須充份發揮作用的重要性。托洛茨基說話的語調，既無矯揉造作，也無半點誇張，卻是熱情奔放，在掌聲雷動中，他結束了講話。幾個星期以來，人們在他的臉上潑了多少污泥濁水，但這幾個星期，卻絲毫擋不了我們俄國同志、非俄國同志始終對他的尊敬，對他的熱情。

托洛茨基沉默不語——令人難以理解

1924年6月，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接着便在莫斯科召開了。大會持續了一個月。中國共產黨由五人組成的強有力代表團參加大會，李大釗是代表團的領導者，其他四個成員是鐵路工人唐（Chiminot Tang）、劉清揚、張太雷和我本人。

6月，本是蘇聯首都和第三國際所在地的一個美好而又惹人喜歡的月份。我們的感覺十分良好。太陽照在身上暖洋洋地卻並無酷熱的感覺。天氣晴朗。但與此相反，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的這一時刻，政治氣氛，即使不說會令人窒息，卻早已是異常沉重了。當然，俄共黨內曾經爆發出來的激烈鬥爭，還遠遠沒有結束，儘管沒有引起公開爭論。我們中國黨的代表，不是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因此有關大會所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消息是很不靈通的。實際上，我們不知道那次大

會曾給三駕馬車提供機會，去向反對派，尤其是向托洛茨基發動新的進攻。不僅如此，那次代表大會同樣給三駕馬車敞開大門，使他們有可能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指控托洛茨基應負德國革命慘敗的主要責任，由此便可以一勞永逸地剝奪他的權利，使他再也不能發揮作為世界革命鼓舞者的作用了。

李大釗、鐵路工人唐、劉清揚和張太雷，只在 1924 年 6 月初才到莫斯科，也僅僅是在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代表團，包括我自己在內，將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因此，我不能作為觀察員，參加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如同大多數歐洲各國同志們所已經做到的那樣。對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將會出現甚麼重大事件，我們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我們沒有掌握住能解開其他各種問題的鑰匙。當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全體會議開始時，在我們看來，顯然是特有的紊亂，令人厭煩，彷彿是永無休止的，我們更加難以理解的是：大辯論的進程，因有關次要問題的討論而不斷地複雜化，又因保加利亞革命失敗這類問題的提出而深感棘手。要找到三駕馬車所設置的陰謀詭計的來龍去脈，這對我們來說，既是極端困難，又是很不全面的。

季諾維也夫向我們提出的是「德國問題」，這份報告的主要特點是冗長乏味，報告長達四個小時，我們越是聽下去，越覺得困惑不解。當然，季諾維也夫克制着、沒有去控訴托洛茨基；首先，這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仍然試圖推卸他自己在德國革命慘遭失敗中的那一份責任，然而，在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毫不躊躇地斷言：第一，1923 年 9 至 10 月間，在德國所發生的一切，決不是真正的革命；第二，那時由德國共產黨人造成的失敗，本質上應歸因於機會主義路線，前德國共產黨總書記海因里希·勃蘭德勒終於成為這條機會主義路線的典型代表人物了。但他表達的方式、是如此空洞抽象、冗長嚙嚙，而且含糊不清，他的話裏充塞着一大堆隱隱約約的影射，他所指控的人，我們從不了解，

由於我們不是內幕的知情者，我們手裏的「探照燈」起不了作用，甚麼東西都沒有看清。那時，我恰好坐在李大釗的身旁，他彎下身來，皺起眉頭對我說：「我甚麼也沒有弄清楚，他究竟指的是甚麼，簡直是一筆糊塗賬……」

代表當中對討論，或者更精確地說，對所發生的事件，滔滔不絕說個不停的是 R·費雪爾，她是德國共產黨的左傾領袖，A·馬斯洛夫的女伴。1923 年 9 月間，她是第一個要求把決議付之行動的人。他此時故意冷冷淡淡地略去有關莫斯科的遁詞，而是從接過季諾維也夫的話着手，一開始，便譴責勃蘭德勒在薩克森地區建立「無產階級聯合政府」、忽視武裝工人階級、因而導致德國共產黨完全迷失了方向。她還指責勃蘭德勒說，在他接到從莫斯科來的命令，即發動武裝起義之後，仍然頑固地縱容社會民主黨人。她越說越激動，怪不得人們諷刺她陶醉在自己的演說中了。看來，她那德國國會議員的經歷，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恰好就是這種特色。在柏林，眾所周知，她被人看做是德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上升的新星、因而獲得一個外號叫做「羅莎第二」。這是一個奉承拍馬的外號，是言過其實、自我吹噓的外號。但他留給我們的印象，留給中國同志和我自己印象，費雪爾僅僅是一個淺薄輕佻、愛好虛榮，而且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懂得充份賣弄她那相對年輕的條件（那時只不過三十出頭一點），賣弄她那演說才能，來達到她的目的。

與費雪爾不同，塔爾海默則是一個舉止莊重的人，他是漢堡的一個老工人，現在莫斯科已向他開了綠燈，他可以繼承勃蘭德勒成為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了。他承認，有許多客觀因素，使 1923 年秋天德國革命遭到了挫折。但他仍然宣佈說，勃蘭德勒在執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職務時，犯了嚴重的錯誤。因此，他的結論與費雪爾作出的結論是完全一樣的。然而，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這位被當眾侮辱的同志，這位被作為是德國革命失敗的唯一的負責者，這位唯一坐到被告席上的勃蘭德勒，卻沒

有出現在我們中間，不能為自己進行辯護，而大會提供給我們有關德國事件的說法，只有他們的唯一模式。實際上，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久，人們早就公開剝奪了勃蘭德勒的德共總書記的資格了。我們中國同志，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內幕真相，我們無法參加「討論」，而他們卻力圖在這次討論中要得出一種印象，即決心要使勃蘭德勒成為替罪羔羊的角色，人們對他提出的指控全部都是預先製造好的。可以說，我們是這次不公正對待勃蘭德勒同志的見證人。至於我自己，從來沒有機會見到過勃蘭德勒。但不少蘇聯同志肯定地告訴我，他是一位非常誠實的人，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產主義者。此外，我也確實發現令人氣憤的事，在整個會議廳裏，甚至包括歐洲各黨的代表團在內，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揭露、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宣佈的對勃蘭德勒的控訴是可恥的。

應該是到了結束「德國問題討論」的時候了。又是季諾維也夫本人出來負責主持。他反反覆覆地對我們說，去年秋天，德國並沒有出現革命，而只是革命的一個插曲，這樣也就談不上失敗，只不過是一次失利或挫折，這次失利或挫折首先應是勃蘭德勒負全部責任；接着，他用特有的誇張語調宣告說，真正的德國革命還在我們前頭，而且應在不遠的將來定會爆發的。

真是離奇的樂觀主義。但樂觀主義須得到強有力的理論分析的支持和論證的，一位早已馳名的經濟學家瓦爾加（這位經濟學家幾乎直到斯大林時代結束，一直是燦爛群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在他那材料豐富並有文獻作依據的報告中，對德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形勢，作出了預測。他的基本論點是，席卷資本主義的世界的經濟危機，遠遠沒有結束，德國資產階級的基礎始終是處在動搖中，在德國，即將到來的革命，其成功的客觀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了，更加集中到一起了。換句話說，瓦爾加已為季諾維也夫演說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思想的「上

層建築」，提供了似乎是堅實的、動搖不了的社會經濟的「基礎結構」。這麼一大堆標有數位的、頗富藝術吸引力的資料，以及用淵博學識加以支持的推理，能起到甚麼作用呢？顯然，這只能使我們中國同志以及我本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罷了，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我們自己的推斷，這些論據是多麼地站不住腳，這些論據都是用淺薄的理論和謊言編制起來，恰好把事物的真實性隱藏在謊言的背後。

正當共產國際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將要結束之前，按照規定，一場反托洛茨基的進攻出現了，我敢說這成了大會的高潮，使我們吃了一記悶棍，陷於手足無措的震驚中。顯然，這場反托洛茨基的進攻，是為了幾個星期前，早已小心佈置好了的劇情發展需要而發動的，這就又一次給了費雪爾出來表演的機會。她在重彈了三駕馬車及其一夥的老調之後，德國共產黨內這位狂妄放肆的所謂「上升的明星」，又出來指責托洛茨基是甚麼「孟什維克主義」是「完全失去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然而，她做得太過份了，因為她竟敢把「德國十月」慘遭失敗的責任，直接歸咎於托洛茨基。她責問道：難道勃蘭德勒不是歷來對托洛茨基懷有崇高的敬意嗎？難道勃蘭德勒不是與他保持最密切的關係嗎？難道不就是勃蘭德勒請求他來領導德國革命嗎？一句話，費雪爾千方百計希望把托洛茨基扔進所謂他的「同夥」勃蘭德勒所已經扔進去的垃圾堆裏。費雪爾講話的時間，拖得很久，他所使用的論據和詞彙，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一套，即在斯大林時代各個時期裏，每當事關消滅某反對派的時候便會盛行起來的那些論據和詞彙。但是，這還確是第一次，托洛茨基發現他自己已受到一個兄弟黨的代言人如此粗暴對待，也還是第一次。近來在俄共黨內已成為司空見慣的極其卑鄙的手法，卻流傳到第三國際中去而且被採用了。

這一現場情景，這個令人悲痛的不祥之兆，把我們中國同志以及我本人拋到了驚恐萬狀的深淵之中。我們中間最感到氣憤的是李大釗同志。

實際上，他對托洛茨基從沒有絲毫懷疑，他認為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在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具有同樣決定性作用，誰也沒有權利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同列寧的名字割裂開來。啊！真想不到竟然有人突然間把托洛茨基宣佈為，好像一個從來沒有停止過損害我們事業的最醜惡的壞人！

費雪爾試圖把公憤推向頂點，面對托洛茨基，顯露出一副特有的挑釁性面孔。她責令托洛茨基答覆她提出的所有問題。她還要求托洛茨基當着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面，立刻對他自己的「不正當行徑」作出解釋。費雪爾設下的圈套是十分清楚而又明確的，這就是誘使托洛茨基犯錯誤，以便在全世界共產黨人的眼裏，剝奪他一直保持着的顯赫威望，費雪爾就用這種辦法向托洛茨基提出挑釁。

然而，托洛茨基沉着鎮定，一直保持緘默。自從代表大會開始以來，他只在全體大會會議廳裏出現過幾次，大約三到四次，不會再多了，當然，每次當他到會時，便坐在講台上為他保留着的座位，如同所有其他主席台上的成員一樣，他穿着晶亮的本色白亞麻制服。但每次到會後，他從不開口，然後離開座位，悄悄地走了。所有的人都為他始終保持沉默而感到驚奇，而在通常情況下，他思想敏捷，對提出的問題都能侃侃而談，駁得對方啞口無言，我們還注意到，每當一位朋友給他提供機會去反駁以他為進攻目標的言論時，他都拒絕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他的對手正好憑此一點，全力以赴地掄起大棒力圖把他壓垮，難道此刻他已到了精疲力竭、不堪一擊的地步了嗎？不，不可能，我們也從來沒有這種想法。原來，只在很久以後，他才向大家表明，他保持沉默的唯一理由，是受到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紀律措施的約束，這就是說今後不可在黨外參加任何辯論，違者必處以極嚴厲的制裁，甚至開除出黨。費雪爾是完全知道所發生的事的。因此，可以肯定，這個靈魂醜惡的女人，像以往一樣，乘機來歪曲托洛茨基的形象。在費雪爾講話

期間，我對托洛茨基作了觀察，而且觀察得十分認真仔細。他始終無動於衷，他臉面上飄過一層愁雲，無限的哀傷，使他的目光變得憂鬱了。然而，坐在我身旁的李大釗，不斷地重複着：「為甚麼托洛茨基還不站起來，反駁這些攻擊呢？為甚麼還不為自己進行辯護呢？為甚麼？為甚麼不呢？」

當托洛茨基本人頑強地保持沉默時，他的朋友們又怎能代替他為他的事業作辯護呢？譬如，伯里斯·蘇瓦林，他是《人道報》的主編，我們的同志凡在法國有過實際生活經歷的人，對他都懷有極崇高的敬意，但他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然而人們卻在悄悄地議論起來，他不曾害怕把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新方針》譯成法文來為托洛茨基作辯護，而現在……

中國代表團所屬的委員會，顯然也是日本代表團、印度代表團、波斯代表團以及土耳其代表團等所屬的委員會，這就叫做東方委員會。委員會裏有一個印度人 M·N·魯易，是重要的組織推動人，他擔任芬蘭人 O·庫西寧的副手，這位庫西寧的過去歷史並不引人注目，最近卻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魯易在東方各國中可曾起過甚麼作用嗎？根本沒有做過甚麼重大的事，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出現過大規模革命運動。同樣，在討論問題時，他的話也擺脫不了平淡無奇。每當使委員會所有委員對東方形勢作了含糊不清的描述之後，魯易本人只滿足於發表一次演說，演說內容僅把注意力局限在印度資產階級的特點上。李大釗、張太雷和我編成一個三人小組，以便使我們的代表團能對東方國家委員會的工作，作出一些貢獻，我們提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方針完全缺乏獨創性的介紹。其他代表團幾乎沒有比我們做得更出色。他們先後提出是有關各自國家的報告，這些報告或者毫不連貫，或者支離破碎，或者含糊不清。可以說，所有這些報告都是形式主義的。當這重大的、但又缺乏活動內容的兩天會議結束之後，我們所有的人都不能不有此感覺：浪費時間。

至於我自己，在此同時，卻有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我在東方國家委員會裏工作時，有機會結識了一位日本朋友，他名叫佐野學（Sano Manabo）。他天性溫和，彬彬有禮，約有四十歲了。他與眾不同，不留日本式小鬍子，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後來成為日本共產黨的理論大師。我們唯一可用的外國語是德語，佐野學對德語還能略懂一些，但我不會說德語，連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我們彼此能夠溝通思想只有通過中文了，換句話說，用筆寫中文。然而大體上說來，這樣也就足夠使我們互相了解，而且了解得不錯。有一次人們要求佐野學在東方國家委員會上發言，他乾脆用日本漢字撰寫一篇簡短演說詞，然後把演說詞交給我，要我即席譯成俄語，代他在會上發言。

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工作結束之後，當選為或重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大多數同志，顯然都是俄國共產黨或西方國家各共產黨的領導人。但怎麼托洛茨基的名字不再列入他們之中呢？這又怎麼可能呢？我們對此不禁大為震驚。原來，我們還是太天真了，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完全是那些仍然活着的、聲名顯赫的世界革命領導人的蜕化變質，他們向我們宣佈的演說，只是極其卑鄙的德國共產黨內的小人物，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歐洲共產黨內既可笑而又極其惡毒的代言人發表出來攻擊托洛茨基的，而那時我們聽到的也正是這些演說。讓我們來看吧！托洛茨基的名字，對我們來說，難道不是一向與列寧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嗎？難道托洛茨基不是同列寧一樣，在1919年與1920年，對創辦我們的國際作出了貢獻嗎？難道不是托洛茨基為共產國際撰寫了大部份宣言、聲明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其他文獻嗎？難道不也是他，由於對歐洲國家富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直到今天還是在忙於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一道，特別是同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道，共同解決多數帶有派別傾向性的鬥爭問題，或者解決必須解決的人事爭吵問題嗎？難道去年9月勃蘭德勒所請求的不也是托洛茨基嗎？他請求共產國際急速派

他去領導德國革命，因為勃蘭德勒估計得很正確也很坦率，他認為唯有托洛茨基才是真正有能力去領導德國革命的人。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名單中把托洛茨基的名字排除在外，這在我們眼裏，是一件很不恰當的事，說得嚴格一點：那是一件反常的事。

好多年已經過去了，我們方才認識到：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原來是代表着共產國際史上劃分為兩個不同時期的真正分水嶺；也就是「一國社會主義」邏輯未取得勝利之前的時期與已經取得勝利之後的時期。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我們仍然有偉大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作為我們的鼓舞者。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只有季諾維也夫成為表面上的領導人，而斯大林則躲在幕後操縱。意味更深遠的是：這位斯大林，原本沒有在這次大會上佔一席之地，此刻他卻是第一次被選為擁有全權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取代了托洛茨基的位置。同樣，我們先前也沒有估計到，我們親身經歷過的這一重大時刻，原來就是：共產國際跌落到深淵去的開端。

回國

在沒有舉行會議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通常都留在呂克斯旅館內。我就在旅館裏利用這些時間，同代表們相互討論大會的所有議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還有機會結識了馬林（斯尼夫里特），他是作為荷蘭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來到莫斯科的。我經常去看望他，並在他的房間裏談心，在這種時候，往往我聽他談的要比我對他說的時間要長得多。由於他成了極不公平待遇的犧牲品，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咬住他的心，所以他說起話來，總是非常激動的。在我面前他毫無保留地抱怨那些人竟敢如此對待他。難道他不是最忠實的第一任莫斯科派往中國的密使嗎？難道不是他在全世界面前成功地與孫中山取得聯繫的嗎？難道不是他同國民黨舉行了如此巧妙、如此長期的談判，並終

於取得眾所周知的效果嗎？難道人們不應當考慮，在達成蘇聯、國民黨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聯盟的這一成就中他不是真正的關鍵人物嗎？但不幸的是，一旦事畢功成，莫斯科就急忙派遣以蘇聯和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身份的鮑羅廷到孫中山身旁了，這個鮑羅廷原是默默無聞的人。也正是這個鮑羅廷摘取了馬林的勞動果實。這果實啊！卻像是漫無邊際的航程，需要馬林在那艱苦的歲月中，隻身走遍全中國才得以完成的航程啊！這就是為甚麼今天的馬林成了個一無所有的人。

我的對話者馬林，感到如此受委曲、被羞辱，氣憤達到如此高度，他終於高聲喊出反對俄國共產黨，指責俄共已經陷入排外主義的泥坑中去了。「他們拒絕信任我的唯一理由，只因為我是第一批入黨的共產黨員，只因為我不是一個俄國人！」他寫這行字時，義憤填膺，痛楚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了。當他怒氣沖沖時，我幾乎無法插上一句話，無法轉移他的話題，即要他不談這無法忍受的不幸，而談別的甚麼，也無法使他心平氣和地與我討論我們關心的政治問題。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還是達到了目的，我提出一個他一直強調的問題，這就是動員中國農民問題。他便抓住這個問題作為他最首要的任務了。此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馬林便回荷蘭去了。他再也沒有重新踏上中國土地，而且也沒有到遠東其他國家去。

1920年底，在上海時，我與維金斯基並沒有接近，因為我們都是漁陽里六號不拘小節的小夥子，這完全是為了安全問題。此刻，當我知道了他要來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工作，我感到十分高興，立刻到呂克斯旅館去看望他。他以極親熱的表情接待了我，如同接待任何一位同志一樣。當我在同馬林談話時，經受了一場龍捲風式的強烈震動之後，此刻在維金斯基那豔陽天般的笑臉之前，我感受到多麼地輕鬆愉快啊！在他那裏，一切都是如此悠然自得，隨和可親。此外，他還謙遜有禮。總之，他的美德實在太多了，直到現在，有些淡忘而記不起來了，如同

能在代表大會上所觀察到的一樣。下面這件事，就證實了這是人間出於最自願的真情：維金斯基自動向我建議由他負責通過外交郵袋將我的所有書籍運往上海，這是我在上文中已經談到過的。

1924年6月，是可怕的、叫人難受的一個月，但在莫斯科，最使我感受到高興的是，我終於能同一個人進一步建立了友誼關係，這個人並非別人而是李大釗，號守常。他是中華民族的傑出人士，是極有影響的人物，他把守舊的一代扔到荒煙漫草中去，而把年輕的一代推上時代的浪潮，自從「五四」運動掀起滾滾巨浪以來，他便投身到歷史舞台的最前沿，他那純樸的態度，坦率的摯情，立刻打動了我的心，他所喚起的青年學生和大孩子，要遠遠超過高明的知識階層。

像大多數河北人一樣，他身材高大，舉止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他有一縷濃濃的鬍子，人稱李鬍子。在那茂密的眉毛下，一對眼睛閃耀着輕柔的亮光。他年紀多大？約摸三十五歲了。從這個人身上噴發出來的火樣的熱情，難以估算的寬宏大量。不論是弱者或強者，都會被他吸引進去。一旦他在某地出現，氣氛立即緩和下來。只要他親自到場，沉悶的空氣一掃而光，紛爭吵鬧也就平息下來了。但在他身上最使我感受到有最大魅力的是：理性主義哲學家與世上少有的抒情詩人融合於一體。有一天，我問他：「根據你在蘇維埃國家裏所看到的，甚麼事使你產生強烈的印象？」他朗朗地笑出聲來：「喔！讓我再想一想，對了，我想，那西伯利亞的林海，才是神乎其神的事，這林海伸延開去，一望無際，直到那天涯海角。」

誠然，在那幾天談話中，守常與我兩人之間，彼此無所不談，更經常的是，守常跟我談起那激動人心的往事，如1919年9月陳獨秀出獄，1920年底霍霍諾夫金到北京的使命等。所有這一切，我在上文已經談過了。一個難得的夜晚，用不着轉彎抹角，我直率地向守常提出，我們具有光榮歷史的出版界，高水準的文章現在越來越難得看到；那時，我不

無感慨地回憶起，在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那些論文，曾給我以及與我同一代許多其他青年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留下了幾乎不可磨滅的印記，而且也推動我下決心去獻身於革命事業，我毫不掩飾地問他；（下面是彼此對答的話）

——現在你為甚麼不像從前那樣寫得多了？

——哎呀！你得知道，今天我已沒有那麼多時間了，說起來話長，不是兩三句話說得清楚的。

——甚麼事情佔去了你這麼多時間，甚麼事情妨礙你不能有自己支配的時間，沒有一刻清靜的時間呢？

——唉！所有那些正直的人們，絡繹不絕地看望我。來的人是如此之多，形形色色，有所謂知識淵博的大文豪，也有自稱「進步分子」的軍人，有所謂「左傾」的政治家，當然也有名實相符的同志，更不必說還有年輕人和我的學生了。啊！真是五花八門，我的大部份時間都在接待來客，同他們交談中消失了，一去不復返了……

此外，守常每星期至少一次，要去同蘇聯駐北京大使加拉罕交談，並和加拉罕一道處理各種實際問題。他必須為北京大學備好課，上好課，同時還要忙於為我黨北方區委開展工作，任務如此繁重，委實使他精疲力竭。

當然，我對此深表同情，但經過片刻沉默之後，我情不自禁地以最審慎的語調對他說：「我完全理解你，如果拒不接受那些特意來訪的『正直者』你是有些困難的……但是你不相信嗎？利用你已付出的全部時間，難道不會有更好更值得的事可做嗎？難道你再也不希望重新開始認真思考，並寫出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有關問題的論文嗎？至於我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十分強烈地祝願你，能夠這樣去做。」守常受到了感動，但仍保持沉默，不露感情。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回答我說：「你說得有理由，我完全應當找到擺脫的辦法，改變這種局

面。」正當他沉思不語時，一個想法，而且是一個很可取的想法在我的腦子裏閃過，我便扼要地把我的想法對他談出來：「你為甚麼不可以在蘇聯再留一段時間呢？一月，兩月或者更久一些呢？這樣，你就有可能安心幹你的事，讀你願讀的書，你還可以在莫斯科找到值得你讀的英文書刊，何不試一試。」我的建議立即引起守常的注意。他同意可以考慮，並且很快便作出決定，延長在蘇聯的逗留時間。這一延長使他直到1925年初，才動身返回北京。

1924年初，當東方大學學年結束時，我已決定離開莫斯科，但在回國之前，先去歐洲逗留一年，我預先準備要在德國住一段較長時間。當時，我寫了一封信，寄給我在隆中鎮教書時的學生，這個學生姓鄭，早已參加共產黨，我要求他轉告住在湖南的我的好友，設法從經濟上幫助我完成這一重要旅行。未過多久，他的回信來了，說已經籌好一筆錢，共計七百元（確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他們並且希望我。盡可能久地留在歐洲，以便能夠真正得到最大收穫。

我在覆信中，一再感謝鄭為我幫了大忙，我還告訴他，最好是把這七百元寄到上海交給沈雁冰，他就是後來的作家茅盾，當時是我的同志，因為他知道採取甚麼辦法，能把錢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我的手裏。正當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工作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又收到鄭的一封短信，他告訴我七百元已寄到上海去了，這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此時，我感受到最迫切的事，莫過於到守常那裏去。但守常立即給我潑了一盆冷水，他向我解釋說：獨秀以及我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有這樣的願望，由於他們感受到領導人手實在太少，難以對付我黨目前所面臨的任務，他們希望我盡可能快地回到中國去，只要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經結束，我就要回國去。

當時，我只得不無遺憾地放棄了德國和法國之行，而且自我安慰說畢竟能投身到實際革命行動中去了。

大約在 1924 年 7 月 10 日，是我向莫斯科中國同志告別的時候了。在我以個人名義向他們告別之前，我以集體名義向他們告別。這時，旅莫中共小組由六十人至七十人組成，作為最後一次履行旅莫小組書記任務，我要求他們全體一致集中起來，討論我必須向他們提出的兩個報告。其中一個報告是關於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情況，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另一個報告有關我回國後必將面臨着的我黨的形勢問題。第一個的報告，實際上只不過是以彙報的形式向同志們提供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同志們對此雖感興趣，但看來他們認為沒有必要進行長時間的討論。第二個報告的效果恰好相反，同志們的情緒十分熱烈，只因為我以系統方式表達了同志們好幾個月以來的感受和想法。

我們旅居的莫斯科，與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大城市之間，相距有幾千公里，留在中國或者回國去的同志們，原則上都是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而作準備的。我們也很想了解我黨的最近發展情況，免得焦急不安。實際上，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經常地接到中國共產黨人出版的主要刊物，其中有《嚮導》、《新青年》、《前鋒》、《中國青年》等。與此同時，我們不但已發現的大部份文章中，既是思想混亂又有刺耳聲音而局促不安，而且還因下列事實而深感不快，這就是用我們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或毛澤東署名發表出來的文章，證明有一種傾向越來越明顯了，這傾向表明在對待階級敵人更加妥協的意圖上。所有這一切，我們自然是無法容忍的，在我們看來，這已經忽視了階級的界限了。更令我們氣憤的是：我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嚮導》週刊，在最近的 3 月份居然刊登周佛海的文章，周佛海以評論倫敦成立麥克唐納內閣為名，宣揚說，在工黨領導下，大不列顛無須通過革命正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根據同志們的談話，不論是從中國寄來的信件中所寫的，也不論是從上海、北京或廣州到達莫斯科的同志們的口頭所說，都證明問題是非常突出了；另一方面，無疑地、焦急不安的心情無限地增長起來；自從我黨第三次

代表大會舉行以來，在組織上同國民黨合作的路線取得了勝利，我黨壓倒多數的同志被國民黨名副其實地吸收進去了。正因此，他們在政治上、物質上都不可能以加倍努力來建設我們的黨，也不可能再次發動和擴大工人運動，而工人運動仍然是唯一能保持不斷地輸送大量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否則一切都會失去。如果說有甚麼人際此我黨處於極大可悲的情況下，向我提出了值得重視的意見，這意見既切實可靠又正確無誤的，這個人恰好就是李守常同志，自從6月初開始，我們以私人身份就此問題進行多次交談過，他就談出他的看法。

實際上，正是他早已向我指出，我黨中央領導幹部中，唯有陳獨秀和蔡和森最終沒有加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正是他，使我無意中認識到：這條在組織上與國民黨進行合作的路線，最初在1922年時，守常他自己正像陳獨秀一樣，表示憎惡的，但到1923年，他和陳獨秀一樣，又誠心誠意地回到這條路線上來。但這是甚麼路線呢？這條路線只能是：一旦起了作用，便會注定帶來惡果的路線，它終日所接納的，只是所謂「名聲顯赫的」平庸人物，而在北京能起作用的，只是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士，而不是共產主義領導人，這條路線一旦起了作用最終完全變為起消毒作用的工具罷了！難道這也不正是守常同志嗎？他不再為未能迅速地意識到，我黨現時正在其中掙扎着的嚴重困難的真實原因而感到驚異了，而是明白地告訴我，他同意我迅速返回上海，而不是動身前往柏林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應當以盡可能快的迅速，向我黨中央領導人把一直保存在我心中的那個原因說個清楚，如果我不去關心處理這件事，那又該是誰呢？

在告別會上，我明確地引用守常對我所說的話，並着重指出，他對我黨黨員人數停滯不前，黨的影響力下降，黨的活動微不足道，因而深深地感受到不安的同時，但他又是無法看到，在我們幹部人數極端缺乏情況下，即使奪回已經失去的陣地之後，又將如何向前推進呢？因此，

我力促東方大學的中國同志們竭盡所能地找到補救辦法，來克服我在回國前夜向他們提出的報告最後部份中所談的、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不足之處。當我的講話剛剛結束時，同志們便以充沛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作出保證，他們決定在最短期內全體一致地返回中國去，然後開始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他們聲明完全同意我所說的話，並作出決定，要我以動議形式寫進記錄，其內容如下：一旦我們回到中國時，便在黨內開展一次討論，討論的一個目標是、要結束已經深入到我黨領導層中的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傾向，討論的另一個目標是確定我黨的領導方針，使其重新奠定在一個正確的立場上，這立場要嚴格符合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分析形勢的要求上；我們決不同意加入國民黨，也決不同意以任何方式為國民黨工作；為了執行這獨一無二的任務，我們要獻出一切，使我們的黨成為一個條件齊備、堅定不移、充滿生機的黨，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重新開展工人運動。這一動議是在十分莊嚴氣氛下，全體一致通過的。但動議通過了，只不過是力圖把我們的黨、在政治上隸屬於國民黨的這一內容清除掉，但我們是不能公開提出的，因為隸屬於國民黨的路線是共產國際強加給我們，儘管我們內心深處是不能接受的。

由於感到讓我負責把我們小組，即莫斯科的中國同志的使命帶給上海的負責人還是不夠，他們終於選舉我為代表，參加我黨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這樣，我們每個人均無疑地相信，當黨領導看到我們眾多人數，我們的強大力量，要想置我們的意見於不顧，是相當困難的。

約在 1924 年 7 月 15 日前後，我起程回中國了，同行者有張太雷，鐵路工人唐和劉清揚。我們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再到伊爾庫次克，使我重新踏上三年前已經走過的，而方向相反的行程。如果同 1921 年秋天相比較，即使有甚麼變化，並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反正是橫貫西伯利亞大草原那麼一回事！起初，列車飛快地奔馳，隨處可以看到鐵軌、道岔、橋樑、隧道等，都已及時修復好了。往日，

那些被拆毀的車輛，常常撒落在與鐵路平行的斜坡以及荒地上，現在也都搬走了。在我們稍作停留的每一個城鎮裏，都有充裕的必需的食品，可供旅客們享用。在赤塔，當然我還可以作出較好的評價：儘管困難不少，而這些困難大約一年前是由於三駕馬車及其官僚們無能，在蘇維埃聯盟的大多數共和國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領域裏再度引起的。儘管如此，目前的經濟建設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邁進。在赤塔，我們第一次作了較長時間的停留，因此給我們提供了機會，可以在整整幾個小時內進行散步，甚至可以嘗到乳豬，喔！多鮮美啊！那時，我們正在等一輛列車，這列車必須把我們一直送到靠近中國東北的邊境線上，那裏一直是張作霖盤據着的地方。

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的邊境——滿洲里，我的旅伴和我彷彿被幽禁在同一車廂的疊鋪上，整整度過了八天。這八天，我們彼此緊靠在一起，共呼吸、共飲食、共睡眠，一起交談、一起讀書、一起望着窗外的田野和森林匆匆往後退去。這八天並非都是相安無事的，人們少不了還要談話，特別是鐵路工人唐與劉清揚之間不停地爭來辯去，而張太雷則要動足腦筋從中激化他們的情緒。

要劉清揚來到莫斯科，與李大釗、張太雷、鐵路工人唐以及我一道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這原是陳獨秀的意願，這裏有兩個理由，第一，陳獨秀估計在五四運動的光榮史上，劉清揚曾是披一身虹彩的人物，第二，陳獨秀認為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團，至少包含一位婦女同志是比較適宜的。但，這是不是一個好主意呢？我一點也看不出來。據我的看法，如果我們非得要選拔一位婦女代表的話，我們應該選拔的最好是某一位別的人，而不是劉清揚。1923年，當她和丈夫張崧年離開德國，回國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幾個星期，在此期間，我很快便了解到，她在柏林時對待學習並不那麼認真嚴肅，她的一般文化修養和政治水準都是很低的，她有強烈的虛榮心，念念不忘的是革命以後

的安樂生活。在那整整一個月裏，我與她共同作為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可以說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有接觸，使我對她有更多的了解。那時，我還發現她滔滔不絕地胡說八道，其唯一目的是誇耀自己，提高她的身價。

鐵路工人唐，是個北方人，性情有點粗暴，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勞工社會，隴海鐵路上的僱工和列車司爐中間度過的，他跟你談起話來真誠坦率，但他的生活習慣就不那麼文雅了，他絕對不能容忍劉清揚的作風。而劉清揚由於不得不同如此不文雅的人打交道而感受到氣憤，但又必須承認，他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都是非常簡單的人，她一經發現他受到了半點氣，又會苦惱起來，因此劉清揚就不斷地找他的碴兒相互爭吵。我們的列車車廂裏，從早到晚，動不動為了一點小事，就會引起他倆爭吵。當然，我力圖加以排解，也並非完全白費心機。至於張太雷同志，劉清揚對他並沒有比對鐵路工人唐有更多的好感。有時不顧我們的勸阻和責備，張太雷自制不住，總要送上幾句俏皮話，或者幾句諷刺話，逗得鐵路工人唐哈哈大笑，他的藉口說是為了排解他倆之間衝突。結果，好不容易達成的口角「休戰」，突然間又被衝破了，何等烏煙瘴氣！

赤塔已被拋在我們的身後，列車靠近邊界線了。下車以後，就在一個簡樸市鎮的候車室裏靜候。一輛馬車，一輛低級的手推車，很快把我們載走了。經過幾個小時顛簸不平山路的長途跋涉之後，我們進入了人煙稀少的東北境內。但此後，我們再也不必擔心，會引起張作霖邊界哨兵的極不正常的好奇心了。

我們到達了滿洲里，但路上沒有碰到任何一個人。我們的「步行之旅」終於結束了。找到一家可靠的小旅館，宿了一夜，第二天，我們便鑽進了一輛列車，這列車毋須中途耽擱，一直把我們帶到了北京。經過哈爾濱，然後到達天津，劉清揚便從這裏下車，而鐵路工人唐首先回到家裏，接着回到了他的工作崗位上，在沿隴海鐵路線上的工人同志中間

重新開始戰鬥。

以前，我從未去過北京。這次我終於能踏上北京，應該是十分高興了。但事情並非如此，事實上，經歷了長達十五天特殊艱苦旅程之後，我到達北京時已是疲乏不堪，甚至不想去看一看北京。可以說，我在北京停留時間，沒有超過七十二小時，所操心的是，要盡快地向上海我黨中央報到，並接受領導機關的分配。

1924年，我們在北京共有多少同志呢？至多一百人，包括青年團員在內，大部份都是知識分子：教授和學生，他們正由於全國工人運動（華北、華中、華南和華東）沒有更好地發動起來，而在1923年2月初，遭到吳佩孚以及其他軍閥的打擊。但當他們休假不在時，我怎麼有可能見到他們呢？

其中有幾位同志，顯然並沒有離開城市，在張太雷的幫助下，我同四位同志有了接觸，一位是何孟雄，他當時因李守常不在北京，擔任我黨北方區代理區委書記的職務，另一位是王政一（Wang Zhengyi），鐵路工人，他盡量做到確保工會的繼續存在，以便等待時機的到來；再一位是黃瑞奎（Huang Rikui），他負責北方區青年團工作；第四位是劉仁靜，是研究英國文學和語言的。1922年底在莫斯科以及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我曾有機會認識了他，而一年來，他基本上是全國青年團中央書記。但唯有何孟雄和王政一兩人，能給我提供有關北京共產主義活動的一些資訊，使我很快就明白北京的現狀不僅僅因為學生和教師回去度假，而且黨和團的組織也是在不知不覺中墮入麻木狀態了。

自從離開蘇聯以來，我也出了一點小問題，一個屬於個人性質的滑稽可笑的小問題：這就是衣着打扮問題。為了要通過滿洲里返回中國，我的衣着式樣，要能避免引起別人的注意，難道不應該這樣嗎？這就是說，我的衣着要完全像一個中國人，但這三年半時間裏，我已不再有這樣的衣服了，如此我在赤塔時，向張太雷借了一套衣服換上，但張太雷

的身軀要比我大得多，我穿起他的衣服來，簡直可以在裏面游泳，非但沒有舒適的感覺，而且只能像一個滑稽的小丑。直到我到達上海，這個原先的憂慮也就消除了。革命者的命運本來就是如此的。

第一二章

**我黨路線的調整：國民黨
捆住中共黨員手腳，
我向中央陳情**

我又回到了離別已久的、我所選擇的城市——上海。那是夏天，烈日下人聲嘈雜、塵土飛揚。近一個世紀來，在上海，有人追逐利潤，有人艱苦勞動，充滿着暴力行為，但通過市容的改變、再改變，塑造、再塑造，終於成為空前的心臟地區。人們可以根據小小細節、某些街頭情景，就能感觸到處處存在着通常所稱的強權勢力。從遠方來的、好戰的「大國」軍艦目空一切地停泊在黃浦江上，面對外灘。大國的水手憲兵、警察、僑民，就像在他們自己國土上一樣，在南京路上昂首闊步，或在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咖啡館裏，開懷暢飲。

然而，上海是整個神州大地上的最大都市，也是中國人民的最大都市，這些中國人從各地來到上海，有來自北方的、南方的，也有來自海外的，要分清他們，就不知如何着手，也許永遠也分不清的。上海是一座畸形的大熔爐，來自全國各省居民中、有各種各樣的善、惡勢力，永不停止地相互對抗，相互爭鬥，一片沸沸揚揚。時隔三年又半，上海給我們的印象，幾乎全變了。我注意到：人口的流動、車輛的往來，商品的運送，簡直是越來越緊張、越來越頻繁了。除了我所熟悉的電車之外，還添了公共汽車，車輪滾滾，這在我看來是件新鮮事。唉！人們在大小馬路上，還能看到的，而且是壓倒一切的現象則是人拉黃包車，黃包車夫衣衫襤褸，光着雙腳，對比之下，好一副淒涼圖景？！

上海同志，士氣低落

我在張太雷陪同下，從北京到達上海，並由他帶領直接去找交通處⁸¹，這是一個常設機關，是我黨中央委員會的招待處，位於公共租界內的威海衛路（今威海路）上。當我深入了解一下，立刻便知道了，這裏沒有辦法為途經上海的各省同志提供住房。

81 交通處，亦即聯絡處，當然，聯絡處的一切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

當我剛剛解決了住房問題時，不期遇上了高君宇，一位北京同志，1922年初，我在莫斯科便認識他的，那時，他來莫斯科是為了參加遠東勞動者代表大會工作的。高君宇熱情地接待了我，並把我介紹給他的一位夥伴，他不是別人，而是范鴻劫（Fan Hongjie），范在五四運動時期，是北京學生運動中的著名領袖之一。

范鴻劫雖然只在上海逗留一段時間，但對北京青年激進分子所產生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他成了那裏的真正「頭頭」，也因此成了當時國立北京大學在職校長蔣夢麟⁸²的「黑獸」（即危險人物）。實際上，北京大學仍然是知識分子運動的傑出基地，是北方都城的政治前鋒。六、七年以來，范鴻劫所追求的，並不是在學習完成之後拿到一張文憑，而是熱衷於保存一個學生身份，在這種獨特形式下，繼續發揮他在學生運動中的鼓舞者作用。他是湖北省人，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背略駝，心胸坦蕩，表情討人歡喜，我一下子對他懷有強烈好感，說實話，這種好感比我對高君宇的好感還更強烈。他確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從不轉彎抹角，或兜來兜去，只要說出來便好了，不必顧到說的是至理名言、扣人心弦，或者只是隻言片語、供人一笑。他個性幽默，愛好諷刺挖苦，自然，人們也指責他無禮放肆，是個淘氣鬼。

1922年7月，高君宇當選為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後，曾在上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他經常為我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嚮導》週報撰寫文章。1923年6月，他未當選為我黨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接着，他便回北京去了。在此期間，他只是在上海生活一段時候，

82 1919年5月初，因北京事件，蔡元培離開北大，需要有人來代替他，擔任北大校長，此人曾是胡適的朋友，一位忠誠的自由派分子，他跟胡適一樣，在美國留學很久，並深受哲學家杜威的影響，但決不是一個思想激進者，此人便是蔣夢麟。1919年9月間，蔡元培重新回到北京，立即恢復北大校長職位。但此後每當他必須離開北大，並在校外停留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之久時，他便要求蔣夢麟代替他，擔任北大臨時校長。自從1923年初以後，蔣夢麟實際上就是北大校長了。他沒有迫害學生中的共產黨員，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同樣，他也並不喜歡這些共產黨員學生。

並由范鴻劼陪同，不久，范便動身回北京去了。

這次，我同高君宇、范鴻劼的談話，當然是以我們見面以來莫斯科所發生的一切為中心，但我與高君宇同樣也談到了北京黨務活動的方法方式。但過了一會之後，我就克制不住，向高君宇問起上海的情況，特別是黨內情況。實際上，高君宇對有關這方面的事，顯然是個十分熟悉內情的人，因為他仍然是《嚮導》週報的常任編輯之一。他當時的臉色變得陰沉起來了。他搖頭苦笑着回答我的問話說，我們的黨用不了多久，便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毛澤東所鼓吹的那種理論，這位毛澤東恰好就住在他同一層樓面的鄰居。按照高君宇說法，毛澤東描繪我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使用了一句頗具輕蔑口吻而又生動別致的熟語：「重床疊戶。」

高君宇跟我談到毛澤東時的那種表情、神色就說明他並不喜歡他。但是，這卻引起我的焦慮，促使我要去看一看這位毛澤東，迄今為止，我一直還沒有機會碰到過他。在談話過程中，高君宇使我回想起，毛澤東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該屆中央委員會中的四個常委之一，另三個常委是陳獨秀、蔡和森和瞿秋白。他又告訴我，從1924年1月以來，毛澤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是國民黨在上海的「宣傳」部門負責人，他有大部份時間是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駐上海代表團的代表，代表團所在地是法租界黃龍路四十四號。高君宇真誠而又明確地告誡我，毛澤東並非我們同志中唯一聽憑吸收到國民黨中去的人，事實遠非如此，不過他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罷了，此外還有鄧中夏或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

與范鴻劼、高君宇兩人交談了一會之後，我毫不遲疑就去看毛澤東，他正在房間裏。我們之間的談話方式是斷斷續續，並不連貫的。凡話題是關於國民黨內所發生的事，以及他所熟悉的事，此時，他的話就多了，但當問題一接觸到我黨內部情況時，他就顯得有所保留。反之，他倒東

穿西插地以各種不同話題向我打聽。當我了解到毛澤東是受到我黨中央同志以及專門從事黨組織問題的同志們攻擊時，我就設想，他是一位有資格、有條件的同志，能把我長期掛在心上的疑慮，解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仍然堅持，要他談一談我們的同志究竟做了甚麼工作，我很希望能知道他在這方面的想法。但不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他絲毫不是這樣的人，會把我心中的疑慮擺脫掉的。

他回答我的話很簡單，而且含糊其詞，他說的基本內容如下：「我病了，應該盡快地離開上海，回到我的家鄉去。我相信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對我是很不適宜的。我要回鄉村去生活一段時間，在那裏休息，並在那裏保養身體。或許，當我的身體健康有了好轉，我很想試一試在農民方面能做點甚麼事。」當時，我曾相當仔細地觀察了我的交談者。我發現，從他的樣子看來，實際上他的健康狀況已是十分糟糕的。身體虛弱的程度，彷彿從來沒有過。他臉色蒼白，而且白裏透青。我非常擔心他很可能患了肺結核病，如同我們許多人在一生中已經或隨時可能感染上的一樣。他把妻子楊開慧及孩子們留在湖南，就必須隻身生活在這上海腹地，這對於人的一生活，對於生活來說，都是極其巨大的損害。我理解他的內心鬱悶，也理解他再也不能有別的事可做。不錯，他必須要做的，最好就是暫時地回到他自己的家裏。

在他看來，中國想在短期間內，取得蘇維埃式革命成功的希望，即使不說毫無可能，也是極端微弱的，因此，依靠工業城市，亦即依靠「伸向四面八方的城市」作為代表的、基本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土壤上鬧革命，他能不能感到高興和滿意呢？從毛澤東的整整一生中，可以證實他確是不滿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他從來就不理解工人階級，既不愛護工人階級，也不信賴工人階級。

在毛澤東離開上海之前，我再也沒有見到他了。後來，只在 1926 年 5 月，我在廣東時才有了新的機會遇到他。1924 年 8 月底，他沒有參加

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會，而陳獨秀和蔡和森邀我參加了（關於此事，我將在下文中詳細闡述），之所以值得驚奇，是因為他只在 1924 年 9 月間才離開上海。但事實是：他沒有參加會議。

有好幾天，我都要經過威海衛路交通處，我又有了機會可以同羅章龍交談了。羅章龍是湖南人，曾在北京大學文學院讀過書，1920 年底，他已是我們北方同志中最忠誠積極的一個，後來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而受人敬佩。1922 年底，他來到莫斯科逗留了至少四個星期。儘管我在那裏接待過他，但由於當時我工作忙，僅僅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過了很久以後，當我讀到一些栩栩如生而又令人心碎的文章之後，我發覺他曾以斷斷續續的方式寫過有關 1923 年「二七」事件，以及隨後的京漢路鐵路工人罷工事件，與此同時他又寫了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勝利鬥爭的第一次高潮。從那以後，我確實很想結識羅章龍。今天，在我面前的，恰好就是他本人，但不幸的是，他給我留的並不是那麼好的印象。一張皺着眉頭的臉，毫無風度可言，寧可說是一個毫無生氣，粗野平庸的人。30 年代初，當黨內形成一條左傾路線，他力圖推銷他的「調和主義」，但是枉費盡心機。

我在黨的交通處再次見到的、或初次認識的同志當中，最重要的人物，既非羅章龍、范鴻劫，亦非高君宇或毛澤東，而是蔡和森，我回到上海兩天後，便接待了他的來訪。蔡和森是我黨中央常委會委員、《嚮導》報主編，實際上，他顯然是 1924 年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

儘管以前我從未見到過他，但立即能認出他那兩隻小小的眼睛裏，閃耀着含蓄的亮光，這亮光既能說明他具有勤於學習的生命活力，也是誠懇樸實、熱情關懷人的象徵；我毋須費多大力氣就可以肯定他的品德和身份，因為從法國來到莫斯科而且曾同我接觸過的同志，經常向我描述那些法國小組中的成員，這些人有的仍然留在法國，而有的沒有再經過俄國便逕直回國去了。1920 年到 1921 年期內，當蔡和森在法

國時，他是中國青少年團體中的左派領導人之一，他們按照勤工儉學運動發起人提出的方案，選擇到法國去生活幾年。在此期間，他確實花了不少精力，去建立旅居法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小組，終於在 1921 年初，在他與幾位同伴的共同努力下發展起來了。由於還不能熟練地掌握法語，他便不知疲倦地把大部份時間專心致志地用來攻讀革命的法國報刊；開始時，可以看到他手捧辭典，學習《人道報》以及法國共產黨的其他出版物。就這樣，蔡和森終於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文化學習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鑽研中去，坦率地說，在這些方面，他比大多數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其他發起人要堅實得多。有人欽佩他，有人尊敬他，當然也免不了有人從旁取笑他，嘲諷他，說他是個「死啃書本的人」。通常，有人把周恩來的性格拿來與他的性格作對比。實際上周恩來的積極性、生命力的充沛，絲毫不減於蔡和森，但他們兩人的作風迥然不同；周恩來是個交遊廣闊的人，善於同各種各類的人保持大量通訊關係，只要是為執行使命而奔走，他甚麼事都可以放棄不做，可以不斷地旅行到法國、比利時，甚至不怕遠及德國……現在讓我們回到蔡和森的話題上來。通過從法國轉來莫斯科的同志們口中，我對蔡和森還有哪些了解呢？當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與毛澤東以及其他留在湖南的夥伴們，通信來往頻繁。他們在來往信件中，長期地、詳盡地討論了無政府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和優點，並作了比較，也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這是無可懷疑的，此時，他對湖南的夥伴們，特別是對毛澤東的思想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此外，我還知道蔡和森很會寫文章，可以真正稱得上握有一支宣傳家的筆桿子。因為在《新青年》雜誌上，我讀過一些蔡和森寫的出色文章。

里昂事件以後，即 1921 年底，蔡和森和勤工儉學運動中其他左派中國學生離開法國，並同他們一起回到中國，這些回國學生包括李維漢、

李立三、向警予（即蔡的妻子）；在 1922 年頭幾個月中，他們即以積極態度投入戰鬥。1922 年夏初，蔡和森參加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大會召開期間，馬林第一次以共產國際名義、要求我們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團結一致並融合在這個黨裏。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中，敢於公開站出來反對採取這路線的，蔡和森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他的這一勇敢行為，並沒有阻止他當選為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代表大會結束時，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的還有陳獨秀、李守常、張國燾、高君宇以及唯一的候補中央委員王荷波。更令人滿意的是；自從 1922 年 9 月，我黨創立代表我黨方針、政策的主要機關刊物《嚮導》報以來，人們便信任他擔任主編。當然，陳獨秀一直是寫作最多的《嚮導》週報編輯，同樣，蔡和森跟隨陳獨秀之後也表現得很出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唯有他們兩人，能不斷地表明，有能力獨立思考、並且毋須依靠任何人，可深入鑽研思想問題。

為了要像他的朋友那樣去了解他，我必須學會怎樣去認識他，因此，我毋須轉彎抹角，而要立即把自己的心裏話向他講出來。這就需要開門見山，接着我便直截了當地向他傳達了我的使命，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們全體一致要我負責、向黨中央傳達的那個使命；我對他說，我們不贊同我黨現時所採取的方針、政策，並解釋說，我們不理解，為甚麼我黨認為有必要把所有有生的力量投放到國民黨的活動中去，為甚麼有必要幾乎全心全意地、無償地為國民黨服務。就在此時，我明確地向他表示，儘管我們沒有掌握所有有關本質的各要素、以便允許我們對全國佔支配地位的局面作出判斷，但我們深有感觸的是，凡留在國內的同志們似乎具有這樣的傾向，即對自己黨的命運漠不關心了，這裏所涉及的是若干令人遺憾的事實。

蔡和森對於我所談的這番話的反應，並不表示驚訝！相反地，他卻證實了我的擔憂以及莫斯科同志們的憂慮，都有充份根據的。他遠不是

反駁我的意見，而是承認我們的同志當中，最有才幹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活動分子，一個又一個都被國民黨的機構吸收進去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再也不為我們的黨而工作，卻是為他們的黨而工作了。我們的工人運動，彷彿是突然間便不存在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似乎老老實實地接受保守主義的侵犯，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到最後，他無法保持沉默，便大聲地嚷起來，「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存在下去了」，他甚至不考慮我是否也有這樣想法，便說：「該怎麼辦，該怎麼辦，該怎麼辦呢？」

當時，我聽了他這番話後，並不感到局促不安而是心平氣和地回答他說，他應當做的，首先應是矯正我們宣傳部門的方向，因為我們出版物上所刊載的相當數量文章，顯然已經遠離了我們的信念，遠離了我們每一個人不能不知道的最基本的原則，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本應在他的所說所為中嚴格遵守這些最基本的原則。接着，我又再三強調，他還應當做的是，要不失時機地重新恢復我黨的正常活動，要刻不容緩地要求我們的活動分子，當然，還有我們所有的領袖們，都必須把絕大部份的才能和精力貢獻給我黨的事業。

當我向黨的領導拋出這麼一顆重磅炸彈之後，我並未忘記我的交談者也是領導成員之一，這樣做，會不會太刺激了呢？我倒有點不安起來了，但蔡和森對於我提出的這一系列責備的話，毫無半點抱怨，真令我喜出望外。更值得高興的是：我的談話一經結束，他反而感到輕鬆、愉快；而且我還理解他、十分誠懇地接受我向他提出的建議，儘管我當時表達的方式是提綱挈領式的，也是十分簡短的，接着是他說話了，他的情緒也越來越熱烈。我們分別時，他容光煥發，一臉喜色，他對我說：「你回國來，又回到我們當中，這真是一件太好的事。今後，你應當為《嚮導》報撰稿，成為《嚮導》報的編輯之一。我立即要找陳獨秀談一談。」由於我已經肯定，有關黨務的現狀問題，蔡和森的基本觀點，是跟我以

及我的莫斯科同志們的觀點十分接近的，因此，當我們兩人交談結束時，我感到我的心情充滿着輕快的喜悅。

國民黨捆住中共黨員手腳 瞿秋白不禁黯然失色

上次，我同蔡和森接觸過之後，僅僅過了幾天，我又見到他了。這一回，我立即察覺到他神色異常，心情不快，但等不到我開口問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就把心中的憂慮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告訴我了。

他對我說：陳獨秀剛接到瞿秋白的信，這是從廣州發出一封快信，你總不會忘記吧，瞿秋白，正如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以及我們其他幾位同志一樣，自從1924年1月以來，已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是為出席國民黨中央全會前往廣州的，這次全會十分重要，因為會議要集中討論國民黨與我黨的關係問題。不錯，瞿秋白只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而我們同志中的某幾個人卻是有全權的中央執行委員。但作為我黨中央常委會委員的身份，顯然，瞿秋白是一個定基調的人物，可以代表現時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委中所有的共產黨員說話；事實上，他就以他們全體的名義寫信給陳獨秀的。

蔡和森繼續說道：1924年春，我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給必須參加國民黨機關工作的團員們，發出一份通知，儘管通知是以最近在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措詞比較含糊的文本為根據，但仍然屬於內部嚴格秘密的性質。通知號召青年團員應當首先尊重團中央的決議，繼續獨立存在於國民黨之外，要設法擺脫困難，保持各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並要定期地在他們中間舉行會議，以便根據自身的原則，同國民黨內的活動協調起來。正在此時，國民黨右翼軍人竟然在廣州竊取到青年團中央通知的一份樣本，因此，他們便加緊恢復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活動。由張繼、謝持這一夥死頑固的、毫不讓步的中央監察委員負責調查，顯然可以看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是想借此事件來小題大作。迄今

為止，我們青年團中央所發的通知僅是影響極微的文件，卻被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宣佈為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分子幹出「罪惡行徑」的「不容置疑的證明」，說文件「表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專門從事於真正的「顛覆活動」，因此，人們從中得出的最明確的結論是：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必須成為「嚴厲制裁」的對象，這是在一份所謂一致通過的「調查委員會的動議」上寫明，而這份「動議」於1924年6月便急忙轉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了⁸³。幾天前，即1924年8月1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了擴大中央全會，着重討論「由極端嚴重事件所引起的問題」，以便重新提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所屬「調查委員會動議」中的條件。討論的氣氛活躍，情緒激烈。顯然，為了使每個出席會議的人能冷靜地對待問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乾脆提出了如下的建議：建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由一名國民黨代表，一名中國共產黨代表，一名共產國際代表組成；這個聯合委員會考慮到所有的問題是在國民黨內有大量的共產黨人在場時提出的；要有能力把問題解決得更妥當些；而共產國際在事先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不能向中國共產黨員提出甚麼指示。因此，我們該怎麼辦呢？如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4年8月底再次召開擴大中央全會要對問題作出決定時，我們對提案表示贊成呢？不理睬呢？抑或表示反對呢？我們是投票贊成、反對抑或棄權呢？此外，我們是否有可靠的理由反對這項提案呢？為了在辯論中解決問題，我們是否準備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呢？如有，那又是甚麼樣的方案呢？這就是瞿秋白向陳獨秀提出來的問題，瞿秋白要求陳獨秀在接到他的信後，火速作出回答。

蔡和森明確向我表示，自從八個月以前，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召開以來，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中歷史悠久的那些「死硬派」之間，存在

83 在國民黨內部，唯一真正掌握實權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但常委會中沒有一個共產黨人。

着磨擦，當然，這已不是第一次。但，磨擦具有如此嚴重的性質，這還確是第一次，因為這是第一次完全根據國民黨內最正統集團成員的頑固意志、把磨擦的風暴提到更高的高度上來，中央監察委員會恰好是為這個集團成員的聚會服務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常委會，即我黨中央，當時由於瞿秋白不在，毛澤東態度冷漠，實際上只剩下陳獨秀和蔡和森兩個人了，使他倆處於十分尷尬的地步，通過蔡和森的口，他們向我提出以下的問題：「如果你處在我們的位置上，你該怎麼做，你將怎麼答覆瞿秋白的信呢？」

在沒有表示意見之前，我抓住時機先考慮了一下，然後直截了當地對蔡和森說，「聯合委員會」是根據國民黨領導人的擬議而建立，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看來這等於使我們陷入極端危險的、錯綜複雜的困境中，蔡和森聽了之後，高興地站起來，他和陳獨秀的觀點與我的觀點已是不謀而合，他不失時機地又回到陳獨秀那裏去，與他再次磋商了一會，最後、協助陳獨秀起草了給瞿秋白的覆信，覆信內容，十分明確，毫無含糊之詞：8月13日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提出的建議，再次承認了國民黨有權，繼續監視我黨的一切活動，我們要予以拒絕，決不接受。

不幸得很，這一建議完全被廣州方面忽視了。由於得到鮑羅廷的支援（鮑羅廷是蘇聯以及第三國際駐中國南方極有勢力的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在1924年8月底召開一次新的中央全會上，便毫不費力地、並且是如願以償的通過一項有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關係的決議。至於瞿秋白，他甚至不期望接到我黨「中央」給他的覆信，他本來在信中提出，要我黨中央作出決定，怎樣公開地對付國民黨領導人的立場的。但瞿秋白沒有任何別的選擇，當他接到覆信時，只好裝做從來沒有接到過似的。

由於辜負了我黨中央，一般指的就是在上海的共產黨人對他的信任，

瞿秋白深感不安，他寧願延長在廣州的逗留時間，此外，他正好有機會發揮他的筆譯和口譯才能為鮑羅廷服務。一週又一週，一月復一月，瞿秋白推遲返回揚子江畔大都市——上海的歸期。他甚至不敢回上海參加於 1925 年 1 月召開的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只當他獲悉這次代表大會要改選我黨中央委員時，才在 1925 年 2 月或 3 月間回到上海，但他離開已經有七個多月了。他曾在多數共產黨人周圍、特別是在陳獨秀身旁所享有的名譽，聲望和權威，那麼到了 1924 年夏末還留下甚麼呢？可以肯定地說，留下來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了。

大家當記得，瞿秋白於 1922 年底在莫斯科時，曾征服了陳獨秀的心，當他陪同陳獨秀回國以後，陳獨秀對他的器重和好感，絲毫沒有減低。1923 年 6 月，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結束時，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並在中央委員會常務會中佔有一席，成為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三號人物（第一號人物仍然是陳獨秀，第二號人物為蔡和森）。與此同時，他還接受一項使命：重新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但經商談之後，雜誌的出版意向，不再是「每月一期」的月刊，而是「每季度一期」的季刊了。瞿秋白在《晨報》工作時，曾取得一種成功的方法，現在應用到編輯《新青年》上，這就是給《新青年》撰寫最基本的文章，其中大部份是論文和譯文，這些譯文是直接譯自莫斯科來的文件。很顯然，他只是採用這樣的辦法，形成一種中文版的《國際通訊》，但也要說句公道話，他也同樣給《新青年》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社會問題的論文，以供討論，還撰寫了一系列所謂中國社會「氏族家長制」性質的論文。

我們的上海同志完全不懂俄文，也沒有接觸過直接來自莫斯科的俄文文件，因此，瞿秋白毋須花太多的力氣，就能在他們周圍，或者把範圍擴大一點，在中國所有左派知識分子階層的周圍，贏得了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聲譽，時間長達好幾個月，此外，上海大學的創始人兼校長于右任委託他領導該大學的「社會科學部」，同時要他負責歷史唯物

主義哲學的教學工作，這一事實就很自然地使他進一步地鞏固了聲譽。享有學識淵博、思想先進盛名的于右任，創辦了上海大學，通稱「上大」，並要使之迅速發展，其唯一目的是盡可能地把大批人才集中起來。瞿秋白曾是國民黨員，從一開始，他在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同情者中間，擁有優越的地位，這本來就沒有甚麼困難的。

為了在上海大學講課，瞿秋白僅僅限於把我在上文已經講到過的、布哈林的著作《歷史唯物主義》，逐字逐句地譯出來，供他的學生使用……但他力圖避免談起這件事，甚至在他的教學中也沒有提到這是布哈林的著作，布哈林這部傑出的論著，在1923年至1924年間，有否中文譯本呢？當然沒有，當時，瞿秋白可能認為，不會有甚麼風險，這就使他的膽子更大，居然用他自己姓名出版哲學教程。實際上，這是布哈林早前的著作，只不過是通過瞿秋白的口說出來，然後編成一系列「上大」的講義，送到上海書店印刷出版。我們東方大學的中國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內，從1923年底或1924年初起，已在莫斯科發現這個大騙局了。這對瞿秋白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從此，他在我們的眼裏已經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可敬性。我們同志中的某些人（還使用了刻毒的語言），直指他為「文抄公」或者乾脆是「剽竊者」。但我們上海同志對他在理論上的想像能力還一直抱有幻想，他們如此地關心他，幾乎沒有一個人曾經對他表示失望，直到1924年秋初。

如果說，以往瞿秋白曾在上海和莫斯科受到過人們的尊重，但他不能得到人們對他更好的愛戴。其中原因有二，第一，他始終沒有放棄那種嬌生慣養、雍容華貴、「自命不凡、出人頭地」的生活方式；第二，通常，他只對那些知名人士稍表關懷，而對於那些來自底層的小人物，就表示出隨心所欲，不以為然了。凡要去看望他的人，必須把自己的姓名寫在一張紙上，交給住在他家底樓下的女僕，女僕上樓再把這張紙交給瞿秋白，他本人就藏身在樓上。每當來訪的客人，如果是沒有重大影

響的同志，而是工人運動中的一般活動分子，例如陳為人（Chen Weiren）、李震瀛（Li Zhenying）等人時，他便要女僕出來傳話說：「我們的少爺不在家。」但當來訪的客人是重要人物，是頗孚眾望的社會名流，譬如說沈玄廬等人，他便沖下樓去親自迎接，並且留客吃飯，甚至設宴款待⁸⁴。

一方面，他在教育「上大」學生時，大量運用和傳播按照原來方式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報刊上，大量介紹直接譯自俄文的、具有蘇維埃精神的經典作品，但另一方面，瞿秋白自從回國以後，關於中國政局的分析，他所贊同的、所採取的立場，與其說是左傾的，倒不如說是右傾得厲害。在國共兩黨關係上，他是主張緊密合作形式的積極擁護者，例如在1923年夏初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他最終是全面贊同這種形式的；1924年1月，他為能夠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的工作而欣喜若狂，但陳獨秀和蔡和森卻對出席「改組」大會不屑一顧。後來，在同一次改組代表大會上，瞿秋白被選為國民黨「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時，他感到無限幸福。1923年12月正當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他在《嚮導》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用了難以置信的奉承阿諛的話來頌揚國民黨，文章署名巨緣。1924年2月，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召開之後，他又在《嚮導》報上發表一篇同樣不值得一提的文章，署名屈維它，標題為「國民黨與下等階級」。他在這篇文章的結論中，令人齒冷地寫道：「國民黨仍然是各下層階級的黨，一個革命的黨、一個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並為保護他們的利益而戰鬥的黨。」那時，我很想問一聲中國共產黨，你起甚麼作用？豈不是一個多餘的黨了嗎？或者正如毛澤東所說「重床疊戶」的黨嗎？

84 這裏所說的有關瞿秋白1923-1924在上海時，那種並不光彩的生活作風，是陳碧蘭告訴彭述之的；陳碧蘭，共產黨員，1925年底，她成為彭述之的妻子。1923年，1924年，陳碧蘭在上海，她有一段時間，恰好住在施存統和瞿秋白同一座房子裏。

不管怎麼說，事實是明顯地擺着的，因為在他的眼裏，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而瞿秋白就聽憑自己為所欲為了，如同他在廣州的表現一樣。他無視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指示，在1924年秋天，徹底投到國民黨領導人麾下，後來兩黨第一次嚴重對抗中，矛頭直指共產黨全體黨員，這就使瞿秋白在整整好幾年中給自己留下了有切膚之痛的回憶。我可以用以下的事實加以證明，1927年4月在武漢，瞿秋白以挑釁性的論戰方式，拋出一本反對我的小冊子，重新提起他那政治生涯中實是可悲的插曲，目的是用歪曲事實、厚顏無恥的手法，把當時的責任推在我的頭上。他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我黨中央發給他的指示，即有關「1924年8月底，由常委會提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國共兩黨之間關係問題之所以加以拒絕」，只是因我插手策劃的「陰謀」而造成的後果。瞿秋白注意到，這次事件的發生是在我回國後不久，而且斷言從那時起，即從1924年8月中旬起，我已被結合到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中去（從事實來說，我只在一個多月之後、如果從正式程式上來說，只在1925年1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我才成為中央領導機關的成員），因此，他就走得更遠了、甚至說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中央」所犯錯誤的唯一「罪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彭述之囉！

向中央陳情

我在威海衛路上的交通處，度過八天之後，便定居在「三零七」號，與過去一樣，我們同志之間可以更經常地交談。甚麼叫「三零七」？這是民厚里（minhouli）的一座小房子，位於慕爾鳴路進口處三零七號。「三零七」號與交通處一樣同屬於公共租界範圍內，這裏也是居民住宅區。真想不到，我在這裏差不多住了整整六個月。

「三零七」號是上海最常見的普通民房，有兩層樓，底樓有兩個房

間，二層樓也是兩個房間，兩層之間有一個更小的、上海人稱為「亭子間」的小房間。開始時，瞿秋白和施存統共同租用這家民房，由於房子靠近上海大學，施存統感到很方便，他們兩人幾乎每天都要去「上大」上課。瞿秋白住在二樓靠後的房間，施存統則住在底樓，也是靠後的房間，那天自從下車之後我被安排在這小小亭子間裏暫住。亭子間恰好就在施存統及其可親的妻子王一知（Wang Yizhi）所住房間的上面，也恰好在瞿秋白所住房間的下面，那時，瞿秋白動身到廣州去了，我就毋須搬動房子，直到 1925 年 2 月。

當我剛剛到達「三零七」號時，瞿秋白住的二樓前房，來了一對年輕人，一個是秋白的弟弟瞿韻白，另一個是未來的小說作家丁玲，那時的丁玲，圓圓胖胖，正是年華方富時。但這兩位年輕人，完全被他們的愛情史所陶醉，外面的世界對他們兩人來說，彷彿不再存在了。甚至與他們擦肩並行的同志們，他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當他們倆在這間房子裏度過的那幾天，我也只是隱隱約約地看到過他們的影子。這兩個年輕人剛一動身去北京，代替他們來住的是蔡和森和向警予。

底樓唯一可住的房間是靠後的那間（而前間則是「三零七」號所有房客共用的）。施存統和王一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底樓後房的房客。後來，當他們把家搬到法租界去的時候，這間後房被新來者所接替，開始來接替的是沈玄廬及其年輕的妻子，他們僅僅住了很短的時間，接着，是被一批路過的同志們暫住：張太雷，在沒有決定他回廣州之前暫住那裏；陳延年，從莫斯科回來之後，以及劉伯莊等等，都曾在那間後房暫住過。二樓的後房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無人居住。但通常是由我們黨中央的同志，先是陳獨秀，後是蔡和森，用來召開大小會議的地方，這樣一直使用到 1924 年底為止。

可以說，我在既是住宅區、又是「黨機關」的環境裏，重新取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席之地。

在投入黨的活動之前，我感到有責任使這項黨的活動，具有轟轟烈烈的性質，我敢說，我利用那怕點滴時間，力圖踏着黨的脈搏去形成一種盡可能正確的思想，去完成我們那感人而又道路漫長的事業。在這樣的精神指導下，我開始有系統地檢查各種不同出版物（在莫斯科時，我只能不定期地注意到這些出版物），並不斷地去看望在上海的同志們。

最初，黨派我到上海區委去，上海區委又稱江一浙一皖區委，包括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區委的中心自然落在上海。上海區委所在地位於上海北區，屬於公共租界內，用中國話說是閘北區。帶我去的是韓白樺（Han Baihua），一位詩人兼畫家，1921-1922年在莫斯科時，我們曾是在一起的夥伴。1922年夏末，韓白樺從蘇俄回國以後，實際上他是江一浙一皖區委書記，他接替沈雁冰擔任這一職務的。沈雁冰其人，猶如不久前談到陳獨秀時所說的一樣，他的能力差，甚至連最小型的會議、也不能在適當時候、適當場所有效地召開。毫無疑問，沈雁冰在文學界，以茅盾為筆名，是享有很高聲譽的，但他是一位空想主義文學作家。韓白樺則是另一位文學作家，但他的工作能力顯得更有效。上海區委的所在地是座規模很小的兩層樓房，坐落在混凝土庭院的深處，不論從裏面看出來，或從外面看進去，都不會顯得過份簡陋；不錯，正是在這庭院深處的小樓房裏，我們區委的領導成員經常可以碰頭，並且也正是在這裏，我們有效地與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各大中城市、小鎮和鄉村的同志們取得聯繫。

然而，我們對外並沒有使用這個引入注目的組織名稱：「中國共產黨江一浙一皖區委員會」，因為這個富麗堂皇的組織名稱，是跟貧乏現實活動很不相稱的，事實上，我們上海組織中能正常開展活動的僅有兩個支部，即商務印書館支部和「上大」支部。此外，在楊樹浦區，我們還有一個工人小組，當然，也還有一些同志，他們是被派去在我們組織周邊，主要是在國民黨內，以某種方式進行活動，因此，他們成了單獨

作戰的活動分子。總之，我們將如何恢復江—浙—皖區委的工作呢？就算我們能把所有記得起的人，一個不漏地加起來，還不到五十人，這就是說按照在全國學聯內有過職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及我們留在上海的同志們都包括進去了。區委的組成，除書記陳獨秀外，還包括商務印書館支部一、二名支部委員，一名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從那時以來，他們並不是很積極的，而且會議也很少召開，就韓白樺來說，他也是考慮到適宜於做甚麼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相信有可能從根本上調整我黨的路線，也很難相信有可能開展或重新恢復群眾運動，唯一可能做的事，我們首先要從這種萎靡不振的氣氛中擺脫出來，當時，我認為不論在上海或在別地，未來的前景都是不容樂觀的。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要喚起或者重新喚起群眾，首先要喚起工人群眾，全部問題就在這裏。在喚起工人群眾方面，我們在上海要從何處着手呢？我同我們工人運動的同志李立三和項英兩人進行了談話後，很快就使我拿定了主意。〉

大家當記得，李立三在法國時，由於長期生活困難，於 1921 年底，他同勤工儉學運動的其他中國青年，如蔡和森、李維漢等同時回到中國來。他曾經回到湖南故鄉，並聯絡我們的同志，如劉少奇等人起程到安源去，這是江西省西部靠近萍鄉的煤礦工地。他們在 1922 年下半年，就地創建了第一個「煤礦工人俱樂部」，換句話說，就是第一個煤礦工人自己的工會。他曾在安源煤礦大罷工中發揮了十分出色的鼓動作用，這次罷工是由「煤礦俱樂部」發動的，並一直堅持到勝利。從此以後，安源便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基地，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和保護下建立起來的基地，周圍團聚了不少於一萬礦工。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還創辦了一批學校，供煤礦工人的子女們上學。學校需要教師，可以吸引很多同志到安源去。在我們的眼中，當時的安源彷彿就是名副其實的「小蘇維埃」。然而，到了 1923 年底，李立三捲入了一件很不光彩

的事。他感情衝動，行為冒失，經常鬧男女關係，他愛上了一個礦工的妻子。這礦工也是工會的活動分子、表現突出，受人尊敬，當然不能容忍妻子幹出這樣的事。在整個安源，人人都知道了，駭人的醜聞不脛而走。李立三成了礦工們怒目而視的對象，他不得不趕快離開安源。

1924年1月，李立三像很多同志一樣，到廣州去參加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的工作。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在幾個大城市中，例如上海、武漢和北京，建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中執委的所在地設在廣州。代表大會結束以後，安排李立三去成立並任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駐武漢代表團的代表。國民黨中執委駐武漢代表團包含三名共產黨員，即林祖涵，又名林伯渠（他是代表團的主持人）⁸⁵、項英、劉豐（Liu Fen）以及一名「最典型的」國民黨人老張（原文只有姓，無名），我黨便利用這個代表團作為一種手段，來擴大自己在湖北省的影響和聲望。國民黨人老張，對所發生的一切事很不滿意，但又無能力提出反對，他不得不起程返回廣州，向國民黨中央領導申訴，竭力反對他的共產黨同事。他痛斥共產黨人幹下了「不忠誠的勾當」、控告他們在武漢的國民黨組織中、大權獨攬，隨之而來的便是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右翼代表之間的爭吵趨勢，越來越更激烈了。聽了老張如此的申訴之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終於作出決定，下令解散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駐武漢代表團。李立三和項英便在那時離開武漢。他們兩人於1924年4月間先後定居在上海，相當於我再次到達上海之前大約兩個月左右。

當我見到李立三時，他的名字不再叫李立三，而叫李隆鄧（Li Nengzhi）了。李立三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小夥子，走起路來搖來擺去。兩隻眼睛鼓

85 林祖涵，即林伯渠。湖南人，1924年時已近四十歲了。在孫中山影響下，於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從1920年開始，在陳獨秀、李大釗影響下，轉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1年夏末，孫中山和馬林先後來到位於廣西東北部的桂林，當他們兩人第一次會面時，林祖涵是他們的中間人。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代表大會結束時，他作為共產黨人，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以及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直到他逝世、即1960年春為止，他不斷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得大大的，一張嘴巴大得出奇；吃東西時，他那帶病態的蒼白臉色，令人深感不安。然而，在那時，即在 1924 年 8 月下半月，應該說，李立三是我在上海的同志中，十分難得的一個，他不僅滿懷希望，而且精力充沛。他出版一張油印小報，名為《上海工人》，原則是每月出版一期。他對這份小報；寄予很大希望，力圖借此重新推動上海的工人運動。這份小報幾乎全是李立三一個人負責編輯出版的，當然，不會有甚麼了不起的價值：讀者在閱讀時就能發現：就實際水準來說，是很低的，就形式來說，充滿着錯別字、錯印、錯排，這就造成閱讀小報的極大困難。然而，李立三卻沒有因此而心灰意冷。他倒以這份工人小報而自豪。他真的不知疲倦地幹下去。他要我到他的所謂報館「大本營」去參觀訪問：這原來是一座簡陋的二層樓小房子，位於人口十分稠密的楊樹浦區，靠近港口，就某些方面來說基本上是為地區性工會服務的，這工會便叫做「機器業工會」。

我帶着好奇心問李立三：「是否有工人經常到這裏來呢？」李立三回答我說：「不太多，只是在每個星期天，有幾個工人到這裏轉一轉，我們也乘機進行簡短的談話」。根據李立三對我談的這番話中、更突出地顯示出上海工人運動正處於「低潮時期」。當然，如能在有限範圍內傳播《上海工人》可以說已經達到最理想的程度了。僅有幾個工人積極地在他們周圍傳遞這份可憐的小報。

為甚麼我們會是如此可憐呢？毋須多費力氣，我便領悟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我們之所以如此，因為我們還未能從階級敵人製造的 1924 年「二·七」事件的打擊中恢復過來。我們之所以如此，特別因為我們不是積極地去準備發動工人運動，相反，我們大多數同志陷入國民黨的框框之內而發生了變化。例如，我們的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傑出的鼓動者鄧中夏，從 1921 年底到 1923 年初是個怎麼樣的人呢？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駐上海代表團的一名官員。看來，他也經常忙於工人運

動……但純粹是形式主義的，因為他既然作為國民黨的一名負責人，就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來了。

我朝那「機器業工會」的二層小樓房望了一下，心想這工會畢竟還能發揮經常性作用的。我毫不懷疑，近一個月來，我們能同南洋煙草公司職工中的罷工領導人進行接觸，都是由於這個工會起了有利作用的結果，而這種接觸，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

項英給我的印象，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都跟李立三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1924年，他仍然使用原來的真姓名；項德隆（Xiang Delong）。他的化名項英，只在1925年5月30日，當革命爆發之後不久才使用的。他就是以項英這個化名，馳譽國內外，他出身在湖北，當時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小夥子，身材高大是我們北方人常見的特徵。他那張平整的臉龐，略顯刻板，兩隻半開不閉的眼睛不斷地眨巴着。凡見過他的人，都會覺察得出項英是一位親切的、具有深厚感情的人，他正直善良，可以說無懈可擊。1923年，在「二·七」事件中，他受到嚴重創傷，但不知道怎麼會活着脫身的，那時他神態憂鬱、恍惚，我敢說他的精神失常了。

他原是武漢紡織工人，早年便投身到工會活動中去，屬於由徐白浩（Xu Baihao）創建的、經得起一切考驗的戰鬥小組，徐白浩是湖北最早的工人領袖之一。這個小組曾培養出好幾個像項英一樣知名的青年，向忠發⁸⁶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後來也正是這個戰鬥小組，全力以赴地去

86 向忠發，正式的無產階級工人，原籍湖北省。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他領導武漢漢一冶一萍冶金聯合企業礦工工會（漢一冶一萍冶金聯合企業，指的是萍鄉安源煤礦及大冶鐵礦，這個聯合企業採的煤、鐵主要是供應漢陽的高爐煉鐵用）。1927年回國後，他擔任湖北省總工會主席。1928年夏季，在帕維爾·米夫的監視下，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結束後，他突然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但從未履行過總書記的職責，只不過是李立三的傀儡，直到1930年，此時，他在上海被國民黨警察逮捕，王明取代李立三擔任中國共產黨新的總書記。1931年6月，國民黨警察槍決了向忠發。

組織北京——漢口鐵路上員工總罷工，這就是著名的 1923 年初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這次總罷工遭到由英美支持的、北洋軍閥集團首領吳佩孚的殘酷鎮壓。無情地槍殺罷工者、逮捕他們的領袖，殺害了可敬的罷工鼓舞者之一的律師施洋，這就名副其實地把中國工人運動的首腦砍掉了⁸⁷。至於項英本人，他終於能逃過這次大屠殺，簡直像是死裏逃生。此後，他便轉入秘密活動，直到林祖涵（伯渠）調他去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駐武漢代表團的工作為止。

他詳細地向我敘述了「二·七」罷工事件的壯麗場面及其恐怖情景，因為他是 1923 年 2 月事件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他對我敘述時，彷彿是剛剛經歷過的一樣，使人們經常回到了那夢魘般的悲慘結局中去。當他追憶到那些烈士和死難的同志，或者談到仍然被幽禁在監獄中的同志時，他那憤怒的淚水在眼眶裏滾動。這種種事實，同 1924 年上半年在武漢的國民黨右翼分子對抗共產黨人的矛盾交織在一起，顯然是不能使他平靜下來的。他的心情惶惶不安，他的失望發展到痛苦的程度，然而，從他返回上海時起，黨仍然認為沒有必要使他參加工作，也沒有交給他完成一項那怕是很小的任務。悲觀主義攫取了他的心。此時，我盡我的可能，力圖把他從悲觀傷感的處境中擺脫出來。我答應他把問題向我黨中央同志提出來，以便使他閒着無事可做的景況不會拖得很久。

自我從蘇俄回國後，通過與一些同志們的接觸和交談中，得到了啟發。現時，我感到能夠更明確地提出我對黨務現狀，特別是對上海現狀的看法，給我黨領導參考。我一有機會再見到蔡和森時，便小心謹慎地，用婉轉的措詞，向他談出我的意見。我對他說，我感到悲傷的是：不能不肯定幾乎全體中國共產黨員都被國民黨吸收過去了；更感到驚奇的是：

87 施洋，武漢市年輕的共產黨員律師。他以雙重身份——革命戰士和工會法律顧問——同統治湖北的直隸軍隊進行了鬥爭，1923 年 2 月初，他在京漢路的罷工中，真正發揮了領導作用。駐武漢的軍閥蕭耀南下令逮捕他，於 1923 年 2 月 15 日，他被槍決而犧牲。

中國共產黨在突然之間確確實實失去了作為一個真正革命黨的資格了。我向蔡和森表明態度，要求黨中央在最短時間內，從頭到尾重新考慮一個問題，這問題在我看來，幾乎每時每刻都令人焦急不安地向我們提出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

過了兩三天後，蔡和森通知我說，陳獨秀要我以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員小組代表的身份、參加中央委員會常委會會議。這次會議在1924年8月底召開，參加會議的實際只有三個人，即陳獨秀、蔡和森和我自己。瞿秋白仍然留在廣州，沒有參加；毛澤東無疑是唯一知道開會的人，但他以開會無益為理由，所以也沒有參加。

我應陳獨秀和蔡和森的要求，向他們作了一次極其簡短的有關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員小組活動的彙報，然後又作了更簡短的有關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開會情況的彙報（我的彙報所以簡短，是因為張太雷尚未離開上海，他或者已經作過一次內容相同的彙報，或者將要作一次更詳細的彙報）。然後，我便把莫斯科同志集體提出的、對黨的路線以及黨在目前所起作用的不滿評價告訴他們：我還以私人名義進一步地向他們兩人說出，我從回到上海後曾對蔡和森一人說過的那些意見。我以焦急心情，十分迫切的語調，懇求他們徹底糾正我黨總路線以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在這方面，我及時地向他們指出，國民黨正處於非常複雜的內部衝突的中心，而這個黨已被這些衝突所困擾，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制訂，並要嚴格遵循的我黨真正的路線，這種必要性是如此迫切，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去避免落到了由各集團、各派系、各個人交織在一起的、永無休止的相互爭奪的圈套中去，而對於這些集團、派系和個人而言，國民黨這個黨正是他們耀武揚威的戰場。我向這兩位具有特殊影響力的交談者，一再強調我的想法，即當前我們的第一任務，是要在一片廢墟中重振我們的工人運動。我還向他們表明，如果我們真的願意，並且能夠挑起這項任務，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重新調動我們最有才能的同

志去完成我黨自身的任務，同樣，我們也只有召回黨內活動的中心力量；不幸的是，我們曾經犯了嚴重的錯誤，在不到一年時間，都讓他們跑到國民黨內部去了。最後，在結束談話之前，我提請蔡和森和陳獨秀注意，仍然留在莫斯科的同志們曾經全體一致作出一項堅定不移的決議，他們表示要盡快地返回中國，為加強我黨力量而作貢獻，與此同時，他們還要專心致志地去重新開展中國的工人運動，使他們最感到厭惡的事，莫過於去壯大國民黨的隊伍。

我已認識到蔡和森基本上是同意我的意見的，但我所擔心的則是陳獨秀對我所持的意見，會作出甚麼反應。如果他贊同我的意見，我所維護的事業便會獲得重大力量，而這股力量本來是不存在的，如果缺乏這股力量，我們的事業將不可能獲得勝利。結果怎麼樣呢？陳獨秀非但沒有反駁我，而且不僅限於此，他對我們與國民黨關係這一主題，看來願意比我走得更遠，他解釋道，實際上我們要在國民黨內做好工作，越來越更困難了，現時國民黨發動一場反對我們的進攻，就我個人來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氣憤。按照陳獨秀這個觀點，是否可以證明他已有了顯著的變化和發展呢？我確有這樣的感覺。因為到此時為止，陳獨秀原來的想法，恰像瞿秋白那樣，國民黨就是「我們的黨」，我們應當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國民黨身上。但此刻不同了，陳獨秀確是十分樂意地承認要把這種判斷全部加以重新審查。

直到最近為止，中國共產黨有三個中央機關刊物，它們是《嚮導》、《新青年》和《前鋒》。《前鋒》將要停刊，現在只剩下兩個刊物了。然而，對我來說，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思想的演變直到我們宣傳工作的演變，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概念，因此，我必須用銳利的目光，嚴格檢查一整套《前鋒》以及《嚮導》報和《新青年》，顯然，我要站在《嚮導》報編輯立場上，全神貫注地來審閱所有這些文獻。這種努力是否有成效呢？這是肯定的，因為我終於發現以下的事實：

一、1922年底，這是《嚮導》報創刊時期，總的說來，此時我黨所堅持的立場，是相當正確的，只是到了1923年，才逐漸失去控制，而一步一步地向危險的斜坡上滑下去了。從1924年初開始，越來越迅速地陷入到機會主義的泥潭中去，這不論是在理論層面上的分析，也不論是對現實問題的判斷，都是如此。

二、我黨的宣傳工作，在最近兩年內，一直圍繞在兩個進步的主題提出我們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徹底肅清軍閥」。但一旦碰到了新的問題，即當我們的國家出現了政治和社會形勢的不斷變化時，我黨的宣傳方針也就搖擺不定，猶豫不決了。更確切地說來，我們中央機關刊物的各編輯們未能從現實中得到啟發而發表及時的述評。

三、不幸的是，在這一點上更使我感到吃驚：自從1924年1月以來，我們三個主要刊物的編輯們，從來就沒有過不同的意見，即不管「改組後」的國民黨究竟是甚麼貨色，他們不但避而不作出評論，相反地，卻全體一致地確認這個黨是真正的革命黨。

四、顯然，這是我黨對在中國政壇上彼此競爭的各個黨派，在階級與階級性的關係上，未能提出真正馬克思主義分析，由此也可證明我黨領導在一年多來，採取的是經驗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方法。過去，我在莫斯科時早有這樣的體會，而現在我更加體會得深刻了。「預先決定能擔負我國革命領導責任的是甚麼樣的社會階級，因而是甚麼樣的政治組織呢？」這歷來是而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不得不指出，在我們的中央機關刊物中答覆這個問題的含糊不清語調，只能在我們積極分子的頭腦裏散佈紊亂，並引導他們走向錯誤。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同志絲毫沒有懷疑過，中國共產黨是保衛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階級利益的傑出先鋒隊。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同志終於在實際上已被人說服：中國革命必然在同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才能領導鬥爭，才能對內消滅軍閥，對外趕走帝國主義；我們的同志還認為國民

黨自從「改組」以後，已成為這個聯盟的活的化身，因此，他們只能偶而或多或少地感到有點迷惑不解。

五、在我們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四名常委中，我早已說過，瞿秋白在頌揚國民黨的「革命性」方面是走得最遠的，正如他署名巨緣和屈維它，於1923年12月及1924年2月先後發表在《嚮導》報上的論文中所表明的一樣。然而，陳獨秀是第一位以毫不含糊的態度提出他的論點，即現階段的中國革命，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1923年4月25日，他在《嚮導》報上發表一篇論文，題為「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12月底，他以同樣毫不躊躇的態度，在《前鋒》刊物上，又發表一篇論文，就同一題材把論點說得更清楚、更明確、更徹底……但也更令人遺憾，這篇論文的標題是「國民革命與中國各社會階級」。毛澤東並沒有像瞿秋白那樣寫得多，但他在頌揚「革命資產階級」方面比陳獨秀還表達得更加明顯，如同我在1923年7月一期《嚮導》報上讀到的論文所理解的一樣，他在這篇論文中談到曹錕和吳佩孚在發動暴力政變之後不久，為了直隸集團的利益，便利用這次政變控制了北京和整個華北；毛澤東還說反軍閥、反帝國主義能否取得成功，基本上要取決於「商人階級」⁸⁸的干涉。在我黨領導的四個常委中，唯有蔡和森一人基本上對國民黨保持警惕，沒有說過奉承的話，他強調指出在全世界範圍的爭奪中，使不同的軍閥與不同的帝國主義者團結起來的那種聯繫是何等的緊密啊！然而，他的論點在同陳獨秀、毛澤東以及瞿秋白等人的論點交鋒與抗衡中，既不是十分堅定，也沒有深入細緻。

我以批判眼光，有系統地審查了我黨的出版物後，自然就考慮到我們能做些甚麼，特別是我本人能做些甚麼，以便給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十分艱巨、十分急迫的問題，提供解決辦法，而這些解決辦法要比迄

88 毛澤東這篇論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發表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那期《嚮導》報上。

今為止所提出的辦法更適合於我們自己的原則。在我們所能找到的辦法和方案中，自然，首先應向《嚮導》報主編了解情況；由於我能經常性地看到他（這裏指的大概就是蔡和森——譯者）無需事先通知，就能詳細地了解到的。奇怪的是當我去了解時，卻不免大吃一驚：這份週報本是他主持的，他本人也寫過很多文章，卻在不到兩年時間內，仍然成為鼓吹機會主義的輿論工具。可他絲毫也沒有認識到。儘管我保持沉默，但顯然可以看出當他談起這應受譴責的問題時，確是感到痛苦與不安，至於在我這方面，倒認為他這樣說不僅是不合時宜的，而且也是不公正的。

讓過去了的見鬼去吧！讓未來的大放光芒：蔡和森和我兩人不失時機地立即達成一項共同的、完全一致的意見，而且連一個星期也不放過，要按照嚴格的、革命的意義，重新確定我黨的宣傳方針路線，我們將重新振作起來，從根本上改變《嚮導》報的精神面貌，再也不是繼續消極地聽憑國民黨把我們當小僕人那樣來使喚，我們還要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最後使這份週報成為我黨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支柱。但如果沒有得到中國共產黨第一號領袖的同意，或至少得到他的默許情況下，我們又怎能將這決議付之實施呢？當蔡和森把我們討論的詳細內容和意圖告訴了陳獨秀之後，他未說二話。我們知道他給我們開了綠燈了，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卻沒有積極地像我們一樣抱同一觀點。

為義和團恢復名譽，上海大學，五·卅幹部學校

即將到來的9月7日，同20世紀初以來所有各年的9月7日一樣，是中國國恥日。自從帝國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北京，把義和團起義運動淹沒在血泊之中，並把王宮劫掠一空之後，列強還強迫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這一年就是這個條約簽訂第二十三週年。理所當然地我要抓住這個時機，把時代的新氣息刊登在我黨的出版物上。儘管大家對同意支付

天文數字般的賠款，以及對列強於 1901 年 9 月 7 日從清廷手中奪去的新的領土特權的讓與，都表示同聲譴責，並認為是絕對不容許的，但我們各種信仰、各種傾向的反對派卻都一致地、或者仍然一致地指責義和團，力圖擺脫他們的影響，將他們看作是最原始的仇外排外者，或者將他們看作是最粗野的群氓、盜匪。在義和團起義時期，他們就是這樣稱呼起義者，而從那時以來，他們還仍然保留這種稱呼。實際上，他們用來稱呼起義者的這種表達法，從來就不是起義者稱呼自己的表達法，起義者使用的是「義和拳」或「義和團」，意思是為正義與協和而戰鬥的拳師或團員，但他們卻稱呼他們為「拳匪」。陳獨秀本人於 1918 年 11 月 15 日那期《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也曾使用過這個令人刺耳的貶詞「拳匪」，在他看來搗毀樹立在北京的馮·凱特勒（Von Kettler）紀念碑的行為⁸⁹，是「拳匪」煽動起來的。但我認為：長期以來，在最有教養的那部份中國人當中，直到現在為止仍然不斷地用這種論斷加在義和團起義者頭上，這是根本錯誤的，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暴露出、對於這起事件中出現的真正的、唯一的盜匪，也就是說國際帝國主義聯盟代理人，卻表示了令人吃驚的討好和奉承，而對於成千上萬的窮人卻又是不公正到使人深覺憎恨。這些窮人倒頗有勇氣，赤手空拳為保衛自己的國家去同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作戰。按照我的看法，使用「義和團起義」這個詞，就能充份表明這是一次中國北方農村的真正起義、反對外國侵略者，這是一次帶有民族，反帝性質的農民運動。

89 義和團接到清太后慈禧的秘密通知及「降旨」號召，刺殺了德國駐北京大使馮·凱特勒，那是 1900 年 6 月 20 日，德國大使到中國外交部赴會談判。義和團被摧毀之後，馮·凱特勒的紀念碑在北京豎立起來。理所當然，這個紀念碑，對於中國人來說，一直是個奇恥大辱的標誌。1917 年，中國政府官員，以段祺瑞為代表，根據自身利益，作出決定，宣佈對德作戰。1918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市民得知休戰協定簽字的消息，便蜂擁把凱特勒紀念碑砸得粉碎。陳獨秀在 1918 年 11 月 15 日出刊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對此事件作了評論，他堅持自己意見，認定謀殺馮·凱特勒之後，使列強把罪惡的軍事干涉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行為，基本上是由中國人的殘酷野蠻、愚昧無知的傳統劣性而引起的，而義和團（他稱之為「拳匪」）正是這種劣性的集中體現。

我向蔡和森暴露了對此問題的看法。他很快就表示同意，因為他的思想也早已接近這種境界。我向他建議說，把1924年9月3日那期《嚮導》報改為特刊，即（1901年條約簽訂二十三週年特刊）。我們準備在特刊上為義和團起義者進行辯解，反對二十多年來一直使他們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些人們，我們要為他們恢復聲譽，並進而從根本上重新評價義和團起義運動的重大意義。蔡和森同意了。在我們之間取得一致意見之後，決定由我負責寫一篇主要是從歷史意義上來分析的文章。這就是說，我們對特刊的工作有了明確的分工。

但要完成我所承擔的任務之前，時間只剩下不到十天了，無疑，我必須迅速行動起來了，更何況沒有一清二楚地回顧一下歷史事件，或者說沒有細細閱讀過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有關文獻和最低限度的著作，我是不可能很快完成任務的。然而，到哪裏去找這些有關文獻和著作呢？天無絕人之路，剛好碰到了沈澤民，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沈澤民是沈雁冰的弟弟，他建議我到商務印書館去找資料。沈雁冰在這所出版社裏擔任重要職務，事實上，他比誰都更容易接近圖書館文獻。當沈澤民想到要通過他哥哥給我提供幫助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沈雁冰便僱用人拉黃包車，一車一車地把大量書、刊給我送到「三零七」號裏來，這些書刊正是我十分需要的。一開始送來的是珍貴的全套《東方雜誌》，這是由商務印書館按月出版的十分精彩的當代文化雜誌。沈雁冰回去之後，我就毫不遲疑地一頭扎進這奇蹟般的書刊中，一連好幾天，我就埋頭研究；除了快速寫作長篇文章之外，我就沒有外出露面過，文章題為「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

為了要讓讀者了解，19世紀初期義和團起義終於爆發的深刻動機，我在文章中綜合了現有可用的（而且是事實確鑿的）資料，並進行分析19世紀末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性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披着各種各樣的外衣的，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

在中國的北方地區，尤其在中國的南方地區，他們特別大膽做法是披着基督教傳教士的外衣，以法國的天主教傳教士最為明顯，帝國主義的勢力主要是在這種傳教活動中發展起來的。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基督教傳教士們便毫不猶豫地同當地的土豪劣紳勾結起來。從此之後，在雙重壓迫和雙重剝削之下（一方面是遭受傳統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遭受剛從外國來的所謂虔誠基督徒的壓迫和剝削），我國北方各省廣大農村人口，生活越來越貧困，命運越來越悲慘：從自己土地上被趕走的佃農人數、被剝奪了工作的手工業工人人數，從而漂泊流浪的無業游民的人數，年復一年地增加起來。

從土地上被驅逐出來的佃農，被剝奪了工作的手工業工人以及無業游民就成為我國秘密會社的三大組成部份。在 19 世紀末，從長城內外直到長江流域之間，這裏所說的秘密會社，又一次地壯大了他們的人數，這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時秘密會社中的一派，即白蓮教支派，取名為「為正義、協和而戰的戰鬥團」，這個戰鬥團比任何其他秘密會社發展得更加迅速。但因其自身的愚昧落後及其封建環境的加深影響，「為正義、協和而戰的戰鬥團」團員，在實際上不可能比他們的前輩創造出更多、更好、更合適的運動方式來：他們的運動一旦被推上起義的道路，不論在方法上，或在形式上，就只能是老式農民起義的變體；這就是為甚麼滿清王朝及聚集在滿清王朝周圍的統治階級，費不了多大力氣終於能使運動偏離方向，並使之挫敗的主要原因。儘管如此，但從根本上來說，起義一開始，並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就存在着某種新的、完全合法的因素，這就是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真正革命的運動。

我就是採用這種分析方法，在我的文章中把一直沒有引起爭議的、對「義和團起義」現象的傳統解釋，徹底推翻了。當我把文章手稿送給蔡和森時，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觀點。而蔡和森在自己寫的〈義和團與

國民革命》一文中，則採用推理方法進行分析。此後，我們兩人便採取一致態度，對二十多年來大多數中國人所持的所謂進步思想予以揭露，揭露他們有時採取的立場，實際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妥協的立場。更使我們兩感到滿意的是：陳獨秀也站到我們這一邊了。他在我們兩人所寫文章的結尾部份作了評注，並加了標題「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陳獨秀在評注中基本上是這樣解釋的：我們關於義和團所犯的第一個錯誤，是只局限在指出他們思想、行為方式的消極方面（如原始性、封建迷信、瘋狂性等等）；第二個錯誤在於我們斷定他們的起義，事實上是不負責的少數人的起義，這種起義是徒勞無益的，只會再一次使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招致不幸。現在陳獨秀則堅決肯定義和團起義，他認為實際上這是民族革命的悲劇式但又是壯麗的序曲，比任何時候都更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這是不言而喻的，陳獨秀在談到他自己對待義和團事件時，責備了並放棄了六年來他在這同一題材上所發表的一切論述。

《嚮導》報有關「1901年條約簽訂二十三週年」特刊號，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在那些自稱學識淵博的階層中，很快就引起強烈抗議，最明顯的是在北京大學，北大的胡適及其朋友們簡直暴跳如雷地抗議道：「這種荒謬絕倫的叫囂有甚麼意思呢？難道你們想把這件歷史公案翻過來嗎？」其實，在胡適眼裏，「為正義、協和而戰的義和團」，過去是將來也永遠只是「拳匪」，如果把農民運動的英雄稱號、更不必說把農民民族運動的稱號授給他們，那簡直是荒唐可笑了。但另一方面，在幾乎所有中國共產黨人的眼裏，由我提出的、並經蔡和森以及陳獨秀一致同意的這個論證，即有必要為義和團起義恢復聲譽的論證，已躍居為十分明顯的真理地位了。我們有關義和團運動的學說，此後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理論收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此外，我們這個學說的現時價值，就是使我們全體同志得以更好地理解帝國主義，從而更好地去與帝國主

義作鬥爭。

當《嚮導》報「義和團起義」特刊號開始發行和流傳的時候，到處都激發起狂熱的浪潮和陣陣讚揚聲，正當此時，即 1924 年 9 月初，我加入上海組織生活的進程，不僅繼續下去，而且不斷地加速和擴大範圍。當我還在莫斯科時，早已商定，一當我回到中國，就要在上海大學講課，並且作為瞿秋白所領導的社會科學部的成員之一而工作。但不知應開甚麼課程？別人沒有對我說起，我自己也未有定見，因此「上大」有關方面便要我代替瞿秋白的位置，並擔任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教學工作。

我在開始講課之前，照例拜訪上大的創始人于右任校長，他把我迎進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位於一座西方式的小房子裏，鄰近是上大的一排課堂，但與他的辦公室隔開。他穿着寬大的長袍，頭髮散亂，一絡蓬鬆的鬍子，風度灑脫，看起來着實有點浪漫蒂克，如果同他的輕視一切社會習俗，以及他那頗為高雅的書法家素質聯繫起來，使他長期以來贏得了一個名士派頭的雅號，在中國所謂名士就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學士，但總是與中國社會相脫離。不過，古時候的這種人，由於不肯隨俗浮沉，不肯因循守舊，很快就會迫使他成為最堅決的皇室政權的反對者。于右任在日本留學時，第一批加入同盟會，隨後回到中國，在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Le Quotidien du Continent-benidez-dieux）⁹⁰，這是一份反滿族統治的日報，曾於 1907、1908 兩年中對我國同胞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影響可以同孫中山在東京出版的《民報》具有相同的作用。不幸的是，《神州日報》很快出事，遭到破壞，不得不停止繼續出版。到了 1910 年 10 月，當他創辦《民立報》（Journal des droits du peuple）時，《神州日報》終於有了自己的繼承者。《民立報》在 1911 年革命準備時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情況在宋教仁擔任該報主編以後，我已經談

90 「神州」二字，是中國詩歌中的用語，此處用來代表中國。

到過的。

于右任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我也同樣直率而又簡單地跟他談了話。他當然很清楚，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但他毫不在意。他之所以毫不在意，並不是因為他屬於國民黨左派人物中的一員，而只是因為他是一位寬宏大度，精明機智的人。于右任不僅把我作為一個正直的人來接待，而且他認為我還可以在教學上發揮重要作用，以此來提高他創辦的上海大學的聲望。說實話，于右任在性格上是超脫塵世，落拓不羈的。他對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不斷出現的摩擦，不感興趣。人們可能說，這首先是因為 20 世紀 20 年代初，他在上海剛巧碰到的那幾個既有才能、又富理想的知識分子，都是共產黨人，或者是在共產黨勢力影響範圍之內的同情者，因此，于右任一開始不僅信賴他們來照管和確保上海大學以及上大附中的一切教學工作，而且還委託他們來照管全部校務工作，而他自己則主要是負責開闢財源，爭取到更多的辦學資金。

1924 年 9 月間，上海大學分兩個部：社會科學部和文學部。共產黨員瞿秋白原是社會科學部的主持者，那時他長期留在廣州，實際上，瞿秋白只不過是名義上的主持者。文學部的負責人是陳望道，如果說陳望道早已脫離共產黨是確實無誤的，但這也不過是他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若即若離。施存統、安體誠（An Ticheng）和我本人，是社會科學部的三教授，我們分別任教「政治經濟學」、「工人運動史」和「歷史唯物論」，我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文學部的多數教授也同樣是共產黨員。我的朋友、詩人蔣光赤，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即在 1925 年底，也參加進來，壯大了他們的文學部陣營。當共產黨員鄧中夏即將被派往北方去重建鐵路員工工會時，他不再能履行自從他到上大時起便擔任的行政負責人的任務了。但是來接替他的韓菊民（Han Juemin）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年輕畢業生，同樣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如果少了我們這些同志例如董亦湘（Dong Yixiang），他是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書記或編輯，或者像

于右任

歐陽敬修 (Ouyang Jinxiu)，他是四川人，多年來，以陽翰笙⁹¹的筆名，在中國共產主義文學領域裏，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如果少了我們這些同志，還有誰能負責主持上海大學及其附中學生的教學工作呢？

從 1924 年最後幾個月到 1925 年頭幾個月，上海大學設在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陝西北路）的一條弄堂內。從外表上看來，上大校舍是由一排排二層樓的小房子組成，經過整理佈置，使各小房子相互連接起來，勉強組成一個整體，當然，課室還不能說太差。但總的說來，上大校舍是相當簡陋的。但這又有甚麼妨礙呢？上大早已是、而現在仍然是培養我黨黨員和團員主要基地，這批培養出來的黨、團員，在烈火般的革命活動中，他們的表現是那麼忠誠的組織者，那麼優秀的鼓動者，又那麼精幹的領導者，特別是在 1925-1927 中國大革命高潮中，把他們推到了激流滾滾的革命浪巔上去，1925 年 5 月 30 日，當革命爆發不久之後，壓倒多數的「上大」學生，主要的是屬於社會科學部和文學部的學生。他們在我們的關懷下動員起來，正當上海工人區的工會開始像雨後春筍般萌發起來時，「上大」學生起到了工會書記的作用。顯然，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公共租界當局不能容忍上海大學在「他們的」領地上繼續辦學，租界當局下令驅逐上大，迫使它在其他地區尋找新的校址，並迫使它立即遷出公共租界，因此，上大終於在閘北重新安頓下來。

1924 年底，上海大學及其附屬中學，估計約有學生三百人，大多數

91 歐陽敬修即陽翰笙，他在漫長的一生中，寫過散文、小說、戲劇和電影劇本。除此之外，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文學生涯的最盛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為建立左派愛國主義作家統一戰線，作了很多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經成立，他便很自然地成了中國文化界、更精確地說，成了中國文學與電影藝術界的「最高支配者」之一。但到了 60 年代中期時，他強烈不滿毛澤東的一種提法，敢於斷定，根據「合二而一」的原則去建立存在哲學，要遠勝於「一分為二」的原則。正由於這個原因以及某些別的原因，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指控為「階級合作的擁護者」，「投降分子」以及「修正主義叛徒」，還指控他在散文、小說和戲劇方面的作品，幾乎全是「毒草」；也因此，他受到「紅衛兵」的殘酷迫害。毛澤東死後不久，陽翰笙又重新露面，並在鄧小平執政時，他再度成為中國文化界的「最高支配者」之一了。

學生的思想傾向都是十分激進的，可以說，他們幾乎都是左派學生，他們當中有好多人已經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有幾個人是中國共產黨員。1925年時，甚至還在五·卅運動開始之前，我們在學生中吸收新的黨、團員人數，在不斷地擴大。上海大學因為設有這樣的社會科學部，到了1924年底時，就被人們廣泛地看作是革命幹部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培訓學校，在此期間內，上大首先應被看作是革命幹部在軍事上的培訓學校，相當於廣州的黃埔軍校。

《歷史唯物主義》是布哈林的著作，由瞿秋白翻譯，後來他以自己的名義出版。這本《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有系統闡明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教本，那時已有了中文版，我建議我的學生仍須繼續將其作為基本教程來學習。我以這本哲學教程為出發點，並認真嚴格地按照書的內容開始了我的講課。但與此同時，我還在講課中援引了其他一些出色的書籍，例如1923年春至1924年夏，我為莫斯科中國同志小組主持講座時所準備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概念的那套書。當然，我還必須為學生們從這些書中譯出最精彩、最生動、最深刻的篇章。我在講課中的一個特點是，在每一課的最後十分鐘，總要學生向我提出他們希望提出的問題，並力求盡可能完滿地解答他們的問題。然而，學生們通常提出來的總是，與其說是與歷史哲學有關，倒不如說同現實政治更有關。儘管我在上海大學講課時用的化名叫做彭冠南（Peng Guanán）是施存統出的主意，給我取了這個荒唐的假名，因為他當時不願意暴露我原來的真姓名，可後來我卻發現彭南冠（Peng Nánguán）倒是非常奇特有趣的名字，但實際上，學生們幾乎全都知道我就是彭述之⁹²，是他們在《嚮導》

92 「南冠」，Nán代表南，Guan代表冠，南冠即指南方的帽子，冠南則意義反之。這個典故出自古時候的《戰國策》，是寫在竹簡上的古籍，「南冠」用來指命運不幸的戰俘，二千四百或許二千五百年前，這批戰俘經過勝利的遠征時期，帶着北方的蠻族一道來到南方。所有這批戰俘戴的都是非常奇特的帽子，既表明了他們的身份，又表明他們的處境淒涼。

報上讀到過的若干篇引起哄動的文章的作者。

我在上海大學擔任教授，直到 1927 年初止（每次或幾乎每次當我因種種原因而必須中斷時，便由鄭超麟來接替）。在我的學生中，青年男女人數佔總數的大部份，可以說是很多的。從 1924-1925 年，更精確地說，從 1924 年 9 月到 1925 年 2 月（此後，我便生病了），學生人數約計八十，超過了課室所能容納的最大容量，實際上，我所能接納的學生座位僅有六十個。其中有十個學生，由於各種理由長期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高爾博（Gao Erbo）和高爾松（Gao Ersong）是兄弟兩人，他們倆既是積極熱情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又是上海學生聯合會領導小組的成員，正因此，在五·卅運動中充份發揮了頭等重要的作用；林俊（Lin Jun）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男子，是上海路商會的積極組織者，上海路商會是群眾性組織，在五·卅運動中就自然而然地佔據着重要的地位；何秉彝（He Bingyi），一個較為膽怯的小夥子，每當我講課或同全體學生談話時，我總是特別注意他，他是我的最虔誠、最積極活動的學生之一，不幸的是，在五·卅運動那一天，他在南京路上犧牲在英國巡捕的槍彈下，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十多個同年齡的其他中國青年，他們都是因為繼續保留着帝國主義的「統治秩序」而被激怒了的。劉華（Liu Hua），他是我學生中年紀最輕者之一，同時也是我所最喜愛的一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應該是連上大附中還沒有畢業，便來聽我講課，實際上是一種例外（儘管這種例外在別的時候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的），劉華是一個剛強的，品質高尚的共產黨員，不久後成為上海工人運動中最出色的領袖之一，同時也是中共第一批烈士中的一個，關於劉華我還要在下文中更詳細地談到；吳季嚴，是陳獨秀的外甥；他態度嚴肅，常識淵博，20 世紀 20 年代時，他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第一批前驅者之列；楊之華，我認為她已同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Sen Jian Long）離了婚，此時她很可能已是或者將是瞿秋白的妻子；沈志遠（Shen Zhiyuan），

浙江人，1931-1937年時，他是抗日知識分子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王稼祥，安徽人，20年代末，顯然是在莫斯科度過，他搖擺不定終於擺向斯大林主義去，在「江西蘇區」時期，他是「紅色農村根據地」重要領導小組首腦之一，1949年至1951年，他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趙雲（Zhao Yun），就是後來化名為康生⁹³的年輕人，此人沉默寡言，一聲不響，他完全沒有令人好感的方面，彷彿事先就注定他的作風，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享有最陰森可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臭名；等等，等等。在上海大學第一批八十名學生當中，有些人，顯然也是我所重視的，但他們留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其他幾個人那麼確切，那麼深刻，他們以後都怎麼樣了呢？在中國第二次大革命中，大多數都成為卓越的領導人，有些是各省的書記，有些是群眾運動的領袖，他們或者是堅持群眾運動，或者是進一步地推進運動，他們的崇高本質是：不成功，毋寧死。

當我在「上大」開始講課之前不久，或者之後不久，有一次，韓白樺邀請我去參加一個支部大會，一當我走進舉行會議的那個小房間時，我便受到一位年輕婦女的歡迎。她面色蠟黃，體態憔悴，但具有突出的特點，總之，她的外貌文雅，令人可親，在我看來，她必是支部書記：楊之華。這次支部大會集中了十多個人，不少一部份是學生，施存統和韓菊民兩人參加會議，蔡和森也到會了。很顯然，這是經過一段時期的休會停頓後而重新恢復起來的支部會議。在這次支部會議上，各成員只不過是草率地討論了有關日常事務問題，而有意避開討論政治問題。基

93 康生，到了1937-1938年時，他本來是為王明效勞的，轉而為毛澤東效勞了。此後，這個格別烏分子康生，就一直是由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中國秘密警察的頭子。這也就是說，直到1948-1949年止，他是「紅色區域」的特工頭子，隨後就成為全中國的特工頭子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1965-1968），他的行為表現，使他在中國罪惡史上，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特別令人可憎的反面人物。1975年12月16日，他像本世紀其他劊子手一樣，終於去見閻王了。毛澤東死後不久，他聲名狼藉，終於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本上，人們只是來聽取我本人的解答，我根據各支部成員向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作了回答，特別是有關蘇聯問題。當然，當我向他們作解答時，每個人心情激奮，受到感動。在支部會議結束之後，他們知道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上大」支部，陣營比較強大，力量相對雄厚，成員約有十至二十餘人，他們充滿活力，富有朝氣。

在「上大」同事中，與我保持緊密聯繫的是施存統，只因為我們兩人是住在同一座房子裏的。人們當記得，1920年秋天，當我到達上海時，施存統就離開了，我對他幾乎沒有甚麼了解。只有到了今天，我才認識這個人。施存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態度可親，性情溫和，但又是一個正直而坦率的人，他工作起來，勤勤懇懇，甚至不分白天黑夜。通常，在上大上完課之後，他便直接參加《民國日報》社工作，主編該報文化增刊《覺悟》，直到拂曉時，他才回到家裏，這時任務已經完成了，但他仍保持足夠的精力，放高聲學習日語。

施存統的妻子是王一知，那時她很年輕，有意識地愛好打扮，賣弄風情，這是婦女解放初期，出身於上等家庭的中國婦女，普遍具有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好多年來，我們很少在大城市裏能夠見到的，王一知確曾是上海大學學生。但她卻使人感到不勝厭煩。她為了要找我聊天，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藉口。當我在「三零七」號不懈地工作時，她就一邊聊天一邊把我的筆記本和書籍有意地隱藏起來。通常她跟我說話時，總是把她男朋友的照片亮給我，並且對我說，我應當考慮找一個女朋友。

我聽憑王一知在我耳邊喋喋不休，但沒有過多注意她那番友好的無聊話。當然，我也決非鐵石心腸，木頭木腦的；我顯然也希望有一個「女朋友」，說得更明確點，也就是希望有一個女伴侶。但是，除了在我的周圍，我還沒有發現一個真正能使我喜歡的、樂意接受的女朋友之外，真的，時間也不容許我去追求一個女友，因為我已全神貫注在壓倒一切

的大量工作任務上，這些任務，有的是我自己去要求承擔的，有的是我同意承擔的。換句話說，自從我回到上海以後，我在上海過的生活，如同留學莫斯科時過的生活一個樣，彷彿過的是修道士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那時我在莫斯科是懷有一個美好的遠景（應該說就是我今天所處的環境），希望我國形勢，在短期內會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希望有一個直接行動，旨在策動及加速中國革命的新進程。如果從未來幾個月將要發生的事的高度出發來觀察問題，我已感到我沒有太多剩餘精力了。因此，個人的事又何足輕重呢？

小沙渡工人俱樂部

1924年9月底，或10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同志再次邀我去參加會議，並要我與他們共同商討問題。這次，陳獨秀和蔡和森開門見山地要求我提出具體意見，以便重新開展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4年8月底，當中央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在那次會議上，他們同樣邀請我參加討論，說實話，我的意見並沒有超出概括性的泛泛之談的範圍。而現在，好極了，我毋須再躊躇不決，而是具體地回答他們說：「我早已向你們提出過，目前對我們來說，最迫切的事，便是重新開展工人運動。為達此目的，在最短的時期內，我們應在黨中央周圍建立工人運動委員會。」至於談到運動的規模和方式方法時，我就毫不懷疑地說，我將開拓一個遠遠超過我們大家所期望的工人運動。

儘管如此，但這並不等於說，可以不顧任何社會背景就能開展我們的工會運動的；此時，恰好有一家南洋煙草公司，曾在1924年9月初，爆發了一場自發性的工人大罷工，他們打算要結束這場罷工了，一個多月以來，罷工工人不斷地來找我們黨員談心，交換意見，開始是由我本人跟他們談的。應當說，南洋公司發展得很快，從總的來說，這家公司是我國民族資本最大的捲煙製造廠，在上海僱用七千多男女工人，公司

所屬的工廠遍佈在楊樹浦區華德路貨物裝卸碼頭附近地方。由於公司資方採取一系列挑釁性的措施（例如無理解僱兩名女工，野蠻地解散工廠的工人協會等等），罷工就以自發形式開始了。特別當資方買通打手，迫使罷工工人復工時，這次罷工運動便全面展開。罷工進行得非常順利，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事件在反動派報紙上引起一片喧嘩，大肆攻擊，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Le Quotidien du Republicain）也認定有必要推波助瀾，隨聲附和。

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倆，在罷工爆發後不久，便搬到「三零七」號新居裏，此後，我與他們一起，小心謹慎而又積極熱情地關注着並參與到罷工中每一次出現的意外事件中去。為使我們全體同志以及盡可能多的中國人提高警惕性，讓他們真正懂得罷工勝敗的利害關係、正確地評估上海各社會勢力之間關係演變的意義，最後，也為了擺脫國民黨右翼和一般右翼分子所煽動起來的、烏煙瘴氣的宣傳輿論的影響，反擊他們那從來沒有停止過的、對罷工工人的誹謗和污衊，向警予、高君宇（此時高君宇還沒有返回北京），以及我本人便撰寫若干篇慷慨激昂、堅強有力的文章，刊登在1924年9月17日、9月24日和10月1日三期《嚮導》報上。李立三和向警予根據我的緊急動議，立即跟團聚在各自周圍的罷工工人打成一片。他們終於在短時間內把若干罷工工人吸引到「機器業工會」會所裏來，而且人數逐漸地增加。這個「機器業工會」，我在上文中已經談到過。就這樣，在罷工工人和我們之間，相互信任很快地建立起來。那時，罷工工人把我們介紹給他們的領導者，這些罷工領導者在開展集體鬥爭來反對階級敵人，確實還只具有初步的經驗：很明顯，他們會因罷工勝利而充滿着積極進取的精神，但有時，又由於不願意完全聽我們的意見，而顯得進退兩難，猶豫不決。正為此，後來才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協商制度。如果說，這次罷工很快便結束了，而罷工工人並沒有獲得滿意的結局是事實，但下列看法也同樣是事實，

即這次罷工歸根到底是成功的，可以舉出的理由基本上有二，其一，罷工已使上海的資本家深感不安；其二，這次以南洋煙草公司工人組織起來的罷工，已為今後的工會秘密組織做好了準備工作。

然而，現時為了更好地重新開展上海工人運動，並以上海為出發點，把工人運動推廣到全國去，我們應當採取哪些步驟呢？我曾用了好幾天時間對此問題作了反覆思考，依我看來，應當創立一個在我黨中央直接領導下的機構，即創立我黨中央的工人運動委員會，陳獨秀、蔡和森兩人要求我同他們再次討論具體辦法，使黨能從麻木、遲鈍的精神狀態中擺脫出來。但我們還只限於通過李立三的中轉關係，同楊樹浦區這一個同情黨的工人小組，保持某種程度的聯繫，即使最近補充了若干名南洋煙草公司的工人，實際上，這仍然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在我們看來，工運的規模要更大些、更有系統性些。我們應當在工人運動委員會內重新集合具有一定工運經驗的同志，使他們團結一致，全力以赴，不容遲疑地挑起這副擔子。這樣的同志該從哪裏找呢？開始時，我們這裏有三位同志：不言而喻，李立三同志是一位；其次是項英同志，項英同志長期以來，無事可做，閒得發慌，簡直失去了一切聯繫；第三位是李啟漢同志，他在監獄裏蹲了兩年多時間，剛剛恢復自由。

當我提出這些建議時，陳獨秀和蔡和森就迫不及待地要按照我的建議進行，顯然，他們兩人毫無保留地贊同我的方案。此外，他們還要求我，一開始就應是我黨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的一名委員，立即成為具有全權的四工委之一。但對這最後一點，我頗猶豫不決，不能順從他們的要求，我感到肩上的工作任務已經很夠繁重了。我不能不優先考慮我的主要職責，這就是說，我是《嚮導》報的編輯，又是上海大學的教授。我簡直無法想像，從現在起，要佔用我的大部份時間，連同我正在幹的工作停頓下來，而轉到在這偌大的上海市、從這頭到那頭，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地來回跑動……但當陳獨秀向我保證說，他所說的並非這個

意思，並解釋道，他的願望只不過是希望我能在工人運動委員會內，起到顧問性質的作用，顧問當然只限於幫助其他同志制訂出所要完成的工作總方針。由於陳獨秀的執着堅持，我終於同意了。為了方便由李立三、項英、李啟漢和我四人組成的新機構開展工作，我黨中央當時便決定撥出一部份錢，作為工運活動的經費。

要在中國建立現代化工會，建立迄今從未有過的產業工會（那怕只是萌芽式的產業工會），無疑地，這就給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委員會從首次會議開始，便規定一個宏偉的目標。但是，由於受到要盡快地實現組成工會這願望的驅使，我們便研究應在上海的哪一個區作為試點而開始活動，楊樹浦區或是小沙渡區呢？這兩個區的地理位置都屬於公共租界的轄區範圍內。實際上，這兩個區都是上海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李立三、項英、李啟漢與我自己終於選擇了小沙渡。小沙渡區位於上海的西部，這裏的紗織廠完全是由日資控制的。我們在小沙渡區租下一間房子，並要求項英長期住在那裏，這間房子也就成了我們的工會辦公場所。每星期我們在那裏開會一次，制訂或者修訂我們的行動總路線，同時也可解決向我們提出的純屬實際性質的問題。

活動一經開始，李立三、項英以及李啟漢便向我提出，要我詳細介紹我在莫斯科所知道的俄羅斯工人運動，以及西方國家建立產業工會的具體條件等等。我當然盡快地滿足了他們的迫切要求，隨後，我還向他們表示，在此工運開始之際，最好的辦法無疑是總結我們各自對中國工人階級以及中國工人運動的經驗。實際上，最使我感興趣的是詳細總結1922到1923年之間，從零開始、後來又怎樣發展成為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以及京漢鐵路員工大罷工的整個過程及一系列事實。同志們馬上一致同意了。然後一個接一個地，甚或同時地談起他們所經歷過的生活。當他們在談話期間，我不斷地要求他們三位，特別是項英和李立三，盡可能準確地回顧在那兩年半或者三年時間內，他們是在甚麼樣環境條件

下，能夠建立起中國工人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最初聯繫。於是，他們便一點一點地從回憶的搜索中，終於構成一幅完美的畫圖，即他們自始至終參與的一系列罷工活動的情景，並且提供了我們共同的資訊資料，這些資料是十分珍貴的，因為這是他們以及他們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夥伴們自己選擇的方法方式、而創造出來的「工人俱樂部」。上述這個「工人俱樂部」，首先是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鐵路工人中誕生，然後逐漸地擴大到京漢路沿線，隴海路沿線，最後也受到安源煤礦工人的熱烈歡迎。

李啟漢、李立三和項英剛想問我有甚麼意見時，我立即向他們提出我的看法。我建議：「我們要在小沙渡區人口最稠密的地段開辦一所成人夜校」。他們不免感到意外，問道「從哪兒去找夜校教師呢？」我毫不躊躇地回答他們「我們每個人輪流擔任」。當時他們又問：「就算這樣吧，但是我們少不了一個信任可靠的人，這個人要住在夜校裏管理一切，這又要誰去擔任呢？」我向他們表示，請他們放心，因為我已有成竹在胸：我心中的這個人，現在閒着，是隨時可以使用起來的，而且完全有能力勝任這項工作，這個人是我的學生，上文已經提到，他原是「上大附中」學生，到「上大」來聽我講課，他是最年輕學生中的一個，名叫劉華（Liu Hua）。劉華頗有自信，工作認真，而且聰明機智。如果要在他身上找甚麼不足之處，那就是太窮了，我們必須要給他支付一點工資，沒有這點工資，他是無法生活的。我提出的方案，不再引起任何反對意見，就這樣，工人運動委員會便一致通過，並立即付之實施。兩天後，李啟漢（如果不是李立三的話）好不容易在小沙渡最恰當的一隅，找到了一間簡樸的小房子，將其租下來了，並裝配好課桌和課椅。二十四小時之後，劉華便遷到這間房子裏。他每月工資僅 15 元，但正是依靠這份工資才使他不再挨餓了。從 1924 年 10 月中旬起，我們也就圍繞成人夜校開展工作。

我們的學校一經開辦起來，準備招一批學生來上課；開始時，來的都是年幼的學生，而且是真正年幼的學生。事實上，這不僅是我們經驗見識不夠，而且也是不可能在舉手之間就可直接辦成獨特的成人夜校。那時，我們的幾個同志就成了上門勸學的積極分子了。學校的教師劉華自然是他們當中最積極的一位。他們就在小沙渡挨家挨戶地走訪了那些最受剝削的無產階級家庭，並詢問他們是否樂意在我們學校裏免費學文化，或者他們的孩子或弟妹們不願或不能到工廠去做工時是否願意。這樣挨家挨戶地走訪，進行得十分順利，而我們的劉華成了最優秀的教師。我們終於能同學生中的一些父母或兄弟姐妹間建立了關係，這種關係日復一日地發展到更加信任，使我們在這個工人居住區內深受歡迎，彼此間已經融合成為一個整體。從那時起，我們原來目的就有可能達到了，這就是說，一旦上下午的小學生離開學校之後，我們便可在晚上開始組織成人學文化了。不久後，夜校成人學生的人數增加了很多，我們必須按照他們的文化，政治水準的高低，分成若干組。分擔授課的工作，差不多相當及時地在五個人之間分配下來，這五個人便是工人運動委員會的四個委員，加上劉華。但我不得不承認，在五個任課教師中，我的工作比較缺乏規律性、經常性的，因為我還必須從事《嚮導》報和上海大學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中央主辦的這所工人成人夜校，在當時說來還是第一所這樣的夜校，而在上海來說，是件新生事物。意想不到的，這所夜校開辦以來，各項工作的開展還是很不充份的，但開展得很出色，簡直創造了奇蹟。在「五·卅」運動爆發前不久，這所夜校便很快誕生了，我們過去沒有較好的可以培養經得起上海工人運動考驗的幹部人才的地方。然而，我們這些學生，並不是把他們的熱情僅僅局限在學習課本得來的知識，卻是很快地發揮主動性，創造了小沙渡工人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在每個星期天，利用學校場所，把他在區內所能團聚的，或

吸引過來的所有男女工人集中起來，以便暢敘生活中的瑣事細節，交流他們心裏的不同觀點，因而在男女工人之間開始交織成多管道的團結互助聯絡網了。俱樂部能對其產生影響的，姑不說能對其實行領導的工人人數，以及俱樂部能將其吸引過來的工人人數，到 1925 年 1 月底止，約計已達 1 萬多人了，這些工人中的絕大多數，是在日商開辦的紗廠裏做工的。第一次罷工浪潮的主要原動力是 1925 年 2 月間爆發的那次罷工，結果使上海日商的紗廠全部癱瘓了，小沙渡工人俱樂部領導的罷工，同樣是第二次罷工浪潮的主要原動力，這就是 1925 年 5 月的罷工。5 月大罷工的一名工人領袖，從一開始就是最富有戰鬥性的，名叫顧正紅，他是日商（Naiga Weita Keisha）第九紗廠的工人，1925 年 5 月 15 日，由該廠日本工頭所製造的刺殺案，成為 1925 年 5 月 30 日革命爆發的引爆劑。從 1925 年 5 月中旬開始，小沙渡工人俱樂部的影響，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像炸彈那樣地炸開了，在楊樹浦，在閘北，在大上海任何一個無產者集中的地區，點燃了反帝、反資本家的熊熊烈火。這決不是誇張其辭，相反，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小沙渡工人俱樂部已變成重新發動中國工人運動的最強大策源地之一。然而從 1925 年 2 月開始，之所以能形成這樣的局面，應該歸功於誰呢？基本上，應歸功於三個人，他們是李啟漢、劉華和陶景宣（音譯：Tao Jingxuan）。

1920 年 10 月，當我在上海初次結識李啟漢的時候，我立即對他深表好感；我曾不止一次地敬佩和讚賞他的智慧和毅力。在陳為人和袁篤實的支持下，他運用他的智慧和毅力在工人中間進行調查、研究，如果沒有他下了這番功夫，我們的週刊《勞動者》決不可能一直堅持到 1921 年 1 月中旬的。但那時我和他所保持的關係，決不像我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外國語學社裏大多數同學那樣，事實上在那個時期裏，我跟他的這種關係是非常膚淺的。隨後不久，我就把他忘了，因為他本人放棄了到俄羅斯留學的機會。說真的，這回，在僅僅幾個月過程中，由於我作為

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可以頻繁地與他接觸，因而給了我以機會，得以最終對他各方面的個人素質作出我自己的評價。李啟漢，個子雖小但身材堅實，確是一位短小精悍的人，他沉着鎮靜而又充滿活力。凡與他共事過的人，都會對李啟漢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證明他是一位特別值得信賴的人。由於沒有經過為無產階級獻身的必要考驗，他的外貌始終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型的和藹可親、溫文爾雅。他行動迅速，思想敏銳，更恰當地說來，是講求實效的實際主義者，他幹起事來並不大叫大嚷，從不喜歡自吹自擂。但誰曾看得出他會在考驗面前決不退縮呢？這是多麼地令人肅然起敬啊！敵人監獄裏的生活，遠沒有摧毀他的意志，卻給他增添了無窮毅力。他這個湖南人，會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在實際生活中，這是很罕見的例子）。被捕前，他對小沙渡情況，自然是瞭若指掌。現在他又重新回到小沙渡，使他感到非常滿意，事實上，這也正是符合他的願望的。

1925年2月初，李啟漢離開上海，化名李森（音譯：Li Sen）前往廣州和香港，並在那裏積極地開展鬥爭，他生平的卓越聲望，就是在「李森」這個化名下，達到最高點。1925年5月的最初幾天，中國勞動者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森代表好幾個工會組織出席大會，在這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終於建立了中國勞動者全國總工會，而中國共產黨在總工會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李森站在蘇兆征同志一邊大力支持他，蘇兆征是省港反英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這次大罷工於1925年6月中旬在香港爆發，半個多月後，罷工浪潮影響到整個廣州，一直堅持到1926年7月，實際上是堅持了一年多。當省港罷工爆發之後不久，蘇兆征來到廣州，擔任強有力的罷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這個委員會是負責領導罷工的，正在此時，李啟漢／李森接受使命，回到香港去，他的任務是注意及防止有甚麼力量會阻擋罷工的繼續進行。就在這次返回香港的日子裏，李森成為英帝國殖民地裏應外合最受歡迎，最享盛名的工人

領袖。不幸的是，1927年春，國民黨劊子手們卻把他槍殺在廣州（或香港），這情況正如我從廣東負責同志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所讀到的完全一樣。

劉華，是我黨十分年輕的新戰士，他跟我們閱歷豐富的老戰士李啟漢作比較，當然，既沒有他那樣的戰鬥經驗，也沒有他那樣的堅韌體力。但是在他這副虛弱身軀的深處，卻深埋着他那善於思考的才智、鋼鐵般的意志、驚人的工作能力。開始時，我們只要求他完成一般的、並不重要的任務，即要求他在上午和下午兩段時間內，完成一般學校教師的任務便行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他卻把完成任務作為最大的光榮和自豪，這樣，我們就毫不遲疑地，如同他所企求的那樣，把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他了。最後，如果說我們當中有甚麼人最適宜於擔任小沙渡工人俱樂部組織者的話，顯然，最有資格的就是劉華了。他具有很大的耐性，這個特點能使他做一切應該做的事；作為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在青年女工中，終於贏得了最富有感染力的那部份女工的信任和尊敬。與此同時，劉華還表明是一位富有才華的宣傳員，他成功地說服了一大批年長的工人，使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使我們最感到滿意的是，他終於有一天把不可缺少的陶景宣也被吸引過來參加革命。

1925年2月的罷工事件，是第二次使上海日商紗廠癱瘓了。在此期間，劉華不僅是小沙渡區，而且是整個上海市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特別是當整個五卅運動期間，他無疑地成為一位英雄。眾所周知，1925年5月31日，由我們完全控制的上海勞動者總工會已經創建起來了。李立三擔任總工會主席，一方面，這是因為他在小沙渡區是一位知名人士，另一方面，他在那「獨有的活動基地」楊樹浦區，仍然佔據着最有利的地位。而劉華則是自然而然地被推選為總工會副主席。然而，具有同一革命本質的革命家，決不會不引起那些為維持資本—帝國主義「秩序」的最兇惡衛道士們的仇恨。1925年11月底，劉華被公共租界的巡捕逮

捕了，然後就把他引渡給當時駐紮在上海的軍閥——孫傳芳手下的劊子手們。1925年12月17日，劊子手們，沒有經過任何審訊手續，就把劉華槍殺了。

陶景宣 (Tao Jing Xuan) 是紡織工人，當劉華動員他站到我們的旗幟下時，已是四十多歲的人，態度嚴肅，舉止莊重，他祖籍湖北，多年來曾以軍人為職業。陶景宣，有非凡的膽量，而且是一位極有說服力的演說家。他歷來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富有喚起他人感情的天賦能力，這也就是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鼓動家。據說，他曾是某一幫口 (Bangkou) 的首領、或首領之一，即人數很多的上海湖北幫，其中大多數人是收入最微薄的湖北打工者。那麼他本人究竟是不是幫派的成員之一呢？這完全有可能。不應忽視的是，他可以聽任自己在上海各處毫無阻礙地自由通行，而這些地方是由「江湖好漢」或「兵老爺們」所統治的或者可以顯示他們實力的地方。有了這幾張王牌在手，很顯然，他是處於特別有利的位置上，可以在以日商紗廠領頭的、所有小沙渡區紡織工人中，創造一道為革命作準備的、充滿生命力的關係網。如果一旦他接到命令，要他安排人員投入戰鬥，那麼正是這道關係網，他可以認真、積極地利用起來。當「五·卅」運動即將來到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他，從這一工廠到那一工廠，從這個區到那個區，彷彿是馬不停蹄地跑動着，向上海工人發表演說，要他們起來反抗。隨後，人們還可以看到，在將近一年半時間內，他令人最滿意地擔任上海勞動者總工會的糾察隊長。但在1926年10月底，他是我們同志中的第一個，為在上海反對孫傳芳的武裝暴動的失敗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次武裝暴動是不成熟的，是嘗試性的，我們也犯了有關的錯誤，我還將在我的《回憶錄》中的另一章中詳細評述這次事件。

約在1924年10月10日即在小沙渡夜校舉行開學典禮之前不久，我黨江一浙一皖區委，召開一次上海的全體黨員大會。大會是在由我們一

位同志創辦的小學裏舉行，這所小學位於上海北區——虹口，即在橫濱橋附近。出席大會的有：江一浙一皖區委委員、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及商務印書館支部委員、青年團全國領導成員以及我黨在國民黨駐上海機關裏工作的全體同志，此外還有沈玄廬（他只是路經上海，由他一人代表浙江參加），出席大會人數總計約有四十人左右。

江一浙一皖區委書記韓白樺，十分坦率地向我們作了有關黨在上海活動的情況報告。聽完了報告之後，我的體會是，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我從莫斯科回國之後，第一次與韓白樺在私人性質的談話中所談到的那個問題。他在報告中向我們講述得最明顯最突出的事就是：如果我們不能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紮下根來，我們上海的黨，只能是代表着基本上由知識分子和學生組成的組織，因而是規模很小，力量脆弱而且是經不起打擊的組織。當韓白樺結束他的報告之後，接着便開始討論，這次討論會是相當激烈、相當認真的。比之以往令人更樂觀的是，李立三肯定無疑地向我們保證說，他同南洋煙草製造廠的前罷工分子，仍然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因此，他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在不久之後在華德路的工人同志中間，建立起我們的支部，然而，這還僅僅是一道希望的亮光。至於我們為小沙渡工人所創辦的成人夜校，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呢？誰也無法知道。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在竭盡所能去尋求一個較妥的辦法，以便在上海給我們的黨帶來最低限度的生命活力。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掌握鼓舞人心的實例，我們也就不可能找到較妥的辦法。更不幸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在我們上海，猶如在全國範圍內一樣，學生運動並沒有比工人運動更有起色，現時，就學生運動本身來說，正處於低潮時期……。

在散會之前，我們還討論了若干不同的組織問題，特別是關於我可否適宜於擔任江一浙一皖區委委員的問題，進行了辨論。那些主張我擔任區委委員的同志們，便立即斷定說，我應當把大部份精力用在我參與

重建的地區性組織的振興工作上。然而正當他們的建議有取得成功希望的時候，沈玄廬卻以頗富風趣的、生動的方式提出反對，他說：「事實上，這是屬於黨中央一級的事，唯有黨中央才能確定他能否承擔這份責任。無論如何在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對他的問題作出決定之前，任何有關他的決議，都是不能接受的，況且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不久將要舉行了。」

至於我本人，關於參加江一浙一皖區委這件事，好多天來，我的態度一直是猶豫不決的，猶豫不決的理由，是同上文提到的參加黨中央所屬工人運動委員會時一個樣。然而最後我終於抵擋不住這種引誘力，即我要與上海市區的同志們一起，投入到日常鬥爭的戰場中去。這就是為甚麼我毋須作過多的辯白、便接受了他們提出的建議，而且不顧沈玄廬的反對，獲得這次大會絕大多數人的贊同。作為黨中央一名十分積極的成員，我經常要履行應盡的職責，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仍然是江一浙一皖區委中的一名兢兢業業、辛勤工作的委員，一直堅持到 1927 年春天。我從來沒有對自己應做的事，發出任何怨言。反之，正是在這兩年半中，就我來說，是獲益最多，接受教育異常豐富的源泉，說得更確切一點，這就是在 1924 年的最後三個月、1925 年的頭兩個月。

然而，我如何能設想，正當這次選我為江一浙一皖區委的上海共產黨員大會結束的時候，怎麼會在這一年內，這個擁有四十名戰士的小組而且多數人自信不足，卻會在驚人的事件中得到鍛煉和改造？怎麼這個小組居然會成為中國大地上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集中的策源地？怎麼原本是一支搖曳不定的燭光，卻彷彿從天體中散射出星光耀眼的誘人魅力！

第一三章

一個風狂雨驟的秋季，
我們從防禦轉入進攻

為 裝卸槍支、彈藥而發出的鏗鏘聲，為準備戰鬥而陷於一片混亂，接着是停火、關係破裂，又重歸和好，又突然來一個 180 度轉變，相互撲空，這就是由於各派軍閥集團以及國民黨內陰謀派系為爭奪控制權而相互攻擊，而使當時整個中國變成了政治、軍事上戰火紛飛、狼煙四起的悲劇舞台，其狀慘不忍睹，這個時期一共延續了三至四個月，大體上就是 1924 年的秋季。鄉村被燒毀了，城市遭到蹂躪，商店住宅洗劫一空，年富力強的壯丁，一夜之間便從他們的家裏被拉出來，去填補由內戰造成的打着各種牌號部隊的空額，婦女和兒童，則遭到所有部隊野蠻軍人的騷擾和侵犯，到處可以看見的只是一片淒涼景象：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那季節實際上就是無謂犧牲的季節，他們蒙受了一個又一個苦難，卻得不到任何好處，至於工人運動，也像學生運動一樣，都保持着沉默，即使有一些軟弱的抗議表示，也會立即遭到機關槍的掃射而被摧垮了，所有的藉口，無非是為了恢復國家的統一，進行戰爭是必要的。但是，唯有我們共產黨人，照常地動員組織起來，為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事物的發展進程，而且我們也早已掌握着可以對付局勢的手段和辦法。難道這不可能是、也不應當是一個最理想的特殊機會，讓我們共產黨人來重申我們的立場，來表現我們的本色嗎？難道我們不能也不應讓我們來表明我們有能力、以最堅決最積極的態度來干預有關我們國家命運的日常事務嗎？這也正是我在一開始時便談到的，在 1924 年 8 月底和 9 月初，我在三個主要地區，華北、華中、華南亦即北京區、長江口區和廣州區所察覺到的，事態的發展已開始呈現出非凡的、異乎尋常的動盪不安。恰好在此同時，蔡和森和陳獨秀也抱同樣的想法，他們的想法跟我此刻準備要給《嚮導》報注入強大的動力，是不謀而合的。從那以後，接連好幾個星期，在我們三人之間，就分析中國局勢演變，如何確定我們應採取的立場，力求轉變局勢，朝着有利於我們所維護的事業方向發展等問題，定期地、如實地展開了一系列討論。

1924年8月底到12月初，先後有三件大事震撼了全中國。第一件事，即江蘇軍閥反對浙江軍閥的江浙戰爭，這構成了事變的中心環節。第二件事是唯一表現出如此錯綜複雜的所謂廣州商團的「叛亂」，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時發生，也大約是在1924年10月中旬先後結束。第三件事於1924年10月23日由馮玉祥將軍在北京發動的倒戈式政變，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上述兩件事的尾聲，事件的反覆性、多變性使其一直延續到1925年仲春，但實際上，在1924年底，已經基本結束了。不錯，中國共產黨又重新站起來了，而且能夠毫不含糊地對擺在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先鋒隊面前的三大事件中的每一問題，都作出了適當的回答。如果有人說，真正恢復了黨的正確路線，並且能以這樣巧妙的方式去執行這條路線，特別是完全、徹底地動員黨的戰士們鼓起勇氣並取得卓越成效，這首先應歸功於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之間的堅定不移，而又相互信賴與合作，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過份。

1924年8月間，直隸系軍閥集團的兩大首領之一曹錕，控制北京已有一年多，當時政治腐敗、敲詐勒索無奇不有，因而使得曹錕能在華盛頓的庇護和恩賜之下，操縱「國會」，「推選」他為共和國總統以來，也已過去十個月了。屬於同一直隸系，卻由英美兩國操縱的另一軍閥首領是吳佩孚，他控制着幾乎整個華北和華中的一大片土地，包括江蘇省。曹錕與吳佩孚的主要對手，是安福系軍閥的首領段祺瑞，以及奉天系軍閥的首領張作霖。儘管他們兩人，自從1923年夏季以來，一個接一個地被剝奪了行使中央權力的機會，但段祺瑞和張作霖仍然是他們各自領地上的統治者，段祺瑞佔據着安徽和浙江兩省，而張作霖則佔據着東北三省，安福系和奉天系軍閥首領的後台老闆及其金錢和武器的主要供應者是日本人，然而人們認為，「美國佬」之插手中國事務，且其影響日益擴大，已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和不滿。與此同時，在中國西南的邊陲省份，特別是雲南省和四川省，一個勢力較小的軍閥集團，也正在猖狂地崛起，

而法國人認為如有必要，從不放過每一次機會，給這個軍閥集團以或大或小的一臂之助。此外，還有廣東省，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自從1923年初以來，孫中山的政權之所以還能順利地維持他在廣東省的統治，是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給他以支持，但是仍始終存在着隨時有被驅逐出去的危險，因為當地存在着一批人數雖少而手段惡劣的軍閥勢力，不管怎麼說，廣東省確已成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儘管這個根據地的基礎是極端脆弱的……

到了1924年夏末，美英帝國主義與直系軍閥集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勾結起來，在中國橫衝直撞。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在吳佩孚和曹錕的指揮棒下，「重新統一全中國」，這就是說要打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以期盡可能快地把以日本人為保護者的兩派軍閥——安福系與奉天系驅逐出他們的東北三省以及長江口岸上的老巢，並且還要把在蘇俄支持下的孫中山分子——共產黨人的革命軍，趕出他們的廣東根據地。在美國佬的全力支持下，當時英軍和直系軍閥分配了任務，各自執行屬於同一目標的軍事計劃，前者在國民黨右派的卑劣分子和蠢蠢欲動的小軍閥陳炯明的協力合作下，從香港出發，策動一次鎮壓「廣州商團叛亂」的戰役，他們的願望是想利用這次戰役，能在幾個星期內，從孫中山分子和共產黨的革命者手裏奪回廣東省的控制權；而後者，即直系軍閥在長江口地區掀起了江浙戰爭，從而可以更有利地在華北和東北地區，給予勢力更加強大的奉天系軍閥以重重的打擊。

當然，過不了多久，陳獨秀、蔡和森以及我本人便全然理解，並且指出江浙戰爭與所謂鎮壓「廣州商團叛亂」這二者之間，有着緊密聯繫的關鍵所在。特別是我們很快就敏銳地意識到，這兩起精心策劃的聯合進攻所引起的威脅之嚴重性，必將使中國局勢、國民革命根據地以及勞工階級蒙受巨大的影響和損失。從這一系列新的、事實上已經發動起來的內戰中，將可能帶來怎樣的結局呢？如果是此一軍閥集團或彼一軍閥

集團取得全面勝利，那麼是否意味着，中國注定要在兩個或三個強權國家共管的政權下苟延殘喘呢？或者，在比較好的情況下，各軍閥集團之間達成新的妥協，但同樣又由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不可能結束這場永無休止的、自相殘殺的戰鬥，把中國拖到精疲力盡，那麼其結果是否必然是，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少可能擺脫她的半獨立——半殖民地狀態，也就是說擺脫不了自從各列強將中國劃分成幾個「勢力範圍」後的那種狀態呢？

不，不論這三個假設中的任何一個，我們都是堅決不能接受的，因為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一如既往地深信，我國的革命運動，早已是充滿活力地開展起來了，只要我們願意，亦即不怕向廣州以及廣州以外各地人民呼籲支援，便足以挫敗他們，並且足以迫使聯合起來的國內外敵人後退。

齊燮元，是屬於直系軍閥，當時盤據在江蘇省。1924年9月13日，齊燮元下令，要他的部隊進攻浙江省。浙江督軍是盧永祥，屬於安福系軍閥。由於齊燮元的襲擊便點燃了江浙戰爭。這場戰爭一共持續四十天。戰爭是以齊燮元及直系的另一軍閥、福建省統治者孫傳芳的聯軍，以壓倒的優勢擊敗盧永祥而告終。之後，盧永祥避難到日本。而日本佬則作出決定，要張作霖，以防禦為名，於1924年9月中旬，發動他的全部軍隊，襲擊駐紮在東北及華北的吳佩孚部隊。

戰爭剛一爆發，我們三人：陳獨秀、蔡和森和我，在1924年9月10日出版的《嚮導》報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的宣言〉中，便指出這場戰爭的性質和意義。按照我們的看法，直系軍閥發動的戰爭，只能是在中國犯下新的罪行，同時又指出他們是承擔中國人民災難的頭號責任者，因為他們首先在長江口地區發動局部性內戰，人們難以看出這局部性內戰如何才能在短期內不會引發出全面性內戰，至少，不會在大部份遼闊的中國土地上引發出軍閥內戰。然而，我們能否

把避免內戰的一線希望，寄託在直系的對手安福系和奉系軍閥身上呢？不，這顯然是決無可能的。因為這兩派軍閥集團是依賴他們的保護人——日、法帝國主義的，其關係之密切如同直系軍閥之依賴於他們的後台老闆——英美帝國主義一樣的。中國的各派軍閥，毫無例外地都是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傀儡，中國人民不能不把這些不祥而又險惡的敗類，看做是頭號敵人。各派軍閥毫無例外地都必須擊敗、打倒，並消滅之。為了要消滅各派軍閥，我們還必須同時摧毀他們的保護者勢力，為達此目的，唯一可取的辦法，就是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把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走上系統鬥爭道路，以便同舊世界決裂。

江浙戰爭的國際背景，以及在中國已經形成的各軍閥之間全面衝突的局勢，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寫了兩篇論文，先後刊登在1924年9月17日和24日出版的兩期《嚮導》報上。在這兩篇論文中，我着重指出，最近幾年中，帝國主義國家間在遠東所進行的重新結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間在世界範圍內重新結盟的延緩。這就顯示出國際上已有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這全新的局面，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於日爾曼勢力的消失，由於美國的崛起，由於法、英間舊有矛盾的重新出現以及日、美間競爭加劇而迅速形成的。但，我在上面提到的論文中，特別強調指出：各帝國主義國家統治者之間相互敵對的矛盾，如果同團聚在蘇聯以及第三國際周圍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東方各民族間的整體矛盾比較起來，不僅現在而且在將來，越來越只表現出更不重要的意義了。

當重大事件出現時，其有利條件就在於使你有機會考驗你自己，也可以識別你的朋友。人們至少可以承認，我們的合作夥伴，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在中國進入江浙戰爭這一重大事件面前，其所作出的反應，是令人深感不安的。果然，在1924年9月4日和5日，國民黨人就感到必須對這可鄙的軍閥盧永祥備加讚揚，在他抗擊直系強盜的進攻時，把

他封為抵抗運動的英雄，同時還宣佈說，反擊齊燮元的自衛戰，將是發動中國國民革命的前奏，不僅如此，孫中山並不滿足於對安福系提供這種無條件的支援，他還派遣他的兒子孫科，前往東北地區開始與張作霖談判「粵奉」結盟問題，樂意與親法帝國主義的雲南小軍閥唐繼堯進行談判，也並不感到同粵閩邊界的「獨立」小軍閥陳炯明開展對話是件可憎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服他們同自己一起，立即發動向北討閥的北伐戰爭：不言而喻，如果在北伐戰爭中缺少了同這些軍閥的結盟，就不可能在他的統治下，完成全中國的統一。孫中山為之飄飄欲仙的這場美夢，其用心非常明顯，就是要把凡屬直系敵人所有軍閥，都團聚在他自己的周圍，團聚在他的政府和國民黨的周圍。

夢，有可能實現嗎？肯定地說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政治錯誤，這錯誤使陳獨秀、蔡和森和我三人感到非常氣憤，在我們看來，應當毫不客氣地給予公開揭露。就是根據這種精神，我寫了一篇題為「江浙戰爭與國民黨」的文章，刊登在1924年9月24日出版的那期《嚮導》報上。我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抨擊了《民國日報》，我認為該報對軍閥盧永祥表示出來的那種可恥的吹捧，簡直是一種犯罪行為。該報說，他所支持的反直系軍閥集團的戰爭，是一場「正義戰爭」，並且自欺欺人地謊稱，這場反直系軍閥戰爭已經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其次，我也沒有放過孫中山，我譴責他在1924年9月5日發表的有關「江浙戰爭」宣言書中，乾脆隻字不提應對中國新的災難真正負責的幕後策劃者——即帝國主義分子，對於國民黨當權者這種背信棄義行為，我就予以徹底揭露。國民黨在其自身「改組」代表大會的代表面前，曾經許下諾言，今後決不改變黨的鬥爭路線，這就是要在中國結束軍閥統治，同時還要結束外國壓迫者的統治，但為時不到八個月，他們就背信棄義了。我還着重指出，長期以來，國民黨人為了奪取政權，一貫抱着純軍事觀點，現在又重蹈覆轍了。我終於發現國民黨內部，那

些「改組派」、官僚、軍閥以及其他傳統的中國右翼分子，仍然居於優勢地位，這批人幾乎毫不猶豫地以某個大國這樣或那樣的代理人身份出賣自己，以換取額外的權力或金錢。但為了在文章的結束語中要把問題提得婉轉些，我就稍稍克制了自己的情緒：我表示希望，國民黨領導人中的有識之士，儘管他們現在還處於少數派地位，但只要恢復到冷靜思考問題，同時又能保持着真正革命根據地的生命活力和工作熱忱，也許為時還不會太晚，他們還可以成功地把目前氾濫成災的那股有害的逆流重新倒轉過來……

當時陳獨秀，也曾在1924年9月24日和10月1日兩期的《嚮導》報上發表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待國民黨態度，儘管比較要溫和得多，但實際上他同樣要求孫中山放棄把西南和南方的小軍閥重新團聚在他周圍的計劃，要求他從現在起停止策動北伐戰爭，並以更加籠統的方式要求他，防止重新起用各式各樣的可疑政客、蛻化變質的軍官以及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也不能同這批人合作，最後還要求他切不可採用既無可能又不光彩的手法，因為這種手法曾多次導致失敗，而失敗的代價，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都是無法估計的。另一方面，我在題為「我們為甚麼反對國民黨的軍事行動」的文章中（該文刊於1924年10月1日出版的《嚮導》報上）着重指出孫中山的黨所犯下的根本錯誤，這個錯誤他們已在20年前犯過而現在又重犯這個錯誤了。孫中山的黨，最初稱為同盟會，而現在則取名為國民黨，這個組織中的成員及其領導者，不是致力於全面地去識別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不同特點，這些社會階級和階層，實際上包含有中國的以及所有東方各國的人民，這就是工業無產階級、農民、小手工業工人、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以及資產階級中更富有學識、更開明的那一部份人，孫中山的黨寧願經常性地去尋求浮在我們社會上層的那些次要分子的支持和依附，這些人包含有由清朝創建起來的新軍官兵，彙聚在秘密會社內部的城鄉游民和流氓無產階級，辛亥革

命前定居在東南亞、太平洋島嶼上以及美國西海岸的中國商人，以及辛亥革命後「共和國」政權下的政客、新官僚和軍閥。在這樣的形勢下，問題的答案在於：不限於不從正面去同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作鬥爭，不限於在這樣的意圖或那樣的藉口下，作出各式各樣的妥協，例如為了以更好的理由去利用某些糾紛或相互爭吵，以便達到分化國內的敵人，如果採用那種方式很明顯地就要不斷地把財力、人力投入到極端冒險性的、純軍事的戰鬥中去；反之，應當利用自己的優勢去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把他們組織起來，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結束壓迫者、即帝國主義分子和軍閥的統治。一句話，孫中山及其一夥所犯下的重大錯誤，即致命的錯誤，便是用軍事行動去壓倒政治行動、也就是說犯下了本末倒置的錯誤。但奇怪的是，為甚麼到了 1924 年的 9 月，又重犯這個嚴重錯誤呢？當然，我們共產黨人並不一概反對軍事行動，我們只是認為，從本質上來說，軍事行動必須帶有人民群眾起義的性質和形式，如果沒有把人民群眾真正地動員起來，無論如何就不可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換言之，也就不可能帶來真正革命進程中圓滿如意的結局。毫無疑義，國民黨仍然是「改組」前的那副老樣子，絲毫沒有受到制約，在這種情況下，要革命，只有撇開國民黨才能進行下去。不錯，這就是 1924 年 10 月 1 日我在《嚮導》報上所寫的那篇文章中，對國民黨所作評論的實質問題，只是在採用的方式和形式上略加克制而已；在文章的結束部份，我還虔誠地提出願望，希望國民黨能夠盡快作出深刻而又徹底的轉變，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顯而易見，這篇文章不論在國民黨內或在中國共產黨內，都引起了強烈反響。瞿秋白便利用這篇文章作為罪證，當 1927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從一開始就以褻瀆共產國際的威信為名，向我發起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攻擊和控告。

「廣州商團叛亂」事件的主要煽動者，名叫陳廉伯（Chen Lian-

bo)，他是著名的滙豐銀行的高級職員，也是廣東省極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同國民黨右翼頭子們保持着極其密切的聯繫，此外，他本人也是國民黨黨員，是國民黨人中的最後一個同廣東小軍閥陳炯明還保持着一定的聯繫。像國民黨所有的官僚政客和大資產階級分子一樣，他對共產黨人懷有刻骨仇恨，決不能容忍讓共產黨人參加到國民黨內部來。他所擬訂的計劃，千真萬確地是要推翻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政府，為了實現他的計劃，他要依靠城市商人和地位低微的小市民，並把他們的不滿情緒統統集中起來作為自己的資本。1924年夏間，陳廉伯在得到英國朋友的堅決支持下，便着手要把他的計劃付諸實施。他加速動員廣州商人，要求他們建立「民兵」或突擊隊，為大規模的軍事訓練作好準備，期待着可能出現的起義，他還購買大量武器，這些武器是通過沙面小島轉送到他們的手裏，沙面雖然很小，卻是廣州一塊十分有用的土地，長期以來，大英帝國早已把沙面建設為一個主要的基地。廣州政府決不能容忍這種非法運輸、非法買賣長期地持續下去，決定要制止這類行為。1924年8月10日，廣州政府屬下的海關巡邏隊，在海面上攔截了一艘貨船，這艘貨船裝有幾千支步槍和手槍，幾百萬發子彈，預先決定好要運到陳廉伯的「民兵」隊裏使用。這真是一齣可悲的鬧劇！為了迫使廣州政府把所有的步槍、手槍交還給「商團民兵」，廣東資產階級實際上不僅限於宣佈商界總罷市，而且將廣東各地區早已建立起來的「商團民兵」分遣隊，全部向廣州集中，以便同廣州的「商團民兵」一起，拿起武器肩並肩地列隊遊行，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性。更惡劣的是：香港急不可待地利用事態，把水搞混；該殖民政府宣佈說，如有必要，準備派遣炮艦去救援廣州「商團民兵」。

就孫中山本人來說，他確實很不願意向叛亂分子及其幕後策劃的、大英帝國保護人提出的無理要求讓步的。他的願望也是毫不遲緩地反擊他們。但可悲的是：他始終搖擺不定，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右翼分子對他

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常常是頗有成效的。毫無疑問，在利益有關的不同派系之間，這種極其錯綜複雜的交易，從 1924 年 8 月中旬以來就已經開始了。但時間不超過十五天，這筆交易最後達成一項「和解」協議，條件是：廣州政府把 8 月 10 日由海關沒收的裝滿一船的槍支彈藥交還給廣州商團，以換取陳廉伯及其一夥純係形式的認錯道歉，並給廣州政府駐紮在廣州市的部隊，支付一筆數目可觀的軍餉。實際上，所宣佈的這項「和解」協議，不多不少，恰好是一次默不作聲的政變：這場政變授權國民黨右翼軍人以及廣州商團，把孫中山逐出廣州政府，而無需開一槍、打一炮，此外，同樣是靜悄悄地以廣東小軍閥陳炯明來取代孫中山的位置，這肯定得到了廣東資產階級及其更強有力的同盟者大英帝國的積極支持的。從 1924 年 9 月初到 9 月底，種種陰謀、詭計、圈套、陷阱以及投敵叛國的行為，匯成大合奏發揮了作用，好像一把鉗子，夾在廣州政府的脖子上，而且越夾越緊，到了 1924 年 10 月初，以孫中山為核心的國民黨高層分子，為了要走出這個死胡同，確也曾提出過較好的行動計劃。然而，另一方面，在前所未有的真正廣州統治者——國民黨右翼軍人及政客的所謂親切關懷下，卻加強了「商團民兵」的力量。

當廣州的「商團民兵」剛一登場時，《嚮導》報立即斥責它是具有反革命性質的組織，並且強調指出，其中的陰謀恰好是符合英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的。接着，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在《嚮導》報的各欄文章中提出要求，要求廣州政府立即解散「商團民兵」，召回自己的武裝力量，與此同時，還要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的武裝力量，以便能夠對付外國侵略勢力可能挑起的意外事件。在這種意圖主導下，我們特別支援孫中山，使他明白，必須迅速放棄北伐戰爭，必須迅速把以黃埔軍校士官生為首的那支軍隊召回廣州，而且也只有依靠這支軍隊，才能從廣泛結盟中清除掉威脅到他的政府生存的落後叛逆分子，也只有依靠這支軍隊，才能反擊陳炯明，保護自己的生存，這個陳炯明已經調

動他的大量士兵，離開粵閩邊界地區，正向廣州方向移動。最後，我們終於直言不諱地責備國民黨領導人，已經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因而引發了像「商團民兵」那樣的政治危機。他們究竟犯了甚麼致命的錯誤呢？那錯誤就在於：首先是過於倉促地建立廣州政府，並在整整一段時期內，單純依賴一小撮小軍閥的僱傭軍，甚至竟敢相信他們是忠實可靠的；其次，他們放任小軍閥屬下的僱傭軍大肆燒、殺、淫、掠，敲詐勒索，這不能不深深地激怒現時仍集合在陳廉伯突擊隊旗幟下的所有小市民；第三個致命的錯誤是：對英帝國主義分子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軟弱態度；第四，竟然容忍反革命勢力，像果實裏的蛀蟲一樣鑽到廣東省國民黨機構以及政府機構裏面去，霸佔了自上而下各級權力機關。

無可置疑，當時廣東省也存在着革命的左派，左派成員包括有一定數量的工會組織以及工人、農民、學生等聯合會。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青年團員是革命左派的先頭主力。1924年9月7日，正值為肅清義和團運動而簽訂恥辱條約二十三週年，革命左派顯示出足有能力召開一次重大會議，會議期間迫使孫中山政府切斷與廣州商團的聯繫，為達此目的，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因而，就要把8月10日由海關截取而預定交還給商團的槍支彈藥，重新分配給人民。但不幸的是，孫中山的政府對此呼籲，仍然是充耳不聞。廣東革命左派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只有單獨往前走了。革命左派開始創建工人警衛團和農民自衛隊，他們的力量不斷壯大起來，正因此，他們能在1924年10月10日，適值辛亥革命起義已屆十三週年，走上街頭，並要求孫中山及其政府下定決心，繼續進行唯一可行的鬥爭，使中華民族能夠重新獲得獨立。並毫不退讓地為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而鬥爭到底。

然而，走上街頭的一支工農學生隊伍，在繞城遊行時，不期遇上了一隊武裝警察以及處於戰鬥戒備狀態的「商團民兵」。衝突發生了。「商團民兵」和警察開槍射人。他們還把槍口對準工人和學生，一場面對面

的肉搏戰開始了。霎時間，打死了二十多名學生和工人，幾百人被拘捕受拷打。人們再也明顯不過地看清，這是得到了軍事當局的同意，同樣，人們也一致認為，這是以孫中山的政府為掩護而挑起的一場血腥屠殺事件！廣州商團自以為一切都已經得到許可，便在廣州大街鬧市到處巡邏，務必保證新的商界罷市發揮更有效的作用（這種罷市行為，以前早已發動過的）。並在行人最集中的場所張貼佈告，要求孫中山讓位給陳炯明，而這只不過是人民所提心吊膽的、引為警惕而又早已察覺的那場政變的繼續，經過近兩個月的遲疑不決之後，他們為了使政變繼續深化下去，那就必然向國民黨高層進行嚴厲懲罰了。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後，便立即給黃埔軍校的士官生發佈命令，要他們重新回到廣州，並準備出其不意地消滅廣州商團。革命委員會不僅獲得廣東革命左派、廣東人民群眾以及那些害怕在陳炯明嚴格控制下生存的所有人們的一致支持，而且還能把國民黨右翼中某些主要領袖人物，團聚在自己的旗幟之下，這些右翼領袖經過反省，意識到不願在孫中山的統率下繼續活動，因為他當時突然改變主張，要選擇雲南和福建的小軍閥，急想帶頭成立自治省。並且也由於擁有黃埔軍校一批士官生以及廣東警衛團團員與農民自衛隊隊員，他們為了在廣州繼續點燃中國民族革命的火焰，不惜獻出了幾十條生命，就這樣，經過十分艱苦的戰鬥，終於在1924年10月22日成功地摧毀了廣州商團。

蔡和森和我兩人，用不了多久時間，便從廣州政府這一艱難而又苦澀歷史的新插曲中汲取教訓。我們在1924年10月22日那期《嚮導》報上發表了文章，指出應得的教訓。

蔡和森非常密切地注視着「商團」事件危機的進展情況，他從根本上感受到危機的劇變及其曲折性的發展。因此，蔡和森專心致志地進行總結，特別是從政治上來總結，並把視線轉向國民黨領導人，他在回顧中，儘管十分嚴厲地、但確有充足的理由指出，只因為是國民黨領導人，

在週復一週的鬥爭過程中，證明他們完全缺乏決心，因此，對於廣州叛亂本應可以奪取勝利的，但結果，革命支持者卻付出了損失慘重的代價，而一無所獲；他還向國民黨領導人提出警告說，迄今為止他們在兩個重要問題上，仍然是心中無數，飄忽不定：其一是：廣東的反革命基本力量並沒有肅清，有時還聽任其擴大開來；其二是英帝國軍事干涉的威脅，就像達摩利劍一樣，懸在他們的頭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最後，蔡和森以我黨名義，向國民黨領導人提出建議，無論如何，我們應盡快地採取如下措施：首先，暫時不考慮北伐戰爭，在軍事行動方面，當前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立即着手擊退陳炯明部隊的進攻；其次，我們要走到人民群眾中去，不論在廣東省，或在全中國，我們都要在群眾中再一次鼓舞他們的鬥志，發揮他們的沖天幹勁，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宣傳解釋運動，揭示廣州商團的真面目，如果不去消滅商團叛亂，我們有可能犯下的都是策略性的錯誤；第三，嚴厲懲處與反革命勢力串通一氣的各地小軍閥，擊潰並驅散他們的武裝部隊；第四，廢除一切稅收，這些稅收盡是用來填滿廣東右翼勢力的腰包；第五，要在廣東全省，發動一場農民解放運動，與此同時，要孤立反革命的天然代理人——農村中的土豪劣紳。此外，還要不斷地，以最高限度的公開性挫敗帝國主義者的犯罪行為，不斷地揭示他們是在中國領土上製造混亂的始作俑者，是我國動亂局勢的真正的、為首的唆使者，為此，我們也要不斷地呼籲人民群眾起來反對他們；最後，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在廣東重新奪回中國海關的控制權。

所有這些就是對廣州商團叛亂的原因，作出了最深刻的分析。我在1924年10月22日出版的那期《嚮導》報上，力圖突出這些分析，商團叛亂究竟是以甚麼形式出現呢？叛亂事件本身已在預示着不多不少、恰好是法西斯主義新變種的出現：是法西斯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應用，亦即：東方式的法西斯主義。1924年底，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後不久而存在的國家中所適用的那種法西斯主義，是歐洲式的法西斯主義，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現象，而且也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得到的正確印證。毫無疑義，這裏所指的是逐漸衰老、日薄西山的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並因無產階級與其他受剝削的社會階級的革命運動的高漲，而到達恐懼、驚慌和矛盾激化的最高點了⁹⁴。然而，誰也沒有聽說過，有一種反對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的法西斯主義，而這種法西斯主義旨在延長已經陷於窮途末路的帝國主義的統治，當然，這種東方式法西斯主義，只能是通過壓迫民族代理人的操縱，而移植到被壓迫民族社會機體上的一種法西斯主義。不錯，正是這種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社會第一次，以英帝國主義為幕後策劃人，以廣東商團武裝反革命的組織形式而具體化了。這也就是說，1924年秋初，這種東方式法西斯主義是以中國的特殊模式出現的。歐洲或者西方國家的法西斯主義，如同人們所早已認清的，是以很大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以及投靠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階層構成其社會基礎的。而在中國或東方的法西斯主義，則以廣東為其歷史舞台的商團叛亂事件所暴露出來的那樣，一部份與佔支配地位的帝國主義保持着緊密聯繫的資產階級成為它的社會基礎，正因此，人們稱這部份資產階級為買辦資產階級。

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同在香港的大英帝國主子的利益有着深刻而又密切的聯繫，因而在廣州以及廣東省的其他城市，交了好運而且發跡起來了。特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商業資本主義雖然空前地繁榮起來，但其特點仍然是未能超越原始積累

94 1919年春，墨索里尼組建了「黑衫黨」，這是最早的法西斯主義突擊隊。當時，也正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發起組織第三國際的時候。1922年10月底，法西斯進軍羅馬的事件出現了。可以這樣說，當彭述之尚未接到回國命令之前，那時在莫斯科，我們是有充份時間對法西斯現象進行分析的。如果他沒有認識到有關法西斯的理論，沒有認識到20年代初、在蘇維埃國家內，已經進一步對西歐法西斯主義的高漲原因，作出了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的話，彭述之是不可能對廣州商團叛亂事件提出東方式法西斯主義的學說的，該提法可參見1924年10月22日出版的《嚮導》報。

階段，其後果就表現在同其他階級的關係上，這種關係只能是窮兇極惡、貪得無厭地進行剝削的關係。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比較起來，要脆弱得多，而且更經不起打擊，這樣就決定中國資產階級不能不以最殘酷的方式，榨取工人、手工業者和農民的血汗來養活他們自己。因此，工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就不能不向買辦資產階級開展非常強烈的反抗。實際上，廣東的階級鬥爭，已是十分尖銳了，理由是最近幾個月中，在革命左派的推動下，工人和農民運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達到了聲勢浩大的頂點。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短期內，存在着真正的民族革命席捲一切的徵兆，廣東的資產階級及其幕後的英國「合作者」就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了。他們在宣傳戰線上，繼續玩弄和鼓噪所謂有「紅色廣州」以及「共產主義廣東」的幽靈在上空徘徊，他們利用這樣的條件創建了「商團民兵」並在自身周圍重新團聚了一部份小市民、小資產階級者以及各種各樣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尋找職業的人們，此外還有一批僱傭兵，他們隨着各個小軍閥的垮台而被遣散出來的。

然而，在現實基礎上，我們能從這一事實中得出甚麼結論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1）帝國主義者敢於嘗試着要把歐洲鎮壓和制服起來反抗的無產階級的那種方式，應用到正在廣東掀起反抗的東方民族的事件中，帝國主義者已經向我們表明，他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決地干預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如同干預所有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那樣，其罪惡意圖就是要永遠地延續他們的統治權。（2）我們共產黨人應當承認，在各社會階級中，包括資產階級在內，能夠擔負起中國民族革命任務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犯下了分析上的錯誤。誠然，中國資產階級並非全都是買辦階級。但當他們具有買辦性時，當他們在外國列強支援下，以在我國建立法西斯政權為其使命時，我們就應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看作同軍閥集團一樣，具有危害性和危險性，我們應當奮力而起同他們作鬥爭，我們還應當堅定不移地要求，將他們的代表從國民黨的行列中驅逐出去。

(3) 在革命左派關懷下創建起來的工農武裝隊伍，自從投入戰鬥的第一天起，已經實地表明，這支工農武裝隊伍要比孫中山政府更能勝任革命的捍衛者。也只有以這支工農武裝隊伍為基礎，民族革命的未來才有所依靠，才能把革命推向前去，而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也才能保持勝利。

(4) 就國民黨來說，她現在熱衷於把主要精力投到「為時過早的北伐戰爭」的軍事冒險中去，這簡直是天真到把賭注押在法西斯方面去了，因為這樣做，只能大大有利於加強中國南方小軍閥的地位，與此同時，實質上是在廣州和廣東全省創造一個社會經濟局面，把小市民和小商人推向買辦資產階級的懷抱中去。如果國民黨真的想要繼續為解放全中國而努力奮鬥，她就必須斷然地與這種傳統作法決裂。中國民族革命的發展過程，還在不斷地、令人滿意地進行着，這一過程不能不包含有以下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必須通過宣傳和組織去喚醒廣大群眾；第二個階段要訓練群眾，使他們能夠拿起武器去進行武裝鬥爭，以便最後奪取政權。

十分明顯，當我提出這一系列論斷時，我還無法預測到未來甚麼時候，或者就在不久之後，會出現這種帶有預兆性的極其悲慘的局面。但引起我焦急不安的是，我們同國民黨的結盟是不可靠的，搖擺不定的，這仍然是個事實。但使我感到慶幸的是：現時我黨「中央」完全同意我所作出的論斷。因此，1924年夏初以來，特別是1924年秋當國民黨召開兩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時，對我們發動了背信棄義的進攻（我在上文已有敘述），陳獨秀在1924年9月17日出版的那期《嚮導》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題為「我們的回答」，他在文章中有理有節，又能剛強不屈地予以反擊。待到1924年10月29日，亦即摧潰了廣東商團叛亂事件之後兩個星期，陳獨秀又在那期《嚮導》報上，發表他的題為「肅清內部」

(*Nettoyons la Maison*) 的文章，他以我們全黨同志的名義，向孫中山及國民黨內其他比較誠懇的領導人，發出了堅定而又緊迫的警告，肅清國民黨內正在日益擴大其數目的反動分子。要趕在為時未晚的時機之前，

刻不容緩地徹底、全部肅清他們！實際上，1924年秋初，不僅在廣州已經出現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同時在上海、武漢也出現了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他們是以所謂「醒獅」集團為名，糾聚一批人，正面地針對革命運動的戰士們不斷地加強他們的挑釁行為⁹⁵。

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甚至還沒有從江浙戰爭以及廣州商團事件的政治鬥爭中完全擺脫出來時，而1924年10月29日由馮玉祥將軍在北京策動的倒戈政變，又迫使我們不得不投入到新的政治鬥爭中去了。

1924年9月中旬，張作霖的部隊轉而進攻吳佩孚了，當然，這首先是因為張作霖得到了日本主子的大量軍援。但一個多月後，裝備精良和實力雄厚的奉系部隊，在兩軍直接接觸的任何一條戰線上，都沒有戰勝「直系」部隊，特別在接近山海關周圍的更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戰中，張作霖也沒有突破對方的防線。因此，不久後，他便接受直隸集團的一位將軍，向他秘密提出的政治、軍事合作建議，這位將軍便是馮玉祥，他統率的部隊正在前線與奉軍正面對峙。馮玉祥是一個野心勃勃、頗有心計的小軍閥，他自稱已皈依於基督教，通常人們稱他為「基督將軍」。1924年10月19日，這位「基督將軍」以及在他指揮下的以胡景翼（Hu Jingyi）將軍為首的同黨，還有全體官兵突然間停止對奉系作戰，掉轉頭來溜之大吉，像變戲法般地在往南的方向消失了。這就叫做未遇抵抗，輕而易舉地登上了整個北京衛戍司令的寶座，而他的一個同謀者孫越（Sun Yue）將軍成了他的副手。他們剛一掌握大權，便把曹錕逮捕起來，並宣佈說他們已經建立了國民軍，馮玉祥任最高統帥兼第一軍司令。接着，僅需十來天時間，奉軍全線摧潰了直隸部隊；與此同時，並給吳佩

95 1924年10月間，在上海創辦了一份《醒獅》週刊，主要的發起人和鼓動者，名叫曾琦（Zheng Qi），當時，他是聞名的國家主義派，以及極右翼黑手黨秘密組織的首領。這份週刊一向指責孫中山採取聯俄聯共政策，在長江中、下游幾乎所有的大城市裏，煽動組織明顯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突擊隊。上海、武漢兩城市的突擊隊是最具挑釁性的。特別是在武漢，他們明目張膽地向共產黨人發動襲擊。

孚以致命打擊，使其一蹶不振，無法重新站起來了。當馮玉祥宣稱，他這樣做的意圖只在於使中國能從內戰的恐怖中擺脫出來時，另一方面，在他進入北京城的同一天，便邀請所有的政治組織以及與直隸集團為敵的軍閥的主要領導人，前來與他磋商如何盡快地和乎統一中國的道路和辦法。其中有張作霖、段祺瑞，也包括孫中山等人在內。他把希望寄託在段祺瑞身上，祝願他不負眾望地肩負起一項使命，能在短期內組成臨時政府，唯一的前提是在他的任期內實現全國和解。

當出人意料而又聳人聽聞的局勢急轉直下，我們就不能不迅速及時地把真實的原因揭露出來。我們在 1924 年 10 月 29 日出版的《嚮導》報上，把事件真相公開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當曹錕在中國已成為受人鄙視的將軍，而吳佩孚本人也不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時，為甚麼英美帝國主義者能不願意把保護他們自身利益的任務託給這批新人呢？而馮玉祥作為美國基督教新教會的寵兒，在他們的眼中，怎麼能不是這批新人物中最值得信託的人呢？這位「基督將軍」顯然是在美帝國主義的鼓勵下，於 1924 年 10 月 23 日幹下了這場政變的勾當，至於美帝國主義當然需要在中國政壇上擴大其影響，同時也相當小心翼翼地、避開同那不容輕視的日本對手發生正面衝突。但北京城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其實，歸根到底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變化：美帝國主義者要插手干涉中國，曾經利用過吳佩孚，而現時的吳佩孚終於變成被榨乾了的不能再加利用的檸檬，美帝國主義者就把他甩開，起用馮玉祥來代替他，就這層意圖來說，馮玉祥的優點就在於更加馴服，更加聽命於帝國主義者。

由「基督將軍」向中國政界各主要領導人提出的，大吹大擂的「全國和解」建議，從那時起就不能對其抱有幻想。不論為了孫中山本人，或為了我們所有的中國國民革命事業的捍衛者，我們仍然擔心甚至非常擔心，孫中山是否會捆住自己的手腳，落到他們設置的圈套中去。因此，我們毫不遲疑地向他發出危險的警告信號。對我們來說，無疑這是很明

顯的，既然已接受北京之行的邀請，他，孫中山，應在1924年11月10日，即離廣州赴上海之前發出聲明，唯有國民會議才能使中國得以解決她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因此，目前建立起來的中央臨時權力機構，只能是國民會議的籌備會議，應由與直隸軍閥的好戰派為敵的人民團體和政黨代表，以及所有曾經戰勝吳佩孚部隊的軍隊代表組成。

按照我們的初衷，總希望孫中山能在上海多停留幾個星期。但他只從1924年11月17日起，停留到22日為止。由於我們共產黨人的關懷，大部份動員起來的數千名學生和工人，對他的歡迎仍然是十分熱烈的。不錯，我們是盡了自己的能力來歡迎孫中山的；值得慶幸的是：他不再緘默，而要向群眾發出呼籲了；當然，1924年11月17日當他到達上海不久之後，我們便毫無保留地表示熱烈歡迎，他主持了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宣佈說，國民會議應當頒佈法令，廢除具有不平等特點的「奴隸性契約和合同」，把各列強國家從我們手中強奪去的領土，不論是特許的、割讓的或租用的一律歸還中國，廢止准許外國人逃避中國法律追究的領事裁判權，最後要譴責盎格魯—薩克遜人對中國事務的干涉主義。例如廣州商團叛亂事件，便進一步地說明了這種極端惡劣的侵略行為。

事實上，1924年底，上海的政治氣氛特別有利於發動一場強有力的、反帝人民運動的。孫中山已經感受到這種氣氛。而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很快地提請他注意，他們已處於戒備中。當孫中山剛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之後，他們就通過報界宣佈說，他們已經接到命令，認為孫中山在這個大城市逗留過久是很不適宜的。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者干涉中國內政的新的無禮行為，我們理所當然地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不僅如此，我們還採取了進一步措施。1924年11月19日出版的《嚮導》報上，刊出我們的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於時局的主張」，我們的看法如下：（1）所有這些意圖，都同和平統一國家無關，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領土劃分為若干個勢力範圍，這是近一個

月來，在中國境內相互角逐的各軍閥集團頭目及其外國主子們，處心積慮地要實現他們預定的陰謀詭計，因此中國人民必須要倍加警惕。（2）我們應當堅決支持由孫中山在 11 月 10 日於廣州、11 月 17 日於上海所提出的要求，但我們切不可對這種會談的結果抱過多的幻想，過去在華北、各方所舉行的這種會談已經證實了這一點。（3）至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至少包括 13 點要求的請願書，其主要內容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海關關稅權必須完全獨立自主；一切帶有鎮壓性質的法律、條規同樣必須廢止，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立即終止軍閥統治下的政權，軍隊要民主化，採取各項具體措施，大大改善工人、農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條件；在所有社會活動中，男女要按常規都有享受平等的權利；等等。

在我黨的推動下，一個加快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從 1924 年 11 月底開始，已在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等省飛速發展起來。在上海，為發動國民會議運動的一個聯合會已經建成，重新團聚了一百四十三個基層組織，人們可從聯合會宣言中看到，除了專門有關上海市民的要求之外，還公佈了 11 月 19 日〈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的看法〉一文中所表達出來的主要觀點。最後，1924 年 12 月 10 日，我本人對工人階級寄予熱烈期望，希望他們能夠重新動員起來以利於國民會議運動的發展，建議他們在目前首先要實現四大鬥爭目標，這就是：要重建京漢路鐵路員工工會，這個工會已於 1923 年 2 月遭到破壞；要恢復僱用最近被解僱的二千名唐山礦業工人；要杜絕一切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例如與安福系軍閥有勾結的、親日派反工會政客們干涉（交通）工會事務；要把吳佩孚、蕭耀南以及其他直隸系軍閥交付法庭審判，他們在 1923 年 2 月犯下了屠殺鐵路工人的罪行。

然而，1924 年 11 月 24 日自從段祺瑞返回北京之後，為了要建立所謂「中華共和國臨時政府」，華北事態的發展是極不光彩的。段祺瑞匆匆忙忙地宣佈，迄今為止所有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仍然有效之後，便

裝模作樣地表示依靠「善後會議」。這個重建國家政權的善後會議，要向各省的行政和軍事負責人開放，並表示要解決有關重建中央權力機構的所有問題。至於他的臨時「政府」，實際上並非別的，只是由安福系軍閥集團統治華北的一個新的工具而已。

至於此時的孫中山，他費了很長時間要去團結和爭取北京。自從他對日本進行突擊之行後，於1924年12月初到達天津，但是日復一日地過去了，他並沒有甚麼作為。在我們看來，不言而喻段祺瑞先打出再甩掉善後會議這張牌，他的意圖無非是使孫中山置身於既成事實面前，然後誘使他上當受騙。眼看到這個前景，我們自然感到氣憤，要反抗。我們曾不斷地勸阻孫中山不要再指望北京了……他終於在1924年12月31日突然來到北京。但自從到達華北以來，孫中山實際上沒有任何跡象表示他在群眾中起過任何政治影響。他始終執著地保持緘默。他這樣做，是否表明他已身患重病，抑或有別的原因呢？這，我們就無法得知了。

不論情況如何，我們當時憂心如焚，終於請求孫中山盡快公開發表聲明，刻不容緩地向群眾公佈他的計劃和打算，否則就會再度失去他們的信任。這是由我負責傳遞使命。1925年1月7日我在《嚮導》報上發表題為「孫中山先生的態度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獲得他的反響已經太遲了，這就是在1925年3月11日，即孫中山先生逝世的前夕，他以口授汪精衛公佈的舉世轟動的孫文遺囑形式出現⁹⁶。

96 1924年12月4日，當孫中山到達天津時，他已經患病相當嚴重，而同年12月31日，當他到達北京時，病情更加惡化了。1925年1月27日，他只能接受安排，進了北京美國人創辦的醫院，該院醫生不久後便發現，他得的是肝癌病，離死亡之期，已是指日可數了。這也就是說，自從1925年初以來，他實在連話都不能說了。此外，由於段祺瑞為了達到欺騙目的發動一場十分卑鄙可恥的陰謀活動，他在精神上大受挫傷。然而，對於所有這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事實上一無所知……直到1925年3月12日，出人意料之外地「共和國之父」逝世的消息像炸彈一樣地爆炸開來時，我們才有所了解。1925年3月11日由孫中山口授汪精衛而成的那份政治遺囑，全文雖短，但很清楚，我們又從這份遺囑中看到，他特別重申有必要，而且必須盡快地召開真正的中國國民會議。最後，在經過整理補充而成為一份完備的遺囑中，我們看到孫中山所操心的是，要求領導國民黨的那些領袖人物，在他死後，要繼續打聯蘇的牌。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

要解答這個問題，確是十分困難的，但這個問題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最終目的及其革命途徑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為的是使中國共產黨要在根據完全獨立於國民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重新確定她的戰略任務：作為主要任務之一，我一直在不斷地為之思考着，而 1924 年最後一個季度以來，我的政治鬥爭熱情並不因此而有所減低，反之，卻更加地奮發起來。這決不是偏離了理論思考，事實上，現實問題通過千萬條不同途徑，使我能從各種意想不到的因素中吸取養料，並使我越來越迫切地感到追求理論思考問題的必要性。

根據我的建議，於 1924 年 10 月初，即當「雙十節」來臨之際，陳獨秀、蔡和森與我在《嚮導》報上開闢一期專刊，集中討論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為了指出同盟會以及主要國民黨領導人所犯下的原則性錯誤，陳獨秀在該專刊上着重說明，單純借助於「打倒滿族統治」的口號和情緒，已不足以動員所有的革命力量，如沒有這一切革命力量的同時參與，就不可能希望達到目的。張太雷更進一步地肯定，歸根到底辛亥革命對於國民革命只不過具有微不足道的意義罷了！理由很簡單，這次革命對當前的首要目標，即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絲毫沒有提供任何有益的東西。我則着重揭露了共和黨人失敗的社會和經濟的根源，其要點如下：

一、辛亥革命前夕，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顯得格外突出。七十年來，在遭到國際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壓迫，中國的社會基礎連根動搖了，而且成為幾個世紀來，在舊政權統治下，封建生產關係已陷於一片混亂的國家。家庭式的小生產經濟早已沒落了。幾百萬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從他們的土地和小作坊中被逐出來，變成了無業游民，生活飄忽不定。新興的資產階級在中國沿海港口和大城市中不斷湧現出來。這

個新興階級中有相當一部份人深信要刻不容緩地拯救這個國家，走發展資本主義道路，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同一時間內，要使幾乎全體中國公民都抱有這樣的願望：既要衝破帝國主義秩序，又要結束封建主義秩序，這是遠遠超過了中國人民群眾所能承擔的範圍。況且，長期以來，全國的有生力量，同聚集在清王朝周圍並受帝國主義列強保護的傳統的保守階級之間矛盾，已經激化到頂點了。

二、在 20 世紀（1900）到來的那幾年中，中國的形勢，換句話說，革命的客觀形勢，佔據了上風。如果說有甚麼跡象已經暴露出來了，那正好是在 1911 年開始的以反帝反封建為指導方針的三大運動，這三大運動在中國各省同時而又普遍地開展起來。第一，反對清王朝頒佈鐵路「國有化」法令的運動，這個法令的目的，實際上是允許清王朝把這些鐵路的建設權和開發權，讓給外國公司，以此作為交換，可在交易成交之後獲得大批酬金。反對「鐵路國有化」運動在浙江、湖南、廣東以及四川各省所引起的反響特別強烈，這主要是由於有教養、有常識的知名人士寫文章、發表演說而培養起來的，這些知名人士恰好代表了早期中國資產階級的願望。第二，提出要把在外國公司繼續控制下所開採的煤礦、鐵礦等，收歸中國人自辦的運動。這運動主要是在直隸（河北）、山東、雲南等省所起的作用最大，運動的領導者是與第一個運動的領導者一樣，也是各省的知名人士。第三，在農村中，掀起一場抗繳國家徵收苛捐雜稅運動，數十萬農民、手工業者將反對當地小城鎮的政府官吏鬥爭進行到底。

三、以反帝反封建為指導方針的這三大運動，是完全適合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深遠要求的。然而，同盟會的領導人既不理解運動的意義，也不理解它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就不會去力求領導運動，也不會把運動的力量統一起來。客觀上革命形勢成熟了，已是十分明顯的，但主觀上革命黨的不成熟也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我們應當如何來解釋革命黨的不成熟呢？如何解釋毫無能力去識別真正的革命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

主義，因而總是從一個極端，即採取軍事行動的冒險路線，到另一個極端，即與敵人妥協的機會主義路線之間搖擺不定呢？我們應當從革命黨的社會組成加以分析，其組成成份既是混雜不堪，又是與社會脫節的。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在同盟會的組織內部，除了知識分子外，還有商人以及團結在共和思想周圍的官吏，這批人恰好迎合了大量的海外華僑的心意，此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社會殘渣，他們恢復了秘密會社，卻沒有明確的目標。

1924年10月中旬，在「三零七」號舉行一次工作會議，結束第二階段的最後工作，蔡和森即將離開我們，要忙於他自己的事務。此後，我只有和陳獨秀在一起了。我心想，當他還沒有急於離開之前，向他說明我所想到的有關中國革命階級路線問題，並同他徹底討論一次，這應是個好機會，否則就沒有機會同他討論了。我對他講述了我曾讀過他以前所寫的全部文章，特別是讀過了他於1923年12月在《前鋒》上所寫的那篇文章〈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我坦率地告訴他，我未能全部同意他的論點，我認為他過高估計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而過低估計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此外，我又告訴他，如果根據他的思想方法去進行中國國民革命，我們莫斯科同志也是不會信服的……因此，我建議他把這個問題重新擺到會議桌上來討論。

當我以比較突然而又嚴肅的態度，向他提出這個建議時，他有點局促不安，他先是紅了臉，接着便自我辯護並進行解釋。但當我們的討論越加深入下去時，他似乎越加緊張起來。我向他指出這些錯誤，是深懷着對他的敬意，絲毫沒有刺激他或使他生氣的意思，然而我的意圖，在於最終能夠在他與我之間就這個問題展開一次真心誠意的對話，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決不能把我心裏所想的話，對他有所保留。

不過，我感覺到他並不願意與我對話；然而我又仔細觀察他，他倒

非常認真地聽取我的理由分析。

好幾天過去了，陳獨秀、蔡和森通知我說，他們希望我負責完成將於1924年12月出版的那期《新青年》雜誌。我又怎能拒絕呢？瞿秋白長期來一直沒有決定何時回到上海，這就必須有一個人去代替他，擔任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的主編工作。

預定由我主編的這期雜誌的主題是：「國民革命」，我務須加速編輯步伐，使其不負眾望，我還得到鄭超麟、蔣光赤、李宗武（Li Zhongwu）和任弼時的幫助，他們四人是當年秋天從莫斯科歸國的，我估計可以在所需的期限內出版，我在論文中就中國革命的發展及其成功的條件，毫不掩飾地發表我的意見，而我的意見與我黨中央直到現在還佔着優勢的意見是迥然不同的。

然而，我是否能在《新青年》雜誌中，按照中共中央的正式論點提出批評呢？這些論點在好幾個月來已由陳獨秀、瞿秋白以及毛澤東充份表達出來了。我所要解決的……這個問題是十分棘手，而且也是十分微妙的，我決定只局限在積極地把我自己的理論有系統地提出來，而力求避免一切論戰，而且也不指名道姓地指責我的同志。實際上，《新青年》並非內部刊物；而是一份相當大型的公開雜誌。

我那篇文章的標題是：「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根據我的意見，這只能作以下的理解：「在中國，是那一個社會階級有能力把國民革命進行到底」？實際上，我在上述文章中恰如其份地全面分析了今日中國各社會階級的情況，毫無疑義，我把主要目標針對各階級中最富有活力的兩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我緊密聯繫階級本質，作了如下分析：資產階級只能是中途而廢。實質上，中國資產階級可分為三個部份：金融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異常明顯的是，由於這三部份資產階級，毫無共同點，因此他們之間經常性地存在着利益的衝突。

金融資產階級是以銀行系統和企業系統作為基礎的，他與帝國主義以及國家官僚的相互勾結極其密切，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就其本性來說，這部份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絲毫用不着懷疑了。

商業資產階級，基本上是由兩個各不相同的集團組成：其一是買辦資產階級，他成為反革命陣營中的急先鋒（如同最近一次突然爆發出的事件廣州商團叛變，就足以顯示出它的本性一樣）；其二是國內市場大亨、或稱土著（Tuzhu）商業資產階級，據說他們還帶有民族利益感。但據我觀察，如果要想在這兩個集團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來，一般是難以相信的。買辦資產階級，是外國資本的強有力代理人，是把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特殊產物，實際上，這些人在中國起到了很大的影響，而且是頗有權勢的人，他們會使國內市場的「土著」商業資產階級處於從屬地位。因此，土著商業資產階級，除了有名無實的身份或偶然有之的名稱之外，是不可能具有民族利益感。

工業資產階級，基本上是由其自身形成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部份，我們將其看成為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這是正確的，也是合理的。此外，工業資產階級的企業，還須同受外國資本控制的、國家資本控制的企業，進行劇烈的競爭；他們力求要實現的成果，經常遭到內戰、不斷增加的盜匪行為和政府官僚敲詐勒索行為的破壞和損害，他們不能不敏銳地感覺到要終止帝國主義控制以及軍閥體制的必要性，不能不希望重新獲得民族獨立。與此同時，要在中國創立西方式的政治民主體制。不幸的是，工業資產階級在中國政治經濟競技場上所處的地位，遠不如金融資產階級和商業資產階級所處地位那樣的重要；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天平上，工業資產階級所創辦的實業、工廠，若同外國公司以及國家官僚資本所控制的實業、工廠作對比，畢竟在天平這一端的砝碼就顯得太沒有份量了。中國工業資產階級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太晚了，脆弱不堪，處於不利的國際環境中，又被它身後隱現着的、也是剛剛誕生的年輕無產階級幽靈所

嚇住，因此將其折磨得胸襟狹窄，目光短淺，畏首畏尾，在這大規模的激烈政治鬥爭中，工業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起過生機勃勃的政治作用。

總的說來，從最有利的方面來考察，中國資產階級看來是完全沒有能力來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若從不利方面來考察，同樣地，更沒有資格參加領導了。

從全國經濟發展仍處於低級階段的事實出發，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還是相當的微弱，按照嚴格的意義來說，屬於現代工業的我國男女工人總數，沒有超過 160 萬至 180 萬人。當然，人數是不多的。但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又是夠多了，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也並不突出。

另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的組成，不僅包括了受中小型企業內部的中國私人資本盤剝的勞動工人，而且同樣還包括着受大型與更大型企業內部的國家資本與外國資本盤剝的勞動工人，屬於這後一部份的勞動者，幾乎包括全體海運工人、內河航運工人、鐵路工人、城市交通運輸工人、造船工人和礦工等等；毫無疑問，就是這批產業工人是最有力量的、最有機遇的，並且有決心樂於擔負起團聚一切反帝反封建勢力的領導人角色，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經常地、或者直接處於外國侵略者的壓迫之下，或者直接處於國內軍閥的壓迫之下，或者同時兼而有之。正是由於這批產業工人高昂的戰鬥性，現實的革命警惕性，從 1922 到 1923 年，香港的海員罷工、唐山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京漢路鐵路員工的英勇鬥爭，豈不都提供了無法辯駁的證明嗎？

中國工人的精神狀態，仍然深深地打上封建社會的烙印，仍然背負着在經濟上、文化水準上相當落後的大包袱，這是不容否認的。這樣看來，中國工人豈不是與絕大多數的中國同胞遭受到相同的命運了嗎？我不同意用這種一成不變的、宿命論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工人階級的未來，並且深信他們將重新投入到革命戰鬥的熱潮中去，必須擺脫一切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束縛。我更加深信，他們不論意識到與否，在俄國十月革命的鼓

勵下，已經建成階級陣線，在世界範圍內，重新團聚西方和日本的被剝削階級、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去戰勝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同樣，毋須多說，中國工人在不斷增長的世界革命浪潮中早已得到支持、受到推動。

一句話，根據所有這些不利和有利的方面來考察，經過俄國蘇維埃勝利七年之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唯一有資格的階級，只能是無產階級。

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外，其他階級、階層如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人、知識分子以及游民無產者，無疑地，要把他們吸引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來，使他們發揮作用。然而，他們之中任一階級或階層肯定是不能擔當原動力的作用的。

在所有中國各社會階級中，農民是最受剝削者，而且被壓迫得最淒慘，同時在人數上也是最眾多的。他們蘊藏着巨大的革命潛力，然而，如果沒有把他們發動起來，他們就不可能夢想去驅逐帝國主義，粉碎軍閥的勢力，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極端落後，不可能將他們上升為獨立自主的革命原動力，這也同樣是不言而喻的。為了充份發揮農民的力量和作用，這就必須緊密地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置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不久後，在我們眼前出現的，難道不正是這樣一個前景嗎？工人與農民肩並肩地站在一起，去反對湖南的軍閥趙恒惕（Zhao Hengti）以及廣東的軍閥陳炯明⁹⁷。

97 自 1911 年秋直到 1924 年末，先後統治湖南的軍人有：譚延闓，自稱「共和黨人」，自 1911 年秋到 1913 年秋；湯薌銘（Tang Xiangming），係袁世凱的走卒，自 1913 年秋到 1916 年夏；自 1916 年夏至 1918 年春，譚延闓再度統治湖南；張敬堯（Zhang Jingyao）係吳佩孚的心腹，自 1918 年春到 1920 年春，譚延闓三度統治湖南的期間很短自 1920 年春至 1920 年秋；自 1920 年秋起直到 1924 年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自治主義者」統治了湖南。

然而，這個趙恒惕所最關心的是要把他所統治的湖南省，建成自己的獨立王國。到了 1923 年底，顯然，趙恒惕「獨立王國」夢被粉碎了，因為從 1923 年初開始，以共產黨工人和學生首創的第一批農民協會已經在衡州（Heng Zhou）地區成立了。

這批農民協會儘管在 1924 年，已不復像 1923 年那樣，但仍然存在。事實證明，他們在反對趙恒惕的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戰鬥性，與廣東海陸豐農民協會反對陳炯明時一樣地英勇。無論如何，這在彭述之看來，都是很有希望的。

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由於遭到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的過重壓榨，已經失去了自我意識的能力，更不必說能像無產階級那樣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經驗一再表明，在鬥爭的關鍵時刻，他們能成為無產階級最可貴、最親密的同盟軍。中國知識分子，由於喪失掉穩定的經濟基礎，按階級真正意義來說，不是一個社會階級，而是社會階層，通常他們為資產階級服務，或者任憑資產階級的擺佈。在現時的中國，人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深受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集團的羞辱、折磨和壓迫，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傾向急進主義的。顯而易見，這種急進主義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蒙上了一層較為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而不是現實主義的。然而，如果有了唯有工人階級才能推動革命去拯救全中國這種思想照耀，難道還不足以淡化這種浪漫主義色彩嗎？

游民無產者或流浪無產階級，與苦力勞動者截然不同，苦力勞動者是可以與工人階級聯繫起來的，因為他們確是構成工人階級的後援部隊；而游民無產者只是搖擺不定的一個社會階層。這個階層絲毫沒有明確固定階級意識，其社會底層基礎，除了他們自身之外，既不是也不可能有團結一致的。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一定的時期內，游民無產者中或多或少有一部份人，可能被吸引來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但一刻也不能忘記或者忽視他們當中的極大部份人，通常總是傾向於、沉溺於僱傭觀點或土匪主義，事實上，他們是為帝國主義和軍閥謀求更大利益服務的。

現在，還存在着一個嚴肅問題：「如果說，根據客觀形勢的特殊性應當承認，今天唯有工人階級才能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亦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麼，難道不應當同時承認，當工人階級領導整個革命過程而又不把這革命轉變成他們自己真正的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豈不是非常荒唐嗎？」由於從未聽說過有關不斷革命的學說，我對此問題作出了否定的答覆，我是以下列方式進行解釋的：中國工人階級當前

最可怕的政治敵手，並非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帝國主義分子以及中國封建式的最大唯利是圖者：中國工人階級也只有這樣條件下，即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成功地把中國其他的各社會階級，團聚在自己的周圍，因為這些社會階級現時仍以帝國主義分子以及中國封建式的最大唯利是圖者作為他們最可怕的政治敵手：當然，不應忽略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僅僅代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第一個階段，而工人階級已被歷史召喚出來領導這一階段的革命，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則應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第二個階段；然而，工人階級同時還應當認識到，要把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階段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進行到底，如果試圖強行把運動推向前去，那就只能過早地導致把一些社會階級和階層投向反革命陣營中去，因為這些階級和階層尚未具有走向較高一級革命的可能性，從而會阻擋了應由他們領導的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

當時我思想上只保留着俄羅斯的情況，即列寧曾在 1907 年宣告說：無產階級應以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為第一階段的任務，取得領導權之後，由於面對的是專制政權的幫兇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叛徒，他們不僅要團聚小資產階級分子，而且還要團聚農民在自己的周圍。不錯，這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是，如列寧所宣告的同樣論述，即便過了十七年之後，只要將其運用到中國的情況上來，再也沒有比這更具有現實性了。不錯，給我留下更強烈的印象是：20 世紀初期的俄國形勢，同今天的中國形勢之間作一對比，何其相似！正是經過一番回憶之後，我才在文章中提出最後一個論點，即「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文章到此結束，全文篇幅不少於一萬字。

我剛把文章寫就之後，不管怎樣便把原稿交給了獨秀。當然，我預計決不會合獨秀的口味，因為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之間，還有相當距離，儘管如此，由於我仍然希望他能向我的觀點邁進一兩步，我總是懷着不

安心情，急想知道他的確切反應。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得不到獨秀的隻言片語。令人奇怪的是三天、四天、五天都過去了，仍然沒有獨秀的反應，甚至連一點跡象都沒有。實際上，這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最後，當一週結束時，他終於給我答覆來了，但用甚麼形式答覆呢？他交給我一疊稿紙，寫滿了他自己的手跡，這是一篇長文章，他要求我在發表我的文章同時，也發表他的文章，他既沒有給我提出任何說明，也沒有任何評注。

但確實令我驚奇的是，當我掃一眼他的長文章，其標題是「二十七年以來中國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這就不能不使我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怎麼不使我感到驚訝呢！當他進行了一番冷靜的、客觀的而且是十分出色的分析研究之後，即關於百日維新、義和團起義、辛亥革命以及他本人在其中發揮卓越作用的五四運動等經驗分析研究之後，他終於強調指出：所有這些維新、起義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最有力的理由在於領導權掌握在社會的中間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手中來進行，而在這個時期內，無產階級尚未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足以跑到歷史舞台的前沿，更慶幸的是，獨秀在文章中引證了最近三年來的所有鬥爭或主要鬥爭、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他終於得出結論說，儘管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但這個新的社會階級已經上升到成為傑出的革命階級了，也唯有這個階級才能真正推倒帝國主義勢力，也唯有這個階級才有可能去推動其他社會勢力、去完成清算舊秩序的革命事業，並在不停頓的鬥爭道路上去解放全中國人民！

此時，獨秀看待事物的方法，與我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了，我當然欣喜若狂……但同時也不能不有點驚異。那又如何才能解釋獨秀如此迅速、全面地轉變他的態度呢？這只能歸因於獨秀性格上的特點。

獨秀具有光彩奪目的智慧和高度的敏感性，他經常高瞻遠矚、聞得出新生事物的芳香；不錯，當他周圍身任要職的同志們還絲毫沒有任何

感知之前，他已經盡早地預見到甚麼了。當然，他性格上的這個特點，確是罕見的，而且也是他取得成就的最可貴的特點。舉例來說：1915年9月間，正是袁世凱處於權力之巔的時刻，彷彿中國就要長期地陷入到黑夜中去，但獨秀為了向世人宣告中國定能擺脫黑暗，敢於創辦了《新青年》雜誌：事實證明，這份雜誌很快就成為我國空前未有的、掀起愛國熱情和精神復興高潮的最出色先鋒。這就是「五四運動」。另一個例子是對於十月革命的態度，在最初時期，獨秀與「五四」運動中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與其說是同情的因素多，毋寧說是懷疑的因素多；然而，不久後，他一經讀到了李大釗於1918年10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後，就足以使他發現，十月革命無疑地會給人類帶來美好的前途，當他以驚人速度掌握了部份的、非系統的有關馬克思及其後繼者的思想資料以及有關蘇維埃國家所發生的變化之後，他隨即就能吸收、接受我們時代最先進思想，並成為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傑出的宣傳家之一。

陳獨秀所特有的這種對事物的快速領會，不幸也有其反面，那就是缺乏思考的深刻性，難以把邏輯本質推到底，也就是過份的隨意處理。像任何獎章都有兩面一樣，他的高度敏感性，光彩奪目的智慧也有其反面。這便可以用來解釋，在他的政治途程中，多少出現過一些迂迴曲折的特點。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剛剛萌發的時期，在他與維金斯基（G·Voitinsky）經常來往的時期，他領會到十月革命精神，喚起了革命激情，他就以這種革命精神和激情，投入到第三國際的活動中去，學習以更深刻思想和方法為特徵之列寧工作作風，陳獨秀在兩個時期內已經顯示出完成政治任務的高度了。隨後不久，他能頂得住馬林施加給他的壓力，馬林是共產國際的代言人，他錯誤地要說服獨秀重新回到國共兩黨合作的組織路線上來，但是，在他向馬林做出讓步之後的幾個月時間內，他常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不久後，又一直走到承認資產階級的作

用，認為國民黨在中國國民革命中具有主要的原動力作用。此時，他還頗受瞿秋白的影響，視瞿秋白為無可匹敵的理論家，一個才華熠熠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正是這位才華熠熠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拋棄了陳獨秀。

自我從莫斯科歸國之後，獨秀跟我討論有關理論問題的機會，儘管不是很多，但他還能夠聽取我的意見，特別當我在閱讀甚麼資料時，他就更加細心傾聽了，我現在還可以舉出證據、確認我的觀點畢竟是切合適宜的。同時，他甚至向我表明，他完全肯定，他之所以反駁或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並不是因為對這些人懷有仇恨，儘管這些人以相當嚴厲的口吻來批判他的意見，而是只有經過反覆思考之後，當他認為完全可以接受時，才站到他們的意見一邊。

當然，我應當細細思考一下，如果一個人輕易地向我表示，他要放棄整整一個時期內曾為之維護的、卻沒有任何根據的意見時，這個人能否表現出堅定立場來支持他曾採取過的、完全有根據的意見呢？過了很久很久以後，獨秀有一次突然心血來潮、打趣地對我說：「當我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時，我無法做到堅持不放，一抓到底；但當我掌握的是錯誤思想時，我常常力圖把這錯誤思想推向比誰都更遠。」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肯定無疑地證明他在這方面是有自知之明，頭腦十分清醒的。然而，獨秀在個性上存在着的這消極一面，我遠沒有去提醒他，甚至到了1924年底，也沒有加以絲毫懷疑。那時，我所觀察到的，他給我特別迷人之處，就是他同蔡和森、我本人以及上海其他同志們所具有的共同膽識相比較，陳獨秀卻能一個勁地幹他要幹的事，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儘管他比我們年長十到十五歲，他的生命活力，工作熱忱卻遠遠地超過了我們。

以國民革命為中心的《新青年》特刊上，除了發表獨秀的文章之外，還發表了維金斯基撰寫的文章，即關於廣州商團叛亂危機，特別是對孫中山政府帶來的危機。有鄭超麟的〈論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方式〉，

瞿秋白的〈論土耳其革命〉、莫雲（Mo Yun）的〈台灣人民反帝意識的覺醒〉，任卓宣從巴黎寄來的一封信，即關於在倫敦召開的國際聯盟會議，還有蔣光赤、任弼時、李宗武、鄭超麟從俄文轉譯過來的文件，這些檔包括有：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論殖民地問題〉，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有尚未公開發表的列寧有關中國問題的原稿（其中一篇關於義和團戰爭，另三篇關於辛亥革命及其前瞻），此外，還有托洛茨基於1924年3月在東方大學所作的報告。這篇報告全文我在會議現場已經聽到過的。換言之，這期《新青年》專刊的發行，多少帶來爆炸性作用，從那時起，便引起了轟動一時的反響，這就用不着驚奇了。

在黨內引起的反響，應該說贊同的意見遠遠地超過了反對的意見。《新青年》專刊發行後不久，我便接到不少同志們的賀信，其中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來自張國燾的信，信雖短，卻充滿了頌揚之詞，那時張國燾剛從監獄出來，經常住在北方，更使我感到高興的，我接到一封來自吳（Wu）同志的信，他1920-1922年間屬於劉少奇「七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不論在上海或在莫斯科，我均對他懷有很大好感。吳同志的信實際上是從安源寄出的，他長期來一直擔任礦工工會的領導人之一；他在信中要我相信，凡讀過《新青年》專刊的所有礦工同志們，都跟他一樣，對我的文章〈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和興奮，他還要我相信，當他們讀了文章之後，真正的感到寬慰，他們再也不懷疑，我黨「中央」制定的戰略政策的正確性了。

同樣地，在莫斯科或在東方大學，我們的中國同志當中，不論是我讓他們留在那兒的，或在我離開之後便動身回國的，都一致贊同我1924年12月在《新青年》特刊上提出的我所維護的學說，他們一致認定，這是以最佳的方式符合了當前的迫切需要，即對當前局勢做出真正馬克思

主義的分析。不過，我只在幾個月以後才了解到這一情況。

但最使我感到滿意的是，從此時起，我們已重新找到了正確的方向。1924年12月《新青年》特刊，無疑地標誌着，我黨在國民革命中有關階級領導問題的立場做出了急劇的轉變，最後有可能使我黨的政治路線也同樣地做出了急劇的轉變；這就是不久之後決定召開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

第一四章

敲響警鐘的第四次 黨代表大會

當以國民革命為中心的《新青年》特刊出版之後不久，陳獨秀、蔡和森和我，便進入積極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階段，最後確定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為 1925 年 1 月 25 日（譯者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是 1 月 11 日至 22 日召開的），為了總結四至五個月以來所完成的工作，我們認為可以載入黨的史冊的，是在三個領域內取得了進展：在小沙渡區，我們已經在工人隊伍中立定了腳跟；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雙重壓迫，以及在同國民黨的關係方面，我們已從防禦性策略轉而採取進攻性策略；經過嚴格分析並在摒棄原有立場的基礎上，我們重新認識到，要在我國進行國民革命，領導權只能是交託給無產階級。然而，在另一個領域或第四個領域內，這就是組織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過去我們的組織既沒有快速發展，也沒有廣泛深入，我們此時也沒有把這種傾向真正地撥正過來，因此，留待我們要完成的任務還是很多很多的。

直到 1924 年深秋時節，我們在上海的共產黨人，仍然沒有掌握足夠的物資和人力資源，特別當我們要能及時地使「中央」和「江—浙—皖」三省區委的工作運轉起來，就更加感到兩方面資源的不足了，與此同時，由於我們人員不多，必要物資欠缺，即使我們有錢可花，也不能完成日益迫切的任務。然而，我們的處境如同北方、華中以及南方各省的處境作一比較，我們倒還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各省省委自從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不久後，便一貫地執行國共兩黨合併的政策，結果這些省委是以虛弱無能，幾乎束手無策而告終。

湖南省委自從毛澤東應邀調來上海工作之後，由李維漢出任書記，直到 1923 年夏初，該省委的工作還算開展得不錯的。那裏有堅實的工人基礎。只因為江西西部屬於萍鄉煤礦礦區，這裏的工人從來沒有停止過與省委的聯繫。但這是一個例外，而例外卻能證明規律。

廣東省委一直是以譚平山擔任書記，以馮菊坡（Feng Jubo）負責工

人運動，以彭湃負責農民運動，最近又因周恩來剛從歐洲回國，更加充實了廣東省委的領導力量，周恩來不斷地深入廣大群眾中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廣東省委從未有過這麼長的時間，在以他們為特色的領導下開展活動的，也就是說一直活動到 1923 年底。實際上，到了 1924 年底，廣東共產黨人中的絕大部份，都已轉為「革新」國民黨內的專職人員了。譚平山本人是被突然任命為「革新」國民黨中央機關的「組織」部部長；這個職務使他全神貫注，簡直沒有多餘時間，讓他自行支配來從事任何其他工作了。馮菊坡與彭湃則一貫地活躍在廣東的工農運動中，如同在廣州商團危機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一樣；但他們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再也不會這樣幹了；至於此時的周恩來，把主要的時間用在甚麼方面呢？他頗為聰明地、為了國民黨的利益，擔任了黃埔軍校士官生的政治部主任。

北方區委的所在地就在北京，一向以李守常作為區委的主要發起人和鼓舞者。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領導人，領導着北方各省的一系列運動並提高區委的領導能力。但不幸的是從 1923 年年底開始，他在該區公眾心目中是作為國民黨的頭號人物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而聞名的。正因此，直到 1924 年夏初，人們指責他是全心全意為維護孫中山黨的事業而獻身於事業。我們總還可以記得起，當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他便決定在莫斯科逗留一個較長的時期，這最大可能就是為了擺脫這種約束。然而這樣一來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即令是以臨時代理人的身份也無法具有這樣出色的才能來取代他的位置。因此，我黨北方區委組織就變成了從未有過的、如此無所作為、如此虛弱無能的組織了。

武漢地區的共產黨組織，一直是由陳潭秋主持領導的。這個組織先是因 1923 年二、七事變而遭到嚴重損失，後來又於 1924 年春天，由於上了國民黨右派的當而受到打擊。陳潭秋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同志，但他過高估計黨的組織者具有第一流的能力，而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小的小組，

而且由於元氣大傷，正處於困境中的小組。

等，等等……這裏顯而易見的是，我們並未擁有數量足夠的戰士，他們是經過考驗、富有經驗的，而且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動員起來為我們的利益，我們的理想，我們的事業而奮鬥！自 1923 年底以來，我們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們就一直為這個問題而擔憂；現在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有根據的。但，難道我不是這部份中國同志授權的代表嗎？不錯，我歷來就是這樣的代表，而且我在這個位置上一直留到 1925 年 1 月底，並因為有了這個身份，我才參加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然而，在 1924 年 7 月，正當我告別莫斯科回國之前，東方大學同志們以及我本人都早已宣誓保證過，當我們回到中國之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決不會去壯大國民黨的行列，只能接受為我們自己的黨而工作。難道不是這樣嗎？自從我把家安頓在「三零七」號之後，我經常可以在黨「中央」的周圍參與工作，每當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從蘇聯回國時，我們就指派他們在上海或各省以共產黨員幹部的身份去完成最迫切的任務。

後來，我得到同意，在 1924 年秋天，先後把張太雷、鄭超麟、任弼時三人結合到黨中央刊物《嚮導》和《新青年》的編輯組中來。

1924 年 12 月底，陳延年從莫斯科回國，我就毫不遲疑地派他去廣州。從 1925 年初開始，他充份發揮作用，給廣東省委注入了生命活力，因此，我們也同樣毫不遲疑地把廣東省委改名為兩廣區委，即廣東和廣西區委。

由我向黨中央推薦派往北京去協助北方中國共產黨開展活動的第一位同志，他不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而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叫做劉伯莊。他已經三十多歲了。當他接受任命之前，在上海逗留的短暫時間內，我並沒有詳盡了解劉伯莊，他的性格，溫柔文雅，公正率直，頗能經常性地引起任何人對他的全部信任。不久後，他便以出色的工作方式，擔負起北京城我黨黨委書記的職務。然而，正當劉伯莊剛剛向我們告別時，

我得知趙世炎將要離開莫斯科回國。他打算在到達上海之前，先在北京逗留幾天。當時，一個念頭在我心裏閃過：「趙世炎如果回到上海來，發揮的作用不大。他不應該只是在北京逗留幾天，而應該在那裏定居下來，以便對擺脫北方區委工作的滯後不振，做出貢獻。」我向黨中央提出我的想法，黨中央終於採納了。就這樣，從 1924 年與 1925 年之間的那個冬天開始，亦即李守常仍然逗留在莫斯科的若干星期內，北方共產黨組織，在兩個人，即一個從法國留學回來，另一個在蘇聯留學歸來的雙重推動下，重振旗鼓，意氣煥發。在同一情況下，並且幾乎在同一個時候，我還做了一件必需做的事，這就是使另一個從蘇聯歸來的尹寬同志，刻不容緩地去負責一個省委的重建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省，就工業生命力來說是不容忽視的省，因而還可以重振我國的工人運動——這就是山東省委。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鼓舞人心的，確實，也沒有甚麼上過當、受過騙，然而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在組織的領域內曾經做出的努力，畢竟是遲了一點了，而且也是明顯不夠的，只在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才開始產生某些感覺得到的效果。

從 20 世紀 30 年代初，直到 60 年代初，一些「歷史學家」在中共接二連三地授意下，由他們負責撰寫或續寫的「概論」、「教程」中，概無例外地給我們提供的是不合實際的、任意想像出來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史。一些歷史學家有意識地把某些事說得天花亂墜，把黨的四大描繪為早已建立起群眾基礎的黨代會。另一些歷史學家則有意地將黨的四大看作毫無意義的黨代會，他們或者是單憑記憶，或者任意挑選，而且只是十分簡單地提一提，就把黨的四大迴避過去了。同樣，在他們所提供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大會進行時的環境條件，缺乏嚴肅性的評述，而對參加大會的人數統計，則各不相同，在這些歷史學家的筆下，人數至少有二十人，最多的高達七十人，相去何遠！

事實上，當黨代會開始工作時，我們的情況究竟怎樣呢？大約十來位代表，兩位來自「中央」的同志以及四位觀察員，總數為十五人或十六人。北方區委代表一人，以武漢為中心的代表一人，廣東省代表一人（即周恩來），湖南省委代表兩人（李維漢和朱錦棠）、江一浙一皖區委代表兩或三人（其中韓白樺肯定是代表之一），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小組代表一人（這就是以我為代表），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一人（張秋人 Zhang Qiuren），青年團代表只是對上海青年團組織負責，以上組成了黨代會。「黨中央」應有四位同志，但僅有陳獨秀和蔡和森參加，因為瞿秋白仍在廣州，而毛澤東長期以來早已離開上海，在他的故鄉——湖南養病。至於黨代會的觀察員，規定只有發言權，而沒有表決權，他們是李啟漢、項英、李立三、向警予，四人中的前三人是作為工人運動的領導者而應邀參加，而後者則是黨代會中唯一的一名婦女，她是作為婦女運動的代言人而應邀參加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婦女運動卻早已消聲匿跡了。

李維漢（後來又稱羅邁），此時還不到三十歲，1919年底，他隨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人，也是為了同一原因從法國回國來。從那以後，他一直在長沙活動。1922年，他成為我黨湖南省委最積極的成員之一。1923年初，當毛澤東在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我黨「中央」第四號人物，不得不離開湖南，定居上海之後，李維漢就很自然地擔任了湖南省委書記。從政治上來說，李維漢並非才智出眾的人。但他具有很高的文化水準，善於思考，小心謹慎，因此能出色地完成他所承擔的任務。除此之外，在1923-1924年間，他不滿足於僅僅使我黨的湖南組織、保持在毛澤東於1921-1922年間所達到的水準；他還要加以發展和提高，正像我曾經指出過的那樣，湖南省委是我黨各省委組織工作進行得較好的一個省委，實際上，在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可以說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省委組織。朱錦棠是一個可愛的小夥子，十分年輕，一臉笑

容，卻具有豪邁的氣派。他是地道的安源煤礦工人，富有戰鬥性。在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幫助和培養下，朱錦棠成為一位深孚眾望、富有活力的鼓動家。最近幾個月來，他在汪澤楷的政治領導下工作，汪澤楷也是從蘇聯留學歸來的一位同志，他能力很強。此時的朱錦棠是最適宜於開展工作，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自信過。

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晚上，亦即 1925 年 1 月 20 日（譯者注：應是 1 月 10 日），我以個人身份前往廣東代表落榻處的旅館去看望周恩來，就當時情況來看，即使在黨內，周恩來也還不是一個令人矚目的重要人物，但是兩年來，特別是在莫斯科時，從我經常接觸到的或從法國、比利時，或從德國回來的同志口中，多次聽到有關周恩來的事，但他們也並不急於希望去結識他。

他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彷彿我們曾是老朋友：這使我感到非常驚奇，因為當我在蘇聯時，我並沒有機會像跟在歐洲留學的同志那樣，同他建立起通訊關係。周恩來已不是一個年輕人了，但看起來還很年輕，他比我年輕三歲或四歲。他是一個很漂亮的美男子，一個富有魅力的人，還留有一縷小鬍子，使他的風度更加別致。他祖籍浙江，大部份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在他的伯父家裏度過，那時他伯父在東北（或在北方）——是一個中級官僚，後來他到天津南開中學上學，他講的是一口非常標準的北方官話，就像是地道的北方人，這時他從柏林歸國僅有幾個月時間，自從去年秋初以來，他幾乎全部讀過我在《嚮導》報、《新青年》雜誌上所寫的文章，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這些文章使他欣喜若狂，並且毫無保留地贊同文章的內容。只有到了此時，我才了解、為甚麼他如此親切地如此主動地向我表示好感。

周恩來跟我談話時，態度隨便，主動熱情，可以說無所不談，他談到了在歐洲逗留期間的活動，廣東我黨黨務情況以及他的個人問題……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他在個人問題上的坦率友好態度，他對我說，他最眷

戀的人是「小超」。也就是鄧穎超，這是他「五四」時期在天津認識的。他還向我吐露了知心話，他說此時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再見到「小超」。他頗焦急地問我，是否有鄧穎超的消息，特別是有令人興奮的消息。事實上，她一直住在天津，周恩來急想知道，是否有甚麼辦法能安排鄧穎超即刻前來廣州跟他在一起。我對他說，辦法是有的，並毫不躊躇地答應他，我必將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如此熱情，委實使我深受感動！但同時，又使我感到有點困惑不解，彷彿我們兩人之間是不協調的，因為他太善於社會交際，是一個外向的人！然而，當我們兩人在交談時，當我聽取他在傾吐心情時，時間已在不知不覺中流逝了。最後，我向他告別時，夜已經很深了。

我們在公共租界內，租了一間小屋，作為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會場。代表大會「會議室」是一間樓房，這裏可容納的人數不足二十人。小房間裏僅有的傢具是「條櫈」，我們全體代表只得一個緊靠着一個坐在這些條櫈上。代表大會是秘密召開的，要求十分嚴格，各代表都要遵守極其嚴密的規定。例如，不許代表成群結隊，只能單獨行動，當大會舉行期間，各代表一直要留在小小的會議室裏，如果要離開會議室時，必須做到一個挨一個地分別出去，會議期間有一兩位同志值勤，在會議室周圍擔任戒備工作。代表大會於1925年1月21日開幕，24日結束（譯者注：代表大會於1925年1月11日開幕，22日結束。有關四大的譯者注，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作出的）。會議研討以下課題：（1）當前的政治形勢；（2）工人運動現狀；（3）農民及土地問題；（4）青年動員工作；（5）婦女問題。在大會最後一天，我們回顧和審視各個不同問題以及我黨新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選舉程式。我被提名擔任大會組織處秘書後，便小心謹慎地投入準備工作，對大會期間的各次會議都做好細緻佈置。

有關政治形勢部份的討論，如同慣常的做法一樣，是根據任期屆滿

的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報告而展開的，討論的主要內容有：自從上次代表大會以來，即 1923 年 6 月以來，在中國所發生的重大問題以及共產黨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陳獨秀在其顯然帶有總結性的報告中，着重談到了北方發生的馮玉祥政變及其引起的影響，但同時，他沒有略而不提南方發生的最新事件，即國民黨的「改組」問題，也沒有忘記表達我們對最近由國民黨右翼集團發動進攻中國共產黨人的巨大憤慨。在討論的整個過程中，幾乎所有代表都積極參加了。令人注目的是，代表們在發言中，可以說沒有對陳獨秀的報告提出反駁，而是正面地提出論據；有些代表則要求根據他們的方式把報告的局部或全部內容重新加以整理安排。陳獨秀的報告，不論就其形式或內容來看，已經真誠坦率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方針路線的轉變；所不足的是，這條方針路線的真誠轉變，還沒有使代表做到心領神會，因此，還應該進一步地使報告內容更充實、更加明白易懂。

中國北方事件，竟然以這種形式出現，絲毫沒有令我們感到樂觀。毫無疑義，自從去年 10 月底以來，吳佩孚再也不可能把北京、天津、河南抓到自己鐵腕手中，而現時，所有這些地區已經落到了馮玉祥、胡景翼（Hu Jingyi）孫越等人操縱的國民軍的掌握中了，這就是說，不論表面上或實際上，段祺瑞將再次出任「中華民國」的第一號人物，這就不用着多加懷疑了。我們不禁要問，這種情況要延續多長時間？要以甚麼樣力量，才能使北方不至於出現這樣的局面：即段祺瑞重新奪回失去的土地、或者說重新恢復我們十分熟悉的安福系軍閥專政政權，甚至有時候還要重新建立最殘酷的統治工具，來鎮壓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運動呢？孫中山到達北京已有三個星期了，他仍然沉默不語，這個事實同樣地不能不使我們引起越來越大的關切。我們仍須下決心，繼續推進我們的運動，要支援這種迫切需要、即孫中山本人在廣州，後來於 1924 年 11 月間在上海，曾經轟動一時地形成的決議，去繼續施加我們的影響、

以有利於擴大聯合力量去「迅速召開國民會議」，我們還應切實地意識到，我們有必要去痛斥停止召開以段祺瑞為首腦的重建政權的善後會議（Conference de reconstruction）、要說服群眾毫不遲疑地行動起來，阻擋走向安福系軍閥統治的道路上。

在中國南方發生的那種事態形式，在我們看來，並沒有比北方發生的事件更具有令人鼓舞的意義。粉碎了廣州商團叛亂後三個多月，籠罩着廣東全省的政治氣氛，實際上是異常混亂的。在廣東省遼闊境內的各個不同地區駐軍，仍然是由廣東小軍閥楊希閔（Yang Ximin）、劉震寰（Liu Zhenhuan）、鄧本英（Deng Benyin）以及許崇智的「部隊」組成，這些「部隊」，純係填不飽的僱傭兵，亦即難以控制的烏合之眾。然而就是依靠這樣的「部隊」，才得以重建廣州政府，不言而喻，廣州政府的能否存在要取決於小軍閥的忠誠投靠。從那以後，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從國民黨奪取政權，並在我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擊退了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走卒的進攻以來，為甚麼國民黨的基礎仍然是更不穩固、更不可靠呢？實際上，我們對於國民黨所抱的信心歸根結底不可大於這夥國民軍的將軍們……

我們有關政治問題的長期辯論，也就是我黨現時在北方和南方所面臨的政治問題、使我們接觸到了中國國民革命的階級領導問題。用不着再加懷疑了，這時我黨曾經宣佈過的所有問題中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嶄新政治問題。就我本人來說，誰都知道自從大家讀到了我在1924年12月那期《新青年》上所分析過的文章以來，我是何等地期望這個政治問題能得到澄清、得到解決。然後，其他同志也都談了他們的想法。陳獨秀發言了。他在發言中首先突出的是，我們在論文所提到的基本點，即在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工人階級必然要擔負起領導作用。接着獨秀而來的發言者，很快就表明，在我們同志中間，就這個基本點而言，誰也沒有不同意見、他們跟獨秀的意見以及我的意見是相一致的。

現在留待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有關政治部份的整個討論結果，寫進大會決議中，我們誠意地要求獨秀接受起草這份決議書。

此刻，所有的與會者、都已深入理解這個論點，即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必然要緊緊的掌握住領導權；此刻，代表們毫不困難地理解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工人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應該調整的所有問題中最為迫切、最為重要的問題了。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的三位委員，李啟漢、項英和李立三，充滿激情地參加了討論，並在討論中對工人運動進行了回顧和檢查。

通過回顧和檢查，代表們詳細地了解到，近四個月來，為喚醒無產階級自覺性，我們曾在上海所做的準備工作。首先是楊樹浦區，我們利用南洋煙草公司工人自發罷工的時機以及罷工事件結束之後的工運工作情況，後來由於開辦了工人成人夜校和工人俱樂部，我們在小沙渡區所做的工運工作。當代表們知道，小沙渡區有一萬多日本紗廠紡織工人，我們通過俱樂部，就能建立起並保持着同她們之間的長期聯繫時，他們便深感驚奇。這種成功的經驗，使他們深受感動，豈僅深受感動，簡直是鼓舞了他們的高昂鬥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後的整個時期內，一部份對中國無產階級實際能力抱比較悲觀態度的同志們，現時也開始充滿着無限希望了。他們不容遲疑地開始研究、有否可能在全國各地像在小沙渡區所曾經取得的經驗那樣，使中國共產黨成為能與工人保持一定聯繫的黨。在這一點上，北方特別值得注意。事實上，北方存在着一些微妙的跡象，北方的新統治者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其他兩個首腦，不僅是在口頭上支持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且已在他們三支部隊控制下的各省份，或各省份的局部地區，放鬆了對群眾運動、學生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的控制。他們甚至還要求釋放鐵路工人領袖，這些工人領袖，在1923年2月初，吳佩孚為了把他們送進監獄，長期禁閉起來，是

不惜任何代價的。異常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應當利用這些微妙變化，特別要利用這些變化，立即着手重建兩年前受到破壞的、沿平漢路的鐵路員工工會，還要利用這個時機，在中國所有鐵路員工中建立起工會。自從第一次中國勞動者代表大會召開以來，差不多三年已經過去了，至少在我們看來，現在要召開第二次勞動者代表大會是不容推卸的，我們決定 1925 年 5 月 1 日在廣州召開。

在中國工人運動現狀的討論中，使我們得出的有關理論和實踐性質的結論，已經收進由李啟漢、項英和李立三參與起草的決議中。儘管決議全文並不長，但應該說、能說的話都說了。決議不禁使人們回想起過去，這不僅自從 1923 年二、七事件發生以來，而且特別自從共產黨員中的極大部份為國民黨效勞以來，中國的工人運動已不再受到重視，甚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再作為獨立自主的力量而存在了。與此同時，決議毫不含糊地宣告說，長期來，工人運動失去了生命活力，也不可能夢想它去發動我國國民革命了。

我們關於農民運動的討論，沒有像討論工人運動那麼豐富多彩，那麼情緒激烈。我甚至認為，總的說來，農運問題是令大家不滿意的。由於甚麼原因我們的農運工作令人不滿意呢？這是由於我們在這方面既不了解情況，又缺乏經驗。顯而易見，國民革命如果得不到強大農民運動的支持，要想取得勝利，這是莫大的幻想。但是，在這方面唯一可以用來作為參考的經驗，是在彭湃同志的關懷下，在廣東海、陸豐地區建立起來的農民協會，這有兩個理由：其一，同一類型的農民協會在中國其他地區從未出現過；其二，大約六個多月以前，彭湃相當關心，以十分確切的形式向我們提供情況，刊登在《嚮導》報上⁹⁸。此外，我們並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餘地，我們只限於把已經發生的並且已經取得成功的經

98 彭述之這裏提到的文件，即彭湃致世炎（也即致陳獨秀）的報告，這報告發表於 1924 年 6 月 18 日期《嚮導》報上。

驗作為值得慶幸的事，此後，還公開宣佈，這是一個典型的實例，應該盡可能快地把這個典型實例推廣到其他地區和省份。一方面，我們進行口頭宣傳，另一方面，我們還把典型實例寫在決議中，決議強調說，為了要把全中國農民成功地動員起來，最恰當的辦法，是像在海、陸豐地區那樣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在一個確定的地區建立有一定密度的農民協會聯絡網；第二階段，組織為保護農民協會聯絡網的小隊，以便同按大地主的命令而行動的保安部隊的武裝侵犯作無法避免的鬥爭。

另一方面，我們在農民運動的討論中以及在我們所寫的決議中，只不過是以極端空泛的辭句接觸到這個重要而又又是關鍵性的問題，這就是土地改革問題。根據實際情況，我黨「中央」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既無時間，也無可能為我們準備任何原始文獻，以便及時地提出這個問題，甚至也無可能為我們提供解決土改問題的初步方法。當然，我們知道好幾個月前，共產國際已經專門派遣一位密使來到中國，調查中國農村具體情況以及有關土地制度問題。當這位密使經過上海時，我黨「中央」通過瞿秋白跟他進行了聯繫。然而，看來這位密使還沒有把他的調查工作完成。從那時以來，我們寧可把這問題擱一擱，留到以後再提。

在共產國際的責令下，我黨有關農民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及其表現出來的類似弱點，已不是第一次，不幸，這也不是最後一次。在中國二次革命爆發的前夕，我們還沒有理解到：如果按照我們自身的實際經驗以及群眾的實際經驗，制定一項切實可行的土地改革綱領，那是絕對必要的；遺憾的是，後來我們並沒有做得更好些。1926年和1927年，每當我們要起草土地改革綱領初稿時，事實上，我們所制定的綱領只能是令人失望的文件，因為我們太缺乏有具體內容的建議了。如果我們能不辭辛勞、全力以赴去仔細地研究俄羅斯農民參加1917年革命的歷史現象，我們就會很快地克服這類嚴重的弱點了。但問題的癥結恰恰就在這裏：我們沒有全力以赴地去研究俄國農民是怎樣參加革命的。就我個人

來說，我特別意識到，無產階級一經掌握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之後，就應該緊密地與農民結成聯盟，以期在中國能夠完成歷史給它的使命。但當時我除了以抽象的、籠統的表達方式之外，再也不能以別的明確方式來表達這種迫切要求。就這樣，一直拖到最後，亦即 1927 年春天，我發現自己同中國共產黨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無能以一種具有實踐性的立刻可以應用的指示語言，來表達這種要求。在無能問題上，經常使我一再反思，在無能的原因上進行自我質問，我們並以此自責，至於我自己，從中國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甚至在我的一生中，我一再地譴責自己。

關於動員青年工作的討論，不言而喻，首先應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現狀的討論，對此，大家一致同意，當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應隨之召開，開會的地點與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相同。到 1925 年 1 月止，中共黨員的人數已達一千人，青年團員人數為黨員的兩倍，即約二千人；這些數位必須包括在莫斯科的同志們。

青年團團員幾乎全部是學生，這在 1920 年是這樣，青年團初創時是這樣，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無需任何懷疑，青年團所發揮的最大影響是在學校裏。但畢竟受其控制的學生會連一個都沒有。無疑，青年團要想在北方擴大影響，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困難，儘管在北方地區，曾經享有雙重優越性，也就是說存在着傳統的影響，其一是對過去或「五、四」時期的既定秩序的抗爭，其二是在各大學內部擁有十分嚴密的先鋒分子和同情者網絡的支持。其實，當直隸系軍閥集團的將軍們成了北方統治者之後，便對學生運動施加特別殘酷的鎮壓。但現在直隸集團的將軍們只看到自身的影子了，而國民軍的勢力範圍則週復一週地擴大起來，難道說此時的青年團、在北方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不是有了更好的機會，可以在轉瞬之間，重新找到同樣光輝燦爛的前景嗎？

但按照我們的判斷，可以坦率地說前景恰好相反，即使不是令人焦慮萬狀，至少可以說是令人遺憾的，因為青年團既沒有在青年工人中「禁

下根來」，也沒有在青年農民中「站住腳跟」。這應當如何解釋呢？顯而易見，這是由於在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中，喚醒青年工、農覺悟的工作，做得太遲緩、太拖拉了。然而，我們早已看到，經常與小沙渡「工人俱樂部」有聯繫的青年工人人數不少，為甚麼我們的青年團在好幾年中都不去吸收他們呢？同樣，海、陸豐的青年農民，參加到由彭湃創建起來的農民協會的人數也是很多的，但為甚麼其中最活躍的分子也不曾想到要加入青年團組織中來呢？長期來，我們曾經討論到，以甚麼最合適的、最有希望的辦法來推動青年團擴大其影響，但是，在我們看來，歸根到底在現時唯一可以提出來的辦法，就是要積極地、盡可能地深入到南方和北方的農村中去，藉以加速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即國民會議。

與此同時，除了上述情況之外，青年團還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組織上危機。在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選出的中央書記劉仁靜，實際上早已停止執行他的職能，因為他要完成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習任務。劉仁靜一意孤行，不理睬團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懇求和責備，因而引起了很大的公憤！當我以黨代表身份、負責進行第三次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工作之後兩、三天內，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便要求我去幫助平息這種公憤。

關於婦女問題，婦女的相應要求以及婦女參加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特殊方式問題，我們都進行了討論，但討論的內容是貧乏的，也不能令人滿意的。在中國，確有一批意志堅強的婦女，他們願意在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中，徹底發揮他們的婦女作用。但不幸的是，中國婦女未能出色地成為一支獨立自主的、群眾性運動的有生力量。

同樣，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換言之，即我黨「中央」機構內，並未設有「婦女」部的負責人來開展活動，這也就無須驚奇了。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曾受中央之託，非正式地負責處理婦女問題，但她又怎麼能認真地、專心致志地來肩負起這項工作呢？好幾個月以來，

擺在她面前的有大量的工作，因為她一直是為國民黨在上海出版的日報《民國日報》主持婦女專欄。婦女問題，確實不是我們可以忽視的、無足輕重的問題；反之，這問題曾使我們付出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是，此時迫使我們要做的事，還只能局限於以不明確的詞句來表達一種願望，那就是刻不容緩地提出解決婦女問題的初步辦法。

誠然，我們的黨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黨，我們所有與會的人都高度地意識到、我們要去完成的任務是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和崇高性。我們務必嚴格地、認真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新中央委員會的常委委員。選舉的結果如下：

一、當選為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陳獨秀、李守常、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彭述之、李維漢及朱錦棠，共九位同志，其中前五人，是我黨第三屆中國委員會的老委員，張國燾是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的老委員，後三人是新當選的中央委員。（譯者注：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是陳獨秀、李守常、蔡和森、瞿秋白、項英、譚平山、張國燾、彭述之、李維漢九人，候補委員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五人）。

二、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會，亦即我黨中央領導機關，其職權一直保留到召開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時為止，常委人數共五人，包括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和彭述之。

當第四屆代表大會散會之前，我們最終通過了一份〈聲明〉，該聲明由陳獨秀起草，並在1925年1月28日刊登在《嚮導》報上。〈聲明〉的特點既帶有普遍性，也探討了當前的形勢，旨在說服並動員人民群眾，重新投入反帝鬥爭，因此應以最快速度、最大可能、並具有最廣泛的群眾性，參加到「為加速召開國民會議的聯合活動」中去。這是一份很出色的宣傳文本，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這就是僅僅輕描淡寫地說說我們的工作究竟是甚麼？其政治價值如何？以及代表大會授權我黨進行

路線調整的重大意義何在等等。然而，〈聲明〉卻成了第四屆代表大會的唯一文獻，僅在很短期限內出現在流傳中，但從 1927 年以來又是唯一沒有完全消失了的文獻，這就是說，斯大林已經做出決定，要把他自身犯的錯誤，給陳獨秀扣上一頂帽子，指控他一直陷在右傾機會主義的深淵中。可以肯定地說，在 1925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我們的「中央」決不會忘了通過蘇聯駐北京大使、把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最主要文件，首先是有關政治形勢的決議送達莫斯科。因此這就是為甚麼我總是懷有一線希望，有朝一日人們或許會在共產國際的檔案裏重新找到這些主要文件……就算斯大林分子未曾想像到，讓這些文件發表，或者加以篡改，都是他們無法推卸的罪責。

所謂斯大林分子，其實這裏着重所指的，就是斯大林這批人，在 1927 年，已經成功地制服全蘇聯接受他們的獨裁專政，也是這批人，在同一年中，制服了中國共產黨接受他們的專橫領導，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以及其他內部流行的文件，他們是不惜任何代價，要加以掩蓋和隱瞞起來的，因為這些文件完全能夠粉碎他們關於中國第二次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全部謊言，因為這些文件提供了絕對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陳獨秀在 1925 年 1 月間，早已停止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陳獨秀只不過在莫斯科的聖諭壓力下，才陷進了右傾機會主義泥坑的，這才是事實的真相。隱瞞歷史文獻不僅只是一個政治上的原因（這以前我已談到），而且還有個人原因。當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宰，後來又成為全國主宰時，他本人就注意到、務必使人們盡可能少地去談論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此後才不會有人敢去發掘或重新發現有關類似文件了，這豈不是個人方面的原因嗎？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不正是在毛澤東沒有出席的情況下召開嗎？一點也不錯！可是在個人意圖支配之下，這便成了具有加倍危害性和仇恨性的事了，毛澤東直到他只剩下最後一口氣，還念念不忘這樁私仇。

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一共持續四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持續了三天。青年團召開大會的會場及其會議期間的物質條件，與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幾乎完全相同。參加青年團代表大會的人數約有二十位同志，其中包括觀察員在內。他們代表的地區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安徽、浙江，全國各省的其他城市，也有從莫斯科來的代表。我未能一一認識所有代表。張秋人（Zhang Qiuren）、惲代英、黃日葵（HuangRikui），林育南、任弼時及張太雷，從政治角度來看，是所有代表中最成熟的。上海代表張秋人，同時代表劉仁靜，臨時行使青年團全國書記的職務。惲代英長期以來擔任青年團定期刊物《中國青年》的主編。黃日葵代表北京、林育南代表武漢、任弼時是從莫斯科來的兩位代表中之一，另一位是張太雷，他同時以青年團「創始人」名義參加代表大會工作。難道他不正是 1920 年 7 月間青年團成立時的創始人之一嗎？

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是由張秋人主持的。從大會的首次會議開始，我以黨代表身份，應邀到會致辭，並作了有關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進行情況的報告，報告內容即大會上進行爭論的要點以及大會通過的決議。當我結束講話時，我就了解到，大會對報告的反應熱情積極，欣喜若狂，而且毫不遲疑地向我透露他們要進行討論。我在那裏還逗留一段時間。實際上，青年團的若干負責人早已告訴我，最近幾個月來，他們感到十分滿意，因為他們在黨的刊物上已經發現，人們同意我所採取的立場，也正是長期以來他們的確希望看到的立場，即應使所有中國共產黨員負起責任，有所建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曾反覆多次表示過，他們強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黨卻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深深地陷在這條路線的泥坑中。其實自從 1923 年夏季以來，他們一直不斷地、而且相當公開地要求黨向左轉。然而使我感到震驚的是：黨仍然滿足於在口頭上宣稱，他們有決心要對國民黨拉開一定的距離，而且要盡力使工人運動振

興起來，他們這樣說只不過要人們感到滿意、贏得稱讚而已，這難道不令人震驚嗎？

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第二項議程，規定為對團工作的決議草案進行討論，這是為團的臨時領導機關做好準備的。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做出這樣的估計，即在當時，青年團不乏機遇可為自己爭取到大量青年工人和青年農民的，但多數代表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下的觀點上，即青年團的首要工作，是要繼續把影響擴大到各級學校中去、同時要認識到，在已經取得成績的顯著方法之一，就是有效地為擴大受黨支援的、「加速召開國民會議」的聯合行動作出貢獻。那麼如何引導學生在聯合行動中與群眾打成一片？如何說服他們在新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基礎上搞好團結？與此同時，又應如何使他們下定決心去不斷壯大青年團的行列？所有這些都是大會代表們需要着手解決的問題，此外，加速召開國民會議聯合行動的熱潮，也早已充滿希望地在上海、北京顯示出來，問題終於澄清了，擺脫困境在望了。代表們在大會上提出了青年團的工作決議，這當然是在內部使用的，最後得到通過和批准，這決議還指出了有關行動的指示，對於那些在國民黨內工作的或與之有聯繫的團員來說，是適宜於去遵守的。這些指示從形式上來看，雖比較簡單、樸素，但就其思想內容來說，頗令人滿意和得到鼓舞的。

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第三項議程，是審查團在各地區的活動報告，也就是說要轉到回顧團在各省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團務情況，這也是早已安排好了的，當代表們完成了這項議程之後，我便提出建議要更換團的名稱，即不再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理由很簡單，青年團採用的名稱應與黨的名稱相對應，因為黨和團具有相同的性質。當我提出更換青年團團名的同時，我還要求他們向整個第三國際提出採用這個有效的、有充份根據的建議，務求避免在某些國家裏、有人企圖把下屬於第三國際的青年團，跟下屬於第二國際的青

年團混淆起來。我的建議沒有在代表們當中引起任何異議，而且立刻一致地通過了。當時，大會未經停頓便轉到第四項也就是最後一項議程上去了，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最難處理的議程，因為所涉及的是有關青年團中央領導機關的更新及其改組，代表們一經接觸到這項議程，勢必會提出如下問題：如何對待劉仁靜？他作為青年團第一號人物，已經違背了紀律，放棄了職責；我們又將如何處理他呢？」

到會代表幾乎全體一致，對劉仁靜深表憤慨，其中大部份代表堅決主張，不僅要把他開除出青年團，而且還要把他開除出黨。各代表決不能容忍他置同志們的大量誠懇意見於不顧，而是很快就背離自己的職守。代表們認定，應當以最嚴厲的方式制裁他曾經表現出來的卑鄙行為，這是責無旁貸的。最後，代表們要我向他們談一談我本人對此問題的想法。這可把我難住了，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實際上，我的觀點和他們的觀點並不完全吻合。但，我怎麼能取得他們的同意呢？開始，我向他們表明，劉仁靜犯的錯誤，是把取得畢業文憑的私事放在對一位革命戰士的責任心之上，這是無可否認的；同樣無可否認的是，他的行為是應受譴責的；不管怎麼說，最明顯的是如果青年團代表大會取得大家同意，是完全可以不受約束地處理一個團員的。然而，緊接着我提醒代表們，如果說他們有權可以把劉仁靜開除出青年團，但要把劉仁靜開除出黨，那就未必妥當了。我還明確地提出，考慮到劉仁靜是我黨北京最早入黨的老同志之一，依我之見，無論如何，他只是在追隨我們戰鬥行列的過程中犯了錯誤的。最後，我建議最好是向他提出批評或者發出警告，而不是把他開除出青年團。我的建議並沒有受到代表們的積極歡迎。於是辯論展開了，情緒激烈、富有生氣。結果，代表們還是贊同了我的意見。向劉仁靜同志發出的警告，卻不那麼客客氣氣的，但畢竟只是警告而已。

那麼此刻，由誰來領導青年團呢？代表們彷彿感到，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其實，他們並不是不知道，張秋人既沒有願望、也沒有能

力擔任青年團全國書記，他也沒有同意擔任臨時書記職務，只因為他認為必有某個人同意擔任的。他曾力圖謀求這樣一個人，但是徒勞無益，結果並沒有找到，於是在任期屆滿的青年團中央其他領導成員中挑選一人，這個人既是可以接受的，又是合適的，以便將他培養為新的青年團第一號人物。比方恽代英吧！他顯然作為《中國青年》的編輯，是最理想不過的合適人物。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出色地完成了他已完成的任務。但是，如果允許他辭去編輯，調他去幹組織工作，他能發揮甚麼作用呢？肯定不會有很大作用的。因此，青年團中央在人選問題上，遭到了困難，然後我建議說，不用着急，時間還很從容。我經過考慮之後，便同陳獨秀、張太雷及其他領導人商談，並設法找到解決困難的辦法。甚麼辦法呢？辦法是，當天我力促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立即考慮以下建議：「我們把張太雷和任弼時結合到團的新中央領導機關中去，擔任第一、第二書記，以便當第一書記不在時，由第二書記負責處理團中央事務。」這個建議得到全體代表的贊同，立即選舉青年團新中央領導層，領導層由十二人組成。如同我所希望的，張太雷擔任青年團新的中央第一書記。同樣，也如我所希望的，任弼時擔任第二書記。第三書記顯然就該是恽代英了。青年團中央領導層中還有其他幾個人，他們都像大家所能預料得到的，是來自北京、上海和武漢等地區的負責人，即黃日葵，張秋人及林育南。

團中央選舉的結果，決非偶然的，當然也決非有意地把我的夥伴推到前台，使我可擅自勒令青年團把張太雷和任弼時置於團中央的領導位置上，這僅僅因為當時的環境、條件迫使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我們的青年團是否歷來有過這樣名實相符的領導層呢？青年團的第一任全國書記是施存統。他具有多種多樣的素質和才能，這些我都曾經談到過，但是，可以說，他所具有的才能和素質，幾乎沒有一樣能合適地用來發揮他擔任全國書記的作用。他唯一能真正做出貢獻的事，就是創辦了青年團第

一份表達輿論的宣傳機關報《先驅報》，這是一份半月刊，從1922年1月持續到1923年8月。青年團第二任全國書記是劉仁靜，他幾乎很少全心全意地從事於青年團的發展工作，他只是為我黨《嚮導》週刊寫點文章，因為在一個很短時間內他曾領導《嚮導》報工作。至於張秋人，自從劉仁靜擅離職守之後，曾任代理書記，但他缺乏熱情，缺乏積極性，總的來說，只不過處理日常事務而已。恽代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自1923年秋以來，他是《中國青年》的總主編，也是主要撰稿人，實際上，應該說他是青年團諸領導人中、唯一一位能真正高度地表現出工作能力的。然而，如同大家所了解的，他跟施存統一樣，要擔任青年團第一號人物這個角色，恰恰是沒有這種才賦。也是不很合適的。不言而喻，大家便把上述這項任務委託給新的成員了。我正是抓住了這個明顯的事實之後，才轉向張太雷和任弼時兩位同志。難道他們兩人不正是具有組織才能的出色人物嗎？我曾經在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已分別向他們兩人徵求過意見，了解一下他們是否願意作為青年團全國書記的候選人。他們都作了肯定的答覆。

自從1923年底認識張太雷以來，我一直對他深表賞識和欽佩。那時蔣介石正在「改組」國民黨，張太雷作為國民黨代表團成員之一來到莫斯科。1924年6至7月間，這次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再次來到莫斯科時，我便發現他是一位熱情洋溢的人。但是，只有當我們一起回到中國後，特別是我們兩人遷居在上海時，我們才成為朋友。通過交談，我們進一步地建立了友情；有一段時期內，我們兩人都住在「三零七」號，這便使我們的友情更加深化了；張太雷曾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抱怨說，雖然他是最早入黨的黨員之一，也是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但是當他提出要求在黨內或在青年團內，確定一個固定的工作位置，讓他為革命而發揮積極作用時，卻幾乎都遭到了拒絕。張太雷是一位難得的高水準譯員，在中國共產黨員隊伍

中是屈指可數的，實際上可以這麼說，他作為優秀譯員一直不斷地、甚至在同一時間內，為共產國際、為國民黨所使用，因此，從 1921 年春到 1924 年秋，他一直不停地到處旅行。譯員的工作屬於技術性的多，屬於政治性或政策方針性的少；而且，首先由於張太雷在漢語、英語兩種語言的運用上有獨到之處，他才榮幸地成為三人代表團的團員之一，這兩個代表團在蘇俄時期先後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派出的。1921 年和 1922 年，當馬林來到中國時，黨派張太雷以翻譯身份隨同馬林往各處走動。當馬林與孫中山在桂林舉行著名會談時，不錯，也正是張太雷先後授意他們兩人達成馬林——孫中山聯合公報。但他從那次經歷中，留下了最惡劣的記憶，他說如果再出現這種類似性質的事件，他將毫不留情地加以嚴厲譴責。張太雷在我的影響下，並沒有向我隱瞞他的想法，他希望能竭盡一切力量，全心全意獻身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建設工作，當然，最能吸引他的是為黨工作，但也可以承擔青年團工作。最後，在我們看來，他在這兩方面表現出來的性格，既是開朗的、坦率的；又是富有奔放的熱情，使他能同時適應團的風格和黨的精神。後來，我又進一步地了解到，當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做出決定，要他出任第三任全國書記時，他感到如願以償了。但遺憾的是，他留在這個位置上僅僅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1925 年春初，瞿秋白事實上已經回到上海，張太雷只得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在鮑羅廷身邊重操他的翻譯「職業」了，名義上說是為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合作的「最高利益」的。這時，任弼時便成為青年團的第一號人物了。

我認識任弼時，從時間上來說，要比認識張太雷久得多了。從 1920 年秋天起到 1924 年夏天間，先是在上海我們倆是同學，後來在莫斯科也是同學。他此時仍然十分年輕，儘管已超過三十多歲了。過去，每當大家在路上遇到他時，總要在他的肩上推他一把，把他當作小弟弟看待以示親熱、勉勵的意思，但此刻大家都不想這樣做了，而任弼時本人，顯

然沒有失去那真誠懇切的一面，也沒有失去他那聰明機智的另一面。在中國第二次大革命的整個時期內，任弼時運用自己的技巧和自己的能力領導着青年團的工作。他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與青年團保持着聯繫，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一生是短暫的，但卻是十分充實的。1935-1936年，他在賀龍指揮的部隊裏任政治委員，在鞏固和加強陝北根據地的戰鬥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他們這支部隊與毛澤東所指揮的長征隊伍的殘存者相會合。1949年春天，即在他死前十八個月，他再度當選為青年團書記，儘管這是一個榮譽稱號。換句話說，他最終還是一個「老青年團員」。

暉代英，是在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結束前，選他為擔任全國第三書記。1925年初，我對他的情況尚未清楚，但從1925年秋直到1927年春，我作為黨中央代表身份，多次參加青年團中央會議，因而我有機會認識他，並且十分重視他那正直的高貴品質。最終，我們彼此間都懷有深刻的同情和好感。暉代英祖籍湖北，武漢「文華」(Wen hua)大學畢業，說一口帶有武漢口音的官話。他精通漢語，能說流利英語，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傑出的政治家，也是難能可貴的鼓動家。暉代英生就一張孩子般的臉龐，但與此相反，他的表情卻十分嚴肅，似乎一本正經，但一旦你與他接觸多了，你會對他產生好感！他是不是有點學生氣呢？決非如此！不容置疑，他是個一絲不苟，清廉正直的人；由於堅持理想主義，他下決心要過艱苦樸素的生活，至少可以說他一生過的是十分清貧的生活，他本人對此並不感到苦惱。但他也決非一個清教徒，與冷酷無情的人是迥然相反的。

第三次青年團代表大會結束了，我不免感到有點依依不捨，青年同志們的激情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們生龍活虎般的生命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為了革命的勝利，在戰鬥中那種一往無前、奮不顧身的精神，久久地扣住我的心弦。

校後小記

《彭述之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中文本是根據巴黎 Gallimard 書店法文本譯出。第一、二章葉向陽譯，第三至十四章周任辛（周仁生）譯。

社團單位名稱，報刊名稱等由法文譯過來，往往與當時使用名稱不同。又由於漢字同音字很多，人名地名只能音譯。二位譯者的譯文也須統稿。周任辛原計劃自己統稿，並尋找資料校對社團報刊名稱和人地名。不幸周任辛於2004年1月27日逝世。我接過他未完的工作，盡力為之。

我所做的，是將兩位譯者的譯文加以統稿。較多的改動是專用名詞的翻譯。我找資料，還向黨史學者請教，並承王觀泉研究員將其珍藏的全套《嚮導》、《新青年》借予參考。原稿列印出來後，曾複印十多冊徵求意見本，分送給老朋友和專家學者，請他們指正。任建樹、朱正、王觀泉、劉平梅、陳鏡林等先生提了許多勘誤意見，我深表感謝。

由於我的學識有限，資料缺乏，加以年齡和精力的關係，還有許多沒有改正過來。敬請讀者指正。

《彭述之回憶錄》下卷，程映湘和高達樂已在整理，直接用中文出版。

蕭舟

2005年1月10日

